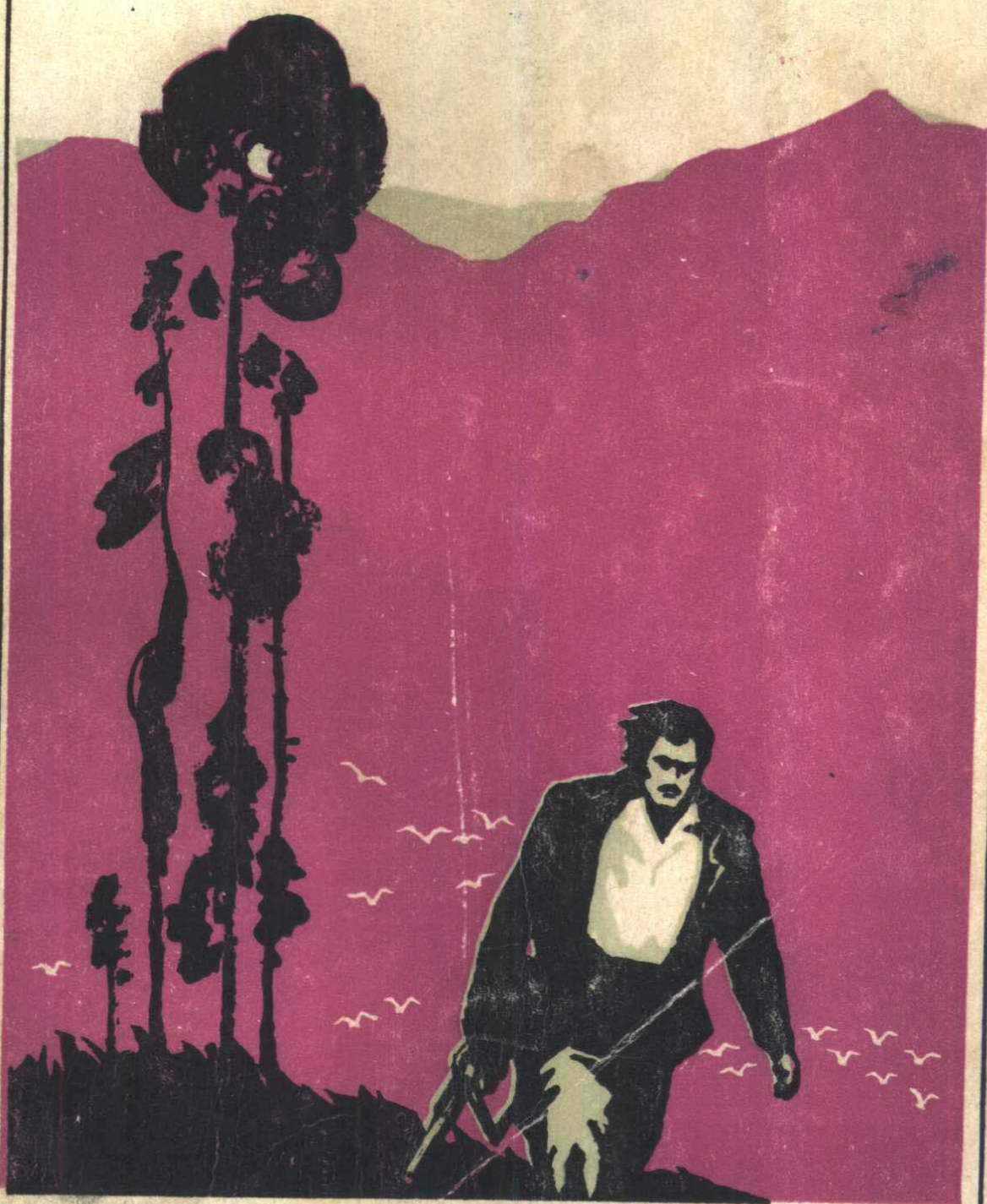


丧钟为谁而鸣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丧钟为谁而鸣

程中瑞 程彼德 译

王永年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nest Hemingway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43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共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丧钟为谁而鸣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程中瑞 程彼德 译 王永年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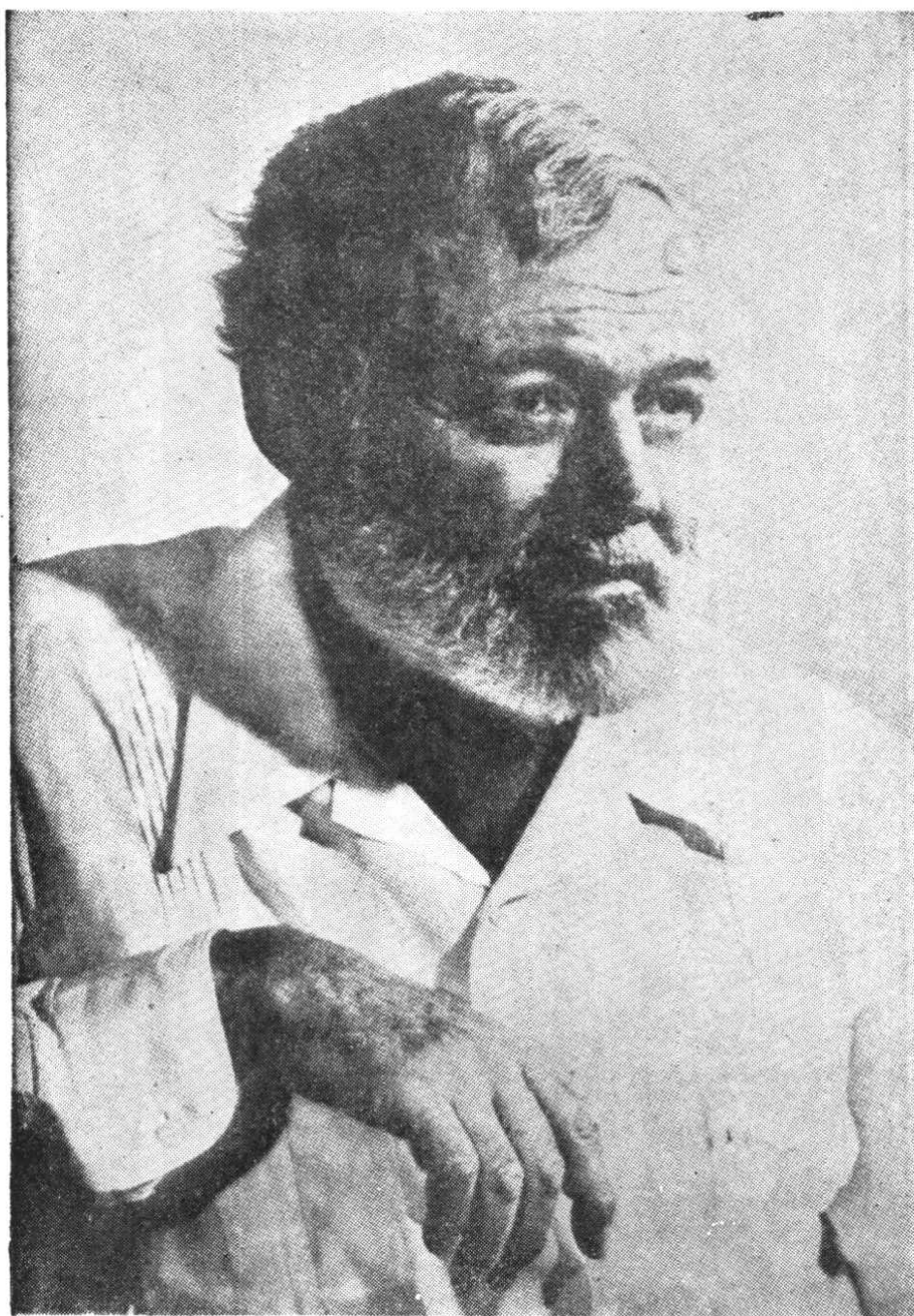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75 插页 6 字数 397,00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75,000 册

书号：10188·315 定价：(五)1.85 元



海 明 威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①

约翰·堂恩

① 引自英国玄学派诗人 约翰·堂恩(John Donne, 1571 或 1572—1631)于一六二三年写的《祈祷文集》第十七篇。

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积着一层松针的地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颚；在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梢上呼啸而过。他俯躺着的山坡坡度不大，再往下却很陡峭，他看得到黑色的柏油路蜿蜒穿过山口。沿柏油路有条小河，山口远处的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在夏天的阳光下泛着白光。

“那就是锯木厂吗？”他问。

“就是。”

“我记不得了。”

“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还在前面，离山口很远。”

他在地摊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端详。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矮老头儿，身穿农民的黑罩衣和硬邦邦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他爬山刚停下来，还在喘气，一手搁在他们带来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里望不到那座桥了。”

“望不到，”老头儿说。“这山口一带地势比较平坦，水流不急。再往前，公路拐进林子不见了踪影，那里地势突然低下去，有个挺深的峡谷——”

“我记得。”

“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他们的哨所在哪儿？”

“你看到的锯木厂那边有个哨所。”

这个正在研究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擦镜片，调整焦距，目镜中的景象突然清晰，连锯木厂的木板都看到了，他还看到了门边的一条长板凳，敞棚里的圆锯，后面有一大堆木屑；他还看到一段把小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材运下来的滑槽。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平静，打着旋涡的水从拦水坝泻下来，底下的水花在风中飞溅。

“没有岗哨。”

“锯木房里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有晒衣绳上挂着衣服。”

“这些我见到了，但看不到岗哨。”

“说不定他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那头。”

“可能。另一个哨所在哪里？”

“在桥下方。在养路工的小屋边，离山口五公里的里程碑那里。”

“这里有多少士兵？”他指指锯木厂。

“也许有四个加上一个班长。”

“下面呢？”

“要多些。我能探听明白。”

“那么桥头呢？”

“总是两个。每边一个。”

“我们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能召集多少，”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就有不少人。”

“多少？”

“一百多个。不过他们三三五五分散开了。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勘察了桥以后再跟你说。”

“你想现在就去勘察桥吗？”

“不。现在我想去找个地方把这炸药藏起来，要用的时候再去取。我希望把它藏在最安全的地方，假如可能的话，离桥不能超过半小时的路程。”

“那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到桥头全都是下坡路。不过，我们现在要去那儿倒得认真地爬一会儿山哪。你饿吗？”

“饿，”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过后再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竟把名字都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来帮你拿那只背包。”

这年轻人是个瘦高个儿，长着闪亮的金发和一张饱经风霜日晒的脸，他穿着一件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的裤子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去，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皮带圈里，把那沉重的背包甩上肩头。他把另一条胳膊伸进另一条皮带圈里，使背包的重量全压在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是汗湿的。

“我把它背上啦，”他说。“我们怎么走？”

“咱俩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被背包压得弯下了腰，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一步步向上爬，身上淌着汗。年轻人发现林中并没有路径，但是他们继续向上攀登，绕到了前山，这时跨过了一条小溪，老头儿踩着溪边石块稳健地向前走去。这时，山路更陡峭，爬山更艰难了，到后

来，溪水似乎是从他们头顶上一个平滑的花岗石悬崖边上直泻下来，于是老头儿在悬崖下停了步，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你行吗？”

“行，”年轻人说。他大汗淋漓，因为爬了陡峭的山路，大腿的肌肉抽搐起来。

“在这里等我。我先去通知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总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当然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吗？”

“很近。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①，”年轻人回答。他卸下背包，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那么就在这儿等着，罗伯托，我回来接你。”

“好，”年轻人说。“难道你打算以后走这条路到下面桥头去吗？”

“不。我们到桥头去得走另一条路。那条路近一些，比较容易走。”

“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

“你瞧着办吧。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另找地方。”

“我们瞧着办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看着老头儿攀登悬崖。这悬崖不难攀登，而且这年轻人发现，从老头儿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利落样子看来，这地方他已经爬过好多次了。然而，待在上面的人们一向小心翼翼地不让留下任何痕迹来。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他饿极了，并且心事重重。挨

① 这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读法的音译。

饿是常有的事，但担心却不常有，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一向并不在意，并且他凭经验知道，在这一带开展敌后活动是多么容易。假如你有个好向导的话，在敌后活动也好，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插也好，都不是难事。问题只在于如果被敌人抓住，事情就不好办了；此外，就是判断可以信任谁的问题。你要么完全信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要么丝毫也不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作出决定。这些都不使他发愁。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呢。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的本领真了不起。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是走山路的能手，但是，他从黎明前跟着他走到现在，他知道这老家伙能够使他走得累死。除了判断力，罗伯特·乔丹事事都信得过这个安塞尔莫。他还没机会考验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反正这一回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作出判断。不，他不愁安塞尔莫，而炸桥的事也不见得比许多别的事更难办。随便什么样的桥，只要你叫得出名称他都会炸，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他都炸过。即使这座桥比安塞尔莫所介绍的大两倍，这两只背包里的炸药和装置也足够把它全炸掉。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曾走过这座桥，戈尔兹^①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曾给他念过关于这座桥的资料。

“炸桥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着。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疤的光头上。“你懂吗？”

“是，我懂。”

“根本不算一回事。仅仅把桥炸掉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将军同志。”

“应该做到的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你当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权利，这就是你的任务。”

戈尔兹看看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任务，”戈尔兹接着说，对他点点头。他这时用铅笔敲敲地图。“那就是我的责任。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兹气愤地说。“你经历过好多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
- ① 西班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国会选举中，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派等为中坚力量的人民阵线取得了压倒多数，成立联合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开武装支持下，佛朗哥将军于七月十八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及各地驻军纷起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西北及西南部。八月十四日，叛军攻陷西部边境重镇巴达霍斯，南北部队在此会师，整个西部都落入叛军之手，就集中兵力进攻首都马德里。十一月初，四支纵队兵临城下。这时形势非常危急，共和国政府被迫于十一月九日迁东部地中海边的瓦伦西亚。内战爆发后，德意源源不绝地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军需及武装人员直接介入，英法却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实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在法国成立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于十月正式在西班牙参战，和英雄的首都人民一起，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马德里巍然不动。本书故事发生在第二年五月，地点是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区，该山脉为西南—东北向，叛军占领着各山口，并在山顶有一道防线，但防线后深山中有几个游击小组在展开敌后活动。这时政府军司令戈尔兹将军正计划向该山区发动强攻，目的在突破敌人防线，收复山后重镇塞哥维亚。本书主人公美国志愿军罗伯特·乔丹奉命进山，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这次进攻，完成炸桥任务。

“如果指挥进攻的是你，就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也指挥不了，”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而已。但我就是指挥不了。炮队不是我的。我必须提出申请。即使他们有的东西也从没按照我所要求的给我。那还是最小的事情。还有别的呢。你知道这些人的作风。没有必要详谈了。总是出问题。总是有人来干扰。你得了解这一点。”

“那么什么时候炸桥呢？”罗伯特·乔丹问。

“在进攻开始之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提前。这样，增援部队就不能从那条路开上来。”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肯定那条路上来不了援兵。”

“什么时候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能只能把日期和时间当作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在那之前准备就绪。进攻开始后你就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着。“他们增援兵力只能经过那条路。他们只能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以至卡车开到我发动攻击的山口。我必须肯定桥要炸掉。不能提前，不然的话，如果进攻推迟，他们就可以把桥修好。那可不行。进攻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炸掉，我必须充分把握。岗哨只有两个。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里来。据说他非常可靠。你就会明白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要多少。尽可能少用人，但要够用。我不必对你多说这些事情了。”

“我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进攻将由整整一师兵力发动。先有飞机轰炸作为准备。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进攻就开始了？”

“你不能老是这样理解，”戈尔兹说，还摇摇头。“但是这一次，你可以这样看待。这是我布置的进攻。”

“我懂了，”罗伯特·乔丹说，“老实说我不十分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十分喜欢。你要是不愿承担，现在就说。要是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说。”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干，没问题。”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戈尔兹说，“那就是桥上不能有任何东西通过。那一点要绝对保证。”

“我懂。”

“我不喜欢要求人做这种事，并且用这种方式做，”戈尔兹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干这种事。我明白由于我提出的条件，你将被迫干些什么。我已经仔细解释过了，为的是要你明白，要你明白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

“等我们攻占了山口，就着手把桥修起来。这是一次十分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象以往一切军事行动那样复杂而漂亮。这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这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杰作。我布置这次进攻，象历来那样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大有可为的军事行动。我为这次行动比往常感到更为乐观。把桥毁掉之后，这一仗是可能打胜的。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看，我来指给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你看到吗？我们的目标可不是这次进攻的山口的顶端。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在远远的那边。看——在这里——象这样——”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兹说。“这样，你到了那边就可以少一点思想负担，是吗？”

“我即使不去那边也不想知道。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泄露情况的不会是我。”

“确实是不知道的好，”戈尔兹用铅笔敲敲前额。“有好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桥的事，你知道吗？”

“是。那我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了，”戈尔兹说。“我不再向你发表讲话啦。我们现在来喝点酒吧。话说得不少，我很口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很有趣，霍丹同志。”

“‘戈尔兹’用西班牙语是怎么念的，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露齿笑了，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就象患了重感冒咯痰似的。“‘霍茨’，”他声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假使我早知道‘戈尔兹’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念的，我来这里打仗以前就给自己另外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我明知道我要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什么名字都可以，可是竟取了‘霍茨’。‘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经太迟了。你喜欢 partizan 工作吗？”这是个俄语中的词儿，意思是在敌后打游击。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露齿笑笑。“在露天活动非常有益健康。”

“我在你那样年纪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戈尔兹说。“人家对我说，你炸桥是很拿手的。干起来井井有条。这只不过是听说。我还没亲眼见你干过。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这时他在开玩笑。“把这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

“有时候。”

“你炸这座桥，可最好不要说什么‘有时候’啊。得，咱们别再唠叨这座桥啦。关于这座桥，你现在相当清楚了。我们非常认真，所以才能开些大玩笑。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姑娘吗？”

“没有，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太不正规了。还有，你得把头发理一理。”

“我的头发理得很合适，”罗伯特·乔丹说。要他象戈尔兹那样把头发剃光才见鬼呢。“没有姑娘，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啦，”他阴郁地说。

“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都不用穿，”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是在逗你。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兹说着又斟满了两人的酒杯。

“你思考的事情从来不仅仅是姑娘。我根本不思考。干吗要思考呢？我是将军。我从来不思考。别引诱我去思考吧。”

有个师部的人员坐在椅子上，正在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这时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兹大声地说了些什么。

“闭嘴，”戈尔兹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正因为我很认真，才能开玩笑。现在把酒喝了就走吧。你懂了吗，呃？”

“是，”罗伯特·乔丹说。“我懂了。”

他俩握了手，他敬了礼，出来上了师部的汽车，老头儿等在里面，已经睡着了。他们乘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仍然在睡觉，再顺着上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儿睡了三小时才出发。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的情景，戈尔兹有着一张永远晒不黑的白得出奇的脸，鹰一样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剃光的头上有着一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部队将集合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魆魆的公路上；长长两行卡车在夜色中装载着步兵；配备沉重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平板车；在深夜把一师兵力拉出去，调动布置，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些事。那不是他的事。那是戈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计划得清清楚楚，把所有情况都估计到，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这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这时，他坐在小溪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他发现溪水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涉过小溪，拔了两把，在水流中把根上的泥洗净，然后返身坐在背包旁，吃着那干净而凉爽的绿叶和鲜嫩而带辣味的茎梗。他跪在溪边，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背后，免得弄潮。他两手各撑在一块岩石上，俯身去喝溪水。溪水冷彻骨髓。

他撑起身体，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从悬崖上爬下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黑罩衣和深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还背着一支卡宾枪。这人光着脑袋。两人象山羊般灵活地从悬崖上爬下来。

他们向他走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微微一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人满是胡子茬的大脸。这张脸盘差不多是滚圆的，脑袋也是圆圆的，紧挨在肩膀上。两只眼睛小而分得很开，一双耳朵小而紧贴在脑袋上。他身子粗壮，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大手大脚，鼻子破裂过，

嘴角一边被刀砍过，横过上唇和下颌的刀疤在丛生的胡子中露了出来。

老头儿对这个人点点头，微微一笑。

“他是这里的头儿，”他露齿笑着说，然后屈起双臂，仿佛要使肌肉鼓起来似的。他以一种半带嘲弄的钦佩神情望着这个背卡宾枪的人。“一条好汉。”

“我看得出，”罗伯特·乔丹说，又笑了笑。他不喜欢这个人的神情，心里没有一丁点儿笑意。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把别住衣袋盖的安全别针解开，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这个人，这个人摊开证件，怀疑地看看，在手里翻弄着。

罗伯特·乔丹看出他原来不识字。

“看这公章，”他说。

老头儿指指印鉴，背卡宾枪的人端详着，把证件夹在手指间翻来翻去。

“这是啥公章？”

“你以前从没见过？”

“没有。”

“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S. I. M.——军事情报部。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对，那个公章我以前见过。不过在这里要我说了才算数，”对方阴郁地说。“你包里藏的什么？”

“炸药，”老头儿神气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越过了火线，今天一整天，背着这炸药走山路。”

“我用得着炸药，”背卡宾枪的人说。他把证件还给罗伯特·

乔丹，上下打量着他。“对。炸药对我很有用。你给我带来了多少？”

“我带来的炸药不是给你的，”罗伯特·乔丹平静地对他说。
“炸药另有用处。你叫什么名字？”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他叫巴勃罗，”老头儿说。背卡宾枪的人阴郁地望着他们俩。

“好。我听到过很多夸你的话，”罗伯特·乔丹说。

“你听到关于我的什么话？”巴勃罗问。

“我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游击队长，你忠于共和国，并用行动证实了你的忠诚，你这个人既严肃又勇敢。我给你带来了总参谋部的问候。”

“你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注意到这个人一点也不吃马屁。

“从布伊特拉戈到埃斯科里亚尔，我都听说，”他说，提到了火线另一边的整个地区。

“布伊特拉戈也好，埃斯科里亚尔也好，我都没熟人，”巴勃罗对他说。

“山脉的另一边有很多人从前都不是住在那里的^①。你是哪里人？”

“阿维拉省人。你打算用炸药干什么？”

“炸毁一座桥。”

“什么桥？”

^① 由于国内战争，很多拥护共和国政府的人从敌占区投奔到瓜达拉马山脉东南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去。

“那是我的事。”

“如果桥在这个地区，那就是我的事。你不能在紧挨你住的地方炸桥。你住在一个地方，就只能到另一个地方去活动。我这儿的事我了解。在这儿能待上一年没死掉的人了解自己的事。”

“这是我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你愿意帮我们拿背包吗？”

“不，”巴勃罗说，摇摇头。

老头儿突然转过身，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勉强能听懂的语言，迅速而愤怒地对巴勃罗说话。仿佛是在朗诵克维多的诗篇。安塞尔莫这时是在说古卡斯蒂尔语^①，大意是这样的：“你是野兽吗？是呀。你是畜生吗？一点不错。你有头脑吗？不，没有。我们这次来，要干的是重要透顶的事，可你呢，只求不惊动你自家住的地方，把你自己的狐狸洞看得比人类的利益还重。比你同胞的利益还要紧。我操你的祖宗。把背包提起来。”

巴勃罗把头低了下去。

“人人都得根据实际情况干他力所能及的事，”他说。“我住在这里，就到塞哥维亚以外活动。你要是在这一带山里搞什么名堂，我们就会被敌人从这里赶出去。我们只有在这一带山里按兵不动，才待得下去。这是狐狸的原则。”

“着啊，”安塞尔莫尖刻地说。“这是狐狸的原则，可是我们需要的是狼。”

“我比你更象狼啊，”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看出他会拿起那个背包的。

^① 克维多(Quevedo, 1580—1645)：西班牙作家，著有讽刺文、流浪汉小说及诗歌等。阿维拉省及塞哥维亚省属古卡斯蒂尔地区，其方言至今带有古风。

“唏。嘴……，”安塞尔莫冲着他说。“你居然跟我比谁更象狼，我六十八啦。”

他往地上唾了一口，摇摇头。

“你有那么大年纪吗？”罗伯特·乔丹问，看到暂时不会闹翻了，就想法使气氛轻松些。

“到七月份满六十八岁。”

“我们能活到七月份就好了，”巴勃罗说。“我来替你背这个包，”他对罗伯特·乔丹说。“另一个让老头子背。”他现在的口气不是阴郁的，而几乎是伤心的。“这老头子力气大着哪。”

“我来背一个，”罗伯特·乔丹说。

“不，”老头儿说。“让这另一个大力气的家伙背吧。”

“我来背，”巴勃罗对他说，在他的阴郁神情中间包含着一分忧伤，使罗伯特·乔丹忐忑不安。他理解这种忧伤，在这里看到使他发愁。

“那么把卡宾枪给我，”他说。巴勃罗递给了他，他把枪背在背上。两人在他前面带路，他们笨重地用双手双脚攀登那花岗石悬崖，翻过山脊，来到树林中一片绿色的空地。

他们沿着这片小草地的边缘走去，罗伯特·乔丹如今不带背包，轻松地迈开了大步；卸下了沉甸甸的、使人出汗的重荷，肩上换上硬邦邦的卡宾枪，令人愉快。他注意到这里有几处地方的草被牲口啃掉了，地上还有钉过系马桩的痕迹。他看得出草地上有一条牵马到小河边去饮水时踩出来的小径，和几匹马的新鲜粪便。他想，他们是晚上把马儿拴在这里吃草、白天把它们隐蔽在树林里的。我不知道这个巴勃罗有多少匹马儿。

他现在想起了无意间看到过巴勃罗的裤子在膝盖和大腿部分被磨得油光锃亮。他想，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马靴，还是穿了那

种麻鞋骑马的。他一定有一大套装备。他想：可是不喜欢他那分忧伤。那种忧伤不是好兆。那是人们在撒手不干或者背叛前所表现出的忧伤。那是一种出卖别人之前流露出来的忧伤。

在他们前面的树林里，有匹马在嘶叫，那时只有些许阳光从那稠密得几乎不见天日的树顶洒下来，他看到了用绳子绕在褐色的松树树干上围成的马栏。他们走近去，马儿都把脑袋朝着他们，马栏外一棵树下放着一堆马鞍，用油布遮盖着。

他们走前去，背包的两个人停下了脚步，罗伯特·乔丹知道他应当把马儿赞美一番。

“不错，”他说，“这些马儿真漂亮。”他转身向巴勃罗。“你还有一支配备齐全的骑兵队哪。”

绳栏里有五匹马：三匹栗色马，一匹白鬃栗色马和一匹鹿斑马。罗伯特·乔丹先把它通盘扫了一眼，然后一匹匹加以区分，仔细打量。巴勃罗和安塞尔莫都知道它们有多少优点。巴勃罗这时骄傲地站着，脸上的忧伤消失了几分，亲切地注视着马儿，而老头儿的神态仿佛表示这些马都是他亲手突然创造出来的奇迹。

“你看这些马怎么样？”他问。

“这几匹马都是我搞来的，”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听到他的得意的口气，自己也暗自高兴。

“那一匹，”罗伯特·乔丹说，指着一匹栗色马，那是匹前额有块白斑、一只前脚是白色的大种马，“很出色。”

那匹马很漂亮，象是委拉斯开兹^①油画上的马变活了。

^① 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 1599—1660): 西班牙名画家，作有不少肖像画及历史画。

“都是好马呀，”巴勃罗说。“你识马吗？”

“识。”

“那可不坏，”巴勃罗说。“你看得出其中有一匹有点毛病吗？”

罗伯特·乔丹明白这个不识字的人现在才真的在检查他的证件啦。

这些马儿仍旧都抬起了头望着这个人。罗伯特·乔丹从马栏的两道绳子之间钻进去，拍拍鹿斑马的屁股。他往后靠在绳栏上看着马匹在里面兜圈子，又挺直了身子对它们打量了一会，等它们站停了，他弯下腰，从绳子之间钻出来。

“白鬃栗色马靠那边的一条后腿有点瘸，”他告诉巴勃罗，眼睛并不瞧着他。“有只蹄裂了，如果蹄铁钉得合适，不会马上出毛病，可是在硬地上多走路，就要垮掉。”

“我们弄到它的时候，马蹄就是这个样子，”巴勃罗说。

“你最好的马儿，那匹白额栗色种马的炮骨上部有个肿块，我可不喜欢。”

“那没关系，”巴勃罗说。“那是三天前它撞出来的。要是碍事，早就出毛病了。”

他揭开油布，露出了马鞍。有两副普通的牧人马鞍，类似美国西部牧牛郎用的马鞍；一副十分华丽的牧人马鞍，皮面上有手工精印的花纹，配着一副厚实的有脚背盖的马镫；还有两副是军用的黑皮马鞍。

“我们杀了两个民防军，”他解释军用马鞍的来历。

“那是大收获哪。”

“他们在塞哥维亚到圣玛丽亚德尔雷亚尔的那段路上从马上下来。他们下马来查看一个赶车人的身份证。我们想办法杀

了他们，没有损伤马儿。”

“你们杀了很多民防军吗？”罗伯特·乔丹问。

“杀过几个，”巴勃罗说。“杀了人而不伤马的只有这两个。”

“在阿雷瓦洛炸火车的是巴勃罗，”安塞尔莫说。“那是巴勃罗干的。”

“有个外国人参加了我们，是他动手炸的，”巴勃罗说。“你认识他吗？”

“他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得了。名字古怪得很。”

“他相貌是怎么样？”

“金头发白皮肤，象你一样，不过个子没你高，长着一双大手和一个断鼻梁。”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兴许是卡希金。”

“对，”巴勃罗说。“那个名字古怪得很。大概是这个名字。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在四月里死了。”

“谁都免不了一死，”巴勃罗沮丧地说。“我们大家的收场都是这样。”

“那是大家的结局，”安塞尔莫说。“人总是这样结局的。你这是怎么啦，伙计？你肚子不舒服吗？”

“他们十分强大，”巴勃罗说。他好象在自言自语。他沮丧地望着那些马儿。“你们不明白他们有多强大。我发现他们越来越强大，装备越来越好。物资越来越充裕。我这里呢，却只有这些马儿。我能盼望什么呢？被人追捕，死去。没别的啦。”

“人家追你，可你也在追人家呀，”安塞尔莫说。

“不，”巴勃罗说。“再也不是这样了。要是我们离开这山区，

我们又能去哪里？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现在能去哪里？”

“西班牙有的是山地。离开了这里，还有格雷多斯山^①可去哪。”

“我才不去呢，”巴勃罗说。“我被人追乏啦。我们在这里不错。如果你在这里炸了桥，我们就要被人追捕。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用飞机来搜索，就会发现我们。如果他们派摩尔人^②来搜索，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就得走。这一切叫我厌烦了。你听见了吗？”他转向罗伯特·乔丹。“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到我这里来吩咐我得做什么？”

“我没有吩咐你非做什么不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你以后会的，”巴勃罗说。“瞧那儿。那就是祸根子。”

他指指他们刚才看马时卸在地上的那两个沉重的背包。看到了马儿似乎勾起了他这满腹的心事，而看到了罗伯特·乔丹识马，似乎使他健谈了。他们三人这时站在绳栏边，斑斑阳光落在那匹栗色种马的皮毛上。巴勃罗望望它，接着用脚碰碰沉重的背包。“这就是祸根子。”

“我只是来执行任务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是奉那些指挥战争的人的命令前来的。如果我要求你帮助我，你可以拒绝，那我就去找愿意帮我忙的人。实在我还没开口请你帮忙呢。我必须按照命令办事，我还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任务的重要性。我是外国人可不是我的过错。我宁愿是个本地人。”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人家来找我们的麻烦，”巴

① 格雷多斯山脉在瓜达拉马山脉西南，与之差不多联成一直线，一起构成斜贯西班牙中西部的中央山脉。

② 佛朗哥在当时属于西班牙的摩洛哥招募了大批摩尔人，运到西班牙充当叛军。

勃罗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要对我手下的那些人和我自己负责。”

“对你自己。是呀，”安塞尔莫说。“你早就对你自己负责啦。对你自己和你的马儿。在有马之前，你是和我们一条心的。现在你却成了一个资本家啦。”

“这句话不公平，”巴勃罗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直把马儿亮出去的。”

“不见得，”安塞尔莫轻蔑地说。“我看不见得。用来偷，是的。吃得好，是的。杀人，是的。打仗，可不干了。”

“你这个老头贫嘴贫舌，要自找苦吃啦。”

“我这个老头见谁也不怕，”安塞尔莫对他说。“我这个老头可没有马。”

“你这个老头看来活腻了。”

“我这个老头会活到老死的，”安塞尔莫说。“而且我可不怕狐狸。”

巴勃罗没说什么，但拿起了背包。

“也不怕狼，”安塞尔莫说，拿起了另一个背包。“假使你是狼的话。”

“闭嘴，”巴勃罗对他说。“你这个老头老是太噜苏。”

“可是他说到做到，”安塞尔莫说，在背包的重压下弯了腰。“这个老头现在饿啦。渴啦。走吧，哭丧着脸的游击队长，带我们去找点东西吃吧。”

罗伯特·乔丹想，事情一开头就够糟的了。但是安塞尔莫是条好汉。他想，他们好的时候真了不起。他们好的时候，谁也比不上他们；他们坏的时候，可谁都不如他们恶毒。安塞尔莫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一定明白自己干的是什麼。可是不喜

欢这一切。我一点也不喜欢。

唯一的好迹象是巴勃罗在背背包，还把卡宾枪给了他。罗伯特·乔丹想，他也许一向就是这副样子。他也许正是那种天生阴郁的人。

不，他对自己说，别骗自己啦。你不知道他以往的为人；可是你知道他毫不掩饰地正在迅速地变坏。当他开始掩饰的时候，准是已经拿定主意了。记住这一点，他对自己说。当他作出第一个友好表示时，准是已经拿定主意了。然而这些马儿真不赖，他想，漂亮的马儿呀。我不知道什么事物才能使我产生那些马使巴勃罗产生的那种感情。那老头儿说得对。马让他发了财，他发了财就想过好日子。他想：依我看呀，他的心情马上就会变坏，因为他不能参加赛马俱乐部。可怜的巴勃罗。轮不上他参加赛马俱乐部。

这个想法使他的心情好了点。他露齿笑笑，望着他前面那两个人弯着腰，背着大背包在树林中穿行。他一整天没和自己开过玩笑，而现在开了一个，他觉得痛快多了。你要变得和他们这些人一样了，他对自己说。你也要变得阴郁的。他和戈尔兹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是严肃而阴郁的。这件任务使他有点手足无措。稍微有一点，他想。简直是手足无措。戈尔兹是快活的，他希望罗伯特·乔丹出发之前也快快活活，但是罗伯特·乔丹并不快活。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所有杰出的人物都是快活的。快快活活做人是多么好啊，而且这也是一种吉兆。仿佛是当你仍然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永生。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这种乐天的人活着的也不多了。是呀，活下来的不多了。活下来的这种人少得可怜了。不过，要是你继续这样想个不停，老弟，你自己

也会活不下来。老伙计，老朋友啊，现在别去想它啦。你现在是个炸桥的人。不是思想家。他想：好家伙，我饿啦。我希望巴勃罗是个讲究吃喝的人。

第二章

他们穿过浓密的树林，来到这小山谷的杯形的上端，他看到前面树林里隆起一座凹形的石壁，下面一定就是营地。

那儿果真是营地，地形选得不坏。不走近根本看不出，罗伯特·乔丹知道，从空中是发现不了的。从上面看什么痕迹都没有。营地象熊窝那样隐蔽。可是，看来也不比熊窝防卫得更好些。他们走上前去的时候，他仔细地打量着。

那凹形石壁上有一个大山洞，洞口坐着一个人，背靠山岩，伸着两腿，一支卡宾枪靠在岩石旁。他正在用刀削一根木棍，他们走近时，他盯了他们一眼，然后继续削木棍。

“喂，”坐着的人说。“来的是什么人哪？”

“老头子和一个爆破手，”巴勃罗告诉他，卸下背包，放在洞口的里面。安塞尔莫也卸下了背包，罗伯特·乔丹解下卡宾枪，把它靠在山石旁。

“别把背包搁得离洞口这么近，”削木棍的人说，他长着一双蓝眼睛，黝黑、漂亮的吉普赛型的脸上带着懒洋洋的神情，脸色象熏黑的皮革。“里面生着火哪。”

“你起来，去把它放好，”巴勃罗说。“把它搁在那棵树下。”

吉普赛人不动身，说了句粗话，接着说，“让它搁在那儿得了。把你自已炸死吧，”他懒洋洋地说。“这样会治好你的毛病。”

“你在做什么东西？”罗伯特·乔丹在吉普赛人身边坐下。吉普赛人拿给他看。那是一个4字形的捕兽器，他正在削上面的横档。

“逮狐狸用的，”他说。“上面支一段树干充当打击的工具。它会把狐狸的背脊砸断。”他朝罗伯特·乔丹露齿笑笑。“是这样操作的，你瞧。”他做了个捕兽架倒塌、树干砸下去的样子，然后摇摇头，把手缩回去，张开双臂，装出被砸断脊骨的狐狸的模样。“挺实用，”他解释说。

“他喜欢逮兔子，”安塞尔莫说。“他是吉普赛人。所以逮到了兔子说是狐狸。逮到了狐狸就说是象。”

“那么逮到了象呢？”吉普赛人问，又露出一口白牙齿，对罗伯特·乔丹眨眨眼睛。

“你会说是坦克，”安塞尔莫对他说。

“我会俘获一辆坦克的，”吉普赛人对他说。“我会俘获一辆坦克。那时候随你说我逮到的是什么呢。”

“吉普赛人讲得多，做得少，”安塞尔莫对他说。

吉普赛人对罗伯特·乔丹眨眨眼睛，继续削木棍。

巴勃罗早走进了山洞，看不见了。罗伯特·乔丹希望他是去找吃的东西的。他在吉普赛人身边地上坐下来，下午的阳光从树梢上射下，温暖地照在他伸直的腿上。这时他闻到了山洞里散发出饭菜的气味，闻到了食油、洋葱和煎肉的香味。他饿得饥肠辘辘。

“我们能俘获坦克，”他对吉普赛人说。“并不太难。”

“用这玩意儿吗？”吉普赛人指指那两个背包。

“对，”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以后教你。你可以布置一个陷阱。这不难。”

“你和我？”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干吗不行？”

“嗨，”吉普赛人对安塞尔莫说。“把这两个背包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行吗？这东西很宝贵。”

安塞尔莫咕哝了一声。“我去拿酒，”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把背包提离洞口，在一棵树的两边各放一只。他知道里面是什么，决不愿意让这两只背包之间的距离挨得太近。

“给我带一杯来，”吉普赛人对他说。

“有酒吗？”罗伯特·乔丹问，又在吉普赛人身边坐下来。

“酒？干吗没有？满满的一皮袋。反正半皮袋总会有的。”

“有什么吃的？”

“样样都有，伙计，”吉普赛人说。“我们的伙食跟将军吃的差不多。”

“那么吉普赛人在战争期间干些什么？”罗伯特·乔丹问他。

“他们还是当他们的吉普赛人。”

“这个行当不坏。”

“最好的啦，”吉普赛人说。“人家叫你什么名字？”

“罗伯托。你呢？”

“拉斐尔。坦克的事可当真？”

“当然。干吗不当真？”

安塞尔莫从洞口出来，捧着满满一瓦缸红酒，手指钩着三只杯子的柄。“瞧，”他说。“杯子呀什么的，他们全有。”巴勃罗在他们背后出现了。

“吃的马上就来，”他说。“你有烟吗？”

罗伯特·乔丹走到背包边，打开了一只，伸手摸到里面的夹

层口袋，掏出一盒他在戈尔兹司令部里弄到的扁盒装的俄国香烟。他用拇指指甲划开了烟盒一边的封口，揭开盒盖，递给巴勃罗，巴勃罗拿了五六支。他用一只大手握住烟卷，拣了一支对光看着。烟卷细长，一头有硬纸咬嘴。

“卷得松，没多少烟草，”他说。“这烟我知道。那个名字古怪的人也抽这种烟。”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把烟盒递给吉普赛人和安塞尔莫，他们每人拿了一支。

“多拿几支，”他说，于是他们每人又拿了一支。他再给了他们每人四支。他们手拿烟卷，向他点头致谢，因此烟卷的头也上下摆动，就象人们持剑行礼那样。

“对，”巴勃罗说。“那个名字很古怪。”

“喝酒吧。”安塞尔莫从缸里舀了一杯递给罗伯特·乔丹，然后为自己和吉普赛人舀酒。

“没我的吗？”巴勃罗问。他们都坐在洞口。

安塞尔莫把他的一杯递给他，自己进洞去再拿杯子。他走出洞来，俯身从缸里舀了满满的一杯，大家就相互碰杯。

酒不坏，有一点儿皮酒袋的松脂香味，但好极了，他舌头上只觉得清爽而鲜洁。罗伯特·乔丹慢慢儿喝着，觉得一股暖意流遍了疲乏的全身。

“吃的马上就来，”巴勃罗说。“那个名字古怪的外国人，他是怎么死的？”

“他被抓住后自杀的。”

“那是怎么回事？”

“他受了伤，不愿当俘虏。”

“详细经过呢？”

“我不知道，”他撒谎说。他明明知道详细情况，但他知道，这时讲这些情况不妥当。

“他要我们保证，万一炸火车的时候受了伤，逃脱不掉，就枪杀他，”巴勃罗说。“他说话的神气挺古怪。”

罗伯特·乔丹想，早在那时候，他准是已经神经过敏了。可怜的卡希金啊。

“他这人特别反对自杀，”巴勃罗说。“他对我说过。他还特别害怕被俘后受刑。”

“他连这一点也告诉了你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是的，”吉普赛人说。“他对我们大家都说过类似的话。”

“你也参加了炸火车？”

“是呀。我们大家都参加了。”

“他说话的神气挺古怪，”巴勃罗说。“不过他非常勇敢。”

可怜的卡希金呀，罗伯特·乔丹想。他在这一带造成的影响准是坏的多于好的。我早知道他那时候已经这么神经过敏就好了。他们就可以把他抽调回去。你派去执行这种任务的人不能说这种话。绝对不能说这种话。说了这种话，即使他们完成了任务，他们造成的影响也是坏多于好。

“他有点古怪，”罗伯特·乔丹说。“我看他神经有点儿不正常。”

“不过他搞爆破挺在行，”吉普赛人说。“并且非常勇敢。”

“不过有点不正常，”罗伯特·乔丹说。“干这种事，必须要很有头脑，而且头脑要特别冷静。说那种话可不行。”

“那么你呢，”巴勃罗说。“如果你在炸桥这种事情上受了伤，你愿意被人撂在后面吗？”

“听着，”罗伯特·乔丹说，他身体向前凑去，替自己又舀了

杯酒。“把我的话听清楚了。假使我有一天要请哪位帮点儿小忙的话，到那时候我会请求他的。”

“好样的，”吉普赛人称赞说。“好汉说话就是这个样。啊！吃的来啦。”

“你已经吃过了，”巴勃罗说。

“再来两份也吃得下，”吉普赛人对他说。“瞧谁拿吃的来了。”

一个姑娘端着一只大铁食盘，弯着身体从洞口钻出来，罗伯特·乔丹看到她脸的侧面，同时看到她异样的地方。她微笑着说，“你好，同志。”罗伯特·乔丹也说，“你好，”并且注意着不盯住她看，但也不掉头不顾。她把平底铁盘放在他面前，他注意到了她那双漂亮的褐色的手。她这时正眼望着他的脸，微微一笑。她那褐色的脸上有一口白牙齿，她的皮肤和眼睛也是这种金褐色的。她长着高颧骨，欢乐的眼睛，和一张丰满而端正的嘴。她的头发象金黄色的田野，已被阳光晒得黑黝黝的，可是给全部剪短了，只比海狸皮的毛稍长一点。她冲着罗伯特·乔丹的脸笑着，举起褐色的手去抚摩头发，手过之处，那抚平的头发随即又翘起来。她的脸很美，罗伯特·乔丹想。要是人家没有把她的头发剪短，她一定很美。

“我就是这样梳头的，”她笑着对罗伯特·乔丹说。“吃你的吧。别盯着我。人家是在瓦利阿多里德^①把我的头发剃成这副样子的。现在算是长出来啦。”

她坐在他对面望着他。他也回看她，她微微一笑，合抱着双

^① 瓦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为西班牙北部一古城，有大教堂、旧王宫等名胜古迹。

手搁在膝头。她这样双手搁在膝上坐在那儿，一双长腿斜搁着，裤管口露出一截干净的腿儿，他能看到她灰色衬衫内耸起的小乳房的轮廓。罗伯特·乔丹每次对她望的时候，都感到自己的喉咙哽塞起来。

“没有碟子，”安塞尔莫说。“用你自己的刀吧。”姑娘在铁盘子边上搁了四把叉，叉尖朝下。

大家直接从大铁食盘里拿东西吃，就象西班牙人的习惯那样，不说话。吃的是洋葱青椒烧兔肉，加红酒的调味汁里放着青豆。菜烧得不错，兔肉烂得从骨头上掉了下来，调味汁很鲜美。罗伯特·乔丹吃着，又喝了杯酒。姑娘一直在看他吃。其余的人都望着自己的食物，只顾吃着。罗伯特·乔丹拿一片面包擦干净自己面前盘里剩下的调味汁，把兔骨堆在一边，擦净底下的调味汁，然后拿面包擦净叉和自己的刀，把刀藏起，再把面包吃掉。他凑身前去，满满地舀了一杯酒，那姑娘还在望着他。

罗伯特·乔丹喝了半杯，可是等到向姑娘说话时，喉咙里又哽塞起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巴勃罗听到他说话的声调，马上对他瞥了一眼。接着他站起身走开了。

“玛丽亚。你呢？”

“罗伯托。你在山里待了很久吗？”

“三个月。”

“三个月？”他望着她那又密又短的头发，她这时局促不安地用手一捋，这头发就象山坡上的麦田在风中泛起麦浪那样波动着。“头发给剃光了，”她说。“在瓦利阿多里德监狱里，按规矩都得剃光头。三个月之后才长成这副样子。我那时也在火车上。他们打算把我带到南方去。火车被炸之后，很多犯人又被逮住

了,但我没有。我跟着这些人来了。”

“我瞅见她躲在山石中间,”吉普赛人说。“那时我们正要撤退。乖乖,那时她可真难看哪。我们带着她走,可有好多次,依我看,我们差一点不得不扔下她。”

“还有跟他们一起炸火车的那个人呢?”玛丽亚问。“也是个金黄头发的。那个外国人。他在哪里?”

“死了,”罗伯特·乔丹说。“四月份死的。”

“四月份?炸火车是四月份嘛。”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他在炸火车十天之后死的。”

“怪可怜的,”她说。“他非常勇敢。那你也是干这一行的?”

“是的。”

“你也炸过火车?”

“是的。三列火车。”

“在这里吗?”

“在埃斯特雷马杜拉^①,”他说。“我来这里以前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我们在那里干了不少事。我们有很多人在那里活动。”

“那你现在干吗到这山里来?”

“接替那个金黄头发的人。还因为革命以前我就熟悉这个地区。”

“你很熟悉这里?”

“不,其实不很熟。不过我很快能熟悉。我有一张好地图,还有一位好向导。”

“那个老头子,”她点点头。“老头子人很好。”

“谢谢你,”安塞尔莫对她说。于是罗伯特·乔丹突然意识

^① 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西班牙西部一地区,和葡萄牙接壤。

到，在场的不只是他和姑娘两个人，他还意识到，他很难正眼看这姑娘，因为这会使他说话时声音变样。他正在违犯和说西班牙话的人搞好关系的两条纪律中的一条：请男人抽烟，别碰女人。他十分突然地意识到自己顾不得这些了。很多事情他都不在乎了，为什么要计较这一点呢？

“你的脸长得很美，”他对玛丽亚说。“我要是有幸在你的头发剃掉之前看到你就好了。”

“会长出来的，”她说。“六个月之后就会很长了。”

“你该在我们把她从火车里带走时见见她。她难看得叫人恶心。”

“你是谁的女人？”罗伯特·乔丹问，他这时想摆脱这件事了。“是巴勃罗的吗？”

她望着他笑，然后在他膝盖上打了一下。

“巴勃罗的？你见过巴勃罗吗？”

“噢，那么是拉斐尔的罗。我见过拉斐尔。”

“也不是拉斐尔的。”

“她不属于任何人，”吉普赛人说。“这个女人挺怪。她不属于任何人。可她饭菜做得不坏。”

“真的不属于任何人吗？”罗伯特·乔丹问她。

“不属于任何人。才不哪。不管是说笑话，还是说正经的，都是这样。也不是你的。”

“是吗？”罗伯特·乔丹说，他感到喉咙里又哽塞起来了。“好啊。我没时间跟女人打交道，那倒是真的。”

“连十五分钟也没有？”吉普赛人戏弄地问。“一刻钟工夫也没有？”罗伯特·乔丹不回答。他望着这姑娘玛丽亚，觉得喉咙里哽塞得不敢开口说话了。

玛丽亚望着他笑，接着突然脸红了，但是仍旧盯住他看。

“你在脸红，”罗伯特·乔丹对她说。“你常脸红吗？”

“从来不。”

“你现在脸红了。”

“那么我要到山洞里去了。”

“别走，玛丽亚。”

“不，”她说，不对他微笑了。“我现在要到里面去了。”她收拾起他们吃饭的铁盘和四把叉。她走起路来象小马般不大自然，但同时也象小动物那么姿态优美。

“你们还要用杯子吗？”她问。

罗伯特·乔丹仍旧在望着她，她又脸红了。

“别惹我脸红，”她说。“我不喜欢这样。”

“别拿走，”吉普赛人对她说。“来一杯吧，”他在酒缸里舀了满满的一杯递给罗伯特·乔丹，而他正看着姑娘端着笨重的铁盘低了头钻进山洞。

“谢谢你，”罗伯特·乔丹说。她走了，他的声调又恢复了常态。“这是最后一杯了。我们已经喝够了。”

“我们来喝干这一缸，”吉普赛人说。“还有大半皮袋酒。那是我们用马驮来的。”

“那次是巴勃罗最后的一次出击，”安塞尔莫说。“自此以后他啥也不干。”

“你们有多少人？”罗伯特·乔丹问。

“我们有七个男人，还有两个女的。”

“两个？”

“对。一个是巴勃罗的老婆。”

“她人呢？”

“在山洞里。那姑娘稍许会做些饭菜。我说她做得好是为了让她高兴。她多半是帮巴勃罗的老婆做下手。”

“巴勃罗的女人，她这人怎么样？”

“有点儿野，”吉普赛人露齿笑笑。“实在太野了。如果你以为巴勃罗长得丑，那你应当见见他老婆。不过，那女人很勇敢。比巴勃罗勇敢一百倍。只是有点儿野。”

“想当初巴勃罗也很勇敢，”安塞尔莫说。“想当初巴勃罗是很认真的。”

“他杀的人比霍乱还多，”吉普赛人说。“革命开始时，巴勃罗杀的人比伤寒还多。”

“可是长远以来，他太差劲了，”安塞尔莫说。“他太差劲了。他非常怕死。”

“可能是因为当初杀的人太多了，”吉普赛人富有哲理地说。“巴勃罗杀死的人比鼠疫还多。”

“这是一点，再加上贪财，”安塞尔莫说。“另外他酒喝得太多。现在他打算象斗牛士一样退休了。不过他没法退休。”

“他要是跨过火线到了那边，人家准会扣下他的马，叫他入伍，”吉普赛人说。“至于我，我也不喜欢在部队里当兵。”

“别的吉普赛人也不喜欢这样，”安塞尔莫说。

“干吗喜欢？”吉普赛人问。“谁肯进部队？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进部队吗？我愿意打仗，可不愿待在部队里。”

“还有些人在哪里？”罗伯特·乔丹问。他喝了酒，这会儿觉得很舒服，昏昏欲睡，他仰天躺在树林中的地上，透过树梢望见午后的小片云朵在西班牙高空中徐徐飘移。

“有两个在洞里睡觉，”吉普赛人说。“两个在山上咱们架枪的地方放哨。一个在山下放哨。说不定他们都睡着了。”

罗伯特·乔丹翻身侧卧着。

“是什么枪？”

“枪名挺怪，”吉普赛人说。“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是一架机关枪。”

罗伯特·乔丹想：一定是支自动步枪。

“有多重？”他问。

“一个人能扛，不过挺重。枪有三条腿，可以折起来。那是我们在末一次大出击中缴获的。就是在搞到酒的那次之前的那一次。”

“你们那支枪有多少子弹？”

“多得数不尽，”吉普赛人说。“整整一箱，沉得叫人不相信。”

罗伯特·乔丹想，听他这样说象是五百发光景。

“上子弹是用圆盘还是长带？”

“用装在枪上面的圆铁盒。”

罗伯特·乔丹想，了不起，是挺刘易斯轻机关枪^①。

“你懂得机枪吗？”他问那老头儿。

“不懂，”安塞尔莫说。“一点不懂。”

“那你呢？”问吉普赛人。

“这种枪开起来快极了，枪筒越打越烫，烫得手没法碰，”吉普赛人神气地说。

“那有谁不知道！”安塞尔莫蔑视地说。

“也许是这样，”吉普赛人说。“不过他既然要我讲讲机关枪是怎么样的，我就告诉他。”他接着补充说，“还有，它不象普通步

^① 这种轻机关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协约国首先使用，后来还装在战斗机上。它每分钟可打五百五十发子弹，重量约十二公斤。

枪，只要你扣住扳机，这种枪可以打个不歇。”

“除非卡了壳，子弹打光或枪筒烫得发软，”罗伯特·乔丹用英语说。

“你说啥？”安塞尔莫问他。

“没什么，”罗伯特·乔丹说。“我只是用英语在讲未来的事。”

“那才怪了，”吉普赛人说。“用英国话来讲未来的事。你会看手相吗？”

“不会，”罗伯特·乔丹说着又舀了杯酒。“不过，要是你会的话，我倒希望你给我看看，告诉我最近的三天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巴勃罗的老婆会看手相，”吉普赛人说。“不过她挺暴躁，挺野，她肯不肯看，我可说不准。”

罗伯特·乔丹坐起来，喝了口酒。

“我们现在去见见巴勃罗的老婆吧，”他说。“假使真是这样糟糕的话，那我们去试试，不行就算了。”

“我不想去打扰她，”拉斐尔说。“她最讨厌我。”

“为什么？”

“她拿我当二流子看待。”

“真不公平，”安塞尔莫嘲弄地说。

“她讨厌吉普赛人。”

“真是错透了，”安塞尔莫说。

“她有吉普赛血统，”拉斐尔说。“她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他露齿笑笑。“可是她的舌头太伤人，象条牛鞭子。用那条舌头她能把人的皮都扒下来，撕成一条条的。她真野得不得了。”

“她和那姑娘玛丽亚相处得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

“好。她疼那丫头。有谁敢去接近这丫头，打她主意的话——”他摇摇头，舌头啧啧作响。

“她待那姑娘真不错，”安塞尔莫说。“好好照顾着她。”

“我们炸了火车把她带回来时，她模样很怪，”拉斐尔说。“她不吭声，哭个不停，谁碰碰她，她就抖得象只落水狗。最近她才好了点。最近她好多了。今儿她很好。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她非常好。我们炸火车后打算扔下她不管。她愁眉苦脸，那么难看，显然一无用处，当然不值得为她耽误时间。可是老太婆在那丫头身上系了根绳子，等她觉得再也走不动了，老太婆就用绳子梢抽她，逼她走。后来，她真的走不动了，老太婆就把她扛在肩上。等老太婆扛不动了，就由我来扛。那时我们是在爬山，山上金雀花和石南长得齐胸高。等到我也扛不动了，就由巴勃罗来扛。老太婆逼我们扛她的时候，骂得可凶哪！”他想起了往事还直摇头。“是啊，这丫头固然长得高，身体可不重。瘦骨头不压什么分量。不过当时我们不得不扛着她，一会儿停下来开枪，一会儿再把她扛起来，那时候她可够沉的。老太婆呢，用绳子抽打巴勃罗，替他拿步枪，当他打算扔下丫头时，老太婆把枪塞在他手里，又逼他把丫头再背起来。她一边替他上子弹，一边咒骂他。老太婆把他子弹袋里的子弹掏出来，装进弹仓，一边朝他咒骂。那时天快擦黑了，一到夜晚，事情就好办了。不过还好，人家没有骑兵队。”

“那次炸火车准是艰苦极了，”安塞尔莫说。“我那时不在场，”他向罗伯特·乔丹解释。“当时参加的有巴勃罗的一帮和‘聋子’的一帮，今晚我们就要见到‘聋子’；另外还有这一带山里的两帮人。我那时到火线的另一边去了。”

“还有那个名字很古怪的金黄头发的人——”吉普赛人说。

“卡希金。”

“对。这个名字我始终叫不上口。我们还有两个人带了一挺机关枪。他们也是部队派来的。他们没法带了机关枪撤，就把枪扔了。机关枪当然不比这丫头沉，要是老太婆当时管住他们的话，他们准会把枪带走。”他想起了往事，摇摇头，接着说下去。“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象那次爆炸那样的场面。火车直直地开来。我们老远就看到了。我那时心里紧张极了，现在讲不上来。我们望到火车喷出的气，接着听到汽笛声。接着，火车恰一恰一恰一恰一恰一个劲地开来了，形体越来越大。接着，在爆炸的那一刹那，火车头的前轮腾空飞了起来，一团黑烟，一声轰响，好象地皮整个翻腾起来，火车头好象在梦境里似的在一片升腾的灰尘和枕木中间飞得老高，然后侧着倒在地上，象头受了伤的大野兽，炸飞的泥巴还在往我们身上掉，这时，火车头锅炉一声爆炸，一片白色蒸气弥漫着。机关枪开始响啦，达一达一达一达！”吉普赛人这时握紧双拳，翘起了两个大拇指，在身前上下摆动，好象在开一挺想象中的机关枪。“达！达！达！达！达！达！”他欣喜若狂。“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只见敌人的部队从火车里逃奔出来，机关枪对准他们响个不停，他们一个个倒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一出神把手搁在机关枪上面，觉得枪筒滚烫，这时，老太婆给了我一个嘴巴，说，‘开枪呀，你这笨蛋！开枪呀，要不我把你的脑瓜踩个稀烂！’我接着开起枪来，不过要把枪握稳真不容易，敌人正往远处的山上跑去。后来，我们下去，赶到火车边看看有什么可搬回去的，有个军官用手枪逼着士兵，赶他们向我们反扑。他不停地挥舞手枪，对他们大叫大嚷；我们都向他开枪，可谁也没打中。接着有几个敌人卧倒射击了，那军官拿着手枪在他们背后跑来跑去，我们还是打不中

他，机关枪被火车挡住了，没法向他射击。军官枪杀了两个卧倒的士兵，可别人还是不肯起来，他就骂他们，最后他们才三三两两地爬起来，朝我们和火车冲过来。他们接着又卧倒了射击。于是我们撤退了，机关枪仍在我们头顶上达达达的响着。我就在那时发现了那丫头，她从火车里逃到了山石间，她就跟我们一起逃。就是这些部队咬住了我们，一直追击到晚上。”

“当时的情况准是够艰险的，”安塞尔莫说。“真够紧张的。”

“我们只干了这么一件好事情，”一个深沉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你这个没羞没臊的吉普赛私生子、懒酒鬼、孬种，你在干什么呀？”

罗伯特·乔丹见到面前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个子差不多跟巴勃罗一般大，身材也是滚圆的，穿着农民的黑裙子和背心，粗壮的腿上套着厚羊毛袜，脚下是一双黑色绳底鞋，褐色的脸蛋象座花岗石雕像。她长着一双粗大但好看的手，稠密的黑卷发在脑后挽了个发髻。

“回答我！”她对吉普赛人说，也不理会有别人在场。

“我在跟这些同志说话。这个人是要当爆破手的。”

“这我全知道，”巴勃罗的老婆说。“现在给我滚，到山顶上去换安德烈斯的班。”

“我走，”吉普赛人说。“我走。”他转身对罗伯特·乔丹。“我吃饭时再跟你见面。”

“你想得倒美，”妇人对他说。“照我算来，你今天已吃过三顿饭了。现在去把安德烈斯给我找来。”

“你好，”她对罗伯特·乔丹说，伸出手来并微笑着。“共和国那边一切都好吗？”

“很好，”他说，也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共和国和我都

好。”

“我很高兴，”她对他说。她紧盯着他的脸，微笑着。他注意到她长着一对好看的灰眼睛。“你是来找我们再炸一次火车吗？”

“不，”罗伯特·乔丹说，立即对她开诚布公。“是来炸桥的。”

“那算不上什么，”她说。“一座桥算不上什么。现在我们有马匹啦，什么时候再炸火车？”

“以后再说。这座桥很重要。”

“那丫头跟我说，你那位跟我们一起炸火车的同志死了。”

“是呀。”

“真可惜。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爆炸。他是个能干的人。他挺讨我喜欢。现在不能再炸一次火车吗？如今山里有很多人。太多啦。找吃的已经有困难了。最好还是撤出去。我们有马啊。”

“我们必须炸掉这座桥。”

“桥在哪里？”

“很近。”

“那更好，”巴勃罗的老婆说。“让我们把这里的桥统统炸掉了再撤走。我讨厌这个地方。这里人太集中了。这不会有好处。这里死气沉沉得叫人讨厌。”

她在树林里看到巴勃罗的人影。

“醉鬼！”她向他喊着。“醉鬼。烂酒鬼！”她兴冲冲地转身对着罗伯特·乔丹。“他带了皮酒袋自个儿在林子里喝酒，”她说。“他整天喝个没完。这样过日子要把他毁了。小伙子，你来了我很高兴。”她拍拍他的背脊。“啊，”她说。“你长得比外表结实，”她用手抚摸着他的肩膀，感到他法兰绒衬衫里面的肌肉。“好。你来了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我们会彼此了解的，”她说。“喝杯酒吧。”

“我们已经喝了些，”罗伯特·乔丹说。“那么你喝吗？”

“我吃饭时才喝，”她说。“酒使我心里发烧。”她接着又看见了巴勃罗。“醉鬼！”她嚷着说。“酒鬼！”她对罗伯特·乔丹摇摇头。“他这人以前真不错，”她对他说。“可现在完蛋了。还有一桩事你听我说。要好好对待那丫头，要爱护她。那个玛丽亚。她受过一番苦。你懂么？”

“懂。你说这话干吗？”

“她见了你之后回到山洞里来，我看出了她的心情。我还发现她走出山洞前就在打量着你。”

“我跟她说笑了几句。”

“她原来的心境很坏，”巴勃罗的老婆说。“现在她比较好了，她应该离开这里。”

“那当然，可以由安塞尔莫把她送过火线去。”

“这次事情结束后，你和安塞尔莫可以把她带走。”

罗伯特·乔丹觉得喉咙作痛，他的声音变粗了。“也许能行吧，”他说。

巴勃罗的老婆望着他摇摇头。“唉，唉，”她说。“难道男人都是这副样子的吗？”

“我什么也没说啊。她长得很美，这你也知道。”

“不，她长得不美。你的意思是说，她开始变得美了，”巴勃罗的老婆说。“男人呀，我们把他们生了出来，真叫我们觉得可耻。不。说正经话。难道共和国里没有收留她这种人的地方吗？”

“有，”罗伯特·乔丹说。“好地方，在东海岸瓦伦西亚那一带。别的地方也有。那里他们会待她很好，她可以带领孩子。有不少从乡村撤出来的孩子。人家会教她怎样工作的。”

“那正是我希望的，”巴勃罗的老婆说。“巴勃罗已经在动她脑筋了。这又是件会毁掉他的事情。他见到她就心痒难熬。最好她现在就走。”

“干完这件事以后，我们可以把她带走。”

“要是我信任你，你从现在起肯爱护她吗？我跟你说话象是老相识了。”

“人们彼此了解了，”罗伯特·乔丹说，“就应该这么样。”

“坐下吧，”巴勃罗的老婆说。“我不要你保证，反正事情要发生总会发生的。但是，你如果不肯带她走，我就要你保证。”

“为什么说如果我不肯带她走呢？”

“因为我不希望你走了以后让她在这里发疯。我见过她发疯似的模样，不发疯，我也够受的了。”

“炸桥后我们一定带她走，”罗伯特·乔丹说。“只要我们炸桥后还活着，我们一定带她走。”

“我不爱听你用这种口气说话。这种口气绝对不会带来好运。”

“我用这种口气只是为了向你保证，”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是那种爱说丧气话的人。”

“让我看看你的手，”那妇人说。罗伯特·乔丹伸出手来，妇人把它摊开，放在她自己的大手上，用大拇指摩摩手掌，仔细端详，然后放掉他的手。她站起来。他也站起来。她望着他，脸上没有笑意。

“你从手上看到了什么？”罗伯特·乔丹问她。“我不信手相。你不会吓倒我的。”

“没什么，”她对他说。“我看不出什么。”

“不，你看出来了。我只是好奇罢了。我不信这一套。”

“你信什么呢？”

“我相信的东西很多，可不信这一个。”

“相信什么？”

“相信我的工作。”

“是的，我看出这点了。”

“跟我说，另外还看出了什么。”

“我看不出别的，”她不痛快地说。“你说过炸桥很难吗？”

“不。我说过炸桥很重要。”

“可是炸桥会不会很难？”

“会的。我现在得下山去看桥了。你这里有多少人？”

“有点用的有五个。吉普赛人是窝囊废，尽管他心肠不坏。他心地很好。巴勃罗这人，我不再信任了。”

“‘聋子’有多少顶用的人？”

“大概有八个吧。今晚我们就能弄清楚。他要到这儿来的。他是个很踏实的人。他也有一些炸药。不很多。你和他谈谈。”

“你派人去找他了？”

“他每天晚上都来。他是邻居。还是同志加朋友。”

“你看他这人怎么样？”

“他这人很不错。而且很踏实。在炸火车这件事上，他真了不起。”

“别的那几帮里的人手呢？”

“如果通知及时，大致能召集到五十个带步枪的人手，比较可靠的。”

“可靠性多大？”

“根据情况是不是严重才能定。”

“每支枪有多少发子弹？”

“大概有二十发。要看他们参加这次行动时愿意带多少来。这是说如果他们愿意来参加这次行动的话。你别忘了，炸桥这种事，既弄不到钱，也没战利品；而且你尽管不明说，危险是不小的；还有，事后又不得不从这一带山里撤走。很多人会反对炸桥这件事。”

“这很清楚。”

“这样看来，可以不提这件事就不提。”

“我同意。”

“那么等你踏勘过了桥，我们今晚就和‘聋子’谈谈。”

“我现在跟安塞尔莫下山去。”

“那么把他叫醒吧，”她说。“你要带支卡宾枪吗？”

“谢谢你，”他对她说。“带一支固然好，不过我不会用它的。我是去侦察，不是去找麻烦的。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些情况。我非常喜欢你说话的方式。”

“我说话喜欢坦率。”

“那么告诉我你在我手上看出了什么。”

“不，”她说，摇摇头。“我没有看出什么。现在到你的桥那儿去吧。我会照管你的装备的。”

“把背包遮盖起来，谁也不让碰。搁在那儿要比山洞里好。”

“会遮盖好的，不让任何人碰，”巴勃罗的老婆说。“现在到你的桥那儿去吧。”

“安塞尔莫，”罗伯特·乔丹把手按在老头儿的肩膀上说。老头儿脑袋枕在双臂上躺着睡熟了。

老头儿抬起头来。“有，”他说。“不用多说。我们走吧。”

第三章

他们赶着最后的二百码路程，在树荫下小心翼翼地在这棵树移动到那棵树，这时，穿过陡峭的山坡上最后几棵松树，离桥只有五十码了。夕阳仍然越过褐色的山肩照来，那座桥被峻峭的峡谷间的辽阔空间衬托着，显得黑魑魑的。那是一座单孔铁桥，两端各有一个岗亭。桥面很宽，可以并行两辆汽车。线条优美的坚固的铁桥横跨深谷，在下面深深的谷底，白浪翻滚的河水流过大块圆石，奔向山口那边的主流。

阳光正对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那座桥只现出一个剪影。随着太阳落到圆滚滚的褐色山头后边，阳光减弱消失，他透过树林眺望这山头，这时他不再直视着刺眼的阳光，发现山坡竟是一片葱翠的新绿，山峰下还有一摊摊积雪。

接着他在那短暂的余辉中又望望那突然显得真切的铁桥，观察它的结构。要炸掉这座桥并不难。他一面望着，一面从胸口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迅速勾勒了几张草图。他在本子上画图时并不同时计算炸药用量。他要以后再计算。他现在注意的是安放炸药的位置，以便炸断桥面的支撑，让桥的一部分塌到峡谷中去。安放五六个炸药包，同时引爆，就能从容不迫、井井有条而正确无误地干成功；要不然，用两个大炸药包也能大致完成。那就需要非常大的炸药包，放在两面同时引爆。他高兴而快速地勾勒着草图；他为了终于着手处理这件事，终于真的动手干起来而高兴。他接着合上笔记本，把铅笔插进本子护封里边的皮套，把笔记本藏进衣袋，扣好袋盖。

他画草图的时候，安塞尔莫监视着公路、铁桥和岗亭。他认为他们太接近桥，未免危险，草图画完后，他才算松了口气。

罗伯特·乔丹扣好衣袋盖，匍匐在一棵松树后面，从那里了望。安塞尔莫把手搭在他胳膊肘上，用一个指头指点。

公路这一头面对着他们的岗亭里坐着一个哨兵，膝间夹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他正在抽烟，头上戴着顶绒线帽，身上穿着件毯子式的披风。相距五十码，没法看清他脸上的五官。罗伯特·乔丹举起望远镜，尽管现在没一点阳光，他还是两手捏成空拳，小心地围着镜片，以免产生反光，被哨兵发现。于是桥上的栏杆显得非常清晰，仿佛伸手就能摸到似的，而那哨兵的脸也清清楚楚，连他那凹陷的腮帮、香烟上的烟灰和刺刀上闪亮着的油迹都历历在目。那是一张农民的脸，高颧骨下腮帮凹陷，满面胡子茬，浓眉毛遮着眼睛，一双大手握着枪，毯子式的披风下面露出了笨重的长统靴。岗亭墙上挂着一只磨得发黑的皮酒袋，还有一些报纸，但没有电话机。当然，在他看不到的另外一边可能有架电话机；但是看不到岗亭四周有通到外面的电线。沿公路有一条电话线通过铁桥。岗亭外边有一只炭火盆，是用一只旧汽油桶做的，截去了桶顶，桶壁上凿了几个洞，架在两块石头上，但盆里没生火。火盆下面的灰里有几只烧黑了的空铁罐。

罗伯特·乔丹把望远镜递给平躺在他身旁的安塞尔莫。老头儿露齿笑笑，摇摇头。他用手指敲敲自己眼睛边的太阳穴。

“我看见过他，”他用西班牙话说。他用嘴尖讲话，嘴唇几乎不动，这样发出的声音比耳语还低。罗伯特·乔丹冲着他微笑，他呢，注视着哨兵，一手指着哨兵，用另一手的食指在自己脖子上划了一下。罗伯特·乔丹点点头，但没有笑。

桥另一头的岗亭背对着他们，朝着公路下段，因此他们看不

到里面的情况。这条公路很宽，浇过柏油，铺得很道地，在较远的那个桥堍向左拐弯，再绕一个大弯子向右面拐出去，看不见了。眼前这一段公路是劈去峡谷那一边坚固的石壁，在旧路面的基础上加宽到现有的宽度的；从山口和桥上望下去，公路的左边，也就是西边，面临陡峭的峡谷的地方，竖着一排劈下来的石块做界石，作为防护。这里的峡谷十分幽深，上面架着桥的溪水和山口的主流在这里汇合。

“另外那个哨所呢？”罗伯特·乔丹问安塞尔莫。

“从那个拐弯过去五百米。在靠着石壁盖起的养路工的小屋边。”

“有多少人？”罗伯特·乔丹问。

他又用望远镜观察那个哨兵。只见哨兵在岗亭的木板墙上揪熄烟卷，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荷包，剥开那熄掉的烟蒂的烟纸，把剩下的烟丝倒进荷包。哨兵站起来，把步枪靠在岗亭的墙上，伸了一个懒腰，然后拿起步枪，挎在肩上，走到桥面上。安塞尔莫身体贴在地上，罗伯特·乔丹把望远镜塞进衣袋，脑袋闪在一棵松树后面。

“一起有七个士兵和一个班长，”安塞尔莫凑近他的耳朵说。“我是从吉普赛人那儿打听来的。”

“等他停下来，我们就走，”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太近了。”

“你要看的東西都看到了？”

“不错。我要看的都看到了。”

随着夕阳西沉，他们身后的山上的夕照逐渐消失，天气马上冷起来，天色也越来越暗了。

“你认为怎么样？”安塞尔莫低声问，他们望着那哨兵跨过桥

面，向另一个岗亭走去，他的刺刀在夕阳的余辉中闪闪发亮，他披着那件毯子式的外衣，形状很古怪。

“非常好，”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好。”

“我挺高兴，”安塞尔莫说。“我们走好吧？他现在不会发现我们了。”

哨兵在桥的那一头，背对他们站着。峡谷里传来溪水流过圆石间的淙淙声。接着，夹在流水声中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持续不断的响亮的隆隆声。他们看到哨兵抬起头来，帽子推到后脑勺上。他们掉头仰望，只见高空中有三架列成V字队形的单翼飞机，在还照得到阳光的上空显得清清楚楚，银光闪闪。飞机越过天空，快得难以置信，马达声震响个不停。

“我们的？”安塞尔莫问。

“好象是我们的，”罗伯特·乔丹说，但是他明白，飞得这样高，根本没法断定。既可能是我方，也可能是敌方在傍晚作巡逻飞行。不过人们总是说驱逐机是我们的，因为这使人感到安慰。轰炸机可是另外一回事。

安塞尔莫显然也有同样的感觉。“是我们的飞机，”他说。“我认识这些飞机。这些是蝇式。”

“对，”罗伯特·乔丹说。“我看也象是我们的蝇式。”

“这是些蝇式，”安塞尔莫说。

罗伯特·乔丹原可以把望远镜对准飞机，马上看个分明，但他觉得还是不看为好。今晚，这些飞机是谁的，对他都一样；如果把它们当作我们的会使老头儿高兴，他何苦使他失望呢。飞机现在超出视野，向塞哥维亚飞去，看来它们不象是俄国人改装的那种有绿机身、红翼梢、机翼安在机身下面的波音P 32型飞机。西班牙人把这种飞机叫作蝇式。颜色看不清，但式样显然不对头。

不。那是返航的法西斯巡逻机队。

哨兵仍旧背着身，站在远处的岗亭边。

“我们走吧，”罗伯特·乔丹说。他开始上山，小心翼翼地爬着，利用地形，避开桥那面的视线。安塞尔莫跟在他后面，相距一百码。罗伯特·乔丹走到从桥上不可能望见他们的地方，就站停了脚步，老头儿赶上来，走到前面去带路，不慌不忙地摸黑爬着，穿过山口，爬上那陡峭的山坡。

“咱们的空军真了不起，”老头儿高兴地说。

“对。”

“我们准打胜仗。”

“我们必须胜利。”

“是啊。我们胜利后你一定要来这儿打猎。”

“打什么？”

“野猪、熊、狼、野山羊——”

“你喜欢打猎吗？”

“是啊，老弟。比啥都喜欢。我们村里人人都打猎。你不喜欢打猎吗？”

“不喜欢，”罗伯特·乔丹说。“我不喜欢杀死动物。”

“我呐，正好相反，”老头儿说。“我不喜欢杀人。”

“除了那些头脑不对劲的人，谁都不喜欢杀人，”罗伯特·乔丹说。“可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反对。尤其是为了我们的事业的时候。”

“打猎可是另一回事，”安塞尔莫说。“我现在没有家了，以前可有过的，在我家里藏着我在山下树林里打来的野猪的牙齿。还有我打到的狼的皮。那是冬天在雪地里打的。有一条挺大，十一月有天晚上，我回家路过村边，在黑地里把它打死了。我家地

上铺了四张狼皮。它们都踩旧了，不过毕竟是狼皮啊。还有我在高山上打到的野山羊的角和一只鹰，请阿维拉一个专门剥制禽鸟标本的人加了工，翅膀是展开的，黄黄的眼睛，就象活的一样。这只鹰挺好看，我看到这些东西心里非常高兴。”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

“我村教堂门上钉着一只熊掌，那熊是我春天打的，我发现它在山坡上的雪地里，就用那只爪子在拨一段木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六年前了。那只熊掌象人手，不过爪子很长，已经干瘪了，穿过掌心钉在教堂门上，我每次见到，心里就乐。”

“出于骄傲吗？”

“想到初春在那山坡上和那头熊遭遇确实感到骄傲。不过讲到杀人，象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回忆起来一点也不愉快。”

“你不能把人的手掌钉在教堂门上，”罗伯特·乔丹说。

“不能。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是不能想象的。不过，人手很象熊掌。”

“人的胸部也很象熊的胸部，”罗伯特·乔丹说。“熊剥掉了皮，它的肌肉有很多和人的肌肉相象的地方。”

“是啊，”安塞尔莫说。“吉普赛人认为熊是人的兄弟。”

“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有这种看法，”罗伯特·乔丹说。“他们杀了熊就向它道歉，请它原谅。他们把它的脑壳搁在树上，临走前请求它宽恕。”

“吉普赛人认为熊是人的兄弟，是因为熊剥掉了皮，身体和人的是一样的，因为熊也喝啤酒，也喜欢听音乐，也喜欢跳舞。”

“印第安人也有这种看法。”

“那么印第安人就是吉普赛人了？”

“不。不过他们对熊的看法是一致的。”

“一点也不假。吉普赛人认为它是人的兄弟，还因为它爱偷东西取乐。”

“你有吉普赛血统吗？”

“没有。不过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认识得挺清楚。自从革命开始以来见得更多了。山里就有不少。他们认为杀掉外族人不算罪过。他们不承认这一点，不过这是事实。”

“象摩尔人一样。”

“是的。不过吉普赛人有很多规矩，他们自己却不承认。在打仗时很多吉普赛人又变得象古时候那样坏了。”

“他们不懂为什么要打仗。他们不知道我们作战的目的。”

“对呀，”安塞尔莫说。“他们只知道现在在打仗，大家又可以象古时候那样杀人而不一定受惩罚了。”

“你杀过人吗？”由于相处一天混熟了，现在天色又黑，罗伯特·乔丹便这么问。

“杀过。有好几回。不过不是很乐意的。依我看，杀人是罪过。哪怕是杀那些我们非杀不可的法西斯。依我看，熊和人大不一样，我不相信吉普赛人那种蛊惑人心的说法，什么人跟畜生是兄弟。不。凡是杀人，我都反对。”

“可是你杀过人了。”

“是呀。而且以后还要杀呢。不过，要是我能活得下去，我要好好儿过活，不伤害任何人，这样就会被人宽恕了。”

“被谁？”

“谁知道？既然在这里我们不再信天主，不再信圣子和圣灵了，谁来宽恕呀？我不知道。”

“你们不再信天主了？”

“是呀。老弟。当然是呀。要是有天主，他决不会让我亲眼目睹的那一切发生的。让人们信天主吧。”

“人们是需要天主的。”

“我是在信教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当然想念天主。不过做人现在得由自己负责了。”

“那么宽恕你杀人罪过的人，就是你自己罗。”

“我看就是这么回事，”安塞尔莫说。“既然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看一定就是这样。不过，不管有没有天主，我认为杀人就是罪过。我觉得害人一命可不是儿戏。必要的时候我才杀人，不过我不是巴勃罗那号人。”

“要打赢仗，我们就必须杀敌人。这是历来的真理。”

“那当然。我们打仗就得杀人。不过我有些古怪的念头，”安塞尔莫说。

他们这时正挨在一起摸黑走着，他低声说着，一边爬山，一边还常常回过头来。“我连主教也不想杀。我也不想杀哪个财主老板。我要叫他们后半辈子象我们一样，天天在地里干活，象我们一样在山里砍树。他们这样才会明白，人生在世该干些啥。让他们睡我们睡的地方。让他们吃我们吃的东西。不过，顶要紧的是让他们干活。这样他们就会得到教训了。”

“这样他们会活下来再奴役你。”

“把他们杀了并不给他们教训，”安塞尔莫说。“你没法把他们斩尽杀绝，因为他们会播下更深的仇恨的种子。监牢没用，监牢只会制造仇恨。应该让我们所有的敌人都得到教训。”

“不过你还是杀过人。”

“是的，”安塞尔莫说。“杀过好几次，以后还要杀。但不是乐意的，而且把它看作罪过。”

“那个哨兵呢？你刚才开玩笑说要杀掉他。”

“那是开玩笑。我原可以杀掉他。是呀。考虑到我们的任务，当然要杀，而且问心无愧。不过心里是不乐意的。”

“我们就把这些哨兵留给喜欢杀人的人吧，”罗伯特·乔丹说。“他们是八个加五个。一共十三个，让喜欢杀人的人去对付吧。”

“喜欢杀人的人可不少呢，”安塞尔莫在黑暗中说。“我们就有很多这种人。这种人要比愿意上战场打仗的人多。”

“你参加过战役吗？”

“没有，”老头儿说。“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塞哥维亚打过仗，不过我们吃了败仗，溃散啦。我跟了别人一起跑。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在干啥，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再说，我只有一支猎枪和大号铅弹，可是民防军有毛瑟枪。我在一百码外用大号铅弹没法打中他们，他们在三百码外，却可以随心所欲地象打兔子似的打我们。他们打得又快又准，我们在他们面前象绵羊似的。”他不作声了，接着问，“你看炸桥的时候会打上一仗吗？”

“有可能。”

“我每逢打仗没有一次不逃跑的，”安塞尔莫说。“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是老头子啦，可我一直闹不清。”

“我来帮衬你，”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那你打过很多仗吗？”

“打过几次。”

“你觉得炸桥这件事怎么样？”

“我首先考虑的是炸桥。那是我的工作。把桥炸掉并不难。然后我们再作其它部署。做好准备工作。这一切都得写下来。”

“这里的人识字的很少，”安塞尔莫说。

“要根据每个人的理解程度，写得大家都看得懂，而且还要把它讲清楚。”

“派给我什么任务，我准干，”安塞尔莫说。“不过，想起塞哥维亚开火的情形，假使要打，甚至于大打，最好先跟我讲明白，遇到各种情况，我得怎么干，免得逃跑。记得在塞哥维亚时我老是想逃跑。”

“我俩会在一起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怎么办。”

“那就没问题了，”安塞尔莫说。“吩咐我做的，我都能做到。”

“对我们来说就是炸桥和战斗，假如发生战斗的话，”罗伯特·乔丹说，他觉得在黑暗中说这番话有点象做戏，但是用西班牙语说来很带劲。

“那该是头等大事啊，”安塞尔莫说。罗伯特·乔丹听他说得直率、不含糊、不做作，既没有说英语民族的那种故意含蓄的谈吐，也没有说拉丁语民族的那种夸夸其谈的作风。他觉得能遇到这个老头儿很幸运，他看过了这座桥，设想出了一个简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要突然袭击哨所，就能按常规的办法炸掉它。他这时对戈尔兹的命令，对产生这些命令的必要性起了反感。他所以反感，是因为这些命令会给他；会给这个老头儿带来不测的后果。对于不得不执行这些命令的人来说，这自然是棘手的命令。

这个想法可不对头哪，他对自己说，你也好，别人也好，都没法保证不遭到不测。你和这个老头儿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们是完成你们的任务的工具。有些命令非执行不可，这不是你们所造成的；有座桥非炸掉不可，这座桥可以成为人类未来命运

的转折点，好象它能左右这次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你只有一件事好做，并且非做不可。只有一件事，妈的，他想。如果只此一件事，那就容易办了。他对自己说：别发愁啦，你这个说空话的野杂种。想想别的事情吧。

于是他想起了那姑娘玛丽亚，想起了她的皮肤、头发和眼睛，全是一样的金褐色。头发的颜色比她的皮肤要深些，不过由于皮肤将被阳光晒得越来越黑，头发就会显得淡了。这光滑的皮肤表面上是浅金色的，从内部透出更深的底色。这皮肤一定很光滑，她的整个身体一定都很光滑。她的举止很别扭，仿佛她身上有些东西使她局促不安，她觉得那些东西流露在外面，实在不然，只存在于她的心里。他望着她，她就脸红；她坐着，双手抱住膝头，衬衫领子敞开着，一对耸起的乳房顶着衬衫。想到她，他的喉头就哽住了，走路也不自在了。他和安塞尔莫都不作声，后来老头儿说，“我们现在穿过这些岩石下去就回营了。”

他们摸黑走着山路，这时，有一个人向他们喝了一声，“站住。哪一个？”他们听到往后拉枪栓的喀嚓一声，接着是推上子弹，枪栓朝下扳碰到木枪身的声音。

“同志，”安塞尔莫说。

“什么同志？”

“巴勃罗的同志，”老头儿对他说。“你不认识我们吗？”

“认识，”那声音说。“可这是命令。你们有口令吗？”

“没有。我们是从山下来的。”

“我晓得，”那人在黑暗中说。“你们是从桥头来的。我都晓得。命令可不是我下的。你们必须对得上口令。”

“那么上半句是什么？”罗伯特·乔丹问。

“我忘了，”那人在黑暗中说笑着。“那就带着你他妈的炸

药到炉火边去吧。”

“这就叫做游击队的纪律，”安塞尔莫说。“把枪的击铁推上。”

“没扳起击铁，”那人在黑暗中说。“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它顶着。”

“如果你用毛瑟枪这样干，枪栓没有卡子会走火的。”

“我这支就是毛瑟枪，”那人说。“可是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很管用。我老是这样顶着的。”

“你的枪口朝着哪里？”安塞尔莫对着黑暗问。

“朝着你，”那人说，“我推上枪栓的时候一直对着你。你到了营地，关照他们派人来换我班，因为我饿得真他妈的没法说，我还忘了口令啦。”

“你叫什么名字？”罗伯特·乔丹问。

“奥古斯丁，”那人说。“我叫奥古斯丁，我在这儿厌倦死了。”

“我们一定带去口信，”罗伯特·乔丹说。他在想：西班牙语中的“厌倦”这个词，说别种语言的农民是都不会用的。然而对于各个阶层的西班牙人这却是个最普通的字眼。

“听我说，”奥古斯丁说着，走上前来把手按在罗伯特·乔丹的肩上。接着他用打火石打上了火，吹亮火绒，凑着火光端详着这个年轻人的脸。

“你和另一个的样子很象，”他说。“不过也有些不一样。听着，”他放下火绒，握枪站着。“告诉我这件事。关于桥的事是真的吗？”

“什么桥的事？”

“就是要我们把他妈的那座桥炸掉，过后我们就得操他妈的从山里撤出去？”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奥古斯丁说。“真是笑话！那么炸药是谁的？”

“我的。”

“那你不知道炸药是用来干什么的？别跟我撒谎啦。”

“我知道做什么用，到时候你也会知道的，”罗伯特·乔丹说。“我们现在可要到营地去了。”

“到你他妈的地方去吧，”奥古斯丁说。“去你的吧。你可要我给你讲一件对你有用的事？”

“要，”罗伯特·乔丹说。“只要不老是他妈的，”他指的是交谈中随时都能听到的那种粗话。奥古斯丁这个人，说的话那么脏，老是把“他妈的”这个词加在每个名词前当作形容词，还把它用作动词，罗伯特·乔丹不禁纳闷，他会不会说一句干净的话。奥古斯丁听到后，在黑暗中笑了。“这是我的口头禅。可能不好听。谁知道？说话嘛，谁都有自己的习惯。听我说。桥对我没什么了不起。桥也罢，别的东西也罢，我都不在乎。再说，我在山里厌倦啦。要走我们就走吧。这山区对我没啥了不起，我们该撤走啦。不过有件事我得说说。好好保管你的炸药。”

“谢谢你，”罗伯特·乔丹说，“提防你吗？”

“不，”奥古斯丁说。“提防那些他妈的不象我这样有种的人。”

“是吗？”罗伯特·乔丹问。

“你懂西班牙语，”奥古斯丁这时认真地说。“好好保管你那些他妈的炸药。”

“谢谢你。”

“不。不用谢我。看好你的货色吧。”

“炸药出毛病了吗？”

“不，出了毛病我就不会跟你费时间磨嘴皮了。”

“我还是要谢谢你。我们现在到营地去吧。”

“好，”奥古斯丁说，“叫他们派个知道口令的到这里来。”

“我们会在营地和你见面吗？”

“会，老兄。一会儿就见面。”

“走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

他们沿着草地边走去，这时升起了灰色的雾气。在树林里铺着松针的地上走了许久之后，现在踩着茂盛的青草感到怪美妙的，草上的露水湿透了他们的帆布绳底鞋。罗伯特·乔丹透过树林看到前面有一线光亮，他知道，那里一定就是山洞口。

“奥古斯丁这个人挺不错，”安塞尔莫说。“他说话嘴巴不干净，老是开玩笑，不过，他人挺认真。”

“你和他很熟吗？”

“是的。认识很久了。我挺相信他。”

“也相信他的话？”

“对，老弟。这个巴勃罗现在可变坏了，你看得出来。”

“该怎么办才好呢？”

“应该时刻有人看守着。”

“谁？”

“你。我。那女人和奥古斯丁。因为他看到了危险。”

“你从前就知道这里的情况这样糟吗？”

“不，”安塞尔莫说。“不过糟得很快。然而到这里来是必要的。这是巴勃罗和‘聋子’的地段。在他们的地段上，我们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除非我们有力量单干。”

“那么‘聋子’这个人呢？”

“很好，”安塞尔莫说，“好的程度就象另一个坏的程度一

样。”

“你现在认为他真是坏人了？”

“整个下午我都在想这事，既然我们听到了种种情况，我现在认为他确实坏了。真的坏。”

“我们是不是推说要炸另一座桥，现在就离开这里，到别的几帮那里去找人更好些？”

“不，”安塞尔莫说。“这里是他的地段。你的一举一动他不会不知道。可是我们办事要多加小心。”

第 四 章

他们下山来到山洞口，一道光线从挂在洞口的毯子边缘透出来。两个背包还在树脚边，上面盖着帆布。罗伯特·乔丹跪下来，摸到盖在背包上的帆布又潮又硬。黑暗中，他在帆布下一个背包外面的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只有皮套的扁酒瓶，并把它插在衣袋里。背包是由串在背包口上的金属扣眼里的长柄挂锁锁住的，他打开锁，解开系在每个背包口上的绳子，把手伸进去，摸摸里面的东西有没有短少。他把手伸到一个背包的底部，摸到了捆好的一个个炸药包，那是裹在睡袋里的；他系上背包口上的绳子，再把它锁上，然后伸手到另一个背包里，摸到了那只放旧引爆器的硬邦邦的木盒，装雷管的雪茄烟盒，每个圆柱形的雷管外面都有两根铜线团团绕住（这一切都放得整整齐齐，就象他小时候收集的野鸟蛋那样），他还摸到从手提机枪上卸下来的包在他皮茄克里的枪托，装在大背包内袋里的两个子弹盘和五个子弹夹，以及另一个内袋里的几小卷铜丝和一大卷细漆包线。他在

藏电线的内袋里摸到了老虎钳和两把在炸药包一端钻洞用的木头锥子；接着从最后一个内袋里掏出一大盒从戈尔兹的司令部弄来的俄国香烟。他扎紧背包口，插上挂锁，扣上背包盖，再用帆布盖上这两个背包。安塞尔莫已到山洞里去了。

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想跟他进去，接着又想了想，揭去两个背包上的帆布，一手各提一个，勉强地朝山洞口走去。到了洞口，他放下一个背包，撩开门毯，然后弯了腰，一手提着一个背包的皮带，进入山洞里。

洞里很暖和，烟雾缭绕。沿洞壁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插着一支牛脂烛的瓶子，坐在桌边的是巴勃罗，三个他不认识的人和吉普赛人拉斐尔。烛光在洞壁上投射着他们的影子，安塞尔莫还站在桌子右边他刚才进来时的地方。巴勃罗的老婆站在洞椅角生炭火的炉灶边。那姑娘跪在她身旁，搅动着一只铁锅里的东西。她把木汤匙拿出来，望着这时站在门口的罗伯特·乔丹。他借炉火的光看到那妇人在拉风箱，看到姑娘的脸和一条手臂，汤汁从汤匙中滴下来，滴入铁锅。

“你提着什么东西？”巴勃罗问。

“我的东西，”罗伯特·乔丹说，在桌子对面山洞比较开阔的地方放下了背包，两个背包隔开一些距离。

“放在外面不是满好吗？”巴勃罗问。

“人家可能在黑暗中绊着，”罗伯特·乔丹说着，走到桌子边，把那盒香烟放在桌上。

“我不喜欢把炸药放在这儿洞里，”巴勃罗说。

“离炉火远着呢，”罗伯特·乔丹说。“拿几支烟吧。”他用拇指指甲划开盖上印有一艘彩色大兵舰的纸盒一边的封口，把它推到巴勃罗面前。

安塞尔莫给他搬来一只蒙着生皮的凳子，他就在桌边坐下来。巴勃罗望着他，好象有话要说，却伸手去拿烟卷。

罗伯特·乔丹随即把烟卷推向别人面前。他并不正眼打量他们。不过他觉察到有一个人拿了烟卷，两个人没拿。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巴勃罗一人身上。

“情况怎么样，吉普赛人？”他对拉斐尔说。

“不坏，”吉普赛人说。罗伯特·乔丹看得出，他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议论他。连吉普赛人也局促不安。

“她打算让你再吃吗？”罗伯特·乔丹问吉普赛人。

“是呀。干吗不？”吉普赛人说。这时的气氛和他们下午友好地又说又笑大不相同了。

巴勃罗的老婆一句话也没说，只顾拉风箱、扇炭火。

“有个叫奥古斯丁的说，他在山上厌倦得要死，”罗伯特·乔丹说。

“死不了，”巴勃罗说。“让他死一会儿也好。”

“有酒吗？”罗伯特·乔丹把身体朝前靠，手搁在桌上，向大伙儿随便问。

“剩下不多了，”巴勃罗阴郁地说。罗伯特·乔丹决定，他还不如观察一下另外三个人的神情，来判断自己的处境怎么样。

“既然如此，就让我喝杯水。你，”他叫那姑娘，“给我来杯水。”

姑娘望望那妇人，妇人一声不吭，只当没听到。她随即向水锅那边走去，舀了一满杯。她把水端到桌上，放在他面前。罗伯特·乔丹朝她笑笑。同时，他收紧了腹肌，身子在凳子上向左微微一转，这样，腰带上的手枪滑到了更顺手的地方。他朝后裤袋伸下手去，巴勃罗紧盯着他。他知道大家也都在紧盯着他，但他

只注意巴勃罗一个人。他从后裤袋里抽出那有皮套的扁酒瓶，旋开瓶盖，然后举起杯子，喝了半杯水，把瓶里的酒十分缓慢地倒在杯子里。

“这太凶，你受不了，不然我给你一点，”他对姑娘说，又对她笑笑。“剩下不多了，不然我请你喝一点，”他对巴勃罗说。

“我不喜欢大茴香酒，”巴勃罗说。

刚才一股辛辣味飘过桌面，他闻到了其中一种熟悉的成分的气味。

“那好，”罗伯特·乔丹说，“因为反正只剩一点儿了。”

“那是什么酒？”吉普赛人问。

“药，”罗伯特·乔丹说。“你想尝尝吗？”

“喝了管什么用的？”

“什么都管，”罗伯特·乔丹说。“什么病都能治。你如果有什么病，它准能治好。”

“让我尝尝，”吉普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把杯子向他推去。这酒掺了水变成了乳黄色，他希望吉普赛人只喝一口。剩下的只有一点儿了，这样一杯东西，可以代替晚报，可以代替往日在咖啡馆里消磨的所有的夜晚，代替每年这个月份里开花的所有的栗子树，代替郊区林荫路上的策马缓行，代替书店，代替报亭，代替美术陈列馆，代替蒙特苏里公园，代替布法罗运动场，代替夏蒙高地，代替保险信托公司和巴黎旧城岛，代替古老的福约特旅馆，可以代替在傍晚读书、休息；代替他享受过的、已被遗忘了的一切^①。当他尝着这

^① 从上文“代替晚报……”起，是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在回忆前几年在巴黎时到过的地方。

乳浊、苦涩、使舌头麻木、使头脑发热、使肚子暖和、使思想起变化的神妙的液体时，所有这一切又都重现在他眼前。

吉普赛人皱眉蹙额，交还杯子。“气味象大茴香，味道却象苦胆，”他说。“喝这种药我宁可生病。”

“那是苦艾，”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在这种真正的艾酒里掺有苦艾。据说它会把你的脑子都烂掉，不过我不信。它只会使思想起变化。你原该把水很慢地倒在里面，每一次倒几滴。不过，我却把它直接倒在水里。”

“你在说啥？”巴勃罗觉得受到了嘲弄，气忿地说。

“说明这药的性能，”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并露齿笑笑。“我是在马德里买的。这是最后一瓶，已经喝了三个星期。”他喝了一大口，觉得酒顺着他舌头朝下淌，神经都麻木了，特别舒服。他望着巴勃罗，又露齿笑笑。

“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巴勃罗不回答，罗伯特·乔丹留神望着桌边另外那三个人。有一个长着一张大扁脸，扁而红褐色，象只塞拉诺火腿，断鼻梁，扁鼻子，嘴角斜叼着细长的俄国烟卷，使那张脸显得更扁了。这个人留着灰色的短头发和灰色的胡子茬，穿着通常的黑色罩衣，齐脖子扣住。罗伯特·乔丹望着他，他垂下眼光看桌子，可是目光坚定，一眨不眨。另外两个显然是兄弟。他们长得很象，都是矮胖结实，黑头发，前额很低，黑眼睛，皮肤棕褐色。一个前额上有条刀疤，在左眼上方。他望着他们俩，他们俩也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一个看来二十七八岁光景，另一个可能要大两岁。

“你望什么？”两兄弟中那个有刀疤的问。

“你，”罗伯特·乔丹说。

“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来支烟？”

“行，”那人说。他刚才没拿烟卷。“这烟跟那个人的一样。炸火车的那个人。”

“你参加了炸火车？”

“我们都参加了，”那人冷静地说。“只有老头子没去。”

“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干的事，”巴勃罗说。“再炸一列火车。”

“那可以，”罗伯特·乔丹说。“等炸桥以后。”

他注意到巴勃罗的老婆在炉灶边转过身来，正在留心听。他一提到桥，大家都不作声了。

“等炸桥以后，”他故意重说一遍，呷了口艾酒。他想：我还是挑明的好。这个问题反正要谈到的。

“我可不去炸桥，”巴勃罗说，低头望着桌子。“我也好，我的手下也好，都不去。”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他望着安塞尔莫，举起了杯子。“那我们只好单干啦，老伙计，”他微笑着说。

“不要这个胆小鬼，”安塞尔莫说。

“你说什么？”巴勃罗对老头儿说。

“不关你的事。我没有跟你说话，”安塞尔莫对他说。

罗伯特·乔丹这时隔着桌子望望站在炉火边的巴勃罗的老婆。她还没开过口，也没任何表示。但她这时对那姑娘说了些他听不清的话，姑娘就从火边站起身来，沿洞壁悄悄走去，揭开挂在洞口的毯子，出去了。罗伯特·乔丹想：我看现在要摊牌了。我相信就在眼前了。我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可是实际情况看来就会如此。

“那我们要不靠你的帮助来炸桥，”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

说。

“不，”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望着他出汗的脸。“你不能在这里炸桥。”

“不能？”

“你不能炸桥，”巴勃罗缓慢地说。

“那你怎么说？”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的老婆说，她站在炉灶边显得镇静而高大。她转身对大家说，“我赞成炸桥。”她的脸被火光映亮了，显得红黑红黑的，热情而漂亮，流露出了她的本色。

“你说什么？”巴勃罗对她说；罗伯特·乔丹看到他转过头来，脸上显出感到众叛亲离的神色，前额上在冒汗。

“我赞成炸桥，反对你，”巴勃罗的老婆说。“没别的话啦。”

“我也赞成炸桥，”长着扁脸和断鼻梁的人说，在桌上掀灭了烟蒂。

“对我来说，那座桥算不上什么，”两兄弟中的一个说。“我拥护的是巴勃罗大娘。”

“我也一样，”另一个说。

“我也一样，”吉普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巴勃罗，同时，右手慢慢地放下来，以防万一，心里有点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他觉得那也许是最简易的解决办法，然而又不愿意损害已有的良好进展。他知道，一家人、一族人、一帮人在争吵的时候，很容易迅速团结起来反对一个外来的人；然而他又想，既然问题已经挑明，用这只手所能干出来的事也许是最简单而最好的，象外科手术那样最干脆。他还注意到巴勃罗的老婆站在那里，在众人表态时激动得脸上露出骄傲、坚强、健康的红色。

“我拥护共和国，”巴勃罗的老婆欢快地说。“桥关系到共和国的命运。要干别的我们以后有时间。”

“你呀，”巴勃罗刻薄地说。“你这个种牛脑袋、婊子心肠的东西。你以为炸这座桥还会有‘以后’吗？你考虑到会发生什么事吗？”

“会发生该发生的事情，”巴勃罗的老婆说。“非发生不可的事情总得发生。”

“炸这座桥我们得不到好处，炸桥之后我们会象野兽一样被人搜捕，你觉得无所谓吗？炸桥时万一死掉也无所谓吗？”

“无所谓，”巴勃罗的老婆说。“你别来吓唬我，胆小鬼。”

“胆小鬼，”巴勃罗忿忿地说。“你把一个有战术头脑的人叫做胆小鬼，因为他能事先看到干蠢事要遭殃。懂得什么叫蠢事的可不是胆小鬼。”

“懂得什么叫胆小鬼的也不见得蠢，”安塞尔莫忍不住插了一句。

“你要找死吗？”巴勃罗严厉地对他说。罗伯特·乔丹看到这句话问得太不够策略。

“不。”

“那么留神你的嘴。你话太多了，讲的事自己也不懂。你没看出这件事的严重性吗？”他简直露出了一副可怜相。“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才看出这件事的严重性吗？”

罗伯特·乔丹想：我也这样认为。老巴勃罗啊，老伙计，我也这样认为哪。还有我。你看得出来，我也看出来了，那妇人从我手掌上也看出来了，只是她自己还没有明白过来。目前她还没有明白过来。

“老子当家难道是吃干饭的？”巴勃罗问。“我说的话，我有

根据。你们这帮人哪里知道。这个老头子在胡扯。他呀，这老头子，只会给外国人当通讯员、做向导。这个外国人到这里来干的事只对外国人有好处。为了他的好处，我们却得付出牺牲。我关心的是大家的好处和安全。”

“安全，”巴勃罗的老婆说。“安全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到这里来找安全的人太多了，以致引起了大危险。为了寻求安全，现在把什么都丢啦。”

她这时站在桌边，一手拿着那把大汤匙。

“有安全，”巴勃罗说。“在危险中懂得如何见机行事就有安全。正象斗牛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冒不必要的险，就会安全。”

“直到他被牛角挑伤为止，”那妇人尖刻地说。“斗牛士被牛挑伤前也说这种话，我听到过不知有多少次了。我老是听菲尼托说：这全靠学问，牛决不会挑伤你，而是人自己撞到牛角上去的。他们挨牛角之前，总是这样吹大气。结果是我们到病房里去看他们。”这时，她学着在探病的样子，“喂，老伙计，”她声如洪钟地说。接着，她用受了重伤的斗牛士的衰弱的声音说，“你好，朋友。怎么啦，比拉尔？”“怎么搞的，菲尼托，好孩子啊，你怎么碰到了这种倒霉事儿？”她用自己那洪亮的声音说。接着再学衰弱的声音，“没什么，太太。比拉尔，没什么。本来不会出这种事的。我顺顺当当地刺死了它，你知道。谁都没有我利索。我干净利落地把它杀了，它呢，死定啦，腿儿摇摇晃晃的，支撑不住自身的重量，眼看就要栽倒了。我从它身边走开，模样挺神气，挺帅，哪知道，它从背后把角捅进我的屁股，从肚皮上戳了出来。”她不再学斗牛士那简直象女人一般柔弱的声音了，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又声音洪亮地说话了。“你扯什么安全啊！我和天下三个收入最少的斗牛士待过九年，还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什么叫安全吗？

跟我讲什么事都行，可别讲安全。而你呀。我是一门心思指望你干番大事，现在可落得这样的下场！打了一年仗，你就变成了懒鬼、酒鬼、胆小鬼。”

“你没权利这样说话，”巴勃罗说。“尤其在大家面前，在陌生人面前。”

“我就是要这样说话，”巴勃罗的老婆接着说。“你听到没有？你以为这里还是你作主？”

“对，”巴勃罗说。“这里我作主。”

“没的事，”那妇人说。“这里我作主！你们大伙听到了没有？这里除了我没有别人能作主。你要愿意，可以待着，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可不能不要命似的喝那么多。你要愿意，可以干一部分活。可这里我作主。”

“我该把你和这个外国佬一起毙了，”巴勃罗阴沉地说。

“试试看，”那妇人说。“看看会怎么样。”

“给我来杯水，”罗伯特·乔丹说，眼睛仍然盯着这个脸色阴沉而脑袋笨重的汉子和那个自豪而信心十足地站着的女人，她拿着一把大汤匙，威风凛凛地仿佛拿的是指挥棒。

“玛丽亚，”巴勃罗的老婆喊道，等姑娘进了门，她说，“拿水给这位同志。”

罗伯特·乔丹伸手去掏扁酒瓶，他一边拿出瓶子，一边松开枪套里的手枪，把它在腰带上转过来顶着大腿根。他再往杯子里倒了点艾酒，端起姑娘替他端来的那杯水，开始一滴一滴地倒在酒杯里。姑娘站在他身边望着他。

“到外面去，”巴勃罗的老婆对她说，用汤匙朝外面指指。

“外面冷哪，”姑娘说，脸颊挨近了罗伯特·乔丹的脸，注视着杯子里面的液体逐渐变得混浊。

“兴许是吧，”巴勃罗的老婆说。“不过这里可太热了。”她接着亲切地说，“要不了多久啦。”

姑娘摇摇头，出去了。

罗伯特·乔丹暗自思忖：我看他就要按捺不住了。他一手握着杯子，一手毫不掩饰地放在手枪上。他已经打开了保险栓，抚摩着原先有小方格、现在几乎已磨平的枪柄，摸着圆圆的冰凉的扳机护圈，一种舒适的伴侣感油然而生。巴勃罗不再望着他了，只望着那妇人。她接着说，“听我说，酒鬼。你明白这里是谁作主吗？”

“我作主。”

“不。听着。把你那毛耳朵里的耳垢掏掉。好好听着。我作主。”

巴勃罗望着她，从他的脸上一点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他故意直勾勾地望着她，接着望望桌子对面的罗伯特·乔丹。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他好久，接着又回头望着那妇人。

“行呀。你作主，”他说。“你愿意的话，他作主也行。你们两个见鬼去吧。”他正眼望着那妇人的脸，他既没被她镇住，似乎也没受她多大的影响。“我或许是懒，酒喝得太多。你可以把我当胆小鬼，不过这一点你错了。我可不是傻瓜。”他停了一会。“你想作主，你也喜欢作主。那好，你既然作主，又是女当家，就该给我们搞些吃的了。”

“玛丽亚，”巴勃罗的老婆喊道。姑娘从山洞口的毯子边探头进来。“进来侍候吃晚饭。”

姑娘走进来，走到炉灶边的矮桌前，端起一些搪瓷碗，放到饭桌上。

“红酒够大家喝的，”巴勃罗的老婆对罗伯特·乔丹说。“别

理会那酒鬼的话。喝完了这些酒，我们可以再搞一些。喝掉你那怪东西，来一杯红酒吧。”

罗伯特·乔丹一口干了最后一点艾酒，由于这样一饮而尽，觉得一股暖和、滋润、冒出浓烈气味、产生化学变化的细细的热流在他肚子里直泻而下，他递过杯子去要红酒。姑娘微笑着给他舀得满满的。

“呃，你去看过桥了？”吉普赛人问。刚才摊牌表态后还没开过口的人，现在都凑过来听。

“是呀，”罗伯特·乔丹说。“这件事不难干。要我讲给你们听吗？”

“好，伙计。挺有兴趣。”

罗伯特·乔丹从衬衫袋里掏出笔记本，给他们看草图。

“瞧这桥的样儿，”那个名叫普里米蒂伏的扁脸汉子说。“画得真象。”

罗伯特·乔丹用铅笔尖指着，讲解如何炸桥的方法，为什么要那样安放炸药包的原因。

“真简单极了，”两兄弟中脸上有刀疤的那个说，他名叫安德烈斯。“那你怎样引爆这些炸药包呢？”

罗伯特·乔丹又作了解释。他给他们讲解着，发觉那姑娘在旁边望着，手臂搁在他肩膀上。巴勃罗的老婆也在看着。只有巴勃罗不感兴趣，用杯子在大缸里又舀满了酒，坐在一旁独酌。大缸里的酒是玛丽亚从挂在山洞进口左侧的皮酒袋里倒出来的。

“这种事你干得很多吗？”姑娘悄声问罗伯特·乔丹。

“对。”

“我们可以去看炸桥吗？”

“可以。干吗不？”

“你会看到的，”巴勃罗在桌子的那头说。“我相信你会看到的。”

“闭嘴，”巴勃罗的老婆对他说。她突然想起下午在手掌上看到的预兆，猛的冒出一股无名之火。“闭嘴，胆小鬼。闭嘴，不祥的老鸦。闭嘴，亡命之徒。”

“好，”巴勃罗说。“我闭嘴。现在作主的是你，你只顾自得其乐吧。不过别忘了，我可不是傻瓜。”

巴勃罗的老婆感到自己的愤怒变成了忧伤，感到受到了挫折，丧失了一切希望，前途茫茫。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体会过这种心情，她一生中一直知道产生这种心情的来源。现在突然又出现了这种心情，她把它置之脑后，不让它影响她，既不让它影响她，也不让它影响共和国，于是她说，“我们现在来吃吧。把锅里的菜盛在碗里，玛丽亚。”

第 五 章

罗伯特·乔丹撩开挂在山洞口的马毯，跨到外面，深深地吸了一口夜凉空气。迷雾已消散，星星露面了。这时洞外没有风，他不再闻到洞里暖和的空气，那里弥漫着烟草和炭火的烟味，夹杂着米饭、肉、蕃红花、辣椒和食油的香味，还有那拴住脖子挂在洞边的盛酒用的大皮袋，四腿伸开，一条腿上安了一个塞子，取酒时溅出来的酒洒在泥地上，酒味压倒了尘埃的气味；他不再闻到和长长的一串串大蒜一起挂在洞顶的一扎扎不知名称的各种药草的气味，他不再闻到铜币、红酒和大蒜的气味，马汗和人衣服上的汗味（人汗是刺鼻的酸味，刷下来的马汗沫干了以后带有

怪味，令人作呕)。罗伯特·乔丹现在离开了桌边的那些人，深深吸着夜晚山中带着松树和溪边草地上的露水气息的清新空气。风已停息，露水更浓了，但是他站在那里，却认为早晨准会有霜。

他站着深深地呼吸着，倾听着夜籁，这时，他先听到远方的枪声，接着是下面树林中马栏那边传来猫头鹰的叫声。然后他又听到吉普赛人在山洞里开始唱歌，还有吉他轻柔的伴奏声。

“我爹留给我一笔遗产，”粗哑的假嗓音响了起来，在那里荡漾。他接着唱下去：

“那就是月亮和太阳；
我虽然走遍天涯海角，
这笔遗产永远花不光。”

低沉的吉他声里混杂着大家为歌手喝彩的声音。“好，”罗伯特·乔丹听到有人在喊。“唱那支加泰隆民歌^①给我们听，吉普赛人。”

“不。”

“唱吧。唱吧。唱加泰隆民歌。”

“好吧，”吉普赛人说，就哀伤地唱起来：

“我的鼻子扁，
我的脸儿黑，
不过我还是人。”

① 指用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方言加泰隆语写的民歌。

“好！”有人喊。“唱下去，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的歌声伤心而嘲弄地响起来：

“幸好我是个黑人，
不是加泰罗尼亚人！”

“真闹死了，”只听得巴勃罗的声音说。“住口，吉普赛人。”

“是呀，”他听到那妇人的声音说。“闹得太厉害了。你这副嗓子可以把民防军都招来，不过唱得还是不够格。”

“我还会唱一节，”吉普赛人说，接着响起了吉他声。

“留着吧，”那妇人对他说。

吉他声停了。

“今晚我嗓子不好。不唱也没什么关系，”吉普赛人说着，撩开毯子，走到外面黑夜中去。

罗伯特·乔丹看见他走到一棵树边，然后向他这边走来。

“罗伯托，”吉普赛人低声说。

“嗯，拉斐尔，”他说。他从吉普赛人的声调里听出他有了几分醉意。他自己也喝了两杯艾酒和一些红酒，但是由于刚才和巴勃罗紧张地较量了一番，他的头脑却清醒而冷静。

“你干吗不杀了巴勃罗？”吉普赛人悄悄地说。

“为什么要杀他？”

“你迟早得杀了他。你为啥不利用当时的机会？”

“你这是说正经话？”

“你以为我们大伙在盼着什么？你以为那女人把丫头支出去是为了什么？刚才说了那番话，你以为我们往后还呆得下去吗？”

“我以为你们大家会杀他的。”

“什么话！”吉普赛人冷静地说。“那是你的事。有三四次我们等你动手杀他。巴勃罗没有朋友。”

“我起过这念头，”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打消了。”

“大家也都看到啦。大家都注意到你准备动手。你干吗不动手？”

“我觉得这样做说不定会使你们有些人，或者使那女人不高兴。”

“什么话！那婆娘就象婊子盼嫖客那样心焦地盼着。你看上去挺老练，实际还嫩着呢。”

“那倒有可能。”

“现在去杀他吧，”吉普赛人催促着。

“那就等于暗杀。”

“这样更好些，”吉普赛人悄声说。“危险少些。动手吧。现在就干掉他。”

“我不能那么干。我讨厌那种做法，为了我们的事业，不应该那么干。”

“那么就惹他冒火，”吉普赛人说。“你非杀他不可。没别的办法。”

他们交谈的时候，那只猫头鹰在树林里悄没声儿地飞着，先在他们身旁落下，随即又飞上天去，迅速扑动着翅膀，可是尽管它一路觅食，拍击着翅膀，却一点声音也没有。

“瞧它，”吉普赛人在黑暗中说。“人就该这么行动。”

“可是到了白天，它在树上一点也看不见，却被乌鸦包围起来了，”罗伯特·乔丹说。

“这是难得如此的，”吉普赛人说。“再说，也是偶然的事。杀

他吧，”他接着说。“别等到事情棘手的时候。”

“现在已经错过机会啦。”

“向他挑衅，”吉普赛人说。“或者趁现在夜深人静。”

遮住山洞口的毯子撩开了，露出亮光来。有一个人向他们站的地方走来。

“夜色真好，”那人用低沉而单调的嗓音说。“天气要放晴啦。”

那是巴勃罗。

他正在抽一支俄国烟卷，吸烟时烟头的火光映出了他的圆脸。在星光中，他们看得清他的一双长臂和粗壮的身子。

“别理会那婆娘，”他对罗伯特·乔丹说。黑暗中，烟头的红光很亮，接着那光亮随着他的手垂下了。“她有时真别扭。她人不坏。对共和国很忠诚。”他说话时烟头的光在微微抖动着。罗伯特·乔丹想，他说话时准是把烟卷叼在嘴角。“我们不应当闹别扭，大家是一条心嘛。你来了，我很高兴。”这时烟头的光变得很亮。“别把争吵放在心上，”他说。“你在这里很受欢迎。”

“现在我要失陪了，”他说。“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把马拴好了。”

他穿过树林，走到草地边，他们听到草地上有匹马在嘶叫。

“你明白了吧？”吉普赛人说。“现在你总明白了吧？这一来，机会错过了。”

罗伯特·乔丹一句话也没说。

“我到下面去，”吉普赛人忿忿地说。

“去干什么？”

“瞧你说的，干什么！至少防止他溜掉呗。”

“他能从下面骑了马走掉吗？”

“不能。”

“那么你到一个能防止他走掉的地点去。”

“奥古斯丁在那儿。”

“那你去通知奥古斯丁。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奥古斯丁会很乐意杀掉他的。”

“这倒不坏，”罗伯特·乔丹说。“那就到山上去把发生的情况都照实告诉他。”

“接着呢？”

“我到下面草地上去看看。”

“好。伙计。好。”他在黑暗中看不到拉斐尔的脸，但能感觉到他在微笑。“现在你可要真干啦，”吉普赛人赞许地说。

“去找奥古斯丁吧，”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好，罗伯托，好，”吉普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在松林中穿行，从这棵树摸到另一棵树，来到草地边。他在黑暗中望着眼前的草地，在星光下，这空旷的草地显得较明亮，他看到那些拴住的马的黑黝黝的身影。他数数散开在他眼前到小溪边这片草地上的马群。一共五匹。罗伯特·乔丹坐在一棵松树脚下，眺望面前的草地。

他想：我累啦，也许我的判断力不行了。不过我的责任是炸桥，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我不能拿自己作无谓的冒险。当然，放过必须抓住的机会有时候更危险，但是我一直听其自然，让事态自己发展。要是真象吉普赛人说的，大家都指望我杀掉巴勃罗，那我就应该杀了他。但我一点也摸不透，他们是不是真的指望我那样做。让一个外来的人来杀人，而事后又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工作，这是非常糟的。在打仗时可以这么干，有了充分的纪律保证也可以这样干，可是我觉得，在眼前的情况下这样干是十分糟的，

尽管这办法很吸引人，似乎又干脆又简单。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是不信任何事能这样干脆而简单的，尽管我完全信任那女人，可我不准她对这样走极端的行动会有什么反应。一个人在这种场合死去也许是非常丑恶、肮脏、令人厌恶的。你摸不透她会有什么反应。没有这个女人，这里就没有组织，也没有纪律，有了她，事情就能很好办。如果她杀了他，或者由吉普赛人来杀（但他是不会的），或者由那哨兵奥古斯丁来杀，那就理想了。如果我要求安塞尔莫，他是肯动手的，虽然他说反对杀任何人。我相信，他恨巴勃罗，他对我已经有了信任，而且把我当作他所信仰的事物的代表那样信任我。依我看，只有他和那女人才真正信仰共和国；不过，现在下这种结论还太早。

他眼睛习惯了星光，他看到巴勃罗站在一匹马旁边。那匹马抬起头来不再吃草了；接着又不耐烦地垂下头去。巴勃罗站在马旁边，挨着它，跟它顺着缰绳的长度转圈子，不时拍拍它的脖颈。马在吃草的时候，对这样的爱抚显得不耐烦。罗伯特·乔丹看不清巴勃罗在做什么，也听不到他对马在说些什么，但是他看得出巴勃罗不在解缰绳，也不在备鞍。他坐在地上望着巴勃罗，想把他的问题理出个头绪来。

“你呀，我的大个儿小乖马，”巴勃罗在黑暗中对那匹马说，就是那匹栗色大种马。“你这个可爱的白脸大美人儿呀。你呀，你的长脖子弯得象我老家村子里的旱桥。”他停了一会儿。“弯得更高、更好看。”马在啃草，把草咬断时头歪向一边，被这个人和他的唠叨弄得厌烦了。“你可不是婆娘，也不是傻瓜，”巴勃罗对栗色马说。“你呀，啊，你呀你，我的大个儿小乖马。你不是那个象滚烫的石头一样的婆娘。你也不是那个剃了光头、象乳臭未干的小牝马般走动的丫头。你不骂街，也不撒谎，可懂事哪。你呀

你，我的大个儿小乖马呀。”

如果听到巴勃罗跟那栗色马谈心，罗伯特·乔丹准会觉得非常有趣，但他没听到，因为他深信巴勃罗只是下来检查他的马匹，认为在这时杀他并不可取，所以站起身来，回山洞去了。巴勃罗留在草地上对那匹马谈了很久。马儿一点也不懂他说的话，只听得出那语调是亲热的表示。但它在马栏里被圈了一天，这时正饿着，不耐烦地在系马桩上的绳子长度所及的范围里吃草，这家伙的唠叨叫它恼火。巴勃罗后来把系马桩搬了一个位置，仍旧站在马身边，可是不说话了。马儿继续吃草，这个人不再打扰它了，使它觉得轻松不少。

第 六 章

在山洞里，罗伯特·乔丹挨着炉火坐在角落里一只蒙着生牛皮的凳子上，听那女人说话。她正在洗碗碟，那姑娘玛丽亚把它们擦干净，放在一边，然后跪下来放进当作柜子用的壁洞里。

“真怪，”那女人说，“怎么‘聋子’还不来？一小时以前他就该到了。”

“你捎过话叫他来吗？”

“没有。他每晚都来。”

“他也许有事。有工作。”

“可能，”她说。“他要是不来，我们明天得去看他。”

“对。离这里远吗？”

“不远。出去走走也不错。我缺少活动。”

“我能去吗？”玛丽亚问。“我也可以去吗，比拉尔？”

“可以，美人儿，”那妇人说，随即转过她的大脸，“她不是很漂亮吗？”她问罗伯特·乔丹。“你觉得她怎么样？稍微瘦着点？”

“我看她很不错，”罗伯特·乔丹说。玛丽亚替他斟满了酒。“把它喝了，”她说。“这样，我就显得更好看。要喝许许多多酒才会觉得我漂亮。”

“那我还是不喝的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已经很漂亮了，并且还不止是漂亮呢。”

“这话说对啦，”妇人说。“你的话有道理。她看上去还有什么优点呢？”

“聪明，”罗伯特·乔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玛丽亚吃吃地笑了，妇人失望地摇摇头。“你开头说得多好，最后却这么说，堂·罗伯托。”

“别叫我堂·罗伯托。”

“那是开玩笑。我们这里开玩笑时就叫堂·巴勃罗。就象我们叫玛丽亚小姐那样，也是开玩笑。”

“我不开这种玩笑，”罗伯特·乔丹说。“依我看，在当前的战争中大家都应当非常认真地称呼同志。一开玩笑就会出现不好的苗头。”

“你对你的政治象对宗教那么虔诚，”妇人取笑他。“你从不开玩笑？”

“也开。我很爱开玩笑，可不在称呼上开。称呼好比一面旗帜。”

“我连旗帜也要开玩笑，不管什么旗帜，”妇人大笑。“和我相比，任何别人的玩笑就算不上一回事了。我们管那面黄、金两色的老旗子叫做脓和血。加上紫色的共和国国旗，我们管它叫

做血、脓和高锰酸钾。那是开玩笑。”

“他是共产党，”玛丽亚说。“他们是很严肃的人。”

“你是共产党吗？”

“不，我是反法西斯主义者。”

“很久了吗？”

“自从我了解法西斯主义以来。”

“多久了？”

“差不多十年了。”

“那时间不算长，”妇人说。“我做了二十年共和分子啦。”

“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共和分子，”玛丽亚说。“就为这个，他们把他枪毙了。”

“我父亲也是个终生的共和分子。还有我祖父，”罗伯特·乔丹说。

“在哪一国？”

“美国。”

“他们给枪毙了吗？”那妇人问。

“怎么会呢，”玛丽亚说。“美国是共和分子的国家。那里的共和分子是不会被枪毙的。”

“有一个共和分子的祖父反正是好事，”那妇人说。“从这里看得出家世很好。”

“我祖父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罗伯特·乔丹说。这句话连玛丽亚也觉得印象很深。

“你父亲还在共和国做事吗？”比拉尔问。

“不。他去世了。”

“能不能问问，他是怎样去世的？”

“他开枪自杀的。”

“为了避免遭受拷打吗？”那妇人问。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为了避免受到折磨。”

玛丽亚望着他，眼睛里噙着眼泪。“我父亲，”她说，“当时弄不到枪。噢，我真高兴，你父亲有运气，能弄到枪。”

“是呀。真侥幸，”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谈谈别的好不好？”

“这么说，你和我，我们的身世是一样的，”玛丽亚说。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凝视着他的脸。他望着她那褐色的脸，望着她的眼睛；自从他见到她的眼睛以来，总觉得它们不及她脸上的其他部分那么年青，而现在，顷刻之间，这双眼睛却显得年青，带着渴望的神情。

“看你们的模样很象兄妹，”那妇人说。“不过，我觉得你们俩不是兄妹倒好。”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有那么样的心情，”玛丽亚说。“现在清楚了。”

“什么话，”罗伯特·乔丹说着，伸手抚摸她的头顶。整天来，他一直想抚摸它，现在如愿了，他只觉得自己的喉咙哽得慌。她在他的抚摸之下，把头微微挪动着，她抬头向他微笑；他感到浓密而柔顺的短发在他指缝中波动着。他把手随后放在她脖子上，接着就拿开了。

“再摸一次，”她说。“我整天都盼望着你这样做。”

“以后再说吧，”罗伯特·乔丹声音沙哑地说。

“那我呢，”巴勃罗的老婆嗓音洪亮地说。“难道要我在旁边看着这副模样吗？难道要我无动于衷吗？做不到啊。不得已而求其次，只指望巴勃罗回来。”

玛丽亚这时既不理睬她，也不理会那几个在桌边借烛光玩纸牌的人了。

“要不要再来一杯酒，罗伯托？”她问。

“好，”他说。“干吗不？”

“你跟我一样，也要弄到一个酒鬼了，”巴勃罗的老婆说。“他喝了杯里的怪东西，还喝这喝那的。听我说，英国人。”

“不是英国人。是美国人。^①”

“那么听着，美国人。你打算睡在哪儿？”

“外面。我有睡袋。”

“好的，”她说。“天气晴朗吗？”

“而且还会很凉快。”

“那就在外面吧，”她说。“你睡在外面。你那些货色可以放在我睡的地方。”

“好，”罗伯特·乔丹说。

“走开一会儿，”罗伯特·乔丹对姑娘说，并把手按在她肩膀上。

“干吗？”

“我想跟比拉尔说句话。”

“非走不可吗？”

“对。”

“什么事？”等姑娘走到山洞口，站在大酒袋边看人打牌的时候，巴勃罗的老婆问。

“吉普赛人说我应当——”他开口说。

“不，”妇人打断了他的话。“他错了。”

“如果有必要——”罗伯特·乔丹平静但又犹豫地说。

① 因为美国人也讲英语，所以这些西班牙人自此以后经常称他为“英国人”。

“我相信，那时你是会下手的，”妇人说。“不，没有必要。我一直注意你。不过你的看法是对的。”

“但是如果有需要——”

“不，”妇人说。“我跟你说，没有需要。吉普赛人的心思坏透了。”

“可是人在软弱的时候能造成很大危害。”

“不。你不懂。这个人是已经不可能造成危害的了。”

“我弄不懂。”

“你还很年青，”她说。“你以后会懂的。”接着对姑娘说，“来吧，玛丽亚。我们谈完了。”

姑娘走过来，罗伯特·乔丹伸手轻轻拍拍她的头。她在他的抚摸之下，象只小猫。他以为她要哭了。但是她的嘴唇又往上一弯，望着他微笑了。

“你现在还是去睡觉吧，”妇人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赶了很多路啦。”

“好，”罗伯特·乔丹说。“我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

第 七 章

他躺在睡袋里。他想：我已入睡了很久啦。睡袋铺在树林中的地上，在山洞口一边岩石的背风处；他睡眠中翻过身来，压在手枪上，这手枪的带子系在一只手腕上，是临睡前放在身边的。他当时觉得腰酸背痛，两腿乏力，肌肉由于疲劳而有点僵硬，所以感到地面很柔软，疲乏的身子在有法兰绒衬里的睡袋中舒展一下，使他觉得十分舒适。他醒来时恍恍惚惚，不知道自己

在什么地方，过后才明白过来，就挪开身体底下的手枪，满意地伸伸胳膊和腿，又入睡了，一只手放在用衣服整齐地卷住绳底鞋做成的枕头上，一条胳膊接着这个枕头。

随后，他觉得有只手按到自己肩上，立即翻过身来，右手握住睡袋里的手枪。

“噢，原来是你，”他说着放下手枪，伸出双臂把她朝下拉。他抱住她时，感觉到她在发抖。

“进来吧，”他轻柔地说。“外面很冷。”

“不。不行。”

“进来吧，”他说。“我们等会儿再谈吧。”

她索索发抖；他一手握住她的手腕，另一条胳膊轻轻地搂住她。她扭过头去了。

“进来吧，小兔子，”他说，吻着她的后颈。

“我怕。”

“别。别怕。进来吧。”

“怎样进来啊？”

“钻进来就是。里面有地方。要我帮你吗？”

“不，”她说就钻进了睡袋，他把她紧紧贴着自己，想吻她的嘴唇，她呢，把脸伏在用衣服卷成的枕头上，但双臂紧搂着他的脖子。接着，他感到她的手臂松开了，他伸手拥抱她，她又哆嗦起来。

“别这样，”他说着笑了。“别怕。那是手枪。”

他拿起手枪，推到自己背后。

“我害臊，”她说，脸朝着别处。

“不。没有必要。好。来吧。”

“不，我不能。我害臊，我怕。”

“别。我的兔子。请不要见怪。”

“不行。假如你不爱我呢。”

“我爱你。”

“我爱你。啊，我爱你。把手放在我头上，”她朝着别处说，脸仍伏在枕上。他把手放在她头上抚摸着，接着，她突然从枕头上转过脸，偎在他怀里，紧挨着他，脸贴着他的脸，哭了。

他静静地、紧紧地抱着她，抚摸着她那颀长而年青的身体，抚摸着她的头，吻着她那润湿而带咸味的眼睛；她哭着，他感到她衬衫里面那对圆圆的、隆起的、坚实的乳房在颤抖。

“我不会接吻，”她说。“我不知道怎么接。”

“不一定要接吻。”

“不。我一定要。该做的我都得做。”

“没有必要做什么嘛。我们现在很好。不过你的衣服多了一些。”

“我该怎么办？”

“我来帮你。”

“这样是不是好些了？”

“好。好多了。你是不是也觉得好些？”

“好。好多了。我可以象比拉尔说的那样跟你走吗？”

“可以。”

“可是不去养育院。我要跟你在一起。”

“不，要去养育院。”

“不。不。不。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做你的女人。”

他俩这样躺着，原先遮蔽的，现在全裸露了。原先是粗糙的衣服，现在全是润滑的肌肤，润滑、坚实、圆鼓鼓地紧挨着，长久的温暖的凉意，外面凉而里面暖；长久、轻快而紧密的拥抱，

落莫空虚却又轮廓分明，青春可爱而使人心醉神移，现在都是温馨润滑，给人一种空虚、胸口隐隐作痛、紧密拥抱的落莫之感，这一切如此强烈，以至罗伯特·乔丹觉得再也忍不住了，他说，“你爱过别人吗？”

“从来没有。”

这时，她在他怀里突然象死去了一般，“可是人家糟蹋过我。”

“谁？”

“好几个。”

她这时躺着动也不动，仿佛她的躯体已经死去，她的脸转向别处。

“你现在不会爱我了。”

“我爱你，”他说。

但是他有了变化，她感觉得到。

“不，”她说，声音变得呆板而没生气。“你不会爱我了。不过你也许会带我去养育院的。我去养育院，永远不可能做你的女人，什么也不是了。”

“我爱你，玛丽亚。”

“不。不是真的，”她说。接着，作为最后的努力，她可怜巴巴但仍怀着希望地说：

“可是我从没吻过任何人。”

“那么现在吻我吧。”

“我要吻，”她说。“可我不会。当初他们糟蹋我的时候，我拼命挣扎，直到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挣扎到——到——直到有个人坐在我头上——我就咬他——后来他们蒙住我的嘴，把我两手反捆在脑后——别人就糟蹋我。”

“我爱你，玛丽亚，”他说。“谁也没能把你怎么样。他们碰不了你。谁也没碰过你，小兔子。”

“你相信是那样吗？”

“我知道。”

“那么你会爱我吗？”这时又热烈地紧挨着他了。

“我会更爱你。”

“我要好好吻你。”

“吻我一下吧。”

“我不会。”

“吻我就是了。”

她吻他的脸颊。

“不。”

“鼻子怎么办？我老是不知道鼻子往哪里搁。”

“瞧，把头偏一点，”他俩的嘴就紧贴在一起了。她紧挨在他身上，她的嘴慢慢地张开了一点，他拥抱着她，突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喜悦，轻柔、亲切、欢欣、内心的喜悦，无忧无虑，不再疲倦，不再担心，只感到无比的喜悦，于是他说，“我的小兔子。我的好宝贝。我的小亲亲。我的长身玉立的美人儿。”

“你说什么？”她说，那声音好象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可爱的人儿，”他说。

他俩躺在那儿，他感到她的心顶着自己的心在跳动，他用他的脚轻轻地擦着她的脚。

“你光着脚来的，”他说。

“是的。”

“那你是存心来睡觉的啦。”

“对。”

“那你当时不害怕。”

“怕。很怕。不过更怕穿了鞋再脱。”

“现在什么时候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你没表？”

“有。在你身背后。”

“把它拿过来吧。”

“不。”

“那么隔着我的肩膀看吧。”

在黑暗的睡袋中，表面显得很亮。已经一点了。

“你的下巴扎得我的肩膀好痛。”

“对不起。我没刮脸的家伙。”

“我喜欢。你的胡子是金黄色的？”

“是的。”

“会长得很长吗？”

“炸桥之前不会很长。听着，玛丽亚。你——？”

“我怎么？”

“你想吗？”

“想。怎么都行。随你。要是我们一起把什么都干了，也许那件事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这样想过吗？”

“不。我有过这样的念头，讲出来的却是比拉尔。”

“她非常聪明。”

“还有一件事，”玛丽亚温柔地说。“她要我告诉你，说我没有病。这种事她懂，她要我告诉你。”

“是她要你告诉我的？”

“是呀。我对她谈了，告诉她说我爱你。今天一见到你，我

就爱你了。仿佛我早就爱着你了，可是从没见到过你。我就告诉了比拉尔，她叫我要把所有的事全告诉你，还告诉你我没病。那件事是她很久以前对我说的。在炸火车之后不久。”

“她说了什么？”

“她说：一个人只要不愿意，人家就不能拿她怎么样，还说要是我爱上了一个人，就能把过去的全部抹掉。那时我想死，你知道。”

“她讲的话很对。”

“我现在真高兴，那时没有死掉。我真高兴，那时没死。那么你爱我吗？”

“爱。我现在就爱你。”

“我可以做你的女人吗？”

“干我这一行的，不能有女人。不过，你现在就是我的女人。”

“我一做了你的女人，就永远是你的了。我现在是你的女人吗？”

“是的，玛丽亚。是的，小兔子。”

她紧紧地抱着他，嘴唇寻找着他的嘴唇，接着找到了，就紧吻着，他呢，觉得她娇嫩、润滑、年青、可爱，而又带着热烈得发烫的凉爽，躺在那象他的衣服、鞋子或他的任务一样熟悉的睡袋里，简直难以相信。她惊慌地说，“我们要做的事现在快做吧，把那回事全抹去吧。”

“你要？”

“要，”她简直狂热地说。“要。要。要。”

第八章

夜里天气很冷，罗伯特·乔丹睡得香极了。他醒过一次，在伸展身体的时候，发现那姑娘还在，蜷缩在睡袋下方，轻轻地、均匀地呼吸着。夜空繁星点点，空气凛冽，鼻孔吸进的空气很凉，他在黑暗里把头从寒气中缩到温暖的睡袋里，吻吻她那光滑的肩膀。她没醒，他就侧过身背着她，把脑袋又伸到睡袋外面的寒气中，他醒着躺了一会儿，感到一股悠然的快意沁透了困倦的身子，跟着是两人光滑的身体接触时的喜悦，随后，他把两腿一直伸到睡袋底端，立即进入了睡乡。

天蒙蒙亮他就醒了，姑娘已经离去。他一醒就发现身边是空的，就伸出手去摸摸，觉得她睡过的地方还是温暖的。他望望山洞口，看到挂毯四边结了一层霜花，岩石缝里冒出灰色的淡烟，说明已经生起了炉灶。

有人从树林里出来，披着一条毯子象拉丁美洲的披风似的。罗伯特·乔丹一看原来是巴勃罗，他正在抽烟。他想，巴勃罗已去下面把马儿关进了马栏。

巴勃罗没有朝罗伯特·乔丹这面张望，他撩开毯子，径直进了山洞。

罗伯特·乔丹用手摸摸睡袋外面的薄霜，这只绿色旧鸭绒睡袋的面子是用气球的绸布做的，已经用了五年，全是斑斑点点。接着，他把手缩回睡袋，自言自语说，好啊，就伸开两腿，身子挨着睡袋的法兰绒衬里，感到熟悉舒适，然后并起腿儿，侧过身子，把头避开他知道太阳等会将要升起的方向。管它，我不如

再睡一会儿吧。

他一直睡到飞机的引擎声把他闹醒。

他仰天躺着，看到了飞机，那是三架菲亚特飞机^①组成的法西斯巡逻小队，三个闪亮的小点，急速越过山巅上空，向安塞尔莫和他昨天走来的方向飞去。三架过去后又来了九架，飞得高得多，一丁点大，成三角形的三三编队。

巴勃罗和吉普赛人站在山洞口的背阴处仰望着天空；罗伯特·乔丹静静地躺着，天空中这时响彻着引擎的轰鸣声，接着传来了新的隆隆吼声，又飞来了三架，在林中空地的上空不到一千英尺。这是三架海因克尔 111 型双引擎轰炸机^②。

罗伯特·乔丹的头在岩石的暗处，他知道从飞机上望不到自己，即使望到也没关系。他知道，如果飞机在这一带山区搜索什么，有可能看到马栏里的马。即使他们不在搜索，也会看到马匹，不过他们会很自然地以为是自己骑兵队的坐骑。这时又传来了新的更响的轰鸣声，只见又有三架海因克尔 111 型轰炸机排成了整齐的队形，笔直、顽强、更低地飞过来，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震耳欲聋，等到越过林地后，声音逐渐消失。

罗伯特·乔丹解开那卷当枕头用的衣服，穿上衬衣。他把衣服套在头上往下拉的时候，听到下一批飞机来了，他在睡袋里穿上裤子，静静地躺着，等那三架海因克尔双引擎轰炸机飞过去。飞机越过山脊前，他已佩好手枪，卷起睡袋，放在岩石旁，自己靠山崖坐下，结扎绳底鞋的带子。这时，渐近的轰鸣声比刚才更厉害了，又飞来了九架排成梯形的海因克尔轻型轰炸机，飞机飞过头顶时，声音震天动地。

① 菲亚特(Fiat)巡逻机为意大利产。

② 海因克尔(Heinkel) 111 型轰炸机为德国产。

罗伯特·乔丹沿着山崖悄悄走到洞口，站在那里观望的有两兄弟中的一个、巴勃罗、吉普赛人、安塞尔莫、奥古斯丁和那个妇人。

“以前来过这样多的飞机吗？”他问。

“从来没有过，”巴勃罗说。“进来吧。他们会发现你的。”

阳光刚照到溪边的草地上，还没有射到山洞口，罗伯特·乔丹知道，在晨曦朦胧的树荫和山岩的浓浓的阴影中是不会被发现的，不过为了让他们安心，他还是进了山洞。

“真不少，”那妇人说。

“还会有更多的，”罗伯特·乔丹说。

“你怎么知道？”巴勃罗疑神疑鬼地问。

“刚才这些飞机要有驱逐机伴随。”

说着，他们就听到了飞得更高的飞机的呜咽般的嗡嗡声，它们在五千英尺左右的高空中飞过，罗伯特·乔丹点了数，共有十五架菲亚特飞机，每三架排成一个V字形，一队队地构成梯阵，象一群大雁。

大家在山洞口，脸上都显得十分严肃，罗伯特·乔丹说，“你们没见过这么多的飞机吗？”

“从来没有，”巴勃罗说。

“塞哥维亚也没有这么多吗？”

“从来没有过，我们通常只见到三架。有时是六架驱逐机。有时说不定是三架容克式飞机^①，那种三引擎的大飞机，和驱逐机在一起。我们从来也没见过现在这样多的飞机。”

糟了，罗伯特·乔丹想，真糟了。飞机集中到这里来，说明

① 容克式(Junker)三引擎巨型机为德国产。

情况很糟糕。我得注意听它们扔炸弹的声音。可是不，他们现在还不可能把部队调上来准备进攻。当然啦，今晚或者明晚之前是不可能的，眼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这时候是绝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他还能听到渐渐消失的嗡嗡声。他看看表。这时该飞到火线上空了，至少第一批该到达了。他按下表上的定时卡子，看着秒针嗒嗒嗒地走动。不，也许还没有飞到。现在才到。对。现在飞过好远了。那些 111 型飞机的速度每小时达两百五十英里。五分钟就能飞到火线上空。它们现在早越过山口，飞到卡斯蒂尔地区的上空了，在早晨这个时光，下面是一片黄褐色的田野，中间交错着一条条白色的道路，点缀着小村庄，海因克尔飞机的阴影掠过田地，就象鲨鱼的阴影在海底的沙上移动。

没有砰砰砰的炸弹爆炸声。他表上的秒针继续嗒嗒嗒地响着。

他想，这些飞机正继续飞往科尔梅那尔，埃斯科里亚尔，或曼萨纳雷斯^①的飞机场，那里的湖边有一座古老的城堡，芦苇荡里躲着野鸭，假飞机场在真正的飞机场另一面，上面停放着假飞机，没什么掩饰，飞机的螺旋桨在风中转动着。他们准是在朝那边飞去。他对自己说，他们不会知道这次进攻计划，可是心头又出现另一个想法：为什么不会呢？以前每次进攻他们不是事先都知道的吗？

“你说他们看到了马吗？”巴勃罗问。

“人家不是来找马的，”罗伯特·乔丹说。

“不过，他们看到没有？”

“没有，除非他们是奉命来找马的。”

^① 这些地方都在马德里西北，政府军在瓜达拉马山脉下的防线的后方。

“他们能看到吗？”

“可能不会吧，”罗伯特·乔丹说。“除非那时太阳光正照在树上。”

“树上很早就有太阳光，”巴勃罗伤心地说。

“我看，人家还有别的事要考虑，不光是为了你的马吧，”罗伯特·乔丹说。

他按下秒针卡子后已经过了八分钟，但仍然没有轰炸的声音。

“你用表干吗？”那妇人问。

“我要推算飞机飞到哪儿去了。”

“哦，”她说。等到过了十分钟，他不再看表了，因为他知道，飞机这时已经太远，即使假定声波传来得花一分钟也不会听到了。他对安塞尔莫说，“我想跟你谈谈。”

安塞尔莫从洞口出来，两人走出不远，在一棵松树边停了步。

“情况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他。

“很好。”

“你吃了吗？”

“没有。谁也没吃过。”

“那么去吃吧。再带些中午吃的干粮。我要你去守望公路。路上来往的车辆人马都要记下来。”

“我不会写字。”

“不需要写，”罗伯特·乔丹从笔记本上撕下两张纸，用刀把自己的铅笔截下一段。“把这个带着，用这个记号代表坦克，”他画了一辆倾斜的坦克。“每见一辆坦克就划一道，划了四道之后，看见第五辆就在四条线上横划一道。”

“我们也是这样记数的。”

“好。卡车用另一个记号，两个轮子和一个方块。空车，画个圆圈。装满部队的，画条直线。炮也要记。大的这样。小的这样。汽车这样记。救护车这样记。两个轮子和一个方块，上面画一个十字。成队的步兵按连记算，做这样的记号，懂吗？一个小方块，然后在旁边画一条线。骑兵的记号是这样的，懂吗？象匹马。一个方块加四条腿。这记号代表二十个骑兵一队。你懂吗？每一队画一道线。”

“懂了。这办法真妙。”

“还有，”他画了两个大轮子，周围画上几个圈，再画了一条短线，算是炮筒。“这是反坦克炮。有胶皮轮子的。记下来。这是高射炮，”他画了向上翘的炮筒和两个轮子。“也记下来。你懂了吗？你见过这种炮吗？”

“见过，”安塞尔莫说。“当然啦。很清楚。”

“带吉普赛人一起去，让他知道你守望的地点，以便派人跟你换班。挑一个安全而不太近公路的地点，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个清楚。要待到换你下来的时候。”

“我懂了。”

“好。还有，回来后要让我知道公路上的一切调动情况。一张纸上记去的动静，一张纸上记来的动静。”

他们向山洞走去。

“叫拉斐尔到我这里来，”罗伯特·乔丹说，在树边站住了等着。他望着安塞尔莫进入山洞，门毯在他身后落下。吉普赛人一摇一摆地走出来，用手擦着嘴巴。

“你好，”吉普赛人说。“昨晚玩得好吗？”

“我睡得好。”

“不坏，”吉普赛人笑嘻嘻地说。“有烟吗？”

“听着，”罗伯特·乔丹一面说，一面在衣袋里掏烟卷。“我要你跟安塞尔莫到一个地方去，他去观察公路。你就在那里和他分手，记住那地点，以便过后可以领我或别的换班的人到那儿去。然后你再到一个可以观察锯木厂的地方，注意那边的哨所有没有变化。”

“什么变化？”

“那里现在有多少人？”

“八个。这是我最后了解的情况。”

“去看看现在有多少。看看那边桥头的哨兵间隔多久换一次岗。”

“间隔？”

“哨兵值一班要几小时，什么时候换岗。”

“我没有表。”

“把我的拿去。”他解下手表。

“多好的表啊，”拉斐尔羡慕地说。“你看它多复杂。这样的表准会读会写。看上面的字码密密麻麻的。这样一块表把别的表全比下去啦。”

“别瞎摆弄，”罗伯特·乔丹说。“你会看表吗？”

“干吗不会？中午十二点。肚子饿。半夜十二点。睡觉。早上六点，肚子饿。晚上六点，喝得醉醺醺。运气好的话。夜里十点——”

“闭嘴，”罗伯特·乔丹说。“你用不着这样油腔滑调。我要你监视大桥边的哨兵和公路下段的哨所，就象监视锯木厂边的哨所和小桥边的哨兵一样。”

“活儿可不少啊，”吉普赛人笑嘻嘻地说。“你一定要我去，

不能派别人吗？”

“不能，拉斐尔。这个工作很重要。你必须小心谨慎，注意不要暴露。”

“我相信不会暴露的，”吉普赛人说。“你干吗叫我不暴露？你以为我乐意给人打死吗？”

“认真一点，”罗伯特·乔丹说。“这不是闹着玩的。”

“你昨晚干了好事，现在却叫我认真一点？你原该杀一个人，可你干出了什么事来着？你原该杀一个人，可不是造一个人哪！我们刚看到满天飞机，多得可以前把我们祖宗三代，后把我们没出娘胎的孙子，加上猫儿、山羊、臭虫统统杀死。飞机飞过遮黑了天，声音象狮子吼，响得能叫你老娘奶子里的奶汁都结成硬块，你却叫我认真一点。我已经太认真啦。”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着笑了，把手放在吉普赛人的肩上。“那么就别太认真吧。现在吃完早饭就走。”

“那你呢？”吉普赛人问。“你干什么事？”

“我去看‘聋子’。”

“来了这些飞机，你在整个山区很可能一个人也见不到了，”吉普赛人说。“今早飞机飞过时，一定有很多人在冒大汗哪。”

“那些飞机可不是专来搜索游击队的。”

“对，”吉普赛人说，然后摇摇头。“不过，等人家打算这么干的时候就糟啦。”

“没的事，”罗伯特·乔丹说。“那是德国最好的轻型轰炸机。人家不会派这些飞机来对付吉普赛人的。”

“这些飞机把我吓怕了，”拉斐尔说。“可不，我就怕这些东西。”

“它们是去轰炸机场的，”他们走进山洞时，罗伯特·乔丹

对他说。“我可以肯定是去轰炸飞机场的。”

“你说什么？”巴勃罗的老婆问。她替他倒了一大杯咖啡，还递给他一罐炼乳。

“还有牛奶？真豪华啊！”

“什么都不缺，”她说。“来了飞机，大家很怕。你刚才说它们飞到哪儿去？”

罗伯特·乔丹从罐头顶上凿开的一道缝里倒了些稠厚的炼乳在咖啡里，在杯口刮干净罐头边的炼乳，把咖啡搅成了淡褐色。

“我看他们是去轰炸飞机场的。也许去埃斯科里亚尔和科尔梅那尔。也许这三个地方都去。”

“那样要飞很远路，不应该到这里来，”巴勃罗说。

“那么他们干吗现在到这里来呢？”那妇人问。“现在来干什么？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飞机。也没见过这么多。上面准备发动进攻吗？”

“昨晚公路上有什么动静？”罗伯特·乔丹问。那姑娘玛丽亚就挨在他身边，但他没对她看。

“你，”妇人说。“费尔南多。你昨晚在拉格兰哈。那边有啥动静？”

“没动静，”回答的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矮个子，表情坦率，一只眼睛有点斜视，罗伯特·乔丹以前没见过他。“还是老样子，有几辆卡车。几辆汽车。我在那里的时候，没有部队调动。”

“你每天晚上都到拉格兰哈去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我，或者另一个人，”费尔南多说。“总有一个人去。”

“他们去探听消息。去买烟草。买些零星东西，”妇人说。

“那儿有我们的人吗？”

“有。怎么会没有？在发电厂干活的工人。另外还有一些

人。”

“有什么新闻？”

“没有。什么新闻也没有。北方的情况仍旧很糟。这不算新闻了。北方哪，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就糟^①。”

“你听到塞哥维亚有什么消息？”

“没有，伙计。我没问。”

“你去塞哥维亚吗？”

“有时去，”费尔南多说。“不过有危险。那里有检查站，要查身份证。”

“你了解飞机场的情况吗？”

“不，伙计。我知道机场在哪儿，不过从没走近过。那里身份证查得很严。”

“昨晚没人谈起飞机吗？”

“在拉格兰哈吗？没有。但是他们今晚当然要谈论了。他们谈过基卜·德利亚诺^②的广播。没别的了。唔，还有。看样子共和国在准备发动一次进攻。”

“看样子怎么？”

“共和国在准备发动一次进攻。”

“在哪里？”

“不明确。说不定在这里。说不定在瓜达拉马山区的另外

① 内战一爆发，西北部即陷入叛军之手，北部沿比斯开湾一狭长地带仍忠于共和国，东起法西边界上的伊伦，西止阿斯图里亚斯区的吉洪港。一九三七年四月，叛军主将莫拉将军再次发动进攻，从六月十九日攻陷防守坚固的毕尔巴鄂港起一直到十月二十一日进入吉洪港为止，全部占领了共和国这一地带。

② 基卜·德利亚诺(Queipo de Llano, 1875—1951): 西班牙将军，在内战期间为佛朗哥的叛军主持广播宣传工作。

一个地方。你听到过没有？”

“在拉格兰哈是这么传说的吗？”

“是呀，伙计。我把这个消息忘了。不过关于进攻的传说一直很多。”

“这话从哪儿传来的？”

“哪儿？噢，从各种各样的人的嘴里。塞哥维亚和阿维拉的咖啡馆里军官都在讲，侍者听到啦。谣言就传开来。一些时候以来，他们在说共和国在这些地区要发动一次进攻。”

“是共和国，还是法西斯分子发动？”

“是共和国。要是法西斯分子发动进攻，大家都会知道的。可不，这次进攻规模不小。有人说分两处进行。一处是这里，另一处在埃斯科里亚尔附近的狮子山那边。你听说过这消息吗？”

“你还听到什么？”

“没有了。唔，还有。有些人说，要是发动进攻，共和国打算炸桥。不过每座桥都有人防守。”

“你在开玩笑吧？”罗伯特·乔丹说，啜饮着咖啡。

“不，伙计，”费尔南多说。

“他这人不开玩笑，”那妇人说。“倒霉的是他不开玩笑。”

“那好，”罗伯特·乔丹说。“谢谢你报告了这些情况。没听到别的了吗？”

“没有啦。大家象往常一样讲到要派军队到山里来扫荡。还有的说，军队已经出动了。他们已经从瓦利阿多里德开拔了。不过总是那么说。不值得理会。”

“可你，”巴勃罗的老婆简直恶狠狠地对巴勃罗说，“还说什么安全。”

巴勃罗沉思地望着她，搔搔下巴。“你呀，”他说。“你的桥。”

“什么桥？”费尔南多兴高采烈地问。

“蠢货，”妇人对他说。“笨蛋。再喝杯咖啡，使劲想想还有什么新闻。”

“别生气，比拉尔，”费尔南多平静而高兴地说。“听到了谣言也不必大惊小怪。我记得的全告诉了你和这位同志啦。”

“你不记得还有什么别的了？”罗伯特·乔丹问。

“没有了，”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还算运气，我没忘记这些，因为都不过是谣言，我一点也没放在心上。”

“那么，还可能有别的谣言吧？”

“是。可能有。不过我没留心。一年来，我听到的尽是谣言。”

罗伯特·乔丹听到站在他背后的姑娘忍不住嗤的一声笑出来。

“再跟我们讲个谣言吧，小费尔南多，”她说，接着笑得两肩直颤。

“即使记起来也不说了，”费尔南多说。“听了谣言还当桩大事的人太差劲了。”

“不过我们了解了情况能救共和国，”那妇人说。

“不。你炸了桥才能救共和国，”巴勃罗对她说。

“走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和拉斐尔说。“如果你们已经吃过饭的话。”

“我们这就走，”老头儿说着，他们俩就站起身来。罗伯特·乔丹觉得有人把手按在他肩膀上。那是玛丽亚。“你该吃饭了，”她说，手仍搁在肩上。“好好吃，让你的肚子顶得住更多的谣言。”

“谣言把我肚子填饱了。”

“不。不该这样。在听到更多的谣言之前，先把这些吃下

去。”她把碗放在他面前。

“别取笑我，”费尔南多对她说。“我是你的好朋友，玛丽亚。”

“我不是取笑你，费尔南多。我只是在跟他开玩笑，他不吃要肚子饿的。”

“我们大家都该吃了，”费尔南多说。“比拉尔，怎么啦，没给我们端来吃的？”

“没什么，伙计，”巴勃罗的老婆说着，在他碗里盛满了炖肉。
“吃吧。是啊，那是你办得到的。现在吃吧。”

“好极了，比拉尔，”费尔南多依旧一本正经地说。

“谢谢你，”妇人说。“谢谢你，多谢了。”

“你生我的气吗？”费尔南多问。

“没有。吃。赶紧吃吧。”

“我吃，”费尔南多说。“谢谢你。”

罗伯特·乔丹望着玛丽亚，她的双肩又开始颤动了，她就把眼睛望着别处。费尔南多吃得兴致勃勃，脸上一副骄傲而正经的样子，即使他用着一把特大汤匙，嘴角边滴着一点儿炖肉汁，也没影响他的正经模样。

“你爱吃这东西吗？”巴勃罗的老婆问他。

“是啊，比拉尔，”他说，嘴里塞得满满的。“还是老样子。”

罗伯特·乔丹感觉到玛丽亚伸手搁在他手臂上，感觉到她乐得用手指紧捏着他。

“就为了老样子，你才爱吃吗？”妇人问费尔南多。

“是啊，”她说。“我明白了。炖肉；老样子。北方情况很糟；老样子。这里准备发动进攻；老样子。部队来搜索我们；老样子。你这个人可以当做老样子立牌坊了。”

“可是后两件事只是谣言，比拉尔。”

“西班牙啊，”巴勃罗的老婆尖刻地说。然后转向罗伯特·乔丹。“别的国家里有象这样的人吗？”

“没有别的国家象西班牙一样，”罗伯特·乔丹有礼貌地说。

“你说得对，”费尔南多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西班牙。”

“你到过别的国家吗？”妇人问他。

“没有，”费尔南多说。“我也不想去。”

“你明白了吧？”巴勃罗的老婆对罗伯特·乔丹说。

“小费尔南多，”玛丽亚对他说，“给我们讲讲你在瓦伦西亚的情况吧。”

“我不喜欢瓦伦西亚。”

“为什么？”玛丽亚问，又捏捏罗伯特·乔丹的手臂。“你干吗不爱瓦伦西亚？”

“那里的人没有礼貌，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老是冲着彼此大声嚷嚷：喂，喂！”

“他们懂你的话吗？”

“他们假装不懂，”费尔南多说。

“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连海都没看就走了，”费尔南多说。“我不喜欢那里的人。”

“呸，滚到别地方去，你这个老姑娘，”巴勃罗的老婆说。“滚到别地方去，别叫我恶心啦。我这辈子最好的日子是在瓦伦西亚过的。可不是吗！瓦伦西亚。别跟我讲瓦伦西亚。”

“你在那里做什么？”玛丽亚问。

巴勃罗的老婆端了碗咖啡、一块面包和一碗炖肉，在桌边坐下。

“什么？不是我，而是我们在那里做什么。菲尼托订了个合同，在那边过节的期间斗三场牛，我就去那里。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我从没见过那么挤的咖啡馆。等几个小时也没有座位，电车也没法上得去。瓦伦西亚一天到晚热热闹闹。”

“那么你做些什么呢？”玛丽亚问。

“哪样没玩过？”妇人说。“我们去海滩，躺在海水里，张着帆的船用牛从海里拉上来。牛被赶到海里，它们只得游水；然后把牛拴在船头上，它们站住了脚，就摇摇晃晃地在沙滩上走上来。早晨一阵阵细浪拍打着海滩，十对同轭的牛拖一条张了帆的船。那就是瓦伦西亚。”

“你除了看牛，还玩些什么？”

“我们在沙滩上的凉亭里吃东西。有鱼肉馅儿饼，有红椒、青椒，还有米粒那么大的小榛子。饼子又香又薄，鱼肉鲜极了。海里捞上来的新鲜明虾浇上酸橙汁。虾肉是粉红色的，味儿真美，一只要咬四口才吃光。这玩意儿我们吃得不少。我们还吃什锦饭，配鲜海味，带壳蛤蜊、淡菜、小龙虾和小鳗鱼。我们还吃到小不点儿的清炸鳗鱼，小得象豆芽，弯弯曲曲盘成一团，嫩得不用嚼，到嘴里就化掉。老是喝一种白酒，冰凉，爽口，真棒，三毛钱一瓶。最后吃甜瓜。那里盛产甜瓜。”

“卡斯蒂尔的甜瓜更好，”费尔南多说。

“什么话！”巴勃罗的老婆说。“卡斯蒂尔的甜瓜细得象鸡巴。瓦伦西亚的甜瓜才是可吃的。回想起来，那些瓜有人的胳膊那么长，绿得象海水，一刀切下去，绷脆绷脆的，汁水又多，比夏天的清早更甜美。唉，我想起了盆子里盘成一堆的小不点儿的鲜嫩的鳗鱼啦。还有，整个下午喝大杯的啤酒，冰凉的啤酒盛在水罐那么大的杯子里，杯子外面都凝着水珠。”

“那么你不吃不喝的时候，干什么呢？”

“我们在屋里睡觉，阳台上挂着细木条编的帘子，小风从弹簧门顶上的气窗里吹进来。我们在那里睡觉，放下了帘子，屋里白天也是暗的。街上飘来花市上的香味和爆竹的火药味。在过节期间，每天中午放爆竹，爆竹拴在沿街的绳子上，满城都有。爆竹用药线连起来，顺着电线杆、电车线一个挨一个地炸响，声音可大哪，劈劈啪啪，简直没法想象。

“我们睡觉，然后再要了一大罐啤酒，凉得玻璃外面都凝结着水珠，女侍者把啤酒端来时，我在门口接，我把冰凉的玻璃罐贴在菲尼托背上，他已经睡着了，啤酒拿来时也没醒。这时，他说了，‘别，比拉尔。别这样，太太，让我睡呀。’我说，‘好啦，醒醒吧，你喝这个，有多凉啊，’他眼睛也不睁开就喝了，喝了又睡；我在床脚搁了个枕头，斜靠着，看他睡。他皮肤赭红、头发乌黑，那么年青，睡得那么安静。我把一罐全喝了，听着过路乐队的演奏。你呀，”她对巴勃罗说。“这种日子你经历过吗？”

“我们一起也痛快过，”巴勃罗说。

“不错，”妇人说。“当然啦。你当年比菲尼托更富有男子气。不过我们从没去过瓦伦西亚。我们从没在瓦伦西亚一起躺在床上听乐队在街上经过。”

“那是不可能的事，”巴勃罗对她说。“我们没机会去瓦伦西亚啊。你讲道理的话就能理解这一点了。不过，你和菲尼托没炸过火车。”

“不错，”妇人说。“炸火车是该我们干的事。炸火车。不错。开口闭口老是火车，谁也没法说不是。结果呢，是懒，死样怪气，完蛋了事。结果变成了现在这样胆怯。以前也干过不少别的好事。我说话要公平。不过同样，谁也不能说瓦伦西亚的不是。

你听到我的话了？”

“我不喜欢瓦伦西亚，”费尔南多平静地说。“我不喜欢瓦伦西亚。”

“难怪人家说，驴子的倔脾气是改不过来的，”妇人说。“把桌子收拾干净，玛丽亚，我们准备上路。”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听到了第一批飞机返回的声音。

第九章

他们站在山洞口望着飞机。轰炸机这时飞得很高，象一支支迅疾而丑陋的箭头，引擎声把天空震得象要迸裂似的。它们的外型真象鲨鱼，罗伯特·乔丹想，象墨西哥湾流里尖鼻宽鳍的鲨鱼。不过，这些飞机银翼宽阔，隆隆作响，飞转的螺旋桨在阳光中象一个个模糊的光环，它们的行动可不象鲨鱼。它们的行动和世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同。它们象机械化的死神在行动。

你应该写作，他对自己说。也许你有一天会再拿起笔来。他觉得玛丽亚紧握着他的胳膊。她正望着天空，他就对她说，“你看飞机象什么，漂亮的姑娘？”

“我不知道，”她说。“我看象死神吧。”

“我看飞机就是飞机，”巴勃罗的老婆说。“那些小飞机呢？”

“可能打别的地方飞过去了，”罗伯特·乔丹说。“轰炸机飞得太快，等不及那些小飞机，单独回来了。我们的飞机从不越过火线来追击它们。也没足够的飞机去冒这种险。”

正当这时，三架组成V字形的海因克尔战斗机在林中空地上空朝他们飞来，低得差点儿擦到树梢，就象嘎嘎作响的、机翼

朝下冲的、扁鼻子的丑陋的玩具飞机，突然可怕地变大到实际的尺寸，吼叫着一掠而过。飞机飞得那么低，以致大家从洞口看得见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驾驶员，以及巡逻机队队长脑后飘拂的围巾。

“那些飞机能见到马儿，”巴勃罗说。

“它们能见到你的烟头，”妇人说。“放下毯子吧。”

没有别的飞机再飞来。其余的飞机一定越过了远处那边的山脊，等隆隆声消失以后，他们走出山洞，来到空地上。

天空这时显得空旷、高爽、蔚蓝、明朗。

“这些飞机仿佛是一场梦，我们现在醒过来了，”玛丽亚对罗伯特·乔丹说。飞机声已经远得几乎听不到了，微弱的嗡嗡声象手指轻轻碰了你一下，放开后又碰一下，现在连最后的难以觉察的嗡嗡声都消失了。

“这不是梦，你进去收拾一下吧，”比拉尔对她说。“怎么办？”她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咱们骑马，还是走去？”

巴勃罗瞅她一眼，嘴里哼了一声。

“随你便，”罗伯特·乔丹说。

“那我们走去吧，”她说。“为了我的肝，我想走走。”

“骑马对肝有好处。”

“是啊，不过屁股可受不了。咱们走去，你——”她转身对巴勃罗，“到下面去点点你的牲口，看看有没跟飞机飞掉。”

“你要弄匹马骑骑吗？”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

“不要。多谢。那姑娘怎么办？”

“她走走也好，”比拉尔说。“不然她身上好多地方全僵了，要没用啦。”

罗伯特·乔丹觉得脸红了。

“你睡得好吗？”比拉尔问，接着说，“真的没病。本来可能有的。我不懂怎么会没有。说不定天主到底还是有的，虽然我们把他废了。你走你的，”她对巴勃罗说。“不关你的事，这是比你年青的人的事。人家不是你那种料。走吧。”接着又对罗伯特·乔丹说，“叫奥古斯丁看守你的东西。他一来我们就走。”

天色清澈明朗，阳光温暖。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脸色棕褐的大个子女人，她长着一双和善的分得很开的眼睛，一张大方脸上有了皱纹，难看却不讨厌，眼睛是欢乐的，但嘴唇不动的时候，脸色是悲伤的。他望着她，随后望着那体格魁梧而呆头呆脑的男人，这时他正穿过树林，朝着马栏走去。那妇人也在望着他的后影。

“你们睡过觉吗？”妇人问。

“她是怎么说的？”

“她不肯告诉我。”

“我也不肯。”

“这么说你们睡过了，”妇人说。“你对她可要尽量小心啊。”

“假如她怀了孩子怎么办？”

“不碍事，”妇人说。“不碍事。”

“在这里可不好办。”

“她不呆在这里。她跟你走。”

“那我上哪里去呢？我不能随身带个女人。”

“谁知道？你带着两个都行。”

“可不能那么说。”

“听着，”妇人说。“我不是胆小鬼，不过，清早的情况我看得很清楚。我知道，我们眼前的人中间有许多也许再也活不到下一个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天。”

“真格的，”罗伯特·乔丹说。“下个星期天还远着呢。我们活到星期三就不错了。不过，我不爱听你说这种话。”

“每个人都得找个人谈谈心里话，”妇人说。“以前我们有宗教和那一套劳什子。现在谁都得找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聊聊，因为不管怎么勇敢的人也觉得非常孤单。”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大家在一起。”

“看到那些飞机就叫人上心事。”妇人说。“我们根本对付不了这样的飞机。”

“可是我们能打垮他们。”

“听着，”妇人说。“我对你讲心里的疙瘩，可别以为我决心不够。什么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太阳一升起，悲哀就消啦。悲哀就象雾。”

“那当然，”妇人说。“假如你往好处想的话。看来是讲了关于瓦伦西亚的那套无聊话的缘故。是讲了那个去看马的窝囊废的缘故。我讲了过去的事使他伤心了。杀他，行。骂他，行。伤他的心，可不行。”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的？”

“别人是怎么会在一起的？革命刚开始时和开始以前，他算是一条汉子。是响当当的。现在他可完蛋了。塞子拔掉了，皮袋里的酒全流光了。”

“我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你，并且满有道理。昨晚我跟他睡觉。”她这时笑了笑，摇摇头。“咱们眼前不谈这个，”她说。“我对他说，‘巴勃罗，你干吗不杀了那个外国佬？’

“‘这小子不错，比拉尔，’他说。‘这小子不错。’

“我于是说，‘现在我作主，你明白了？’

“‘明白了，比拉尔。明白了，’他说。后半夜我听到他醒了，一个人在哭。他哭得气咻咻的，难听极了，就象身体里有只野兽在折腾。

“‘你怎么啦，巴勃罗？’我对他说，把他拉过来抱住。

“‘没什么，比拉尔。没什么。’

“‘不。你准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大家，’他说，‘大家抛弃我的情形真叫我伤心。’

“‘是呀，不过他们支持我，’我说，‘而我是你的女人。’

“‘比拉尔，’他说，‘想想火车吧。’他接着说，‘愿天主保佑你，比拉尔。’

“‘你提天主干吗？’我对他说。‘你怎么讲这种话？’

“‘就是，’他说。‘天主和圣母玛利亚。’

“‘什么话，天主和圣母玛利亚！’我对他说。‘能这样说话吗？’

“‘我怕死，比拉尔，’他说。‘我怕死。你明白吗？’

“‘那你给我从床上下去，’我对他说。‘一张床上挤不下我、你和你的害怕。’

“那时他害臊了，不作声了，我就睡着了。不过，小伙子，他这个人完蛋了。”

罗伯特·乔丹默不作声。

“我这辈子时不时也会有这种悲哀，”妇人说。“可是跟巴勃罗的不一样。我的悲哀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这我相信。”

“那也许是女人常有的心情，”她说。“也许根本算不了一回

事，”她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对共和国有很大的幻想。我坚决相信共和国，我有信心。我象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奇迹一样，狂热地相信共和国。”

“我相信你。”

“你也有这同样的信仰吗？”

“信仰共和国？”

“是呀。”

“当然，”他说，希望自己说的是真话。

“我很高兴，”妇人说。“那你不怕吗？”

“死倒不怕，”他说，这是真话。

“别的呢？”

“只怕完成不了我应该完成的任务。”

“不象上次那个人怕当俘虏吗？”

“不怕，”他老实说。“有了那种害怕心理，包袱太重，什么也干不成。”

“你是个很冷静的小伙子。”

“不，”他说，“我不这样看。”

“不。你的头脑很冷静。”

“我只是对工作考虑得很多罢了。”

“难道你不喜欢生活的乐趣？”

“喜欢。很喜欢。但是不能妨害我的工作。”

“你喜欢喝酒，我知道。我看到了。”

“不错。很喜欢。但是也不能妨害我的工作。”

“那么女人呢？”

“也很喜欢，但我不怎么把她们放在心上。”

“你不在乎？”

“在乎。不过人们常说女人能打动你的心，可我还没找到打动我的心的女人。”

“我看你是在撒谎。”

“可能有点儿。”

“可你喜欢玛丽亚。”

“对。突然之间非常喜欢。”

“我也是。我很喜欢这个丫头。不错。很喜欢。”

“我也是，”罗伯特·乔丹说，感到自己的声音又嘶哑了。“我也是。是呀。”说出来使他很愉快，他很正经地用西班牙语说，“我非常爱她。”

“我们见了‘聋子’后，我让你们俩单独在一起。”

罗伯特·乔丹不吭声，过了一会儿才说，“那没有必要。”

“不，小伙子。有必要。时间不多呀。”

“你在手上看出来？”他问。

“不。别再想手相那套胡扯啦。”

凡是对共和国不利的事情她都不爱提，这件事也撂在一边。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他望着玛丽亚在山洞里收拾碗碟。她擦擦手，转身对他笑笑。她听不清比拉尔在说些什么，但是她对罗伯特·乔丹笑的时候，褐色的脸涨得通红，她接着又对他笑笑。

“还有白天呢，”妇人说。“你们过了一晚，还有白天呢。现在自然没有我当初在瓦伦西亚时的那些玩意儿。可是你们可以采些野草莓或别的什么。”她笑了。

罗伯特·乔丹用手臂搂着她的宽肩膀。“我也喜欢你，”他说。“我很喜欢你。”

“你真是个地道的猎艳能手，”妇人说，被这种亲热的表示弄

得很窘。“你快把每个人都爱上了。奥古斯丁来了。”

罗伯特·乔丹走进山洞，走向玛丽亚站着的地方。她看他走来，眼睛明亮，脸蛋和脖子又涨红了。

“喂，小兔子，”他说着吻她的嘴。她紧紧拥抱他，凝视着他的脸说，“喂。噢，喂。喂。”

原先坐在桌边抽烟的费尔南多站起身，摇摇头，捡起靠在洞壁的卡宾枪就走出去了。

“真不象话，”他对比拉尔说。“我不喜欢这样。你该管管这丫头。”

“我在管，”比拉尔说。“那位同志是她的未婚夫。”

“噢，”费尔南多说。“既然这样，他们订了婚，那我就认为很象话啦。”

“我很高兴，”妇人说。

“我也很高兴，”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赞同。“再见，比拉尔。”

“你上哪儿去？”

“到上面岗哨去接普里米蒂伏的班。”

“你他妈的上哪儿去？”奥古斯丁这时走上前来，问这个一本正经的小个子。

“去值班，”费尔南多理直气壮地说。

“你去值班，”奥古斯丁嘲弄地说。“我操你奶奶的班。”接着转身对那女人，“要我看守的他妈的劳什子在哪里呀？”

“在山洞里，”比拉尔说。“装在两个背包里。你满嘴脏话叫我腻烦。”

“我操你的腻烦，”奥古斯丁说。

“那就去操你自己吧，”比拉尔不温不火地对他说。

“你妈的，”奥古斯丁回答。

“你从来没妈，”比拉尔对他说，双方的骂人话达到了西班牙语里的最高水平，其内容从不明说，只能意会。

“他们在里面搞什么名堂？”奥古斯丁这时问，好象在打听什么机密似的。

“不搞什么名堂，”比拉尔对他说。“没什么。我们毕竟是在春天里，你这个畜生。”

“畜生，”奥古斯丁说，玩味着这个词儿。“畜生。还有你呐。你这大婊子养的。我操它的春天。”

比拉尔给他肩上一巴掌。

“你呀，”她说，声如洪钟地大笑了。“你骂人翻不出花样。不过劲头倒挺足。你看到飞机没有？”

“我操它们引擎的祖宗，”奥古斯丁点点头，咬着下唇说。

“那才有点儿意思，”比拉尔说。“真有点儿意思。不过干起来实在不容易。”

“飞得那么高，确实够不着，”奥古斯丁露齿笑着说。“那还用说。不过说说笑话总比担惊受怕强吧。”

“是呀，”巴勃罗的老婆说。“总比担惊受怕强。你这人不错，说笑话很带劲。”

“听着，比拉尔，”奥古斯丁认真地说。“要出事了。是真的吧？”

“你看怎么样？”

“糟得不能再糟了。飞机可不少啊，太太。可不少啊。”

“原来你跟别人一样也给飞机吓着了？”

“哪里话！”奥古斯丁说。“你看他们打算干什么？”

“听好，”比拉尔说。“从这小伙子来炸桥看，显然共和国在准备发动一次进攻。从这些飞机来看，显然法西斯分子在准备迎

战。不过干吗把飞机亮出来呢？”

“这次战争中蠢事真不少，”奥古斯丁说。“这次战争疯癫得没底。”

“这很明白，”比拉尔说。“不然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啦。”

“是呀，”奥古斯丁说。“我们疯疯癫癫地混了一年啦。不过，巴勃罗这人挺有判断力。巴勃罗足智多谋。”

“你说这话干吗？”

“我要说。”

“你可要明白，”比拉尔解释说。“现在要靠智谋来挽救局势已经太晚了，而且他已经失去了判断力。”

“我明白，”奥古斯丁说。“我知道我们得撤走。既然我们必须打胜才能活下去，就必须把桥都炸掉。不过，尽管巴勃罗现在成了胆小鬼，他还是很机灵的。”

“我也很机灵啊。”

“不，比拉尔，”奥古斯丁说。“你不机灵。你勇敢。你忠诚。你果断。你有直觉。很果断，很热情。可是你不机灵。”

“你以为这样？”妇人若有所思地问。

“正是，比拉尔。”

“那小伙子很机灵，”妇人说。“又机灵又冷静。头脑非常冷静。”

“不错，”奥古斯丁说。“他一定很在行，不然人家不会要他来干这一个了。可是我没看出他机灵。巴勃罗呢，我知道他是机灵的。”

“可是他吓破了胆，成了废物，撒手不干了。”

“可还是机灵。”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要好好想想。当前我们做事要动动脑子，炸桥之后，我们得马上撤走。一切都得有个准备。我们要考虑好到哪里去、怎么走。”

“那当然啦。”

“这就用得上巴勃罗。这件事必须干得机灵。”

“我信不过巴勃罗。”

“在这件事上，要信任他。”

“不。你不了解他垮到了什么地步。”

“但他很机灵。这件事我们如果干得不机灵，我们就他妈完蛋啦。”

“我得想想，”比拉尔说。“我还有一天时间可以考虑。”

“炸桥是那小伙子的事，”奥古斯丁说。“这方面他准有一手。另一个安排炸火车的，干得多么出色啊。”

“不错，”比拉尔说。“事实上全是他安排的。”

“你拿出魄力和决断来，”奥古斯丁说。“可是让巴勃罗负责行动，让巴勃罗负责撤退。现在逼他研究方案吧。”

“你是个聪明人。”

“聪明，不错，”奥古斯丁说。“可是不精明。这方面，巴勃罗行。”

“吓破了胆也行？”

“吓破了胆也行。”

“你看炸桥这事怎么样？”

“非干不可。这我知道。有两件事我们非干不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必须打胜仗。要打胜仗就得炸掉桥。”

“巴勃罗如果机灵，为什么看不到这点？”

“因为他自己软弱无能，所以想保持现状。他宁愿保持软弱

无能，好象待在一个旋涡里。不过河水在涨。形势逼他改变的话，他会变得机灵的。他非常机灵。”

“幸好那小伙子没把他杀了。”

“真格的。昨晚吉普赛人要我杀掉他。吉普赛人是个畜生。”

“你也是畜生，”她说。“不过是聪明的畜生。”

“你我都聪明，”奥古斯丁说。“不过有能耐的还是巴勃罗！”

“可是叫人受不了。你不知道他垮到了什么地步。”

“知道。可是有能耐呀。听着，比拉尔。发动战争只要靠聪明就成。不过要打胜仗却需要能耐和物资。”

“我好好考虑考虑，”她说。“我们现在得动身了。我们已经迟了。”接着提高了嗓门：“英国人！”她喊着。“英国人！来呀，咱们走吧。”

第 十 章

“咱们歇歇，”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在这里坐下，玛丽亚，咱们歇一会儿。”

“我们该继续赶路，”罗伯特·乔丹说。“咱们到了那里再休息。我必须见到这个人。”

“你能见到的，”那妇人对他说。“不用着急。在这里坐下，玛丽亚。”

“走吧，”罗伯特·乔丹说。“到山顶上再休息。”

“我现在休息，”妇人说，在小溪边坐下了。姑娘挨着她坐在石南丛中，阳光照耀着她的头发。只有罗伯特·乔丹还站着，在这高山上的草地上纵目远眺，草地上有道小溪，流贯其间，溪

水里有鳟鱼。他站着的地方长着石南。比较低的草地上长着黄色的羊齿植物，而不是石南；一块块灰色的大圆石兀立在羊齿丛中间，山坡下面是一排黑魆魆的松树。

“到‘聋子’那儿有多远？”他问。

“不远，”妇人说，“穿过这一片空地，走下前面那个山谷，到这小溪源头那片树林高处就是。你坐下吧，别那么心事重重的。”

“我要见他，把事情安排好。”

“我要洗脚，”妇人说着脱掉绳底鞋，拉下一只长统厚羊毛袜，就把右脚伸进溪水。“天哪，真冷。”

“咱们骑马就好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走走对我有好处，”妇人说。“这是我一直想望的。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不过，我得赶紧。”

“别着急。有的是时间。今天天气真好，离开了松林心里真痛快。一个人会觉得松树讨厌，你哪里想得到。你不讨厌松树，漂亮的姑娘？”

“我喜欢松树，”姑娘说。

“松树有什么可喜欢的？”

“我喜欢松树的香味和脚踩在松针上的感觉。我喜欢大树梢间的风声和树枝碰擦的响声。”

“你什么都喜欢，”比拉尔说。“如果你饭菜烧得稍微好一点，哪个男人娶了你都是好福气。可是松树林子叫人腻烦得要死。你从没见过山毛榉、橡树或栗树的林子。那才叫树林。在那种林子里每棵树都不同，有特色，有美。松林叫人讨厌。你说呐，英国人？”

“我也喜欢松林。”

“瞧你的，”比拉尔说。“你们俩一唱一和。其实我也喜欢松林，不过我们在松林里待得太久了。我还讨厌这些山。山里只有两个方向。下山，上山，而且下山只有一条路，通到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城镇。”

“你到过塞哥维亚吗？”

“什么话！带了这张脸去？这张脸出了名。你愿意长得丑吗，漂亮的姑娘？”她对玛丽亚说。

“你不丑。”

“得啦，我不丑！我生来就丑。我一辈子都丑。你这个英国人一点也不懂女人。你知道丑女人的心情吗？你知道一辈子都丑的人心里却以为长得很美是怎么回事吗？是很古怪的，”她把另一只脚也伸进溪水，随即又缩回去。“天哪，真冷。瞧那只鹌鹑，”她说，指指一只在溪水上游一块石头上蹦蹦跳跳的圆滚滚的灰色鸟。“这种鸟一点用处也没有。叫得不好听，肉又不能吃。只会尾巴翘上翘下。给我一支烟，英国人，”她说接着接过烟来，并从衬衣袋里掏出火刀火石，点着了烟。她抽着烟，望望玛丽亚和罗伯特·乔丹。

“生活真古怪，”她说从鼻孔里喷出烟来。“我换成男人准是条好汉，可惜我是个十足的女人，长得丑死了。可是不少男人爱过我，我也爱过不少男人。真古怪。听着，英国人，这是怪有趣的。你看我呀，尽管我长得丑。仔细看看，英国人。”

“你不丑。”

“怎么不丑？别跟我撒谎。难道说，”她深沉地大笑起来，“你也开始动心了？不。那是说笑话。不。看看这副丑相。可是，你心里有一种感情，使男人爱上你的时候不辨美丑了。有了这种感情，你就使他迷糊，使你自己迷糊了。然后有一天，不知什么道

理，他看出了你本来的丑相，不再迷糊啦，于是你象他一样，也看出了你自己的丑相，你就失去了你的男人和你自己的感情。你懂吗，漂亮的姑娘？”她拍拍姑娘的肩膀。

“不懂，”玛丽亚说。“因为你并不丑。”

“用你的脑袋，可别用你的心，并且好好听着，”比拉尔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些事是很有趣的。你觉得有趣吗，英国人？”

“有趣。可是我们得走啦。”

“走，那是什么话。我在这里很舒服。”她这时接下去对罗伯特·乔丹说，仿佛在教室里讲课。“要不了多久，等你变得跟我一样丑，变得要多丑有多丑的时候，依我看呀，要不了多久，这种感情，这种自以为漂亮的白痴般的感情又会在心里慢慢滋长。象棵大白菜般长起来了。那时候，等到这种感情长起来了，另一个男人看中了你，认为你长得很漂亮，于是一切就重新开始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已经过时了，不过，说不定以后还会动痴情。你很交运，漂亮的姑娘，你长得不丑。”

“我可丑呢，”玛丽亚坚持说。

“问他吧，”比拉尔说。“别把脚伸到溪水里去，会冻僵的。”

“罗伯托说我们该走，我看我们还是走吧，”玛丽亚说。

“听你说的，”比拉尔说。“这件事对我跟对你的罗伯托关系一般重大，可我说咱们在这儿溪边歇息歇息挺舒服，时间有的是。还有，我喜欢聊聊。这是我们仅有的一点文明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消遣呢？我说的，你不感兴趣吗，英国人？”

“你说得很好。可是除了议论美不美之外，还有别的事使我感兴趣呢。”

“那我们就来谈谈使你感兴趣的事吧。”

“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在哪里？”

“在老家。”

“阿维拉？”

“什么阿维拉！”

“巴勃罗说他是阿维拉人。”

“他吹牛。他想把自己说成是大城市里的人。他的老家是——”她讲了个小镇的名字。

“当时出了什么事？”

“多着哪，”妇人说。“多着哪。可全都是恶劣不堪的。哪怕本来该是光荣的事。”

“跟我讲讲吧，”罗伯特·乔丹说。

“太惨啦，”妇人说。“我不想当着这姑娘的面讲。”

“讲吧，”罗伯特·乔丹说。“她不该听的，不听就是了。”

“我可以听，”玛丽亚说。她把手搁在罗伯特·乔丹的手上。
“没有什么是不该听的。”

“问题不在你该不该听，”比拉尔说。“而是我该不该对你讲，让你做恶梦。”

“我不会听了一段故事就做恶梦的，”玛丽亚对她说。“我们经历了这许多，你以为我听了故事还会做恶梦吗？”

“说不定会叫英国人做恶梦。”

“试试看吧。”

“不，英国人，我不是说笑话。你见过革命开头时小城镇的情况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你根本没有见过世面。你看到巴勃罗现在垮了的模样，可是你该看看巴勃罗当日的威风。”

“讲吧。”

“不。我不想讲。”

“讲吧。”

“那好吧。我要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可你，漂亮的姑娘，假如讲到你受不了的地方，跟我说。”

“假如我受不了，我就不听，”玛丽亚对她说。“不见得会比那许许多多的不幸事更糟吧。”

“我看说不定，”妇人说。“再给我一支烟，英国人，咱们就开始吧。”

姑娘仰靠在长着石南的小溪岸上，罗伯特·乔丹摊手摊脚地躺着，双肩着地，脑袋枕着一丛石南。他伸手摸到了玛丽亚的手，把它握在自己手中，在石南上擦着，直到她摊开手掌，平放在他手上，两人就这样听着。

“兵营里的民防军在大清早投降了，”比拉尔开始讲。

“你们袭击了兵营？”罗伯特·乔丹问。

“巴勃罗乘黑夜包围了兵营，割断了电话线，在一堵墙脚下放了炸药包，命令民防军投降。他们不肯。天亮时他把那堵墙炸开了。接着就开火。两个民防军被打死了，四个受了伤，四个投降了。

“在朦胧的清早我们大家伏在房顶上、地上、墙脚和建筑旁边。爆炸引起的尘土还浮在空中，因为扬得很高，没风吹散它。我们大家朝着建筑被炸开的那一面开火，边装子弹，边向烟雾里开枪，屋里仍有步枪发射的闪光，接着烟雾里有人叫喊别再打枪，四个民防军举着手走出来了。屋顶已经坍下了一大片，那一边的墙没有了，他们便出来投降。

“‘里面还有人吗？’巴勃罗喊着。

“‘有些受伤的。’

“‘看住他们，’巴勃罗对从我们射击的地方走过来的四个人说。‘站在那儿。靠着墙，’他对民防军说。四个民防军贴墙站着，又是脏，又是灰，给硝烟熏得漆黑，那四个看守用枪口对准了他们，巴勃罗和别的人就到屋里去结果那些受伤的人。”

“他们干了这个之后，就此再没伤兵的声息了，没有呻吟，没有呼喊，兵营里也没有枪声了。巴勃罗一伙从里面走出来，他背着猎枪，手里拿着一支毛瑟手枪。”

“‘瞧，比拉尔，’他说。‘这家伙在一个自杀的军官手里。我从没开过手枪。你，’他对一个民防军说，‘把这枪开给我看看。不。你自己别开。讲给我听。’”

“‘兵营里在枪杀伤兵的时候，那四个民防军靠墙站着，满头大汗，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都是高个子，一副丘八相，跟我的脸型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脸上长满了胡子茬，在他们一生的末一个早晨，没有时间刮。他们靠墙站着，一句话也没有。’”

“‘你，’巴勃罗对离他最近的那个人说。‘讲给我听，枪怎样开。’”

“‘把控制杆往下扳，’那人声音干巴巴地说。‘把反弹器向后拉，让它朝前弹。’”

“‘反弹器是什么？’巴勃罗问，望着那四个民防军。‘反弹器是什么？’”

“‘扳机上面的那个活动帽模。’”

“巴勃罗往后一拉，但卡住了。‘现在怎么办？’他说。‘给卡住啦。你骗了我。’”

“‘还要往后拉，让它轻轻地朝前弹回去，’那民防军说。‘我从没听到过那样的说话声调。比没有日出的清晨还要阴沉。’”

“巴勃罗照那人讲的扳了一下，然后一松手，帽模向前弹到

原处，击铁处在击发位置。那是一支难看的手枪，枪把小而圆，枪筒大而扁，使起来不灵巧。在这段时间里民防军一直望着巴勃罗，一声不吭。

“‘你打算把我们怎么办？’有一个问他。

“‘毙了你们，’巴勃罗说。

“‘什么时候？’那人用同样阴沉的声调问。

“‘现在，’巴勃罗说。

“‘在什么地方？’那人问。

“‘这里，’巴勃罗说。‘这里。现在。就在此时此地。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那个民防军说。‘没什么要说的。不过这样做太卑鄙了。’

“‘你才卑鄙，’巴勃罗说。‘你们杀害老乡。你们连自己的亲娘都会杀掉。’

“‘我从没杀过人，’那个民防军说。‘别提我娘啦。’

“‘死给我们看看吧。你们这帮杀人成性的家伙。’

“‘没有必要侮辱我们，’另一个民防军说。‘我们知道怎么死。’

“‘朝墙跪下，脑袋顶着墙，’巴勃罗对他们说。这些民防军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跪下，听着，’巴勃罗说。‘蹲下身子，跪在地上。’

“‘你看怎么样，巴柯？’有个民防军朝那个长得最高、跟巴勃罗讲怎样使用手枪的人说。他衣袖上佩着班长的条纹，尽管清早还很凉爽，他却满头大汗。

“‘跪就跪，’他回答。‘无所谓。’

“‘这就跟土地更接近一些啦，’第一个说过话的人说。他想

说句笑话，但是大家都没有开玩笑的心情，谁也不笑。

“‘那我们就跪下吧，’第一个民防军说。四个人都跪下了，脑袋顶着墙，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模样很别扭。巴勃罗走到他们背后，用枪口逐个抵着他们的后脑勺开了枪。枪声响处，一个个倒下去。我现在好象还能听到那尖厉而被闷住的枪响，还能看到那枪筒猛的一跳，那人的脑袋向前耷拉下去。手枪抵着后脑勺的时候，有一个脑袋一动不动。有一个脑袋向前一冲，前额紧贴在石墙上。有一个浑身哆嗦，脑袋直晃。只有一个用双手捂住了眼睛，那是最后一个。巴勃罗手里仍旧握着枪，转身向我们走来时，那四具尸体都倒在墙脚边。

“‘替我拿着枪，比拉尔，’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放下击铁。’他把手枪交给我，望着倒在营墙脚下的那四个民防军。我们这伙人也都站在那里，望着死人，谁都不说话。

“我们拿下了那个小镇，那时还是清早，没人吃过东西，也没人喝过咖啡；我们互相望望，炸了兵营之后，大家都弄得满身尘土，就象打谷场上的人那样。我拿了手枪站着，手里沉甸甸的，望着墙边民防军的尸体，我觉得恶心。死尸和我们一样，浑身是土，灰扑扑的，只是每个死人都在淌血，润湿了他们身边墙脚下的干泥地。我们站在那儿，太阳从远方的山上升起，阳光照在我们当时站着的路上，照在兵营的白墙上。空中的灰尘在旭日中变成了金黄色。我身边那个农民望望兵营的墙，望望倒在墙边的尸体，再望望我们，望望太阳，然后说，‘瞧啊，一天开始了。’

“‘我们现在去喝咖啡吧，’我说。

“‘好，比拉尔，好，’他说。于是我们走进小镇到了广场上。那些是这小镇上最后被枪杀的一批。”

“其他的人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镇上难道没有别的

法西斯分子吗？”

“什么话，怎么会没有别的法西斯分子？还有二十多个。可是一个也没被枪杀。”

“那是怎么回事？”

“巴勃罗命令用连枷把他们活活打死，然后在峭壁上把他们扔进江里。”

“二十个都这样？”

“我跟你讲吧。事情不那么简单。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看这种情景了，在江边峭壁上的广场上用连枷把人活活打死。

“那小镇建在江岸边，离江面很高，那里有一个广场，广场上有喷泉，几条长凳和给长凳遮荫的大树。住家的露台都对着广场。六条街汇向广场，周围有一条和每座房子相通的连拱廊，太阳毒晒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廊荫下行走。广场三边都是连拱廊，第四边是峭壁边上的一条树木遮荫的走道，下面是相距三百英尺的江面。

“当时的安排由巴勃罗一手包办，就象安排袭击兵营时一样。他先用大车堵住通各条大街的路口，仿佛在广场上准备举行民间斗牛戏似的。法西斯分子统统被关在镇公所里，那是广场一边最大的房子，墙上有一个大钟，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就在那连拱廊下的房屋里。在连拱廊底下，俱乐部门前的人行道上，他们摆了一些桌椅。革命以前，他们惯常在这里喝他们的开胃酒。桌椅是柳条编制的。那样子很象咖啡馆，不过更是雅致。”

“俘虏这些人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生战斗？”

“巴勃罗是在袭击兵营的前一晚把他们逮住的。不过，当时已把兵营包围住了。在袭击开始的同时，他们全都在家里被逮住。干得真聪明。巴勃罗有组织才能。不这样，他在袭击民防

军兵营的时候，人家就会在他的侧翼和背后向他进攻了。

“巴勃罗真聪明，不过也真残暴。他把在镇上干的这桩事布置得面面俱到、井井有条。听着。袭击得手之后，最后四个民防军投降了，他在墙脚下枪毙了他们，我们在拐角上早班公共汽车终点站边那家总是最早营业的咖啡店里喝了咖啡。随后，他就动手布置广场。大车给架在一起，就和准备举行民间斗牛戏时一模一样，只有面江的一边不堵住。网开一面。巴勃罗接着命令神父给法西斯分子忏悔，还给他们做必要的圣事。”

“这事在什么地方干的？”

“我说过了，在镇公所里。神父在里面干这些事，外面人山人海，有的嘻嘻哈哈，骂了一些脏话，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十分认真、恭恭敬敬的。开玩笑的是那些庆祝拿下兵营而已经喝醉的人，还有一些整天醉醺醺的游手好闲的人。

“神父在做圣事的时候，巴勃罗吩咐广场上的人们排成两行。

“他叫大家排成两行，就象叫人们排好了准备来一场拔河比赛，或者象人们在城里看自行车比赛到终点时那样，只给运动员留出一条狭路从中通过，或者象人们站着让路给圣像仪仗队通过一样。两排人之间空出两公尺宽的一条道，人们从镇公所门口排起，通过整个广场，直到峭壁边上。这样，从镇公所大门出来的人朝广场一看，只见两行排得很紧密的人在等待着。

“他们配备了打谷用的连枷，两排之间有足够的抡连枷的空地。不是所有的人都拿着连枷，因为搞不到这许多。可是大多数人从堂·吉列尔莫·马丁的铺子里搞来了，这个人是法西斯分子，卖各种各样的农具。没有连枷的人就拿着粗大的牧羊棍，或赶牛棒，有的拿着木制的干草叉，那是打谷后把干草和麦秆挑

向空中用的木叉，有的拿着镰刀，不过，巴勃罗把这些人安排在队伍中靠近峭壁的那一头。

“两排人静悄悄的，那天就象今天一样晴朗，就象现在一样天高云淡，广场上还没有灰尘，因为上一晚露水很浓，两排人的身上有树荫遮着，你听得到泉水从那狮子塑像嘴里的铜管喷出来，落到水池里的声音，妇女们平时带了水罐就在这里舀水的。

“只有神父在给法西斯分子做圣事的镇公所附近有下流的叫骂声；那些人，我已说过，是已经喝醉的二流子，他们挤在窗外，隔着窗上的铁栅栏，对里面大骂粗话，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站队的两排人大多数不声不响地等着。这时，我听到有人在问另一个人，‘里面有女的吗？’

“另一个回答，‘基督保佑，但愿没有女的。’

“这时还有一个说，‘巴勃罗的老婆在这里。喂，比拉尔。里面有女的吗？’

“我望着他，那是个农民，穿着出客穿的外套，满头是汗。我就说，‘没有，华金。没女的。我们不杀女的。我们干吗杀他们的女人呀？’

“他说，‘多谢基督，没女的。那啥时候动手啊？’

“我说，‘等神父做完祈祷就开始。’

“‘那么神父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我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在抽动，汗从前额上淌下来。‘我从没杀过人，’他说。

“‘那么你得学学啦，’他身旁的一个农民说。‘不过依我看，这家伙揍一下是不会叫人送命的。’他双手握着连枷，怀疑地望着。

“‘妙就妙在这里，’另一个农民说。‘一定要揍许多下才

行。’

“‘敌人拿下了瓦利阿多里德。他们拿下了阿维拉，’有一个人说。‘我们进镇前，我就听到这消息了。’

“‘他们拿不下本镇。这个镇是我们的。我们赶在他们前面先动了手，’我说。‘先下手为强，巴勃罗可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

“‘巴勃罗真能，’另一个说。‘但是在结果民防军的时候，他有点自私。你说对不，比拉尔？’

“‘对呀，’我说。‘可目前的事大家都插手了。’

“‘不错，’他说。‘这次安排得很好。不过我们为什么再听不到关于战争的消息呢？’

“‘袭击兵营前，巴勃罗把电话线割断了。电话线还没有接好。’

“‘噢，’他说。‘原来这样，怪不得我们听不到消息了。我这个消息是今天清早在养路站那里听来的。’

“‘干吗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他们，比拉尔？’他问我。

“‘为了省子弹，’我说。‘还有，每个人都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那么就该动手了。该动手了。’我望着他，只见他哭了。

“‘你干吗哭，华金？’我问他。‘这有啥好哭的。’

“‘我忍不住，比拉尔，’他说。‘我从没杀过人。’

“小镇上大家认识大家，一向知道底细，你要是没见过小镇上革命开头时的情况，你就等于没见过世面。这天，广场上那两排人里，大多数穿着在地里干活的衣服，原是匆匆赶到镇上来的，不过也有人不知道革命头一天该怎么打扮，穿了礼拜天或者过节时的衣服，后来看到别人，包括那些袭击兵营的人，都穿着

最旧的衣裳，发觉自己穿得不对头，很不好意思。不过他们不愿意脱下来，生怕丢失，或者被二流子偷去。他们就这样满头大汗地站在太阳底下，等着动手。

“那时起风了，大家刚才在广场上走的走、站的站，来回走动，泥土被踩得又干又松，被风刮起来，于是有一个穿藏青色出客外套的人喊道：‘洒水，洒水！’每天早晨用皮管在广场上洒水的广场管理员便走上前来拧开水龙头，从广场旁边向中间洒水，把尘土压下去。两排人随即向后退去，让他在广场中间洒水；皮管大幅度地挥动着，喷出的水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大家把身体挂在自己的连枷、棍子或者白木草叉上，望着那喷射的水。等广场上洒得很潮，灰尘不再飞扬了，两排人就又站好了队，有个农民大声喊道：‘我们啥时候伺候第一个法西斯分子啊？第一个啥时候从畜栏里出来呀？’

“‘快了，’巴勃罗在镇公所的门里提高了嗓门说，‘第一个马上就出来。’在袭击兵营时，他大声吆喝，硝烟又呛人，所以他的声音哑了。

“‘还磨蹭什么呀？’有人问。

“‘他们还在忏悔自己的罪孽哪，’巴勃罗提高了嗓门说。

“‘是呀，总共有二十个呢，’有人说。

“‘不止，’另一个说。

“‘二十个人的罪孽讲起来可不少。’

“‘是呀，我看，他们是在搞鬼，在拖时间。在这紧要当口，除了穷凶极恶的事之外，一般的罪孽谁还会记得？’

“‘只能耐心点。这二十多个人穷凶极恶的罪孽也够多的，讲起来可花时间哪。’

“‘我有耐心，’另一个说。‘不过最好还是快点了事。对他

们，对我们，都是快点好。现在七月天了，事情多着。收割后还没打谷。现在可还不是赶集过节的时光。’

“‘今天就等于赶集过节，’另一个说。‘是自由节，从今天起，这些家伙消灭以后，这镇和土地就是我们的了。’

“‘这些法西斯分子就是我们今天要打的谷子，’有个人说。‘打掉秕糠就有了本镇的自由。’

“‘我们必须管好镇上的事，不能丢人，’另一个说。‘比拉尔，’他对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组织大会？’

“‘这件事办完就开，’我对他说。‘就在镇公所的房子开。’

“我戴上一顶民防军的三角漆皮帽闹着好玩。我把手枪上了保险，那当然是扣住了扳机，同时用大拇指把击铁轻轻地朝前推。我把手枪插在腰上，长长的枪筒插在束在腰上的绳子里。我戴帽子的时候，觉得这个玩笑很有意思，尽管后来我想，当初拿民防军的帽子还不如拿枪套的好。两排人里有个人对我说，‘比拉尔，好闺女。你戴这顶帽子，我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我们现在已经把民防军这类东西消灭掉了。’

“‘那么，’我说，‘我就摘下吧。’我摘了帽子。

“‘把帽子给我，’他说。‘应当毁掉它。’

“我们那时正站在这两排人的尽头，沿江峭壁边缘的走道上，所以他随手把帽子从峭壁上扔下去，就象牧人不抬手扔石块赶牛似的。帽子飘到远远的空中，越来越小，漆皮在清澈的空中闪闪发亮，一直落到江里。我回过头来望广场，只见所有的窗口和露台上都挤满了人，那两排人在广场上一直排到镇公所门口，大楼窗前也尽是人，挤来挤去，七嘴八舌，那时只听得一声大叫，有人说，‘头一个出来啦。’原来是镇长堂·贝尼托·加西亚，他光着脑袋从大门里慢吞吞走出来，走下门廊，没有什么动静；他

走到两排拿着连枷的人中间，还是没有动静。他在两个、四个、八个、十个人中间走过，没有动静。他在这两排人中间昂首走着，胖脸上脸色灰白，眼睛先是向前望，接着朝左右偷看，走得很稳。还是没有动静。

“有人在露台上喊了：‘怎么搞的，你们这些胆小鬼？’堂·贝尼托仍旧在两排人中间走着，没有动静。那时，离我三个人的地方，有个人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他咬着嘴唇，使劲握住连枷的手失去了血色。我看他朝堂·贝尼托的方向望着，等他走过来。仍旧没有动静。堂·贝尼托刚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高高抡起连枷，竟然碰到了身边的人，然后一下子往堂·贝尼托砸去，打在他脑袋一边，堂·贝尼托对他瞅了一眼，这人又是一下子，同时嚷道：‘给你点颜色看看，王八蛋，’这一下打在堂·贝尼托脸上，他举起双手捂住脸，于是大家纷纷动手，把他打翻在地；最早动手的那人叫别人帮忙，他一把抓住堂·贝尼托的衬衫领子，别的人抓住他的胳膊，他的脸擦着广场的泥地，大家就这样把他一路拖着，越过走道，拖到峭壁边，扔出去落到江里。第一个动手的人跪在峭壁边上看他往下掉，说：‘王八蛋！王八蛋！啊，王八蛋！’这个人是堂·贝尼托的佃户，他们早就结了仇。堂·贝尼托把江边一块地从他手里收回给别人种，他们为此吵过，这个人早就恨他了。这个人不再回到队伍里面，只是坐在峭壁上，望着堂·贝尼托掉下去的地方。

“堂·贝尼托之后没人肯出来。这时广场上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等待着，要看看下一个出来的是谁。这时有个醉汉大声嚷嚷：‘把牛放出来！’

“这时镇公所窗边有人嚷道，‘他们不肯动窝啦！他们都在祷告！’

“另一个醉汉叫了，‘把他们拖出来。来吧，把他们拖出来。祷告时间过啦。’

“不过一个也没出来，过了一会，我看到大门里出来一个人。

“那是堂·费德里科·冈萨雷斯，他是磨坊和饲料铺的老板，是个首要的法西斯分子。他又高又瘦，头发是横梳的，好遮住秃顶，他穿着长睡衣，下摆塞在裤子里。他光着脚，仍是他在家被逮捕时的那副模样。他两手举过脑袋，在巴勃罗前面走着，巴勃罗跟在后面，用猎枪枪口顶住他的后背，一直逼他走到两排人中间。可是等巴勃罗撤下了他，回到镇公所门口的时候，他却站在那里不动了，眼睛望着天空，两手高举，好象想抓住老天似的。

“‘他没腿走路了，’有人说。

“‘怎么啦，堂·费德里科？你不会走路吗？’有人对他大叫。堂·费德里科却举起两手站在那里，只有嘴唇在动。

“‘走呀，’巴勃罗在石阶上对他嚷道。‘走。’

“堂·费德里科站在那儿不会动了。有个醉汉用连枷柄戳他屁股，堂·费德里科象匹执拗的马那样突然蹦了一下，可是仍旧站在原地，举起两手，翻着眼睛望天。

“于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个农民说，‘这太丢人了。我对他没什么仇，不过这场戏该结束了。’他向这排人的前头走去，挤到堂·费德里科站着的地方，说，‘对不起你啦，’朝他头侧就猛打一棍。

“堂·费德里科把举起的双手按在头上，挡住秃顶，他低下用两手蒙住的头，手指间露出了盖在秃顶上的几根长头发，他在两排人中间飞奔，可是连枷接二连三地落在他背上和肩上，直到他栽倒在地。队伍尽头处的那些人把他拽起来，扔到峭壁外。自从巴勃罗用猎枪把他逼出大门之后，他没开过口。他唯一的难

处就是往前走。两条腿仿佛不听他使唤了。

“在堂·费德里科之后，我看到，最狠心的人都聚到队伍尽头的峭壁边来。我就离开那里，走到镇公所的廊前，推开了两个醉汉，朝窗里张望。在镇公所的大厅里，大家围成半圆形跪在那里祷告；神父也跪着和他们一起祷告。巴勃罗一伙拿着猎枪站着，其中有个叫‘四指头’的皮匠，当时总跟巴勃罗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两个人。巴勃罗对神父说，‘现在谁去？’神父只顾继续祷告，不管理他。

“‘你听着，’巴勃罗粗声粗气地对神父说，‘现在谁去？谁准备好了？’

“神父不愿跟巴勃罗说话，只当没有他这个人在身边。我看得出，巴勃罗很恼火。

“‘我们大家一起去，’堂·里卡多·蒙塔尔沃抬起头，停了祷告对巴勃罗说。这家伙是地主。

“‘什么话，’巴勃罗说，‘准备好了，一次去一个。’

“‘那我去，’堂·里卡多说。‘我永远不会比现在更有准备了。’他说时神父替他祝福，他站起身的时候，神父又替他祝福。神父不停地祷告，举起十字架，让堂·里卡多亲吻。堂·里卡多吻了十字架后转身对巴勃罗说，‘并且再也不会比现在更有准备了。你这个孬种。咱们走吧。’

“堂·里卡多是个矮子，灰头发，粗脖子，穿件没安硬领的衬衫。因为他常骑马，有点罗圈腿。‘永别了，’他对所有跪着的人说。‘不要难过。死没有什么了不起。倒霉的是死在这个混蛋手里。别碰我，’他对巴勃罗说。‘别用枪碰我。’

“他走出镇公所大门，长着灰头发、灰色的小眼睛和粗脖子，显得很矮，很恼火。他望望两排农民，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在当

时的处境下，你知道，英国人，他居然真的啐了唾沫，这种事很少见。他说，‘西班牙万岁！打倒假共和国！我操你们的祖宗！’

“经他这一骂，大家很快就揍死了他。他走到第一个人身前就挨了打，他还想抬起头来朝前走，就继续挨着打，直到栽倒在地，他们用镰钩和镰刀砍他，很多人把他抬到峭壁边，扔了下去。这时，大家的手上和衣服上都沾上了血迹，这时，他们才觉得，走出来的人是他们的真正的敌人，应该杀掉。

“在堂·里卡多恶狠狠走出来骂娘之前，我敢说，不少人是宁愿不站在这队伍里的。要是队伍里有人大叫，‘得了，我们饶了其余的人吧。他们已经得到教训啦，’我敢说，大多数人是会同意的。

“可是堂·里卡多那副拚着干的架势给别人帮了倒忙。因为他惹怒了这两排人，本来大家只是为了履行公事，对这种事劲头不大，而现在冒火了，情绪显然起了变化。

“‘把神父放出来，干起来就快啦，’有个人大叫。

“‘把神父放出来。’

“‘我们干掉了三个强盗，让我们把神父干掉吧。’

“‘两个强盗，’一个矮矮的农民对那个大叫的人说。‘跟我们的主一起钉十字架的是两个强盗。’^①

“‘谁的主？’那人说，他的脸气得通红。

“‘根据习惯的说法，我们的主。’

“‘他不是我的主，绝对不是，’另一个说。‘你要是不打算在这两排人中间走走，最好留心你的嘴巴。’

① 据《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三十八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我拥护自由、拥护共和国，并不比你差，’那个矮个子农民说。‘我打在堂·里卡多的脸上。我打了堂·费德里科的背脊。我打了堂·贝尼托，可是没打中。我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人的正式称呼，跟他一起只有两个强盗嘛。’

“‘你他妈的拥护什么共和国，嘴里老是堂长堂短的。’

“‘这里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嘛。’

“‘我可不这么称呼，他们是王八蛋。还有你的主——嗨！这下又来了一个！’

“那时，我们看到了一幕丢人的景象，因为从镇公所大门里出来的是堂·福斯蒂诺·里维罗，也就是地主堂·塞莱斯蒂诺·里维罗的大儿子。他是高个儿，一头黄发刚朝后面梳理过，因为他口袋里老是揣着一把梳子，这次出来之前也梳了头发。他老是和姑娘们纠缠不清，还是个胆小鬼，并且一直想当个业余斗牛士。他常和吉普赛人、斗牛士和养牛人混在一起，爱穿那种安达卢西亚^①式斗牛服，可是他没胆量，被人瞧不起。有次风传他要在替阿维拉孤老院募捐而举行的业余斗牛表演中出场，照安达卢西亚式骑在马上把牛杀死，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练习过。他事先挑了一头没有腿力的小牛，到场上发现换了一头个儿够大的，马上推说自己感到恶心，并且据说用三个手指伸进自己的嗓子眼，让自己呕吐。

“两排人看到是他，大叫起来，‘喂，堂·福斯蒂诺。留心别呕呀。’

“‘听我说，堂·福斯蒂诺。峭壁下面漂亮姑娘多着呢。’

“‘堂·福斯蒂诺。等一等，我们牵条更大的牛来。’

^①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 西班牙南部一地区。

“另一个喊道，‘听我说，堂·福斯蒂诺。你听说过死吗？’

“堂·福斯蒂诺站在那里，还在充好汉。他一时冲动，对别人说他准备走出镇公所。同样的冲动曾使他宣布要去斗牛。那种冲动使他希望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业余斗牛士。堂·里卡多的榜样给他打了气，他站在那里显出既漂亮又勇敢的样子，脸上还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神气。不过他说不出话来。

“‘来吧，堂·福斯蒂诺，’队伍里有人叫道，‘来吧，堂·福斯蒂诺。这里有条最大的牛。’

“堂·福斯蒂诺站着朝前望。我觉得他在望的时候，那两排人中间没有人怜悯他。他还是要显得漂亮、不可一世，可是时间不等人，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堂·福斯蒂诺，’有人喊着。‘你在等什么呀，堂·福斯蒂诺？’

“‘他在准备呕吐，’有人说。那两行人都笑了。

“‘堂·福斯蒂诺，’有个农民喊道。‘你觉得呕吐有趣就呕吐吧。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们等着的时候，只见堂·福斯蒂诺望望那两排人，望望广场尽头的峭壁，接着，等他看到峭壁和峭壁之外广大的空间，他飞快地转过身，往镇公所门口退回去。

“两排人全都吼叫起来了，有个人拉开嗓门大喊：‘你到哪里去，堂·福斯蒂诺？你到哪里去？’

“‘他去呕吐，’另一个叫道，大家又都哈哈大笑。

“我们看到堂·福斯蒂诺又走出门来，巴勃罗拿着猎枪在他身后。现在他的架子全完蛋了。看到那两排人，他一点气派也没有了，巴勃罗跟在他后面走出来，好象在扫街似的，前面的堂·福斯蒂诺就是他往前扫的垃圾。堂·福斯蒂诺走出门口，一

边划十字，一边祷告，接着，他用手挡住眼睛，从石阶上下来，向两排人走去。

“‘随他去，’有人叫。‘别碰他。’

“两排人心领神会，没人动手去碰堂·福斯蒂诺，只见他两手颤抖，挡在眼前，嘴唇微微抽搐，在两排人中间朝前走去。

“没人说话，没人碰他；他走了一半路，再也迈不开步了，双膝跪在地上。

“没人打他。我顺着队伍走去，看个究竟，只见一个农民弯下腰，把他拖起来，说，‘站起来，堂·福斯蒂诺，接着走吧。牛还没出来哪。’

“堂·福斯蒂诺自己没法走路，这个穿黑衣裳的农民就在一边架着他，另一个穿黑衣裳和牧人靴的农民在另一边架着他，堂·福斯蒂诺两手挡在眼前，嘴唇一直在抖，脑瓜上的黄头发滑溜溜的，在阳光中闪亮，在两排人中间朝前走。他路过的时候，农民们说，‘堂·福斯蒂诺，祝你好胃口，堂·福斯蒂诺。’有的说，‘堂·福斯蒂诺，听您吩咐，堂·福斯蒂诺。’有一个自己斗牛也没有斗成的人说，‘堂·福斯蒂诺。斗牛士，听您吩咐。’另一个说，‘堂·福斯蒂诺，天堂里有的是漂亮姑娘，堂·福斯蒂诺。’他们在两旁紧紧架着他在两排人中间走，脚几乎不着地，而他只顾用手遮住眼睛。不过，他准在指缝中偷看，因为给拖到峭壁边的时候，他又双膝跪下，扑倒在地，抓住了草，死也不肯起身，他说，‘别。别。别。求求你们。千万别。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别。千万别。’

“那时挟住他的农民和队伍尽头处的狠心人，趁他跪下的时候，飞快地在他身后蹲下，把他向前猛地一推，于是他没挨到一拳一脚，就掉下峭壁去了，只听得他在半空里摔下去时的大声叫

喊。

“那时候我知道这两排人眼睛都红了。使他们变成这副样子的，先是堂·里卡多的咒骂，后是堂·福斯蒂诺的怕死相。

“‘再给咱们来一个，’一个农民叫道，另一个农民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堂·福斯蒂诺！真是活宝！堂·福斯蒂诺！’

“‘他现在见到大牛啦，’另一个说。‘呕吐也帮不了他忙啦。’

“‘我这辈子，’另一个农民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象堂·福斯蒂诺这样的活宝。’

“‘后面还有呢，’另一个农民说。‘耐心些。谁猜得到我们还会见到什么样的家伙？’

“‘有长子，有矮子，’第一个农民说。‘说不定还有黑人和非洲来的稀有动物。不过我看，再也不会再有堂·福斯蒂诺那样的活宝了。可是给咱们再来一个！来呀。再来一个！’

“醉汉们从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的酒吧里抄来了一瓶瓶大茴香酒和法国白兰地，大家传来传去，当葡萄酒来大喝，而队伍里不少人，因为干掉了堂·贝尼托、堂·费德里科、堂·里卡多，特别是堂·福斯蒂诺，激动得有点儿晕头转向，这时喝得开始有点醉意了。不喝瓶装烈酒的人，传递着盛葡萄酒的皮酒袋。有人把皮酒袋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让皮袋里凉丝丝的酒顺着喉咙流下去，因为我也渴极了。

“‘杀人使人口渴得慌，’拿酒袋的人对我说。

“‘怎么，’我说。‘你杀过人吗？’

“‘咱们杀了四个啦，’他神气地说。‘民防军不算在里面。你杀了一个民防军，是真的吗，比拉尔？’

“‘不是，’我说。‘我跟别人一样，墙倒时，朝烟尘里开枪。就

是这么回事。’

“‘你那支手枪是从哪儿搞来的，比拉尔？’

“‘巴勃罗给的。他杀了民防军，把手枪给了我。’

“‘他就用这支枪杀掉民防军的？’

“‘正是，’我说。‘之后他就武装了我。’

“‘我看看行吗，比拉尔？让我拿一拿枪，行吗？’

“‘干吗不行，伙计，’我说着从束腰绳里拔出枪递给他。不过，我在纳闷为什么没人出来了，就在这时，堂·吉列尔莫·马丁出来了。偏偏是他。那些连枷啦，牧羊棍啦，木草叉啦，都是从他的铺子里拿来的。堂·吉列尔莫是个法西斯分子，除此之外，人们对他没有什麼芥蒂。

“不错，他付给制连枷的工人的钱不多，不过，他卖出来收费也不高。如果不想问他买连枷，只要付木头和皮革的价钱定做也行。他说话很粗鲁，肯定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他们俱乐部里的成员。中午和傍晚，他总是坐在俱乐部的藤椅上看《辩论报》^①，一面叫人擦皮鞋，一面喝苦艾酒和矿泉水，吃炒杏仁、虾干和鲷鱼。人们可不会因为这点而要他死的，我敢说，要不是堂·里卡多·蒙塔尔沃的骂街和堂·福斯蒂诺的丢人相，使人们感情激动，因而喝醉了酒，准会有人叫，‘让这个堂·吉列尔莫太太平平地走吧。我们手里的连枷还是他的。放他走吧。’

“因为这小镇上的人是心地善良的，虽然也能变得凶狠，他们生来有正义感，主张公道。可是凶狠已经进入这两排人的心里，加上陶醉，或者刚起头的陶醉感，人们的心情已不象堂·贝

① 《辩论报》（“El Debate”）为天主教保守党的机关报，革命前在马德里出版。

尼托走出来时那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样。我比谁都喜欢酒醉的乐趣，不过在西班牙，由别的东西，而不是酒引起的陶醉是十分糟糕的，人们会干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干的事情。你的国家里不是这样吗，英国人？”

“也是这样的，”罗伯特·乔丹说。“我七岁的时候，跟母亲到俄亥俄州去参加一次婚礼，在拿花的一对男女小侯相中我是那个男小孩——”

“你当过小侯相？”玛丽亚问。“真好！”

“在那个城里有个黑人被吊在灯柱上，后来被火活活烧死。灯柱上是一盏弧光灯。点灯时把弧光灯从灯柱上放低到人行道上。这黑人先被人用那吊弧光灯的滑车吊了上去，可是滑车断了——”

“一个黑人，”玛丽亚说。“真野蛮！”

“这些人是不是喝醉了？”比拉尔问。“他们是不是醉得太厉害以至要烧死一个黑人？”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我只是在屋里从窗帘下面望出去时看到的，那幢房屋就在弧光灯柱的拐角上。当时街上人山人海，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

“你那时才七岁，又在屋里，你哪能知道他们醉不醉，”比拉尔说。

“我刚才讲到，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那时候，我母亲把我从窗口拉开了，所以没看下去，”罗伯特·乔丹说。“反正后来我有过类似的经历，说明人们给冲昏了头脑在我的国家里也是这样的。这种事是残忍而野蛮的。”

“你才七岁，年纪太小，”玛丽亚说。“你太小，不懂这些事。我只在马戏团里看到过黑人。除非摩尔人也可算是黑人。”

“有的是，有的不是，”比拉尔说。“我可以给你们讲讲摩尔人。”

“你不及我清楚，”玛丽亚说。“可不，你不及我清楚。”

“别谈这些了，”比拉尔说。“这些事听了不舒服。我们刚才讲到哪儿啦？”

“讲到那两排人醉了，”罗伯特·乔丹说。“讲下去吧。”

“说他们醉是不公平的，”比拉尔说。“因为他们离喝醉还远着呢。不过他们的心情已经起了变化。那时，堂·吉列尔莫走了出来，站得笔直，他目光近视，头发灰白，中等身材，身上的衬衫有硬领扣子，但没有硬领，他站在那里，在自己身上划了一个十字，眼睛望着前面，不过他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但还是平静地一步步往前走，他那副模样能叫人怜悯。可是有人在队伍里叫道，‘过来吧，堂·吉列尔莫。到这里来吧，堂·吉列尔莫。朝这边来吧。我们这里都有你铺子里的货色。’

“他们刚才把堂·福斯蒂诺揶揄得够呛，所以没有想到堂·吉列尔莫是不一样的。假使要弄死堂·吉列尔莫的话，应该让他马上就死，不要伤他的面子。

“‘堂·吉列尔莫，’另一个叫道，‘要我们派人到府上去拿眼镜吗？’

“堂·吉列尔莫家不是大户人家，因此他不很富裕，只得开一家木制农具铺子，挣几个钱，当上法西斯分子无非是想可以谄上欺下，并且为自己的心灵找些安慰。他当法西斯分子还有一层原因，那是为了讨好他老婆，因为他老婆对法西斯有宗教般的虔诚感情。他住在一套公寓里，就在这广场上过去三家门面的地方。堂·吉列尔莫站在那里，眯起一双近视眼望着那两排人，他知道不得不在这两排人中间穿过去，这时，有个女人在他住的公寓露

台上大声尖叫。她在露台上可以望到他，她就是他的老婆。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等等，我要跟你一起去。’

“堂·吉列尔莫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转过头去。他看不到她。他想说几句话，可是说不出声。于是他朝他老婆叫喊的方向挥挥手，开始走进两排人中间。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吉列尔莫呀！’她两手抓住露台上的栏杆，身体前后摇晃。‘吉列尔莫！’

“堂·吉列尔莫又朝喊声方向挥挥手，抬起头走进两排人中间，你没法知道他的心情，只能从他的脸色看出一二。

“队伍里有个醉汉学他老婆的尖叫声喊了一声：‘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这时脸上淌着眼泪，不顾死活地向那人冲去，那人对准他脸上就是一连枷，这一下份量很重，把堂·吉列尔莫打得坐在地上。他坐在地上哭了，倒不是因为害怕。醉汉们打他，还有一个甚至跳上去，骑在他肩上，用酒瓶砸他。随后，不少人离开了队伍，顶替他们的是那些原来在镇公所窗外胡闹和说下流话的醉汉。

“看到巴勃罗打死民防军，我很激动，”比拉尔说。“那件事固然很不光彩，可是我认为如果非这么干不可，也只能这样干，至少不好算残忍，只不过是杀生而已。这些年来大家都懂得，杀生是不光彩的事，不过为了胜利，为了保住共和国，也不得不这么干。

“当广场被堵住、人们排成队伍的时候，我很佩服巴勃罗的这个主意，并且也理解，尽管我认为有点异想天开，我觉得如果这一切是非干不可的，就得干得体面些，别叫人难受。当然，如果法西斯分子由百姓来处决，最好人人动手；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承

担良心责备，正象我希望等这个镇子归我们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可是，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我觉得害臊、难受，再加上队伍里面来了醉汉和二流子，有些人又因为看到堂·吉列尔莫的情况，离开了队伍表示抗议，我希望自己也和那两排人完全脱离关系，便穿过广场，在一棵大树荫下的长凳上坐下。

“队伍里有两个农民，一边说话，一边走来，其中一个叫我，‘比拉尔，你怎么啦？’

“‘没什么，伙计，’我对他说。

“‘肯定有事，’他说。‘说吧。出了什么事。’

“‘我看我已经受够了，’我对他说。

“‘我们也一样，’他说，他们俩一起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个拿着一个皮酒袋，把它递给了我。

“‘你漱漱口，’他说，另一个继续他们俩刚才的谈话，说，‘最糟的是，这会给我们带来厄运。谁也没法保证，象那样把堂·吉列尔莫整死，不会给我们带来厄运。’

“另一个接着说，‘我不相信非把他们统统弄死不可，即使非弄死不可，也该让他们死得象个样，别作弄他们。’

“‘作弄堂·福斯蒂诺还情有可原，’另一个说。‘他本来就油腔滑调，不是正经人。可是作弄堂·吉列尔莫这样的正经人，真正不公道。’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这是实在话，因为我真感到五脏六腑都不舒服，头上出冷汗，胃里折腾，好象吃了不新鲜的海货。

“‘那没关系，’这个农民说。‘我们别再参加在内了。不过我不知道别地方的情形怎么样。’

“‘他们还没接好电话线，’我说。‘这是疏忽，得补救。’

“‘正是，’他说。‘咱们不如把力气花在加强这个镇子的防守上面，别这么拖泥带水而残暴地大批杀人。’

“‘我去跟巴勃罗讲，’我对他们说。我从长凳上站起来，向通镇公所大门的回廊走去。从门口排到广场上的队伍已经变得弯弯曲曲，乱糟糟的，很多人已经醉得厉害。有两个人栽倒了，仰天躺在广场中央，还把酒瓶传来递去。一个呷了口酒，躺在地上发疯似地朝天高喊：‘无政府万岁！’^①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另一个大叫：‘自由万岁！’两只脚在空中乱踢，接着又吼了一声：‘自由万岁！’他也有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一只手挥舞领巾，另一只手摇着酒瓶。

“有个离开了队伍、站到回廊阴影里的农民厌恶地望着他们说：‘他们该喊“醉酒万岁”才对。他们只信这个。’

“‘他们连这点也不信吧，’另一个农民说。‘这些人啥也不懂，啥也不信。’

“正在这时，有个醉汉站起来，紧握拳头，举起双臂，大叫：‘无政府万岁！自由万岁！我操你奶奶的共和国！’

“另一个仍旧仰躺着的醉汉抓住了那个大喊万岁的醉汉的脚踝，翻了一个身，这一来那个喊叫着的家伙也跌倒了。他们俩一起打了一个滚，接着又坐起来，那个拖人跌倒的醉汉用手臂搂着那大叫的人的脖子，把酒瓶塞给他，一边吻他围在脖子上的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们俩一起喝酒。

“正是那时，队伍里响起一声狂吼，我在回廊里抬头一望，看不见走出来的是谁，因为镇公所门口挤满了人，那人的脑袋被别

① 人民阵线也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这里写到的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地方上的狂热信徒。

人挡住了。我只看见有人被拿着猎枪的巴勃罗和‘四指头’推了出来，但看不见究竟是谁，我就朝拥在大门口的那两排人走去，想看看清楚。

“那时挤得很厉害，法西斯分子俱乐部里的桌椅全翻了身，只有一张桌子没有翻倒，上面躺着一个醉汉，他的脑袋垂在桌边，咧开了嘴；我就拖了一把椅子，靠在柱子边，跨到椅子上，这样才能从人群的头顶上望过去。

“被巴勃罗和‘四指头’推出来的人是堂·安纳斯塔西奥·里瓦斯，他确是个法西斯分子，是城里最胖的胖子。他收买粮食，是好几家保险公司的掮客，还放高利贷。我站在椅子上，看见他走下石阶，向那两排人走去，脖子上的肥肉鼓起在衬衫硬领后面，秃顶在阳光下闪亮，可是他到底没有走进队伍中去，因为那时不是几个人，而是大家一齐喊起来了。那是一种难听的喊声，是那两排醉汉同时狂吼的声音；大家向他身上扑去，队伍散开了；我只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两手抱住脑袋，扑倒在地。那时没法看到他了，因为大家压在他身上了。等他们从堂·安纳斯塔西奥身上爬起来，他已经完蛋了，脑袋在回廊里铺着的石板地上被砸碎了，队伍已乱了套，成了一群暴民。

“‘咱们到里面去，’他们开始大喊。‘到里面去收拾他们。’

“‘这家伙重得拖不动，’有一个人踢踢俯躺在那儿的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让他待在那儿吧。’

“‘咱们干吗花力气把这口肥猪拖到峭壁边去呀？随他待在那儿吧。’

“‘咱们现在进去干掉里面的家伙，’有一个人喊道。‘咱们进去。’

“‘干吗整天在太阳底下傻等？’另一个狂叫。‘来呀。咱们

走。’

“这群暴民在挤进回廊。他们呼喊、挤撞，发出的声音就象野兽的吼叫；他们一齐喊着：‘开门！开门！开门！’因为队伍散开的时候，看守们把镇公所的门都关上了。

“我站在椅子上，隔着装有铁栅的窗子，望得见镇公所的大厅，只见里面的情形和刚才一样。神父站着，剩下的那些人在他前面围成一个半圆形跪着，每人都在祷告。巴勃罗坐在镇长座椅前的大桌子上，背上挎着猎枪，两腿垂在桌边，他正在卷一支烟。‘四指头’坐在镇长的座椅里，两脚搁在桌上，正在抽烟。看守他们的人个个拿着枪，坐在镇公所大厅的几把椅子上。大门钥匙放在巴勃罗近身的桌子上。

“暴民象唱歌似的一声声地喊道：‘开门！开门！开门！’可是巴勃罗坐在那里，只当没听到。他对神父说了几句话，可是那伙人闹得太凶，我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那神父象刚才一样，不管理他，仍旧在祷告。很多人在我后面推，我也和他们一样，端起椅子朝前面推，把椅子移近墙边。我站在椅子上，脸紧贴着窗上的铁栅，手抓住铁条。有人也踩上了我的椅子，两条手臂围着我肩膀，抓住了外面两根铁条。

“‘椅子要塌啦，’我对他说。

“‘那有什么关系？’他说。‘看他们，看他们祷告。’

“他嘴里呼出的气，喷在我脖子上，带着那伙暴民的气味，就象石板地上的呕吐物的酸臭和喝醉的人的酒气，接着他把脑袋越过我的肩膀，把嘴凑在铁窗的空档里，大喊：‘开门！开门！’我当时的感觉就象那伙暴民都压在我背上，就象在恶梦中魔鬼压在背上一样。

“那伙人这时使劲顶在门上，前面的人几乎被后面的人挤扁

了；广场上有个大个儿醉汉，身穿黑罩衣，脖子上围条红黑两色的领巾，他跑来朝推推搡搡的人身上猛撞，倒在他们身上，然后站起身往后倒退几步，又向前猛冲，撞在那些推推搡搡的人的背上，大喊：‘老子万岁！无政府万岁！’

“我正望着的时候，这个醉汉转身离开那伙人，走过去坐在地上端着瓶子喝酒。他往下坐的时候，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仍然脸贴着石板合扑在地上，身体已被踩得一塌糊涂了。这醉汉就站起来走到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弯下腰，拿瓶里的酒倒在堂·安纳斯塔西奥头上和衣服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擦了几根火柴，想点火烧堂·安纳斯塔西奥。不过这时风吹得紧，把火柴吹灭了；不一会，这醉大汉在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坐下来，摇摇头，凑着瓶子喝酒，不时探过身去，拍拍堂·安纳斯塔西奥尸体的肩膀。

“这时候，那伙暴民一直在大叫开门，跟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那个男人抓紧了窗铁栅大叫开门，喊声在我耳朵旁震得我啥也听不到，他嘴里呼出的臭气喷在我脸上。我转过脸，不去看那个想焚烧堂·安纳斯塔西奥的醉汉，再望着镇公所的大厅。里面的情景仍然和刚才一样。他们仍旧和先前那样在祷告，全跪在地上，敞开着衬衫，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抬起了头，望着神父和他手里的十字架，神父祷告得又快又使劲，从他们头顶上望过去。他们身后是巴勃罗，他这时已点上了烟卷，坐在桌上，晃着两腿，挎着猎枪，手里在摆弄那把钥匙。

“我看到巴勃罗从桌上俯下身体，又对神父说话。可是人声嘈杂，没法听清他说些什么。神父仍旧继续祷告，不搭理巴勃罗。接着，围成半圆形在祷告的人里面有个家伙站起来了，我看他想走出去。那是堂·何塞·卡斯特罗，人们都叫他堂·佩贝。他

是个死硬的法西斯分子，马贩子，这时他站起身来，显得很矮小，胡子拉碴的，样子倒还干净，身穿一件睡衣，下摆塞在灰条纹的裤子里。他吻了十字架，神父为他祝福；他站直身体望着巴勃罗，还向大门那边摆摆手。

“巴勃罗摇摇头，继续抽烟。我能看到堂·佩贝跟巴勃罗说话，可是听不出说些啥。巴勃罗不答理，他不过又摇摇头，并且对大门那边点头示意。

“我接着看到堂·佩贝端详着大门，才明白他先前没有注意到大门已锁上。巴勃罗给他看看钥匙，他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去又跪在地上。我看到，神父扭头望望巴勃罗，而巴勃罗对他咧嘴笑笑，给他看看钥匙，神父好象这才知道门锁上了，看样子似乎想摇摇头，不过结果却又低下头去祷告了。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不知道门上了锁，看来他们一心在祷告，只想自己的事，这时他们当然弄清楚了，还知道外面在大叫大嚷的原因，于是他们准知道现在情况都变了。不过他们的神色还和原来一样。

“这时候的叫嚷声大得叫人什么也听不到，跟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那个醉汉两手摇着窗铁栅吼叫：‘开门！开门！’嗓子都叫得嘶哑了。

“我看到巴勃罗又跟神父说话，神父不答理。接着我看到巴勃罗取下肩上的猎枪，用枪戳戳神父的肩膀。神父没理睬他，我看到巴勃罗摇摇头。接着他扭回头去对‘四指头’说话；‘四指头’对那些看守说了几句，于是他们都站起来走到房间另一头，提枪站在那里。

“我看到巴勃罗吩咐了‘四指头’几句话，他就掀翻了两张桌子和几条长凳，看守们提着猎枪站在桌凳背后。他们在房间的那

一角搭成一道屏障。巴勃罗探过身去，又用猎枪戳戳神父的肩膀，神父一点不理睬他；不过我看到，别人都在专心一意地祷告，堂·佩贝却望着巴勃罗。巴勃罗摇摇头，看到堂·佩贝在望自己，就对堂·佩贝摇摇头，举起手来，让他看看手里的钥匙。堂·佩贝会意，就垂下头去，开始飞快地祷告。

“巴勃罗两腿一晃，从桌上跳下来，绕过桌子，走向长会议桌后面讲台上那把镇长的大座椅。他坐在椅子上，卷了一支烟，一直盯着那些和神父一起祷告的法西斯分子。你根本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他面前桌上放着那把钥匙。那是一把一英尺多长的大铁钥匙。巴勃罗接着对看守们喊了几句话，我没听出来，只见一个看守朝大门走去。我看出大家祷告得越来越快，我知道他们现在全明白了。

“巴勃罗对神父说了些什么，但神父不管理。于是巴勃罗向前弯下身体，捡起钥匙，顺手扔给门边的看守。看守接住钥匙，巴勃罗对他笑笑。看守把钥匙插进门锁，转动一下，猛地把门向后拉开，自己躲在门后，让那伙暴民冲进去。

“我看见他们冲了进去，正在这时，和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醉汉大叫了，‘噯唷！噯唷！噯唷！’他探出了脑袋，弄得我没法看了，他接着又大叫，‘杀掉他们！杀掉他们！用棍子揍他们！杀掉他们！’他用双臂把我推到一边，我啥也见不到了。

“我用胳膊肘捅了下他的肚子，说，‘醉鬼，这是谁的椅子？让我看。’

“但他只顾用双手双臂不停地捶打着窗铁栅，一面大叫，‘杀掉他们！用棍子揍他们！用棍子揍他们！对啦。用棍子揍他们呀！杀掉他们！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我用胳膊肘狠狠撞他，说，‘你这个王八蛋！醉鬼！让我

看呀。’

“他双手搁在我头上，把我按下去，自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他把全身重量全压在我头上，不停地大叫，‘用棍子揍他们！对啦。用棍子揍他们呀！’

“‘揍你自己吧，’我说，猛撞他最不经打的部位；这下子够他受的，他把两手从我脑袋上松开，捂着自己的小肚子，说道，‘太太，你可不能这么干啊。’这时，我从铁栅中望去，只见厅里一片混乱，大家用棍棒连枷乱打，用已经折断尖齿、被血沾红的白木草叉戳刺，推搡。厅里到处在打人，而巴勃罗坐在大椅子上观看着，膝盖上搁着他那支猎枪。人们在叫喊，挥舞棍棒草叉，被打的人尖叫着，象马儿遇火受惊时的嘶鸣。我看到那神父撩起了袍子，想爬上一条长凳，追他的人用镰刀和镰钩砍他，接着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袍子，只听得接连两声尖叫，我看到两个人用镰刀砍他的背脊，另一个人拉住他的袍子边，神父举起手臂，他死命抱住一把椅子的靠背，正在这时候，我站的椅子坍了，那醉汉和我一起跌倒在带着泼翻的酒和呕吐物的臭气的石板地上。醉汉拿手指点着我说，‘你可不能这样干，太太，可不能这样干。你把我害苦啦。’人们踩在我和他身上，争先恐后拥进镇公所大厅，我眼前只见跨进门的腿儿，那醉汉坐在我对面，用手捧住被我撞痛的地方。

“我们镇上杀法西斯分子的经过就到此结束了，幸亏后面的事我没有见到，但要不是那个醉鬼捣乱，我准能从头看到尾。这可要谢谢他了，因为见了镇公所里的惨况会叫人难受的。

“可是那另一个醉汉更是古怪。椅子坍了，我们爬了起来，人们仍旧不断涌进镇公所，这时候，我见到广场上那个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又在堂·安纳斯塔西奥尸体上浇什么东西。他

的脑袋左摇右晃的，身体也坐不直，可是他在浇什么，划火柴，接着又浇，又划火柴，我走到他身边问，‘你在干什么，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没啥，太太，没啥，’他说。‘别管我。’

“大概是因为我站在那儿，我的腿挡住了风，火柴才点着了，一道蓝色的火焰沿着堂·安纳斯塔西奥外衣的肩部烧起来了，直烧到他的颈背，那醉汉抬起头扯高了嗓门大喊，‘有人在烧死人啦！有人在烧死人啦！’

“‘谁？’有人说。

“‘在哪里？’另一个大叫。

“‘在这里，’那醉汉狂叫。‘就在这里！’

“有人用连枷朝他脑瓜边上猛砸一下，他仰天跌倒在地上，还抬眼望望揍他的那个人，然后闭上眼睛，双手交叉搁在胸口，躺在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好象睡熟了。那人没再揍他，他就躺在那里。当天晚上打扫镇公所之后，人们抬起堂·安纳斯塔西奥，把他和别的尸体一起装上大车，拖到峭壁边把他们全扔了下去，那醉汉仍旧躺在老地方。如果把这二三十个醉汉也扔下去，尤其是那些围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那么这小镇就会更太平啦。如果我们再闹一次革命，我看，一开头就得把这种人搞掉。不过，当时我们还不不懂这一点。我们后来就得到了教训。

“可是，那天晚上我们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镇公所大屠杀之后，不再杀人了，不过我们当晚没法开会，因为醉汉太多了。没法维持秩序，会议只好推迟到第二天开。

“那天晚上我跟巴勃罗睡觉。这话我不该对你说，漂亮的姑娘，不过，另一方面，让你什么都知道知道也好，至少我对你讲的都是真话。听着，英国人。这回事很古怪。

“我说呀，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感到情况很古怪。好象经过了一场暴风雨，一场水灾，或者一场战斗，大家都累了，谁也不多说话。我自己觉得空空洞洞，身体不好受，感到丢人缺德，心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有一种倒霉的预感，就象今天早上飞机过后的心情。不出所料，倒霉事三天之后就来了。

“巴勃罗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很少说话。

“‘刚才的事你喜欢吗，比拉尔？’他终于问道，嘴里塞满了烤小羊肉。我们在公共汽车起点站那儿的一家小客栈里吃饭，里面挤满了人，大家在唱歌，挤得端菜端汤也有困难。

“‘不，’我说。‘除了对待堂·福斯蒂诺的那一段，别的我都不喜欢。’

“‘我可喜欢，’他说。

“‘全部吗？’我问他。

“‘全部，’他说，还用刀切了一大片面包，用它去蘸抹盘子里的肉汁。‘除了那个神父的情况，一切都好。’

“‘神父的情况你不喜欢吗？’因为我知道，他恨神父比恨法西斯分子还厉害。

“‘他叫我大失所望，’巴勃罗伤心地说。

“唱歌的人太多了，我们几乎要喊叫，才听得清彼此讲的话。

“‘为什么？’

“‘他死得非常窝囊，’巴勃罗说。‘他一点也不体面。’

“‘暴民在追他，你哪能指望他体面呢？’我说。‘依我看，在这之前，他一直很体面。世上的体面他享尽了。’

“‘对，’巴勃罗说。‘不过到了最后关头，他怕啦。’

“‘谁能不怕？’我说。‘人们拿着什么东西在追他，你看见没有？’

“‘我怎么会看不见?’巴勃罗说。‘不过我觉得他死得窝囊。’

“‘碰到这种情形,谁都会死得窝囊,’我对他说。‘你指望什么呀?镇公所里发生的每件事都叫人厌恶。’

“‘是的,’巴勃罗说。‘没有一点组织。不过神父是另一回事。他该做出榜样。’

“‘我以前以为你恨神父。’

“‘不错,’巴勃罗说着又切了块面包。‘不过,西班牙神父不同,西班牙神父应该死得漂亮。’

“‘我看他死得够漂亮的,’我说。‘一点仪式都没有。’

“‘不,’巴勃罗说。‘我觉得他叫人大失所望。我整天在等那神父死。我原以为他会最后走进那两排人中间去的。我满心希望地等着。我等着出现高潮的场面。我从没见过神父是怎么死的。’

“‘机会有的是呢,’我挖苦他说。‘革命今天刚开头。’

“‘不,’他说。‘我失望了。’

“‘得了,’我说。‘我看你要失去信仰了。’

“‘你不懂,比拉尔,’他说。‘他是个西班牙神父呀。’

“‘西班牙人是多好的人民啊,’我对他说。‘他们的自尊心多么强,呃,英国人?多好的人民啊。’

“‘我们得走了,’罗伯特·乔丹说。他望望太阳。‘快到中午了。’

“‘好吧,’比拉尔说。‘我们现在走吧。不过我要跟你讲讲巴勃罗。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比拉尔,今晚我们什么都不干了。’

“‘好,’我对他说。‘这叫我高兴。’

“‘我觉得,杀了那么多人之后,干那不合适。’

“‘什么话，’我对他说。‘你成了圣徒啦。我和斗牛士待了那么多年，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斗牛之后的心境吗？’

“‘真的吗，比拉尔？’他问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对他说。

“‘真的，比拉尔，今晚我不中用啦。你不怪我吧？’

“‘不，伙计，’我对他说。‘可是别天天杀人呀，巴勃罗。’

“那天晚上，他睡得象个小孩，等早晨天亮了，我才把他叫醒。不过那晚我睡不着，就爬起身来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我看到白天那两排人站队的广场如今浸在月光里，看到广场对面在月光下闪烁的树和黑魑魑的树荫，在月光下泛白的长凳和闪亮着的散布在地上的酒瓶，以及法西斯分子在那儿被扔进江里的峭壁边沿。夜晚静悄悄，只听到潺潺的喷泉声，我坐着想，我们开头就干糟了。

“窗开着，广场上喷泉那儿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我光着脚走到露台上，站在地上铺着的铁板上，月光照在广场边所有房屋的墙面上。哭声是从堂·吉列尔莫家露台上传来的。那是堂·吉列尔莫的老婆，她跪在露台上哭。

“我随即回到房里，坐在那里不想动脑子，因为直到另一天来到之前，我这辈子从没那么不痛快过。”

“另一天是怎么回事？”玛丽亚问。

“那是三天后，法西斯分子占领这个镇的时候。”

“别说那天的情形了，”玛丽亚说。“我不要听了。够啦。叫人太难受了。”

“我早对你说你不该听，”比拉尔说。“瞧。我不希望你听。现在你要做恶梦啦。”

“不，”玛丽亚说。“不过我不要再听了。”

“我倒希望你以后有机会给我讲讲，”罗伯特·乔丹说。

“我一定讲，”比拉尔说。“不过玛丽亚受不了。”

“我不要听，”玛丽亚可怜巴巴地说。“求求你，比拉尔。我在场的时候别讲，因为我会忍不住要听的。”

她的嘴唇在抖动，罗伯特·乔丹发觉她要哭了。

“求求你，比拉尔，别讲了。”

“别发愁，短头发的小东西，”比拉尔说。“别发愁。不过我以后要讲给英国人听。”

“可我要常跟他在一起，”玛丽亚说。“啊，比拉尔，你干脆别讲了。”

“以后等你干活的时候，我讲。”

“不。不。求求你。千万别讲了，”玛丽亚说。

“既然我讲了我们干的事，讲讲他们干的事也是应该的，”比拉尔说。“不过，不会让你听到的。”

“难道没有愉快的事情可讲了吗？”玛丽亚说。“我们老是得讲骇人的事吗？”

“今天下午，”比拉尔说，“让你和英国人在一起。你们俩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

“那么但愿下午快点到来，”玛丽亚说。“下午快地来吧。”

“会来的，”比拉尔对她说。“会快地来的，同样也会快地去的，明天也会快来快去的。”

“今天下午，”玛丽亚说。“今天下午。让今天下午快来吧。”

第十一章

他们从高山坡上的草地笔直朝下走进树木葱茏的山谷，再爬上一条和小溪平行的山路，随即在松树的浓荫里弃路登上一个陡峭的圆山顶，这时，只见一个手握卡宾枪的男人从一棵树后闪出来。

“站住，”他说，接着说，“是你，比拉尔。跟你一起的是谁？”

“一个英国人，”比拉尔说。“不过倒有个天主教的教名——罗伯托。到这里的路真他妈的陡。”

“你好吗，同志？”哨兵对罗伯特·乔丹说，伸出手来。

“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呢？”

“也好，”那哨兵说。这个人很年轻，身材又小又瘦，长着很高的鹰钩鼻，高颧骨，灰眼睛。他没戴帽子，头发粗浓漆黑，握手有力而友好。他的眼神也是友好的。

“喂，玛丽亚，”他对那姑娘说。“你没有累坏吗？”

“什么话，华金！”姑娘说。“我们坐着聊天的时间比走路的时间长。”

“你就是爆破手吗？”华金问。“我们听说你来这里了。”

“我们在巴勃罗那儿过的夜，”罗伯特·乔丹说。“对，我就是爆破手。”

“很高兴见到你，”华金说。“准备炸火车吗？”

“上次炸火车你在吗？”罗伯特·乔丹微笑着问。

“怎么不在！”华金说。“我们就是在那里把她收下的，”他对玛丽亚露齿笑笑。“你现在长得漂亮了，”他对玛丽亚说。“人家

对你说过，你有多漂亮吗？”

“算了，华金，谢谢你，”玛丽亚说。“你剃了头也满漂亮的。”

“是我背你的，”华金对姑娘说。“我把你背在肩上。”

“好多人都背过，”比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哪个没背过她？老头子在哪儿？”

“在营地。”

“昨晚他在哪里？”

“在塞哥维亚。”

“他带来了消息吗？”

“带来了，”华金说。“有消息。”

“好的还是坏的？”

“我看是坏的。”

“你看到飞机没有？”

“唉，”华金摇摇头说。“甬提啦。爆破手同志，那些是什么飞机？”

“海因克尔 111 型轰炸机。海因克尔和菲亚特驱逐机，”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那些低机翼的大飞机是什么飞机？”

“海因克尔 111 型。”

“管它叫什么名字，反正一样糟，”华金说。“我在耽搁你们的时间了，我带你们到司令那儿去。”

“司令？”比拉尔问。

华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我喜欢叫司令，不喜欢叫‘头目’，”他说。“叫司令更富有部队的气派。”

“你越来越军事化了，”比拉尔取笑他说。

“不，”华金说。“不过我喜欢军事术语，可以使命令更明确，

纪律更严明。”

“这里有个配你胃口的小伙子，英国人，”比拉尔说。“很认真的小伙子。”

“我背你好吗？”华金问姑娘，并把手放在她肩上，冲着她微笑。

“背过一次就够啦，”玛丽亚对他说。“不过还是谢谢你。”

“你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华金问她。

“我记得有人背我，”玛丽亚说。“你背我，记不得了。我记得那吉普赛人，因为他好几次把我扔下了。可是我要谢谢你，华金，以后有机会我来背你。”

“我还记得很清楚，”华金说。“我记得，抓住了你两条腿，你肚子贴在我肩上，你的头和两条手臂垂在我背后。”

“你的记性不错，”玛丽亚对他笑着说。“我一点也记不得了。你的手臂啦，肩膀啦，背啦，我全记不得了。”

“你想知道一件事吗？”华金问她。

“什么事？”

“我高兴的是，当时子弹是从我们背后打来的，你的身体正好挡住了我的背。”

“你这个畜生，”玛丽亚说。“吉普赛人背了我好久，难道也是这个原因？”

“也是这个原因，并且还因为可以抱住你的大腿。”

“这就是我的英雄们，”玛丽亚说，“我的救命恩人！”

“听着，漂亮的姑娘，”比拉尔对她说。“这小伙子背了你好长时间，在那个关头，对你的大腿谁都不会动心。那时候只听到噓噓的子弹声。要是把你扔下，他早就能跑出子弹的射程了。”

“我谢过他了，”玛丽亚说。“我以后一定也背背他。让我们

说说笑话吧。我总不应该为了他背过我而哭吧，是不是？”

“我原想把你扔下的，”华金继续逗她。“可是我怕比拉尔枪毙我。”

“我没枪毙过人，”比拉尔说。

“没有枪毙的必要，”华金对她说。“你一开口就能把人吓死。”

“油嘴滑舌，”比拉尔对他说。“你以前一直是个懂规矩的小伙子。革命前你干什么，孩子？”

“不干什么，”华金说。“我那时只有十六岁。”

“究竟干些什么？”

“时不时摆弄摆弄几双皮鞋。”

“做皮鞋吗？”

“不。擦皮鞋。”

“什么话，”比拉尔说。“不止是擦皮鞋吧。”她望着他那棕色的脸，矫健的身材，蓬乱的头发和那敏捷的步伐。“你干吗不干了？”

“不干什么？”

“什么？你自己知道什么。你现在已经在留头发好扎斗牛士的小辫啦。”

“我看是害怕的缘故，”小伙子说。

“你身材不错，”比拉尔对他说。“只是相貌平常一些。那么是由于害怕，是吗？炸火车的时候，你干得不坏嘛。”

“我现在不怕牛了，”那小伙子说。“随便哪一头都不怕了。比牛凶得多、危险得多的东西，我们都见过了。当然，哪头牛都比不上机关枪危险。不过，要是现在上斗牛场去斗牛，我不知道两条腿还打不打哆嗦。”

“他原想当斗牛士，”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讲。“不过他害怕。”

“你喜欢看斗牛吗，爆破手同志？”华金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喜欢。”

“你在瓦利阿多里德看过斗牛吗？”华金问。

“看过。在九月份的节期内。”

“那是我家乡，”华金说。“我的家乡多好呀，可是城里那些善良的乡亲在这次战争中吃了多少苦啊。”他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他们在那里枪杀了我爹，我妈，我姐夫，后来又杀了我姐姐。”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罗伯特·乔丹说。

这种话他听过多少次啦？他多少次看到人们难受地说着这种话？他多少次见到人们满眶泪水、哽着喉咙、难受地讲到“我爹，我兄弟，我妈，或者我姐妹”？听人们这样讲到死去的亲人，他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人们讲的几乎总和现在这个小伙子讲的一样；一提起家乡，就一下子讲开了，而你呢，总是这么一句话：“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你只不过听人们提起家人丧亡罢了。你没看到他们的父亲死去，不象比拉尔在小溪边向他描述法西斯分子死去的情景那样生动，就象亲眼看见似的。你知道那父亲死在某个院子里，某堵墙脚下，某片地里或果园里，或者晚上死在某条公路边的卡车灯光下。你从山里望见那卡车的灯光，听见了枪声，后来你来到公路上，发现了尸体。你没见到那母亲、姐妹或兄弟被枪杀。你听说过；你听到过枪声；你见过尸体。

比拉尔使他看到了那镇上杀人的情景。

要是这女人能写作就好了。他要把这些事写出来，假如他运气好，能记住，他也许能照她讲的写出来。天哪，她真会讲故事。他想，她比大诗人克维多还出色哪。克维多从没象她那样生动地描写过堂·福斯蒂诺之死。他想，但愿我能写得好，把那个故事写出来。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写出来。不是写人家对我们干的事。那方面他很了解。战线后方的这一类情况，他知道得很多。但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你必须了解他们原来在村里是干什么的。

他想，由于我们的流动性，由于我们事后不必留下来遭到报复，我们不知道事后到底怎么样。你跟一个农民和他家人待在一起。你夜里来了，跟他们一起吃饭。白天，你躲起来，第二天夜里你就走了。你完成了任务一走了事。下一次你又照老样子来了，听说这些人已被枪杀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被枪杀时，你总是不在场。游击队搞了破坏，撤退了。农民留下来遭到报复。我老是只了解一个方面，他想。了解开头时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我老是了解到了，感到憎恨，我听到人们厚颜无耻而使人害臊地提到它，夸夸其谈，强词夺理，辩解，否认。可是这该死的女人使我看到啦，就象我当时也在场一样。

唉，他想，这是一个人的教育的一部分啊。经历了战争，真能长不少见识。要是你注意倾听，在这场战争中能学到不少东西。你肯定能学到。幸亏战前十年他断断续续在西班牙待过不少日子。主要是由于你会讲西班牙话，他们就信赖你。你完全掌握这种语言，讲得满地道，又了解不同地方的情形，他们就信赖你。说到头，西班牙人只真正忠于自己的家乡。当然，首先是西班牙，然后是他的种族，他的省份，他的村镇，他的家庭，最后是他的行业。如果你会西班牙话，他就偏爱你，如果你了解他的省

份，那就更好，不过，如果你了解他的村镇和行业，你这个外国佬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他在西班牙从来不觉得自己象个外国人，他们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把他当外国人看待；除了在他们反对你的时候。

他们当然会反对你。他们常常反对你，但是他们也反对别人。他们连自己都反对。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两个人会联合起来反对第三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开始相互拆台。不总是这样，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使你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足以由此得出这个结论。

可不该这样想啊；但指责他这种想法的是谁呢？谁也没有，只有他自己。他不能老往失败方面想。首要的事是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如果打不赢这场战争，一切都完了。但是他注意观察、留心倾听，并记住一切。他在一场战争中服役，在这服役期间，他绝对忠诚并且尽可能好地完成任任务。可是谁也占有不了他的心灵，或者他的观察和听取的能力，如果他打算作出判断，那是将来的事。作出判断所根据的材料是不会少的。已经有了许多啦。有时候，未免多了一点。

瞧这个叫比拉尔的女人吧，他想。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叫她讲完那个故事。瞧她在那两个年青人旁边走路的样子。你再也找不到比他们三人更好看的西班牙儿女了。她象座山，这青年和姑娘象两棵小树。老树全被砍倒了，小树在茁壮成长。尽管这对年青人遭到过厄运，他们还是显得那么清新、干净、纯洁、完整，仿佛从来也没听到过灾难这种事情似的。可是，听比拉尔的口气，玛丽亚才开始康复。她当初一定情况很糟糕。

他记得十一旅有个比利时小伙子，是和村里另外五个青年

一起入伍的。村里人口大约有两百人，这小伙子以前从没离开过家乡。当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在汉斯旅^①旅部看到他的时候，同村另外五个人全都牺牲了，那小伙子失魂落魄的，他们让他当勤务兵，在旅部伺候开饭。他长着一张白里透红的佛兰芒人^②的大脸，和一双农民的粗大的手，他端着盘碟走动的样子就象拖车的马儿那样地使劲而笨拙。可是他哭个没完。吃饭时他不出声地一直在哭。

你抬头就看到他在哭。你要酒，他哭；你递过盘子要炖肉，他扭过脑袋哭。他也会停住，但要是你抬头朝他一望，他眼泪就又涌出来了。上菜间歇时间，他在厨房里哭。大家都体谅他。但这没用。他要弄明白自己会怎么样，能不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是不是再适于当兵打仗。

玛丽亚现在相当健全。至少她外表看来是这样。可是他不是精神病专家。比拉尔才是精神病专家。昨晚一起过夜对他俩也许是好的。是啊，除非就到此结束了。这对他当然是好的。他今天觉得舒畅、身体健康、无忧无虑、精神愉快。这件事开头显得很糟糕，不过他的运气也够好的。他以前也遇到过表现很糟糕的事情。表现很糟糕，那是用西班牙语思考的说法。玛丽亚是可爱的。

瞧她，他对自己说。瞧瞧她。

他瞧着她在阳光下愉快地迈着大步，她的卡其衬衫敞着领子。她走路的样子象匹蹦蹦跳跳的小马，他想。这种事情是不

① 国际纵队由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人士组成，当时共分五个旅。第十一旅主要为德意的流亡者，又名汉斯旅。第十五旅主要为美国和加拿大人，其中的林肯营和华盛顿营作战英勇，最负盛名。

② 佛兰芒人(Flemish)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居该国北部。

容易碰到的。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他想。也许你这是在做梦，或者在异想天开，但是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也许正象你过去那些梦中的情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女人夜里来到你的床上，那么亲切，那么可爱。当他在床上熟睡的时候，他和她们都那样睡过觉。他还记得嘉宝，还有哈罗^①。是啊，有好多次是哈罗。这一回也许就象那些梦吧。

他还记得进攻波索布兰科^②的前夕，嘉宝上他床的情形，他用手臂搂住她，她穿的是一件柔软光滑的羊毛衫，当她俯身向前的时候，她的头发披在前面，拂在他脸上；她说，她一直爱着他，而他为什么从没向她倾诉过爱情？她并不腼腆、冷漠、可望而不可即。她就是可爱得叫人想搂抱，亲切而可爱，就象当年和约翰·吉尔伯特一起时的模样^③，这情景逼真得仿佛真有其事。他对她的爱情远远超过了对哈罗的爱情，虽然嘉宝只梦见过一次，而哈罗——现在这一回也许就象那些梦吧。

现在也许并不是梦，他对自己说。我现在伸出手去也许能碰到玛丽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不敢这么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怕的是发现这回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是假的，是你自己异想天开，正如梦中出现的那些电影明星，还有你以前所有的女朋友，都回来了，晚上钻在睡袋里，躺在没铺垫的地板上，在于草仓的稻草堆、马厩、马栏、农舍、树林、车库、卡车和西班牙的群山里。当他熟睡的时候，她们都到那条睡袋里来啦，比她们本来的

① 格兰泰·嘉宝和琴·哈罗都是三十年代好莱坞的红女星。

② 波索布兰科(Pozoblanco)在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省，内战初期乔丹在南方前线参加战斗。

③ 嘉宝曾和男明星约翰·吉尔伯特主演过《肉体与恶魔》(1927)和《琼宫恨史》(1933)等爱情片。

面貌要漂亮得多。也许这一回也是这么回事。也许你不敢碰她，来证明是不是真的。也许你敢，但这很可能是你异想天开或者是梦中的情景吧。

他一步跨过山路，把手放在那姑娘的胳膊上。他的手指感觉到她那件旧卡其衬衫里面光滑的臂膀。她对他望望，笑了。

“喂，玛丽亚，”他说。

“喂，英国人，”她回答。他看着她棕褐色的脸，灰黄色的眼睛，带着笑意的丰满的嘴唇，和短短的、金褐色的头发。她抬起脸来望着他，瞅着他的眼睛微笑。这是真的，一点也不错。

这时他们能望到松林尽头“聋子”的营地了，那是峡谷的尽头处，是个圆形的凹地，象只朝天的脸盆。他想，这些石灰岩的盆形高地一定多的是岩洞。前面就有两个岩洞。长在岩石上的矮树丛把这两个岩洞隐蔽得很好。这地方和巴勃罗那里差不多，甚至更好。

“你家里人怎么会被枪杀的？”比拉尔在对华金说话。

“别谈啦，大娘，”华金说。“我家里人跟瓦利阿多里德许多人一样，都是左派。法西斯分子血洗我家乡的时候，先枪杀了我爹。他投过社会党的票。然后杀了我妈。她也投过社会党的票。她一辈子还是第一次投票。后来，他们杀了我的一个姐夫。他是电车司机辛迪加的会员。很清楚，他不参加辛迪加就不能开电车。不过，他是不问政治的。我很了解他。他甚至有点不知廉耻。我看他也算不上一个好同志。后来，另一个姐夫，也是在电车上干活的，象我一样到山里去了。他们以为我姐姐知道他的去向。其实她不知道。他们就把她枪杀了，理由是我姐姐不肯告诉他们我姐夫在哪里。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比拉尔说。“‘聋子’在哪儿？我看不

见他。”

“他在这里。可能在山洞里，”华金回答。他站停了，把步枪托支在地上，说道，“比拉尔，听我说。还有你，玛丽亚。要是我讲了我家的事情使你们不好受，你们得原谅我。我知道大家都有同样的伤心事，最好还是别提起。”

“你应该讲，”比拉尔说。“如果我们不能互相帮助，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吗？光听不说也算不上帮助。”

“可是这会使玛丽亚心里难受。她自己的不幸已经够她受了。”

“哪里的话，”玛丽亚说。“我的不幸象只大水桶，你的苦水永远也灌不满它。我很难受，华金，但愿你那位姐姐平安。”

“到目前为止她还好，”华金说。“他们把她下了大牢，看来没怎么虐待她。”

“你家还有别人吗？”罗伯特·乔丹问。

“没啦，”小伙子说。“只剩下了我，没别人了。还有那个到山里去的姐夫，我看他也已经死了。”

“他也许没事，”玛丽亚说。“说不定他和一帮游击队在别的山区。”

“我看他准死了，”华金说。“他的身子一向不大适宜于走南闯北，他是电车售票员，没有受过锻炼，在山里打游击不行。我看他是活不满一年的。他的肺也有点毛病。”

“他可能很好，”玛丽亚用手臂搂住他肩膀。

“是的，姑娘。那当然啦，”华金说。

小伙子站在那里，玛丽亚踮起脚，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一下。华金把头转向一边，因为他在哭。

“我把你当哥哥，”玛丽亚对他说。“我把你当作哥哥那样吻

你。”

小伙子摇摇头，不出声地哭着。

“我是你妹妹，”玛丽亚说。“我爱你，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

“包括这个英国人，”比拉尔声音洪亮地说。“对不对，英国人？”

“对，”罗伯特·乔丹对小伙子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华金。”

“他是你的兄弟，”比拉尔说。“是吗，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搂着小伙子的肩膀。“我们都是兄弟，”他说。小伙子摇摇头。

“我真不该讲出来，”他说。“讲起这种事，叫大家更难受。我真不该叫你们心里难受。”

“去他妈的什么该不该，”比拉尔用她那低沉而悦耳的声音说。“要是玛丽亚再吻你，我也要吻你了。我好多年没有吻过斗牛士，即使象你那样一个不中用的斗牛士，我倒要吻吻一个成了共产党的不中用的斗牛士。抓住他，英国人，好让我好好吻他一下。”

“松手，”小伙子说，转身就躲开。“别管我。我没什么，我不该那样。”

他站在那里，竭力控制脸上的表情。玛丽亚伸手让罗伯特·乔丹握着。这时比拉尔双手叉在腰上，作弄人地望着那小伙子。

“我吻你的时候，”她对他说，“可不会象你姐妹那样。象姐妹那样吻兄弟的把戏我不会。”

“不必开玩笑啦，”小伙子说。“我跟你说我没什么，我说了刚才的话，对不起。”

“好吧，我们去看老头儿吧，”比拉尔说。“这种动感情的事

叫我心烦啦。”

小伙子望望她。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突然变得很伤心。

“不是你的感情，”比拉尔对他说。“是我自己的。你这个人太脆弱，当不了斗牛士。”

“我本来就没有当成，”华金说。“你何必老是讲个没完呢。”

“可是你又在留斗牛士的发辫了。”

“是呀，那又有什么不好？从经济上来说，斗牛最有利。它使许多人有机会就业，国家可以进行管理。现在我也许不害怕了。”

“不见得，”比拉尔说。“不见得。”

“你说话干吗那么损人，比拉尔？”玛丽亚对她说。“我非常爱你，可是你太不近人情。”

“可能不近人情，”比拉尔说。“听着，英国人。你要跟‘聋子’说些什么，心里有数吗？”

“有数。”

“因为他这人话不多，不象我和你，不象这些爱动感情的小家伙。”

“你干吗这样说？”玛丽亚生气地又问。

“我不知道，”比拉尔大踏步走着说。“你干吗这样想？”

“我不知道。”

“有时候，很多原因使我厌烦，”比拉尔气愤地说。“你懂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年纪到了四十八。我的话你听到吗？四十八岁，一张丑脸。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开玩笑说要吻这个有共产党倾向的没有成材的斗牛士的时候，他脸上显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这话说得不对，比拉尔，”小伙子说。“你没看到惊慌。”

“什么话，你在说假话。你们全是王八蛋。噢，他来了。喂，圣地亚哥！你好吗？”

比拉尔招呼的是个矮墩墩的汉子，棕色脸盘，高颧骨，灰头发，黄褐色的眼睛分得很开，长着一个象印第安人那样的狭鼻梁的鹰钩鼻，一张阔嘴，上唇又长又薄。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他迈着罗圈腿，这和他穿的牧牛人的马裤和马靴是相称的，从山洞口向他们迎来。天气很暖和，但他穿了件羊毛衬里的皮短外套，钮扣直扣到脖子。他向比拉尔伸出一只褐色大手。“你好，太太，”他说。他向罗伯特·乔丹也打了招呼，还和他握握手，定睛望着他的脸。罗伯特·乔丹看到他眼睛象猫眼睛那样黄，象爬虫的眼睛那样呆滞。“漂亮的姑娘，”他招呼玛丽亚，并拍拍她的肩膀。

“吃了？”他问比拉尔。她摇摇头。

“来吃吧，”他说，对罗伯特·乔丹望着。“喝酒？”他问，一边伸出大拇指，做了个朝下斟酒的手势。

“喝，谢谢。”

“好，”“聋子”说。“威士忌？”

“你有威士忌？”

“聋子”点点头。“英国人？”他问。“不是俄国人？”

“美国人。”

“这里美洲人^①很少，”他说。

“现在多起来了。”

“不坏。北美还是南美？”

“北美。”

① 西班牙语中Americano一词和英语中一样，可作“美国人”或“美洲人”解。

“和英国人一样^①。哪时炸桥？”

“你知道桥的事吗？”

“聋子”点点头。

“后天早晨。”

“好，”“聋子”说。

“巴勃罗呢？”他问比拉尔。

她摇摇头。“聋子”咧嘴笑了。

“走开，”他对玛丽亚说，又咧嘴笑了。“回来，”他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一块系在皮带上的大表，望了望。“半小时。”

他做做手势叫他们在一段削平了当作长凳的木头上坐下，然后望望华金，用大拇指猛的指指他们来时走的那条山路。

“我和华金一起遛一会儿再回来，”玛丽亚说。

“聋子”走进山洞，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三个玻璃杯走出来。瓶身上有三个大凹痕的酒瓶挟在一边胳膊窝下，就用那三只手的三个指头夹住了三个杯子，另一只手握住一个陶制水壶的颈口。他把杯子和酒瓶放在那段木头上，水壶放在地上。

“没冰，”他对罗伯特·乔丹说，把酒瓶递给他。

“我不想喝，”比拉尔说着用手蒙住杯口。

“昨晚地上有冰，”“聋子”咧嘴笑着说。“都化了。上面有冰，”他说，指指光秃秃的山顶上露出来的积雪。“太远了。”

罗伯特·乔丹动手替“聋子”斟酒，可是“聋子”摇摇头，做了个手势，让他往自己的杯子里斟。

罗伯特·乔丹在杯子里斟了好些威士忌，“聋子”眼睁睁地瞅着他，等他斟好了，把水壶递给他。罗伯特·乔丹提起水壶，

① 英美同文同种，西班牙老百姓都拿他们当英国人看待。

冷水从陶壶嘴里流出来，灌满了杯子。

“聋子”自己斟了半杯威士忌，再用水加满一杯。

“葡萄酒？”他问比拉尔。

“不。水。”

“喝吧，”他说。“不好，”他对罗伯特·乔丹说，并咧嘴笑笑。

“认识过很多英国人。老是喝很多威士忌。”

“在哪里？”

“牧场上，”“聋子”说。“场主的朋友。”

“你在哪儿搞到威士忌的？”

“什么？”他听不清。

“你得拉开嗓门嚷，”比拉尔说。“对另一个耳朵嚷嚷。”

“聋子”指指自己那个比较好使的耳朵，咧嘴笑笑。

“你在哪儿搞到威士忌的？”罗伯特·乔丹大声说。

“酿的，”“聋子”说，看见罗伯特·乔丹刚要把杯子送近嘴边，却停住了。

“不，”“聋子”拍拍他的肩膀说。“开玩笑。从拉格兰哈弄来的。昨晚听说来了个英国爆破手。好。很高兴。弄到些威士忌。请你喝的。你喜欢？”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说。“这威士忌非常出色。”

“很满意，”“聋子”咧嘴笑了。“今晚有情报。”

“什么情报？”

“很多部队在调动。”

“在哪里？”

“塞哥维亚。你看见飞机了。”

“是呀。”

“不妙，呃？”

“不妙。部队在调动？”

“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塞哥维亚之间很多。在瓦利阿多里德公路上。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圣拉斐尔之间也很多。很多。很多。”

“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准备行动？”

“可能。”

“他们知道。也在准备。”

“可能。”

“干吗不今晚炸桥？”

“命令。”

“谁的命令？”

“总参谋部。”

“喔。”

“炸桥的时间有关系吗？”比拉尔问。

“大有关系。”

“可是，假如他们现在就开来部队呢？”

“我要派安塞尔莫把全部调动和集结的情报送去。他正在守望公路。”

“公路上有你的人？”“聋子”问。

罗伯特·乔丹不知道他听清了多少。对一个聋子你是没法说得准的。

“对，”他说。

“我也派了人。干吗不现在就炸？”

“我听命令。”

“我不喜欢，”“聋子”说。“这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罗伯特·乔丹说。

“聋子”摇摇头，呷了一口威士忌。“你要我干什么？”

“你有多少人？”

“八个。”

“割断电话线，攻击并占领养路工小屋边的哨所，再回过头来向桥靠拢。”

“容易。”

“这些都要写成书面的东西。”

“别费心了。巴勃罗呢？”

“他割断山下的电话线，攻击并占领锯木厂那边的哨所，回过头来向桥靠拢。”

“然后掩护撤退？”比拉尔问。“我们是七个男的，两个女的，五匹马。你们有多少？”她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八个男人，四匹马。马还不够，”他说。

“十七个人，九匹马，”比拉尔说。“还没有算驮东西的牲口呢。”

“聋子”没说什么。

“没法搞到马吗？”罗伯特·乔丹对着那个不太聋的耳朵说。

“打了一年仗，”“聋子”说。“才搞到四匹。”他伸出四个指头。“现在你要八匹明天用。”

“不错，”罗伯特·乔丹说。“你要知道，就快撤走了。不必象原先那样在这一带小心翼翼的。在这里现在不必提心吊胆了。你不能豁出去偷八匹马吗？”

“也许，”“聋子”说。“也许一匹也不行。也许可以搞到更多些。”

“你有自动步枪吗？”他问。

“聋子”点点头。

“在哪里？”

“山上。”

“什么型号？”

“不知道牌子。有子弹盘的。”

“有多少子弹？”

“五盘。”

“有谁会用这支枪吗？”

“我。有点会。不大开。不想在这里弄出太大的声响。不想浪费弹药。”

“我待会看看这支枪，”罗伯特·乔丹说。“你有手榴弹吗？”

“很多。”

“每支步枪有几发子弹？”

“很多。”

“多少？”

“一百五。也许不止。”

“其他小组的情况怎么样？”

“要干什么？”

“在我炸桥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兵力来占领哨所，并掩护那座桥。我们要有比现在大一倍的兵力才行。”

“别愁占领哨所。白天什么时候？”

“拂晓。”

“别愁。”

“我要再加二十个人，做到万无一失，”罗伯特·乔丹说。

“好的没有。不可靠的要不？”

“不要。有多少好的？”

“也许四个。”

“为什么这样少？”

“不可靠。”

“是指要给他们马骑的吗？”

“给马骑的必须很可靠。”

“我想再要十个好的，假如能给我的话。”

“四个。”

“安塞尔莫跟我说，这一带山里有一百多个呢。”

“没好的。”

“你说过有三十个，”罗伯特·乔丹对比拉尔说。“三十个多少比较可靠的。”

“埃利亚斯手下的人怎么样？”比拉尔对“聋子”大声说。他摇摇头。

“没好的。”

“你十个都搞不到吗？”罗伯特·乔丹问。“聋子”用他那呆滞的黄眼睛望望他，摇摇头。

“四个，”他说，伸出四个指头。

“你手下的人好吗？”罗伯特·乔丹问，一出口就懊悔了。

“聋子”点点头。

“要看情况危险不危险，”他用西班牙语说，咧嘴笑笑。“这次行动艰险吧，呃？”

“可能。”

“对我反正一样，”“聋子”直率地说，并不吹牛。“宁要四个好的，不要许多坏的。这次战争中总是坏的多，好的很少。好的一天比一天少。巴勃罗呢？”他望着比拉尔。

“正象你知道的，”比拉尔说，“一天比一天坏。”

“聋子”耸耸肩。

“喝酒呀，”“聋子”对罗伯特·乔丹说。“我带上我和另外四个。一共十二个。今晚我们仔细商量。我有六十包炸药。你要吗？”

“什么成份的？”

“不知道。普通炸药。我带来。”

“我们就用它来炸上游的那座小桥，”罗伯特·乔丹说。“好得很。今晚你下山吗？把炸药带着，好不好？我没得到命令炸小桥，不过也该把它炸掉。”

“今晚我来。然后去弄马。”

“弄到马的希望大不大？”

“说不定。现在吃吧。”

罗伯特·乔丹想，他跟谁说话都是这样简短的吗？还是为了让外国人听懂才这样的呢？

“炸了桥，我们到哪里去？”比拉尔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他耸耸肩。

“一切都得安排好，”那妇人说。

“当然，”“聋子”说。“干吗不？”

“事情很棘手，”比拉尔说。“一切都要很好安排。”

“不错，太太，”“聋子”说。“你愁什么？”

“什么都愁，”比拉尔大声说。

“聋子”咧嘴朝她笑笑。

“你是一直在跟巴勃罗干嘛，”他说。

罗伯特·乔丹想，原来他对外国人才说那种蹩脚西班牙语。好。我高兴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说话了。

“你看我们到哪儿去好？”比拉尔问。

“哪儿？”

“对，哪儿。”

“去处不少，”“聋子”说。“去处不少。你知道格雷多斯山脉吗？”

“那里我们的人很多。人家一旦腾出手来就会扫荡所有这些地方。”

“不错。不过，那地方很大，很荒僻。”

“到那里去很难哪，”比拉尔说。

“样样事情都难，”“聋子”说。“我们去哪儿都行，格雷多斯也去得。昼伏夜行。现在这里很危险。我们能在这里待这么久，真是奇迹。格雷多斯要比这里安全得多。”

“你知道我想到哪里去？”比拉尔问他。

“哪里？帕拉梅拉？那不好。”

“不，”比拉尔说。“不是帕拉梅拉山区。我要到共和国^①去。”

“那办得到。”

“你手下的人愿去吗？”

“愿。只要我开口。”

“我手下的人，我可说不准，”比拉尔说。“巴勃罗不会愿意去，其实他到了那里兴许会觉得安全些。他年纪大了，不用去当兵，除非他们扩大征兵范围。那吉普赛人是不愿去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这里长久以来太平无事，所以他们就看不出危险了，”“聋子”说。

“今天来了飞机，他们会看得清楚一些了，”罗伯特·乔丹

① 指到共和国政府军所管辖的地区去，不愿再待在敌后山区打游击。

说。“但是我看你在格雷多斯山区能干得很出色。”

“什么？”“聋子”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问话的声调一点也不友好。

“你从那里出击更有效，”罗伯特·乔丹说。

“原来如此，”“聋子”说。“你了解格雷多斯吗？”

“了解。你从那里可以袭击铁路干线。就象我们在更南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所干的那样，你可以经常切断铁路。在那里打游击要比回共和国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在那边作用更大。”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对方那两个人都变得脸色阴沉了。

“聋子”望望比拉尔，比拉尔也望望“聋子”。

“你了解格雷多斯吗？”“聋子”问。“真的？”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

“你要到哪里去呢？”

“到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北面去。那些地方要比这里好。可以袭击公路主干线以及贝哈尔和普拉森西亚之间的铁路线。”

“很难，”“聋子”说。

“我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危险得多的地方切断过同一条铁路，”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是谁？”

“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游击队。”

“你们人多吧？”

“大约四十个。”

“那个神经紧张、名字古怪的人就是从那里来的吧？”比拉尔问。

“对。”

“他现在在哪儿？”

“死啦，我对你讲过了。”

“你也是从那里来的？”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比拉尔问他。

罗伯特·乔丹心想：我犯了一个错误啦。我竟对西班牙人说，我们比他们能干，而原则是，决不要提起自己的功绩或能力。本来应该拍拍他们的马屁才是，而我却指点他们应当干这干那，现在他们恼火了。噢，他们可能不会记在心里，也可能会。他们在格雷多斯山区的作用当然要比在这里大得多。证据是，自从卡希金组织炸火车以来，他们在这里毫无成绩。虽然炸火车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一炸使法西斯分子损失了一台机车，死了几个人，可是他们全都把它说得好象那是战争中的高峰。也许他们会感到羞愧而撤退到格雷多斯去。不错，也许我也会在这儿被撵走。反正看起来光景不大妙。

“英国人，你听着，”比拉尔对他说。“你的神经怎么样？”

“很好呀，”罗伯特·乔丹说。“没问题。”

“因为上次他们派来和我们一起干的爆破手虽说是个很棒的专家，却很神经质，所以我问问。”

“我们中间是有神经质的人，”罗伯特·乔丹说。

“我不是说他是胆小鬼，因为他干得很不错，”比拉尔接着说。“可是他说话十分古怪，夸夸其谈。”她提高了嗓门。“上次的那个爆破手，炸火车的那个，有点古怪，圣地亚哥，你说是不？”

“有点古怪，”这聋子点点头，目光在罗伯特·乔丹脸上一扫，那样子，使他想起真空吸尘器那条软管顶端的圆嘴。“对，有点古怪，不过是个好人。”

“他死啦，”罗伯特·乔丹凑着这聋子的耳朵说。

“怎么回事？”这聋子问，目光从罗伯特·乔丹的眼睛移到他的嘴唇上。

“我开枪打死了他，”罗伯特·乔丹说。“他伤势太重，没法赶路，我开枪打死了他。”

“他老是说非要这么干不可，”比拉尔说。“这就是他摆脱不了的念头。”

“是呀，”罗伯特·乔丹说。“他老是说非要这么干不可，这就是他摆脱不了的念头。”

“怎么发生的？”聋子问。“是在炸火车的时候吗？”

“是炸了火车撤退的时候，”罗伯特·乔丹说。“火车炸成了。我们在黑夜里撤退，遇到了法西斯巡逻队，我们奔逃的时候，他背脊的上部挨了一枪，其实没打中骨头，只伤了肩胛。他跑了很长一段路，但伤势使他再也跑不动了。他不愿意留下来，我便开枪打死了他。”

“这样也好，”“聋子”说。

“你能保证你的神经没问题吗？”比拉尔问罗伯特·乔丹。

“能，”他对她说。“我保证自己的神经很健全，而且我认为，等我们炸桥的事了结之后，你们到格雷多斯去是上策。”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女人连珠炮似地臭骂起来，好象温泉突然迸发，一股白花花的热水直朝他身上喷来。

“聋子”对罗伯特·乔丹摇摇头，高兴得咧开嘴笑了。比拉尔骂个没完，他只顾乐得直晃脑袋。罗伯特·乔丹知道，现在又一切顺利了。最后，她住了口，伸手拿起水壶倒水，喝了一口，平静地说：“我们今后怎么干，不关你事，你闭嘴好不好，英国人？你回共和国去，带着你那宝贝，让我们自己来决定要死在这一带山里

什么地方。”

“活在什么地方，”“聋子”说。“你镇静些，比拉尔。”

“活在什么地方，死在什么地方，”比拉尔说。“最后怎样，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喜欢你，英国人，可是别谈等你的事办完之后我们该干些什么。”

“这是你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插手。”

“你插手了，”比拉尔说。“带着你那剃光头的小婊子回共和国去吧，可是你别把人家关在门外，人家又不是外国人，你还在吃娘奶的时候，人家就爱共和国了。”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玛丽亚从山路上回来了，刚好比拉尔又提高了嗓门在对罗伯特·乔丹嚷嚷，最后的一句被她听到了。玛丽亚对罗伯特·乔丹使劲地摇头，还晃着指头警告他。比拉尔看到罗伯特·乔丹望着那姑娘，并看到他在微笑，于是她转身说，“是嘛。我说是婊子嘛，就是婊子。依我看哪，你们会一起去瓦伦西亚，而我们到格雷多斯去吃羊粪。”

“你爱这么说，那我就算婊子吧，比拉尔，”玛丽亚说。“我想，只要是你说的，我算什么都行。不过你镇静些。你怎么啦？”

“没什么，”比拉尔说，在长凳上坐下，她的声音这时平静了，再也听不出那种火星直冒的怒气了。“我不是存心叫你婊子。可是我真想到共和国去。”

“我们可以一起去，”玛丽亚说。

“干吗不可以？”罗伯特·乔丹说。“既然看来你不大喜欢格雷多斯。”

“聋子”咧开嘴对他笑了。

“我们走着瞧吧，”比拉尔说，这时，她的怒气消失了。“给我一杯那种怪酒。我气得喉咙都干啦。我们走着瞧吧。我们看情况

怎样发展吧。”

“你知道，同志，”“聋子”解释说，“难办的是在早晨。”他现在讲的不是那种蹩脚的西班牙语了，他平静而开诚布公地盯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不是搜索或怀疑地，也不是先前那种摆老资格、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目光了。“我懂得你的需要，我知道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拔掉哨所，掩护桥头。这些，我全懂。在拂晓前，或拂晓时，这是容易办到的。”

“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走开一会儿，好吗？”他对玛丽亚说，看都没看她。

姑娘走到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地方坐下，双手抱着脚踝。

“你看，”“聋子”说，“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事后要在大白天撤走，离开这一带，倒是个严重的问题。”

“当然啦，”罗伯特·乔丹说。“我也考虑到了。对我也一样是大白天。”

“可你只是一个人，”“聋子”说。“我们是好几个人。”

“也许可以先回到营地，晚上再撤走，”比拉尔说，把杯子举到唇边，接着又放下来。

“那也很危险，”“聋子”说。“也许更危险。”

“这我能领会得到，”罗伯特·乔丹说。

“晚上炸桥就容易了，”“聋子”说。“可你提的条件是必须在大白天干，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我知道。”

“你不能在晚上干吗？”

“晚上干，我就要被枪毙。”

“你在白天干，我们大家很可能都会送命。”

“对我个人来说，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关系不大，”罗伯

特·乔丹说。“不过我了解你的观点。你不能制订出白天撤退的方案吗？”

“当然能够，”“聋子”说。“我们要想出在这种情况下撤退的方案。不过我要跟你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心事重重，另一个人大发脾气。你说什么到格雷多斯去，好象不过是完成一次军事演习。要是能到得了格雷多斯，那才是奇迹哪。”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听我说吧，”“聋子”说。“我话说了不少。不过多唠叨两句，可以互相了解。我们在这里站住脚跟完全是奇迹。这是法西斯分子懒惰、愚蠢而造成的奇迹，不过，到时候他们是会补救的。当然，我们也非常当心，没有在这一带山里惹麻烦。”

“我知道。”

“可是现在有了炸桥的事，我们就不得不撤走了。我们必须多考虑考虑撤走的方式。”

“完全正确。”

“那么，”“聋子”说，“我们吃东西吧。我的话说得不少了。”

“我从没听你这样唠叨过，”比拉尔说。“是这个原因吗？”她举起杯子。

“不，”“聋子”摇摇头。“不是威士忌的关系。是因为以前从没这么多事可谈的。”

“我感激你的帮助和诚意，”罗伯特·乔丹说。“我理解炸桥时间所引起的困难。”

“别谈这个了，”“聋子”说。“我们在这里尽力而为。不过，这件事不简单。”

“纸上谈兵很简单，”罗伯特·乔丹露齿笑了。“纸上的计划是在开始进攻的同时炸桥，这样可防止公路上有增援通过。纸

上谈兵很简单。”

“那他们也该让我们在纸上行动，”“聋子”说。“让我们在纸上制订方案并贯彻执行。”

“‘纸头是割不出血的’，”罗伯特·乔丹引用了一句谚语。

“可是非常有用，”比拉尔说。“但愿你的命令在纸上能完成。”

“我也这样想，”罗伯特·乔丹说。“可是这样决不会打胜仗。”

“对，”这大个子女人说。“我看不会。不过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吗？”

“到共和国去，”“聋子”说。比拉尔说话的时候，他把他那只不太聋的耳朵凑近她。“你快去啦，太太。但愿我们打胜这一仗，都去共和国。”

“好，”比拉尔说。“看天主面上，我们现在吃吧。”

第十二章

他们饭后离开“聋子”的营地，开始顺着小路下山。“聋子”一直把他们送到半山的岗哨那儿。

“祝你平安，”他说。“今晚见。”

“祝你平安，同志，”罗伯特·乔丹对他说，他们三人就走下山去，“聋子”站着目送他们。玛丽亚转身向他挥挥手，“聋子”以西班牙人的方式，用前臂突然向上一挥，仿佛轻蔑地扔掉一样东西似的，根本不象在行礼，一点儿也不正经。他吃饭时一直没有解开他那件羊皮外套上的钮扣，他十分注意礼貌，注意转过头来听

人说话，又用他那种蹩脚的西班牙语来回答，彬彬有礼地问罗伯特·乔丹关于共和国的情况；但是他显然很想摆脱他们。

他们向他告别的时候，比拉尔对他说：“怎么样，圣地亚哥？”

“噢，没什么，太太，”“聋子”说。“没问题。不过我正在考虑。”

“我也在考虑，”比拉尔说。他们如今穿过松树林，顺着山路轻松地愉快地往下走去。他们刚才就是从这条陡削的山路上费力地走来的。比拉尔这时一句话也不说。罗伯特·乔丹和玛丽亚也不开口，他们三人走得很快，穿过树木丛生的山谷后，山路又变得陡了，朝上穿过一个树林子，直通高坡草地。

那是五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走到最后一段陡峭的山路的中途，那女人停下来了。罗伯特·乔丹停步回头一看，只见她前额上渗着一颗颗汗珠。他发现她棕褐色的脸上失去了血色，皮肤灰黄，眼睛下面有黑圈。

“咱们歇一会儿吧，”他说。“咱们走得太快了。”

“不，”她说。“继续走吧。”

“歇一会儿吧，比拉尔，”玛丽亚说。“你的脸色不好。”

“别说了，”妇人说。“不用你插嘴。”

她拔脚顺着山路向上爬，但是到了顶端，她大口喘着气，脸上全是汗，真是一副病容。

“坐下吧，比拉尔，”玛丽亚说。“求求你，求求你坐下吧。”

“好吧，”比拉尔说，于是他们三人坐在一棵松树下，眺望着高坡草地对面那些矗立在层层山峦之上的高峰，那时刚到下午，峰顶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

“雪这东西真讨厌，可看起来多美呀，”比拉尔说。“雪呀，真叫人看不透。”她转身对玛丽亚。“我刚才对你很粗鲁，对不起，漂亮的姑娘。我不知道今天是怎么搞的。我脾气很不好。”

“你生气时讲的话我从来不在意，”玛丽亚对她说。“再说，你常常生气。”

“不，比生气更糟，”比拉尔说，眺望着对面的山峰。

“你身体不舒服，”玛丽亚说。

“也不是这么回事，”妇人说。“过来，漂亮的姑娘，把脑袋搁在我腿上。”

玛丽亚挨近她，伸出双臂，交迭起来，象人们不用枕头睡觉那样，就用双臂枕着脑袋躺下来。她把脸转过来，仰望着比拉尔，对她微笑，那个大个子女人可仍然凝望着草地对面的群山。她并不低头来看姑娘，只抚摸着姑娘的头，用一个粗大的手指从姑娘的前额上摸过去，然后沿着耳朵边向下一直摸到她脖子上的头发根。

“过一会儿，她就是你的了，英国人，”她说。罗伯特·乔丹正坐在她背后。

“别这么说，”玛丽亚说。

“是呀，他可以占有你，”比拉尔说，对他们俩谁都不看。“我从来不想要你。不过我感到妒忌。”

“比拉尔，”玛丽亚说。“别这么说。”

“他可以占有你，”比拉尔说，指头沿着姑娘的耳垂边摸着。“不过我非常妒忌。”

“可是比拉尔，”玛丽亚说，“你我之间不会有那种情形，这是你自己对我讲的。”

“那种情形总是有的，”妇人说。“那种情形照说不该有，但终究难免会有的。不过，我倒没这种心情。真的没有。我要你幸福，只要你幸福。”

玛丽亚没说什么，只是躺在那里，尽量使自己的头轻轻地搁

在她腿上。

“听着，漂亮的姑娘，”比拉尔说，一边心不在焉地用指头抚摸着她的腮帮。“听着，漂亮的姑娘，我爱你，可是他才能占有你，我不是搞同性恋爱的，而只是个为男人而生的女人。这是真话。但是，我现在大白天里把这种话说出来，说我爱你，我心里是舒畅的。”

“我也爱你。”

“什么话。别胡说八道。你根本不懂我是什么意思。”

“我懂。”

“你懂什么！你是配英国人的。这一看就知道，也该这样。我就是希望这样。不这样，我就不高兴。我不搞不正常的性行为。我只不过把真心话告诉你。对你说真心话的人不多，女人根本没有。我感到妒忌，说了出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说了。”

“别说出来，”玛丽亚说。“别说出来，比拉尔。”

“为什么不说？”妇人说，还是不看他们俩。“我要说，直到不想说为止。还有，”这时，她低头望着姑娘，“好时光已经到啦。我不多说了，你懂吗？”

“比拉尔，”玛丽亚说。“别这么说。”

“你是只挺讨人喜欢的小兔子，”比拉尔说。“现在你把头抬起来，因为蠢话已经说完啦。”

“不蠢，”玛丽亚说。“再说，我的头搁在这里很好。”

“不。抬起头来，”比拉尔对她说，把自己那双大手枕在姑娘脑后，把她的头抬起来。“你怎么不开口，英国人？”她说，仍然托着姑娘的头，一边眺望着对面的群山。“难道你的舌头给猫叼走啦？”

“不是猫，”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是什么野兽叼了？”她把姑娘的头放在地上。

“不是野兽，”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那你自己吞掉了，呃？”

“我看是吧，”罗伯特·乔丹说。

“那你觉得味儿好吗？”现在比拉尔转身对他露齿笑着。

“不太好。”

“我看也不好，”比拉尔说。“我看就是不好。不过我还是要把你的小兔子还给你。我从来也没想要过你的小兔子。这个名字给她起得好。今天早晨我听到你叫她小兔子。”

罗伯特·乔丹觉得自己的脸红了。

“你这个女人很刻薄，”他对她说。

“不，”比拉尔说。“不过，我是又单纯又复杂。你这个人很复杂吗，英国人？”

“不。不过也不是那么单纯。”

“你这个人叫我高兴，英国人，”比拉尔说。随即她笑了一笑，身体向前倾，又笑着摇摇头。“要是我现在把兔子从你手里抢走，或者把你从兔子手里抢走，怎么办？”

“你办不到。”

“这我知道，”比拉尔说着又笑了。“我也不想这样做。不过，我年青的时候办得到。”

“这话我相信。”

“你信我的话？”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不过这是废话。”

“这不象是你说的话，”玛丽亚说。

“今天我不太象我原来的样子，”比拉尔说。“简直一点儿不象我自己了。英国人，你的桥叫我头痛。”

“我们就叫它头痛桥吧，”罗伯特·乔丹说。“可是我要叫它象只破鸟笼似地掉在那峡谷里。”

“好，”比拉尔说。“说话该一直这样。”

“我要象你折断一只剥了皮的香蕉似的把它一炸为二。”

“我现在很想吃只香蕉，”比拉尔说。“说下去，英国人。尽管说大话吧。”

“不必啦，”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回营地去吧。”

“你的任务，”比拉尔说，“就在眼前。我说过要让你俩一起呆一会儿。”

“不。我有不少事要做。”

“那也是事呀，花不了很长时间。”

“闭上你的嘴，比拉尔，”玛丽亚说。“你说得太过分了。”

“我过分，”比拉尔说。“可我也很体贴人呢。我要让你们俩在一起了。妒忌的话是胡扯。我恼恨华金，因为我从他神色上看出来我是多么丑。叫我妒忌的只是你才十九岁。这种妒忌不会长的。你不会老是十九岁的。现在我走了。”

她站起来，一手插在腰上，望着罗伯特·乔丹，他呢，也站起来了。玛丽亚坐在树下，头垂在胸前。

“我们大家一起回营地去吧，”罗伯特·乔丹说。“这样好些，有不少事情要做哪。”

比拉尔朝玛丽亚点点头，玛丽亚坐在那里没说什么，头转向别处。

比拉尔笑笑，差不多使人觉察不到地耸耸肩膀，还说，“你们认得路吗？”

“我认得，”玛丽亚仍然低了头说。

“那我走了，”比拉尔说。“我们要给你多准备些好吃的，英

国人。”

她开始走进草地上的石南树丛，朝通向营地的小河走去。

“等等，”罗伯特·乔丹喊她。“我们还是一起走好。”

玛丽亚坐在那里不作声。

比拉尔没转身。

“一起走，没事的，”她说。“我在营地见你。”

罗伯特·乔丹站在那里。

“她身体没事吗？”他问玛丽亚。“她刚才看来病了。”

“让她走，”玛丽亚说，仍然低着头。

“我看我应该跟她一起走。”

“让她走，”玛丽亚说。“让她一个人走！”

第十三章

他们在山间草地的石南丛中走着，罗伯特·乔丹感到石南的枝叶擦着他的腿，感到枪套里沉甸甸的手枪贴着自己的大腿，感到阳光晒在自己头上，感到从积雪的山峰上来的风吹在背上凉飕飕的，感到手里握着的姑娘的手结实而有力，手指扣着他的手指。由于她的掌心贴在他的掌心上，由于手指扣在一起，由于她的手腕和他的手腕交在一起，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从她的手、手指和手腕传到了他的手、手指和手腕上，这种感觉就象海上飘来的第一阵微微吹皱那平静如镜的海面的轻风那么清新，又象羽毛擦过唇边，或者风息全无时飘下一片落叶那么轻柔，只能由他们俩手指的接触才能感觉到，然而这种感觉又由于他们俩相扣的手指、紧贴在一起的掌心和手腕而变得那么强烈，那么紧张，

那么迫切，那么痛楚，那么有力，仿佛有一股电流贯串了他那条手臂，使他全身充满了若有所求的剧烈欲望。阳光照耀在她麦浪般黄褐色的头发上，照耀在她光洁可爱的金褐色脸上，照耀在她线条优美的脖颈上，这时，他使她的头往后仰，把她搂在怀里吻她。他吻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栗；他把她的全身紧贴在自己身上，一条手臂搂住她的背脊，她仰头站着，浑身哆嗦。她随即把下巴搁在他头上，他感到她双手抱着他的头贴着她胸口来回摇晃。他直起腰来，用双臂紧紧抱着她，以致使她全身紧贴在他身上，离开了地面，他感到她在颤栗，她的双唇压在他脖子上，他接着把她放下来，说：“玛丽亚，啊，我的玛丽亚。”

接着他说，“我们到哪儿去好？”

她没说什么，只把手伸进他的衬衫里，他感到她在解他的衬衫钮扣。她说，“我也要。我也要吻。”

“不，小兔子。”

“要。要。要跟你一样。”

“不。那怎么行。”

“嗯，那就……哦，那就……哦，哦！”

接着是压在身子底下的石南的气味，她脑袋下面被压弯的茎枝的粗糙感，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她紧闭的眼睛上，于是他将一辈子也忘不了她那线条优美的脖颈，她仰在石南丛中的头，她不由自主地微微蠕动的双唇，她那对着太阳、对着一切紧闭的眼睛的睫毛的颤动。阳光照在她紧闭的眼睛上，使她觉得一切都是红色的，橙红的，金红色的，那一切也都是这种颜色，充塞，占有，委身，都成了这种颜色，眼花缭乱地成为一色。对他说来，那是一条不知通往哪里的黑暗通道，一次又一次地不知通往哪里，永远不知通往哪里，胳膊肘沉重地支在地上，不知通往哪里，黑暗的、永

无尽头的、不知名的去处，始终坚持着通往不知名的去处，一次又一次地永远不知通往哪里，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了，无法忍受地一直、一直、一直通往不知名的去处，突然地，灼热地，屏紧地，这不知名的去处消失了，时间猝然停止，他们俩一起躺在那里，时间已经停止，他感到地面在移动，在他们俩的身体下面移开去。

他接着侧身躺着，脑袋深深地枕在石南丛里，闻着石南的气味，闻着石南根、泥土、阳光透过石南丛的气味，石南刮着他赤裸的肩膀和两腰，使他发痒，姑娘躺在他对面，眼睛仍然闭着，这时，她睁开眼睛，对他微笑。他十分疲乏地，似乎隔着很远的距离亲切地对她说，“喂，兔子。”她微笑着，毫无隔阂地说，“哎，我的英国人。”

“我不是英国人，”他疲惫地说。

“噢，你是的，”她说。“你是我的英国人，”并且伸手抓住了他的两只耳朵，吻他的前额。

“嗯，”她说。“怎么样？我吻得好一些了吧？”

接着，他俩顺溪而行，他说，“玛丽亚，我爱你，你真可爱，真好，真美，跟你在一起太美妙啦，使我只觉得，在爱你的那时，好象要死过去了。”

“噢，”她说。“我每次都死过去。你没有死过去吗？”

“没有。也差不多。不过你觉得地面在移动吗？”

“是呀。在我死过去的那时刻。请用手臂搂着我。”

“不。我已经握着你的手了。握着你的手就够啦。”

他望望她，望望草地对面空中一只鹰在盘旋觅食，午后大块的云朵这时正在向山上压过来。

“你跟别人也是这样吗？”玛丽亚问他，他们这时手拉手地走着。

“不。说真的。”

“你爱过不少女人了。”

“有几个。可是跟你不一样。”

“不象我们这个样子吗？真的？”

“也快活，可是不象我们这么样。”

“刚才地面移动了。以前没动过吗？”

“没有。真的从来没有。”

“哎，”她说。“象这样，我们有过一天啦。”

他没说什么。

“我们现在至少有过啦，”玛丽亚说。“你也喜欢我吗？我讨你喜欢吗？我以后会长得好看些的。”

“你现在就非常美丽。”

“不，”她说。“你用手摸摸我的头吧。”

他抚摸她的头，觉得她那头短发很柔软，在他手指下被压平了，随后又翘起来。他把双手捧着她的头，使她仰起脸来对着自己，然后吻她。

“我很喜欢亲吻，”她说。“可我吻得不好。”

“你不用亲吻。”

“不，我要。如果我做你的女人，就该事事都叫你高兴。”

“你已经叫我非常高兴。我不能比现在更高兴啦。如果更高兴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可你以后看吧，”她非常愉快地说。“我的头发现在使你觉得有趣，因为样子怪。不过头发天天在长。会长得很长，那时候我就不难看了，说不定你会非常爱我。”

“你的身体很可爱，”他说。“再可爱也没有啦。”

“只不过是因年青而苗条吧。”

“不。美妙的身体有一种魔力。我不懂为什么有人有，有人没有。不过，你有。”

“那是给你的，”她说。¹

“不。”

“就是。给你，永远给你，只给你一个人。可是这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我要学会好好照顾你。你可要跟我说真话。你以前从没觉得地面移动吗？”

“从来也没有，”他老实地说。

“现在我高兴了，”她说。“现在我真的高兴了。”

“现在你在想别的事吗？”她问他。

“是呀。我的任务。”

“我们有马儿就好了，”玛丽亚说。“我高兴的时候就想骑匹好马飞奔，有你在我身边，也骑着马飞奔，我们要越跑越快，骑着马儿飞奔，我的高兴就永远没个完。”

“我们可以把你的高兴带到飞机上，”他心不在焉地说。

“还要象那些小驱逐机那样，在天上的阳光里闪亮，不停地飞来飞去，”她说。“在空中翻筋斗呀，俯冲呀。多棒呀！”她大笑了。“我高兴得自己也不知道在乘飞机呐。”

“你的高兴没有边，”他说，没有完全听见她讲的话。

因为这时他出了神。他虽走在她身旁，心里却想着桥的问题，一切都显得清楚，确实，轮廓分明，好象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焦距。他看到那两个哨所，看到安塞尔莫和那吉普赛人在守望。他看到那空荡荡的公路，他看到公路上的部队调动。他看到能使那两挺自动步枪发挥最大火力的位置，可是由谁来掌握这两挺自动步枪呢？他想，收尾时是我，那么开始时由谁呢？他看到自己放好炸药，卡住，扎紧，安好雷管，接好电线，联上接头，回到

他放那只旧引爆箱的地方，接着他开始琢磨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以及可能出差错的地方。别想啦，他对自己说。你跟这个姑娘睡过觉，现在头脑清醒，完全清醒，你却开始发愁了。考虑你非干不可的事情是一回事，发愁又是一回事。别发愁。你不能发愁呀。你了解你也许不得不干的事情，你还了解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这些情况当然可能发生的啦。

你知道自己斗争的目标，于是你全力以赴。你反对的正是现在要干的，并且为了有希望得到胜利而不得不干的事情。所以，你如今不得不使用你所喜爱的这些人，就象你要取胜而必须使用那些你对之毫无感情的军队一样。巴勃罗显然最精明。他立刻就了解情况如何险恶。那女人全力支持，现在仍然没变，但是对这件事的实质的认识逐渐压垮了她，已经使她十分沮丧。“聋子”马上看清这件事，他干倒肯干，但是并不比他，罗伯特·乔丹，更喜欢干。

原来你是说你考虑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那女人、那姑娘以及别的人将会碰到的遭遇。好吧。如果你没来，他们又将碰到怎样的遭遇呢？你来这里之前，他们碰到了些什么，她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你不能那样想。除了行动时，你对他们并不负有责任。发号施令的不是你。是戈尔兹。那戈尔兹算老几？是个好将军。是你到目前为止最好的顶头上司。然而，一个人明知那些行不通的命令会导致什么后果，他还应该执行吗？哪怕命令来自那个既是军队又是党的领导人戈尔兹？对。他应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只有在执行过程中，才能证明行不通。你没有尝试哪能知道行不通呢？要是接到命令的时候人人都说没法执行，那么你这个人将落到什么样的境地？要是命令来到的时候你就说“行不通”，那么我们大家将落到什么样的境地？

他见过不少将领，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命令都行不通。埃斯特雷马杜拉的那个畜生戈麦斯就是如此。他见过不少次进攻战，两翼按兵不动，理由是行不通。不，他要执行这些命令，倒霉的是不得不和这些他很喜欢的人一起干。

他们游击队所干的每桩事情，都给掩护他们、和他们一起干的人带来意外的危险和厄运。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最终消除危险，让这个国家成为可以安居乐业的好地方。这种话听起来象是陈词滥调，不过，这是真话。

如果共和国失败的话，那些信仰共和国的人就不能在西班牙生活下去。不过，会失败吗？是呀，根据那些已被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地区所发生的情形看来，他知道是会失败的。

巴勃罗是个畜生，可是别的人都是好样的，那么叫他们去炸桥不是出卖他们每个人吗？也许是。然而，如果他们不这样干，一星期之内就会来两中队骑兵，把他们从这个山区里赶走。

不。把他们扔在一边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除非你的原则是把所有的人都扔在一边，你不应该干涉任何人的事。他原来是这样想的，是不是？对，他是这样想的。那么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等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该由别人去干的事啦。这次战争之后，他有别的事要干。他投入这次战争是因为战争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国家里，他信仰共和国，并且，要是共和国被毁灭，那些信仰共和国的人日子都要过不下去。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得服从共产党的纪律。在西班牙，共产党提供了最好的纪律，最健全、最英明的作战纪律。战争期间他服从他们的纪律，因为在作战的时候，只有这个党的纲领和纪律是他所尊敬的。

那么他的政见又是什么呢？他对自己说：目前没有什么政

见。可是跟谁也不能讲呀，他想。永远别透露这点。那么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呢？我要回去，象以前一样，教西班牙语谋生，并且打算写一本真正的书。我说得准，他说，我说得准这不是什么难事。

他应该跟巴勃罗谈谈政治才对。了解了解他在政治上的发展肯定是很有趣的。可能是典型的由左向右的蜕变，就象老勒洛^①。巴勃罗很象老勒洛。普列托^②也同样的糟糕。巴勃罗和普列托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大致上差不离。他们都抱着偷马贼的政见。他把共和国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加以信任，但是共和国必须清除这帮偷马贼，在叛乱开始时他们这帮人害共和国落到了什么境地啊。领导人民的人同时又是人民的真正的敌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这种情况？

人民的敌人。这种词儿他还是不讲为妙。他不愿用这种口号式的词儿。这是和玛丽亚睡了觉而引起的思想变化。在政治方面，他已经变得象个顽固不化的浸礼会教友那样偏执死板，因此象“人民的敌人”这样的词儿是没有多加考虑就浮上心头的。任何革命的或爱国的八股也是这样。他没有考虑就使用这种词儿。当然啦，它们不是假话，但是非常容易把它们滥用。自从昨夜和今天下午发生那事以来，对这种事情，他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清醒，纯洁得多了。偏执是件古怪的东西。偏执的人必然绝对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克制自己，保持正统思想，正是最能助长这

① 勒洛(Alejandro Lerroux, 1864—1949)：西班牙激进党领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起曾几度出任共和国总理。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中，被人民阵线所击败。他在政治上从共和派逐渐堕落为右派。

② 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西班牙社会党领袖，生于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一年起先后任财政部长等职，政治上逐渐堕落为社会党右翼分子。

种自以为正确和正直的看法的。克制是异端邪说的敌人。

如果他仔细检查的话，这个前提怎么站得住脚呢？共产党总是强烈反对放荡不羁的作风，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吧。当你酗酒或私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拿党的路线来衡量，你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啊。打倒放荡不羁的作风，那是马雅可夫斯基所犯的

错误。

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又被尊为圣徒了。那是因为他已经盖棺论定了。他对自己说：你自己也会盖棺论定的。现在别去想这种事情吧。想想玛丽亚吧。

玛丽亚使他的偏执十分难堪。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影响他的决心，然而他巴不得活在人间。他愿意欣然放弃英雄或烈士的结局。他不想打一场德摩比利式的保卫战^①，也不想当桥头阻敌的罗马壮士霍拉修斯^②，更不想成为那个用手指堵塞堤坝窟窿的荷兰孩子。不。他乐意和玛丽亚一起生活。说得最简单，就是这样。他乐意和她共度一段漫长的岁月。

他不信再有什么漫长的岁月之类的事了，但是，如果真有的话，他乐意和她一起消磨。他想，我们在住旅馆的时候，我看，可以用利文斯通博士^③夫妇的名字来填登记表。

① 公元前四八〇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三百名战士坚守德摩比利隘口，阻击波斯侵略军，结果被围，全部牺牲。

② 霍拉修斯为罗马传说中的英雄，于公元前五〇八年左右，和其他两名壮士坚守罗马一木桥，阻挡住入侵的伊特拉斯坎人的大军，待罗马人毁桥后才跳入台伯河中，游至对岸。有说在河中被淹死。

③ 苏格兰医学博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于一八四〇年离英至非洲南部任传教士，一面行医，一面到处旅行探险。一八六六年第二次到非洲，一度 and 外界失去联系。一八七一年，美国《纽约先驱报》派英籍记者亨利·斯坦利率探险队到非洲寻找他的下落，于十一月十日在坦噶尼喀湖边乌吉吉城与他会面，斯坦利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这位是利文斯通博士吧。”罗伯特·乔丹在此处用开玩笑的心情引用了这句话。

干吗不娶她？当然罗，他想。我要娶她。这样我们就成为爱达荷州太阳谷城的罗伯特·乔丹夫妇，或者是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城，或蒙大拿州比尤特城^①的罗伯特·乔丹夫妇了。

西班牙姑娘能成为了不起的妻子。我从没结过婚，所以很相信这一点。等我回大学复了职，她就是讲师太太啦。西班牙语系四年级学生傍晚来我家抽板烟，饶有兴味地漫谈克维多、维加、加尔多斯^②以及其他始终受人尊敬的死者的时候，玛丽亚可以跟他们讲讲某些为正统信仰而斗争的蓝衫十字军^③怎样骑在她头上，而另一些拧住她胳膊，把她的裙子撩上去堵住她嘴的情况。

我不知道蒙大拿州米苏拉城的人们会怎样看待玛丽亚？那是说，假使我能回到米苏拉找到工作的话。看来我在那里要永远被戴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列在总的黑名单上了。尽管你自己永远不会知道。你永远说不准。他们没法证明你以前干过什么事，事实上即使你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而我的护照在他们颁发限制条例之前去西班牙是有效的。

我可以待到三七年的秋天才回去。我是在三六年夏天离开的，假期虽然是一年，但在第二年秋季开学时回去也没有问题。从现在到秋季开学还有不少时间。你也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到后

① 这三个城市都在美国西部。罗伯特·乔丹的家乡在蒙大拿州西部米苏拉城，离其中两个城市不远。他在设想回美国后带了玛丽亚到那几个地方定居。

② 维加(Lope de Vega, 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现存作品四百余部，大部分为喜剧，以《羊泉村》为代表作。加尔多斯(Benito Perez Galdos, 1843—1920)：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剧本多种。

③ 指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党徒。

天这段时间也不短。不。我看没必要为大学发愁吧。只要你秋天回到那儿去就行。只要想办法回到那儿去就行。

但是现在呢，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多奇怪呀。不怪才有鬼呢。西班牙就是你的任务、你的工作，因此待在西班牙是自然而合理的。好几个夏天，你在一些工程项目中干过，在林业部门参加筑路并在国家公园里干过，学会了使用炸药，所以干爆破工作对你也是合理而适当的。虽然时间仓促，不过学得很扎实。

你一旦把爆破当做问题来看待，那它就仅仅是一个问题罢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好多问题却不好对付，尽管天知道你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人们一直把爆破比做有效的谋杀。讲一套冠冕堂皇的话，就能使它情有可原吗？讲一套冠冕堂皇的话，就会使杀人听起来更有趣吗？他对自己说：依我看，你看待这问题未免太轻率了。他想：等你不再为共和国服役，你的情况将会如何，你究竟配做些什么，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大成问题的。他对自己说：不过我的设想是，只要你把它写出来，就能把这些包袱全都放下。你一旦把它写出来，一切就会成为过去。要是你能写的话，那将是本好书。要比另外那一本好得多。

他想：然而在这阶段，你眼前的生活，或今后的生活，就是今天，今晚，明天；今天，今晚，明天，我希望能一遍遍地周而复始，他想，所以你最好还是抓住目前的时光，并且感到十分欣慰。要是炸桥的情况不妙呢？眼前看来可不太妙。

然而，玛丽亚是美好的。可不是吗？他想，唔，可不是吗？我现在能从生活中得到的也许就是这个了。也许这就是我的生活，不是七十年，而是四十八小时，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七十或者七十二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三个整天是七十二小时。

我看，七十小时跟七十年一样，也可以充分享受生活；只要

你已经到达了适当的年龄，并且这七十小时开始时你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活。

真是胡扯，他想。你一个人在想些什么鬼名堂。这真是胡扯。也许这不是胡扯。得了，我们走着瞧吧。我上一次和女人睡觉是在马德里。不，不对。那是在埃斯科里亚尔，那晚上我醒来，以为是另一个人身边，感到相当激动，后来才知道到底是谁，除了这一点之外，别的很平淡；不过，那还是很愉快的。那次之前是在马德里，除了在睡觉时我对自己的身份说了一些谎和推托的话之外，情况也差不多，或者更差劲一些。所以，我不是过分美化西班牙女人的风流人物，也不认为在西班牙逢场作戏要比在别的国家逢场作戏更强。可是，我和玛丽亚在一起的时候，我爱她之深使我觉得自己确实象要死过去似的，我从来不信会这样，也不认为会有这种事。

所以，假如把七十年来换七十小时，我现在觉得也很值得，而且我能这样认识是够幸福的。假如根本没有那种所谓的漫长岁月，没有人的余生，也没有从今以后，而只有现在，那么“现在”就值得赞美，而我为此感到非常愉快。“现在”，西班牙语叫ahora，法语叫maintenant，德语叫heute。“现在”这个词听起来很好笑，事实上却等于全世界和你的一生。今晚，西班牙语叫esta noche，法语叫ce soir，德语叫heute abend。生命和妻子，法语叫vie和mari。不对，不能这样讲。法国人把这个mari解作丈夫。还可以说现在和妻子；可是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拿死亡来说，法语叫mort，西班牙语叫muerto，德语叫todt。德语的死亡听起来最可怕。战争，法语叫guerre，西班牙语叫guerra，德语叫krieg。德语的战争听起来火药味最浓，是不是呢？要就是因为他的德语最差劲才这么想吗？宝贝儿，法语叫chérie，西班牙

语叫 *prenda*, 德语叫 *schatz*。他愿意把这些词儿都换成玛丽亚。这个名字才美哪。

得了, 他们就要一起行动了, 时间近在眼前了。看起来情况确实是越来越坏。那种任务根本没法在早晨完成。如果碰到无可奈何的情况, 你得一直坚持到晚上才能脱身。你竭力想拖到晚上才动手。要是能拖到晚上, 也许就没问题了。那么, 假如在白天就开始拖, 又怎么样呢? 能行吗? 那该死的“聋子”, 特地用了正规的西班牙语来仔细地向他解释这一点。他好象以为, 自从戈尔兹首次提出这事以来, 每逢罗伯特·乔丹特意想到坏的方面时, 从没认真考虑过那一点。好象自从大前天晚上以来, 他一直象没事似的, 而不是心窝里搁着一团消化不了的死面疙瘩。

这件事真够呛。你活了半辈子, 常常觉得生活似乎有点儿意义, 但结果总是一无所获。你以为这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了。接着, 在这样一场糟糕的把戏中, 设法取得两帮胆小如鼠的游击队的配合, 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帮你炸桥, 来阻止一场也许早已开始了的反攻, 这时, 你却遇见了玛丽亚这个姑娘。当然啦, 那正是你想望的事。但是遇见得太晚了, 就是这么回事。

原来实际上是比拉尔那么一个女人把这姑娘硬推进了你的睡袋, 那结果怎么样呢? 是呀, 结果怎么样呢? 请你跟我说说结果怎么样吧。是呀。结果就成了这副样子。结果就是这副样子。

别自欺欺人地说什么比拉尔把她硬推进了你的睡袋, 别企图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或者认为真要不得。你一见到她就失魂落魄啦。她一开口跟你说话, 你就产生了爱情, 这你是知道的。你既然有了爱情, 可是一向认为决不会有这种爱情, 那么何必毁谤它呢, 因为你当时明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她托着铁盘, 弯着身

子走出洞来，你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那时就堕入情网了，这你知道，那么干吗自欺欺人呢？每当你望着她，每当她望着你，你心里就折腾开了。所以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好吧，我承认。至于比拉尔把这姑娘硬塞给你，她做的这一切正表明了她是是个有头脑的女人。她处处关心这姑娘，姑娘托着菜盘回进山洞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苗头来了。

因此她使日子好过一些。她作了巧安排，所以才有昨天夜里和今天下午的事。她可比你有见识得多，她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他对自己说：是呀，看来我们得承认，她相当懂得时间的可贵。她宁愿忍受不快，因为她不希望别人错过她所错过的青春，但是承认自己失去了青春实在太痛苦了。因此刚才在山上她很难受，我想我们也并没有使她好受些。

呃，眼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你还不如承认，如今你不会再有两个整夜可以和她待在一起了。不会白头到老，不会生活在一起，不会享受到别人都能享受到的幸福，根本不会这样了。一夜已经过去了，下午又搞了一次，也许还有一夜。不，先生。

没有时间，没有幸福，没有乐趣，没有儿女，没有屋子，没有浴室，没有干净的睡衣，没有日报，不会双双醒来，不会醒来看到她在身边而你不是孑然一身。不。不会有那等事，可是，哎，既然你想向生活索取而能得到的只有这一点儿，既然你已经找到了，那为什么不能在铺有床单的床上睡上哪怕一晚呢？

你在想望办不到的事。你在想望根本办不到的事。所以如果你真象你所说的那样爱这个姑娘，那么你不如使劲爱她，用爱情的强度来弥补这头关系所缺少的持久性和连续性。你听到这话吗？往昔人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爱情。而现在，当你找到

了爱情的时候，却想知道，如果你能领受两夜的话，这种运气究竟从何而来。两夜。两夜工夫，彼此相爱、相敬、相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无论生病或死亡。不，不是这么说的。无论生病或健康。至死才分离。^①只有两夜。可能性很大。可能性很大，不过现在别胡思乱想啦。现在可别乱想啦。这对你没有好处。别做对你没好处的事。这话确实是说对了。

这正是戈尔兹谈起过的事。你和他相处愈久，他就愈显得精明。原来这就是他那时问到的，那就是不正规战争生活里的调济。戈尔兹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由于情况紧急，缺少时间和所处的环境才造成的？在类似的情形下，人人都会遇到这种事吗？难道说，仅仅是因为他遇到了这种事才认为这是特殊情况吗？戈尔兹在指挥非正规的骑兵队时，是不是也匆匆忙忙地和女人睡觉，是不是因为情况错综复杂，阴错阳差，才使那些姑娘也象玛丽亚现在这副样子吗？

戈尔兹可能也理解这一切，所以要你相信，你应该把给你的那两个晚上当作你的一生来享受；既然我们现在过着这种生活，就应该把你应得的一切集中在你仅有的能享受人生的短暂时刻里。

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是他不信玛丽亚的所作所为仅仅是环境造成的。当然，除非她是受到了他的处境以及她自己的处境的影响。他想，她的处境是不太好的。是啊，不太好。

如果事实正是如此，那么就只能是如此。可是并没有法律规定你非接受它不可。他想：我过去不知道自己竟能产生这种

① 罗伯特·乔丹这里在回忆基督教徒在礼拜堂内结婚时，新人对牧师所作的誓言。

感受，也不知道我会遇到这种经历。我但愿能一辈子享受这种感受。他心中另一个声音说：你能够这样。你现在就有着这种感受，而你整个的一生就在现在。除了现在再没有别的了，既没有昨天，当然啦，也没有明天。你要活到多大才能明白这一点呢？只有现在，而如果“现在”只有两天的话，那么两天就是你的一生，而这一生中的一切都将相应地压缩。你就这样在两天中度过一生。如果你不再抱怨，不再要求你永远不会得到的东西，那么，你就会过到美好的一生。美好的一生并不是用圣经上规定的七十年去计量的。

所以现在别愁啦，接受你现有的东西，干你的工作，那么，你就能过到漫长的一生，十分快乐的一生。最近不是很快乐吗？你还抱怨什么呢？他对自己说，这种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的，他很高兴有这样的想法，你学到的事不及你遇到的人那么重要。想到这里，他感到高兴了，因为他在开玩笑，于是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玛丽亚身上。

“我爱你，兔子，”他对姑娘说。“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在说，”她对他说，“你千万别愁你的工作，因为我不会来麻烦你，也不会来妨碍你的。有什么事我可以出力的，你对我说好了。”

“没有什么，”他说。“其实事情很简单。”

“我要问比拉尔，该做些什么才能照顾好男人，然后我就去做那些事，”玛丽亚说。“这样，我一边学，一边也会自己发现一些事情，另外有些事情呢，你也可以对我说说。”

“没什么事要做的。”

“什么话，你啊，没什么事！你的睡袋今天早晨就该拍拍，挂在有太阳光的地方晒晒。然后在降露水前收起来。”

“说下去，兔子。”

“你的袜子得洗，得晒。我要让你有两双替换。”

“还有呢？”

“你要是肯教我，我就给你擦枪，上油。”

“吻我吧，”罗伯特·乔丹说。

“不，现在说正经话。你肯教我保养手枪吗？擦布啊，油啊，比拉尔有。山洞里有根擦枪用的通条，准配得上。”

“当然啦。我一定教你。”

“还有，”玛丽亚说，“如果你教了我开枪，那么，万一我或你受了伤，为了不被俘虏，有必要时你可以枪杀我，我也可以枪杀你，或者自杀。”

“真有意思，”罗伯特·乔丹说。“你有很多这样的主意吗？”

“不多，”玛丽亚说。“不过这是个好主意。比拉尔把这个给了我，还教我怎么用，”她解开衬衫前胸的口袋，掏出一只放随身带的梳子的那种短皮套子，解开勒住两端的宽橡皮筋，抽出一张刮胡子用的单面刀片。“我一直把这个带在身上，”她解释说。“比拉尔说，你该搁在耳朵下面，朝这里一划。”她用指头比划给他看。“她说这里有一根大动脉，你用刀片朝这儿一划，保险不会划错。她还说，不会有痛苦，你只要在耳朵下面按紧，用刀片向下划。她说，这是轻而易举的，只要划成，他们就拿你没办法了。”

“她说得不错，”罗伯特·乔丹说。“那是颈动脉。”

他想：原来她走东走西一直随身带着，认为这是种理所当然而准备恰当的应付万一的办法。

“可是我宁愿你枪杀我，”玛丽亚说。“答应吧，必要的时候你一定要枪杀我。”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我答应。”

“多谢你啦，”玛丽亚对他说。“我知道，这种事做起来可不容易。”

“没有什么，”罗伯特·乔丹说。

他想：这一切你全忘啦。你太多地考虑你自己的任务，却忘了内战的种种妙处啦。你把这种事给忘了。得了，你是应该忘掉它的。卡希金忘不了这种事，结果毁了他的工作。或许你认为这位老兄事先就有预感的吧？真是怪事，他对枪杀卡希金一事竟然无动于衷。他原以为到了某个时候，心里准会难受。然而到现在为止还心安理得。

“不过，我还可以替你做别的事，”玛丽亚对他说，这时紧挨在他身边走着，态度十分认真，富有女人的味儿。

“除了枪杀我之外，还能干别的事吗？”

“是呀。等你吸完了那些带嘴的烟卷，我可以替你卷烟。比拉尔教过我怎么把烟卷得好好的，又紧又整齐，不会绽开。”

“好极了，”罗伯特·乔丹说。“是你自己舔湿卷烟纸的吗？”

“是呀，”姑娘说。“等你受了伤，我来看护你，给你包扎伤口，给你擦身，喂你吃——”

“要是我不受伤呢？”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等你害病的时候，我来看护你，给你做汤，给你擦身，事事伺候你。我还要读书给你听。”

“要是我不生病呢？”

“那么等你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给你端咖啡来——”

“要是我不爱咖啡呢？”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不，你爱的嘛，”姑娘快乐地说。“今天早晨你就喝了两杯。”

“如果我喝腻了咖啡，没有必要枪杀我，我既不受伤，也不害病，戒了烟，只有一双袜子，自己晒睡袋，那么怎么办呢，兔子啊？”他拍拍她的背，“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玛丽亚说，“我要向比拉尔借把剪刀，给你理发。”

“我不爱理发。”

“我也不爱，”玛丽亚说。“我喜欢你现在的头发式样。那么，要是没事可替你做，我就坐在你身边，看着你，晚上，我们睡觉。”

“好，”罗伯特·乔丹说。“最后这个主意非常明智。”

“我也这样想，”玛丽亚微笑了。“噢，英国人，”她说。

“我的名字叫罗伯托。”

“不嘛。我要和比拉尔一样，叫你英国人。”

“可我的名字还是叫罗伯托啊。”

“不，”她对他说。“今儿一天都叫你英国人。英国人，我可以帮你做工作吗？”

“不。我现在干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而且头脑要很冷静。”

“好吧，”她说。“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走运的话，今天晚上。”

“好，”她说。

他们所在的山坡下面，是通往营地的最后一片松林。

“那是谁？”罗伯特·乔丹问，用手指指。

“比拉尔，”姑娘顺着他手臂指的方向望着说。“准是比拉尔。”

草坡的下端出现第一批树木，那妇人就坐在那里，头伏在双臂上。从他们站着的地方望去，她好象一团什么深色的东西，衬着那棕褐色的树干，显得黑黝黝的。

“走吧，”罗伯特·乔丹说，拔脚穿过齐膝高的石南丛向她奔去。石南长得密，他跑不快，才跑了一小段路，就放慢脚步走了。他看得见那妇人的头伏在交抱着的双臂上，衬托在树干前面，她显得又宽又黑。他走到她跟前，猛的叫一声：“比拉尔！”

妇人抬起头来望着他。

“唔，”她说。“你们已经解决了？”

“你不舒服吗？”他凑在她身边俯身问道。

“哪里话！”她说。“我睡着了。”

“比拉尔，”玛丽亚走上前来说，在她身旁跪下。“你身体好吗？没病吧？”

“好得很，”比拉尔说，但没站起来。她望着他们俩。“好啊，英国人，”她说。“你又在耍男人的那套花招了？”

“你身体可好？”罗伯特·乔丹不睬她的话，问。

“干吗不好？我睡着了。你呢？”

“没有。”

“嗯，”比拉尔对姑娘说。“看来合你的心意。”

玛丽亚红了脸，没说什么。

“别惹她，”罗伯特·乔丹说。

“没人跟你说话，”比拉尔对他说。“玛丽亚，”她说，声音很生硬。姑娘仍然低着头。

“玛丽亚，”女人又说。“我在讲，看来合你的心意。”

“噢，别惹她啦，”罗伯特·乔丹又说。

“你给我闭嘴，”比拉尔说，一眼都不看他。“听着，玛丽亚，告诉我。”

“不，”玛丽亚说，摇摇头。

“玛丽亚，”比拉尔说，声音就象她那脸相那样生硬，一点不

友好。“你要自觉自愿地告诉我。”

姑娘摇摇头。

罗伯特·乔丹思量着，要不是我得跟这女人和她那酒鬼男人和她那帮胆小鬼合作，我要狠狠揍她的嘴巴，要揍得她——

“说呀，告诉我，”比拉尔对姑娘说。

“不，”玛丽亚说。“不。”

“别惹她，”罗伯特·乔丹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好象不是他自己的。他想：我无论如何得揍她，管她娘的。

比拉尔根本不跟他说话。这并不象蛇把鸟吓呆，也不象猫把鸟吓呆的情况。没有一点弱肉强食的意味。也没有丝毫反常的地方。然而他感到这回事在他心里越胀越大，就象一条眼镜蛇的脖子在膨胀。他能感觉到。他能感到这种膨胀的威胁。这回事在他心头占着压倒的优势，然而它并不是邪恶的，倒是带有试探性的。罗伯特·乔丹想，但愿我没有看到这点就好了。可是，这不是揍嘴巴能解决的问题。

“玛丽亚，”比拉尔说。“我不会碰你。现在你自己讲。”这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姑娘摇摇头。

“玛丽亚，”比拉尔说。“现在就讲，要你自己讲。你听到我的话吗？只要你说一句。”

“不，”姑娘小声说。“不，不。”

“现在你要告诉我了吧，”比拉尔对她说。“只要你说一句。你明白啦。现在你要告诉我了吧。”

“刚才地面移动了，”玛丽亚说，没朝那妇人看。“真的。这种事我是不该告诉你的。”

“原来这样，”比拉尔说，她的声音变得热情而友好，里面没

有强迫的意思了。但是，罗伯特·乔丹注意到她前额和嘴唇上出现了细小的汗珠。“原来如此。那就对了。”

“是真的，”玛丽亚咬着嘴唇说。

“当然是真的，”比拉尔亲切地说。“可别告诉你的同胞，因为他们决不会信你的。你没有黑人血统吧，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扶着她站起来。

“没有，”他说。“就我所知，没有。”

“就玛丽亚所知也没有，”比拉尔说。“不过那就怪了。”

“可是真的动了，比拉尔，”玛丽亚说。

“干吗不这样，丫头？”比拉尔说。“我年青时地面移动过，动得你好象觉得什么都在移动，动得你害怕身子下面的地面要裂开似的。这种情形每夜都有。”

“你骗人，”玛丽亚说。

“不错，”比拉尔说。“我骗人。一生一世决不会超过三次。刚才地真的动了吗？”

“动了，”姑娘说。“真动了。”

“那么你呢，英国人？”比拉尔望着罗伯特·乔丹。“要说真话。”

“动了，”他说。“真动了。”

“好，”比拉尔说。“好。那才对了。”

“你说三次是什么意思？”玛丽亚问。“你说这干吗？”

“三次，”比拉尔说。“你们现在有了一次。”

“只有三次吗？”

“大多数人是一次也没有的，”比拉尔对她说。“你肯定动了？”

“人好象往下掉似的，”玛丽亚说。

“那么我想是动过了，”比拉尔说。“走吧，我们到营地去吧。”

“你胡扯什么三次干吗？”他们一起穿过松林，罗伯特·乔丹对妇人说。

“胡扯？”她挖苦地望着他。“别跟我说什么胡扯，英国小子。”

“这又是象手相那一套骗人的把戏吧？”

“不，这是吉普赛人都知道的确实可靠的常识。”

“我们可不是吉普赛人。”

“对啊。不过你有一点小运气。不是吉普赛人，有时倒有些运气的。”

“你真的相信三次这种事吗？”

她又古怪地望着他。“别问我了，英国人，”她说。“别来烦我啦。你年纪太轻，我跟你说不通。”

“不过，比拉尔啊，”玛丽亚说。

“闭嘴，”比拉尔对她说。“你有过一次，这辈子还有两次。”

“那么你呢？”罗伯特·乔丹问她。

“两次，”比拉尔说，伸出两个手指。“两次。再不会有第三次啦。”

“干吗不会？”玛丽亚问。

“啊，别说了，”比拉尔说。“别说了。你年青不懂，叫我厌烦。”

“干吗不会有第三次？”罗伯特·乔丹问。

“啊，你闭嘴好不好？”比拉尔说。“闭嘴！”

行，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问题只在我就此得不到了。我认识很多吉普赛人，这些人怪得很。不过，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怪呢。不同的是我们得正正当地挣钱过活。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什么种族，不知道我们的种族的传统，也不知道我们祖先

生活在丛林里时的神秘事迹。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无知。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黑夜里的情况。白天发生的情况，那是另一回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事已成事了，可现在这个女人不仅逼得这姑娘说出了她不愿说的事情，而且偏要把它拿来当作她自己的经验。她偏要把它说成是吉普赛人的鬼把戏。我原以为她在山上时很难受，可现在回到这里，她又神气活现了。这种行为要是有什么恶意，该把她枪毙。但是并没恶意。这只不过是她想保持生活的乐趣，通过玛丽亚来保持生活的乐趣罢了。

他对自己说：等你打完了这次仗，你可以着手研究女人了。你可以拿比拉尔开个头。依我看哪，她度过了颇不简单的一天。过去她从没提起过吉普赛人的玩意儿。他想，除了手相吧。对，正是手相，没错儿。我看，手相这玩意儿不见得是她捏造的。当然啦，她看到了什么是不会告诉我的。不管她看到什么，她自己可是深信不疑的。可是这种鬼把戏是不会应验的。

“听着，比拉尔，”他对妇人说。

比拉尔朝着他微笑。

“什么事？”她问。

“别那么故弄玄虚了，”罗伯特·乔丹说。“这种鬼把戏叫我讨厌透啦。”

“是这样吗？”比拉尔说。

“我不信妖怪、占卜者、算命先生，或者乌七八糟的吉普赛巫术。”

“唔，”比拉尔说。

“对。你别去惹玛丽亚啦。”

“我不惹这丫头了。”

“也别故弄玄虚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够忙的，要做的

事不少，不讲这些神秘莫测的事也够复杂了。少算些命，多做点事吧。”

“我明白了，”比拉尔说，同意地点点头。“不过听着，英国人，”她对他笑着说。“地动过吗？”

“动过，你这个该死的。地动过。”

比拉尔笑了又笑，站着朝罗伯特·乔丹笑。

“噢，英国人。英国人呀，”她笑着说。“你这人真滑稽。你再要装得一本正经可不容易了。”

滚你妈的蛋，罗伯特·乔丹想。但是他默不作声。他们刚才说话的时候，太阳被乌云遮住了。他回头仰望那些山头，只见天空阴霾密布。

“错不了，”比拉尔望着天空对他说。“要下雪了。”

“现在吗？快到六月了。”

“干吗不能下？山区是不分月份的。现在是太阴历五月。”

“不可能下雪，”他说。“不能下雪。”

“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她对他说，“要下。”

罗伯特·乔丹仰望着灰沉沉的天空，只见太阳变成一团昏黄。他望着望着，太阳完全消失，天际一片灰暗，天色显得模糊阴沉；乌云这时把山峰都遮掉了。

“是啊，”他说。“看来你说对了。”

第十四章

他们到达营地的时候，已经在下雪了。雪片在松树之间打着斜飘下来，起先稀疏地斜穿过树林，打着转飘落下来，接着，寒

风从山上刮下来，雪片稠密地盘旋而下，这时，罗伯特·乔丹恼怒地站在山洞口凝望着风雪。

“我们要遇到大雪了，”巴勃罗说。他嗓音沙哑，眼睛昏红。

“吉普赛人回来了没有？”罗伯特·乔丹问他。

“没有，”巴勃罗说。“他没回来，老头子也没回来。”

“你陪我到公路上段的哨所去好吗？”

“不，”巴勃罗说。“这事我不插手。”

“我自己去找。”

“这样大的风雪你会找岔的，”巴勃罗说。“换了我，现在可不去。”

“只要下坡到了公路边，然后顺路走去就是了。”

“你能找到的。不过，下了雪，你那两个侦察员多半正在回来的路上，你可能会和他们错过。”

“老头子正在等我。”

“不。现在下了雪，他会回来的。”

巴勃罗望着飞扫过洞口的风雪说，“你不喜欢下雪吧，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咒骂了一声，巴勃罗用他那迷糊的眼睛望着他笑。

“这场风雪叫你的进攻吹啦，英国人，”他说。“进洞来吧，你的侦察员就要回来了。”

山洞里，玛丽亚在炉灶前忙着，比拉尔在收拾饭桌。炉火正在冒烟，姑娘在烧火，塞进一根木头，随即用一张折好的纸扇着，扑的一声，火苗一亮，柴火旺了，风从山洞顶上一个的小口子里灌进来，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

“这场雪，”罗伯特·乔丹说，“你看会下大吗？”

“大，”巴勃罗心满意足地说，然后对比拉尔喊道，“你也不喜欢下雪吧，太太？现在是你当家，你不喜欢这场雪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比拉尔转过头来说。“要下就下呗。”

“喝点酒吧，英国人，”巴勃罗说。“我喝了一整天就等着下雪。”

“给我来一杯，”罗伯特·乔丹说。

“为雪干杯，”巴勃罗说，和他碰杯。罗伯特·乔丹盯着他的眼睛，丁的一声碰了杯。他想：你这个醉眼朦胧的挨刀的，我巴不得用这杯子磕你的牙齿。别着急，他对自己说，别着急。

“雪真美，”巴勃罗说。“天在下雪，你不想睡在外面了吧。”

罗伯特·乔丹想：原来你也在想这个问题。巴勃罗，你操心的事也不少啊，对不对？

“不睡在外面？”他客气地说。

“不睡在外面。很冷，”巴勃罗说。“很潮湿。”

罗伯特·乔丹想：你才不知道那只鸭绒睡袋为什么值六十五块钱哪。我在下雪天在那睡袋里过夜已不知有多少次，如果每次人家给我一块钱，那才美呢。

“那么我该睡在这儿山洞里啦？”他客气地问。

“不错。”

“谢谢，”罗伯特·乔丹说。“我还是睡在外面。”

“睡在雪地里？”

“不错。”（他心里说：你那双通红的猪眼睛，你那张长满猪鬃的猪屁股似的脸，都见鬼去吧。）“睡在雪地里。”（就睡在这场该死透顶、害人不浅、意料不到、别有用心、叫人失败、臭婊子养的雪里。）

他走到玛丽亚身边，她刚才在炉灶里又添了一根松柴。

“这场雪多美啊，”他对姑娘说。

“不过对工作可不利，对吧？”她问他。“你不愁？”

“什么话！”他说。“愁也没用。晚饭什么时候能做好？”

“我早知道你今晚胃口一定好的，”比拉尔说。“要不要现在吃一片干酪？”

“谢谢，”他说。她伸手把挂在洞顶的一只放着一大块干酪的网袋取下来，拿刀在切过的那头切下厚厚一大片，递给他。他站着吃。膻味重了一点，不然倒是很好吃的。

“玛丽亚，”坐在桌子边的巴勃罗说。

“什么事？”姑娘问。

“把桌子抹抹干净，玛丽亚，”巴勃罗说，对罗伯特·乔丹露齿笑笑。

“把你自己泼洒在桌上的东西抹掉吧，”比拉尔对他说。“先抹你自己的下巴，抹你的衬衫，再抹桌子。”

“玛丽亚，”巴勃罗喊着。

“别理他。他醉了，”比拉尔说。

“玛丽亚，”巴勃罗喊着。“雪还在下，真美呀。”

罗伯特·乔丹想：他哪里知道那只睡袋的价值。这个猪眼老家伙不知道我干吗花六十五块钱向伍兹家的兄弟们买下这只睡袋。可是，我真希望吉普赛人就回来啊。他一回来我就去找老头儿。我应该现在就走，不过很可能跟他们在路上错过。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放哨。

“想做雪球吗？”他对巴勃罗说。“想玩雪战吗？”

“什么？”巴勃罗问。“你打算干什么？”

“没什么，”罗伯特·乔丹说。“你的马鞍都盖好了吗？”

“对。”

罗伯特·乔丹然后用英语说，“打算去喂马吗？还是把它们拴在外面让它们自己扒掉了雪啃草吃？”

“你说什么？”

“没什么。那是该你来操心的事，老朋友。我要到外面去走走啦。”

“你干吗说英国话？”巴勃罗问。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我非常疲乏的时候往往讲英语。或者在十分厌烦的时候。要不，譬如说，在举棋不定的时候。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说英国话，为了听听这种话的调子。这种调子叫人心踏实。今后你也该试试。”

“你说什么，英国人？”比拉尔问。“这种话听起来很有趣，可我听不懂。”

“没说什么，”罗伯特·乔丹说。“我讲的英国话的意思是‘没什么’。”

“那还是用西班牙话讲吧，”比拉尔说。“西班牙话来得简短。”

“当然啦，”罗伯特·乔丹说。他想：可是老兄啊，巴勃罗啊，比拉尔啊，玛丽亚啊，坐在角落里的两兄弟啊（我该记住你们俩的名字，却忘了），这些事有时使我讨厌。讨厌这些事，讨厌你们，讨厌我自己，讨厌战争，唉，到底为什么现在非下雪不可呢？这真他妈使人受不了。不，不是这样。哪有什么使人受不了的事啊。你只有接受现实，并在现实中杀出一条路来。现在别情绪波动啦，应当象刚才那样接受正在下雪这个现实，而下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向吉普赛人打听情况，找到老头儿。可是下雪啦！这个月份竟然下雪。他对自己说，别想啦。别想啦，接受现实吧。这就是苦杯，你知道。关于这苦杯是怎么说的？他要就必须提高

自己的记忆力，要就永远别去想什么引语^①，因为当你想不起来的时候，就象忘了一个人名似的，老在心里挂着，抹不掉也推不开。关于苦杯是怎么说的呢？

“请给我来一杯酒，”他用西班牙话说。接着对巴勃罗说，“雪下得不小，呃？”

那醉汉抬起头来看他，露齿笑笑。他点点头，又露齿笑笑。

“进攻吹啦。飞机不来啦。桥炸不成啦。只有雪啦，”巴勃罗说。

“你巴望下很久吗？”罗伯特·乔丹在他旁边坐下。“巴勃罗，你看整个夏天我们都会被雪困住吗，老兄？”

“整个夏天，不会，”巴勃罗说。“今天晚上和明天，那错不了。”

“你凭什么这样看？”

“风雪有两种，”巴勃罗一本正经而富有见识地说。“一种是从比利牛斯山^②刮来的。来了这种风雪，天就要大冷。现在已过了时候，所以不是这一种。”

“不错，”罗伯特·乔丹说。“有道理。”

“现在这场风雪是从坎塔布里科^③刮来的，”巴勃罗说。“是从海上来的。风朝这个方向刮，会有大风大雪。”

① 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时，对十二门徒说，他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被定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后来在客西马尼花园里，他向上帝祷告：是否可以让他不喝这一杯苦酒。《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一节至四十四节：“……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最后来捉拿他时，门徒彼得拔刀砍掉一个来人的右耳，但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一节）

② 在西班牙东北部，是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天然疆界。

③ 横贯西班牙北部一大山脉，滨大西洋的比斯开湾。

“你这些是从哪里学来的，老师傅？”罗伯特·乔丹问。

他的怒气消失了，这场风雪象以往任何风雪一样使他激动。暴风雪、飓风、突然的风暴、热带暴风雨或者夏天山区的雷阵雨都会使他激动，这是其他事物做不到的。就象战斗中产生的激动一样，不过比战争中的来得纯洁。在战斗中会刮起一阵风，那是一阵热风，又热又干，就象你嘴里的感觉那样；它刮得劲头十足，又热又脏，随着一天中战局的变化而起风或停息。他很了解这种风。

但是暴风雪和这种风完全不同。在暴风雪中你走近野兽的时候，它们并不感到害怕。它们在旷野里乱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一只鹿会躲到小屋的背风处去站着。在暴风雪中，你骑马碰到一头麋鹿，它会把你的马误认为另一头麋鹿，一路小跑着向你迎来。在暴风雪中，你总有种感觉，似乎一时什么仇敌都没有了。在暴风雪中，风可能大极了；但是天地一片洁白，满天白雪飞舞，一切都变了样，等风停息下来，四下万籁俱寂。现在一场大风雪来临了，他还是喜欢它吧。这场风雪打乱了一切，可是你还是喜欢它吧。

“我赶过好多年牲口，”巴勃罗说。“我们在山里用大车运货。那时还没用卡车。我们干了这一行才学会了识天时。”

“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我一向是左派，”巴勃罗说。“我们和阿斯图里亚斯^①那里的人接触很多，他们在政治上很进步。我一向拥护共和国。”

“那么你革命前在干什么？”

“那时我替萨拉戈萨^②的一个马贩子干活。他向军队和斗牛

① 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西班牙西北部一地区，滨比斯开湾。

② 萨拉戈萨(Zaragoza)：西班牙东北部萨拉戈萨省省会。

场提供马匹。我就是在那时遇见比拉尔的，就象她自己跟你讲的，她那时正和帕伦西亚^①的斗牛士菲尼托作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相当得意。

“他这个斗牛士没什么了不起，”桌边两兄弟中的一个望着站在炉灶前的比拉尔的后背说。

“没什么了不起？”比拉尔转身冲着他说。“他没什么了不起？”

她这时站在山洞里的炉灶前，想象中看到了他，身材矮小，皮肤棕褐，神情安详，眼睛忧郁，双颊深陷，汗湿的黑髻发贴在前额上，紧箍在头上的斗牛帽在前额上勒出了一条别人不会注意到的红痕。这时她看见他站着，面对着那头五岁的公牛，面对着那两只曾把好几匹马挑得老高的牛角。骑着马的斗牛士用尖利的标枪刺进了牛脖子，而那粗壮的牛脖子把那匹马越顶越高，越顶越高，直到啪哒一声把马掀翻，骑手摔在木栅栏上，公牛把腿儿使劲抵着地面，身子朝前冲，粗脖子朝上一挥，一对角扎进那匹奄奄一息的马儿，要结果它的性命。她看到菲尼托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斗牛士这时站在牛的面前，侧身对着它。她这时清楚地看到他在那块带杆的厚实的法兰绒卷起来；公牛腾空跃起，肩头扎着的那几根短镖枪嗒嗒地碰击着，同时那块法兰绒在交锋中掠过牛头，牛肩以及淌着鲜血、弄得湿漉漉、亮闪闪的牛肩隆，一直掠过牛的背部，弄得沾满了鲜血，沉甸甸的。她看到菲尼托侧身站在离牛五步远的地方，那头牛笨重地站着不动；他慢慢地把剑举到齐肩高，目光顺着朝下倾斜的剑锋瞄准他这时还看不见的要害，因为牛的头挡住了他的视线。他要用左臂挥动那块

^① 帕伦西亚(Palencia):西班牙北部帕伦西亚省省会。

又湿又重的绒布，引牛低下头去；但他这时把脚跟抵在地上，身体向后微微一仰，侧身站在那只碎裂了角的牛面前，用剑锋瞄着牛的脑后；牛的胸脯一起一伏，两只眼睛盯着那块绒布。

她这时很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模样，听到了他那尖细而清晰的声音，只见他扭头望着斗牛场红色栅栏上方的第一排观众，并且说：“咱们来试试能不能就这样杀死它！”

她能听到他的话声，还能看到他膝头一弯，走上前去，看清他一直朝牛角走去，这时候牛角奇怪地低下来了，因为牛嘴跟着那块在低处摆动的绒布下垂了；他用瘦细的棕色手腕操纵着，使牛角低低地从身边擦过，同时把利剑刺进沾着尘土的牛肩隆。

她看到雪亮的剑慢慢地、平稳地刺进去，仿佛是牛的冲刺把斗牛士手中的剑顶进了身体，她看到那把剑一直插进去，直到那棕褐色的手指节抵住了绷紧的牛皮；这个棕褐色的矮小的斗牛士，眼光从没离开过剑刺进去的地方，这时从牛角前转过收缩的肚子，利索地摆脱了那头畜生，左手拿了那幅带杆的绒布，举起右手，望着那牛死去。

她看到他站着，眼睛盯住那头想站稳身子的牛，看它摇摇晃晃，象一棵即将倒下的树，看它拚命想在地上站稳，而这个矮小的斗牛士按照常规，举起一手，打着表示胜利的手势。她看到他站在那里满头大汗，为这场斗牛的结束而感到空虚的宽慰，眼看那头牛即将死去而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身子在牛角边擦过的时候没挨到冲撞、挑刺而感到松了一口气。跟着那头牛没法再站稳了，啪哒一声栽倒在地，四脚朝天地死去了；她看到这个矮小的棕褐色的斗牛士疲惫而一无笑意地朝场边的栅栏走去。

她知道即使拼出性命他也没法跑着穿过斗牛场。她望着他慢吞吞地走到栅栏边，拿一块毛巾抹抹嘴，抬头望望她，还摇摇

头，用毛巾抹抹脸，然后开始胜利地绕场走一圈。

她看到他慢吞吞地拖着脚步绕斗牛场走着，微笑，鞠躬，微笑；助手们跟在他后面，俯身把观众扔下来的雪茄烟拾起来，把帽子扔回去；他眼色忧郁、面带笑容地绕场一周，最后来到她面前结束巡礼。她从上面看去，只见他坐在木栅栏的台阶上，拿毛巾捂着嘴。

比拉尔站在炉灶边看到了这一切，她说，“难道他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斗牛士？现在跟我一起过日子的倒是些什么角色呢！”

“他是个斗牛好手，”巴勃罗说。“他吃亏的是身材矮小。”

“而且他明摆着害着肺病，”普里米蒂伏说。

“肺病？”比拉尔说。“象他那样吃过苦的人，谁能不得肺病？在这个国家里，要不就做胡安·马契那样的恶棍，要不当斗牛士，要不就做歌剧院的男高音，哪个穷人能盼着挣到钱啊？他怎么能不得肺病？在这个国家里，资产阶级吃得胀破了肚子，不吃小苏打就不能活命，而穷人从出娘胎到进棺材都吃不饱，他怎么能不得肺病？你躲在三等车厢的座位底下，为了可以不买车票，到外地各市集去看斗牛，想从小学点本领；待在座位底下和尘土、垃圾、刚吐的痰和干了的痰打交道，假使你胸部又被牛角抵过，你能不得肺病？”

“一点也不假，”普里米蒂伏说。“我只是说他得了肺病。”

“他当然得了肺病，”比拉尔站在那儿说，手拿一把搅拌用的大木汤匙。“他个子矮小，嗓子尖细，见牛非常害怕。我从没见过在斗牛前比他更胆小的，也从没见过在斗牛场里比他更勇敢的人。你呀，”她对巴勃罗说，“你现在就是怕死。你以为死是不得了的事。菲尼托可是一直胆小的，到了斗牛场里却象头狮子。”

“他的勇敢是出过名的，”两兄弟中的另一个说。

“我从没见到过这样胆小的人，”比拉尔说。“他把牛头放在家里都不敢。有次节日里，他在瓦利阿多里德把巴勃罗·罗梅罗的一头牛宰了，干得真漂亮——”

“我记得，”那第一个兄弟说。“我那时在斗牛场上。那条牛是皂色的，前额上有鬃毛，一对角很长很大。这头公牛有七百六十多磅^①重。这是他在瓦利阿多里德宰掉的最后一头牛。”

“说得一点也不错，”比拉尔说。“后来，捧场的人在哥伦布饭店聚会，用他的名字给他们的俱乐部命名，还把那只牛头剥制成标本，在哥伦布饭店的一个小型宴会上送给他。他们吃饭的时候，把牛头挂在墙上，不过用布蒙了起来。当时在座的有我和一些别的人，还有帕斯托拉，她比我长得还要丑；还有贝纳家的妞儿和别的吉普赛姑娘，以及几个高级婊子。这次宴会规模不大，可是热闹得很，因为帕斯托拉和一个最红的婊子争论一个礼貌问题，差不多闹翻了天。我自己也是开心得不能再开心了。我坐在菲尼托身边，发现他不肯抬起头来望那牛头；牛头上蒙上了一块紫布，就象我们过去信奉的主耶稣受难周教堂里圣徒像上蒙的那种布一样。

“菲尼托吃得不多，因为那年在萨拉戈萨参加的最后一场斗牛中，他正要动手刺杀那条公牛时，被牛角横扫了一下，弄得他昏过去了好些时候，因此即使参加这次宴会时，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会不时拿手帕捂在嘴上，往里面吐血。我刚才讲到哪儿啦？”

① 原文为“over thirty arrobas”，按 arroba 为西班牙的重量单位，合 25.36 磅。

“牛头，”普里米蒂伏说。“那只剥制的牛头。”

“对，”比拉尔说。“对了。不过有些细节我必须讲一讲，好让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菲尼托是一向兴致不大高的。他是天生严肃的，我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从没见过他为了什么事情大笑过。哪怕是很滑稽的事，他也是不笑的。他遇事都是一本正经。差不多象费尔南多一般一本正经。不过，那次宴会是由一群斗牛爱好者组成的菲尼托俱乐部为他举办的，所以他必须显得高高兴兴、和和气气、喜气洋洋。所以宴会时他始终笑嘻嘻的，说着亲热的话儿；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他在拿手帕干什么事。他随身带了三条手帕，结果三条手帕都吐满了血。接着他声音放得很低地对我说，‘比拉尔，我再也支持不住啦。我看只有走了。’

“‘那我们就走吧，’我说。因为我看他很难受。宴会到了这个时候热闹极了，吵闹声大得不得了。

“‘不。我不能走，’菲尼托对我说。‘说到头，这个俱乐部用的是我的名字，义不容辞哪。’

“‘你既然不舒服，我们还是走吧，’我说。

“‘不能，’他说。‘我不走。给我些白葡萄酒。’

“我觉得他不该喝酒，因为他一点东西也没吃，而胃又不好；不过，要是不吃点喝点的话，他是明摆着再也应付不了这种嘻嘻哈哈、吵吵闹闹的场面的。就那样，我看他很快地喝了差不多一瓶白葡萄酒。他把手帕都弄脏了以后，这时把餐巾来当手帕用了。

“这时宴会可真到了最热火的时候，有些骨头最轻的婊子跨在几个俱乐部成员的肩膀上大出洋相。应大家的邀请，帕斯托拉唱起歌来，小里卡多弹起了吉他，场面非常动人，真叫人开心，

大家醉醺醺地亲热到了极点。我从来也没见过哪次宴会能达到这样的真正的安达卢西亚式的热情，不过，我们还没到替牛头揭幕的时候，归根到底，举行这次宴会就是为了这一个。

“我开心极了，不停地伴着里卡多的琴声拍手，跟一些人一起给贝纳家的妞儿的歌声打拍子，竟然没留心到菲尼托把他自己那块餐巾吐满了血，已经把我的那块也拿去了。他那时又喝了些白葡萄酒，眼睛变得亮亮的，高高兴兴地对每个人点头。他不能多讲话，因为一开口就随时得使用那块餐巾，可是他装得喜气洋洋，非常高兴，这次要他来出席毕竟是为了让他享受享受乐趣啊。

“宴会继续进行下去，坐在我旁边的是‘公鸡’拉斐尔的前经理，他正在给我讲故事，故事的结尾是：‘所以拉斐尔走到我身边说，“您是我在世界上最高尚的莫逆之交。我对您的爱象兄弟一般，我要送您一件礼物。”因此他就送了我一只漂亮的钻石领针，还吻了我的双颊。我们俩都很感动。’“公鸡”拉斐尔送了我那只钻石领针之后，就走出了咖啡馆，我对坐在桌边的雷塔娜说，“这个下流的吉普赛人刚和另一位经理签了一个合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雷塔娜问道。”

“‘我替他当了十年经理，以前从没送过我礼物，’‘公鸡’的前经理说。‘这回送礼无非说明了这一点。’果然不错，‘公鸡’就这样和他吹了。

“可是，正在这时帕斯托拉插嘴了，也许不是为了替拉斐尔辩护，因为谁也比不上她自己那样诋毁拉斐尔，只是因为这位经理提到吉普赛人的时候，说了句‘下流的吉普赛人’。她插身进来，讲得声色俱厉，使得经理哑口无言。我就插进去要帕斯托拉别吵，而另一个吉普赛女人插进来要我别吵，因此闹成一片，谁

也没法听清我们之间所讲的话，只有一个词儿，‘臭婊子’，最最响亮。最后重新安静下来了，我们三个插嘴的人都坐下来，低头望着自己的酒杯，这时，我才留意到菲尼托脸上露出惊骇的神气，正瞪着那只仍然蒙在紫色布里的牛头。

“这时，俱乐部主席开始演说了，等他讲完了就要给牛头揭去蒙着的布。演说时从头到尾只听到人们喝彩叫好，拍桌拍凳，我呢，望着菲尼托正在朝他的，不，朝我的餐巾里吐血，身体在椅子上往下瘫，一面惊骇而迷惘地瞪着他对面墙上蒙着布的牛头。

“演说快结束时，菲尼托开始摇头，身体在椅子上越来越往下瘫了。

“‘你怎么啦，小不点儿？’我对他说，但他望着我时的神气却好象不认得我了，他只管摇着头说，‘别。别。别。’

“俱乐部主席的演说到此结束，在大家的一片喝彩声中，他站在椅子上伸手解开缚在牛头上的紫布的带子，慢慢地把布揭开，布被一只牛角勾住了，他把布提起来，从那尖锐而光滑的牛角上拉掉，露出那只黄色大牛头和那对挑出在两旁、角尖朝前的黑牛角，那白色的牛角尖象豪猪身上的硬刺般锐利，牛头挺精神，好象活的一样，前额象活着的时候一样长着鬃毛，鼻孔是张开的，眼睛乌亮，正直瞪瞪地望着菲尼托。

“每个人都欢呼、拍手，菲尼托却更往椅子上瘫下去，大家顿时静下来望着他，他呢，一边说着‘别。别，’一边望着牛头，身子更向下瘫了，接着他大喊一声‘别！’吐出一大口血，他顾不上拿起餐巾，血就顺着他下巴淌下来，他仍旧望着那只牛头，说，‘斗牛季节，好。挣钱，好。吃，好。可是我不能吃啦。听到了吗？我的胃坏了。可现在我的季节也过去了！别！别！别！’他望望桌子四周的人，望望那只牛头，又说了一声‘别，’接着低下头去，拿起

餐巾捂在嘴上，就那样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了。那次宴会开头很好，眼看在寻欢作乐和交流情谊方面会得到划时代的成功，结果却失败了。”

“那之后他过了多久死去的呢？”普里米蒂伏问。

“那年冬天，”比拉尔说。“他在萨拉戈萨被牛角横扫一下之后一直没有复元。这比被牛角挑伤还厉害，因为这是内伤，治不好的。他每次最后刺牛的时候差不多都要挨这么一下，他不是最出名，就是这个道理。他个子矮小，想要把上半身躲开牛角不容易。差不多每次都要挨一下横扫。不过当然，好多次仅仅是擦一下罢了。”

“既然他个子矮小，就不该去当斗牛士，”普里米蒂伏说。

比拉尔望望罗伯特·乔丹，对他摇摇头。她然后弯身望着那只大铁锅，还在摇头。

她想，这是什么样的人民哪。西班牙人是什么样的人民哪。“既然他个子矮小，就不该去当斗牛士。”我听着，无话可说。我现在已不恼恨这种话了。我刚才跟他们解释过，现在无话可说了。不知道底细，那说说多容易啊。不知道底细，有个人就说，“他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斗牛士。”不知道底细，另外一个人说，“他得了肺病。”等我这知情人讲明了之后，又有人说了，“既然他个子矮小，就不该去当斗牛士。”

她这时俯身凝望着炉火，眼前又浮现出那赤裸的棕色身体躺在床上，两条大腿上都是瘢痕，右胸肋骨下面有个深深的圆伤疤，身子一侧有一长条一直延伸到胳肢窝的白色疤痕。她看到那双闭拢的眼睛，严肃的棕褐色的脸，前额上的黑色鬈发那时被掠到了脑后。她挨着他坐在床上，揉着他的两条腿，揉着小腿肚上绷紧的肌肉，揉着肌肉，使它松舒，然后用她握紧的双手轻轻捶

打，松舒抽筋的肌肉。

“怎么样？”她对他说。“小不点儿，腿上好些吗？”

“很好，比拉尔，”他闭着眼睛说。

“要我揉揉胸膛吗？”

“别，比拉尔。请你别碰胸膛。”

“大腿呢？”

“别。腿上痛得太厉害啦。”

“不过，要是让我揉一揉，搽点药膏，就会使肌肉发热，舒服一点儿的。”

“别，比拉尔。谢谢你。还是别去碰它。”

“我来用酒精给你擦擦。”

“好的。要很轻很轻。”

“你最后一次斗牛真了不起，”她对他说，而他回答道，“正是，那头牛我宰得真不赖。”

她给他擦洗之后，盖上一条被子，然后上床躺在他身边；他伸出棕褐色的手来摸摸她，说，“你真是个好女人，比拉尔。”这就算是他说的笑话了。他通常在斗牛之后就睡熟了，她就躺在那儿，把他的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里，听他呼吸。

他在睡梦中常常会受惊，她就会觉得他的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还见到他前额上冒出汗珠；要是他醒过来，她说，“没事，”于是他又睡去。她就这样跟了他五年，从来没有对他不贞过，那是说几乎从来没有。葬礼之后，她就和在斗牛场给斗牛士牵马的巴勃罗相好了，他就象菲尼托消磨一生所宰的牛那样壮实。但是她现在知道，牛的劲头，牛的勇气都不能持久，那么什么能持久呢？她想，我是持久的。是呀，我是持久的。可是，为了什么呢？

“玛丽亚，”她说。“注意些你在干什么。这炉火是用来煮吃的。可不是用来烧掉城市的。”

正在这时，吉普赛人走进门来。他满身是雪，握着卡宾枪站住了，跺着脚把雪抖掉。

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向门边走去。“情况怎么样？”他对吉普赛人说。

“大桥上每岗两个人，六小时换一次，”吉普赛人说。“养路工小屋那边有八个人和一个班长。这是你的手表。”

“锯木厂边的哨所的情况怎么样？”

“老头子在那儿。他可以同时监督哨所和公路。”

“那么公路上呢？”罗伯特·乔丹问。

“老样子，”吉普赛人说。“没什么特别情况。有几辆汽车。”

吉普赛人浑身透露出寒意，黑黑的脸冻得皮肤都绷紧了，两手发红。他站在洞口，脱下外衣抖雪。

“我一直待到他们换岗的时候，”他说。“换岗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和下午六点。这一岗可不短。幸亏我不在他们部队里当兵。”

“我们去找老头子，”罗伯特·乔丹穿上皮外衣说。

“我不干了，”吉普赛人说。“我现在要烤火、喝碗热汤了。我把他守望的地方告诉这里的一个人，他会给你带路的。嗨，你们这帮二流子，”他对坐在桌边的那些人大声说。“哪个肯带英国人去老头子守望公路的地方？”

“我去，”费尔南多站起身来。“把地点告诉我。”

“听着，”吉普赛人说。“那是在——”他告诉他老头儿安塞尔莫放哨的地方。

第十五章

安塞尔莫蹲在一棵大树的背风处，雪从树干两边吹过。他紧靠树干蹲着，两手合抱，笼在袖筒里，脑袋竭力往外套里缩。他想，要是再待下去，我要冻僵了，那才没意思哩。这英国人叫我一直待到换班的时候，可是他那时不知道会来这场暴风雪。公路上并没有特殊情况，而且我知道公路对面锯木厂边那哨所的人员部署和活动规律。我现在要回营地去啦。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会指望我回营地去的。他想，我再等一会儿才回去吧。那是命令的毛病，太死板了。不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改变。他把两只脚互相搓擦，然后从衣袖里抽出手来，弯下身体用手揉腿，再拍击双脚使血液流通。待在树后吹不到风，冷得不厉害，但他还是要过一会儿就动身走回去。

他弯身揉脚的时候，听到公路上开来一辆汽车。车轮上系着防滑铁链，有一节铁链啪哒啪哒地响着；他望见车子在覆盖着雪的公路上驶来，车身上的油漆绿一块、褐一块的乱漆一气，车窗上涂了蓝色，使人看不到里面，上面只留出一个半圆形没有涂漆，让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那是一辆用过两年的罗尔斯·罗伊斯^①轿车，涂了伪装漆，供总参谋部使用，安塞尔莫可不知道这情形。他看不见车子里坐着三个军官，身上裹着披风。两个坐在后座，一个坐在对面的折椅上。车子开过的时候，坐在折椅

^① 罗尔斯·罗伊斯为英国产高级轿车，后座与司机座之间有玻璃隔开。此处因后座坐有三名叛军高级军官，窗上涂了蓝漆，司机座则未加伪装，故安塞尔莫能看见司机及勤务兵。

上的军官正从蓝车窗上的缺口向外张望。安塞尔莫可不知道这情况。他们俩都没有发现对方。

车子就在他下面的雪地里经过。安塞尔莫看见了头戴钢盔、脸色红红的司机，脸和钢盔露在他身穿的毯子式的披风上面，他还看到司机身边那勤务兵携带的自动步枪的上半截朝前撅出着。车子朝公路上段驶去，安塞尔莫就把手伸进外套，从衬衣袋里掏出罗伯特·乔丹笔记本上撕下的两张纸，按规格画了一辆汽车的记号。这是那天驶上山的第十辆车子。有六辆已回下山来。四辆仍然在山上。路上驶过的车子并不太多，安塞尔莫也分不清控制着各山口和山顶防线的师参谋部的车辆和总参谋部的车辆之间的区别：师参谋部有福特、菲亚特、奥贝尔、雷诺和雪铁龙等牌的汽车；总参谋部有罗尔斯·罗伊斯、兰西亚斯、默塞德斯和伊索塔等。^① 罗伯特·乔丹分得清这种区别，要是在那儿的是他而不是老头儿，他就能领会那些车子上山的含意了。但是他不在那儿，而老头儿呢，只在那张纸上给每一辆上山去的汽车画上一划罢了。

安塞尔莫这时非常冷，所以他决定，最好还是在断黑以前回营地去。他不怕迷路，可是他认为再待下去没意思了。风越刮越冷，雪也不见小。他站起身来，跺跺脚，目光穿过飞舞的雪花望望公路，并不动身攀登山坡，却仍旧靠在那棵挡风的松树后面不动。

他想：英国人叫我别走。说不定这会儿他就在路上快到这里了，要是我离开这里，他在雪里找我可能会迷路。我们这次打仗老是因为缺乏纪律、不听命令而吃苦头，我要再等一等英国人。不过，如果他不马上来，那管它命令不命令，我一定要走，因

^① 这些汽车是美、英、法、德、意等国的产品，都是当时的名牌。

为反正我现在有东西可交差啦，而且这些天来，我要干的事可不少，冻僵在这里未免过份、没有意义。

路对面锯木厂的烟囱正在冒烟，安塞尔莫闻得出烟在雪中正向他这边飘来。他想，法西斯分子又暖和又舒服，可明天晚上我们要叫他们归天啦。这事情真怪，我可不爱想它。我整整守望了他们一天，可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我看哪，要不是他们奉有命令要盘问一切过路人、检查身份证的话，我满可以走到锯木厂去敲敲门，而且他们准会欢迎我的。我们之间只隔着一道命令。那些人不是法西斯分子。虽说我叫他们法西斯分子，其实不是。他们是穷光蛋，和我们一样。他们绝对不应该和我们打仗，我可不爱想到杀人的事儿。

这个哨所里的人都是加利西亚^①人。我从今天下午听他们说话的口音中所听出的。他们不会开小差，因为开了小差，一家老小都要给枪毙。加利西亚人要么非常聪明，要么笨头笨脑、野蛮得很。这两种人我都遇见过。利斯特就是加利西亚人，和佛朗哥是同乡^②。现在这种季节下雪，我真不知道这些加利西亚人是怎样想的。他们没有这样高的山，他们家乡老是下雨，四季常青。

锯木厂的窗子里露出了灯光，安塞尔莫哆嗦了一下，心想：那个英国人真该死！这些加利西亚人在我们这里呆在暖和的屋子里，我却在树背后冻得发僵，而我们呢，却象山里的野兽般住在山洞里。他想：可是明天哪，野兽要从洞里出来，而这些现在

① 加利西亚(Galicia)：西班牙西北端一地区，滨大西洋，早被叛军所占，故这些士兵不敢开小差，怕连累家属。

② 两人都是加利西亚的埃尔费罗尔港人。恩里克·利斯特(Enrique Lister)为石匠出身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为优秀的政府军指挥员。

这么舒服的人却要暖暖和和地在毯子里归天啦。他想：就象我们在袭击奥特罗时那样叫他们在夜里归天。他可不爱回想在奥特罗发生的事。

他第一次杀人就是在奥特罗的那天晚上。他希望这次拔除哨所时不用杀人。在奥特罗，安塞尔莫用毯子蒙住哨兵的脑袋，巴勃罗用力捅，那哨兵抓住了安塞尔莫的一只脚不放，虽然闷在毯子里透不过气来，却在里面喊叫，安塞尔莫只得在毯子里摸索着，给了他一刀，才叫他放掉了脚，不动了。他当时用膝头抵住了那家伙的喉咙，不让他发出声来，一边用刀捅进这被毯子裹住的人。巴勃罗同时把手雷从窗口扔进屋里，哨所的士兵们全在里面睡觉。火光一亮，好象全世界在你眼前被炸成了一片红黄色，紧接着又扔进了两颗手雷。当时，巴勃罗拉开保险，飞快地扔进窗子，那些在床上没被炸死的家伙刚爬起来，却被第二颗手雷炸死了。那是巴勃罗大出风头的日子，他象瘟神似地把那一带搞得天翻地覆，法西斯分子的哨所在晚上没有一个是安全的。

安塞尔莫想：可现在呢，巴勃罗完蛋了，不中用了，就象阉过的公猪一样，等手术一做好，它停止了尖叫，你把那两颗卵蛋扔掉了，而那只公猪，其实已算不上公猪啦，却用鼻子嗅来嗅去，把卵蛋拱出来吃掉。不，他还没糟到这个地步。安塞尔莫咧开嘴笑了：你竟然把巴勃罗看得这么糟啊。不过，他是够讨厌了，变得很不象样了。

他想，天气太冷了。但愿英国人就来。但愿在这次袭击哨所的行动中我不用杀人。这四个加利西亚人和他们的班长该留给那些爱杀人的人去对付。英国人说过这话。假如是分配给我的任务，我就杀；可是英国人说过，要我跟他一起在桥头干，这里的人留给别人。桥头一定会打一仗，要是这次我能顶住，那么在这

场战争中，我就好算尽到了一个老头子的全部责任啦。现在啊，英国人你可该来啦，因为我感到很冷，看到锯木厂里的灯光，知道这些加利西亚人在里面暖呼呼的，叫我感到更冷了。但愿我能再回到自己家里，但愿这场战争就结束吧。他想，可是你现在已没家了。要回到你自己家乡，我们就必须先打赢这场战争。

锯木厂里，有个兵坐在铺上擦靴子。另一个躺在铺上睡着了。第三个在煮东西。班长在看报。他们的钢盔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步枪靠在木板墙上。

“快到六月还下雪，这是什么鬼地方？”坐在铺上的兵说。

“真是怪事，”班长说。

“现在是太阴历五月，”在煮东西的兵说。“太阴历五月还刚开始呐。”

“五月天下雪，这是什么鬼地方？”坐在铺上的兵坚持说。

“这一带山里五月天下雪也不是罕见的事，”班长说。“我在马德里的时候，五月份要比哪个月都冷。”

“也更热，”在煮东西的兵说。

“五月的气温差别最大，”班长说。“在这里卡斯蒂尔地区，五月是大热的月份，不过也会变得很冷。”

“要么下雨，”坐在铺上的兵说。“这刚过去的五月份差不多天天下雨。”

“没有的事，”在煮东西的兵说。“反正这刚过去的五月，实在是太阴历四月。”

“听你扯什么太阴历的月份，真叫人头痛，”班长说。“别谈什么太阴历的月份啦。”

“住在海边或者乡下的人都知道，重要的是看太阴历的月份而不是看太阳历的，”在煮东西的兵说。“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

太阴历五月刚开头，可是太阳历马上就到六月份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老是落在季节后面呢？”班长说。“这些个事叫我糊涂了。”

“你是城里人，”在煮东西的兵说。“你是卢戈^①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海，什么叫乡下？”

“城里人可比你们这些文盲在海边或乡下要见识多些。”

“第一批沙丁鱼群在这个太阴历的月份里要来了，”在煮东西的兵说。“沙丁鱼船在这个太阴历的月份里要整装待发了，鲐鱼可已经到北方去了。”

“你既然是诺亚^②人，干吗没有参加海军？”班长问。

“因为我登记表上填的不是诺亚，而是我的出生地内格雷拉。内格雷拉在坦布雷河上游，那里的人都被编进陆军。”

“运气更坏，”班长说。

“别以为当海军就没危险，”坐在铺上的兵说。“即使不大会打仗，那一带海岸在冬天也满危险的。”

“再没有比当陆军更糟糕的了，”班长说。

“你还算是班长哪，”在煮东西的兵说。“你哪能说这种话？”

“不，”班长说。“我是就危险性来说的。我是说要挨到炮轰空袭，不得不冲锋陷阵，躲在掩体里度时光。”

“我们在这里倒没什么，”坐在铺上的兵说。

“托天主的福，”班长说。“可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会吃到这种苦头呀？我们当然不可能永远过现在这种舒服日子的！”

“你看，我们这个任务还要执行多久？”

① 卢戈(Lugo)为加利西亚地区卢戈省省会。

② 诺亚(Noya)为滨大西洋的一个渔港，居民惯于海上生活。

“我不知道，”班长说。“不过我希望整个战争期间我们能一直执行这个任务。”

“六小时值一班岗，时间太长啦，”在煮东西的兵说。

“如果风雪不停，我们三小时值一岗，”班长说。“这原是应该的嘛。”

“参谋部那些汽车是什么意思？”坐在铺上的兵问。“这么多参谋部的汽车开来开去，我可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班长说。“这些都不是好兆头。”

“还有飞机，”在煮东西的兵说。“又是个不妙的兆头。”

“可是我们的飞机很厉害，”班长说。“共产党可没有我们这样的飞机。今天早晨的那些飞机，叫谁都会高兴的。”

“我见过共产党的飞机，也够厉害的，”坐在铺上的兵说。“我见过那些双引擎轰炸机，当初挨到它们轰炸的时候，真叫人胆战心惊。”

“不错。可是没我们的厉害，”班长说。“我们的飞机谁也敌不过。”

这就是他们在锯木厂里的聊天，而这时安塞尔莫在雪中等待，望着公路和锯木厂窗子里的灯光。

安塞尔莫正在想：但愿杀人的事不由我来干。我看哪，等战争结束了，对杀人的行为总得有些好好儿苦行赎罪的办法吧。要是战后我们不再信教了，那么我看，百姓总得采取一种苦行赎罪的办法，来涤除杀过人的罪孽，否则，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了。杀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对一个人来说，干这种事总是缺德的。我看哪，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得了胜利，一定会有一种苦行赎罪的办法，来涤除我们大家的罪孽。

安塞尔莫是个十分善良的人，每当他一个人待着的时间一

长——而他是经常一个人待着的——这个杀人的问题就在他心里浮起。

他想，我弄不懂这个英国人。他对我说过，他不在乎杀人。可是他的样子既敏感又善良。也许对年轻人说来，这是无所谓的。也许对外国人说来，或者对不信奉我们的宗教的人们说来，态度就不一样。不过依我看，凡是杀人的人，迟早都要变得毫无人性，而且依我看，即使杀人是必要的，它仍然是桩大罪过，事后我们要花极大的力气才能赎罪。

天黑了，他望着公路对面的灯光，用双手拍拍胸脯取暖。他想，现在一定要回营地去了。但是有一种感情使他仍待在公路上边的那株树旁不走。这时雪下得更大了，安塞尔莫就想：要是今夜能炸桥就好了。象这样的夜晚，拿下哨所，炸掉大桥，都算不上一回事，一下子可以全都干好。象这样的夜晚，干什么事都行。

随后他靠着树站在那里，轻轻地跺着脚，不再去想那座桥了。黑夜的来临总使他感到孤单，今夜他特别感到孤单，心里有一种饥饿般的空虚。往日里，他孤单的时候可以靠祷告来帮忙，他经常在打猎回家的路上反反复复地念着同一段祷文，这使他觉得好受一点。但是革命开始以来，他一次也没祷告过。他感到若有所失，但是他认为现在再祷告是不适当的，是言行不一致的，他不愿祈求任何恩宠，或接受与众不同的待遇。

他想，是啊，我感到孤单。但是所有那些当兵的，当兵的老婆，那些失去家人或爹娘的人都是如此。我没老婆了，幸好在革命前她就死了。她是不会理解的。我没儿女，再不会有儿女啦。白天没事干的时候我感到孤单，可是黑夜来到了感到更孤单。不过，我有一桩事是无论谁还是天主都没法夺走的，那就是我

给共和国好好出了力。我一直在为争取以后我们大家可以分享的好处而出大力。革命一开始，我就尽力而为，我干的事没一桩是问心有愧的。

我感到惭愧的只是杀人的事儿。不过以后一定有机会来补偿，因为有这种罪孽的人可不少，以后当然会想出一个补救办法来的。我倒要跟这个英国人谈谈这件事，不过人家年青，不一定能理解。他提起过杀人的问题。要不，是我提起的吧？他一定杀过很多人，不过他没露出喜欢干这种事的迹象。喜欢杀人的人总是骨子里就堕落的。

他想，杀人必然是罪大恶极的事。因为，我知道，即使有必要，我们也没权利杀人。可是在西班牙，杀人太随便啦，而且常常是没有真正的必要，草菅人命的事多得很，事后无法补救。他想，我还是别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心思吧。但愿有赎罪的办法，让人家现在就开始做，因为我一辈子干的事情中只有这件使我在一个人待着时感到难受。任何别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宽恕，要不，你总有机会做些好事或者用什么合理的办法来补偿。可是我看，杀人这种事肯定是罪大恶极，我希望能弥补这件事。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一个人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工作或者力所能及的事去涤除杀人的罪孽。也许象是在教堂里做礼拜时的捐献，他想，不禁微笑了。教会为赎罪安排得好好的。想到这个，他高兴起来，罗伯特·乔丹朝他走来时，他正在黑暗中微笑。罗伯特·乔丹悄悄地走来，走到老头儿跟前他才看到。

“你好，老头子，”罗伯特·乔丹压低了声音说，还拍拍他的背。

“冷得很哪，”安塞尔莫说。费尔南多站得稍远些，背顶着风雪。

“来吧，”罗伯特·乔丹低声说。“上山到营地去取暖吧。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这么久，真是罪过。”

“那是他们的灯火，”安塞尔莫指点说。

“哨兵在哪儿？”

“你在这里望不到。他在拐角处。”

“让他们见鬼去吧，”罗伯特·乔丹说。“你到营地再跟我讲吧。来，我们走。”

“我指给你看，”安塞尔莫说。

“我早晨会来看的，”罗伯特·乔丹说。“来吧，喝一口。”

他把扁酒瓶递给老头儿。安塞尔莫侧着瓶子喝了一口。

“哎哟，”他说，擦擦嘴。“象火一样。”

“来吧，”罗伯特·乔丹在黑暗中说。“咱们走。”

天色这时黑得叫人只能看到在空中刮过去的雪片和那些一动不动的黑魆魆的松树干。费尔南多站在山坡上，离他们几步路。罗伯特·乔丹想，他真象雪茄烟店门口的木雕印第安人^①。看来我得请他也喝一口。

“嗨，费尔南多，”他走上前去说。“来一口吧？”

“不，”费尔南多说。“谢谢你。”

罗伯特·乔丹想：我得谢谢你呢。幸亏雪茄烟店门口的印第安人不喝酒。剩下不多啦。罗伯特·乔丹想，好样的，我很高兴见到这老头子。他望望安塞尔莫，接着又拍拍他的背，一起开始上山。

“我见到你很高兴啊，老头子，”他对安塞尔莫说。“我忧闷的

① 这种彩色木雕像一般和真人差不多大小，作招徕顾客之用。此处喻指费尔南多站在雪中一动不动的样子。

时候见到你就高兴。来，我们上山吧。”

他们在雪中爬山。

“回巴勃罗的宫殿去，”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这句话用西班牙语来说听起来很美妙。

“怕死鬼的宫殿，”安塞尔莫说。

“没蛋的岩洞，”罗伯特·乔丹乐呵呵地比另一个说得更俏皮。

“什么蛋？”费尔南多问。

“说笑话，”罗伯特·乔丹说。“说笑话呐。不是蛋，你知道，是另外的那一种。”

“可为什么没了？”费尔南多问。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说起来话可长呢。问比拉尔吧。”他说罢紧搂着安塞尔莫的肩膀一起走，还摇摇他。“听着，”他说。“见到你真高兴，听到吗？在这个国家你把一个人留在一个地方，之后竟能在原地方找到他，这不知道会使人多高兴呢。”

他对这个国家竟说出这种不尊重的话，这说明他对它怀着多大的信任和亲密感啊。

“我见到你也高兴，”安塞尔莫说。“不过，刚才我正打算不等下去了。”

“你才不会呢，”罗伯特·乔丹高兴地说。“你冻僵了才会离开。”

“山上的情况怎么样？”安塞尔莫问。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一切都好。”

他感到一种在革命队伍里当指挥的人才有的突如其来的难得的快乐心情，那种发现自己的两翼中竟有一翼仍然坚守着阵

地时的快乐心情。他想，要是两翼都能坚守下去，我看就力量无比。我看任何敌人都不指望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你把一翼的队形，任何一翼的队形拉开的话，最终就得每一个人独力作战。对啊，每一个人。他需要的可不是这种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这是个好人。一个好人。他想：我们这次进行战斗的时候，你一个人当左翼。我现在最好先不告诉你。他想，这将是一次规模挺小的战斗。但它将是一次挺出色的战斗。噢，我一直想独力地指挥一次战斗。我对从阿让库尔战役^①以来所有别人指挥的战斗的毛病，一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我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这一仗规模不会大，然而会很精采。如果我必须按照自己认为必要的方式去干的话，那确实会成为非常精采的一仗。

“听着，”他对安塞尔莫说。“见到你我真是高兴。”

“我见到你也一样高兴，”老头儿说。

他们在黑暗中爬山的时候是顺风，风雪在他们身边吹过。安塞尔莫这时不觉得孤单了。英国人刚才在他背上拍拍之后，他就不再觉得孤单了。英国人非常高兴，他们俩就说说笑笑。英国人刚才说一切都好，因此老头儿不愁了。酒一下肚，使他暖呼呼的，如今爬着山，两腿也暖和起来啦。

“公路上没什么情况，”他对英国人说。

“好，”英国人对他说。“我们到了营地你再给我看吧。”

安塞尔莫这时很高兴，他很高兴自己刚才在观察哨坚持了下来。

^① 阿让库尔(Agincourt)为法国西北部滨英吉利海峡的布洛涅港东南约三十英里处一小村，因一四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英法两军在此决战而著名。英王亨利五世利用弓箭手以寡敌众，大破穿戴笨重盔甲的法国骑士，使该战役成为世界军事史上著名战役之一。

罗伯特·乔丹在想，即使他自己回营地，也不能怪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回来，也是明智和正确的。罗伯特·乔丹想，然而他遵照命令待下去了。这在西班牙是非常难得的情形。在暴风雪中能坚守下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说明了不少问题。德国人把进攻称为暴风雨^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然愿意多用几个这种肯坚守下去的人。那是当然的啦。我不知道那个费尔南多会不会待着不走。这也是可能的。反正刚才自动跟来的是他。你以为他会待着不走吗？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他相当顽强。我来试探试探。不知道这个雪茄烟店门口的印第安人现在在想些什么。

“你在想什么，费尔南多？”罗伯特·乔丹问。

“你问干吗？”

“好奇，”罗伯特·乔丹说。“我是个很好奇的人。”

“我在想晚饭，”费尔南多说。

“你喜欢吃？”

“是呀。很喜欢。”

“比拉尔做饭手艺怎么样？”

“平常，”费尔南多回答。

罗伯特·乔丹想：他也是个讲究吃喝的人。不过，你知道，我总觉得他也会坚守下去的。

三个人在雪中一步一弯腰地爬山。

① 英语中的storm(暴风雨，此处指暴风雪)来自德语中的Sturm，两者都可作“进攻、袭击”解。

第十六章

“‘聋子’来过了，”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他们从风雪中走进烟雾弥漫、热气腾腾的山洞里。那妇人点点头，示意罗伯特·乔丹到她身边去。“他去找马了。”

“好。他有口信留给我吗？”

“他只说去找马了。”

“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她说。“瞧他。”

罗伯特·乔丹进洞的时候就看见了巴勃罗，巴勃罗对他露齿笑笑。这时他坐在板桌边朝他望着，又露齿笑笑，挥挥手。

“英国人，”巴勃罗招呼他。“天还在下雪呢，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朝他点点头。

“我把你的鞋拿去烤烤干，”玛丽亚说。“我把它挂在这炉灶的烟火上。”

“留心别把鞋烧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我不想在这里光着脚板走路。怎么回事？”他转身对比拉尔说。“这是在开会吗？你派人放了哨没有？”

“在这样的风雪里？亏你说的！”

桌边坐着六个人，背靠在墙上。安塞尔莫和费尔南多仍在洞口拍掉外套和裤子上的雪，朝墙上跺脚。

“把你的外套给我，”玛丽亚说。“别让雪化在衣服上。”

罗伯特·乔丹轻轻脱下外套，拍掉裤子上的雪，解开鞋带。

“这里全要给你弄湿了，”比拉尔说。

“是你招呼我过来的啊。”

“可没人拦住你，不让你回到洞口去拍雪哪。”

“对不起，”罗伯特·乔丹说，光着脚踏在泥地上。“找双袜子给我，玛丽亚。”

“夫君吩咐啦，”比拉尔说，向火里添了一块柴。

“你得抓紧现有的时间，”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背包上着锁，”玛丽亚说。

“钥匙在这里，”他把钥匙扔过去。

“这不是这只包上的钥匙。”

“开另一只包。袜子就在上面边上。”

姑娘找到了袜子，关好背包，上了锁，把袜子和钥匙一起拿过来。

“坐下来穿上袜子，把脚好好揉揉，”她说。罗伯特·乔丹咧嘴朝她笑笑。

“你不能用你的头发来把它们擦干吗？”他这话是故意说给比拉尔听的。

“真不是人，”她说。“开头象当家的。现在是我们的前任天主啦。拿木柴揍他，玛丽亚。”

“不，”罗伯特·乔丹对她说。“我是开玩笑，因为心里高兴。”

“你高兴？”

“对，”他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罗伯托，”玛丽亚说。“坐下，擦干脚，让我拿些喝的给你暖和暖和。”

“听她这么说，你会以为他从没踩湿过脚，”比拉尔说。“身上也从没掉过一片雪花。”

玛丽亚替他拿来一张羊皮，铺在山洞的泥地上。

“踩在上面，”她说。“踩在羊皮上，等鞋子干了再穿。”

羊皮是刚晾干不久的，还没有鞣过，罗伯特·乔丹把穿着袜子的脚踩在上面，羊皮窸窣作响，象张羊皮纸。

炉火在冒烟，比拉尔对玛丽亚叫道，“扇扇炉火吧，没用的丫头啊。这里可不是熏制作坊。”

“你自己扇吧，”玛丽亚说。“我在找‘聋子’留下的酒瓶。”

“在他的背包后面，”比拉尔对她说。“你非把他当吃奶的娃娃来照顾不可吗？”

“不，”玛丽亚说。“把他当一个又冷又湿的男人，一个才回家的男人。找到啦。”她把酒瓶拿到罗伯特·乔丹坐着的地方。“这瓶酒就是你今天中午喝过的。瓶子可以做盏漂亮的灯。等再有电的时候，真可以把它做盏灯呢。”她赞赏地看着这只瓶身上有三个大凹痕的酒瓶。“你看它好不好，罗伯托？”

“我原以为我是叫英国人呢，”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叫你罗伯托，”她红着脸低声说。“你爱喝这酒吗，罗伯托？”

“罗伯托，”巴勃罗嘶哑地说，对罗伯特·乔丹点点头。“你爱喝这酒吗，堂·罗伯托？”

“你要喝点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巴勃罗摇摇头。“我正在用葡萄酒把自己灌醉，”他神气地说。

“那你去找巴克斯^①吧，”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话说。

“巴克斯是谁？”巴勃罗问。

^① 巴克斯(Bacchus)为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名。

“你的同志，”罗伯特·乔丹说。

“我可从没听到过他，”巴勃罗气咻咻地说。“在这山区里从没听到过。”

“给安塞尔莫来一杯，”罗伯特·乔丹对玛丽亚说。“挨冻的是他。”他正在穿上烘干的袜子。杯里兑水的威士忌爽口而暖人。他想：但是不象艾酒那么在肚子里翻腾。什么酒及得上艾酒啊！

他想：谁想得到这儿山里竟有威士忌。不过，要是仔细想想，在西班牙最可能搞到威士忌的地方，就得算拉格兰哈了。想想看，这“聋子”拿出一瓶来请作客的爆破手，并且记在心上，把它带来留在这里。这不光是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习惯是拿出瓶子，循规蹈矩地请人喝一杯。法国人就是会这样做的，他们还会把喝剩的留到下一次。是啊，当你干的事使你有充分理由可以毫不顾及别人，只顾你自己，可以毫不顾及别人的事，只顾你自己手头的事的时候，竟能真心体贴地想到客人会喜欢喝威士忌，并且后来再把它带来让他喝个痛快——这是西班牙人的本色。他想：这是某一种西班牙人的吧。你爱这些人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他们想到把威士忌带来。他想：别把他们看得太理想化了。美国人各各不同，西班牙人也如此。不过，带威士忌来这一点还是干得很漂亮。

“你觉得酒怎么样？”他问安塞尔莫。

老头儿坐在炉边，脸上堆着笑，两只大手捧着杯子。他摇摇头。

“不喜欢？”罗伯特·乔丹问他。

“小丫头在里头兑了水，”安塞尔莫说。

“罗伯特就是这么喝的嘛，”玛丽亚说。“你就跟人家不一

样？”

“不，”安塞尔莫对她说。“一点没什么不一样。我只是喜欢喝下肚火辣辣的劲头。”

“把杯子给我，”罗伯特·乔丹对姑娘说，“给他斟些火辣辣的玩意儿。”

他拿杯里的酒倒在自己杯里，把空杯递给玛丽亚，她小心翼翼地把酒瓶里的酒倒在杯里。

“啊，”安塞尔莫拿起酒杯，一仰脖灌进喉咙。他望望拿着酒瓶站在那儿的玛丽亚，对她眨眨眼睛，眼睛里涌出泪水。“对头，”他说。“对头。”他然后舔舔嘴唇。“这才能把我们肚里作怪的蛆虫杀死哪。”

“罗伯托，”玛丽亚走到他身边说，仍然拿着酒瓶。“你要吃饭吗？”

“饭做好了吗？”

“你要吃什么时候都行。”

“别人吃过了？”

“只有你，安塞尔莫和费尔南多还没吃。”

“那我们吃吧，”他对她说。“你呢？”

“等会儿跟比拉尔一起吃。”

“现在跟我们一起吃吧。”

“不。那不好。”

“来，吃吧。在我的国家里，男人不在他女人之前先吃。”

“那是你的国家。这里后吃比较合适。”

“跟他吃吧，”巴勃罗从桌边抬头说。“跟他吃。跟他喝。跟他睡。跟他死。照他国家的规矩办。”

“你醉了吗？”罗伯特·乔丹站在巴勃罗面前说。这个肮脏

的、满脸胡子茬的大汉兴高采烈地望着他。

“不错，”巴勃罗说。“你那个女人跟男人一起吃饭的国家，英国人，在哪里？”

“在美利坚合众国，在蒙大拿州。”

“男人跟女人一样穿裙子的地方，就是那里吗？”

“不。那是苏格兰。”

“可是听着，”巴勃罗说。“你穿裙子时，英国人——”

“我不穿裙子，”罗伯特·乔丹说。

“当你穿这种裙子的时候，”巴勃罗顾自说下去，“裙子里面穿什么？”

“我不知道苏格兰人的穿着，”罗伯特·乔丹说。“我自己也想知道。”

“别管苏格兰人，”巴勃罗说。“谁管苏格兰人呀？谁管名称那么希奇古怪的人呀？我不管。我才不管哪。你，我说，英国人。你。在你们国家，你们在裙子里面穿什么？”

“我对你说过两次啦，我们不穿裙子，”罗伯特·乔丹说。“既不是说酒话，也不是讲笑话。”

“可是你在裙子里面穿什么？”巴勃罗不放松地说。“因为大家知道，你们是穿裙子的。连大兵也穿。我见过照片，我在马戏场也见过。你在裙子里面穿什么，英国人？”

“那两个蛋，”罗伯特·乔丹说。

安塞尔莫哈哈大笑，其他听着的人也笑了，只有费尔南多例外。他认为在女人面前讲这样的粗话有失体统。

“噢，这是合情合理的嘛，”巴勃罗说。“不过我看，你真有了两个蛋，你就不会穿裙子了。”

“别让他再说这种话，英国人，”那个名叫普里米蒂伏的扁

脸、断鼻梁的汉子说。“他醉了。跟我讲讲，你们国家种什么庄稼，养什么牲口？”

“牛羊，”罗伯特·乔丹说。“还种很多粮食豆子。还种很多做糖的甜菜。”

这时他们三个坐在桌边，其他人挨在旁边坐着，只有巴勃罗独自坐在一边，面前放着一碗酒。炖肉还是跟昨晚的一样，罗伯特·乔丹狼吞虎咽地吃着。

“你们那里有大山吗？既然叫蒙大拿^①，当然有大山啦，”普里米蒂伏客气地问，想打开话匣子。巴勃罗喝醉了酒，使他很窘。

“有很多大山，高得很哪。”

“有好牧场吗？”

“好极了；夏天有政府管理的森林里的高原牧场。到秋天，就把牛羊赶到较低的山坡上去放牧。”

“那里土地是农民自己的？”

“大多数土地归种地的人所有。土地本来是国家的，不过，如果有人在那里生活，并且表示愿意开垦的话，一个人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公顷土地。”

“跟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奥古斯丁问。“这是种蛮有意思的土地改革呀。”

罗伯特·乔丹讲解了分给定居移民宅地^②的过程。他以前

① 蒙大拿州的州名(Montana)和西班牙语中的 montaña 一词都源出拉丁语，意为“山岳、山区”。

②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规定任何一家之主，或满二十一岁的公民可向政府领取一百六十公顷土地，定居开垦三年后，成为该地的所有者。该法案促进了广大西部的开发，成为后来各州土地法的基础。此处罗伯特·乔丹提及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蒙大拿州的情况。

从没想到这算是一种土改。

“真是呱呱叫，”普里米蒂伏说。“这么说你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罗？”

“不。那是在共和国领导下进行的。”

“依我看，”奥古斯丁说，“在共和国领导下，什么事都办得好。我看不需要别的政府形式了。”

“你们没有大业主吧？”安德烈斯问。

“有很多。”

“那就一定有弊病罗。”

“当然。有很多。”

“你们可要想法消灭这些弊病？”

“我们越来越想这样做。不过弊病仍旧很多。”

“有没有很大的产业必须加以限制的？”

“有。不过，有人认为，靠抽税就能限制它们扩展。”

“怎样做法？”

罗伯特·乔丹解释所得税和遗产税的作用，一边用面包抹着炖肉碗。“不过，大产业还是有的。还有土地也要征税，”他说。

“可是大业主和有钱人准要闹革命来反对这些税啦。我看这些税倒是革命的。他们看到自己要倒霉，准会起来反抗政府，就象法西斯分子在这里干的那样。”

“这可能。”

“那么在你们国家里，也得象我们这里一样，必须斗争啦。”

“是啊，我们不斗争不行。”

“不过在你们国家里，法西斯分子不多吧？”

“很多，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就是法西斯分子，不过到头来是

会明白过来的。”

“可是，他们不造反，你们就不能消灭他们吧？”

“对，”罗伯特·乔丹说。“我们不能消灭他们。不过我们可以教育人民警惕法西斯主义，等它一出现就有所认识，向它斗争。”

“你知道什么地方没有法西斯分子？”安德烈斯问。

“什么地方？”

“在巴勃罗老家的那个镇上，”安德烈斯说，露齿笑了。

“那镇上发生的情况，你知道吧？”普里米蒂伏问罗伯特·乔丹。

“知道。我听说了。”

“是比拉尔讲的？”

“不错。”

“你从那女人嘴里是听不到全部真相的，”巴勃罗气咻咻地说。“她没看到结局，因为她在窗外从椅子上摔下去了。”

“那你把后来的情形给他讲讲吧，”比拉尔说。“既然我不知道，你讲就是了。”

“不，”巴勃罗说。“我从来没对人讲过。”

“不错，”比拉尔说。“你以后也不会讲啦。如今你可希望根本没有发生那件事。”

“不，”巴勃罗说。“这话说得不对。要是大家跟我一样把法西斯分子杀个干净，我们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不过，我但愿当时的情况不象已经发生的那样。”

“你说这话算什么意思？”普里米蒂伏问他。“你在改变政治见解吗？”

“不。不过当时太狠心了，”巴勃罗说。“那些日子里我太狠

心了。”

“你现在可醉了，”比拉尔说。

“对，”巴勃罗说。“请你包涵。”

“我倒喜欢你狠心的时候，”妇人说。“男人中最讨人厌的是酒鬼。贼不偷的时候就象人样。流氓不在自己家里敲诈勒索。杀人犯在家里会洗手不干。可是酒鬼臭气冲天，在自己床上呕吐，让酒精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烂掉。”

“你是女人，不懂，”巴勃罗心平气和地说。“我喝得烂醉，如果我没有杀过那些人就快活了。那些人叫我伤心不堪。”他忧郁地摇着头。

“拿‘聋子’捎来的酒给他一些，”比拉尔说，“给他一些壮壮胆。他伤心得受不住了。”

“要是我有本事使他们复活，我一定干，”巴勃罗说。

“去你奶奶的，”奥古斯丁对他说。“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一定使他们都复活，”巴勃罗伤心地说。“每个人。”

“去你妈的，”奥古斯丁朝他大叫。“免了这种话吧，要不就滚出去。你杀的人是法西斯分子啊。”

“你听见我说的了，”巴勃罗说。“我要使他们都复活。”

“那你就能在海面上行走啦^①，”比拉尔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男人。到昨天为止你还有一点男人气概。今天呢，你还不如一只有病的小猫。你喝得醉醺醺的，还怪高兴呢。”

“那时应该一个也不留，要就一个也不杀，”巴勃罗点着头

① 喻指耶稣基督。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曾使已埋葬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从墓穴里走出来。另据《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耶稣曾在四更天在海面上行走，使门徒及看到的人相信他真是上帝的儿子。

说。“一个也不留，要就一个也不杀。”

“听着，英国人，”奥古斯丁说。“你怎么会到西班牙来的？别理巴勃罗。他醉了。”

“我第一次来是在十二年前，为了研究这个国家和西班牙语，”罗伯特·乔丹说。“我在大学里教西班牙语。”

“你可不大象教授啊，”普里米蒂伏说。

“他没有胡子，”巴勃罗说。“瞧他，他没胡子。”

“你真的是教授吗？”

“是讲师。”

“反正你教课？”

“对。”

“可是干吗教西班牙语呢？”安德烈斯问。“你既然是英国人，教英语不是容易些？”

“他的西班牙语说得跟我们一样，”安塞尔莫说。“干吗他不教西班牙语？”

“对。不过外国人教西班牙语可多少有点自不量力，”费尔南多说。“我可没有反对你的意思，堂·罗伯托。”

“他是个冒牌教授，”巴勃罗自得其乐地说。“他没有胡子。”

“你的英语肯定更好些，”费尔南多说。“教英语不是更好些、更容易些、更清楚些？”

“他不是教西班牙人——”比拉尔开始插嘴了。

“但愿如此，”费尔南多说。

“让我把话说完，你这个蠢驴，”比拉尔对他说。“他是给美洲人教西班牙语。北美洲人。”

“他们不会讲西班牙话吗？”费尔南多问。“南美人是会讲的。”

“蠢驴，”比拉尔说。“他教说英语的北美人。”

“不管怎么样，他既然讲英语，我看还是教英文容易些，”费尔南多说。

“难道你没听到他说的西班牙话吗？”比拉尔无可奈何地对罗伯特·乔丹摇摇头。

“不错。不过带点口音。”

“哪里的口音？”罗伯特·乔丹问。

“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

“我的妈呀，”比拉尔说。“这种人哪！”

“可能的，”罗伯特·乔丹说。“我是从那儿来的。”

“他自己很清楚，”比拉尔说。“你这个老姑娘，”她扭头对费尔南多说，“你吃够了吗？”

“东西多的话，我还能吃，”费尔南多对她说。“别以为我的话是反对你，堂·罗伯托——”

“奶奶的，”奥古斯丁干脆地说。“操你奶奶的。咱们干革命就是为了对同志称呼堂·罗伯托吗？”

“依我看，革命就是为了让大家相互称呼‘堂’，”费尔南多说。“共和国领导下就该这样。”

“奶奶的，”奥古斯丁说。“黑奶奶的。”

“我还是认为堂·罗伯托教英语来得容易些、清楚些。”

“堂·罗伯托没胡子，”巴勃罗说。“他是冒牌教授。”

“你说我没胡子是什么意思？”罗伯特·乔丹说。“这是什么？”他摸摸下巴和脸颊，三天没刮脸，长了一片黄色的短胡须。

“不是胡子，”巴勃罗说。他摇摇头。“那不算胡子。”他这时简直喜气洋洋了。“他是个冒牌教授。”

“我操你们的奶奶，”奥古斯丁说。“这里简直象疯人院。”

“你该喝酒，”巴勃罗对他说。“依我看，什么都正常，就只是堂·罗伯托没长胡子。”

玛丽亚伸手摸着罗伯特·乔丹的脸颊。

“他有胡子，”她对巴勃罗说。

“你当然知道，”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对他望着。

罗伯特·乔丹想：我看他不见得真醉成这样。不，不见得真醉成这样。我看最好还是多加小心。

“你，”他对巴勃罗说。“你看这场雪会下长吗？”

“你看呢？”

“我问你。”

“问别人吧，”巴勃罗对他说。“我不是你的情报部。你有情报部的证明文件嘛。问那女人。她当家。”

“我问你。”

“去你妈的，”巴勃罗对他说。“你和这女人和这丫头，全见鬼去吧。”

“他醉了，”普里米蒂伏说。“别睬他，英国人。”

“我看他没有真的醉成这样，”罗伯特·乔丹说。

玛丽亚站在他背后。罗伯特·乔丹看到巴勃罗隔着他的肩头在打量着她。他那满脸胡子的圆脑袋上长着两只小眼睛，这双公猪般的小眼睛正在打量着她。罗伯特·乔丹想：我在这次战争中见过不少杀人者，以前也见过一些，他们各不相同；没有相同的特征，没有相同的面貌，也没有所谓天生的凶犯相；不过巴勃罗确实长得丑。

“我看你不会喝酒，”他对巴勃罗说。“我看你也没有喝醉。”

“我醉了，”巴勃罗神气地说。“喝酒没什么了不起。喝醉才

了不起。我醉得很厉害。”

“我不信，”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胆小如鼠，倒是真的。”

山洞里顿时鸦雀无声，他听得到比拉尔烧饭的炉灶里柴火发出的噼啪声；他听到自己把全身的分量踩在羊皮上所弄出的窸窣声。他自以为简直能听到洞外的下雪声。他实在听不到，但能听出落地无声的寂静。

罗伯特·乔丹在想：我真想把他杀掉，一了百了啊。我不知道他打算耍些什么花招，但肯定不会有好事。后天早晨就要炸桥，而这家伙真糟糕，他对整个任务的完成实在是危险的。来吧。我们把这件事了了吧。

巴勃罗朝他露齿笑笑，伸出一只指头，在脖子上一划。他摇摇头，可是脑袋在那又粗又短的脖子上只微微晃动了一下。

“不行，英国人，”他说。“别惹我发火。”他望着比拉尔，对她说，“你想这样把我搞掉可不行。”

“无耻之徒，”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存心想动手了。“胆小鬼。”

“很可能是嘛，”巴勃罗说。“可我才不会让你惹恼呢。喝点儿什么吧，英国人，给那女人打个手势告诉她没成功。”

“闭嘴，”罗伯特·乔丹说。“我是自己向你寻事。”

“白费心思，”巴勃罗对他说。“我才不会被惹恼呢。”

“你真是个怪物，”罗伯特·乔丹说，不愿就此罢休；不愿这第二次尝试又遭到失败；他说话时就明白，这种场面以前已演过一遍了；他感到他正根据记忆，按照曾在书上看到的、或梦中见过的样子在演一个角色，觉得一切在周而复始。

“很怪，是啊，”巴勃罗说。“很怪，并且很醉了。祝你健康，英国人。”他在酒缸里舀了一杯，举起杯子。“祝你健康，有种。”

罗伯特·乔丹想：是啊，他这个人很怪，很机灵，很不简单。他只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听不到炉灶里的声音了。

“为你干杯，”罗伯特·乔丹说，也舀了杯酒。他想，不来上这一套祝酒的玩艺，就谈不上什么背弃自己的打算了。干杯吧。“干杯，”他说。“干杯，再一次干杯。”他想：你干杯吧。干杯，你干杯吧。

“堂·罗伯托，”巴勃罗气咻咻地说。

“堂·巴勃罗，”罗伯特·乔丹说。

“你不是教授，”巴勃罗说，“因为你没长胡子。再说，要把我干掉，只能靠暗杀，但要这样干，你可没种。”

他望着罗伯特·乔丹，紧闭着嘴，嘴唇抿成一条线。罗伯特·乔丹想：真象鱼的嘴。长着这样一个脑袋，就象被捉住后的针鲇在吸进空气，把身体胀大。

“干杯，巴勃罗，”罗伯特·乔丹说，举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从你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我在教教授啦，”巴勃罗点点头。“来吧，堂·罗伯托，我们做个朋友吧。”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罗伯特·乔丹说。

“现在我可要做好朋友啦。”

“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我要离开这里了，”奥古斯丁说。“一点不错，人家说我们活一辈子至少要听到一吨假话，刚才这一会儿我每个耳朵里就灌进了二十五磅。”

“你怎么啦，黑鬼？”巴勃罗对他说。“你看到堂·罗伯托跟我做朋友不喜欢吗？”

“你嘴里可别不干不净地叫我黑鬼。”奥古斯丁走到他面前

站住了，双手垂在身旁。

“人家就是这样叫你的嘛，”巴勃罗说。

“不要你叫。”

“行，那么叫白人——”

“也不要这样叫。”

“那么叫你什么呢？赤色分子——”

“对。赤色分子。佩着部队的红星，拥护共和国。我的名字叫奥古斯丁。”

“好一个爱国者，”巴勃罗说。“瞧，英国人，好一个爱国模范。”

奥古斯丁举起左手，反手一挥，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巴勃罗坐在那儿，嘴角上沾着酒，声色不动，但罗伯特·乔丹注意到，他眯细了眼睛，就象猫的瞳孔在强光前收缩成一条垂直的狭缝那样。

“这也不行呢，”巴勃罗说。“别指望这么做啦，太太。”他转过头来朝着比拉尔。“我不会被惹恼的。”

奥古斯丁又揍了他一下。他这次紧握了拳头，打在他嘴上。罗伯特·乔丹在桌子下面用手握着手枪。他扳开保险，左手推开玛丽亚。她挪了挪身子，他用左手在她肋骨上又使劲地推了一下，叫她真的走开。她这才走开了。罗伯特·乔丹从眼梢上瞅见她沿着洞壁朝炉灶悄悄走去，于是才注视着巴勃罗的脸色。

这个圆脑袋的汉子坐着，没神的小眼睛瞪着奥古斯丁。这时，瞳孔竟变得更小了。他舔舔嘴唇，举起一条手臂，用手背擦擦嘴，低头一看，看到了手上的血。他用舌头舔着嘴唇，接着唾了一口血水。

“这也不行，”他说。“我不是傻瓜。我不会着恼。”

“王八蛋，”奥古斯丁说。

“你哪会不知道，”巴勃罗说。“你了解这女人的嘛。”

奥古斯丁又狠狠地给他嘴上一拳。巴勃罗冲着他哈哈大笑，染红的嘴里露出一口黄色的坏牙。

“算了吧，”巴勃罗说，用杯子从缸里舀了些酒。“这里谁也没有种来杀我，挥拳头是傻瓜。”

“胆小鬼，”奥古斯丁说。

“骂人也是白搭，”巴勃罗说，用酒漱着口，发出咕噜噜噜的声音，然后吐在地上。“骂我，根本是白搭。”

奥古斯丁站在那里，低头望着他，慢吞吞地，一字一句地，刻薄而轻蔑地骂他，一迭连声地骂着，好象正在用粪肥从粪车里一下下地挑起肥料，给地里施肥似的。

“再骂也是白搭，”巴勃罗说。“算了，奥古斯丁。别再接我啦。你会伤了自己的手。”

奥古斯丁从他身旁走开，朝洞口走去。

“别出去，”巴勃罗说。“外面在下雪。你就在里面舒服一会吧。”

“你！你！”奥古斯丁在门口转身对他说，把他满腔的轻蔑都放在“你”这个字里面。

“对，就是我，”巴勃罗说。“等你归天的时候，我一定还活着。”

他又舀了一杯酒，向罗伯特·乔丹举起杯子。“为教授干杯，”他说。然后转身对比拉尔。“为太太司令干杯。”接着为大家祝酒，“为全体痴心妄想的人干杯。”

奥古斯丁走到他面前，用手倏的一砍，打掉了他手中的杯子。

“把酒糟踢了，”巴勃罗说。“多蠢啊。”

奥古斯丁对他恶毒地骂了一声粗话。

“不，”巴勃罗说，又舀了一杯。“我醉了，你没看到吗？我不醉的时候不大说话。你从没听到过我说这么多话。不过，聪明人和傻瓜泡时间，有时就不得不喝醉。”

“滚，操你奶奶的怕死鬼，”比拉尔对他说。“你这个怕死鬼，我看透啦。”

“这女人家的嘴多脏啊，”巴勃罗说。“我要出去看马了。”

“操它们去吧，”奥古斯丁说。“这不是你的老规矩吗？”

“不，”巴勃罗说着摇摇头。他从洞壁上取下毯子式的披风，望望奥古斯丁。“你啊，”他说。“太粗暴了。”

“你去和马干什么？”奥古斯丁说。

“去查看一下，”巴勃罗说。

“操它们，”奥古斯丁说。“嫖马客。”

“我非常喜欢它们，”巴勃罗说。“哪怕从屁股后边望去，它们也要比这帮家伙漂亮些、懂事些。你们自己消遣吧，”他露齿笑笑说。“跟他们谈谈桥吧，英国人。向他们交代袭击时的任务。告诉他们撤走的办法。炸桥之后，英国人，你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你把你这些爱国者带到哪里去呀？整整一天，我一面喝酒，一面在琢磨这件事。”

“你想到了什么？”奥古斯丁问。

“我想到了什么？”巴勃罗说，舌头在嘴里到处舔着。“我想到了什么，跟你有什么相干？”

“说说吧，”奥古斯丁对他说。

“很多事，”巴勃罗说。他把披风从头上套下去，那滚圆的脑袋从这肮脏的黄披风中央的圆孔里伸了出来。“我想到了很多

事。”

“什么事？”奥古斯丁说。“什么事？”

“我想到，你们是一帮痴心妄想的家伙，”巴勃罗说。“带头的一个是女人，头脑长在两条大腿中间，另一个是来送你们上西天的外国佬。”

“滚，”比拉尔对他喝道。“滚，到雪里去玩你自己吧。你给我滚开，你这被马儿掏空了身子的嫖客。”

“说得多带劲啊，”奥古斯丁钦佩地说，可是有点心不在焉。他发愁了。

“我走，”巴勃罗说。“不过我马上就要回来。”他撩起洞口的毯子，走到外面，接着在洞外嚷嚷，“英国人，还在下雪哪。”

第十七章

雪从山洞顶上的窟窿里飘落在炉灶的煤火上，发出嗞嗞声，这是这时山洞里唯一的声音。

“比拉尔，”费尔南多说。“还有炖肉吗？”

“呸，闭嘴，”妇人说。但玛丽亚接过费尔南多的碗，拿到已从炉灶边端下的大铁锅旁，在里面舀吃的。她把它端到桌边，搁在桌上，费尔南多俯身去吃。她拍拍他的肩头，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一只手搁在他肩上。但费尔南多没有抬头。他一心一意地吃着炖肉。

奥古斯丁站在炉灶边。其他人都坐着。比拉尔坐在桌边，罗伯特·乔丹的对面。

“唉，英国人，”她说，“你看到他是什么模样啦。”

“他会怎么干？”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都干得出来，”妇人低头望着桌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他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自动步枪在哪里？”罗伯特·乔丹问。

“在那边角落里，裹在毯子里，”普里米蒂伏说。“你要吗？”

“等会要，”罗伯特·乔丹说。“我想知道枪藏在哪儿。”

“就在那儿，”普里米蒂伏说。“我把它拿进来裹在我的毯子里了，免得受潮。弹药盘在那只包里。”

“他不会动它的，”比拉尔说。“他不会拿这支机关枪干什么名堂。”

“我记得你刚才还说他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有这个可能，”她说。“不过他没有用过机关枪。他可能扔个炸弹进来。这才更符合他的作风。”

“不把他干掉，就是蠢，胆小，”吉普赛人说。在整个晚上这场谈话中，他没开过口。“罗伯托昨晚就该把他干了。”

“杀了他吧，”比拉尔说。她那张大脸上露出了阴郁而疲惫的神色。“我现在赞成这个办法了。”

“我本来是反对的，”奥古斯丁说。他站在炉灶前，两条长手臂垂在身体两侧，颧骨下满是胡子茬的两颊，在炉火映照下显得凹陷了。“我现在赞成了，”他说。“他这个人现在很恶毒，毁了我们大家他才高兴。”

“大家说说吧，”比拉尔说，但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安德烈斯，你说呢？”

“杀掉他，”两兄弟中那个黑头发在前额上生得很低的说，还点点头。

“埃拉迪奥？”

“一样，”另一个兄弟说。“依我看，他是个大祸根。而且他根本不中用了。”

“普里米蒂伏？”

“一样。”

“费尔南多？”

“我们不能把他关起来吗？”费尔南多问。

“谁来看守囚徒？”普里米蒂伏说。“一个囚徒得两个人看。再说，最后我们怎么处理他？”

“我们可以把他抛给法西斯分子，”吉普赛人说。

“这种事干不得，”奥古斯丁说。“这种卑鄙勾当干不得。”

“我不过是出个主意罢了，”吉普赛人拉斐尔说。“依我看哪，叛乱分子会高兴把他弄到手的。”

“算了吧，”奥古斯丁说。“那太卑鄙了。”

“也不比巴勃罗更卑鄙吧，”吉普赛人为自己辩护道。

“不能用卑鄙来对付卑鄙，”奥古斯丁说。“好，大家都说了。还有老头子和英国人没讲。”

“他们跟这没关系，”比拉尔说。“他没有当过他们的头。”

“等一等，”费尔南多说。“我的话还没说完。”

“说啊，”比拉尔说。“一直说到他回来。说到他从毯子下面扔个手榴弹进来把我们全炸掉，把炸药什么的全炸掉。”

“我认为你看得太严重了，比拉尔，”费尔南多说。“我看他不至于有这种心思吧。”

“我看也不会，”奥古斯丁说。“因为这一来把酒也要炸掉啦，可等一会他就要来喝的。”

“干吗不把他交给‘聋子’，让‘聋子’去把他抛给法西斯分子？”拉斐尔提议说。“可以弄瞎他的眼睛，那就容易对付了。”

“闭嘴，”比拉尔说。“你一开口，我就觉得你这人实在也该杀。”

“法西斯分子反正不肯在他身上花一个子儿，”普里米蒂伏说。“这种事别人试过，他们不给钱，倒会把你也毙掉。”

“我认为，弄瞎了他的眼睛，能拿他卖到钱，”拉斐尔说。

“闭嘴，”比拉尔说。“要是再说弄瞎眼睛，你可以跟他一起去。”

“可是巴勃罗弄瞎过受伤的民防军，”吉普赛人不放松地说。“那一回你忘了吗？”

“住口，”比拉尔对他说。当着罗伯特·乔丹的面提到弄瞎眼睛这回事，使她发窘。

“我的话没让说完哪，”费尔南多插嘴说。

“说吧，”比拉尔对他说。“说下去。把话说完。”

“既然把巴勃罗关起来行不通，”费尔南多开始说，“而通过任何形式的谈判把他抛给敌人的做法又使人太反感——”

“快说啊，”比拉尔说。“看在天主面上快说啊。”

“我认为，”费尔南多不慌不忙地说下去，“为了保证计划中的行动取得最大成功，最好也许是结果他。”

比拉尔望望这个矮小的汉子，摇摇头，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费尔南多说。“我相信，我们把他看成是对共和国的危害，是有根据的——”

“圣母玛丽亚啊，”比拉尔说。“即使在这里，人也会打官腔。”

“这是既根据他自己的言论又根据他最近的作为来看的，”费尔南多接着说。“尽管他在革命初期并且直到不久以前所做的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比拉尔已走到炉火边。这时她来到桌子旁。

“费尔南多，”比拉尔平静地说，递给他一个碗。“请你规规矩矩地吃了这碗炖肉，把你的嘴塞满了，别再开口啦。我们了解你的意见了。”

“可是，那么怎样——”普里米蒂伏问到这里就不说下去了。

“我准备好了，”罗伯特·乔丹说。“既然大家决定该这么干，这件事我能出把力。”

他想：我怎么啦？听了费尔南多说话，我的调子也跟他一样啦。这种语言一定有传染性。法语是外交语言。西班牙语是官僚语言。

“别，”玛丽亚说。“别。”

“这不关你的事，”比拉尔对姑娘说。“把嘴闭上。”

“今晚我就动手，”罗伯特·乔丹说。

他看到比拉尔对他看了一眼，手指放在嘴唇上。她正望着洞口。

系在洞口的毯子给撩起了，巴勃罗探进头来。他露齿朝大家笑笑，撩开毯子挤身进来，然后回身系上挂毯。他转身站在那里，脱掉披风，抖去上面的雪。

“你们在谈我吧？”他对大家说。“我把你们的话打断啦？”

没人接他的话，他把披风挂在洞壁的木钉上，向桌子走去。

“怎么样？”他问，拿起桌上他那只空杯子在酒缸里舀酒。“酒没了，”他对玛丽亚说。“到酒袋里去倒些来。”

玛丽亚拿起酒缸，朝酒袋走去。这只倒挂在洞壁上的外面涂了柏油的皮酒袋积满了灰尘，胀得滚圆。她把一条腿上的旋塞拧开一点，让酒从旋塞四周喷射在酒缸里。巴勃罗望着她跪着端起了酒缸，望着那淡红色的酒很快地注进缸里，酒越来越

满，在缸里打着旋。

“小心别洒了，”他对她说。“袋里的酒只剩一半了。”

没人说话。

“我今天从皮酒袋的肚脐那儿喝到了胸口^①，”巴勃罗说。
“一天的成绩。你们大伙儿怎么啦？舌头丢啦？”

大家一句话也没有。

“把塞子旋紧，玛丽亚，”巴勃罗说。“别让酒漏了。”

“酒多的是哪，”奥古斯丁说。“够你喝个醉。”

“有人找到舌头了，”巴勃罗说，对奥古斯丁点点头。“恭喜恭喜。我以为你给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啦。”

“为什么？”奥古斯丁问。

“因为我进来了。”

“你以为你进来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罗伯特·乔丹想：看来奥古斯丁在动起来啦。也许他就要动手了。他当然非常恨巴勃罗。我不恨他，他想。是啊，我不恨他。他叫人讨厌，可我不恨他。虽然弄瞎眼睛这种事使他显得特别要不得。然而这是他们的战争。今后两天里有他在身边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想：我不打算插手这件事啦。今晚我一度当了傻瓜，我竟巴不得把他干掉。我可决定不到时间不跟他胡来啦。而且炸药就在旁边，可不能在这山洞里来什么射击比赛，闹什么儿戏。巴勃罗当然想到了这一点。他对自己说：你刚才想到了吗？没有，你没想到，奥古斯丁也没想到。他想：如果万一出了什么纰漏，你活该。

① 这种皮酒袋用整张牛皮制成，四条腿封住，在一条腿上安上个龙头，倒挂在墙上，要酒时旋开龙头即可。巴勃罗非常贪杯，那天喝了不少，袋内余酒的水平面已从这牛皮上的肚脐处降到了胸部。

“奥古斯丁，”他说。

“什么？”奥古斯丁阴沉地抬起眼睛，扭过头不去看巴勃罗。

“我想跟你说句话，”罗伯特·乔丹说。

“以后说吧。”

“现在，”罗伯特·乔丹说。“劳驾啦。”

罗伯特·乔丹已走到洞口，巴勃罗的目光跟着他。身材高大、脸颊凹陷的奥古斯丁站起身向他走去。他勉强而轻蔑地挪动着脚步。

“背包里藏的什么东西，你忘了？”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声音低得听也听不清。

“奶奶的！”奥古斯丁说。“一习惯就忘了。”

“我刚才也忘了。”

“奶奶的！”奥古斯丁说。“我们真是傻瓜！”他大摇大摆地回到桌边坐下。“来一杯，巴勃罗，老兄，”他说。“马儿好吧？”

“很好，”巴勃罗说。“雪下得小了。”

“你看雪会停吗？”

“会停，”巴勃罗说。“现在下得稀了，在下小雪珠。就要起风，不过雪倒会停。风向变啦。”

“你看明天会放晴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会，”巴勃罗说。“看来明天要转冷放晴了。风向在变。”

罗伯特·乔丹想：瞧他的模样。他现在变得友好啦。他象风向那样变啦。他长着一副猪的相貌和身材；我知道，他杀人不眨眼，可是他灵敏得象只好的气压表。他想：是啊，猪也是满聪明的畜生嘛。巴勃罗是恨我们的，不过，恨的也许只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他用侮辱来表达他的憎恨，使你到了想干掉他的程度，可是他看到达到了这程度，却改变了主意，重新又来了一套新花

样。

“我们行动时会遇上好天气，英国人，”巴勃罗对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比拉尔说，“我们？”

“是啊，我们，”巴勃罗露齿对她笑笑，喝了几口酒。“干吗不？我刚才在外面把这个问题想过了。干吗我们要不一致呢？”

“关于什么事？”妇人问。“到底关于什么事？”

“什么事都一致，”巴勃罗对她说。“关于这次炸桥行动。现在我和你一起干。”

“你和我们一起干？”奥古斯丁对他说。“在你说过那些话之后？”

“不错，”巴勃罗对他说。“天气变了，我和你们一起干了。”

奥古斯丁摇摇头。“天气，”他说，又摇摇头。“即使我打过你的脸？”

“对，”巴勃罗朝他露齿笑笑，用手指摸摸嘴唇。“即使这样也干。”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比拉尔。她正望着巴勃罗，仿佛他是头怪物似的。她脸上仍然带着一点儿刚才提到弄瞎眼睛时所出现的表情。她摇摇头，仿佛想把这表情甩掉，随即头向上一昂。“听着，”她对巴勃罗说。

“是，太太。”

“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巴勃罗说。“我改了主意。就是这么回事。”

“你在洞口偷听了吧？”她对他说。

“是啊，”他说。“不过我什么也没听到。”

“你怕我们干掉你。”

“不，”他对她说，越过酒杯向她望去。“我不怕这个。这你知道。”

“噢，那你是怎么啦？”奥古斯丁说。“你刚才还是喝得醉醺醺的，拿我们大家数落，不愿卷入我们当前的任务，恶毒地咒我们死，辱骂妇女们，反对该做的事——”

“我刚才醉了，”巴勃罗对他说。

“那么现在——”

“我不醉了，”巴勃罗说。“我改了主意。”

“让别人听信你的鬼话吧。我可不信，”奥古斯丁说。

“信也好，不信也好，”巴勃罗说。“除了我没人能把你们带到格雷多斯山区去。”

“格雷多斯？”

“炸桥之后只有这条路可走。”

罗伯特·乔丹望着比拉尔，举起离巴勃罗较远的那只手，轻轻敲敲自己的右耳，好象在提问似的。

妇人点点头。接着又点了点头。她对玛丽亚叽咕了几句，姑娘就跑到罗伯特·乔丹身边来。

“她说，‘他肯定听到了’，”玛丽亚凑着罗伯特·乔丹的耳朵说。

“那么巴勃罗，”费尔南多慎重地说。“你现在和我们站在一起，也赞成炸桥了？”

“对，老弟，”巴勃罗说。他正面望着费尔南多的眼睛，对他点点头。

“当真？”普里米蒂伏问。

“当真，”巴勃罗对他说。

“那你看这事能成功？”费尔南多问。“你现在有信心了？”

“干吗没有？”巴勃罗说。“难道你没信心吗？”

“有，”费尔南多说。“我可一直有信心。”

“我要离开这里了，”奥古斯丁说。

“外面冷呐，”巴勃罗和气地对他说。

“可能吧，”奥古斯丁说。“可我在这个疯人院里实在待不下去啦。”

“别把这个山洞叫疯人院，”费尔南多说。

“收容杀人狂的疯人院，”奥古斯丁说。“我要走了，再待下去我也要疯了。”

第十八章

罗伯特·乔丹想，这真象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不是那种配上蒸气管风琴音乐、孩子们骑在两角漆成金色的牛身上、转得很快的旋转木马，那里有投套环游戏，曼恩大街上蓝色的煤气灯傍晚就点亮，旁边有卖炸鱼的摊子，象风车似的摸彩轮^①在旋转，皮制阻力片啪嗒啪嗒地刮打着编号的小木格，一包包当奖品的块糖堆得象金字塔。不，不是那种旋转木马。尽管现在也有人们在等待，正象那些戴便帽的男人和穿毛线衫的、没戴帽子、头发在煤气灯光下闪闪发亮的女人站在那旋转着的摸彩轮前面等待着那样。是啊，人就是那些，轮子却是另一种。一种时高时低、绕着圈儿转的轮子。

^① 摸彩轮(wheel of fortune)为一种赌具。

现在它已转了两圈。这是座倾斜的大轮子，每转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一边比另一边高，它的回旋把你带到高处，又送回到原来的起点。他想，而且没有奖品，因此谁也不愿跨上这座轮子。每次你都是莫名其妙地跨上去旋转的。只转一圈，顺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轨道，从低到高、从高到低地转上一圈，你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他想：我们现在又回来啦，一件事也没落实。

山洞里很暖和，外面风已停息。他坐在桌边，面前摊着笔记本，考虑着炸桥的所有技术问题。他画了三张草图，描绘出他的行动方案，用两张图来说明爆破方法，清楚得象幼儿园的课本，这样，万一在爆破过程中他自己遇到意外，好让安塞尔莫继续完成。他画好了这些草图，仔细端详着。

玛丽亚坐在他旁边，从肩后看他工作。他意识到巴勃罗就在桌子对面，其他人在聊天、玩牌，他闻到山洞里的气味，这时已经不是饭菜和烹饪的气味，而是烟火味、人味、烟草味、红酒味和人的汗酸臭。玛丽亚看他画好了一张图，把手搁在桌上；他用左手拿起她的手，放在脸上，闻到她洗碗碟时用的劣质肥皂味和刚在水里洗过的皮肤的清香味儿。他没有对她看，就放下了她的手，继续工作，他没有看到她脸红了。她把手放在他手的近旁，但他并没把它再拿起来。

他完成了炸桥方案，翻开笔记本另一页，开始写行动指令。他的思路清晰而周密，写下的东西使他很愉快。他在笔记本里写了两页，仔细看了一遍。

他对自己说，我看就是这些了。写得明明白白，看来没有任何漏洞。按照戈尔兹的命令，把那两个哨所拔掉，把桥炸掉，这就是我的全部任务。只有有关巴勃罗的那回事是个我不应该背的包袱，不过这问题好歹总会解决的。有巴勃罗，还是没巴勃罗

都行，我不在乎。但是我不打算再登上那个轮子了。我上去过两次，两次都转了个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我再也不上去了。

他合上笔记本，抬头望着玛丽亚。“喂，漂亮的姑娘，”他对她说。“你看出什么名堂来了吗？”

“没有，罗伯托，”姑娘说，把手放在他那仍旧握着铅笔的手上。“你搞好了？”

“好了。现在已经全部写好，安排好了。”

“你在干什么，英国人？”巴勃罗隔着桌子问。他的眼睛又变得迷糊了。

罗伯特·乔丹定睛注视着他。他对自己说，离开这轮子。别登上这个轮子。我看，它又要开始转了。

“研究炸桥的事，”他客气地说。

“情况怎么样？”巴勃罗问。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一切都很好。”

“我一直在研究撤走的事，”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望望他那醉醺醺的猪眼，再望望那只酒缸。酒缸差不多空了。

他对自己说：离开那轮子吧。他又在喝酒啦。没错儿。可你现在别登上那轮子啦。格兰特^①在内战期间不是据说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吗？他确实是如此。我打赌，要是格兰特能看到巴勃罗，他一定会对这样的对比感到恼怒。格兰特还爱好抽雪茄。啊，他得想法弄支雪茄给巴勃罗。这副相貌真需要添上一支雪茄才能算真正完整；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他到哪里去弄支雪

^① 格兰特 (Ulysses Grant, 1822—1885): 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1869—1877), 在南北战争 (1860—1865) 期间为北军将领。一八六四年三月, 被任命为北军总司令。

茄给巴勃罗呢？

“研究的结果怎么样？”罗伯特·乔丹客气地问。

“很好，”巴勃罗说，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你有主意了？”跟别人一起打牌的奥古斯丁抬头问道。

“对，”巴勃罗说。“很多主意。”

“你在哪里找到的？在酒缸里？”奥古斯丁追问。

“也许，”巴勃罗说。“谁知道？玛丽亚，请你把酒缸加满好吗？”

“这酒袋里该有些好主意吧，”奥古斯丁转身对着打牌的人说。“你干吗不钻到里面去找找？”

“不，”巴勃罗随和地说。“我在酒缸里找。”

罗伯特·乔丹想：他也不想登上轮子啦。它肯定是独自在运转的。看来你不能在那轮子上待得太久。也许那是一座致人死命的轮子。我高兴的是我们下来了。有两次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然而那些酒鬼和真正卑鄙而残忍的家伙，却会在上面一直待到死。它先朝上面转，每次的转法总是有点不同，接着朝下转。让它转吧，他想。他们没法叫我再上去啦。不，先生，格兰特将军，我离开这轮子啦。

比拉尔正坐在炉火旁，她把椅子转了个向，隔着背对她的两个打牌人的肩头可以看到打牌。她正观看着。

罗伯特·乔丹想：再怪也没有了，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变成正常的家庭生活场景了。原来是因为这该死的轮子要往下转，这才使你难住啦。他想：可是我离开这轮子了。谁也别想叫我再上去啦。

他想：两天前，我根本不知道有比拉尔、巴勃罗以及他们其他那些人。世界上根本也没有玛丽亚这样的姑娘。当时的世界确

实是简单得多。我从戈尔兹那儿得到的指示十分明确，完全可能执行，尽管包含着某些困难和严重的后果。我们炸桥以后，我回不回前线都行，如果回去，我打算请几天假去马德里。这次战争中谁也没有休假，但是我肯定可以在马德里待两三天。

他想，到了马德里，我要买几本书，到佛罗里达旅馆去开一个房间，洗一个热水澡。我要打发茶房路易斯去买一瓶艾酒，要是他能在莱昂内萨乳品店或者大马路附近的铺子里找到一瓶的话，洗澡之后，我要躺在床上看看书，喝两杯艾酒，然后打电话到乐爵饭店，问问能不能去那里吃饭。

他不想到大马路饭店去吃，因为那儿的饭菜实在差劲，并且还得早去，去晚了什么都吃不上。那里还有很多他认识的记者，他不打算叫自己守口如瓶。他要喝点艾酒，使自己健谈，然后到乐爵饭店去和卡可夫一起吃饭，那里有好菜和货真价实的啤酒，他要打听一下战局的实情。

他第一次去乐爵的时候，并不喜欢这家由俄国人接管的马德里大饭店，因为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它显得过于豪华，菜肴太好，对战时来说，人们的谈吐也过于玩世不恭。不过我是很容易蜕化的，他想。你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回来，既然可能吃到山珍海味，那何不饱饱口福呢？他当初第一次听到时认为是玩世不恭的言谈，结果倒是着实正确的。他想：等任务完成以后，这一点在乐爵饭店倒是个聊天的话题呢。对，等这任务完成以后。

你能带玛丽亚到乐爵饭店去吗？不。你不能。但你可以把她留在旅馆里，让她洗个热水澡，在那儿等你回来。对，你可以这么办，可以先向卡可夫介绍她的情况，然后带她去，因为他们会对她产生好奇心，想看看她这个人。

也许你根本不会到乐爵饭店去。你可以在大马路饭店吃了饭，匆匆赶回佛罗里达旅馆。可是你明知道自己是想到乐爵饭店去的，因为你想再看看那里的一切；你想在炸桥之后再吃吃那里的好菜，看看那里的舒适和豪华的环境。然后你回到佛罗里达旅馆，玛丽亚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啦，炸了桥以后，她会在那儿的。炸桥结束以后。对，炸了桥以后。要是他干成了，他该有资格去乐爵饭店吃一顿。

你在乐爵饭店能遇到西班牙著名的工农出身的指挥官，战争一开始，这些来自人民的人事先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就拿起了武器。你还发现其中有不少人会讲俄语。几个月前，这使他第一次感到大为失望，他自己也开始由此愤世嫉俗了。但是等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就心情释然了。他们是工人和农民嘛。他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三四年的革命^①，革命失败后，他们被迫流亡国外，到了俄国，他们被送进军事学院，被送进共产国际主办的列宁学院，受到必要的指挥作战的军事训练，准备下一次战斗。

共产国际在那些地方教育了他们。在革命中，你不能让局外人知道帮助你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有的人了解的情况超过他该了解的范围。他懂得了这一点。

你就是在乐爵饭店了解到那个被叫做“农民”的伐伦廷·冈萨雷斯从来没有当过农民，却当过西班牙外籍军团的中士，后来

① 一九三三年秋，西班牙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勒洛于十二月担任共和国总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深夜，工人总罢工开始，全国近一百万人参加，在许多地方发展为武装斗争。阿斯图里亚斯地区首要城市奥维多被矿工占领，成立工人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掌握了十五天政权，最后被政府优势兵力所镇压。三万人被俘，被监禁，受严刑拷打，几百人被处死刑。

开了小差，跟阿布德·艾尔·克里姆一起作战。^①那算不了什么。他干吗不可以呢？在这种战争中，你需要很快就有这种农民领袖，而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很可能太象巴勃罗反而使人不敢领教。你不能等待涌现出真正的农民领袖，而等他出现的时候，他的农民习气可能太多。所以你得制造一个。说到这一点，当初他看到“农民”冈萨雷斯时，只见他长着黑胡子和黑人般的厚嘴唇，瞪着眼睛，目光如火，他觉得这个人可能象真正的农民领袖那样惹出麻烦来。他上次见到冈萨雷斯的时候，发现他似乎相信了自己的名声，真以为自己是个农民了。他是个勇敢而坚韧的人，谁也比不上他勇敢。可是上帝啊，他的话太多啦。他激动时什么话都说得出，也不管自己的轻率会产生什么后果，而这种后果已经不少了。即使在似乎毫无指望的情况下，他仍旧是个了不起的旅指挥员。对他来说，毫无指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即使遇到那种情况，他也要扭转局面。

你在乐爵饭店还遇见过加利西亚人恩里克·利斯特，那个平凡的石匠，他现在指挥一个师，也会讲俄国话。你还遇见过那个细木工，安达卢西亚人胡安·莫德斯托^②，最近刚给他指挥一个军团。他在圣玛丽亚港^③没学过俄语，然而，如果他们为细木工开设一所贝里兹语言学校^④，他可能去学习的。他是个最得俄

① 阿布德·艾尔·克里姆从一九二〇年起领导摩洛哥的柏柏尔人起义，曾屡次挫败西班牙殖民地部队，一九二六年被法西联军战败，被俘，被流放到法属留尼汪岛。一九四七年，逃至开罗。摩洛哥独立后，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于一九五八年给他民族英雄的称号。一九六二年，他宣称要回祖国，未果，于翌年去世。

② 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一样，也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政府军指挥员。

③ 圣玛丽亚港在西班牙南端重要海港加的斯附近。

④ 美国教育家查尔斯·贝里兹生于一九一三年，于三十年代创办贝里兹语言学校，遍设纽约、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等地，并陆续编辑出版“贝里兹教学法”的各种外语课本、外语自修课本、词典，发行语言教学用唱片及影片等。

国人信任的青年军人，因为他是个道地的党员，“百分之百的”，他们骄傲地用这美国的词儿说。他比利斯特或“农民”都聪明得多。

当然啦，你想受到全面的教育，乐爵饭店正是你所需要的场所。在那里，你能了解全部实情，而不是设想中的情况。他想：他还是刚刚开始在教育哪。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长期地学习下去。乐爵饭店很良好，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在乐爵饭店的见闻只加强了他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事物的信念。他想知道实在的情况，而不是设想中的情况。战争中历来有谎言。然而关于利斯特、莫德斯托和“农民”的真相要比谎言和传奇好得多。得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对大家讲明真相的，而眼前，他高兴的是能借乐爵饭店来亲自了解真相。

是啊，他在马德里买了书，躺在澡盆里洗了热水澡，喝了两杯酒，读了一会儿书之后，就打算去乐爵饭店。不过那是玛丽亚进入他生活之前他惯常的计划。好吧。他们可以租两个房间，他去乐爵饭店的时候，她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呢，会从饭店回到她身边。她在山区待了那么许多日子，如今在佛罗里达旅馆再待一会儿等他也不妨。他们可以在马德里过三天。三天可算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了。他要带她去看马克斯三兄弟演的《歌剧院一夜》^①。这部影片已开映了三个月，看来再映三个月也准能卖座。他想，她会喜欢马克斯三兄弟的《歌剧院一夜》的。她一定会非常喜欢。

从乐爵饭店到这个山洞的路途可不短啊。不，那段路还不

① 马克斯三兄弟为当时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歌剧院一夜》(1935)为他们主演的名片。

算长。长的将是从这个山洞再回到乐爵饭店。第一次是卡希金带他去的，他那时不喜欢它。卡希金当时说，他应该见见卡可夫，因为卡可夫想了解美国人，因为他最最喜爱洛佩·德维加，认为维加的《羊泉村》是世间最最伟大的剧作。也许是为了这个原因吧，但是他，罗伯特·乔丹，却不以为然。

他喜欢卡可夫，可不喜欢那地方。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最聪明的要算卡可夫了。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的外形很滑稽，穿着黑马靴、灰马裤和灰上衣，手和脚都很小，脸和身体显得虚弱浮肿，牙齿不好，说话漏风。然而，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比谁都更有头脑，更有自尊心，外表更傲慢，更富有幽默感。

卡希金认为罗伯特·乔丹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卡可夫起初可客气得使人难堪，可是罗伯特·乔丹并不以英雄自居，却讲了一则确实有趣、有损自己声誉的风流逸事，这时卡可夫如释重负地由客气转变为粗鲁，进而是傲慢。他们这才成了朋友。

人们在那儿对卡希金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显然犯过什么错误，到西班牙来将功赎罪。人家不肯告诉他是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卡希金已经死了，说不定会告诉他了。总之，他和卡可夫做了朋友，而且还和卡可夫的妻子做了朋友，她那时在坦克兵团当翻译。她瘦得出奇，表情呆板，皮肤黝黑，心地善良，神经紧张，逆来顺受，长着一个瘦削的、不加爱惜的身体，灰黑相杂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他也跟卡可夫的情妇做了朋友。她长着两只猫样的眼睛，一头金红的头发（有时偏红，有时偏金，这取决于理发师），一个懒洋洋的肉感的身体（天生适合被人拥抱），一张天生适合给人亲吻的嘴和一颗愚蠢、狂妄而极度忠诚的心。这位情妇爱讲闲话，喜欢间发地有节制地跟其他人搞搞男女关系，这看来反而叫卡可夫感到高兴。除了这个在坦克兵团的妻子外，据说卡

可夫在某处地方还有一个老婆，也许两个吧，但是谁也没法肯定。罗伯特·乔丹对他认识的那个卡可夫的老婆和情妇都喜欢。如果还有一个老婆，而他也认识的话，他认为自己也会喜欢的。卡可夫对女人有良好的鉴赏力。

乐爵饭店楼下大门外有背着上了刺刀的枪的哨兵，在被围困的马德里全城，今晚要算它是最愉快、最舒服的地方了。他巴不得今晚自己不在这里，而在乐爵饭店。尽管他们已使那轮子停住不转了，这里也不错，而且雪也停了。

他很想把他的玛丽亚带给卡可夫看看，不过他得先讲明了才能把她带去；他还得了解执行这次任务之后人们怎样接待他。发动这次攻势之后，戈尔兹也会到那儿去；要是他干得不错，大家都会从戈尔兹那儿知道这个消息。戈尔兹也会拿玛丽亚来跟他开玩笑，因为他曾经说过自己没空交女朋友。

他把杯子伸到巴勃罗面前的酒缸里，舀了一杯。“可以吗？”他说。

巴勃罗点点头。罗伯特·乔丹想：他大概在琢磨他的军事问题吧，不是在大炮口上寻求肥皂泡般脆弱的荣誉，而是在那边酒缸里寻求问题的答案。这个野杂种只要肯干，显然能成功地把这帮人带领好。他望着巴勃罗想，在美国内战时期，不知他会成为怎样的游击队长。他想：这种人很多，但是我们不太了解他们。不是匡特里尔，也不是莫斯比^①那种人，也不是他自己的祖

① 匡特里尔(William Quantrill, 1837—1865)为美国内战期间南军方面的游击队头子，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一带活动，一八六二年被授上尉军衔，三年后在肯塔基州被北军所杀。莫斯比(John Mosby, 1833—1916)也是南军方面的游击队领导人，率领骑兵，袭击北军，破坏交通，为南军立下不少功劳，被提升为上校。战后加入共和党，在政界活动，并写了几部关于内战的回忆录。

父那种人，而是那种小头头，打游击的。至于喝酒，你以为格兰特真是酒鬼？我祖父始终说他是酒鬼，说他一到下午四点钟就总是有点醉意了，在围攻维克斯堡兵临城下的期间^①，他有时一醉就是一两天。但祖父声称，不管他喝多少，他工作完全正常，只是有时很难把他叫醒。然而，如果你能叫醒他，他神志还是正常的。

在这次战争中，迄今双方都没有象格兰特、谢尔曼、“石墙”杰克逊^②那样的人。没有。没有象杰布·斯图尔特，也没有象谢里登^③那样的人，然而却多的是象麦克莱伦^④那样的人。法西斯那一方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呢，至少有三个。

在这次战争中，他确实没见到过任何军事天才。一个也没有，连近于天才的人也没有。克莱伯、卢卡茨、汉斯在国际纵队

① 维克斯堡在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西部密西西比河滨，在南北战争中为战略重地。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北军将领格兰特拟攻占未遂，第二年中，通过精心规划的水陆联合作战，于七月四日拿下该城，从而切断了南军和密西西比河西部的给养地区的联系。

② 谢尔曼(William Sherman, 1820—1891)为北军将领，在南北战争中最大的功勋为一八六四年五月开始的向佐治亚州的进军。他于九月初占领该州首府亚特兰大，一直朝太平洋海岸直插，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进入该州东端的萨凡纳港，从而把南军控制下的地区一切为两，加速了南方的最后崩溃。杰克逊(Thomas Jackson, 1824—1863)为南军将领，以精通战略战术著称。一八六一年七月，在第一次布尔伦河战役中，他坚守左翼巍然不动，赢得“石墙”的外号。

③ 斯图尔特(J. E. B. Stuart, 1833—1864)为南军骑兵将领，为南方立下不少战功，一八六四年五月，在里士满附近和北军骑兵的遭遇战中受重伤而死。谢里登(Philip Sheridan, 1831—1888)为北军骑兵将领。一八六四年十月十九日拂晓，他的部队在弗吉尼亚州西北部谢南多亚河谷雪松溪边受到南军突袭，他在二十英里外闻讯飞骑赶回，收拾残部，重整阵容，当天下午打了一场大胜仗。这是南北战争史中著名的一仗。

④ 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 1826—1885)为北军将领，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当上主帅，但由于在作战时过于审慎，贻误战机，在第二年中被林肯总统两度撤下作战指挥岗位。

保卫马德里的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那个老秃子，那个鼻梁眼镜、自高自大、蠢得象猫头鹰、言语无味、勇猛固执得象公牛、靠宣传吹捧起来的马德里保卫者米亚哈^①，十分妒忌克莱伯的名声，竟迫使俄国人解除了克莱伯的指挥权，调他到瓦伦西亚去了。克莱伯是个好军人，但有局限性，对自己的工作确实谈得太多。戈尔兹是个好将军和出色的军人，但是他们总是把他放在从属的位置上，从不让他充分发挥才能。这次攻势将是到目前为止他指挥的最大的军事行动，但罗伯特·乔丹不太喜欢自己所听到的有关这次攻势的情形。还有那个匈牙利人高尔，如果你在乐爵饭店听到的有关他的情况有一半属实，他就该枪毙。罗伯特·乔丹想：还不如说如果你在乐爵饭店听到的有百分之十属实的话，他就该枪毙。

但愿他亲眼见到他们在瓜达拉哈拉东面高原上打败意大利人的战斗就好了。可是当时他在南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两星期前有天晚上，汉斯在乐爵饭店对他讲过那情形，使他知道了一切。有一个阶段看来大势已去，因为意大利人突破了特里胡克附近的防线，如果托里哈到勃里胡加的公路被切断的话，第十二旅将被孤立。^②“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汉斯说，“我们就采取了一次跟别的部队作战时绝对不应采取的行动。结果是成功的。”

汉斯在作战地图上向他解释了那次战役的一切情况。汉斯

① 米亚哈(José Miaja)生于一八七八年，在内战爆发时为陆军准将，效忠于共和国政府，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任城防司令。

② 一九三七年三月，政府军在马德里东北的瓜达拉哈拉附近大败意大利派来的侵略军，打破了叛军切断马德里和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的企图。国际纵队的第十二旅，又名加里波第旅，主要由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志愿人士组成。

总是把地图放在文件包里随身带着，似乎依然为那次奇迹般的胜利感到又惊又喜。他是个出色的军人，是个好伙伴。汉斯对他说过，在那次战役中，利斯特、莫德斯托和“农民”的西班牙部队都打得很漂亮，这得归功于他们的领导和他们执行的纪律。有些行动是俄国军事顾问叫他们采取的。他们象驾驶着带有复式操纵装置的飞机的实习飞行员，一出岔子就可以由飞行教练来接替。噢，这一年将可以看出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掌握得好不好。再过一个时期就用不着复式操纵装置了，那时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独立指挥师和军团的水平了。

他们是共产党人，实施纪律的人。他们实施的纪律将造就优秀的军队。利斯特的纪律是凶残的，他是个真正的狂热分子，具有根本不尊重生命的西班牙作风。他常常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就地处决部下，自从鞑靼人首次入侵西方^①以来，这种情况在别的部队已不多见了。但是他懂得怎样把一师人马锻炼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罗伯特·乔丹坐在桌边想：守卫阵地是一回事，攻占阵地是另一回事，在战场上如何调动一支部队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根据我所看到的利斯特的情况，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了复式操纵装置，他将怎样行动？他想：不过，也许不会没有。我不知道会不会没有。或者，会不会反而加强。我不清楚俄国人在整个这件事上的立场又是什么？乐爵饭店是个该去的地方，他想。现在我需要了解很多情况，只有在乐爵饭店才能了解到。

他一度认为乐爵饭店对他有害。它和马德里委拉斯开兹路

① 西方人往往把蒙古人泛称为鞑靼人，此处指成吉思汗于一二一九年第一次西征。

六十三号所具有的共产主义的气氛完全相反，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原是座王宫，现已改为国际纵队在首都的司令部。在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人们仿佛是一个团体的成员——至于在乐爵饭店的感觉，可跟你在分成新军各旅队以前的第五团团部^①的感觉大不相同。

在这两个地方，你都会有参加一支十字军的感觉。唯有这个名称才真正合适，虽然它已变成陈词滥调，被反复滥用，不再具有它的真正的意义了。尽管有种种官僚主义、工作无能和党内斗争，你依然会感到你首次参加圣餐礼时所指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感情。那是一种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这种感情象宗教悟彻一样难以言宣，但它是真诚的感情，正象你倾听巴赫的音乐，或站在夏尔特尔大教堂或莱昂大教堂里面见到大窗户外射进光亮时所产生的情绪，或者象当你在普拉多国立博物馆见到曼坦那、格列柯和勃吕格尔的油画^②时的感受一样。它使你感觉到你参预了一件你全心全意信仰的事业，和其他参预的人有一种高度的兄弟情谊。这种感情你以前从来没有过而现在体会到了，你对它那么重视，认为它是那么合理，以至自己的死亡似乎也无足轻重了，只因为死亡会妨碍你履行职责，才要加以避免。但是最好的一点是你可以为这种感情以及这种必要性而采取行动。你可以为之战斗。

① 内战爆发时，大部分正规部队都倒向了叛军，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政府以原有的少数效忠的部队为基础，开始筹建一支“新军”。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旧王宫原为第五团团部所在地，第五团被分散编入新军各旅后，该处才成为国际纵队的司令部。

② 马德里的普拉多国立博物馆是世界最著名的美术博物馆之一。曼坦那(Andrea Mantegna, 1431—1506)为意大利历史、宗教画画家，格列柯(El Greco, 1548?—1614)为西班牙宗教、肖像画画家。勃吕格尔(Pieter Brueghel, 1525?—1569)为荷兰著名风俗画家。

所以你参加了战斗，他想。在战斗中，你不久就对那些幸存的英勇善战的人失去了这种纯真的感情。过了最初的六个月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在战争中保卫阵地或保卫城市时，你会体会到这种纯真的感情。当初在山区作战时就是这样。他们怀着真正的革命同志情谊在那儿战斗。在那边第一次出现加强纪律的必要性时，他理解并赞赏它。在炮火下，有人吓坏了，拔腿就逃。他看到逃跑的人被枪毙，尸体扔在路边腐烂，人们毫不在乎，只从尸体上取下弹药和值钱的东西。拿他们的弹药、靴子和皮外套是对的。取下值钱的东西无非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这无非是不让无政府主义者得到这些东西罢了。

当时看来逃跑的人被枪毙是公正、正确和必要的。这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他们逃跑是自私的表现。法西斯分子发动了进攻，我们在瓜达拉马山区灰色岩石的山坡上的矮松林和荆棘丛中阻击他们。敌人飞机来轰炸，后来把大炮拉了上来，加上炮火的轰击，我们坚守着那条公路，等到那天傍晚，还活着的人员发动了反攻，把敌人击退了。后来，当他们穿过岩石和树林，企图从左侧迂回的时候，我们坚守在一所疗养院里，从窗子里和屋顶上射击，尽管他们已经包抄了疗养院的两侧；我们尝到了被包围的滋味，直到那次反攻把他们赶回公路的对面。

炮弹炸开时的闪光和轰响，使泥灰纷纷坠下，一堵墙突然塌倒，叫你惊慌失措，你把机枪刨出来，拖开脸朝下、埋在瓦砾堆里的机枪手，你把脑袋躲在机枪的遮护板后面，排除故障，刨出被砸碎的弹药箱，重新整理好弹带，你然后俯卧在遮护板后面，把机枪再次向公路边扫射。在这整个过程中，在那使你嘴巴喉咙发干的恐惧中，你做了该做的事，并且知道自己是对的。你

体会到战斗中那种使人嘴巴发干的、战胜了恐惧并排除其他杂念的狂喜。那年夏天和秋天，你为全世界的穷苦人，反对所有的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他想，那年秋天你学会了怎样长时间地在寒冷、潮湿、泥泞以及掘壕沟、筑工事的活动中坚持下去，不畏艰苦。你对夏天和秋天的感情被深深地埋葬在疲乏、渴睡、紧张和不舒服的感觉底下了。但它一直存在着，而你所经历的一切只不过证实了它的存在。他想，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你怀着一种深刻、健全、无私自豪——他突然想到，这将使你在乐爵饭店成为一个非常讨厌的人。

他想：是啊，你当时如果去乐爵饭店不见得会吃得开的。你太天真了。你当时仿佛正蒙受着天恩。不过，当时的乐爵饭店可能和现在不同。他对自己说：是啊，事实上不是那样的。压根儿不是那样的。当时根本还没有乐爵饭店哪。

卡可夫跟他谈起过那些日子。当时所有的俄国人都住在皇宫旅馆。当时罗伯特·乔丹还没有跟他们中的任何人结识。那是第一批游击队成立之前，他遇到卡希金和其他俄国人之前。卡希金当时在北方的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并参加了那次向维多利亚进攻但没有成功的战斗^①。他直到一月份才到达马德里。而罗伯特·乔丹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作战的那三天里，他们阻击了法西斯军队对马德里的攻势的右翼，把摩尔人和外籍兵团逐屋打回去，扫荡了那阳光直晒的灰色高原边缘上被打得稀巴烂的郊区，沿着高地边缘筑起了一道防线来保卫这个城角^②。那时

① 圣塞瓦斯蒂安在伊伦西，为一著名的避暑胜地，维多利亚在其西南，两地都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民族地区的重要城市。

② 乔丹随国际纵队到了西班牙，即投入马德里保卫战，这里提起的是在首都西南郊区击退叛军的一页。等安然度过了这艰苦战斗的冬天，政府军组成了第一批游击队，乔丹才开始到瓜达拉马山区及西南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去搞敌后爆破活动。

卡可夫在马德里。

卡可夫谈起往事时也没对那些日子冷嘲热讽。那时一切都好象没有希望了，他们同舟共济，如今每个人都还记得在那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比受到的表扬和勋章记得更清楚。当时政府放弃了这城市，撤退时带走了国防部所有的汽车，老米亚哈只得骑自行车去视察他的防御阵地。罗伯特·乔丹不信这件事。即使他充满了爱国的想象，也没法想象米亚哈骑自行车的情景，但卡可夫说那是真的。不过话得说回来，他当时替俄国报纸写了这件事，所以很可能写了以后希望这是真的。

然而另一件事卡可夫可没有写：在皇宫旅馆有三个由他照管的俄国伤员，两个是坦克手，一个是飞行员，伤势很重，没法运走。那时最重要的是不能留下俄国人介入的证据以免法西斯分子为公开干涉作辩护，所以万一放弃这个城市的话，卡可夫有责任不让这些伤员落入法西斯分子手中。如果有必要放弃这个城市，卡可夫应当在离开皇宫旅馆之前消灭一切有关他们身份的迹象。一个腹部有三处枪伤，一个下巴被枪弹打掉了，声带露在外面，还有一个股骨被枪弹打碎，双手和脸部烧伤严重，一张脸变成了一个没有睫毛、眉毛和汗毛的大水泡，光凭这三个留在皇宫旅馆床上的伤员的尸体，谁也没法证明他们是俄国人。你无法证明一个不穿衣服的死人是俄国人。人死了以后，国籍和政治态度都显示不出来。

罗伯特·乔丹曾问卡可夫，如果他不得不这样做，有什么感想；卡可夫说，他过去没有想到要这样做。“那你打算怎么办？”罗伯特·乔丹曾问他，还加上一句，“你知道，突然要你把人弄死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卡可夫说，“是啊，如果你总是把它带在身边准备自己用，那就简单了。”他接着打开烟盒，给罗伯特·乔丹

看藏在烟盒一边的东西。

“不过，如果人家俘虏了你，第一件事就会是拿走你的烟盒，”罗伯特·乔丹提出异议。“他们会叫你举起双手。”

“可我在这里还有一点儿，”卡可夫露齿笑着，拉起他上衣的翻领。“你只消这样把翻领往嘴里一塞，咬一下，咽下就成。”

“那要好得多，”罗伯特·乔丹说。“告诉我，它是不是象侦探小说里老爱描写的那样有苦杏仁的气味？”

“我不知道，”卡可夫高兴地说。“我从来没闻到过。我们折断一小支闻闻好吗？”

“还是留着吧。”

“好吧，”卡可夫说，收起烟盒。“我不是失败主义者，你知道，可是随时都可能再出现这种严重的局面，而这东西不是到处都能搞到的。你看到来自科尔多瓦前线的公报吗？非常美。所有的公报中我现在最喜欢这个。”

“公报说些什么？”罗伯特·乔丹是从科尔多瓦前线来到马德里的，所以他突然一愣，因为有些事情你自己可以取笑而别人却不能，别人取笑时就会出现这种心情。“给我说说好吧？”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可夫用他那古怪的西班牙话说。

“恐怕不是这样说的吧，”罗伯特·乔丹将信将疑地说。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可夫用英语又说了一遍。“公报上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找给你看。”

你还牢记着在波索布兰科外围战斗中牺牲的你所认识的人，而在乐爵饭店，这只是个开玩笑的话题。

敢情乐爵饭店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然而乐爵饭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革命初期的那种情况在幸存下来的人们中产生了

乐爵饭店那样的事物，如果现在还是这种情况，他倒很乐意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他想：你的心情跟当初在瓜达拉马山区，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时的大不一样啦。你很容易蜕变啊，他想。然而那是蜕变呢，还只不过是丧失了当初的天真？在其他方面不也是这么回事吗？有谁能始终保持着青年医生、青年牧师和青年军人初出茅庐时所惯有的对自己事业的忠贞呢？牧师当然保持着，否则他们就不干了。他想，看来纳粹分子也保持着，还有极其自我克制的共产党人也保持着。

他想到卡可夫的情况就没个完。他上次在乐爵饭店的时候，卡可夫对一个在西班牙待了很久的英国经济学家推崇备至。多年来罗伯特·乔丹经常看这个人的著作，虽然对他的情况一点不了解，但一直很尊敬他。他不怎么喜欢这个人写的有关西班牙的著作，认为写得太浅显简单，太一目了然了，而且他知道有很多统计数字是主观捏造的。但是他想：你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之后，就不会重视有关那个国家的新闻报道了。然而他还是尊敬这作者的意图。

他们进攻卡拉万切尔的那天下午，他终于见到了这个人。他们坐在斗牛场的背风处，两条街上有人在射击，大家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进攻开始。一辆约定的坦克没来，蒙特罗手托着头坐着，不断说：“坦克还没来。坦克还没来。”

那天很冷，街上刮着黄色的尘土，蒙特罗的左臂中了弹，手臂发僵了。“我们非有坦克掩护不可，”他说。“我们必须等坦克来，可是等不及了。”他受的伤使他的口气显得暴躁。

蒙特罗说，他认为坦克可能停在公寓楼后面电车路的拐角上，罗伯特·乔丹就返身去寻找。果然在那儿。然而不是坦克。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把什么车子都称为坦克。那是一辆旧的

装甲车。司机不愿离开公寓楼的拐角把车子开到斗牛场来。他站在车后，靠在车身的铁板上，戴着有衬垫的皮头盔的头靠在抱着的双臂上。罗伯特·乔丹跟他说话时，他摇摇头，仍旧枕在双臂上。接着他扭过头去，不看罗伯特·乔丹。

“我没有接到去那儿的命令，”他阴沉地说。

罗伯特·乔丹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把枪口抵住装甲车司机的皮外衣。

“这就是给你的命令，”他对他说。司机摇摇头，那顶大皮头盔活象足球运动员头上的帽子，他说，“机关枪没弹药。”

“我们在斗牛场有弹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来，我们走吧。我们到那儿去上弹药。走吧。”

“没人使机关枪，”司机说。

“人呢？你的伙伴哪儿去了？”

“死了，”司机说。“在车里。”

“把他拖出来，”罗伯特·乔丹说。“把他从车子里拖出来。”

“我不愿碰死人，”司机说。“他身体倒在枪和方向盘之间，我没法跨过他的身体。”

“来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一起把他拖出来。”

他爬进装甲车的时候碰了头，眉毛上面撞破了一道小口子，血从那儿流到脸上。尸体又重又硬，没法弯曲，他不得不用力敲尸体的头，把这卡在座位和方向盘之间的脸朝下的脑袋拖出来。他终于用膝盖抵在尸体的头下面，把它顶起来，然后等头一松动，就抓住尸体的腰往外拉，一个人把尸体拖向车门。

“帮我拖一把，”他对司机说。

“我不愿碰他，”司机说，罗伯特·乔丹看到他在哭。在他那沾满尘土的脸颊上，眼泪从鼻子两边直淌下来，他的鼻子也在流

鼻涕。

他站在车门旁把尸体摔了出去，尸体直倒在电车路旁的人行道上，仍旧保持着死去时那个弯腰曲背的姿势。他躺在那儿，灰黄色的脸贴在水泥人行道上，两手弯在身体下面，姿势象在车里一样。

“上车，他妈的，”罗伯特·乔丹用手枪指点着司机说。“上车去吧。”

正在这时，他看到从公寓楼后面走出一个人来。那人穿着长大衣，没戴帽子，头发花白，颧骨宽阔，两眼深陷而相距很近。他手里拿着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正在用枪口把司机推上装甲车的罗伯特·乔丹。

“等一等，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跟我谈谈战斗的情况好吗？”

罗伯特·乔丹接过香烟，放进他那蓝色技工服的胸袋里。他从过去看到的照片上认出了这位同志。就是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去你的，”他用英语说，然后用西班牙语对装甲车司机说，“开到那边去。斗牛场。懂吗？”他砰地一声拉上笨重的车门，上了锁，他们俩就顺着那长长的斜坡驱车直驶。枪弹随即射在车上，嗒嗒地响，好象小石子打在铁锅炉上的声音。接着机关枪向他们开火了，就象尖厉的锤打声。他们开到斗牛场后面停下，售票窗口旁仍然张贴着去年十月份的海报；弹药箱已被撬开，同志们端着步枪，腰带上和口袋里装着手榴弹，在背风处等待着。蒙特罗说，“好。坦克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进攻了。”

那晚他们攻下了山上最后几幢房屋后，他舒适地躺在一堵砖墙后面，墙上敲掉了几块砖当枪眼，他眺望着那片在他们和撤退到山梁上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美丽平坦的田野，怡然自得

地想着那掩护着左翼的上有一座被击毁的别墅的小山。他穿着汗湿的衣服，躺在一堆稻草里，身上裹着毯子等衣服干。他躺在那儿想起了那位经济学家，不禁笑了，接着为自己的粗鲁觉得抱歉。然而那人伸手递香烟给他，就象要打听消息给小费似的，那时候，他这战斗员对非战斗员的反感使他失去了自制。

他如今想起了在乐爵饭店卡可夫谈起这个人的情形。“原来你是在那儿遇到他的，”卡可夫说。“那天我到了托莱多大桥^①就没有上前去。他向前线走出很远。我相信，那是他表现勇敢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马德里。我相信，他在托莱多表现得最勇敢。在托莱多他出足风头。我们攻下城堡时出谋划策的人中间有他。你看到他在托莱多的表现就好了。我相信多半是靠了他的努力和建议，我们的围攻才取得成功。那是战争中最蠢的一页。事情愚蠢到了极点，可你跟我谈谈，在美国，对他有什么看法？”

“在美国，”罗伯特·乔丹说，“人们认为他和莫斯科非常接近。”

“他才不呢，”卡可夫说。“可是他有一副奇妙的相貌，他的相貌和举止很讨人喜欢。凭我的相貌可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取得的一些微小的成绩跟我的脸不相干，我的脸既不打动人，也不会使人喜欢我、信任我。但是米切尔这个人有一张使他发财致富的脸。那是一张阴谋家的脸。凡是从书上见过阴谋家的人立即就会信任他。他还具有地道的阴谋家风度。任何人看他走进屋，马上会知道面前是一个第一流的阴谋家。你那些自以为出于感情

① 马德里旧城区位于曼萨纳雷斯河的东岸，托莱多大桥在城西南，为横跨河面的主要桥梁之一。

而愿意帮助苏联的有钱同胞，或者是为了共产党万一有朝一日会得势而替自己多少留点后路的人，马上都能从这家伙的脸上和举止上看出他十足是个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代理人。”

“难道他在莫斯科没有人事关系吗？”

“没有。听着，乔丹同志。你知道有两种傻瓜吗？”

“一般的傻瓜和该死的傻瓜吗？”

“不。我是指我们俄国的两种傻瓜，”卡可夫露齿笑笑接着说。“第一种是冬天的傻瓜。冬天的傻瓜来到你家门口大声敲门。你走到门口，发现他站在那儿，可你以前从没见过他。他的形象使人一见难忘。他是个庞然大物，穿着高统靴，身披毛皮大衣，头戴毛皮帽子，浑身是雪。他先跺跺脚，靴子上的雪落了下来，接着脱下毛皮大衣抖抖，又有一些雪落下来了，接着摘下毛皮帽子，在门上拍打，又有一些雪从帽子上落下来。接着他又跺跺脚，走进屋来。随后你对他望望，发现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冬天的傻瓜。

“而在夏天，你看到有个傻瓜在大街上走，他挥舞着双臂，脑袋左右摇晃，在两百码之外的人都能断定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夏天的傻瓜。这位经济学家是个冬天的傻瓜。”

“可是在这里人们为什么信任他呢？”罗伯特·乔丹问。

“他的脸，”卡可夫说。“他那副漂亮的阴谋家的嘴脸。他还有一个出了钱也买不到的花招；装得象是什么地方的要人，深受信任，刚从那地方来。当然，”他微笑了，“要使这个花招奏效，他必须到处奔波。你知道，西班牙人十分古怪，”卡可夫接着说。“这个政府很有钱，有很多黄金。他们不肯给朋友一个子儿。你是朋友。很好。你肯不要钱为他们干，那就不用给你报酬。但是对于一个并不友好但必须对之施加影响的重要公司或国家的

代表——对这种人，他们却慷慨解囊。你仔细观察的话，那是很有趣的。”

“我可不喜欢这种情况。再说，这些钱是属于西班牙劳动人民的。”

“也不要求你喜欢。只消了解就行了，”卡可夫对他说。“我每次见到你，总要教给你一点道理，有朝一日你会完成你的教育的。使一位教授再受教育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回去以后能不能当上教授。说不定他们会把我当赤色分子撵走的。”

“噢，说不定你可以到苏联去继续学习。那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

“我的专业可是西班牙语。”

“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很多，”卡可夫说。“别的国家不会全都象西班牙那样难对付。你还得记住你不当教授已经将近九个月了。在九个月里面你可以学会一门新的行业。你学了多少辩证法？”

“我读过埃米尔·伯恩斯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如此而已。”

“如果你已读完全书，也相当不错了。一共有一千五百页，每一页上都可以花相当时间。但是你应该再读些别的书。”

“现在可没时间读书。”

“我知道，”卡可夫说。“我是指以后。要读的书很多，这些书会使你明白现在的一些事情。从目前的情况中会产生一本必要的著作，这本书将解释很多应该明白的事情。也许我将写这本书。我希望这本书的作者是我。”

“我知道没人能比你写得更好了。”

“别恭维，”卡可夫说。“我是新闻记者，但是象所有的记者一样，我喜欢写文学作品。我现在正忙于研究卡尔伏·索特罗，他是个地道的法西斯分子，一个真正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和别的那些人都算不上。我一直在研究索特罗的全部著作和讲话。他非常聪明，把他杀掉是非常聪明的办法^①。”

“我本来以为你是不赞成政治暗杀的。”

“这种事是非常普遍的，”卡可夫说。“非常、非常普遍的。”

“但是——”

“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行动，”卡可夫微笑着说。“当然不赞成刑事恐怖分子和反革命组织搞的那一套。我们非常憎恨布哈林那帮两面三刀、杀人破坏、干尽坏事的豺狼，以及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他们的走狗那样的人类渣滓。我们痛恨、厌恶这些不折不扣的魔鬼，”他又微笑着。“但我仍然相信，政治暗杀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当然处决并消灭这种不折不扣的魔鬼、人类的渣滓、奸诈成性的将军们，不让出现海军将领不忠于自己职守的可恶现象。这些人被消灭了。这不叫暗杀。你明白这种差别吗？”

“明白，”罗伯特·乔丹说。

“再说，因为我有时喜欢说笑话，你也知道，即使为了说笑话

① 卡尔伏·索特罗 (Calvo Sotelo, 1892—1936): 西班牙右派政客，一九三三年起，作为保皇派的头子，反对人民阵线，并当上右派各政党的统一组织“西班牙右翼自治派同盟”的领导人。一九三六年七月内战爆发前夕，共和派中的过激分子为了报复长枪党的政治暗杀暴行，把他逮住了加以杀害。

而说笑话有多么危险？好。因为我说笑话，可别以为西班牙人没有把某些现在还在发号施令的将军枪毙掉，今后会永远不后悔。我是不喜欢这些枪毙人的行为的，你知道。”

“我可不在乎，”罗伯特·乔丹说。“我不喜欢枪毙人，可是我不再在乎了。”

“这我知道，”卡可夫说。“我听说过了。”

“这事关紧要吧？”罗伯特·乔丹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过想说老实话罢了。”

“这是令人遗憾的，”卡可夫说。“然而这是一个好办法，使人家觉得你是可以信赖的，否则，要达到这种地步得花不少时间呢。”

“我算是可以信赖的？”

“你在工作上算是很可以信赖的。改日我要和你谈谈，了解一下你心里在想些什么。遗憾的是我们从没认真谈过。”

“要等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我的思想才会有着落，”罗伯特·乔丹说。

“那时候，可能你可以好一阵子用不着思想啦。但是你应当好好把思想锻炼锻炼。”

“我看《工人世界报》，”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卡可夫就说，“行啊。好。人家开玩笑，我也受得了。不过，《工人世界报》上是有不少非常有见解的文章。关于这次战争的唯一有见解的文章。”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我同意你。不过，要了解眼前发生的事的全貌你不能只读党的机关刊物。”

“对，”卡可夫说。“不过即使读了二十种报纸，你也得不到这种全貌的。再说，即使你得到了，我不知道你拿它有什么用。”

我差不多一直了解全貌，可我却想设法忘掉它。”

“你认为情况那样糟吗？”

“现在比以前好些。我们正在清除一些最要不得的分子。但是情况十分糟糕。我们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军队，有些人是可靠的，象莫德斯托、‘农民’、利斯特和杜兰的部下。他们不仅仅可靠，还是挺了不起的人。你将会看到这一点。再说，我们依旧有国际纵队，虽然它们的作用要改变。但是，一支成分中好坏兼有的军队是无法打胜仗的。所有的人都必须达到一定的政治觉悟水平，所有的人都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战斗和战争的重要性。所有的人都必须对未来的战斗抱有信心，都必须服从纪律。我们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征募的军队，但没时间树立征募的军队所必须具备的、教他们在炮火下该如何行动的纪律。我们称它为人民军队，然而它缺乏真正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又缺乏征募的军队所需要的铁的纪律。你将会知道，这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你今天不大愉快。”

“不错，”卡可夫说。“我刚从瓦伦西亚回来，在那儿我见到很多人。从瓦伦西亚回来的人心情都不大愉快。在马德里，你感到舒坦，感到只会胜利，不可能失败。瓦伦西亚是另一码事。从马德里逃跑的懦夫们仍在那儿统治着。他们心满意足地安于懒散的官僚统治。他们对马德里的人只有蔑视。现在使他们困扰的是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削弱。还有巴塞罗那。你应该去看看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怎么样？”

“还是象在演滑稽歌剧。最初是狂想家和浪漫革命家的乐园。现在是冒牌战士的天堂。那些喜欢穿军装、喜欢耀武扬威

的戴着红黑领巾的士兵，这种人喜欢战争的一切，就是不喜欢打仗。瓦伦西亚使你作呕，而巴塞罗那使你发笑。”

“那么波姆叛乱^①呢？”

“波姆根本是不严肃的。那是狂想家和过激分子的异端邪说的产物，实在不过是幼稚病而已。有些是误入歧途的老实人。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智囊人物，还有一点法西斯分子那边弄来的钱。不多。可怜的波姆。他们是非常愚蠢的人。”

“在叛乱中很多人被杀了吗？”

“没有叛乱后被枪杀的、或今后将被枪杀的多。波姆，正象它的名称，是不严肃的。应该管它叫炸腮或麻疹^②才对。可是不对。麻疹要危险得多。它会损害视力和听觉。可是你知道，他们搞了个阴谋来杀我、杀华尔特、杀莫德斯托、杀普列托。你明白他们糊涂到什么地步了吗？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可怜的波姆。他们从没杀过敌人。在前线或别的地方都没杀过。在巴塞罗那是杀过一些，不错。”

“当时你在那儿吗？”

“不错。我发了个电报，报道了那个托派杀人犯的臭名昭彰的组织的罪恶，和它那些卑鄙透顶的法西斯阴谋诡计，不过，我们说句体己话，波姆成不了大事。厄恩是他们中唯一的有头脑的人。我们逮住了他，可又从我手里溜掉了。”

“现在他在哪儿？”

① 波姆（P.O.U.M.）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首字母缩略词的音译，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组织，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十日在巴塞罗那发动反共和政府的叛乱。

② 此处卡可夫有意把“炸腮”和“麻疹”的英语名称念成 M.U.M.P.S. 及 M.E.A.S.L.E.S.，听上去好象也是什么政治团体的首字母缩略词。

“在巴黎。我们说他在巴黎。他是个很令人愉快的人，但是在政治上糟糕地背离了正道。”

“他们和法西斯分子有联系，对不？”

“谁又没有联系呢？”

“我们没有。”

“谁知道？但愿我们没有。你经常到他们阵线的后方去，”他露齿笑了。“但是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馆一个秘书的弟弟，上星期曾到圣让德吕兹去会见布尔戈斯方面来的人^①。”

“我更喜欢前线的情况，”罗伯特·乔丹说。“越靠近前线的人越好。”

“你喜欢法西斯阵线的后方吗？”

“很喜欢。我们在那儿的人是很不错的。”

“噢，你知道，在我们阵线的后方，他们同样也一定派了很不错的人。我们逮住了他们就枪毙，他们逮住了我们的人也枪毙。你在他们的地区里，必须时刻想到他们一定派了好多人到我们这里来。”

“我想到过这些人。”

“好吧，”卡可夫说。“今天你应该思考的事也许已经够多了，所以把罐里剩下的啤酒喝了就走吧，因为我还得到楼上去找人。楼上的上层人士。早点再来看我吧。”

好，罗伯特·乔丹想。我在乐爵饭店学到很多东西。卡可夫看过他出版的唯一的那本书。那本书并不成功。只有两百页，他不知道看过这本书的人数到不到两千。他在西班牙靠步行，坐

^① 布尔戈斯为西班牙北部布尔戈斯省省会，在马德里正北约一百三十二英里处，内战爆发后，就成为佛朗哥叛军“政府”所在地。圣让德吕兹为法国西南端一滨比斯开湾的小城，离西班牙边境城市伊伦极近。

火车三等车，公共汽车，骑骡马，搭卡车旅行了十年，把耳闻目见的事全写在这本书里了。他非常熟悉巴斯克地区、纳瓦拉、阿拉贡、加利西亚、两个卡斯蒂尔和埃斯特雷马杜拉^①。这一类作品中，博罗、福特^②和其他一些人写得已经很出色了，他没什么新的内容可以增添。但卡可夫说那是本好书。

“我关心你的原因就在这里，”他说。“我认为你写得绝对真实，那是不可多得的。所以我想让你了解一些情况。”

行啊。等这次任务结束后，他要写一本书。但是只写他真正了解的事情，他懂得的事情。他想：可我得成为一个比目前高明得多的作家才能处理这种题材啊。他在这次战争中逐渐了解到的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

第十九章

“你坐在那儿做什么？”玛丽亚问他。她挨在他身边站着，他转过头去，朝她微笑。

“不做什么，”他说。“我在想。”

“想什么？想桥？”

① 这些地名除纳瓦拉为北部比利牛斯山南的一省名外，其他都是历史上的古王国或地区的名字，沿用至今。阿拉贡地区在东北部，老卡斯蒂尔地区在马德里西北，本书背景即在此地区，新卡斯蒂尔在其东南，占西班牙的中部，包括马德里在内。

② 乔治·博罗(George Borrow, 1803—1881): 英国语言学家、旅行者兼小说家，著有多种关于西班牙风土人情、吉普赛人及其方言的作品。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 1796—1858): 英国旅行家兼作家，一八四五年发表的《西班牙旅游者手册》为一部非常详情的佳作。

“不。桥已经想好了。想你，想马德里一家饭店，那边有我认识的几个俄国人，还想我以后要写的一本书。”

“马德里有很多俄国人吗？”

“不多。很少。”

“可是在法西斯分子的刊物上说有好几十万。”

“那是胡扯。没有多少。”

“你喜欢俄国人吗？上次来这儿的是个俄国人。”

“你喜欢他吗？”

“喜欢。那时我病着，可我觉得他很漂亮、很勇敢。”

“漂亮！胡扯，”比拉尔说。“他的鼻子平得象我的手掌，颧骨阔得象羊屁股。”

“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罗伯特·乔丹对玛丽亚说。“我很喜欢他。”

“当然啦，”比拉尔说。“可是你枪杀了他。”

她讲到这里，牌桌上的人都抬起头来看，巴勃罗呢，呆瞪着罗伯特·乔丹。谁也不说话，最后吉普赛人拉斐尔发问了，“是真的吗，罗伯托？”

“真的，”罗伯特·乔丹说。他想：比拉尔不提这个话题就好了，他在“聋子”那儿不讲这件事就好了。“根据他的要求。他受了重伤。”

“真是件怪事，”吉普赛人说。“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老是说起这种可能性。我答应他照他要求做，不知道有多少回了。真是件怪事，”他又说了一遍，还摇摇头。

“他这个人非常古怪，”普里米蒂伏说。“非常特别。”

“听着，”两兄弟中的一个，安德烈斯说，“你是教授，懂得多。你相信人能预见自己的未来吗？”

“我认为无法预见，”罗伯特·乔丹说。巴勃罗好奇地瞅着他，比拉尔脸上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拿这位俄国同志来说，他在前方待得太久，变得神经质了。他在伊伦打过仗，你知道，那一次情况很糟，非常糟。后来他在北方打仗。自从第一批在敌后干这种工作的小组成立以来，他在这儿干过，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干过。我认为他非常疲劳而神经质，总是往最坏的地方想。”

“他肯定见过很多邪恶的事情，”费尔南多说。

“什么没见过！”安德烈斯说。“可是听我说，英国人，你认为一个人能事先就知道将来的遭遇吗？”

“不能，”罗伯特·乔丹说。“那是无知、迷信。”

“说下去，”比拉尔说。“我们来听听教授的看法。”她那种样子就象正在对一个早熟的小孩子讲话一样。

“我以为恐惧会产生不祥的幻觉，”罗伯特·乔丹说。“看到凶兆——”

“比如说今天的飞机，”普里米蒂伏说。

“比如说你的来到，”巴勃罗低声说，罗伯特·乔丹在桌对面望着他，看出他这句话不是挑衅，而只是他思想的流露，便接下去说，“一个人怀着恐惧，看到了凶兆就会想象到自己的末日到了，就认为这种想象是预感。”罗伯特·乔丹最后说，“我看情况不外乎就是这样。妖怪啦，算命先生啦，超自然的奇迹啦，我都不信。”

“可这个名字古怪的人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吉普赛人说。“结果正是这样啊。”

“他没有预见到，”罗伯特·乔丹说。“他害怕会发生这种事，而这种害怕变成了他心头的一个疙瘩。别跟我说什么他预见到

了什么。”

“我也不能说吗？”比拉尔问他，从炉灶里抓起一把灰，摊在手掌上，吹掉。“我也没法说服你吗？”

“对。即使你拿出巫术、吉普赛人的那一套劳什子，也没法说服我。”

“因为你这个人聋得出奇，”比拉尔说，一张大脸在烛光中显得严峻而宽阔。“倒不是因为你愚蠢。你只是耳朵聋罢了。耳朵聋的人是听不到音乐的，也没法听收音机。因为从来也没听到过，所以他会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什么话，英国人！我在那个名字古怪的人的脸上看出了死相，就象用烙铁烫在脸上似的。”

“没的事，”罗伯特·乔丹坚持说。“你看到的是恐惧和忧虑。恐惧是他的经历造成的。忧虑是因为他想象有可能遭到不测。”

“什么话，”比拉尔说。“我明明白白地看到死神好象就坐在他的肩上。不但如此，他身上还发出了死的气味。”

“他身上发出了死的气味，”罗伯特·乔丹嘲笑道。“大概是恐惧的气味吧。恐惧的气味是有的。”

“是死的气味，”比拉尔说。“听着。那个当时替格兰纳罗帮场的布兰克特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斗牛士助手，他对我讲过，马诺洛·格兰纳罗死的那天，他们去斗牛场的路上，在小教堂做了祷告，那时马诺洛身上的死味浓得差点叫布兰克特呕吐。动身去斗牛场之前，马诺洛在旅馆里洗澡、换衣服时，他就和马诺洛在一起。他们在汽车里紧挨在一起坐着，开往斗牛场时，还没有这股气味。当时在小教堂里除了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之外，谁也辨不出什么气味。马西亚尔也好，奇昆洛也好，无论在那时，还是后来他们四个人排了队在斗牛场绕场一周的时候，都没有

闻到这股气味。布兰克特告诉我说，胡安·路易斯脸色煞白，布兰克特就对他说，‘你也闻到了？’

“‘浓得叫我透不过气来，’胡安·路易斯对他说。‘是你那位斗牛士身上的。’

“‘一点没办法，’布兰克特说。‘一点没办法。但愿我们弄错了。’

“‘别人呢？’胡安·路易斯问布兰克特。

“‘没有，’布兰克特说。‘一点没有。不过这个人的气味比何塞在塔拉韦拉时还要浓。’

“正是在那天下午，维拉瓜牧场豢养的公牛波卡贝纳把马诺洛·格兰纳罗撞死在马德里斗牛场两号看台前的木板围栏上。我和菲尼托在那儿，我亲眼看到的。公牛把马诺洛摔在围栏下，他的脑袋卡在栏杆底下，颅骨给牛角撞得粉碎。”

“你可闻到什么气味？”费尔南多问。

“没有，”比拉尔说。“我离得太远。我们在三号看台的第七排。因为在角上，所以看到了整个情况。布兰克特从前替何塞帮过场，何塞也是被牛挑死的。那天晚上，布兰克特在福尔诺斯酒店对菲尼托讲到这件事，菲尼托就问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但他不肯说，只是点点头，表示是真的。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场。所以英国人啊，看来你对这种事情耳朵是聋的，就象奇昆洛、马西亚尔·拉兰达以及他们所有的短扎枪手和长矛手，象胡安·路易斯和马诺洛·格兰纳罗手下的人在那天都是聋的一样。胡安·路易斯和布兰克特可不聋。我对这种事情也不聋。”

“这是该用鼻子嗅的，你干吗说耳朵聋呢？”费尔南多问。

“去你的！”比拉尔说。“英国人的教授位子该由你来坐啦。”

不过我还可以给你讲些别的情况，英国人；所以你自己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情，你也不要怀疑。狗听得到的，你可能听不到。狗嗅到的，你也可能嗅不到。不过你已经多少体会到人可能碰到什么命运了。”

玛丽亚把手放在罗伯特·乔丹肩上，不就挪开，他不禁突然想到，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废话，好好利用现有的时间吧。不过，现在还早着呢。我们不得不消磨傍晚的这段时间，所以他对巴勃罗说，“你，你相信这种巫术吗？”

“我不知道，”巴勃罗说。“我比较赞成你的看法。我从没遇到过超自然的奇迹。可是恐惧，当然是有的。很多。不过比拉尔能看手算命，我是相信的。如果她不是撒谎，那也许她真的能闻出这种味儿来。”

“什么话，我干吗撒谎呀！”比拉尔说。“这种事不是我胡诌的。布兰克特这个人非常认真，而且非常虔诚。他可不是吉普赛人，而是瓦伦西亚的资产阶级。你从没见过他吗？”

“见过，”罗伯特·乔丹说。“我见过他好多次。他个子矮小，脸色灰白，挥动披风的功夫谁也比不上他。他脚步灵活得象兔子。”

“一点也不错，”比拉尔说。“他脸色灰白是心脏病的缘故。吉普赛人都说，死神附在他身上，可是他象掸掉桌子上的灰似的，能用披风把死神掸掉。他不是吉普赛人，然而在塔拉韦拉斗牛的时候，闻到了何塞身上的死的气味。我可不明白他在弥漫着白葡萄酒气味的气氛中怎么还能闻到死的气味。布兰克特后来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很踌躇，可是听他讲话的那些人说，那是瞎想出来的，他闻到的是何塞处于当时的生活方式中他胳肢窝里出的汗的气味。可是后来呢，发生了马诺洛·格兰纳罗这件事，

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也闻到的。胡安·路易斯名声当然不太好，但是做事利索，还是个跟女人睡觉的好手。布兰克特呢，很严肃，非常文雅，根本不会讲假话。我跟你说呀，你那个同事从前在这里的时候，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死的气味。”

“我不信，”罗伯特·乔丹说。“你还说过，布兰克特在绕场时闻到了这股气味。就在斗牛开始之前。而你和卡希金在这里炸火车，干得很成功。炸火车时他没有死。那你怎么会闻到？”

“这压根儿不相干，”比拉尔解释说。“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在他最后一个斗牛季节里身上死的气味那么浓，在咖啡馆里很多人都不愿和他坐在一起。吉普赛人都知道这件事。”

“人死了之后，人家就虚构出这种事来了，”罗伯特·乔丹争辩说。“人人都知道，桑切斯·梅希亚斯很久不练功，他的斗牛架式笨而犯险，力气衰退了，腿儿不灵活了，反应也不象以前那么快了，所以早晚会挨上牛角的。”

“当然啦，”比拉尔对他说。“这一切都是事实。不过，吉普赛人个个都知道，他身上有死的气味。他一走进玫瑰酒店，里卡多、费利佩·冈萨雷斯这些人，就从酒吧后面的小门溜走了。”

“也许他们欠他债吧，”罗伯特·乔丹说。

“有可能，”比拉尔说。“很可能。不过他们也闻到了，人人都知道这回事。”

“她话不假，英国人，”吉普赛人拉斐尔说。“这件事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我一点也不信，”罗伯特·乔丹说。

“听着，英国人，”安塞尔莫开口说。“这些巫术我全不信。不过这位比拉尔能未卜先知倒是有名的。”

“那么这种气味象什么？”费尔南多问。“是怎么样的气味？要是有的话，那一定是种很具体的气味。”

“你想知道吗，费尔南多？”比拉尔对他笑笑。“你以为你能闻到吗？”

“要是果真有这种气味，人家能闻到，我干吗不能？”

“干吗不能？”比拉尔取笑他，她拿两只大手抱着双膝。“你乘过船吗，费尔南多？”

“没有。我也不想乘。”

“那么你恐怕辨不出来。这种气味有点儿象暴风雨来时关上舷窗后船里的气味。船在你脚底下颠簸，你感到头昏眼花，胃里直翻，你把鼻子贴在拧紧的舷窗的铜把柄上，就能闻到一点儿这种气味了。”

“我不打算乘船，所以这种气味我不可能辨出来，”费尔南多说。

“我乘过几回船，”比拉尔说。“去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我都是乘船去的。”

“还有呢？”罗伯特·乔丹问。比拉尔骄傲地想起了她的旅行，嘲弄地望着他。

“好吧，英国人，学学吧。这就对了，学学吧。好吧。你在船上闻到这气味之后，该一清早在马德里走下山，到托莱多大桥边的屠宰场去，站在那潮湿的石板地上，那时候从曼萨纳雷斯河面上飘来了晨雾，你等着那些天没亮就去喝被屠宰的牲口的血的老太婆。这种老太婆裹着围巾，脸色灰白，眼睛凹陷，下巴和脸颊上长着老年须，就象豆种上长出来的芽须，不是硬毛，而是她死人般蜡黄的脸上长出的灰白色的芽须；等这样一个老太婆从屠宰场里走出来，你伸出手去紧紧搂住她，英国人，把她紧贴在你身

上，亲她的嘴，那你就知道这种气味还象些别的什么东西了。”

“这种气味叫我倒胃口啦，”吉普赛人说。“这种芽须的气味叫人太受不了啦。”

“你还要听吗？”比拉尔问罗伯特·乔丹。

“当然，”他说。“如果有必要学学，就学学吧。”

“老太婆脸上芽须的气味叫我作呕，”吉普赛人说。“老太婆脸上为什么会长出这玩意儿来，比拉尔？我们可不这样。”

“是不这样，”比拉尔取笑他说。“我们老太婆啊，年轻时可苗条呢，当然啦，可惜老是腆着个大肚子，这说明了她丈夫给她的恩赐。每个吉普赛女人老是前面顶着个——”

“别说这种话，”拉斐尔说。“太下流啦。”

“原来伤了你的感情了，”比拉尔说。“吉普赛女人不是快生孩子就是刚生孩子，你可见过有谁不是这样子吗？”

“你。”

“别胡扯，”比拉尔说。“每个人都有伤感情的时候。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年纪给大家都带来一副丑相。不必细讲啦。不过，要是英国人一定要知道他巴不得辨别的那种气味，他必须大清早到屠宰场去。”

“我去，”罗伯特·乔丹说。“不过等她们路过的时候，我只想闻闻这种气味，不想跟她们亲嘴。我也和拉斐尔一样，怕这种芽须。”

“吻一个吧，”比拉尔说。“吻一个吧，英国人，要知道，就得吻。然后鼻孔里带着这股气味，赶回城里，看到垃圾桶里有枯谢的花，就把鼻子深深地伸到桶里，吸它一口气，让鼻孔里已有的气味和桶里的气味混在一起。”

“我这可差不离了，”罗伯特·乔丹说。“什么花呢？”

“菊花。”

“讲下去，”罗伯特·乔丹说。“我闻到了。”

“然后，”比拉尔接着说，“要紧的是要挑一个秋天下雨的日子，或者至少要有雾，或者甚至在初冬，你该在城里一股劲地走，顺着康乐大街走，等那些妓院里清扫出垃圾、往阴沟里倒便桶的时候，有什么气味你就闻什么。这种一夜风流的气味和肥皂水、香烟屁股的香味混在一起，淡淡地飘进你的鼻孔，你得继续向植物园走去，在那儿，夜色里，没法再在妓院里接客的姑娘们，靠在公园的铁门和铁栅栏上接客，就在人行道上接客。她们就是在树荫下靠在铁栏杆上让男人过瘾的，从一毛钱满足最简单的要求，到一块钱干一次我们天生会干的好事，那是在一个还未清除死花、重新栽上的花坛上干的，这样把泥土搞得比人行道软得多。你将会发现一只被扔掉的麻袋，上面带着湿土、枯花和那夜所干的好事的气味。这麻袋上含有全部精华，既有死土、枯萎的花梗和腐烂的花朵的气味，也有人的死亡和诞生的气味。你把这只麻袋套在自己头上，在里面呼吸。”

“不。”

“要，”比拉尔说。“你把这只麻袋套在自己头上，在里面呼吸。你深呼吸的时候，假如先前的那些气味还没有散失，那么，你就会闻到我们所说的死亡临头的气味了。”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那你说卡希金在这里的时候，身上就有这种气味吗？”

“是的。”

“得，”罗伯特·乔丹认真地说。“要是真有这种事，我把他枪杀掉倒是件好事啦。”

“说得妙，”吉普赛人说。其他人都笑了。

“好极了，”普里米蒂伏赞许地说。“这下子可把她难住啦。”

“不过比拉尔啊，”费尔南多说。“堂·罗伯托是个知书识理的人，你当然不能指望他干出这种肮脏勾当。”

“对，”比拉尔同意说。

“这种事全叫人恶心到极点。”

“是啊，”比拉尔同意说。

“你并不指望他真的干出这些有失身份的事？”

“对，”比拉尔说。“你去睡觉吧，好不好？”

“可是比拉尔——”费尔南多继续说。

“你住口好不好？”比拉尔突然恶狠狠地对他说。“你别发傻了，我也不发傻了，不再跟这种根本听不懂我的话的人说话了。”

“说句心里话，我是听不懂，”费尔南多开口说。

“别说心里话了，别想听懂了，”比拉尔说。“外面还在下雪吗？”

罗伯特·乔丹走到洞口，撩起门毯望望外面。洞外，夜空晴朗，天气寒冷，不下雪了。他目光穿过树干之间向雪地望去，再抬头透过树梢望望无云的夜空。他呼吸时觉得吸进肺部的空气冷得刺人。

“如果‘聋子’今晚去偷马，会留下很多脚迹，”他想。

他放下门毯，返身进入烟雾弥漫的山洞。“天晴啦，”他说。“暴风雪过去了。”

第二十章

他如今躺在黑夜里，等着姑娘到他这儿来。这时风已停息，松树在夜色中悄然无声。松树干兀立在盖满雪的地面上，他躺在睡袋里，感到身体底下他铺的东西软绵绵的，两腿直伸在暖和的睡袋里，脸上接触到的和吸进鼻子的空气冷得刺人。他侧身躺着，头下是他用裤子和外衣卷在鞋子外面做成的圆鼓鼓的枕头。他脱衣时从枪套里取出大自动手枪，把手枪带系在右手腕上，这时感到那冷冰冰的枪身贴在腰的一侧。他推开手枪，身体更往睡袋里缩下一些，同时望着雪地对面山岩上的黑色缺口，那就是山洞的洞口。天空晴朗，借着雪光的反射可以看清山洞两旁的树干和大块山岩。

临近黄昏的时候，他曾拿了一把斧头，走出山洞，踏过新下的雪，来到林间空地边缘，砍下一棵小云杉。他在黑暗中握着树的根端，把它拖到山崖的背风处。他挨近山崖，一手把稳树干，把树竖直，一手握住斧头柄靠近斧头的地方，砍下了所有的枝丫，聚成一堆。然后，他把光树干放在雪地里，离开那堆枝丫，走进山洞去拿一块他早先见到靠在洞壁上的厚木板。他用这木板沿着山崖把一块地上的雪全刮开，然后拣起树枝，抖掉上面的雪，一行行地排列在地面上，就象鸟身上迭盖着的羽毛那样，直到做成一张床铺。他把树干横在这些树枝做成的床铺的一头，免得树枝散开，并从那块木板边上劈下两个尖楔，打进地里，卡住树干。

然后他把木板和斧头拿回山洞，撩起门毯，低着头进去，把这两件东西靠在洞壁上。

“你在外面做啥？”比拉尔问。

“做了一张床。”

“你做床，可别拿我那新搁板劈呀。”

“请原谅。”

“没关系，”她说。“锯木厂里木板多着。你做的床是啥样的？”

“就象我家乡的一样。”

“那就在铺上好好睡吧，”她说。罗伯特·乔丹打开一个背包，从里面抽出睡袋，把包在里面的东西放回背包，然后拿着睡袋再撩开门毯，低头走出山洞，把睡袋铺在树枝上，让睡袋那封闭的一头抵在那根横钉在床脚的树干上。睡袋口有峻峭的石壁遮挡着。然后他再到山洞里去拿他的背包，但比拉尔说，“就象昨晚一样，背包跟我睡得啦。”

“你不派人放哨？”他问。“今晚天晴，风雪又停了。”

“费尔南多去，”比拉尔说。

玛丽亚正在山洞深处，罗伯特·乔丹看不见她。

“诸位晚安，”他说。“我去睡啦。”

大家正在把板桌和蒙着生皮的凳子推到一边，腾出睡觉的地方，把毯子和铺盖摊在炉火前的地上。这时，其中的普里米蒂伏和安德烈斯抬起头来说：“晚安。”

安塞尔莫在角落里，已经睡熟了，身体裹在他的毯子和披风里，连鼻子也看不到。巴勃罗坐在椅子上睡熟了。

“你铺上要张羊皮吗？”比拉尔低声问罗伯特·乔丹。

“不用，”他说。“谢谢你。我不需要。”

“好好睡吧，”她说。“你的东西我负责。”

费尔南多跟他一起来到洞外，在罗伯特·乔丹铺睡袋的地

方站了一会儿。

“你这主意很古怪，睡在露天。堂·罗伯托，”他站在黑暗中说，身上裹着毯子式的披风，卡宾枪挂在肩上。

“我习惯了。晚安。”

“你习惯了就行。”

“什么时候人家来换你的班？”

“四点钟。”

“从现在到四点这一段时间很冷。”

“我习惯了，”费尔南多说。

“你习惯了那就行——”罗伯特·乔丹客气地说。

“对，”费尔南多附和说。“我现在得上山去放哨啦。晚安，堂·罗伯托。”

“晚安，费尔南多。”

然后他把脱下的衣服做了个枕头，钻进睡袋，躺着等待，感到在这暖和的法兰绒衬里的羽绒睡袋底下，那些树枝富有弹性。他注视着雪地对面的山洞口，等待着，觉得心在跳。

夜色晴朗，他感到头脑和空气一样清澈而寒冷。他闻到身体下面松枝的气味、压碎的松针的味儿和更强烈的树枝断口渗出的树脂香味。比拉尔，他想，比拉尔和她扯的死亡的气味。我爱闻的可是这一种气味。这一种和新割的苜蓿的气味，还有你骑了马赶牛时踩碎的鼠尾草的气味，柴火的烟味和秋天烧树叶的气味。那准是勾起乡愁的气味，秋天在故乡米苏拉的街上耙成堆的树叶燃烧时的烟火味。你情愿闻哪一种气味呢？印第安人编篮子用的香草的气味？熏皮张的气味？春雨后泥土的气味？你在加利西亚地岬上走在金雀花丛中闻到的海洋味儿？还是你在黑夜里驶近古巴的时候，从陆地上吹来的风的气味？那是仙人掌

花、含羞草和马尾藻丛的气味。要不，你情愿闻闻在早晨饥饿时所吃的煎咸肉的香味？还是早晨的咖啡香？还是把一只晚秋苹果一口咬下去时闻到的香味？还是苹果酒作坊在碾碎苹果时的味儿，或者刚出炉的面包香味呢？他想：你一定饿了。他侧身躺着，借着照在雪上的星光望着那山洞口。

有人从毯子后钻出来。他看见那人站在山岩的缺口前，就是那山洞口，但看不清是谁。他接着听到在雪里移动的脚步声，接着，这个人撩起毯子，低着头又进去了。

他想：看来她要等大家都睡熟了才会前来。真是浪费时间啊。夜晚过去一半了。玛丽亚啊。快来吧，玛丽亚，因为时间不多啦。他听到树枝上一块雪轻柔地掉在雪地上的声音。起了一阵微风，他脸上感到了。他忽然慌张起来，说不定她不会来了。这时起了风，使他想到早晨不久就要来临。他听到微风吹动树梢的声音，树枝上又有些雪落下来了。

来吧，玛丽亚。他想：请你现在快到我身边来吧。啊，快到我身边来吧。别等啦。你等不等他们睡熟，都没有关系了。

接着，他看到她从那蒙在山洞口的毯子下面钻出来了。她站了一会儿，他知道是她，但看不清她在做什么。他低声吹了声口哨，但她还在洞口山岩的黑影里做着什么。接着，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奔过来了。他看到她两条长腿在雪地里奔跑。接着，她跪在睡袋旁边，拍掉脚上的雪，用头紧挨着他。她亲了他一下，把一包东西递给他。

“把这个和你的枕头放在一起，”她说。“我在洞口脱掉了鞋，免得浪费时间。”

“你光着脚从雪地里来的？”

“是啊，”她说。“只穿一件结婚衬衫。”

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把头磨蹭着他的下巴。

“别碰脚，”她说。“脚很冷，罗伯托。”

“把脚伸到这儿来，暖和暖和。”

“不，”她说。“很快就会暖和起来的。现在快说：你爱我。”

“我爱你。”

“好。好。好。”

“我爱你，小兔子。”

“你爱我的结婚衬衫吗？”

“永远是这一件。”

“对。就象昨晚一样。这是我的结婚衬衫。”

“把脚伸到这儿来。”

“不，那不象话。脚自己会暖和起来的。我不觉得脚冷。只因为踩过雪，你才觉得冷的。再说一遍。”

“我爱你，我的小兔子。”

“我也爱你，我是你的妻子。”

“他们睡着了？”

“没有，”她说。“可我再也忍不住了。那有什么关系？”

“一点儿没关系，”他说，感到她贴在身上，苗条而顾长的身子温暖喜人。“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把手放在我头上，”她说。“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吻你。”

“这样好吗？”她问。

“好，”他说。“把你的结婚衬衫脱了。”

“你要我脱吗？”

“要，不冷就脱。”

“哪儿的话！我身上象着了火似的。”

“我也是。可是过后你不会觉得冷吗？”

“不会。过后我们会象森林里的野兽，紧紧地挨在一起，彼此都分不出哪个是你、哪个是我了。你不觉得我的心就是你的心吗？”

“觉得。分不出了。”

“现在你摸摸。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成为一个人了。我爱你，啊，我多么爱你。我们不是真的成为一个人了？你不觉得吗？”

“觉得，”他说。“的确如此。”

“现在你摸摸。你除了我的心外可没别的心了。”

“也没有别的腿、别的脚或别的身体了。”

“可我们是不一样的，”她说。“我希望我们完全一样。”

“你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我非要对你这样说不可。”

“你不是这个意思。”

“也许不是，”她温柔地说，嘴唇贴在他肩上。“可是我巴不得这样说。既然我们不一样，叫我高兴的是你是罗伯托，我是玛丽亚。不过，要是你想变，我也乐意变。我愿意变成你，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可不愿意变。还是你是你、我是我的好。”

“可现在我们要变成一个人啦，再分不出你我了。”她接着说，“即使你不在身边，我也是你。啊，我真爱你，我一定要好好地宠爱你。”

“玛丽亚。”

“嗯。”

“玛丽亚。”

“嗯。”

“玛丽亚。”

“噢，喂。说吧。”

“你不冷吗？”

“噢，不。把睡袋拉拉好，遮住你的肩。”

“玛丽亚。”

“我说不出口了。”

“啊，玛丽亚。玛丽亚。玛丽亚。”

到后来，紧挨着躺在一起，外面是寒夜，睡袋里是绵绵暖意，她头贴在他脸颊上，静静地、愉快地挨在他身旁，接着温柔地说，“你呢？”

“跟你一样，”他说。

“好，”她说。“不过跟今天下午不一样。”

“是啊。”

“可我更喜欢这样。不一定要死过去的。”

“但愿不，”他说。“我希望不要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是一个意思。”

“那你干吗说这话而不照我的意思说？”

“对男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那我高兴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也高兴，”他说。“不过我懂得这死过去的感觉。我这样说，只不过因为我是男人，出于习惯。我和你的感觉一样。”

“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怎样说，都正合我的心意。”

“我爱你，我还爱你的名字，玛丽亚。”

“那是个普通的名字。”

“不，”他说。“不普通。”

“我们现在睡吧？”她说。“我很快就会睡熟的。”

“我们睡吧，”他说。他感到那颀长而轻盈的身体温暖地挨着他，使人舒适地挨着他，排除孤独地挨着他；就凭腰部的接触，肩膀和脚的接触，奇妙地使他不再感到孤独，跟他结成一个对抗死亡的联盟，于是他说，“好好睡吧，长脚小兔子。”

她说，“我已经睡熟了。”

“我就要睡着了，”他说。“好好睡吧，亲爱的。”然后他入睡了，快乐地熟睡着。

但是，夜半他醒来，把她紧紧接着，仿佛她就是生命中的一切，正从他身边被夺走似的。他搂着她，觉得她是存在着的生命的一切，而且事实正是如此。她呢，安详地熟睡着，没有醒过来。于是他翻了个身，侧卧在一边，拉起睡袋蒙住她的头，在睡袋里凑着她的脖子吻了一下，然后拉起手枪上的绳子，把手枪放在随手拿得到的身旁，然后躺在夜色里思量。

第二十一章

黎明带来了一阵和风，他听到树上的积雪溶化了，啪嗒啪嗒地掉在地上。那是一个暮春的早晨。他呼了一口气就知道，这场暴风雪只不过是山区里的反常现象，雪到中午就会化掉的。他接着听到有匹马来近了，骑手策马小跑，马蹄带着湿雪，发出重浊的得得声。他听到卡宾枪套摇晃时的拍打声，和皮鞍的咯吱咯吱声。

“玛丽亚，”他说，摇摇姑娘的肩膀，要她醒来。“躲在睡袋里

别起来。”他一手扣衬衫钮扣，一手拿起自动手枪，用大拇指松开保险。他看到姑娘剪短头发的脑袋猛的缩进睡袋，接着就看到那骑手从树林里过来了。他这会儿匍匐在睡袋里，两手握着枪，瞄准朝他骑来的人。他以前从没见过这个人。

这时，骑手几乎就在他对面了。他骑着一匹灰色大阉马，头戴卡其贝雷帽，穿着毡子式的披风和笨重的黑靴，马鞍右面的枪套里撅出着一支短自动步枪的枪托和狭长的子弹夹。他长着一张年青而冷酷的脸，这时他看到了罗伯特·乔丹。

他把手朝下伸向枪套，当他弯腰转身从枪套里急速拔枪的时候，罗伯特·乔丹看到他卡其披风的左胸前佩戴着大红色的统一标记^①。

罗伯特·乔丹瞄准这标记稍下方，朝他当胸一枪。

枪声在积雪的树林中震响着。

马儿仿佛突然被马刺踢了一下，向前猛地一冲；那年轻人还在拉扯枪套，身子就朝地面溜下去，右脚被马镫勾住了。马儿撒开四腿拖着脸朝下的骑手颠簸碰撞，在林中奔驰而去。罗伯特·乔丹一手握枪，站起身来。

那匹大灰马在松林中狂奔。那人的身子在雪地上拖出了一条宽阔的痕迹，一边是一道深红色的血迹。大家从山洞里走出来。罗伯特·乔丹伸手把当枕头用的裤子摊开，开始穿着。

“你把衣服穿上，”他对玛丽亚说。

他听到头顶上一架飞得很高的飞机的声音。他穿过树林看见那匹灰马站在那儿不跑了，那骑手仍旧脸朝下地挂在马镫

① 指天主教会内崇拜耶稣基督圣心的信徒们所佩的标记。该崇拜由法国修女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于十七世纪倡议，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传播甚广。

上。

“去把那匹马拉住，”他朝向他走来的普里米蒂伏喊着。接着问，“山顶上谁在放哨？”

“拉斐尔，”比拉尔在山洞口说。她站在那儿，头发来不及梳，两股发辫披在背上。

“骑兵来了，”罗伯特·乔丹说。“把你那挺天杀的机枪架在山上。”

他听到比拉尔对山洞里叫奥古斯丁。接着她走进山洞，然后两个男人跑出来，一个拿着自动步枪，三脚架摆在肩上；一个拿着一袋子弹盘。

“跟他们一起上山，”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你伏在枪边，抓住枪架别动，”他说。

三个人顺着山路，穿过树林，跑上山去。

太阳还没照上山顶，罗伯特·乔丹站直了身体，扣上裤子，收紧腰带，手腕上的绳子上挂着那支大手枪。他把手枪插在腰带上的枪套里，把活结移到下端，把绳圈套在自己脖子上。

他想：总有一天人家会用这个绳圈把你绞死。得了，这次它可帮了个大忙。他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抽出子弹夹，拿枪套外边那排子弹中的一颗塞进子弹夹，再把子弹夹推入枪柄。

他朝树林中普里米蒂伏那儿望去，只见他抓住了马缰，正把那骑手的脚从马镫里拔出来。尸体的脸朝下，伏在雪地上；他望着普里米蒂伏正在搜他的衣袋。

“过来，”他喊道。“把马带来。”

罗伯特·乔丹跪着穿绳底鞋时，觉得玛丽亚靠在他膝旁，正在睡袋里穿衣服。她这时在他生活里没有地位了。

他在想：这骑兵没料到会出意外。他没有循着马蹄印走，

竟没有理所当然地保持着警惕，更不用说心怀恐惧了。他甚至没顺着那通向岗哨的脚印走。他准是散开在这些山里的巡逻队中的一员。可是等巡逻队发现他失踪了，他们会循着他的马蹄印找到这里来的。他想：除非雪先化掉，除非巡逻队遇到什么情况。

“你最好到下面去，”他对巴勃罗说。

这时大家都走出了山洞，提着卡宾枪站在那儿，腰带里插着手榴弹。比拉尔把一皮袋手榴弹递给罗伯特·乔丹，他拿了三个，插在衣袋里。他低头钻进山洞，找到他那两个背包，打开里面有手提机枪的那只，取出枪管枪托，将枪托接好，在枪里推进一个子弹夹，衣袋里藏了三个。他锁上背包，随即走向山洞口。他想：我两个口袋都装了硬货。但愿口袋的线缝别绽开。他走到山洞外，对巴勃罗说，“我要上山去。奥古斯丁会使那挺机枪吗？”

“会，”巴勃罗说。他望着带马来的普里米蒂伏。

“瞧，多好的马，”他说。

那匹大灰马渗着汗，微微战栗，罗伯特·乔丹拍拍马肩隆。

“我把它和别的马放在一起，”巴勃罗说。

“不行，”罗伯特·乔丹说。“它留下了来这里的蹄印。还得踩一条出去的印子。”

“对，”巴勃罗同意。“我骑它出去，把它藏起来，等化了雪再带回来。你今天很有头脑，英国人。”

“派个人下山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得上山了。”

“不用了，”巴勃罗说。“骑兵不会从那条路来。不过我们倒可以从那条路以及别的两条路撤走。如果有飞机来，还是不要留下足迹的好。给我皮酒袋，比拉尔。”

“想走开了喝个醉！”比拉尔说。“还是把这拿去吧。”他伸过

手去，把两只手榴弹藏进衣袋。

“什么话，去喝个醉！”巴勃罗说。“情况严重哪。不过还是把酒袋给我。干这种事叫我喝水可不行。”

他抬起双臂，抓住缰绳，一翻身上了马鞍。他露齿笑笑，拍拍那心惊肉跳的马。罗伯特·乔丹看他亲切地用腿儿磨蹭着马的侧腹。

“这匹马棒极了，”他说，又拍拍这匹大灰马。“这匹马美极了。走。它越早离开这里越好。”

他伸手从枪套里拔出枪筒上有散热孔的轻自动步枪，打量着它，实际上那是一支改装成可以用九毫米手枪子弹的手提机枪。“瞧他们的装备多好，”他说。“瞧这现代化的骑兵。”

“现代化的骑兵正脸朝下地躺在那儿哪，”罗伯特·乔丹说。“咱们走吧。”

“安德烈斯，你把那些马儿备好鞍，作好准备。要是听到枪声，把它们带到山隘后的树林里去。带着你的武器前来接应，让妇女们看管马。费尔南多，注意把我的背包也带着。最要紧的，拿时要特别小心。你也得把我的背包看好，”他对比拉尔说。“你要保证它们跟马一起走。咱们走吧，”他说。

“撤走的事由玛丽亚和我来准备，”比拉尔说。接着对罗伯特·乔丹说，“瞧他那副德行，”一边朝巴勃罗点点头。巴勃罗象牧人那样骑在灰马背上，用两条肥腿夹住了马腹，给自动步枪换子弹夹，这时马儿张大了鼻孔。“瞧，一匹马使他多精神啊。”

“但愿我有两匹马，”罗伯特·乔丹带劲地说。

“你骑马可不稳当。”

“那么给我一头骡子吧，”罗伯特·乔丹露齿笑着说。

“给我把那家伙的衣服剥下来，”他对比拉尔说，朝那脸面朝

下、躺在雪里的骑兵点了点头。“信呀，证件呀，什么都拿来，藏在我背包的外口袋里。什么都别丢，懂吗？”

“是。”

“咱们走吧，”他说。

巴勃罗一马当先，后面两个人单行相随，免得在雪里留下踪迹。罗伯特·乔丹提着手提机枪的前把手，枪口朝下。他想：但愿它用的子弹和这骑兵的马鞍枪^①的一样就好了。但是不一样。这是德国制造的。就是卡希金留下的那支。

这时，阳光盖满山岭，和风吹拂着，雪在溶化。真是一个可爱的暮春早晨。

罗伯特·乔丹回过头来，看见玛丽亚和比拉尔一起站着。接着她从山路上跑来。他有意落在普里米蒂伏的后面，跟她说话。

“你，”她说。“我可以跟你去吗？”

“不。帮比拉尔做事。”

她跟着他走，一只手搭在他胳膊上。

“我要去。”

“不行。”

她还是紧跟他走着。

“我可以按住枪架，就象你吩咐安塞尔莫做的那样。”

“不要你按枪架。不管是枪架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要。”

她走在他身边，把手插进他的口袋。

“别，”他说。“只要好好保护你的结婚衬衫。”

① 泛指骑兵插在马鞍上的枪套里的枪支，此处为自动步枪，较一般的略短。

“如果你要走，”她说，“吻吻我。”

“你真不知害臊，”他说。

“对，”她说。“一点也不。”

“你现在回去。要做的事很多。如果他们循着这些马蹄印来，我们说不定要在这里开火。”

“你，”她说。“你看到他胸前佩戴着什么？”

“看到。怎么会不看到？”

“那是圣心啊。”

“不错。所有的纳瓦拉人都佩戴圣心。”

“你就瞄着它开枪？”

“不。瞄在圣心下面。你现在回去吧。”

“你，”她说。“我全看到了。”

“你什么也没看到。一个男人，一个从马背上翻下来的男人。你回去吧。”

“说你爱我。”

“不。现在不行。”

“现在不爱我了？”

“别说了。你回去吧。一个人不能一边开枪一边谈恋爱啊。”

“我要去按住枪架，一边听枪响，一边爱你。”

“你疯了。你现在回去。”

“我不疯，”她说。“我爱你。”

“那么你回去。”

“好。我走。你要是不爱我，我对你的爱够我们俩消受的。”

他望着她，想了一想，不禁微笑了。

“你听到了枪声，”他说，“就跟那些马匹一起走。帮比拉尔背我的背包。说不定太平无事。但愿这样。”

“我走，”她说。“瞧，巴勃罗骑的马多棒。”

大灰马在山路上一直跑在前面。

“对。走吧。”

“我走。”

她把手在他口袋里紧捏成拳头，狠狠地捶他的大腿。他对她看看，看到她眼睛里噙着泪水。她从他口袋里抽出拳头，张开双臂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吻他。

“我走，”她说。“我走。”

他回过头来，看到她站在那儿，黎明的曙光照着她那褐色的脸，和那一头金光闪闪的剪短的褐发。她向他举举拳头，垂下头去，在小路上转身往回走了。

普里米蒂伏转过身来，望着她的背影。

“要是头发不剪得这么短，她准是个漂亮的姑娘，”他说。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他正在想别的事。

“她在床上怎么样？”普里米蒂伏问。

“什么？”

“在床上。”

“小心你的嘴。”

“不该为听了这话生气，因为——”

“算了吧，”罗伯特·乔丹说。他在察看地形。

第二十二章

“给我砍些松枝，”罗伯特·乔丹对普里米蒂伏说，“快点拿来。”

“枪架在那儿不对头，”他对奥古斯丁说。

“为什么？”

“把它挪到那边去吧，”罗伯特·乔丹指点着。“我以后告诉你。”

“架在这儿。我来帮你搬。这儿，”他说着就蹲下来。

他眺望着对面一块狭长地带，打量着两边岩石的高度。

“要放远些，”他说，“再远些。好。架在这儿。这样就行了，以后再好好调整。行啦。把石块放在那儿。这儿放一块。边上再放一块。给枪口留些转动的地方。这石头还得朝这边挪过些。安塞尔莫，到下面山洞里给我拿把斧头。快。”

“难道你们从来没有给这挺枪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吗？”他对奥古斯丁说。

“我们总是架在这儿的。”

“卡希金从没说过应该把枪架在那儿吗？”

“没有。这挺枪是他走后送来的。”

“送枪来的人中间没有会使的人吗？”

“没有。这挺枪是脚夫捎来的。”

“办事怎么能这样，”罗伯特·乔丹说。“没有说明就把枪给你们了？”

“是啊，象送礼一样。一挺给我们，一挺给‘聋子’。送枪来的人有四个，带路的是安塞尔莫。”

“四个人越过火线没把枪丢了，倒是怪事。”

“我那时也这么想，”奥古斯丁说。“我想打发他们来的人就是打算丢掉的。但安塞尔莫好好儿把枪护送来了。”

“你会使这枪？”

“会。我试过。我会。巴勃罗会。普里米蒂伏会。费尔南

多也会。我们在山洞里研究过，在桌子上把它拆开再装上。有次拆开后，装了两天才装好。我们从此再没拆过。”

“枪现在能发射吗？”

“能。但是我们不让吉普赛人和别人摆弄。”

“你懂吗？把枪架在那儿毫无作用，”他说。“瞧。那些岩石原该用来掩护你的两侧，反而被向你进攻的敌人当掩护了。有了这种枪，你该找块开阔的平地来发挥火力。你还得斜着打。懂吗？你瞧。现在前面都在你火力控制之下啦。”

“我懂了，”奥古斯丁说。“可是我们从没打过保卫战，除了我们老家那个小镇被占领的那回。炸火车的时候有正式当兵的使机关枪。”

“那我们一起来学吧，”罗伯特·乔丹说。“有些情况要注意。吉普赛人没有来，哪儿去啦？”

“不知道。”

“他可能上哪儿？”

“不知道。”

巴勃罗策马驰出山口，拐了一个弯，绕着山顶上那块平地转了个圈子，那里是自动步枪的火力范围。罗伯特·乔丹这时看见他顺着这四匹马刚才踩出来的那道蹄印，驰下山坡。他向左驰去，消失在树林里。

“但愿他别迎面碰上骑兵，”罗伯特·乔丹想。“就怕我们万一射击起来他也在我们火力范围内。”

普里米蒂伏拿来了松枝，罗伯特·乔丹把它们插在积雪下没冻结的泥土里，弯成拱形遮在枪上。

“再弄些来，”他说。“必须掩护那两个打枪的人。这不管什么用，不过在拿来斧子之前能凑合。听着，”他说，“如果你们听

到飞机，要在岩石的阴影里就地卧倒。我在这里守住枪。”

太阳这时已经升起，暖风吹拂，待在岩石有阳光照到的那一面很舒适。罗伯特·乔丹想：有四匹马。两个女的和我，安塞尔莫，普里米蒂伏，费尔南多，奥古斯丁，两兄弟中的另一个到底叫什么来着？一共八个人。吉普赛人还没算进去。一共是九个。加上骑了一匹马走的巴勃罗是十个。另外那个兄弟，他的名字叫安德烈斯。加上另外那一个埃拉迪奥。一共十个。每两个人也分不到一匹马。三个男的可以守在这里，四个可以撤走。加上巴勃罗是五个。剩下两个。加上埃拉迪奥是三个。真见鬼，他上哪儿去啦？

假如他们在雪地里发现了那些马的蹄印，天知道“聋子”会碰上什么遭遇。真够呛，雪竟然停了。不过今天化了雪，情况又会变得有利。对“聋子”来说可不是这样。对他来说，恐怕来不及了，不会变得有利了。

要是我们能拖过今天而不用开火，凭我们现有的力量能唱好明天的那台戏。我知道我们能行。也许不大出色。不够理想，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不能称我们的心来干，不过，把每个人都用上的话，我们是能干成功的。但愿今天不用开火就好啦。要是今天非打不可，那上帝来保佑我们吧。

我不知道眼前躲在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安全。现在走，只会留下脚印。这里可算是最好的地方了，如果情况糟得不能再糟，这里有三条退路。接着等天黑下来，那时候不管我们在这一带山区的什么地方，我都能设法在黎明时把那座桥炸掉。我不知道先前我为什么发愁。现在看来相当容易。我希望这一次我们的飞机能准时起飞。我确实这样希望。明天公路上将会热闹起来。

噢，今天会十分有趣，或者十分乏味。感谢上帝，我们把骑兵的那匹马引开这里了。我看即使他们骑马到了这儿，也不见得会循着现在那些马蹄印走的。他们会以为他停了下来，转了一个圈子，他们会循着巴勃罗的马蹄印走。我不知道这个老杂种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许会象头老公廐那样落荒而逃，一路向上爬，留下蹄印，然后等雪化了，兜一个圈子，抄山下的路回来。那匹马确实使他来了劲。当然啦，他也可能拿了这匹马反而把事情搞糟。噢，他是应该能照顾自己的。他好久以来都这么着。不过我不信任他，就象我根本不信你能推倒埃弗勒斯峰^①一样。

我看，聪明一点的办法是利用这些岩石给这挺枪修一个隐蔽得很好的火力点，而不要筑一个正式的掩体。假如来了敌人或来了飞机，而你正在挖掘，准会给弄得措手不及。只要在这里坚守下去有用，凭比拉尔的情况看是能坚守下去的。我反正不能留下作战，我得带了炸药离开这里，我要带安塞尔莫一起走。假使这里非打不可，那么我们撤离的时候，谁留下来掩护我们呢？

他眺望着视力所及的田野时，看到那吉普赛人穿过山岩从左边来了。他扭着屁股，漫不经心而大摇大摆地走来，卡宾枪挎在背上，褐色的脸上咧嘴笑着，双手各提着一只大兔子。他提着兔脚，两颗兔子脑袋摇晃着。

“喂，罗伯托，”他兴冲冲地喊道。

罗伯特·乔丹把手按在嘴上，吉普赛人显然怔了一下。他一溜烟地躲到山岩后面，走到伏在树枝掩蔽着的自动步枪边的罗

^① 即珠穆朗玛峰。

伯特·乔丹身边。他蹲下来，把兔子放在雪地上。罗伯特·乔丹抬头望着他。

“你这个婊子养的！”他低声说。“你他妈的到哪儿去啦？”

“我在追兔子，”吉普赛人说。“我把两只都逮住了。它们在雪地里调情哪。”

“你不是在放哨吗？”

“捉兔子时间不长，”吉普赛人低声说。“出了什么事？有警报吗？”

“来骑兵了。”

“老天爷！”吉普赛人说。“你看到他们了？”

“有一个现在在营地，”罗伯特·乔丹说。“他来吃早饭的。”

“我好象是听到了一声枪响什么的，”吉普赛人说。“我入他奶奶的！是从这里过来的？”

“从这里来的。从你的岗哨上来的。”

“我的妈呀！”吉普赛人说。“我是个倒霉的可怜虫。”

“你不是吉普赛人的话，我就毙了你。”

“别，罗伯托。别讲这种话。对不起。那是兔子的关系。天亮前我听到雪地里有一只公兔在踏雄。你哪里想象得到它们在搞什么下流的勾当。我朝声响走去，兔子溜掉啦。我沿着脚印在雪地里搜，发现两只都在山上，就把它们都宰了。你摸摸，在这个季节，这两只兔子多肥。想想看，比拉尔能拿来做什么好吃的。我很懊恼，罗伯托，和你一样懊恼。那个骑兵给宰了？”

“宰了。”

“是你宰的？”

“不错。”

“好样的！”吉普赛人毫不掩饰地拍马屁了。“你这人真了不

起。”

“去你妈的！”罗伯特·乔丹说。他禁不住对吉普赛人苦笑。
“把兔子带回营去，给我们弄点早点来。”

他伸手摸摸躺在雪地上的兔子。兔子软绵绵的，身体又长又沉，毛厚，长脚长耳朵，睁着黑色的圆眼睛。

“的确很肥，”他说。

“肥啊！”吉普赛人说。“每个兔子的肋骨上都可刮下一桶油哪。我这辈子做梦也没见过这样的兔子。”

“那就走吧，”罗伯特·乔丹说。“快去拿早饭来，还把那保皇派骑兵^①的证明文件也带给我。向比拉尔要。”

“你不生我的气吧，罗伯托？”

“不生气。恼恨的是你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要是来的是一队骑兵怎么办？”

“老天爷，”吉普赛人说。“你这人真通情达理。”

“听我说。你再不能象这样擅离职守了。绝对不许。我说枪毙不是说着玩的。”

“当然不。还有，决不会再有两只兔子自己跑来的机会了。一个人一辈子也难碰上一次。”

“快走！”罗伯特·乔丹说。“快去快回。”

吉普赛人提起两只兔子，返身穿过岩石走了。罗伯特·乔

① 十九世纪中叶，关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出现了一批拥护堂·卡洛斯及其后裔接位的王室正统论者，他们发动叛乱，挑起内战，自后成为一股政治势力。一九三一年推翻君主制后，这股势力抬头，站在教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边，并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在意大利受训，配合佛朗哥手下的摩尔人部队及摩洛哥的雇佣兵组织外籍军团作为叛军的急先锋。本书中这支骑兵部队就是这种保皇派武装力量，思想极端保守，胸前都佩有圣心标记。

丹眺望着前面那开阔的平地和下面的山坡。两只乌鸦在头顶上盘旋，接着停落在下面的一棵松树上。接着又飞来一只，三只在一起，罗伯特·乔丹望着乌鸦想：这是我的哨兵。只要这些鸟不惊飞，就表示树林中没人来。

他想：这个吉普赛人哪，真是个废物。他没有政治觉悟，也不守纪律，你什么也不能信赖他。但我明天需要他。明天我用得着他。吉普赛人参加战争是少见的。他们应当象由于信仰的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那样予以豁免，或者作为体力和智力上不适合的人予以除外。他们是废物。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拒服兵役的人也不能豁免。谁也不能豁免。战争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得了，它如今降临到这帮懒鬼的头上了。他们现在遇上啦。

奥古斯丁和普里米蒂伏带来了树枝。罗伯特·乔丹给自动步枪筑了个很好的掩体，从天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从树林那面望来显得没什么异样。他指给他们看，在右边山岩顶上布置一个人，能望到山下整个田野和右侧，另外再布置一个人可以控制住左边山崖唯一可以爬上来的要道。

“要是看到有人从那里来，别开枪，”罗伯特·乔丹说。“推一块石头，一块小石头下来告警，用步枪，这样，给我们打信号。”他提起步枪，举过头，好象在保护自己的脑瓜似的。“敌人有几个就举几次，”他上下举动枪支。“要是他们下马，把枪口朝地面。这样。要听到自动步枪响了，你才能在那儿开枪。从上面射击，要瞄准对方的膝盖。如果听到我用这只哨子吹两遍，你就下山，路上注意掩护自己，跑到架自动步枪的这儿岩石边来。”

普里米蒂伏提起步枪。

“我懂了，”他说。“这很简单。”

“先推下小石头告警，指明方向和人数。注意自己别被人发现。”

“是，”普里米蒂伏说。“我可以扔个手榴弹吗？”

“要等到自动步枪响了才行。也许骑兵队会来找他们的同伙，但还是不打算深入。他们可能会循着巴勃罗的蹄印走。能避免的话，我们就不打。最重要的是应该避免交火。现在上山到那边去吧。”

“我走了，”普里米蒂伏说，背起卡宾枪，爬上高高的山岩。

“你，奥古斯丁，”罗伯特·乔丹说。“你会使这挺枪吗？”

奥古斯丁又高又黑，下巴上满是胡子茬，长着一对凹陷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和两只干过粗活的大手。他蹲在那儿。

“会啊，上子弹，瞄准，射击，没别的啦。”

“你得等他们来到五十公尺以内才开枪，只有当你看准他们要走进通山洞的那个山口时才开枪，”罗伯特·乔丹说。

“是。五十公尺是多远？”

“到那块岩石那儿。有军官来的话先向他射击。然后转过枪口去扫射别人。要转动得很慢。幅度要小。我要教费尔南多怎样打枪。要握紧枪，免得枪身跳动，要仔细瞄准，每次射击尽可能不超过六发子弹，因为连发的话射线会向上移动。每次只瞄准一个人打，然后再打别人。骑马的，要打他的腹部。”

“是。”

“由一个人按稳三脚架，免得枪身弹跳。象这样。他可以给你上子弹。”

“那么你待在哪里？”

“我待在这儿左边。居高临下，我可以照顾全局，用这支小手提机枪掩护你的左翼。在这儿。他们要来的话，很可能杀掉他

们一批。但一定要等他们临近的时候，你才开枪。”

“我相信能够杀掉他们一批。杀得他们人仰马翻！”

“可是，但愿他们别来。”

“要不是为了你的桥，我们满可以在这儿杀掉他们一批再撤走。”

“这一点儿没用。这样做没有目的性。炸桥是打赢这场战争的计划的一部分。在这里干算不上什么。不过是个意外遭遇罢了。算不上什么。”

“什么话，算不上什么！法西斯分子死一个少一个。”

“对。但炸了这座桥，我们就能占领塞哥维亚。那是省会。要想到这一点。那将是我们攻占的第一个省会。”

“你真以为是这样？我们能占领塞哥维亚吗？”

“对。正确按计划炸桥就有可能。”

“我愿意在这儿杀掉他们一批，还把桥也炸掉。”

“你的胃口真不小，”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他始终在留神着乌鸦的动静。这时他看到有一只在张望着什么。它哇的一声飞走了。另一只仍待在树上。罗伯特·乔丹抬头望望岩石高处的普里米蒂伏。只见普里米蒂伏正在了望山下的田野，但没有打信号。罗伯特·乔丹俯身向前，拉开自动步枪的枪机，看到弹膛里有一发子弹，就把枪机推上了。那只乌鸦仍在树上。另一只在雪地上空打了个大圈子，又降落下来。在阳光和暖风中，沉甸甸的雪从松枝上掉下来。

“明天早晨我让你杀掉他们一批，”罗伯特·乔丹说。“必须端掉锯木厂边的哨所。”

“我准备好了，”奥古斯丁说。

“桥下养路工小屋那儿的哨所也得端掉。”

“端掉这个或那个都行，”奥古斯丁说。“两个都端掉也行。”

“不是一个个干的。要同时端掉，”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随便干哪个吧，”奥古斯丁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一直在等着干。巴勃罗老是按兵不动，把我们拖烂啦。”

安塞尔莫拿着斧头来了。

“你还要树枝吗？”他问。“我看已经掩护得不错了。”

“不要树枝了，”罗伯特·乔丹说。“要两棵小树，这儿插一棵，那儿插一棵，使得看起来更自然些。要使这儿显得真正自然，树还不够。”

“我去砍来。”

“要齐根砍，别留下树桩给人家发现。”

罗伯特·乔丹听到身后树林里响起了斧头声。他抬头望望山岩上的普里米蒂伏，又低头望望山下空地对面的松林。那只乌鸦仍在那儿。接着，他听到高空中传来一架飞机低微的震响声。他抬头一望，只见阳光中飞机一丁点大，银光闪亮，在高空中好象动也不动。

“飞机望不到我们，”他对奥古斯丁说。“不过还是卧倒好。这是今天的第二架侦察机了。”

“昨天的那些飞机呢？”奥古斯丁问。

“现在想起来真象场恶梦，”罗伯特·乔丹说。

“他们准是驻在塞哥维亚的。恶梦在那儿要变成事实啦。”

飞机这时越出了视野，飞过了山岭，但马达声仍然在空中回响着。

罗伯特·乔丹望着，发现那只乌鸦飞了起来。它穿过树林，笔直地飞走了，但没有叫上一声。

第二十三章

“卧倒，”罗伯特·乔丹对奥古斯丁低声说，并转过头去，对安塞尔莫急速地摆手，示意他卧倒，卧倒；安塞尔莫拿着一棵松树，象扛圣诞树似的扛在肩上，正从缺口处走来。他看到老头儿把松树撂在一块岩石后面，自己也躲在岩石背后不见了。罗伯特·乔丹望着开阔空地对面的树林。他没看到也没听到什么，只觉得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接着听到石头和石头的碰撞声，那是一块小石头跳跳蹦蹦地滚下石壁时的嗒嗒声。他向右面抬起头，看见普里米蒂伏的步枪一上一下地平举了四次。接着，再也看不到什么了，只有他面前的一片白色土地，上面的那圈马蹄印，以及远处的松林。

“骑兵，”他低声对奥古斯丁说。

奥古斯丁望着他龇牙笑笑，黑黝黝的凹陷的双颊下部显得更阔了。罗伯特·乔丹发觉他在出汗，就伸手按在他的肩头上。他没有拿掉他的手，他们就看到树林里跑出四个骑兵来。他感到奥古斯丁肩背上的肌肉在他手下抽动着。

一个骑兵领先，后面跟着三个。领先的那个循着马蹄印走。他骑在马上低头察看着。其他三个跟在他后面，成扇形穿过树林。他们都在仔细观察着。罗伯特·乔丹匍匐着，觉得自己的心抵着雪地在怦怦地搏动，他把胳膊肘分得很开，撑起上半身，通过自动步枪的瞄准装置注视着他们。

带头的那个沿着蹄印骑到巴勃罗打圈子的地方，停下来了。其他三人向他靠拢，也都停下来了。

罗伯特·乔丹顺着自动步枪蓝色的钢枪筒，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他看到了他们的脸、身上挂着的马刀、被汗湿得黑黑的马腹、圆锥形的卡其披风和纳瓦拉人惯常歪戴着卡其贝雷帽。领先的那个拨转马头，正对着架枪的岩石缺口。罗伯特·乔丹看清他那张饱经风霜的年青的黑脸、两只相距很近的眼睛、鹰钩鼻子和过长的楔形下巴。

这个领先的骑兵骑在马背上，马头高昂，胸脯朝着罗伯特·乔丹，马鞍右侧的枪套里露出了轻自动步枪的枪托，他指着那架枪的缺口。

罗伯特·乔丹把胳膊肘紧贴在地上，顺着枪筒向那四个停留在雪地里的骑兵望去。其中三个拔出了自动步枪。两个把枪横搁在鞍头上。另一个骑在马背上，步枪斜在右侧，枪托支在屁股上。

他想：你难得见到靠得这么近的敌人。伏在这种机枪后面望这样近的敌人，可从来没有过。通常是把表尺抬高，敌人的身形显得很小时，你很难把子弹打中那么远的目标。要不，他们向你跑来，卧倒，再跑，你呢，用机枪火力扫射山坡，或者封锁一条街道，或者朝着窗户射击；要不，在远处望着他们在路上行军。只有在袭击火车时看到过这样近的敌人。只有在那时候才有现在这样的景象。这四个家伙啊，你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距离这样近，通过枪的表尺和准星来看，这些人显得比他们本来的样子大两倍。

他望着稳定在表尺缺口内的楔形准星，准星顶端对准着那领先的骑兵的胸膛中央，对准着那卡其披风上在晨曦中分外鲜明的大红标记右面一点儿的的地方。他想：你啊。他这时用西班牙语在想，把手指朝前抵住扳机护圈，免得这自动步枪一触即发，

猛的嘟嘟嘟一梭子打出去。这时他又想：你啊，年纪青青就要报销啦。他想：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不过但愿这种事不要发生。不要发生吧。

他发觉奥古斯丁在他身边要咳嗽了，接着忍在喉咙里，咽下一口口水。他顺着油亮的蓝色枪管，穿过树枝间隙望着前面的空地，手指仍然朝前抵住了扳机护圈，这时他看到那领先的骑兵调转马身，指着巴勃罗在树林里走过的路线。于是四个骑兵策马向树林里骑去。奥古斯丁低声说：“王八蛋！”

罗伯特·乔丹回过头去望望安塞尔莫刚才把松树撂下的地方。

吉普赛人拉斐尔从岩石中间向他们走来，拿着两只布制的马褡裢，挎着步枪。罗伯特·乔丹挥手叫他卧倒，吉普赛人立即低下身子看不见了。

“我们满可以把四个都干掉，”奥古斯丁悄悄地说。他仍然汗淋淋的。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可是开了枪，谁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正当这时，他又听到有块石头滚下来的声音，他立刻朝四周扫了一眼。吉普赛人和安塞尔莫两个人都不见踪影。他看看手表，接着抬头朝普里米蒂伏那儿望望，只见他正在急速地上下举动步枪，举了无数次。罗伯特·乔丹想：巴勃罗已走了四十五分钟。他接着听到有一队骑兵行近的声音。

“你别着急，”他对奥古斯丁低声说。“他们会象刚才几个那样走过去的。”

树林边缘出现了二十个骑兵，两个一排，和刚才那四个人一样的武器和服装，马刀晃动着，枪套里插着卡宾枪。他们和先前

几个一样，一直朝树林中骑去了。

“你看到了吗？”罗勃特·乔丹对奥古斯丁说。

“人数不少啊，”奥古斯丁说。

“要是我们干掉了先前几个，现在就不得不对付这些个了，”罗勃特·乔丹悄没声儿地说。现在他心情平静了，衬衣前胸被融化的雪水弄得湿漉漉的。胸口感到空洞洞的。

雪上阳光灿烂，雪在很快消溶。他看到树干上的雪在消失；眼前，就在枪的前面，湿雪的表层象稀稀拉拉的花边一碰就碎，阳光的热力融化着雪面，泥土的暖气向覆盖在上的残雪蒸腾。

罗勃特·乔丹抬头望着普里米蒂伏的岗哨，看到他交叉着双手，手掌向下，表示“平安无事”。

安塞尔莫的脑袋从一块岩石后探出来了，罗勃特·乔丹招手示意，要他过来。老头儿从一块岩石后面跑到另一块后面，最后爬过来，卧倒在自动步枪旁边。

“人很多，”他说。“人很多哪！”

“我不要小树了，”罗勃特·乔丹对他说。“不需要再改善树枝的伪装了。”

安塞尔莫和奥古斯丁都咧嘴笑了。

“这里被仔细地查看过了，没有露馅儿。现在插树是危险的，因为这些人还要回来，再说，他们也许并不蠢。”

他觉得有必要讲话，因为对他来说，这表示刚经历了很大的危险。他老是能根据事后谈起先前发生的事的劲头来判断当初的情况危险到什么地步。

“这个掩护不错吧，呃？”他说。

“不错，”奥古斯丁说。“真他妈的不错。我们原可以把四个一起干掉。你看到了吗？”他对安塞尔莫说。

“我看到了。”

“你，”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你得再到昨天的岗哨上去，或者自己另找个好地方，去观察公路，跟昨天一样，报告所有的动静。这件事我们做得已经迟了。要一直守到天黑，然后回来，我们换个人去。”

“那么我留下的脚印怎么办？”

“等雪化掉了从下面走去。路上会被溶化的雪弄得一片泥泞的。留心烂泥路上有没有很多汽车或坦克开过的痕迹。我们眼前只能说这一些，要等你到那儿自己观察了才知道究竟。”

“我可以说话吗？”老头儿问。

“当然可以。”

“如果你同意，我到拉格兰哈去打听一下昨晚的情况，并且找个人照你教我的办法去守望公路，这样不是更好吗？那人可以今晚把情报送来，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由我再到拉格兰哈去取情报。”

“你不怕碰到骑兵？”

“雪化了，就不怕。”

“拉格兰哈有人能干这事吗？”

“有。有人能干。有个女的。拉格兰哈有好几个可靠的妇女。”

“这个我相信，”奥古斯丁说。“我还知道，有几个附带还干别的行当。你不打算叫我去吗？”

“让老头子去。你能使这挺枪，今天还没过去呢。”

“雪化了我就走，”安塞尔莫说。“雪化得很快。”

“你看他们有可能抓住巴勃罗吗？”罗伯特·乔丹问奥古斯丁。

“巴勃罗很机灵，”奥古斯丁说。“没有猎狗，人能逮住灵敏的公鹿吗？”

“有时候能，”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不会叫人逮住，”奥古斯丁说。“和原来相比，他现在明摆着是个废物。不过，有很多人在墙脚下给枪毙了，他却仍旧在这一带山里活得舒舒服服，拼命喝酒，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有人家说的那么机灵吗？”

“比人家说的还要机灵。”

“他在这儿看来并不很能干。”

“怎么不能干？他如果不能干，昨天晚上就送命了。依我看，你不懂政治，英国人，也不懂游击战。在政治上和在游击战中，首要问题是能存在下去。瞧他昨晚继续存在下去了。任我们两个怎么侮辱，他全忍住了。”

巴勃罗现在已回心转意跟大家一起干了，罗伯特·乔丹就不想说什么对他不利的话，所以他刚才脱口说了关于巴勃罗不能干的话，立刻就后悔了。巴勃罗有多机灵，他心里明白。炸桥的命令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巴勃罗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刚才说这话只是出于厌恶，但他一出口就明知道是不应该说的。这多少是情绪紧张之余，废话讲得太多才造成的。所以他现在撇开这个话题，对安塞尔莫说，“大白天到拉格兰哈去？”

“并不坏，”老头儿说。“我不是跟军乐队吹吹打打一起去的。”

“脖子上也不挂铃铛，”奥古斯丁说。“也不扛大旗。”

“你怎么去？”

“在森林里翻山越岭。”

“可是，如果他们抓住你呢？”

“我有证件。”

“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你得赶快把露马脚的吞下去。”

安塞尔莫摇摇头，拍了一下身穿的上衣的前胸口袋。

“这件事我想过好多回啦，”他说。“可我从来也不爱吞吃纸片。”

“看来我们得在证件上都洒些芥末才是，”罗伯特·乔丹说。“我把我方的证件藏在左胸口袋，右胸口袋放法西斯证件。这样，遇到紧急情况就不会搞错了。”

当第一个骑兵巡逻队的带队的指着缺口的时候，情况一定是够糟的，因为他们现在都讲了很多话。罗伯特·乔丹想：话讲得太多啦。

“可是你听着，罗伯托，”奥古斯丁说。“据说政府一天比一天右倾，还说什么在共和国大家不再称呼同志，而称呼先生和太太了。你那两只口袋也能变吗？”

“等到右倾得太厉害的时候，我就把证件藏在后裤袋里，”罗伯特·乔丹说。“在中间缝上一道。”

“但愿仍旧把它们藏在衬衫里，”奥古斯丁说。“难道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而革命却失败吗？”

“不会，”罗伯特·乔丹说。“不过，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就没有革命，没有什么共和国，也没有你、我，什么也没有，玩儿全完。”

“我也是这么说，”安塞尔莫说。“但愿我们打赢这场战争。”

“胜利以后，除了拥护共和国的好人之外，要把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员，和所有的流氓混蛋，统统枪毙掉，”奥古斯丁说。

“但愿我们打赢这场战争，一个人也不枪毙，”安塞尔莫说。“但愿我们公正地治理国家，出一分力量的得一分好处，大家有福同享，让反对过我们的人受教育、认识错误。”

“我们非得枪毙许多人不可，”奥古斯丁说。“许许多多。”

他紧握右拳，捶打左手的手掌。

“但愿我们一个也不枪毙。哪怕是带头的。但愿让他们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我知道我要叫他们干什么活，”奥古斯丁说着，捞了些雪，放在嘴里。

“什么活，苦活？”罗伯特·乔丹问。

“两种最出色的活。”

“哪两种呢？”

奥古斯丁又放了些雪在嘴里，望着对面刚才骑兵经过的林间空地，接着把雪水吐出来。“瞧哪。多好的早点，”他说。“那个臭吉普赛人哪儿去了？”

“干什么活？”罗伯特·乔丹问他。“说啊，臭嘴。”

“不用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来，”奥古斯丁说，眼睛都亮了。“我们器重的人，受用这个。其余的人呢，钉在栅栏柱子上，再把它向后推倒。”

“这话说得可耻，”安塞尔莫说。“这样一来，我们永远不会有共和国。”

“我巴不得在他们大家的鸡巴熬的浓汤里游几十里路，”奥古斯丁说。“我看到那四个人，满以为能杀掉他们的时候，我觉得真牙痒痒的象马栏里的雌马在等种马。”

“不过，你可知道我们干吗不杀他们吗？”罗伯特·乔丹冷静地说。

“知道，”奥古斯丁说。“知道。可我真牙痒痒得象匹发情的雌马。你没这感觉，哪会知道！”

“你那时浑身大汗，”罗伯特·乔丹说。“我还以为是害怕

呢。”

“害怕，不错，”奥古斯丁说，“害怕，还有，就是想杀他们。我这一辈子再没有比想杀他们更强烈的愿望了。”

是啊，罗伯特·乔丹想。我们冷漠地杀人，他们却不这样，从来也不这样。因为他们有额外的神圣的东西。从地中海另一头传来新教以前，他们早就有了古老的习性，他们始终没有抛弃它，仅仅把它压抑、深藏在心里，在战争和宗教审判中又暴露出来。他们是执行过宗教裁判和火刑^①的民族。杀人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我们杀人的方式和他们的不同。他想：你呢，你从没受到杀人的诱惑吗？你在瓜达拉马山区从没杀过人吗？在乌塞拉从没杀过人？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整个时期中没杀过？从来没杀过？他对自己说：哪儿的话！每次炸火车都杀过。

别再模棱两可地拿柏柏尔人^②和古伊比利亚人做文章啦，要承认自己喜欢杀人，就和所有那些自愿当兵、嗜杀成性的军人一样，不管他们是不是说假话来为自己辩护。安塞尔莫不喜欢杀人，因为他是猎人，不是军人。也不必美化他嘛。军人杀人，猎人杀野兽。他想：你别自欺欺人，也别替杀人虚构一套辩护词啦。你被感染由来已久。可也别把安塞尔莫当坏人看待。他是基督

① 西班牙人的祖先为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有着他们自己的原始文化和信仰，随着罗马人的入侵，带来了在地中海东端新兴的基督教信仰。十六世纪起，在中欧和西欧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但西班牙始终信奉以罗马教皇为主的罗马正教（我国通译为天主教）。在中世纪，天主教会对于异教徒备加迫害，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尤其残酷。乔丹以为这是由于他们祖先遗传下来的原始蛮性所致。下文又否定了这种看法。

② 柏柏尔人为北非古老民族，后来受到从亚洲来的阿拉伯人的影响，接受了其文化、语言及伊斯兰教。八世纪初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其后裔称为摩尔人，今散居于北非。部分柏柏尔人至今仍保留原有语言及生活方式，仍称柏柏尔人。

徒，在天主教国家里这是罕见的事。

他想：然而我原以为奥古斯丁是害怕。就是在杀人前的本能的恐惧。原来他也巴不得杀人。当然，现在他可能是在吹牛。当时可恐惧得很。我的手掌感到了他的恐惧。噢，现在是停止谈话的时候了。

“去看看吉普赛人把吃的拿来了没有？”他对安塞尔莫说。“别让他到这里来了。他是个笨蛋。你把吃的拿来吧。不管他拿来多少，叫他再去多拿些来。我饿了。”

第二十四章

这是五月底的一个早晨，天高气爽，和风吹拂在罗伯特·乔丹的肩上，暖洋洋的。雪在迅速融化，他们正在吃早饭。每人吃两大块夹肉面包，里头还有羊奶干酪。罗伯特·乔丹用折刀切了几厚片洋葱，跟肉和干酪一起夹在面包里。

“你嘴里的洋葱味要从树林里一直飘到法西斯分子那儿去了，”奥古斯丁说，自己的嘴里塞得满满的。

“把酒袋给我，让我漱漱口，”罗伯特·乔丹说，他满嘴是肉、干酪、洋葱和嚼烂的面包。

他从没这样饿过。他喝了一大口略带皮酒袋上的柏油味的酒，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他接着又喝了一大口，这次是举起酒袋，让喷出的酒悬空直灌进嗓子眼里，酒袋碰到了掩护自动步枪的松枝上的针叶，他昂起头来，让酒滴下咽喉，脑袋仰靠在松枝上。

“这一块夹肉面包你要吗？”奥古斯丁问他，把它隔着枪身递给他。

“不。谢谢你。你吃吧。”

“我吃不下了。我早晨不习惯吃东西。”

“真的不要了？”

“不要。你吃。”

罗伯特·乔丹接过夹肉面包，放在膝上，从藏手榴弹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洋葱，打开折刀切起片来。他把洋葱被口袋弄脏的那一边削去一薄片，然后切了一厚片，外边的一圈掉了下来，他拣起来一折，塞在夹肉面包里。

“你早饭常吃洋葱？”奥古斯丁问。

“有，就吃。”

“你们美国人都这样？”

“不，”罗伯特·乔丹说。“在我的国家里，人们讨厌洋葱。”

“这好，”奥古斯丁说。“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个文明国家。”

“你为什么讨厌洋葱？”

“臭味不好。没别的原因。要不然，洋葱就象玫瑰了。”

罗伯特·乔丹对他咧嘴笑了。

“象玫瑰，”他说。“真象玫瑰。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个洋葱。”

“洋葱把你的头脑弄糊涂了，”奥古斯丁说。“留心啊。”

“一个洋葱就是一个洋葱就是一个洋葱，”罗伯特·乔丹兴致勃勃地说，他还想：一块石头就是一块 *stein*^① 就是一块岩石就是一块圆石就是一块卵石。

“用酒漱漱口吧，”奥古斯丁说。“你很怪，英国人。你和上次跟我们一起干的爆破手大不相同。”

“有一点大不相同。”

“跟我说说，什么不同。”

“我活着，他死了，”罗伯特·乔丹说。接着他想：你这个人怎么啦？可以这样说话吗？你吃得忘乎所以了？你算什么，被洋葱弄得醉醺醺了？难道你现在活着就是为了这一点？他老实对自己说，生活从来就没有多大意义。你想使它有点意义，但从来没有做到。在剩下的这点时间里，没必要说假话啦。

“不，”他说，变得认真了。“他是个受过大苦的人。”

“你呢？你没受过苦？”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我是那些没受过苦的人里面的一个。”

“我也没受过什么苦，”奥古斯丁对他说。“有人受过苦，有人没有。我没受过什么苦。”

“那倒不坏，”罗伯特·乔丹又把酒袋倾倒过来。“有了这个，更不坏。”

“我替别人难过。”

“好人都应该如此。”

“我为自己倒很少难过。”

“你有老婆吗？”

“没有。”

① 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 (Gertrude Stein, 1874—1946) 从一九〇三年起长期定居巴黎，二十年代中，主持一个文艺沙龙，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司科特·菲茨杰拉德及海明威本人都是其成员，在文风上都受到她的影响。她在写作中作了一系列的试验，摆脱传统的造句法，强调词句的音调及节奏。海明威在此处拿她的名句“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开玩笑，并引伸到石头，用了一连串同义词，其中这个stein和她的姓同出德语，意为“石头”。

“我也没有。”

“可你现在有了玛丽亚。”

“是啊。”

“有件事很怪，”奥古斯丁说。“自从炸火车后，她到了我们这儿，比拉尔就恶狠狠地不准谁碰她，好象是在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士的修道院里。你万万想象不出她怎样拼命保护玛丽亚。你来了，她却把玛丽亚当礼物般送给你了。你怎么看？”

“情况并不是这样。”

“那么是怎么回事？”

“她把玛丽亚交给我照顾。”

“你的照顾却是整夜和她睡觉？”

“我很走运。”

“好一个照顾人家的办法。”

“你不懂得可以用这种方式给人好好照顾吗？”

“懂，这样的照顾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们别谈这些了，”罗伯特·乔丹说。“我真心爱她。”

“真心？”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真心的了。”

“以后呢？炸桥以后呢？”

“她跟我走。”

“要这样，”奥古斯丁说，“但愿谁也不再说什么闲话，并且祝你们两个一路顺风。”

他举起皮酒袋，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罗伯特·乔丹。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他说。

“说吧。”

“我也非常爱她。”

罗伯特·乔丹伸手搁在他肩上。

“非常，”奥古斯丁说，“非常爱她。爱她爱到人们难以理解的程度。”

“我能理解。”

“她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那是无法打消的。”

“我能理解。”

“听着。我对你说的话十分认真。”

“说吧。”

“我从没碰过她，跟她也没有过任何关系，可我非常爱她。英国人，不要对她随随便便。即使她和你睡过觉，别以为她是婊子。”

“我会爱她的。”

“我相信你。不过还有，你不明白，如果没有革命，这样的姑娘会遭到怎样的结局。你的责任很重大。这个姑娘实在受过大苦。她和我们不一样。”

“我要和她结婚。”

“不。不是这意思。在革命中没有这种必要。但是——”他点点头——“那样更好。”

“我要和她结婚，”罗伯特·乔丹说，说着觉得喉咙哽塞起来。“我非常爱她。”

“以后结婚吧，”奥古斯丁说，“等到方便的时候。要紧的是有这个打算。”

“我有。”

“听着，”奥古斯丁说。“这件事我无权过问，我的话太多了，不过还想问一声，在这个国家里，你认识很多姑娘吗？”

“有几个。”

“婊子吗？”

“有的不是。”

“有多少？”

“有几个。”

“你和她们睡过吗？”

“没有。”

“你明白了？”

“是的。”

“我的意思是，玛丽亚并不是轻易做这种事的。”

“我也不。”

“要是我把你当那号人，昨晚你和她睡的时候，我就把你枪杀了。为了这种事情，我们这里可不少杀人。”

“听着，老朋友，”罗伯特·乔丹说。“那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不拘形式了。我们缺少的是时间。明天我们非打仗不可。对我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可是对玛丽亚和我两个人来说，就意味着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尽量享受生活。”

“一个白天，一个夜晚，真没多少时间啊，”奥古斯丁说。

“是的。但是已经过了昨天一天、前天一夜和昨天一夜。”

“听我说，”奥古斯丁说。“需要我帮忙吗？”

“不。我俩没什么问题。”

“如果要我为你，或者为这个短头发的丫头出把力的话——”

“不。”

“老实说，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帮忙的地方也不多。”

“不。很多。”

“什么？”

“讲到打仗，不管今明两天发生什么情况，你得信任我，哪怕命令看来是错误的，也要服从。”

“自从骑兵队的事和把马引走的事发生以后，我服你了。”

“那算不上什么。你知道，我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不胜利，一切都完蛋。明天的事极重要，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还会有战斗。战斗时没有纪律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事情跟表面现象不一样。必须有了信任和信心，才能有纪律。”

奥古斯丁朝地上啐了一口。

“玛丽亚和这些事全不相干，”他说。“但愿你和玛丽亚作为两个人好好利用现有的时间。只要我能帮忙，尽管吩咐。至于明天的事，我一定绝对服从。如果为了明天的事一定要牺牲性命，就高高兴兴、心情轻松地去牺牲。”

“我也认为你会这样做，”罗伯特·乔丹说。“但听你亲口讲出来真叫人高兴。”

“还有，”奥古斯丁说，“上面那个人，”他指指普里米蒂伏，“是个可靠而有价值的人。比拉尔可靠得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安塞尔莫这老头子也一样。安德烈斯也一样。埃拉迪奥也一样。这人话不多，但是个可靠的角色。还有费尔南多。我不知道你对他怎么看。不错，他比水银还沉。他比公路上拖车的小公牛还没趣。可是吩咐他打仗、办事，倒是条汉子！你自己会看到的。”

“我们很走运。”

“不。我们有两个稀松的家伙：吉普赛人和巴勃罗。‘聋子’一伙可比我们强得多，我们只比羊屎强一点。”

“这么说问题不大。”

“是的，”奥古斯丁说。“可是我希望今天就打。”

“我也一样。干掉算了，但不行。”

“你以为情况会很糟吗？”

“有可能。”

“可你现在兴致很好，英国人。”

“是啊。”

“我也是。尽管有玛丽亚这件事以及别的事。”

“你知道为什么？”

“不。”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天气的关系。今天天气真好。”

“谁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要采取行动的缘故。”

“我看是吧，”罗伯特·乔丹说。“但不是今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避免今天行动。”

他说话时听到了什么声音。这个遥远的声响盖过了暖风吹过树林子的声音。他听不真切，张开了嘴倾听着，同时抬头向普里米蒂伏瞥了一眼。他自以为听到了这声音，但接着又消失了。松林里，风在吹，罗伯特·乔丹聚精会神地细听着。他听到了这随风飘来的微弱的声响。

“我觉得没什么可伤心的，”他听到奥古斯丁说。“我永远也得不到玛丽亚，这没什么。我可以仍旧和以前一样去找娘子的。”

“别作声，”他说。他伏在奥古斯丁身边，头转向别处，不在听他说话。奥古斯丁突然向他望着。

“怎么回事？”奥古斯丁问。

罗伯特·乔丹把手放在嘴上，继续倾听。这声音又来了，低弱而模糊，遥远而单调。但这一回不会听错了。正是自动步枪射击时的一连串清脆的哒哒声，就象在远得几乎听不到的地方成串成串地在放小爆竹。

罗伯特·乔丹抬眼看着普里米蒂伏。普里米蒂伏正伸长了脖子，脸朝着他们，用手拢着耳朵倾听。罗伯特·乔丹探望时，普里米蒂伏朝那边地形最高的山峦指着。

“‘聋子’那边开火了，”罗伯特·乔丹说。

“那我们去支援他们吧，”奥古斯丁说。“把人集合起来。我们走吧。”

“不行，”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待在这儿。”

第二十五章

罗伯特·乔丹仰望着这时站在监视岗上握着步枪指点着的普里米蒂伏。他点点头，但普里米蒂伏仍旧指着，把手搁在耳朵后面，接着又一股劲地指着，好象没法叫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似的。

“你守住这挺枪，在确确实实肯定敌人进来之前，千万别开枪。即使开枪，也要等他们到了那树丛的时候，”罗伯特·乔丹指着。“你明白吗？”

“明白。但是——”

“别但是。我待会再跟你讲。现在我到普里米蒂伏那儿去。”

安塞尔莫就在他身边，他对老头儿说：

“老头子，跟奥古斯丁一起在这儿守住枪，”他慢慢地、不慌不忙地说。“等骑兵真的进来了，他才可以打枪。要是他们仅仅露露面，就别理睬他们，象我们刚才一样。要是他不得不开火的话，你帮他按住三脚架，弹药盘打完了，就递给他满的。”

“好，”老头儿说。“那么拉格兰哈呢？”

“以后再说。”

罗伯特·乔丹往山上爬去，绕过灰色的岩石，攀住岩石往上爬时发现岩石是潮的。阳光把上面的雪迅速地晒化了。岩石顶面开始干燥。他一边爬山，一边望望对面的田野，看到了松林、一长片空地和远方高山前的斜坡。他接着在两块岩石后的空地里，站在普里米蒂伏身边，这个褐脸的矮小汉子对他说，“他们在攻打‘聋子’。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罗伯特·乔丹说。

他在这里清楚地听到枪声，他向田野望去，只见遥远的山谷那边，地势又陡起的地方，有一队骑兵从树林里穿出来，在积雪的山坡上朝着枪响处向上爬。他看到雪地里黑黝黝的两行人马，象一个长方形，斜着向山上强行攀登。他望着这两行人马登上山脊，穿进更远处的树林。

“我们一定要支援他们，”普里米蒂伏说，他的音调干巴而平板。

“不可能，”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打早晨起我就料到这个了。”

“什么道理？”

“他们昨夜去偷马。雪停了，人家跟着脚迹追踪到那里。”

“我们可一定要支援他们，”普里米蒂伏说。“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不管。他们是我们的同志哪。”

罗伯特·乔丹伸手放在这个汉子的肩上。

“我们无能为力，”他说。“有办法的话，我会支援他们。”

“上面有条山路通到那儿。我们可以带上两挺枪，骑马走那条路。就是下面那挺和你那挺。我们可以这样支援他们。”

“你听——”罗伯特·乔丹说。

“我在听的就是这个呢，”普里米蒂伏说。

枪声一阵接一阵地传来。接着，他们听到自动步枪清脆的连发声中响起了手榴弹沉闷的爆炸声。

“他们完了，”罗伯特·乔丹说。“雪不下，他们就完了。我们去的话，也要完。我们现有的力量不能分散。”

普里米蒂伏的下巴、嘴的四周和脖子上全是灰色的胡子茬。脸的其余部分全是褐色的，长着断鼻梁的塌鼻子和深陷的灰眼睛。罗伯特·乔丹望着他，只见他那长满胡子茬的嘴角和脖子上的筋在抽搐。

“你听这枪声，”他说。“在屠杀啦。”

“如果他们把那凹地包围了，就会屠杀，”罗伯特·乔丹说。“可能有人逃得出来。”

“我们可以绕到他们背后去向他们开火，”普里米蒂伏说。“我们四个骑马去。”

“去了又怎么样？等你从背后向他们开火之后，又能怎么样？”

“我们跟‘聋子’并肩作战。”

“到那儿去送命？瞧太阳，白天还长着呢。”

长空无云，阳光照在背上很热。他们下面那片空地的南坡已露出大块大块的泥土，松树上雪已全化了，淌到了地上。他们下面被融雪沾湿的岩石，这时在炎热的阳光下微微冒着热气。

“你必须忍住，”罗伯特·乔丹说。“这类事情在战争中经常有。”

“我们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真这样吗？”普里米蒂伏望着他。罗伯特·乔丹明白他信任自己。“你不能派我和另外一个人

带这支小机枪去？”

“这是没用的，”罗伯特·乔丹说。

他自以为看到了他在寻觅的东西，但那不过是一只苍鹰迎风而下，接着，朝上飞到最远的那一排松树上空去了。“我们一起去也没用，”他说。

正在这时，枪声更加激烈了，枪声中夹杂着手榴弹的沉闷的爆炸声。

“哼，操他们的，”普里米蒂伏噙着眼泪，双颊抽动，十分真诚地辱骂着。“噢，天主和圣母啊，操他们奶奶的。”

“你平静一些，”罗伯特·乔丹说。“要不了多久，你也要向他们开火啦。那女人来了。”

比拉尔踩着沉重的步子，从岩石间向他们爬上来。

风传来阵阵枪声，普里米蒂伏不断地骂着，“操他们的。天主和圣母啊！操他们的。”罗伯特·乔丹爬下去扶比拉尔上来。

“怎么啦，大娘，”当她费力地登上最后一块岩石时，他握住了她两只手腕，把她拉了上来，招呼她说。

“你的望远镜，”她说把望远镜上的带子从脖子上脱下来。
“原来‘聋子’遇上啦？”

“是啊。”

“真可怜，”她怜惜地说。“可怜的‘聋子’。”

她一路爬得气喘吁吁，把罗伯特·乔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紧紧握住，眺望着田野的那边。

“估计打得怎么样？”

“糟。很糟。”

“他遭殃啦？”

“我看是这样吧。”

“真可怜，”她说。“肯定是偷了马引起的？”

“可能是吧。”

“真可怜，”比拉尔说，接着又说，“骑兵来的那糟糕事儿，拉斐尔当小说一样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来的是些什么人？”

“一支巡逻队和一个骑兵中队的一部分。”

“他们到了什么地方？”

罗伯特·乔丹指指巡逻队停过的地方，还指给她看隐蔽枪的地方。从他们站着的地方望去，只能望到奥古斯丁的一只靴子露出在伪装的掩护后面。

“吉普赛人竟然说他们带队的马儿的身子差一点碰到了机枪口上，”比拉尔说。“这种人哪！你的望远镜给忘在山洞里了。”

“东西全收拾好了？”

“能带的都收拾好了。有巴勃罗的消息吗？”

“骑兵队来前四十分钟，他就走了。他们跟着他的踪迹去的。”

比拉尔朝他露齿笑了。她一直握着他的手，这时才放开。“他们永远找不到他，”她说。“现在来谈‘聋子’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没办法。”

“真可怜，”她说。“我很喜欢‘聋子’。你肯定，肯定他遭殃了吗？”

“是啊。我看到很多骑兵。”

“比这里的还多？”

“还有一整队在上山。”

“听枪声，”比拉尔说。“真可怜，可怜的‘聋子’。”

他们倾听着枪声。

“普里米蒂伏要到那边去，”罗伯特·乔丹说。

“你疯了吗？”比拉尔朝那个扁脸汉子说。“我们这儿竟然制造出这种疯子来了？”

“我想支援他们。”

“什么话！”比拉尔说。“又是个不切实际的人。你去了也没用，即使不去，在这儿也快死了，你难道不信？”

罗伯特·乔丹望着她，望着她那深褐色的脸、印第安人般的高颧骨、分得很开的黑眼睛、嘲笑的嘴和带有怨意的厚上唇。

“你必须做得象个男子汉，”她对普里米蒂伏说。“象个成熟的男子汉。瞧你，一脸灰胡子什么的。”

“别取笑我，”普里米蒂伏阴沉地说。“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心肠和一点头脑——”

“他就该懂得克制，”比拉尔说。“不一会儿，你就要跟我们一起死去啦。不要跟外人一起去找死啦。说到你的头脑，吉普赛人的头脑可比谁都强啊。他跟我讲的事真象本小说。”

“你要是亲眼见了，就不会把它说成是小说了，”普里米蒂伏说。“刚才情况够严重的。”

“哪里的话！”比拉尔说。“无非是来了几个骑兵，又走了。你们都自以为是英雄。我们闲的时间实在太长了，遇到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

“难道‘聋子’目前的情况不严重？”普里米蒂伏轻蔑地说。每次风声里送来了枪声，他总显得十分难受，他希望要就去战斗，要就让比拉尔走开，别打扰他。

“即使全饶上去又怎么样？”比拉尔说。“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人家碰到了不幸，你可不能把卵子都急坏了。”

“你自己去玩吧，”普里米蒂伏说。“有些女人又蠢又狠，真

叫人受不了。”

“自己玩也是为了支援和帮助那些不够格的男人嘛，”比拉尔说。“要是没有什么可看的，我要走了。”

正在这时，罗伯特·乔丹听到头顶上高空中的飞机声。他仰起了头，看见高空中的那架飞机，似乎就是早上看到的那架侦察机。它这时正从前线飞回来，朝着“聋子”在那儿受到围攻的高地飞去。

“带来厄运的凶鸟，”比拉尔说。“它看得到那边的情况吗？”

“当然看得到，”罗伯特·乔丹说。“要是他们眼睛不瞎的话。”

他们注视着高空的飞机在阳光中银光闪闪，稳稳当当。它从左边飞来，两个螺旋桨转成两面光亮的圆盘儿。

“卧倒，”罗伯特·乔丹说。

飞机这时飞到了头顶上空，影子掠过林间空地，轰鸣声达到了最凶险可惊的程度。飞机一掠而过，朝山谷那头飞去。他们望着它不慌不忙地一直飞去，最后看不见了，但接着马上打了个朝下的大圈子又飞回来，在高地上空转了两圈，最后朝塞哥维亚方向飞去，看不见了。

罗伯特·乔丹望着比拉尔。她的前额渗着汗，她摇摇头。她一直用牙齿咬着下唇。

“每个人都有克星，”她说，“我就怕飞机。”

“你没有被我的恐惧传染上吧？”普里米蒂伏讥嘲地说。

“不，”她把手按在他肩上。“你没有恐惧可传染的。这我知道。原谅我跟你玩笑开得过分了。我们都是难兄难弟。”她接着对罗伯特·乔丹说，“我把吃的和酒就送上山来。还要些什么吧？”

“现在不要。其余的人在哪儿？”

“你的后备军原封不动地都在下面，和马匹在一起，”她露齿笑着。“东西都收起来了。要带走的都已准备好。玛丽亚和你的器材在一起。”

“万一飞机再来，叫她待在山洞里。”

“是，我的英国老爷，”比拉尔说。“我派你的吉普赛人（我把他交给你了）去采蘑菇了，打算煮兔肉。现在有很多蘑菇，我看还是把兔子就吃了，虽说最好还是明后天吃。”

“我看吃掉最好，”罗伯特·乔丹说。比拉尔把她的大手放在他挂着手提机枪皮带的肩膀上，接着举起手来，用手指弄乱他的头发。“好一个英国人，”比拉尔说。“等煮好了，我叫玛丽亚端来。”

远处高地上的枪声差不多消失了，只偶尔还有一两声。

“你看结束了吗？”比拉尔问。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从我们听到的枪声来看，他们发动了进攻，被打退了。现在依我看，进攻的敌人已经把他们包围了。敌人隐蔽了起来，在等飞机。”

比拉尔对普里米蒂伏说，“你呀，明白我不是有意奚落你了吧？”

“我已经明白了，”普里米蒂伏说。“你讲过更难听的话，我都忍受了。你这张嘴太刻薄了。可要当心啊，大娘。‘聋子’是我的好同志。”

“难道不是我的好同志？”比拉尔问他。“听着，扁脸。打仗的时候，别说什么难受高兴的啦。不算‘聋子’的烦恼，我们自己的已经够多啦。”

普里米蒂伏仍然郁郁不乐。

“你得吃药了，”比拉尔对他说。“我现在去准备吃的。”

“你把那个保皇派骑兵的证明文件带来没有？”罗伯特·乔丹问她。

“我真蠢，”她说。“我忘了。我叫玛丽亚送来。”

第二十六章

等到下午三点，飞机才飞来。雪到中午就全化掉了，岩石如今被阳光晒得很热。晴空无云，罗伯特·乔丹坐在岩石堆中，脱掉了衬衫，让阳光晒着背脊，看那个死去的骑兵衣袋里的信件。他不时放下了信，望望宽阔的斜坡对面那排树林，望望上面的高地，接着继续看信。再没有出现骑兵。“聋子”营地那个方向偶尔传来一声枪响。这种射击是零零碎碎的。

他仔细看了死者部队里的证件，知道这青年是纳瓦拉省塔法利亚人，二十一岁，未婚，是铁匠的儿子。他所属的团队是N骑兵团，这使罗伯特·乔丹很诧异，因为他原来以为这支部队在北方。此人拥护西班牙王室，战争初期曾在围攻伊伦的战斗中负过伤。

罗伯特·乔丹想：说不定在潘普洛纳过节的时候，我见过他在街上在公牛前面奔跑躲避^①。他对自己说：在战争中，你杀的任何人总不是你想杀的人。唉，差不多都不是的，他修正了自己

① 潘普洛纳为西班牙一古城，当时为纳瓦拉省省会，在这骑兵家乡塔法利亚以北。每年七月圣费尔明节期间，有盛大的斗牛赛，人们事先把公牛在大街上一直赶到斗牛场去，一路上喝醉了酒的居民们任意逗弄公牛，有的甚至被牛角挑伤，但在那如醉如狂的欢乐气氛中，人们不以为意。

的想法，就继续看信了。

他看的头几封信写得十分正经仔细，谈的几乎全是当地的新闻。那是他姐姐写来的，因此罗伯特·乔丹了解到，塔法利亚一切平安，父亲健朗，母亲还是老样子，只是有些腰酸背痛，她祝他平安，希望他处境不太危险，她高兴的是他正在消灭赤色分子，把西班牙从马克思主义匪帮统治下解放出来。接着是一张塔法利亚的青年的名单，自从她上次写信以来，这些人有的阵亡了，有的受了重伤。她提到了十个死者的名字。罗伯特·乔丹想：对塔法利亚这种规模的城市来说，死的人真不算少了。

这封信宗教气息很浓。她祈求圣安东尼，祈求比拉尔的圣母，祈求其他圣母^①保佑他，她要他永远别忘掉，那个她相信他始终佩戴在自己胸前的耶稣基督圣心也在保佑他，这种圣心经过无数次的实例——“无数次”三字下面划了道道——证明具有阻挡枪弹的功能。她是永远爱他的姐姐孔查。

这封信信纸的四周有些脏，罗伯特·乔丹小心地重新把它和部队里的证件放在一起，打开一封字迹没那么端正的信。那是这青年的未婚妻写给他的，信中隐隐地、一本正经地、十足神经质地为他的安全担心。罗伯特·乔丹把它看了一遍，就把所有的信件和证件一起放进他的后裤袋里。他不想看其他的信了。

他对自己说：看来我今天干了一件好事。他又说了一遍：看来你确实干了一件好事。

“你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普里米蒂伏问他。

“今天早晨我们毙掉的那个保皇派的证件和信。你要看看

^① 天主教各大教堂、圣地及神龛往往有圣母玛丽亚像，各有各的名称。此处的比拉尔为地名。

吗？”

“我不识字，”普里米蒂伏说。“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是些私人信件。”

“他家乡情况怎么样？你从信上能看出来吗？”

“看来情况不错，”罗伯特·乔丹说。“他家乡的人伤亡很多。”他低头望着掩护自动步枪的地方，化雪后有些变样，更完善了。看起来没有什么疑点。他转过头去眺望田野对面。

“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普里米蒂伏问。

“塔法利亚，”罗伯特·乔丹告诉他。

好吧，他对自己说。我感到遗憾，要是这样说有什么好处的话。

没什么好处啊，他对自己说。

那么好吧，别想它了，他对自己说。

行啦，不想了。

但是要想也不那么容易。他问自己：你杀掉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你以为自己有权杀人吗？没有。可是我不得不杀。你杀掉的人中间有几个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很少。可是他们都是敌人，我们用武力对付他们的武力。可是你对纳瓦拉人比对西班牙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有好感。对。可是你杀他们。对。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下山回营地去看看。你知道杀人是伤天害理的吗？对。可是你还是杀了？对。你仍然绝对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对。

他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气，而是骄傲地对自己说：是正义的。我相信人民，相信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管理自己。但是你别相信杀人啊，他对自己说。你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杀人，但千万别迷信杀人。如果你相信杀人的话，那就全盘都错

了。

但是依你看你已经杀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想记录下来。可是你知道吗？知道。有多少呢？你就说不准有多少了。炸火车时你杀了很多。很多很多。可是你说不准。那你能说准的有多少？二十个以上。其中有几个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我敢肯定的有两个，因为当我在乌塞拉俘虏他们的时候，我不得不毙了他们。这你不放在心上？对。可是你不喜欢这种事吧？不喜欢。我决心不再这样做。我避免这样做。我避免杀那些手无寸铁的人。

他对自己说：听着，你还是别想这个问题了。这对你和你的工作是很不利的。他的自我接着对他说：你听着，知道吗？因为你正在做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我得使你时刻记在心上。我必须使你保持头脑清醒。因为，假如你的头脑不是绝对清醒，你就没权利做你在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罪孽，谁也没权利夺取别人的生命，除非为了防止其他的人遭到更大的不幸。所以，头脑要清醒，别骗你自己。

他对自己说：但是我不愿把我杀掉的人象战利品或者枪托上的计数刻痕那样记录下来，那使人厌恶。我有权不把被杀的人数记录下来，我有权忘掉他们。

他的自我说：不，你没权忘掉任何事物。对这中间的任何事物你都无权闭眼不看、抛到脑后、加以冲淡或者篡改。

住口，他对自己说。你变得夸夸其谈了。

关于这件事，也决不要骗自己啦，他的自我接着说。

好吧，他对自己说。谢谢所有的忠告。那么我爱玛丽亚行不行呢？

他的自我说：行。

根据纯之又纯的唯物主义的社会观，爱情这种东西看来是

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即使这样也行吗？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观念的？他的自我问道。根本没有。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你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你自己知道。你信仰“自由、平等、博爱”。你信仰“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①。别用太多的辩证法来作弄你自己了。那是给别人应用的，不是给你的。你必须知道那一套。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你把很多事情搁在一边了。假如这场战争失败的话，一切都完蛋了。

然而等到事过境迁了，你可以摒弃你不相信的一切。你不相信的事情很多，而你相信的事情也不少。

还有一点：爱情决非儿戏。问题仅仅在于大多数人命运欠佳，得不到爱情。你已往从没得到过爱情，现在得到了。你从玛丽亚那里得到的爱情，不管它只能持续今天一天和明天的部分时间，或者能持续长久的一辈子，毕竟是人生所能遇到的最重大的事情。常有人说，爱情是不存在的，原因是他们得不到它。可是我对你说，爱情真是有的，你得到了它，哪怕你明天就死去，也是幸运的。

别谈死亡这种事情了，他对自己说。我们可不能说这种话。那是我们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的话题。每当情况真的恶化，他们就想放火，去送死。他们的思想方法十分古怪。十分古怪。得了，今天我们快过完了，老伙计，他对自己说。现在快三点了，迟早就要有吃的东西送来了。“聋子”那里还在开火，那就是说，他们也许把他包围了，在等增援，尽管他们必须在断黑前结束这场

① 前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口号，后者引自美国革命时的《独立宣言》，后来写进了美国宪法，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两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范畴。

战斗。

我不知道“聋子”那儿的的情况怎样。我们大家迟早也会遇到这种事。想来“聋子”那儿情绪不会太高。我们叫他去搞些马来，当然会使他陷入了困境。这个词儿在西班牙语中怎么说？Un callejón sin salida. 一条死胡同。看来我能顺利地度过这次战斗吧。这事情只要干一次，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战争中你被包围了能投降的话，那么打仗不是就成为愉快的事儿了吗？“我们被包围了！”这是这次战争中最令人惊慌的呼喊。其次就是你遭到枪击；如果走运的话，在这之前没有什么别的不幸了。“聋子”可不那么走运。等到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走运了。

三点钟了。他听到远处的隆隆声，抬头一望，看到了飞机。

第二十七章

“聋子”在小山顶上作战。他不喜欢这座小山，他见到这座山的时候，就觉得它的形状很象下疳。但是除了这座山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从老远望来，看到了这座山，就选中了它，策马朝它跑来，背上背着沉重的自动步枪，马儿吃力地爬着坡，身子在他胯下颠簸，一袋手榴弹在他身体的一边晃荡着，一袋自动步枪的弹药盘碰撞着他身体的另一边。华金和伊格纳西奥不时停一会儿，开几枪，停一会儿，开几枪，好让他有时间找个有利的地形架枪。

那时，使他们遭殃的雪还没化尽。“聋子”的马被打中了，因

此它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缓慢而蹒跚地爬上通向山顶的最后一段路，伤口鲜血直进，洒在雪地上。“聋子”拉着马笼头，肩上搭着马缰绳，使劲拉着马一起爬山。枪弹啪啪地射在岩石上，他肩上挎着两袋沉重的弹药，拼命爬山，接着他挑了个合适的地方，抓住马鬃，利索、熟练而怀着深情地对马开了一枪。于是马儿脑袋向前栽倒，填补了两块岩石之间的缺口。他把枪架在马背上射击，射掉了两盘弹药。枪身格格作响，空弹壳进到雪地里，搁在马身上的灼热的枪筒烫焦了马皮，散发出马鬃毛的焦糊味。他向冲上山来的敌人射击，迫使他们散开去找掩护，同时总觉得背上发毛，不知道背后会出现什么情况。等到他们五个人中间最后的一个到达了山顶，他才没有后顾之忧，保留下剩下的那几盘弹药，以备不时之需。

山坡上还有两匹死马，这儿山顶上也有三匹。昨夜他只偷到三匹马，其中有一匹，当他们跟敌人一交上火，在营地的马栏里来不及备鞍就想跨上去时，拔脚逃跑了。

到达山顶的五个人中三个负了伤。“聋子”腿肚上受了伤，左臂上伤了两处。他非常口渴，伤口麻木发硬，左臂上有个伤口很痛。还有，他头痛欲裂，他躺着等待飞机飞来，想起了一句西班牙俏皮话：“应当象吃阿司匹林片那样地接受死亡。”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句笑话大声说出来。每当他挪动胳膊，扭头看看周围他那伙剩下的弟兄时，就感到头痛恶心。他在头痛和恶心中咧嘴笑着。

五个人象五角星的五个角尖般展开着。他们用双手双膝挖掘，用泥土和石块在头和肩膀前筑起了土墩。有了这些土墩当掩护，他们用石块和泥土把各个土墩联起来。华金十八岁，他有一个钢盔，便用来挖掘并传送泥土。

他这只头盔是在炸火车时搞到的。头盔上有子弹窟窿，大家常常取笑他保存这头盔。但他敲平了窟窿边的豁口，在窟窿中打了个木塞，然后把里面的木塞头削掉，锉得和钢皮一般平。

枪声初响时，他猛地把钢盔套在头上，哐啷一声，好象头上给菜锅揍了一下。他的马被打死后，他肺部剧痛，两腿死沉，嘴里干渴，在子弹纷飞、枪声大作中冲上山坡最后一段路时，那顶头盔仿佛变得重极了，象一道铁箍般箍住了他那要炸裂的前额。但是他没有丢掉它。他现在就用它不停地，简直象台机器似地拼命挖掘。他还没中弹。

“它总算还有点儿用处啊，”“聋子”用低沉的喉音对他说。

“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华金说，由于恐惧，他口唇干得不听使唤，超过了战斗时常有的口渴。那是共产党的一句口号。

“聋子”转过头去，望着山坡下有个骑兵躲在一块大岩石后打冷枪。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没心情欣赏口号了。

“你说什么？”

他们中间有个人从他在筑的工事面前转过头来。这个人脸面朝下匍匐着，下巴抵住地面，小心翼翼地伸手放好一块岩石。

华金一刻不停地在挖，他用那干渴而年青的声音把口号又说了一遍。

“最后一个词是什么？”下巴抵住地面的人问。

“胜利，”小伙子说。

“狗屁，”下巴抵住地面的人说。

“还有一句，这里也用得上，”华金说，仿佛这句话的每一个词是一个护身符似的，“伊芭露丽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

生。”①

“又是狗屁，”那人说。另一个人扭过头说：“我们是伏着，不是跪着。”

“你啊。共产党员。你的伊芭露丽有个儿子和你年岁相仿，革命开始以来，送去了俄国，你知道吗？”

“那是胡扯，”华金说。

“什么胡扯，”另一个说。“这是那个名字古怪的爆破手跟我讲的。他也是你的同党。他干吗胡扯？”

“胡扯，”华金说。“把儿子藏在俄国逃避战争，她不会干这种事。”

“我在俄国就好了，”“聋子”一伙里又一个说。“你的伊芭露丽现在不会把我从这里送到俄国去吧，共产党员？”

“要是你这样信赖你的伊芭露丽，那么叫她帮我们离开这个山头吧，”一个大腿上绑着绑带的人说。

“法西斯分子会叫你离开的，”下巴抵在泥里的人说。

“别说这种话了，”华金对他说。

“把你嘴上你妈妈的奶水擦擦干，给我一头盔泥吧，”下巴抵住地面的人说。“我们谁也看不到今晚太阳下山了。”

“聋子”在想：这座山的樣子真象下疳。要不，象大姑娘没有奶头的乳房。要不，象圆锥形的火山顶。他想：你从来没见过火山。你永远也见不着了。这座山象下疳。别提火山了。现在想看火山已经太迟啦。

① 伊芭露丽为西班牙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即用“热情之花”为笔名为革命报刊撰文，曾屡次被捕入狱。一九三六年二月当选为议会代表。内战期间始终留在马德里撰写文章为共和国政府作宣传。一九三九年三月首都陷落后，她出国到苏联流亡，并到欧洲和美国参加反佛朗哥政权的活动。上面引的一句话是她的名言。

他从死马的肩隆边万分小心地朝外望了一眼，山坡下方一块大岩石后面立刻射来一梭子弹，他听到手提机枪子弹射入马身上的噗噗声。他在马尸后面匍匐爬去，从马臀部和一块岩石之间的缺口朝外望去。就在他下面的山坡上有三具尸体，那是法西斯分子在自动步枪和手提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向山顶冲锋时倒下的；他当时和其他人把手榴弹扔下去，从山坡上滚下去，粉碎了这次进攻。山顶的另一边还有些尸体，他没法看到。敌人没有可以借以冲上山顶的射击死角，而“聋子”知道，只要他的弹药和手榴弹够用，他的一伙还有四个人，敌人就没法把他从这里赶跑，除非拉来迫击炮。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已派人到拉格兰哈去要迫击炮。也许没去，因为飞机当然就快来了。侦察机从他们头上飞过已有四个小时了。

这座山真象下疳，“聋子”想，我们呢，就是上面的脓。但是他们愚蠢地进攻时被我们杀死了不少。他们怎么会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垮我们呢？他们有了这样新式的武器，忘乎所以，昏了头啦。他们弯着腰冲上山的时候，他扔了个手榴弹，一蹦一跳地滚下山坡，把那带头强攻的年青军官炸死了。他在一片黄色的闪光和灰色的尘雾中看到这个军官身子朝前一冲，栽倒在他这时躺着的地方，象一大堆破烂的衣服。这是他们进攻所达到的最远的地方。“聋子”望望这具尸体，然后望着山坡下方的其他尸体。

这帮家伙有勇无谋，他想。但是他们现在头脑清醒了，飞机到来之前不再进攻了。当然啦，除非他们派来一尊迫击炮。有了迫击炮就好办了。这种情况下一般都用迫击炮。他知道，迫击炮一来他们就会完蛋，但是当他想到要来飞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山顶上一无遮蔽，好象赤身裸体，甚至连皮肤都被扒掉了似的。他想：我觉得没有比这更赤裸裸的了。相形之下，一只剥

了皮的兔子也象一头熊那样有遮盖的了。可是他们干吗要派飞机来？他们用一尊迫击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从山上轰走。然而他们认为他们的飞机了不起，说不定会派飞机来。正象他们认为他们的自动武器了不起，于是就干出了那种蠢事。可是不用说，他们一定已经去调迫击炮了。

有人开了一枪，随即猛的一拉枪栓，又开了一枪。

“要节省子弹，”“聋子”说。

“有个老婊子养的想冲到那块岩石后面，”那人指着。

“你打中他没有？”“聋子”困难地转过头来问。

“没有，”那人说。“杂种缩回去了。”

“比拉尔是头号婊子，”下巴抵在泥里的那人说。“这婊子知道我们在这儿要完蛋了。”

“她帮不了忙，”“聋子”说。那人这句话是在他那只正常的耳朵一边说的，他不用回头就听到了。“她有什么办法？”

“从背后干这些婊子养的。”

“什么话，”“聋子”说。“他们布满了整个山坡。她怎样下手打他们呢？他们有一百五十人。现在说不定更多了。”

“不过，要是我们能坚持到天黑的话，”华金说。

“要是圣诞节成了复活节的话，”下巴抵在泥里的人说。

“要是你大婶有卵子的话，她就成了你大伯了，”另一个对他说。“叫你的伊芭露丽来吧。只有她能保佑我们了。”

“我不信关于她儿子的说法，”华金说。“如果他在那儿，准是在受训练，将来当飞机驾驶员什么的。”

“他躲在那儿保险，”那人对他说。

“他正在学辩证法。你的伊芭露丽到那儿去过。利斯特和莫德斯托那一帮人都去过。这是那个怪名字的家伙跟我讲的。”

“他们应该到那边去学习好了回来帮助我们，”华金说。

“他们现在就应该来帮助我们，”另一个说。“那伙肮脏的俄国骗子手现在都该来帮助我们。”他又打了一枪说：“我操他的，又没打中。”

“要节省子弹，话别太多，要不然会很口渴，”“聋子”说。“这儿山上没水。”

“喝这个吧，”那人说着，侧过身子从头上退下挎在肩上的皮酒袋，递给“聋子”。“漱漱口，老伙计。你受了伤，一定很口渴。”

“大家喝，”“聋子”说。

“那我来先喝一点，”主人说着，把酒袋一挤，喷了好些酒在自己嘴里，这才把它递给大家。

“‘聋子’，你看飞机什么时候来？”下巴抵在泥里的人问。

“随时都会来，”“聋子”说。“他们早该来了。”

“你认为这些老婊子养的会再进攻吗？”

“只要飞机不来。”

他觉得没必要提迫击炮。迫击炮一来，他们马上会明白的。

“我的天主，拿我们昨天看到的来说，他们的飞机是够多的。”

“太多啦，”“聋子”说。

他头痛得厉害，一条胳膊僵硬得一动就痛得简直受不了。他用那条好胳膊举起皮酒袋，同时仰望着那明净蔚蓝的初夏天空。他五十二岁了，他相信这准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那样的天空了。

他一点也不怕死，但气愤的是给困在这座只能当作葬身之地的小山上。他想：如果我们能够脱身，如果我们能迫使他们从那长长的山谷中过来，或者我们能突出去，穿过那公路，那就好

了。可是这座下疳般的山哪。我们必须尽可能好好利用这座山的地形，到目前为止，我们利用得满不错。

如果他知道历史上有许多人不得不用一座小山作为葬身之地，他的情绪不会因此而高一些，因为在他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关心别人在相同情况下的遭遇，正如一个新寡的妇人不会由于得知别人心爱的丈夫去世而凭添慰藉。不管一个人怕不怕死，死亡是难以接受的。“聋子”不怕死，但尽管他已经五十二岁，身上三处负伤，被困在山上，死亡还是没有可爱的地方。

他在心里拿这个来开玩笑，但他望望天空，望望远处的山岭，喝了口酒，却并不想死。他想：要是人一定要死的话——显然人是非死不可的——那么我可以死。只是我讨厌死啊。

死没什么了不起，他心中没有死的图景，也没有对死的惧怕。但是山坡上麦浪起伏的田地、天空中的苍鹰、打稻筛谷时秫屑飞扬中喝的一陶罐水、你胯下的马儿、一条腿下夹着的卡宾枪、小山、河谷、两岸长着树木的小溪、河谷的那一边以及远方的群山，这一切都生意盎然。

“聋子”交还皮酒袋，点头致谢。他向前欠身，拍拍被自动步枪枪筒烫焦皮的死马肩头。他仍能闻到马鬃毛的焦味。他回想到当时子弹在他们头上和四周噓噓而过，密集得象帷幕，他怎样把战栗的马牵到这里，小心地对准马儿两眼和两耳之间的连结线的交叉点打了一枪。然后，乘马栽倒的时候，他立刻伏在那暖和而潮湿的马背后，架好枪射击冲上山来的敌人。

“真是匹了不起的好马，”他说。

“聋子”这时把身子没受伤的一侧贴在地上，仰望着天空。他躺在一堆空弹壳上，他的头有岩石遮掩着，身体伏在马尸背后。他感到伤口僵硬，痛得厉害，他觉得疲乏得没法动弹了。

“你怎么啦，老伙计？”他身边的人问他。

“没什么。我休息一会儿。”

“睡吧，”身边那人说。“他们来的时候会吵醒我们的。”

正在这时，山坡下有人叫喊了。

“听着，土匪！”声音来自架着离他们最近的自动步枪的岩石后面。“飞机一来要把你们炸得粉身碎骨，现在就投降吧。”

“他说什么？”“聋子”问。

华金告诉了他。“聋子”侧身一滚，抬起上半身，这样又蹲伏在枪后面了。

“飞机也许不会就来，”他说。“别管理他们，别开枪。说不定我们可以引他们再来攻。”

“我们骂他们几声怎么样？”那个跟华金谈起伊芭露丽的儿子在俄国的人问。

“不行，”“聋子”说。“把你的大手枪给我。谁有大手枪？”

“这儿。”

“把枪给我。”他双膝跪着，接过一支九毫米口径的星牌大手枪，朝死马旁边的地上打了一枪，等了一会儿，又断断续续地打了四枪。接着，他数到六十，然后对准马尸体上打了最后一枪。他露齿笑笑，交还手枪。

“上好子弹，”他低声说，“大家都别开口，谁也不许开枪。”

“土匪！”岩石后大声喊着。

山上没人说话。

“土匪！投降吧，不然把你们炸得粉碎。”

“他们要上钩啦，”“聋子”高兴地低声说。

在他等着的时候，一个人从岩石堆后面探出头来。山顶上一弹不发，那颗脑袋又缩回去了。“聋子”等着、张望着，却再没出现

什么情况。他转过头，看到其他的人都在观察着各人前面的山坡。他望着他们，他们都摇摇头。

“谁也不许动，”他低声说。

“老婊子养的，”岩石后又传来了骂声。

“共匪。婊娘的。啞你们爸爸鸡巴的。”

“聋子”露齿笑着。他侧过那只正常的耳朵，才听清这大声臭骂。他想：这可比阿司匹林妙啊。我们能打死几个呢？他们能那样蠢吗？

骂声又停了，他们有三分钟没听到什么声音，没见到什么动静。接着，山坡下一百码远的一块岩石后面埋伏着的人探出头来，开了一枪。子弹打在一块岩石上，一声尖厉的呼啸，跳飞开去。接着，“聋子”看到有人弯腰从架着自动步枪的岩石后面跑出来，穿过空地，朝躲在一块大岩石后的伏击者跑去。他几乎是纵身一跳扑到这大岩石后边去的。

“聋子”朝四周望着。他们对他打手势，表示其他山坡上没有动静。“聋子”高兴地笑笑，摇摇头。他想：这可比阿司匹林妙上十倍。他等着，这股高兴劲儿只有猎人才会有。

山坡下从岩石堆后奔到大岩石后去的那个人正在对那伏击者讲话。

“你相信吗？”

“说不准，”伏击者说。

“这是合乎情理的，”这个身任指挥官的人说。“他们被包围了，没了指望，只有死路一条。”

伏击者没说什么。

“你认为怎么样？”指挥官问。

“看不出名堂，”伏击者说。

“刚才那几声枪响以后，你看到过什么动静？”

“一点也没有。”

指挥官看看手表：两点五十分。

“一个钟点以前，飞机就该来了，”他说。正当这时，另一个军官冲到大岩石后面。伏击者挪过一点身子，给他让出些地方。

“你，帕科，”第一个军官说。“你看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军官刚从山坡上自动步枪枪位那儿猛冲过来，正在喘大气。

“我看这里面有鬼，”他说。

“要是没有鬼呢？我们在这儿苦等着，包围着些死人，不是笑话吗？”

“我们干的事岂止可笑哪，”第二个军官说。“瞧这山坡。”

他抬头望着山坡，那里尸体一直遍布到山顶。从他那儿望去，看得见山顶上一片凌乱的山石、“聋子”的死马的肚子、伸出的马腿、撒出的马蹄以及新翻起的泥土。

“迫击炮怎么搞的？”第二个军官问。

“再过一小时该来啦。那是说最多一小时。”

“那就等迫击炮吧。蠢事已经干得够多啦。”

“土匪！”第一个军官突然站起身大喊，脑袋暴露在大岩石上面。他这样站直了身体，山顶望过去显得近得多了。“共匪！怕死鬼！”

第二个军官望望伏击者，摇摇头。伏击者转过头去，但抿紧了嘴唇。

第一个军官站在那儿，一手按在手枪柄上，把脑袋完全暴露在岩石上方。他朝山顶恶骂、诅咒。一点动静也没有。接着他干脆从岩石后面走出来，站在那儿仰望着山顶。

“没死的话，开枪吧，怕死鬼，”他大声叫喊。“开枪打我这个不怕哪个从老婊子肚里钻出来的共匪的人吧。”

最后这句话很长，等他喊完的时候，脸涨得通红。

第二个军官又摇摇头。此人长得又瘦又黑，眼神温和，嘴唇薄，凹陷的双颊上布满了胡子茬。首次下令进攻的是那个在大叫大喊的军官。死在山坡上的青年中尉是这个名叫帕科·贝伦多的中尉最亲密的朋友。帕科正在听那显然处于狂热状态的上尉在叫喊。

“杀我姐姐和娘的就是这帮畜生，”上尉说。他长着一张红脸，留着两撇金黄色的英国式小胡子，眼睛有点毛病。这双眼睛是浅蓝色的，睫毛也是浅色的。你如果仔细看他的眼睛，会发现它们似乎不会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共匪，”他接着大喊。“怕死鬼！”又开始咒骂了。

他这时完全没有掩护，站着用手枪仔细瞄准，朝山顶上的唯一目标，“聋子”的死马，开了一枪。枪弹在死马下面十五码的地方溅起了一股泥土。上尉又开了一枪。枪弹射在山石上，嗖的一声弹开去。

上尉站在那儿望着山顶。贝伦多中尉望着离山峰不远的另一个中尉的尸体。伏击者望着眼前的地面。他接着抬头望望上尉。

“上面没有活人了，”上尉说。“你，”他对伏击者说，“到上面去看看。”

伏击者垂下了头。他一声不吭。

“你没听到我的话？”上尉对他大喝一声。

“是，我的上尉，”伏击者说，并不朝他看。

“那么站起来，走。”上尉仍握着手枪。“你没听到我的话？”

“是，我的上尉。”

“那干吗不走？”

“我不想去，我的上尉。”

“你不想去？”上尉用手枪抵住他的后腰。“你不想去？”

“我怕，我的上尉，”士兵理直气壮地说。

贝伦多中尉望着上尉的脸和异样的眼睛，以为他要就地枪毙这个兵了。

“莫拉上尉，”他说。

“贝伦多中尉？”

“这个弟兄也许没错。”

“他说怕，没错？他说不想服从命令，没错？”

“不。他说里面有鬼，没错。”

“他们全都死了，”上尉说。“你没听到我说，他们全都死了？”

“你是指躺在山坡上的伙伴们？”贝伦多问他。“我同意你的话。”

“帕科，”上尉说，“别做傻瓜了。你以为惋惜胡利安中尉的只有你一个人？我跟你说，这帮共匪都死了。瞧！”

他站起身来，双手按在大岩石顶上，引体上升，双膝别扭地搁上岩石，最后在顶上站直了身体。

“开枪吧，”他站在这灰色的花岗岩石上挥舞着两臂大喊。“开枪打我吧！杀死我吧！”

山顶上，伏在死马后面的“聋子”咧嘴笑了。

他想：这种人啊。他笑了，因为一笑胳膊就痛，竭力忍住了。

“共匪，”声音从下面传来。“流氓，开枪打我吧！杀死我

吧！”

“聋子”笑得胸口直颤，从马屁股旁偷偷张望，看到那上尉站在大岩石上挥舞着两臂。另一个军官站在岩石旁边。那个伏击者站在另一边。“聋子”目不转睛地望着，高兴地摆着头。

“开枪打我吧，”他低声自语。“杀死我吧！”他的肩膀又颤动起来。他一笑胳膊就痛，脑袋也象要裂开似的。但是他又笑得象发急惊风似的全身抖动。

莫拉上尉从大岩石上下来了。

“你现在相信我了吧，帕科？”他质问贝伦多中尉。

“不，”贝伦多中尉说。

“王八蛋！”上尉说。“这儿只有白痴和怕死鬼。”

伏击者又小心翼翼地躲到大岩石后面，贝伦多蹲在他旁边。

上尉站在大岩石旁毫无遮蔽，开始朝山顶谩骂。西班牙语里的脏话最多。有些脏话英语里也有，但是另外有一些词儿却只在渎神和敬神并驾齐驱的国家^①里应用。贝伦多中尉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伏击者也是。他们是纳瓦拉的保皇派，他们在火头上诅咒谩骂之后，认为这是罪孽，总得向神父作忏悔。

他们俩如今蹲在大岩石后望着上尉，听他大骂的时候，认为他这个人和他的咒骂都和自己无关。他们在这生死莫测的一天，不愿说这种话来使得良心上感到内疚。伏击者想，这样的谩骂不会带来好运。这样提到圣母是个凶兆。这家伙比赤色分子骂得还恶毒。

贝伦多中尉在想：胡利安死啦。在这样一个日子死在山坡

① 指信奉天主教的国家。

上。这个臭嘴站在那儿臭骂，会带来更坏的运气。

上尉这时不喊了，转身朝着贝伦多中尉。他的眼神显得空前古怪。

“帕科，”他高兴地说，“你和我一起上山吧。”

“我不。”

“什么？”上尉又拔出手枪。

贝伦多在想：我讨厌这种挥舞手枪的家伙。他们一下命令就拔手枪。也许他们上厕所也要拔出手枪才拉得出屎来。

“如果你下命令，我可以去，但是我抗议，”贝伦多中尉对上尉说。

“那我一个人去，”上尉说。“这儿胆小鬼的臭气太重了。”

他右手握着枪，不慌不忙地大步走上山坡。贝伦多和伏击者望着他。上尉无意找掩护，笔直望着他面前山顶上的岩石、马尸和那堆新挖出的泥土。

“聋子”伏在马尸后面岩石犄角那儿，注视着上尉大步爬上山来。

他想：只有一个。我们只捞到一个。但从他的口气听来，他是个大猎物。瞧他走路的样子。瞧这畜生。瞧他大步向前来了。这家伙归我的了。我带这家伙上路啦。现在过来的这个人跟我是同路。来吧，同路的旅伴。迈开步子。笔直过来吧。过来领教领教。来啊。一直走啊。别放慢脚步。笔直过来吧。要走来就走来吧。别停下来看那些死人啦。这就对了。别朝脚下看啊。眼睛朝前，继续走啊。瞧，他留着小胡子。你觉得这小胡子怎么样？他喜欢留小胡子，这位同路的旅伴。他是个上尉。瞧他的袖章。我说过他是个大猎物嘛。他的脸象英国人。瞧啊。长着红脸，黄头发，蓝眼睛。没戴军帽，小胡子是黄色的。长着蓝眼

睛。淡蓝色的眼睛。有点毛病的淡蓝色的眼睛。有点斜视的淡蓝色的眼睛。离我够近啦。太近了。好，同路的旅伴。挨一下子吧，同路的旅伴。

他轻轻扣紧自动步枪的扳机，这种自动武器射击时的后坐力使三脚枪架朝后滑动，枪托在他肩头连撞了三下。

上尉脸朝下地倒在山坡上。他左臂压在身下。握手枪的右臂伸出在脑袋前方。山坡下又一齐向山顶开枪了。

贝伦多中尉伏在大岩石后面，心想现在非得在火力掩护下冲过这开阔地带啦。他这时听到山顶传来“聋子”低沉而嘶哑的声音。

“强盗！”声音传来。“强盗！开枪打我吧！杀死我吧！”

“聋子”在山顶上伏在自动步枪后面，笑得胸部发痛，笑得他自以为天灵盖要裂开了。

“强盗，”他又愉快地喊着。“杀死我吧，强盗！”然后他愉快地摇着头。他想：我们同路的旅伴可不少哪。

他打算等这军官离开大岩石掩护的时候，用自动步枪结果他。他迟早不得不离开那里。“聋子”知道他躲在那里没法指挥，他认为时机很好，能把他干掉。

正在这时，山上其他人第一次听到了飞机来临的声音。

“聋子”没听到飞机声。他正用自动步枪瞄准着大岩石朝下坡的那一边。他想：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在奔跑，如果不留神，会打不中他的。他跑这段路时，我可以打他后背。我应当把枪随着他转动，打他前面。或者让他逃，然后射击他，打他前面。我要在那块岩石边上收拾他，对准他前面打枪。接着他觉得自己肩上给碰了一下，扭头看到华金那灰白而惊恐的脸。他朝这小伙子指点的方向一看，见到三架飞机正在飞

来。

正在这时，贝仑多中尉突然从大岩石后面冲出来，他低着头，撒开两腿，打着斜冲下山坡，奔到岩石堆后架着自动步枪的地方。

“聋子”在注视飞机，没看到他溜了。

“帮我把枪抽出来，”他对华金说，小伙子就把架在马尸和岩石间的自动步枪拖出来。

飞机不慌不忙地正在飞来。它们排成梯队飞行，形体和声音越来越大。

“朝天卧倒，射击飞机，”“聋子”说。“等它们飞来，朝它们前面打。”

他始终望着飞机。“王八蛋！婊子养的！”他连珠炮地骂着。

“伊格纳西奥！”他说。“把枪架在小伙子肩上。你！”对华金说，“坐在那儿别动。蹲下。蹲得低些。不行。再低些。”

他仰卧着，用自动步枪瞄着笔直飞来的飞机。

“你，伊格纳西奥，给我按住那个三脚枪架。”枪架在华金背上晃动，枪筒在他不能自制地震颤的身上跳动，而他蹲伏着，低着头，听着飞机来近的轰鸣。

伊格纳西奥匍匐在地，抬头望着天空，注视着飞来的飞机，用双手紧握住三脚架，稳住了枪身。

“低头，”他对华金说。“头朝前。”

“伊芭露丽说过：‘宁愿站着死——’”隆隆声越来越近了，华金对自己说。接着，他突然改口默念着：“满被圣宠的玛利亚啊，天主与你同在；您是女人中有福的，你儿子耶稣也是有福的。天主圣母玛利亚，在我们临死的时刻，为我等罪人祈祷吧。阿

门。^①天主圣母玛利亚，”他祈祷到这里，这时飞机声响得使人难以忍受了，他突然想起来了，就心急慌忙地做起忏悔来，“我的天主啊，我衷心忏悔，得罪了值得我全心敬爱的您——”

他这时耳边响起了哒哒哒的枪声，枪筒灼热地抵在他的肩上。哒哒哒的枪声这时又响了，枪口的声波把他的耳朵都快震聋了。伊格纳西奥拚命把三脚枪架朝下拉，枪身烤灼着他的背部。飞机的隆隆声中响着哒哒哒的枪声，他想不起忏悔该怎么做了。

他想得起的只有这一些话：在我们临死的时刻。阿门。在我们临死的时刻。阿门。在这时刻。在这时刻。阿门。其他人都都在射击。现在，在我们临死的时刻。阿门。

接着，在哒哒哒的枪声中响起了一声撕破空气的呼啸声，接着，轰的一声，眼前一片又红又黑的景象，他膝下的土地震动起来，掀起泥土，打在他的脸上，接着，泥土和碎石劈头盖脑地落下来，伊格纳西奥压在他身上，枪也压在他身上。但是他没死，因为听见呼啸声又响了，随着一声轰响，他身下的土地又震动起来。接着又是一声轰响，他肚子下面的土地突然倾斜，山顶的一边腾空升起，接着泥土砂石渐渐落下来，盖在他们躺着的身上。

飞机又飞来了三次，轰炸山顶，但是山顶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了。接着，飞机用机枪扫射山顶之后飞走了。当这些飞机最后一次向山顶俯冲、用机枪哒哒地扫射时，第一架飞机拉起机头，一个鹞子翻身，跟着每架飞机依样行事，队形就由梯形变为V形，朝塞哥维亚方向飞去。

贝伦多中尉命令密集火力压住山头，同时带一个小队爬到

^① 这是《圣母经》的全文，译时曾参照天主教会常用的文本。

一个可以向山顶扔手榴弹的炸弹坑。他唯恐还有人活着，守在残破的山顶等着他们，于是先向那堆马尸、炸裂的岩石、带有火药味的被翻起的黄土扔了四颗手榴弹，这才从弹坑里爬出来，走上山顶去察看。

山顶上除了华金之外，没有活人了。这小伙子被压在伊格纳西奥的尸体下面，失去了知觉。华金的鼻孔和耳朵都在淌血。一颗炸弹落在离他那么近的地方，他一下子处在爆炸的中心，顿时透不过气来，此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感觉不到了。贝伦多中尉划了个十字，对准他后脑勺就是一枪，动作干脆，又很斯文——如果这种暴戾的行动能够说得上斯文的话——就象“聋子”打死那匹受伤的马一样。

贝伦多中尉站在山顶，俯视着山坡上被打死的自己的伙伴，然后眺望对面的田野，望着“聋子”在这里作困兽之斗之前他们拍马追逐的地方。他看到自己的部队所作的一切部署，然后命令把死去的伙伴们的马牵来，把尸体横捆在马鞍上，以便运到拉格兰哈去。

“把那一个也带走，”他说。“那个抱着自动步枪的家伙。他准是‘聋子’。他年纪最大，掌握枪的就是他。不。把脑袋砍下，包在披风里。”他考虑了一会儿。“你们还是把他们的脑袋都砍下带走吧。还有山坡上的那几个，我们一开始就发现的那几个。把步枪和手枪收起来，把那挺自动步枪放在马背上。”

接着，他下坡走到第一次进攻时被打死的中尉躺着的地方。他低头望着他，但并不碰他。

“战争真是坏事啊，”他自言自语说。

然后他又划了个十字，一路走下山坡，为死去的伙伴的灵魂得到安息念了五遍《天主经》和五遍《圣母经》^①。他不想待下去

看他的命令如何执行了。

第二十八章

飞机离去以后，罗伯特·乔丹和普里米蒂伏听到枪声开始响了，他的心似乎又随着枪响而猛跳。一片烟雾飘过他能望到的高地上最远的山脊，飞机在空中变成了三点稳定地越来越小的斑点。

“说不定他们狂轰滥炸了自己的骑兵，根本没炸到‘聋子’一伙，”罗伯特·乔丹自言自语。“那些该死的飞机吓得你要死，却不一定把你炸死。”

“还在打哪，”普里米蒂伏听着猛烈的枪声，说。炸弹每次砰的爆炸都使他战栗，他这时舔着干燥的嘴唇。

“干吗不打？”罗伯特·乔丹说。“那些玩意儿根本杀害不了谁。”

接着枪声完全停息了，他再也听不到射击声。贝伦多中尉开手枪的声音没传得那么远。

枪声初停时，他倒不觉得什么。然而持续的寂静却使他心里感到空洞洞的。他接着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心里顿时振奋起来。接着又是鸦雀无声，就此一片寂静，他知道，战斗结束了。

玛丽亚从营地带来了一铅皮桶汤汁很浓的蘑菇炖兔肉，一袋面包，一瓶酒，四只铅皮盘子，两只杯子和四把汤匙。她走到

① 两者都是天主教徒常用的祷文。

枪边停下了步，给奥古斯丁和埃拉迪奥舀了两盘兔肉，拿出面包，旋开角质的酒瓶塞，斟了两杯酒。埃拉迪奥代替安塞尔莫在看守着枪。

罗伯特·乔丹望着她轻捷地朝他的观察哨爬上来，肩上挎着面包袋，手里提着桶，一头短发在阳光中闪亮。他爬下几步接过铅皮桶，扶她爬上最后的一块山石。

“飞机来干什么了？”她眼神惊恐地问。

“轰炸‘聋子’。”

他揭开桶盖，往一只盘子里舀菜。

“他们还在打吗？”

“不。结束了。”

“啊，”她说，咬咬嘴唇，望着对面的田野。

“我没有胃口了，”普里米蒂伏说。

“总得吃一些，”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我咽不下。”

“喝点这个吧，伙计，”罗伯特·乔丹说，把酒瓶递给他。“然后吃饭。”

“‘聋子’的事叫我不想吃了，”普里米蒂伏说。“你吃。我不想吃。”

玛丽亚走到他身边，两臂搂住他的脖子，吻他。

“吃吧，老朋友，”她说。“人人都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普里米蒂伏转身避开了她。他举起酒瓶，仰起了头，让喷出的酒直灌进嗓子眼里，咕咚咕咚地咽了下去。他接着从桶里舀了菜，盛满盘子，开始吃起来。

罗伯特·乔丹望望玛丽亚，摇摇头。她在他身旁坐下，一条胳膊搂着他的肩膀。两人心照不宣地坐在那儿，罗伯特·乔丹

从容不迫地细细品着蘑菇炖兔肉的滋味。他喝着酒，大家都不说话。

“你愿意的话，漂亮的姑娘，可以待在这儿，”过了一会儿，他吃完了东西说。

“不，”她说。“我得到比拉尔那儿去。”

“待在这儿很好嘛。我看现在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不。我得到比拉尔那儿去。她正在给我上课。”

“她给你上什么课？”

“上课。”她朝他微笑，接着吻了他一下。“你从没听说过宗教课吗？”她脸红了。“就是那一类东西。”她又脸红了。“可是不一样。”

“去听你的课吧，”他说，拍拍她的头。她又对他微笑，接着对普里米蒂伏说，“你需要什么东西从下面给你捎来？”

“不要，好姑娘，”他说。罗伯特·乔丹和玛丽亚都看出他心里仍旧不痛快。

“好，老朋友，”她对他说。

“听着，”普里米蒂伏说。“我不怕死，可象这样不顾他们死活——”他说不下去了。

“没别的办法，”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我知道。不过还是叫人受不了啊。”

“没别的办法，”罗伯特·乔丹又说了一遍。“现在还是别再提它的好。”

“是啊。可是在那儿孤军作战，我们一点也不支援——”

“最好还是别再提它了，”罗伯特·乔丹说。“你，漂亮的姑娘，去听你的课吧。”

他看她在岩石中间爬下去。然后，他望着那片高地，坐在那

儿想了很久。

普里米蒂伏对他说话，但他不回答。太阳底下很热，但他感觉不到，只顾坐着眺望山坡和延伸到山坡顶端的那长长的一片松林。一小时过去了，太阳落到左边远处，他这时看到有队人马翻过坡来，就拿起望远镜。

头两个骑马的人出现在高山的长长的绿坡上的时候，马显得又小又清楚。接着又有四个散开的骑兵越过宽广的山坡下山来，接着在望远镜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两行人马来到他的视野里。他望着他们，觉得胳膊窝里的汗水滴到腰上。有一个人带领着这伙人马。接着来了更多的骑兵。接着是没骑人的马匹，鞍上横捆着东西。接着是两个骑马的。接着是骑马的伤兵，旁边有步行的人伴随着。最后又是一些骑兵。

罗伯特·乔丹望着他们骑下山坡，消失在树林里。距离这么远，他看不见有个马鞍上搁着个两头扎紧、中间捆了几道的用披风卷成的包裹，这包裹被绳子勒得象个内含饱鼓鼓的豆子的豆荚，横捆在马鞍上，两头结在马镫的皮带上。“聋子”用的自动步枪和这包裹并排放置在马鞍上，显得威风凛凛。

贝伦多中尉骑在那伙人马前面，两翼各派出了护卫，前有尖兵，在老远的前方，但他并不觉得威风。他只感到战斗之后的空虚。他在想：砍头是残酷的。但是验明正身是必要的手续。事情到这个地步已经够麻烦了，谁管得了这么多？这次把首级带回去，可能会使他们高兴。他们中有些人是喜欢这种玩意儿的。说不定他们会把这些首级都送到布尔戈斯去。这是件残酷的事。用飞机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是用一门斯多克斯迫击炮^①，几乎一点伤亡也不会有，我们就能解决这一仗。两头骡子驮炮弹，一头骡子驮两门迫击炮，一边一门。那就成一支象样的军队啦！

加上这些自动武器的火力。再来一头骡子。不，两头骡子来驮弹药。他对自己说：别想下去啦。这样可不象一支骑兵团啦。别想下去啦。你在为自己编制军队啦。你下一步就要一尊过山炮啦。

他接着想到死在山上的胡利安，如今在第一队人马中横捆在马背上。于是他撇下身后阳光普照的山坡，骑马穿进幽暗静寂的松林，又为胡利安念起祷文来。

“万福，慈悲的圣母，”他开始祷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希望。在这眼泪之谷，我们向您叹息、哀悼、哭泣——”

他不停地祷告，马蹄踩在柔软的铺着松针的地上，阳光从树身和树身的间隙处投下斑斑光影，就象从大教堂的庭柱之间射下那样。他一边祷告，一边望着前面，看两翼的部下在树林中骑行。

他穿出树林，来到通往拉格兰哈的黄土公路上，马蹄在他们周围掀起阵阵尘土。尘土落到横捆在马鞍上、脸面朝下的死者身上，那些伤兵和在旁边步行的人们都被裹在弥漫的尘埃中。

安塞尔莫就是在这里看到他们风尘仆仆地骑马经过的。

他数着死者和伤员的人数，认出了“聋子”的自动步枪。那只用披风包成的包裹随着马镫皮带的晃动，碰撞着带头的马的侧腹，他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可是等他在回营的路上摸黑走上了“聋子”战斗过的山头，他立刻明白这一长卷东西里面藏的是什了。他在黑暗中分辨不出山上躺着的人是谁。但

① 斯多克斯迫击炮最早由英国制造，口径三英寸，炮弹仅十磅重，为轻型迫击炮，使用方便。

是他把这些尸体数了一下，就越过山岭回巴勃罗的营地去了。

那些弹坑使他震惊，那些弹坑以及小山上的情景，使他心里凉了半截，他这时独自在黑暗中走着，心里一点也不在考虑第二天的事情了。他只顾加快脚步回去报告。他一边走，一边给“聋子”一伙祷告。自从革命开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祷告。

“最善良、最亲爱、最仁慈的圣母啊，”他祷告。

他最后还是不禁想到了第二天的事情。他想：我要听英国人的，完全照他说的去做。可得让我跟他在一起，主啊，愿他的指示讲得明确，因为在飞机的轰炸下，我觉得自己是难以控制住自己的。保佑我，主啊，明天让我象个男子汉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那样干吧。保佑我，主啊，让我弄清楚那一天该怎么干。保佑我，主啊，让我两条腿听我使唤，免得在危急的时候逃跑。保佑我，主啊，明天打仗的时候让我象个男子汉那样行动。既然我祈求您帮助，就请您答应吧，因为您知道，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求您的，我也不再有别的请求了。

他独自在黑暗中行走，觉得祷告之后舒坦多了，他这时深信自己会表现得满好的。当他从高地下来的时候，又给“聋子”一伙做了一次祷告。不一会儿，他就走到了营地上面的哨岗，费尔南多要他回答口令。

“是我，”他回答，“安塞尔莫。”

“好，”费尔南多说。

“你知道‘聋子’的情况吗，老弟？”安塞尔莫问费尔南多，他们在黑暗中站在山路口。

“怎么不知道！”费尔南多说。“巴勃罗告诉我们了。”

“他到过山上？”

“怎么没到过？”费尔南多声色不动地说。“骑兵一走，他就上

山去看了。”

“他告诉了你们——”

“他全告诉了我们，”费尔南多说。“这帮法西斯分子真是野兽！我们一定要在西班牙把这种野兽全消灭干净。”他停了一下，沉痛地说，“他们心里啊，哪里懂得什么人的尊严。”

安塞尔莫在黑暗中咧嘴笑了。一小时以前，他没法设想自己竟能再笑。他想：这个费尔南多真叫人敬佩。

“对，”他对费尔南多说。“我们一定要教训他们。我们一定要夺走他们的飞机、自动武器、坦克、大炮，教训他们该怎样尊重人。”

“一点不错，”费尔南多说。“我高兴你有同样的想法。”

安塞尔莫一直下坡朝山洞走去，撇下他独自站在那儿感到义愤填膺。

第二十九章

安塞尔莫发现罗伯特·乔丹在山洞里和巴勃罗面对面坐在板桌旁。他们斟满了一缸酒，放在中间，各自面前放着一杯酒。罗伯特·乔丹拿出了笔记本，握着一枝铅笔。比拉尔和玛丽亚在山洞后部，安塞尔莫看不见她们。他没法知道那女人让玛丽亚待在后边是为了不让她听到谈话。他觉得比拉尔不在桌边倒是怪事。

安塞尔莫从挂在洞口的毯子外钻进来的时候，罗伯特·乔丹抬头望了一眼。巴勃罗直瞪着桌子。他的眼光集中在酒缸上，但是视而不见。

“我从山上来，”安塞尔莫对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告诉我们了，”罗伯特·乔丹说。

“山上有六个死人，敌人把脑袋都砍掉了，”安塞尔莫说。“我摸黑到那儿去过。”

罗伯特·乔丹点点头。巴勃罗坐在那儿望着酒缸，一句话也没有。他脸上毫无表情，猪样的小眼睛望着酒缸，仿佛他以前从没看到过似的。

“坐下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

老头儿在桌边一只蒙着生皮的凳子上坐下，罗伯特·乔丹伸手到桌子下面取出“聋子”送的那瓶威士忌。瓶里约摸有半瓶酒。罗伯特·乔丹伸手在桌上拿了一只杯子，斟了些威士忌，把它放在桌上，推向安塞尔莫。

“喝了吧，老头子，”他说。

安塞尔莫喝酒的时候，巴勃罗的目光从酒缸上移到他脸上，接着又回过来望着酒缸。

安塞尔莫喝下威士忌，感到鼻子、眼睛和嘴里都火辣辣的，接着胃里也觉得畅快、舒适而暖和了。他用手背抹抹嘴。

他然后望着罗伯特·乔丹说：“我可以再来一杯吗？”

“干吗不可以？”罗伯特·乔丹说着又从瓶里斟了一杯，这次是递过去，不是推给他。

这次喝下去没有火辣辣的感觉了，但加倍的暖和而舒适。他精神一振，就象一个大出血的人给注射了一次盐水针。

老头儿又朝酒瓶望望。

“剩下的明天喝了，”罗伯特·乔丹说。“公路上有什么情况，老头子？”

“情况不少，”安塞尔莫说。“我照你的吩咐，都记下了。

我找了一个人现在在替我守望、做记录。过后我去向她要情报。”

“你见到反坦克炮吗？有橡皮轮胎和长炮筒的家伙？”

“见到，”安塞尔莫说。“路上开过四辆卡车。每辆上有一门这种炮，上面的炮筒由松枝遮着。卡车上每门炮有六个人。”

“你说有四门炮？”罗伯特·乔丹问他。

“四门，”安塞尔莫说。他没看记录。

“跟我谈谈路上还有什么情况。”

安塞尔莫把他所看到的公路上的调动情况全告诉罗伯特·乔丹，罗伯特·乔丹作着记录。他以不识字不会写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惊人的记忆力从头说起，讲得井井有条。他讲的时候，巴勃罗两次伸手从缸里添酒。

“还有一队到拉格兰哈去的骑兵，他们是从‘聋子’作战的高地上来的，”安塞尔莫继续说。

他接着讲了他见到的受伤的人数和架在马鞍上的死者的人数。

“有一捆叫我弄不懂的东西横架在一个马鞍上，”他说。“现在我知道了，是脑袋。”他不停地接着说。“那是一个骑兵中队。他们只剩了一个军官。他不是今天一早你守在机枪边见到的那个。死掉的人里面准有他。从袖章上看来，死掉的有两个是军官。他们被捆在马鞍上，脸面朝下，手臂下垂着。敌人还把‘聋子’的自动步枪系在驮脑袋的马鞍上。枪筒弯了。就是这些，”他最后说。

“够了，”罗伯特·乔丹说，用杯子在酒缸里舀酒。“除了你之外，越过火线到共和国那边去过的还有谁？”

“安德烈斯和埃拉迪奥。”

“这两个人，哪个好些？”

“安德烈斯。”

“他从这儿到纳瓦塞拉达去，要多少时间？”

“不背包裹，小心留神，运气好，要三个小时。因为带着情报，我们挑一条路线比较长、比较安全的路走。”

“他准能到达目的地吗？”

“不知道，哪有什么说得准的事情！”

“你也没准？”

“是啊。”

就这样决定吧，罗伯特·乔丹心想。如果他说准能到达目的地，我当然会派他去。

“安德烈斯能象你一样到那儿？”

“跟我一样，或许更有把握。他年青。”

“可是情报非送到那儿不可。”

“要是不出事故，他能到得了那儿。出了事故，谁也没办法。”

“我写份急件派他送去，”罗伯特·乔丹说。“我来跟他讲，到什么地方去找将军。他在师参谋部。”

“师啊什么的，他是弄不明白的，”安塞尔莫说。“这种事情老是弄得我也稀里糊涂。得告诉他将军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可正是在师参谋部能找到他呀。”

“师参谋部可是个地方？”

“当然是个地方，老头子，”罗伯特·乔丹耐心地解释。“不过这是由将军自己挑选的地方。他把作战司令部设在那儿。”

“那么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安塞尔莫感到疲乏，疲乏使他脑

筋迟钝了。而且，象旅呀、师呀、军呀这种字眼，也叫他摸不着头脑。起先只有纵队，后来有团了，后来有旅了。现在是既有旅又有师了。他弄不懂。地方就是地方嘛。

“慢慢地来，老头子，”罗伯特·乔丹说。他知道，如果他没法使安塞尔莫明白，也就根本没法向安德烈斯交待清楚。“师参谋部是由将军挑选来作为指挥所的地方。他指挥一个师；一个师等于两个旅。我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因为选择地点的时候我不在场。很可能是个山洞，或者地下掩蔽部，有电话线通到那儿。安德烈斯得去打听将军和师参谋部在什么地方。他得把这份情报交给将军或者师参谋长，或者交给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我会写在上面的。即使他们外出视察进攻的准备工作了，肯定有一个人留守在那儿。你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

“那么去叫安德烈斯来吧。我马上就写，用这个公章封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圆形的木柄小橡皮图章给他看，上面有S·I·M.^①三个字母，还有一个不比五角硬币大多少的铁壳圆形小印台。“这个公章他们一定会重视的。现在去叫安德烈斯来，让我跟他交待。他得马上就走，但要先弄懂。”

“我懂他也会懂。可你非交待得清清楚楚不可。参谋部啦，师啦，这些名堂，我是莫名其妙的。我去的地方总是象房子之类有确切地点的。纳瓦塞拉达的指挥所是在一家老客栈里。瓜达拉马的指挥所是一幢带花园的房子。”

“这个将军的指挥所，”罗伯特·乔丹说，“该在靠火线很近的某处地方。为了防飞机，会是设在地下的。安德烈斯知道了

① 军事情报部的首字母缩略词，见第12页。

要打听什么，一问就找得到。他只要拿出我写的东西就行了。现在去叫他来，因为马上要送去。”

安塞尔莫低头从挂着的毯子下面钻出去了。罗伯特·乔丹开始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

“听着，英国人，”巴勃罗说，仍然盯着那只酒缸。

“我在写哪，”罗伯特·乔丹说，没有抬头。

“听着，英国人，”巴勃罗直接朝着酒缸说。“这件事你不用灰心丧气。没有了‘聋子’，我们还有很多人，能攻下哨所，把你的桥炸掉。”

“好，”罗伯特·乔丹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写。

“很多人，”巴勃罗说。“今天我很佩服你的果断，英国人，”巴勃罗对着酒缸说。“我看你很有两下子。你比我机灵。我信得过你。”

罗伯特·乔丹正在集中注意力给戈尔兹写报告，试图用最简洁的字句，但仍要写得完全令人信服，要写得使对方把这次进攻完全取消，但又要使他们相信，他之所以主张取消这次进攻，并非由于害怕在执行他自己的使命时可能遇到危险，而只是希望他们了解所有的情况。巴勃罗的话，他几乎一句也没有听清。

“英国人，”巴勃罗说。

“我在写哪，”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没有抬头。

他想：也许我应该分送两份。然而要这样做，又必须炸桥的话，我们炸桥的人就不够了。关于发动这次进攻的原因，我知道些什么呢？也许这只是一次牵制性攻势。也许他们是想吸引其他地方的军队。也许他们这么干是为了吸引北方的飞机。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吧。他们也许并不指望这次进攻获得成功。我知

道些什么呢？这是我给戈尔兹的报告。我要等到进攻开始才炸桥。我接到的命令是清楚的。要是取消这次进攻，我就什么也不炸。但是我必须在这儿保持万一必须执行那个命令时所需要的人手。

“你说什么？”他问巴勃罗。

“我有信心了，英国人，”巴勃罗仍然对着酒缸说。

伙计啊，罗伯特·乔丹想，但愿我有信心啊。他继续写着。

第三十章

那天晚上该做的事情这时都落实了。命令全部下达了。人人都知道了自己在早晨的确切任务。安德烈斯已走了三个小时。天亮时不发动进攻的话，就不会发动了。罗伯特·乔丹到上面的岗哨跟普里米蒂伏说话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对自己说：我相信会发动的。

戈尔兹部署了这次进攻，但他无权撤消。要撤消必须得到马德里的批准。他们很可能没法叫醒那儿的人，即使叫得醒，那些人也会充满着睡意，不会认真考虑。我应该把敌人为了对付进攻所作的准备的情况及早报告戈尔兹，但是事情还没有发生，我怎能事先就打报告呢？天一断黑敌人才调动那些武器。他们不希望公路上的活动被我们的飞机发现。但是他们的那些飞机又怎么说呢？法西斯分子的这些飞机又怎么说呢？

当然啦，我们的人一定看到了这些飞机而引起了警惕。可是，法西斯分子也许想用这些飞机来假装将向瓜达拉哈拉发动另一次进攻。据说意大利军队在索里亚集结，除了那些在北方

活动的之外，又在西昆萨集结^①。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军队和物资同时发动两次大进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肯定不过是虚张声势。

但是我们都知道，上个月和前一个月在加的斯^②登陆的意大利军队有多少。他们想再进攻瓜达拉哈拉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当然不会象上一次那么愚蠢，而会用三股主力军朝南直插，然后扩大突破点，沿着铁路线向高原西部进军。他们有一个可以采用的好办法。汉斯跟他讲过。上一次他们犯了很多错误。那整个设想就不对头。他们进攻阿甘达企图切断马德里和瓦伦西亚之间的公路时^③，没有动用他们进攻瓜达拉哈拉时用的任何部队。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双管齐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为什么？

然而我们两次都用同样的那些部队挡住了他们。要是他们双管齐下，我们就绝对挡不住他们。他对自己说：别愁。想想以前出现过的奇迹吧。你要就必须在早上炸桥，要就不需要炸。但是别欺骗自己，以为可以不必炸桥。反正总有一天要炸。不是这座桥，就是另一座。决定要干些什么，由不得你。你服从命令。按照命令办事，不用想别的。

炸桥的命令很明确。太明确了。可是你不能愁，也不能怕。害怕固然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你听任自己害怕，这种害怕的心情就会感染那些必须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① 这一年三月，叛军就是从西昆萨朝西南进攻瓜达拉哈拉的，目的在攻占该城，进而从东北方向威胁马德里，结果在瓜达拉哈拉东北的布里乌埃加遭到了大败。

② 加的斯为西班牙南端滨大西洋的大海港，内战一开始即陷入叛军之手，成为从西属摩洛哥及德意法西斯输送武装人员及军用物资的补给港。

③ 阿甘达在马德里东南，在通往瓦伦西亚的公路干线上。

他对自己说：可是砍头那件事还是叫人触目惊心啊。老头儿独自在山顶上发现了那些尸体，要是你象那样发现它们，会有什么感觉？这件事震动了你，不是吗？是啊，震动了你，乔丹。今天使你受到震动的事可不止一件，可是你的表现还可以。到目前为止，你的表现还不错。

他揶揄自己说：作为蒙大拿大学的西班牙语讲师，你干得满不错啊。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别以为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在这方面，你还没有做出多大的成绩。想想杜兰吧，他从没受过军事训练，是个作曲家，革命前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现在却成了个了不起的军官，指挥一个旅。对杜兰来说，这一切是那么简单容易，就象一个象棋神童学下象棋一样。你从小就看战略战术的书籍，有些研究，你祖父给你讲美国南北战争，启发了你的兴趣。不过祖父把南北战争说成是叛乱。但是你和杜兰相比，就象一个稳健的好棋手和一个神童对局。老杜兰啊。再见见杜兰倒不错。等这次行动之后，他将在乐爵饭店见到杜兰。对，等这次行动结束之后。看看他的表现有多好？

他又对自己说：等这次行动之后，我将在乐爵饭店见到他。他说：别哄骗自己啦。你干得完全对头。要冷静。别哄骗自己。你不会再见到杜兰了，但那也无关紧要。也别想这种事了，他对自己说。别想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啦。

也不要英雄般的克己。在这一带山区，我们不需要任何英雄般的克己的公民。你祖父在我国的内战中打了四年仗，你在这次战争中才刚打满了一年。你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你十分适合做这项工作。再说，你现在还有了玛丽亚。噢，你什么都不缺啦。你不该发愁。一支游击队和一队骑兵之间的一场小小遭遇战，算得了什么？这算不了什么。他们砍了头又怎样呢？那有

什么关系？不必大惊小怪。

祖父内战后在卡尼堡的时候，印第安人经常剥人头皮。你父亲办公室里有一个柜子，柜架上摊满了箭头，挂在墙上的军帽上斜插着苍鹰翎，皮绑腿和衬衣上有一股熏制的鹿皮的味儿，有珠子装饰的鹿皮鞋摸上去十分柔软，这一切你还记得吗？靠在柜子角落里的野牛骨制的大弓，两个箭筒中装满了打猎和打仗用的箭，你用手紧紧地握住那一把箭杆时的感觉，这一切你还记得吗？

要想想这些事情。要想想具体而实际的东西。要想想祖父的马刀，亮晃晃的，擦遍了油，插在有齿纹的刀鞘里，祖父给你看经过多次打磨已经变薄的刀刃。要想想祖父的史密斯-韦森手枪，那是一支.32口径、没有扳机护圈的军官用的单发枪。枪上的扳机是你触摸到的最轻巧最顺手的，手枪总是擦遍了油，枪膛干干净净，虽然枪身上的装饰花纹全磨损了，褐色的钢枪筒和转轮被皮枪套磨得滑溜溜的。这支枪插在盖口上烙有U.S.字样的枪套里，跟擦枪工具和两百发子弹一起放在柜子的抽屉里。放子弹的纸板盒用蜡线扎得整整齐齐。

你可以从抽屉里把手枪拿出来，握在手里。“随意摸弄”，这是祖父的说法。但是你不能拿它耍着玩，因为这是一支“不能闹着玩的枪”。

你有一次问祖父，他是否用这支枪杀过人，他说，“杀过。”

于是你说，“什么时候，爷爷？”他说，“叛乱战争期间，和战后。”

你说，“你跟我讲讲好吗，爷爷？”

他说，“我不想谈它，罗伯特。”

后来，你父亲用这支手枪自杀了，你从学校请假回家，他们

举行了葬礼。法医验尸后发还了手枪，他说，“鲍勃^①，我看你很想保存这支枪吧。本来是应该没收的，但我知道你爸爸很看重这支枪，因为他的爸爸第一次随骑兵出征就用它，整个内战期间一直随身带着，现在这支枪仍然好得很。我今天下午把它拿到外面试了试。它打得不快，但有准头。”

他把枪放在原来的柜子抽屉里，但是第二天他把它拿出来，和查布两人骑马直赶到红棚屋城北面的高地上，如今那儿筑了一条穿过山口、横跨熊齿高原、通往库克城的公路^②。那里不大有风，整个夏天山上也有积雪。他们来到一个湖边，据说这湖有八百英尺深，湖水是深绿色的。查布牵着两匹马，他呢，爬上一块岩石，探出身子，在那静静的水面看到了自己的脸，看到了自己握着枪的身形，接着握住了枪口把枪扔下去，看它在清澈的水里冒着气泡，直沉到变成表链上的小饰物那么大小，然后消失了踪迹。他接着从岩石上下来，跳上马鞍，用马刺狠刺了一下老贝斯，使它象只摇木马般弹跳起来。他策马沿湖狂奔，等它恢复了正常，他们才沿着山路返回。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处理这支旧枪，鲍勃，”查布说。

“这样，往后我们就不用再谈它啦，”他说。

他们就此再也没谈过这支枪，那就是祖父的除了马刀之外的腰佩武器的结局。他把那把马刀和他自己的其他物品仍然放在米苏拉的箱子里。

他想：我不知道祖父会怎样看待这眼前的情况。人人都说祖父是个了不起的军人。他们说，要是那天他跟卡斯特在一起，决

① 鲍勃为罗伯特的爱称。

② 红棚屋城在蒙大拿州南部，该公路一直朝西南，通过州界上的熊齿山口，往西通到美国风景区黄石公园东北角的库克城。

不会让卡斯特陷入包围的。他怎能没看见小巨角河边洼地上那些印第安人棚屋的炊烟和尘土呢？除非那天早晨有浓雾，可是实际上并没有。^①

但愿在这儿的是我祖父，而不是我。噢，也许明天晚上我们又都可以在一起了。如果真有所谓“来世”这种鬼玩意儿——他想，这肯定是没有的——我当然想跟他谈谈，因为有很多事情我想弄弄清楚。我现在有权问他了，因为我自己也必须做同样的事了。看来他现在不会计较我发问了。我从前没有权利问他。他不肯告诉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了解我。然而现在我想，我们该谈得拢了。我希望现在能和他谈谈，听听他的意见。妈的，即使不想征求他的意见，我也希望跟他谈谈。在我们这样的人之间竟隔着这种时间的距离，真不象话。

他一边想，一边认识到，如果真的能见面，他和他祖父俩都会为他父亲在场而感到非常难堪。他想，任何人都有权自杀。但是这样做不是好事。我理解这种行为，但是并不赞成。这就叫窝囊。可是你真的理解它吗？当然，我理解它，但是。是啊，但是。一个人得钻进了牛角尖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他想：唉，真要命！但愿祖父在这里就好了，哪怕来一个小时也行。我仅有的一点气质也许是他通过那个滥用手枪的人传给我的。也许那是我们三代之间唯一的共通点。但是，妈的。真他妈的，但是我只指望这时间上的间隔不是那么长，这样我就能从他那里学到父亲决不会教给我的东西了。是不是他当初必须

① 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 1839—1876）在内战中为北军立下了出色战功。内战后经常率领部队在密西西比河西向夏延族和苏族印第安人的区域进犯。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在蒙大拿州南部边界小巨角河边发现有个印第安营地，没有觉察对方人数众多，就贸然分兵三路出击，结果他自己率领的二百多人全部在一坡地上被杀。

经受、克服和终于在四年的南北战争和后来对印第安人的战斗（当然，这实在不大可能引起很大的恐惧）中彻底摆脱的恐惧，使我父亲成了一个懦夫，正如斗牛士的儿子几乎都是懦夫一样呢？是不是这样呢？也许那些好的气质只有通过了父亲这一关才能重新发扬吧？

我决不会忘记，当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是个cobarde^①时，我感到多么难受。说下去吧，用英语说：懦夫。说出来就轻松些了，而且用外国话来骂人是狗娘养的，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他也不是什么狗娘养的。他仅仅是个懦夫，这是人生的最大不幸。因为如果他不是懦夫，他就会挺身反抗那个女人，不让她欺侮他。我不知道如果他娶了另一个女人，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是你永远无法知道的，他想，不禁露齿笑笑。也许她身上的蛮横劲儿有助于补充父亲所不足的地方。你呀，别太激动吧。等你干完了明天的事，再提什么好气质那一套吧。别过早地自高自大啦。再说，根本不能自高自大。我们要瞧瞧你在明天能表现出什么气质。

他可又想起祖父来了。

“乔治·卡斯特不是个聪明的骑兵领袖，罗伯特，”他祖父说。“他甚至谈不上是个聪明人。”

他记得，红棚屋城他家弹子房墙上挂有一张旧的安休塞-比施的石版画，画的是穿着鹿皮衫的卡斯特，黄色的鬃发在风中飘拂，手握军用左轮枪站在山上，苏族印第安人正在包围拢来。对这样一位英雄，他祖父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使他感到愤慨。

① 西班牙语：懦夫。

“他就是有陷入困境再摆脱困境的极大本领，”祖父接着说，“但在小巨角河他陷入了困境，却无法脱身了。”

“而菲尔·谢里登却是个聪明人，杰布·斯图尔特也一样。但约翰·莫斯比才是历来最出色的骑兵领袖。”

他在米苏拉的箱子里的物品中有一封菲尔·谢里登将军写给老“骑死马”基尔帕特里克^①的信，信上说他祖父是个非正规骑兵队的领袖，比约翰·莫斯比更出色。

他想：我应该跟戈尔兹谈谈我的祖父。他也许从没听人说起过吧，也许连约翰·莫斯比也从没听说过。英国人都听说过他们，因为他们不得不比欧洲大陆上的人们更多地研究我们的南北战争。卡可夫说过，在这次行动之后，要是我愿意，可以进莫斯科的列宁学院。他说，要是我愿意的话，还可以进红军的军事学院。我不知道祖父会对此有什么想法？祖父嘛，一辈子从没有意地和民主党人同坐一桌。

他想：得了，我不想当军人啊，这我知道。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我只想要我方打赢这场战争。他想：我看哪，真正的好军人真正擅长的除了打胜仗以外，别无所长。这看法显然是不对的。瞧拿破仑和威灵顿。他想：你今天晚上多蠢啊。

他的思想通常是个非常好的伴侣，今夜对他祖父的回忆就是如此。接着对他父亲的回忆使他沮丧。他理解父亲，原谅他的一切，可怜他，但为他感到羞愧。

他对自己说：你最好还是什么也别想。你不久就要和玛丽亚在一起，你就不用想了。如今事事都落实了，最好的办法就是

^① 基尔帕特里克(Hugh Kilpatrick, 1836—1881)为北军将领，在一八六四年谢尔曼将军从亚特兰大向萨凡纳港的进军中，担任骑兵司令。

什么也别去想了。当你使劲想一件事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你的脑子就象个失去了负重的飞轮那样越转越快。你最好还是别想。

他想，但是还得假设一下。假设飞机投弹的时候，炸毁了那些反坦克炮，把阵地炸得稀巴烂，那些老坦克车在什么山上翻了个儿，而老戈尔兹能把十四旅那批酒鬼、流浪汉、无赖、狂热分子和蛮汉赶在前面冲锋陷阵（我知道戈尔兹另一个旅里的杜兰的部下都是好样的），这一来我们明天晚上就能攻占塞哥维亚了。

对。他对自己说，只要这样设想一下就行了。他对自己说，我能到拉格兰哈就心满意足了。他忽然心里完全明白：可是你得把那座桥炸掉。这计划不会取消。因为你刚才的设想正是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想象中的这次进攻的可能结果。对，你必须炸掉这座桥。他知道这不会错。不管安德烈斯遇到什么情况，都无足轻重。

他独自怀着愉快的心情在黑暗中从小路上下来，因为今后四小时里该做的事都安排好了，并且由于回想到具体的细节后产生了信心，因此这时想起他肯定非炸桥不可，使他简直感到舒坦了。

那种犹豫，那种扩大的犹豫情绪，就象一个人由于搞错了可能的日期，不知道客人是否真的会来参加晚会一样——这种情绪是从他打发安德烈斯给戈尔兹送报告后一直存在的——现在全消失了。他现在确信这个重要的日子不会被取消。他想：能确信有多好啊。能确信总是大好的事。

第三十一章

他俩又一起躺在睡袋里，这是最后的一夜，夜已很深了。玛丽亚紧偎在他身上，他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想，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

“罗伯托，”玛丽亚柔情地说，吻他。“真惭愧。我不愿让你失望，可是一碰就痛，痛得厉害。看来我对你没多大用处了。”

“总是会痛的，”他说。“不，兔子，没什么。我们不做任何会引起痛苦的事。”

“我不是指那回事。是这样，我想叫你快活，可是做不到。”

“没关系。一会儿就会好的。我们躺在一起，就结合在一起了。”

“话虽这么说，可我感到惭愧。我想这是以前人家糟蹋了我才引起的。不是你我的关系。”

“我们别谈这个了。”

“我也不愿谈。我想说的是，最后一夜叫你失望，我受不了，因此就想为自己找借口。”

“听我说，兔子，”他说。“这种事一会儿就会好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想，对最后一夜来说，这兆头不妙。

接着他过意不去地说，“紧紧挨着我，兔子。我喜欢你在这儿黑夜里贴在我身边，就象我喜欢和你做爱一样。”

“我真惭愧，我原以为今夜又会和那次从‘聋子’那儿下山后在高地上那样的。”

“什么话！”他对她说。“可不会每次都一样。这样和上一次那

样,我都喜欢。”他撇开失望的心情,撒了个谎。“我们静静地在—起,我们睡觉。我们一起聊聊吧。我从谈话中知道你的情况极少。”

“我们讲讲明天,讲讲你的工作好吗?我要学得聪明点,帮你做事。”

“不,”他说着在睡袋里彻底放松了筋骨,静静地躺着,脸颊贴在她肩上,左臂枕在她头下。“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谈明天,也不谈今天发生过的事。我们在这里不谈伤亡的事儿。明天非干不可的事,到时候干就是了。你不觉得害怕?”

“哪里的话!”她说。“我老是害怕。可现在我尽替你害怕,所以想不到自己了。”

“别这样,兔子。这种事我遇到得多啦。有的比这次更糟,”他撒了个谎。

接着,他突然放纵自己,听任自己沉溺在幻想中,他说,“我们谈谈马德里,谈谈我们在马德里的情景吧。”

“好,”她说。“唉,罗伯托,我让你失望了,真对不起。有什么别的事我可以替你做吗?”

他抚摸着她的头,吻她,然后舒适地偎依在她身边,倾听着夜籁。

“你可以跟我谈谈马德里,”他说,并想:我要为明天养精蓄锐。明天我需要全部的精力。现在松针地上不会象我明天那样地需要精力。《圣经》上说谁把它遗在地上了?俄南。他想:俄南结果怎么样?我想不起还听说过关于俄南的别的情况。^① 他

① 俄南的哥哥死去了,他父亲对他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圣经·创世记》第三十八章第八到十节。)

在黑暗中微笑着。

接着他又听任自己沉溺在幻想中，感到沉溺在幻想中的逸乐，就象夜间迷迷糊糊地接受性爱，只感到接受的快感。

“我亲爱的，”他说，吻着她。“听着，有天晚上我在想马德里，想我怎样到了那儿，把你留在旅馆里，而我呢，赶到俄国人住的饭店里去看朋友。不过那不对头，我不会把你留在旅馆里的。”

“干吗不呢？”

“因为我要照顾你。我永远也不离开你。我要跟你一起到民政局去领证明。然后跟你一起去买需要的衣服。”

“不需要多少衣服，我自己会买。”

“不，要很多，我们一起去，买些好的衣服，你穿了一定很漂亮。”

“我宁愿我们待在旅馆的房间里，打发别人去买。旅馆在哪儿？”

“在卡廖广场。我们要在那家旅馆的房间里待很长的时间。有一张宽阔的床和干净的床单，澡盆里有热的自来水，还有两个壁柜，一个放我的东西，一个归你用。敞开的窗子又高又宽，窗外街上有喷泉。我还知道几家挺好的饭店，那是没有执照的，但饭菜很好，我还知道几家店铺可以买到葡萄酒和威士忌。我们要在屋里放些吃的，饿了就吃，还有威士忌，想喝的时候我就喝，我还要给你买些白葡萄酒。”

“我想尝尝威士忌。”

“不过威士忌不容易搞到，如果你喜欢，还是喝白葡萄酒。”

“威士忌你留着自己喝吧，罗伯托，”她说。“喂，我真爱你。爱你和爱我喝不到的威士忌。你真小气。”

“好，你就喝一点吧。不过女人喝这种酒不合适。”

“我一向可只享用到对女人合适的东西，”玛丽亚说。“那么我在床上仍旧穿我的结婚衬衫吗？”

“不。要是你喜欢，我还要给你买各式各样的睡衣、睡裤。”

“我要买七件结婚衬衫，”她说。“一星期当中每天换一件。我要给你买一件干净的结婚衬衫。你洗过自己的衬衫吗？”

“有时候洗。”

“我什么都要洗得干干净净，我要象在‘聋子’那儿那样，给你斟威士忌，在里面兑水。我要给你搞些橄榄、咸鳕鱼、榛子，给你下酒吃。我们要在房间里住一个月，一步也不离开。如果我能好好迎合你，”她说到这里，突然不高兴了。

“那没关系，”罗伯特·乔丹对她说。“真的没关系。可能是你那里以前受过伤，结了疤，现在又碰伤了。这情况是可能的。这一类情况过些时候都会好的。要是真有问题，马德里有的是好医生。”

“前几次挺好嘛，”她恳求似地说。

“那说明以后也会挺好。”

“那么我们再谈谈马德里吧。”她把两腿曲在他的腿中间，头顶擦着他的肩头。“我一头短头发，那么难看，会不会替你丢人？”

“不会。你很可爱。你有一张可爱的脸，顾长的身子又美丽又轻盈，金红色的皮肤很光滑，人人都会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什么话，把我从你那里夺走！”她说。“没有另一个男人能碰我，除非我死了。把我夺走，休想！”

“不过很多人会有这种打算的。你等着瞧吧。”

“他们会看到，我多么爱你，要是碰我的话，就象把手伸进一锅熔化的铅里那样危险。可你呢？你见了跟你一样有文化的漂

亮女人，你不会替我害臊吗？”

“决不。我要跟你结婚。”

“由你吧，”她说。“不过，我们已经取消了教堂，我看不结婚关系也不大。”

“我觉得我们还是结婚好。”

“由你吧。你听着。要是别的国家还有教堂，也许我们可以在那儿结婚。”

“我的国家里还有教堂，”他告诉她。“要是你觉得有意思，我们可以在那儿的教堂里结婚。我从没结过婚。没有问题。”

“你从没结过婚，我很高兴，”她说。“我还高兴的是，你见多识广，告诉了我那些事，这说明你跟很多女人亲近过。比拉尔对我说过，只有这种男人才能做丈夫。你现在可不会跟别的女人胡闹了吧？因为这准会叫我活不下去。”

“我从来没有跟很多女人胡闹过，”他真心实意地说。“在遇到你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不会深爱一个女人的。”

她抚摸着他的脸颊，接着双手搂住他的头。“你一定搞过很多女人。”

“没有爱过她们。”

“听着，比拉尔跟我讲过一件事——”

“说吧。”

“不。还是不说的好的。我们再谈谈马德里吧。”

“你刚才想说的是什么事？”

“我不想说了。”

“是要紧事，也许还是说的好。”

“你认为要紧吗？”

“对。”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怎么知道要紧呢？”

“从你的态度看得出来。”

“那我不瞒你了。比拉尔告诉我说，我们明天都要死了，还说你跟她一样清楚，可是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她说这话不是批评，而是钦佩你。”

“她是这样说的吗？”他说。他想，这个疯婊子。他说，“又是她那套吉普赛鬼名堂。那是市场上的女摊贩和泡在咖啡馆里的胆小鬼嘴里的胡话。她奶奶的鬼话。”他觉得胳肢窝里在出汗，汗水从胳膊和腰间淌下来。他心里嘀咕着，“敢情你害怕了，呃？”然后说出口来，“她这个迷信的婊子，满嘴胡话。我们再谈马德里吧。”

“那么你不知道这回事？”

“当然不知道。别谈这种废话了，”他说，用了一个更强烈更难听的词儿。

于是他再谈起马德里来，但这次没法再体会到身历其境的感觉了。现在他只不过是在对他的女朋友、对自己撒谎，来消磨这战斗前的一夜，这他自己也明白。他喜欢这么做，但是接受了幻想而得到的乐趣却一点也没有了。然而他还是又讲开了。

“我想过你的头发，”他说。“我想过我们要拿它怎么办。你瞧，现在已经满头都长满了，就象动物身上的毛那样长，摸着很舒服，我非常喜欢。这头发很漂亮，我用手一捋，头发平伏之后又竖起来，就象风中的麦浪。”

“用手摸摸吧。”

他摸着，把手留在头发上，继续贴着她的脖子说话，觉得自己的喉咙哽塞起来了。“不过，我们在马德里可以一起上理发店，让理发师照我的样子把两边和后面的头发剃掉，修得整整齐齐，

这样，在头发长长之前，在城里走动看起来好多了。”

“我会看起来象你了，”她说，紧紧抱着他。“那我一定不再改变发型了。”

“不。头发会不断地长。那只不过是为了在头发长长之前弄得整齐些。头发长长要多久？”

“很长很长吗？”

“不。我是说，长到齐肩。我要你留的就是这样的发型。”

“象电影里的嘉宝那样？”

“对，”他声音哽塞着说。

这时，那种身历其境的感觉又一下子兜上心头来了，他要尽情地享受它。这感觉这时控制了他，他又沉溺在其中，接着说下去。“头发会这样直垂在肩上，下端是髻曲的，好象海浪一样，颜色好象熟透的麦子，你的脸是金红色的，有了金色的头发和金色的皮肤，你的眼睛也只能是金色的，里面有黑色的瞳仁。我要让你仰起头来，凝视着你的眼睛，紧紧拥抱你——”

“在哪儿？”

“在任何地方。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你的头发长长要多久？”

“不知道，因为以前从没剪过。不过，我想六个月就会长到耳朵下面，要一年才能长到你喜欢的样子。你可知道我们先做些什么？”

“跟我讲讲。”

“我们要在我们那个了不起的旅馆里，在你说的那个了不起的房间里干干净净的大床上，我们一起坐在那张了不起的床上照着大柜子上的镜子；镜子里是你、是我，跟着我要这样对着你，胳膊这样搂着你，跟着这样吻着你。”

他们在夜色里静静地紧偎在一起，火热地、一动不动地紧偎在一起，紧紧地搂着。罗伯特·乔丹抱着她，同时紧抱着他明知不会有的一切，但他自得其乐地说下去，“兔子，我们不要老是住在那家旅馆里。”

“干吗不？”

“我们可以在马德里静安公园旁边的街上租一套公寓。我认识一个在革命前出租公寓的美国女房东，我能按以前的租金标准租到这种公寓。那儿有的房间面对公园，从窗口能望到公园的铁栏杆、园地、卵石小路、路边的绿草地、荫翳的树木和很多喷泉。栗树现在一定开花了。在马德里，我们可以在公园里散步，要是湖里现在又有水了，可以在湖上划船。”

“湖里怎么会没有水呢？”

“他们是在十一月份把水抽掉的，因为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会暴露目标。不过，我想现在又有水了。可是不一定。不过，即使湖里没有水，我们可以在公园里别的地方散步；有一个部分象森林一样，世界各地的树木都有，每棵树上都有标签，上面注明树的名称和出处。”

“我可情愿上电影院，”玛丽亚说。“不过这些树听起来很有意思，如果能记住的话，我要跟你一起把树名全记下来。”

“那儿可跟博物院不一样，”罗伯特·乔丹说。“树木是自然生长的，公园里有小山，有一部分象原始森林。公园南面有一个书市，人行道旁有成百个卖旧书的书摊，革命开始以来书籍很多，那是有人从挨到轰炸的住家和法西斯分子家里偷来了，拿到书市上来卖的。我在马德里只要有时间，可以每天整天都消磨在这些书摊上，就象革命前有一度那样。”

“你去逛书市的时候，我在公寓里忙我的事，”玛丽亚说。“我

们有钱雇一个佣人吗？”

“当然。我可以找旅馆里的佩特拉，要是你喜欢她的话。她菜做得不坏，人又干净。她替几个新闻记者做饭，我在他们那里吃过饭。他们房间里有电炉。”

“你要她就行，”玛丽亚说。“要不，我去找一个。不过你为了工作，不是要常常出去的吗？干这种工作，他们不会让我陪你一起去的。”

“说不定我能在马德里找到工作。这种工作我已做了很久，革命一开始我就打仗。现在他们可能会让我在马德里工作了。我从没提过要求。我一直在前线，或者干这种工作。”

“你可知道，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也没有要过什么，除了革命和赢得这场战争以外，也没考虑过别的。说真的，我的志向是非常纯正的。我干了很多工作，现在爱上了你，”他这时说的话把一切不会发生的事都包括在内了，“我爱你，就象我爱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我爱你，就象我爱自由，尊严和人们要求工作、不愿挨饿的权利。我爱你，就象我爱我们所保卫的马德里，就象我爱所有那些牺牲的同志。很多同志牺牲了。很多，很多。你没法想象有多少。但是我爱你，就象我爱世界上我最爱的东西，而我爱你超过了这一切。我是多么地爱你啊，兔子。我无法用话向你表达，而我现在说的话，仅仅告诉你一点儿。我从没娶过妻子，你现在就是我的妻子，我很幸福。”

“我要尽力做你的好妻子，”玛丽亚说。“我明摆着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我一定要弥补这个缺点。如果我们住在马德里，很好。如果我们不得不住在别的地方，也好。如果我们不定居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可以跟你在一起，更好。要是我们到你的国家去，我要学讲英国话，象讲得最好的人一样。我要学他们的一

举一动，他们怎么样，我也怎么样。”

“你会变得非常可笑。”

“当然啦。我会出差错，不过你会对我指出，我就决不犯第二遍，或者只犯两遍。在你的国家里，如果你想吃我们的饭菜，我可以给你做。我要到学校里去学怎样当妻子，如果有这种学校的话，还要好好学。”

“有这种学校，不过你用不着去学。”

“比拉尔对我说过，她认为你的国家里有这种学校。她在杂志上看到过。她还对我说，我一定要学讲英国话，还要讲得地道，千万不能替你丢脸。”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这话的？”

“今天我们包扎东西的时候。她经常跟我讲做你的妻子该做些什么。”

罗伯特·乔丹想，看来她也打算去马德里。他说，“她还说些什么？”

“她说，我应该把自己当做一个斗牛士，一定要保养自己的身体，保持苗条。她说这是很要紧的事。”

“不错，”罗伯特·乔丹说。“你在今后很多年里不用为这个担心。”

“不。她说，我们这个种族的人必须时时注意，因为会突然发胖。她对我说，她以前跟我一样苗条，不过那时候妇女是不锻炼身体的。她教我该怎样锻炼，不能吃得太多。她教我什么东西不能吃。可我已经忘了，还得再问问她。”

“马铃薯，”他说。

“对了，”她接着说。“正是马铃薯，还有油炸的东西。我还跟她讲到痛的事，她说千万不能对你说，只能忍住痛，不让你知道。”

可是我对你说了，因为我永远不愿对你撒谎；我也很害怕，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再不能双方都快活了，以为在高地上那回事没有真的发生过。”

“告诉我是对的。”

“真的？因为我感到惭愧，而且只要你喜欢，我什么都愿意做。比拉尔跟我讲了该为自己丈夫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用做。我们的爱情是共同的，我们要保持它、爱护它。我爱这样躺在你身边，触摸到你，知道你真的在我身边；等你复元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可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呢？她跟我讲过这种事的。”

“没有。我们的需要是共同的。我的需要不能和你分开。”

“这样说我觉得好多了。不过始终别忘了，你喜欢的事我一定做。你可一定要对我说，因为我不懂的事太多了，她对我讲的，我很多都弄不明白。我不好意思问，她呢，懂得又多面又广。”

“兔子，”他说。“你真了不起。”

“哪里话！”她说。“我们正在拔营，打行李，准备战斗，而另一场战斗正在山上进行，在这样的一天里要学会做妻子的一切可是难事啊。要是我出了大差错，你一定要对我说，因为我爱你。很可能我会记错事情，她跟我讲的很多事情复杂得很哪。”

“她还跟你讲了些什么？”

“讲的事情很多，我记不住了。她说，我可以把我受到糟蹋的事告诉你，要是我再记起来的话；因为你是个好人，已经了解了全部真相。不过最好还是永远别提，除非这件事又跟以前那样象恶魔似地缠着我，那么跟你讲讲能使我摆脱它。”

“现在还使你难受？”

“不。自从我们第一次在一起以来，我觉得这事仿佛从没发生过。可是一直在为我爹妈难受。这种心情可是永远抹不掉的。不过既然我要做你的妻子，就应该为了尊重你，让你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我从来也没有屈从过任何人。我总是挣扎，他们总是要两个人或更多的人才能糟蹋我。一个人坐在我头上抓住了我。我把这告诉你是为了尊重你。”

“我尊重的是你。别说了。”

“不，我说的尊重是你为你的妻子应该感到的。还有一件事，我父亲是当地的村长，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我母亲也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是个好天主教徒，因为我父亲拥护共和国的政治观点，他们把母亲和父亲一起枪杀了。我眼看着他俩被打死，当时，父亲站在村里的屠宰场墙边，在被枪杀前说：‘共和国万岁’。

“我母亲也靠那堵墙站着，她说：‘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我希望他们也把我杀了，我打算说：‘共和国万岁，爹妈万岁，’可是他们没开枪，而是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

“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因为它跟我们有关系。在屠宰场上枪杀之后，他们把我们这些看枪毙而没被枪杀的亲人从屠宰场带到一座陡峭的山上，来到镇上的大广场。所有的人几乎都在哭，除了有些看得发呆的人，他们眼眶里的眼泪已经干了。我也哭不出来。枪杀的时候我没注意其他情况，因为只看着父亲和母亲，而母亲说的‘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这句话在我头脑里象是一声号叫，再不会消失，而是不断回响着。我母亲不是共和分子，所以不说‘共和国万岁’，而只是高喊我父亲万岁，他那时栽倒在她脚边，脸朝下躺着。

“可是她说得话声很大，大得象尖叫，他们就开枪，她倒下了。我想离开队伍扑到她身边去，可是我们都被缚在一起。开枪

的是民防军，他们在那儿等着还要枪毙别人，这时长枪党党员们把我们象牲口般赶上山去，把民防军留在后面，支着步枪，墙脚下全是尸体。我们这些姑娘和妇女的手腕被缚着，连成一串，他们把我们一群人赶上了山，穿过街道来到广场。到了广场上，他们在镇公所对面的理发店门口停下了。

“那时有两个人瞧瞧我们，一个说，‘她是村长的女儿，’另一个说，‘拿她开头。’

“他们割断了我手腕上的绳子，有一个对其他人说，‘把其他人用绳子结好。’这两个人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拖进理发店，提起来，按在理发椅上不让动。

“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看到了那些抓住我的人的脸，看到了另外三个俯在我身上的人的脸，这些脸，我一个也不认得，但是在镜子里我看到了自己和他们，而他们只看到我。那样子就象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坐了个人，有很多牙科医生，他们都发了疯。我几乎没法认出自己的脸了，因为我伤心得脸都变了样，但我望着它，知道是自己的脸。然而我伤心得不感到害怕，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只是伤心。

“那时我的头发梳两条辫子，我从镜子里见到有个人抓住了一条辫子猛拉，这样在伤心之外突然使我痛得难熬。他接着用剃刀齐头发根把辫子割了下来。我看到自己只剩了一条辫子和另一条辫子的残根。他接着没有再拉，就把另一条辫子也割了，剃刀在我耳朵上划破了一道小口子，我见到上面在流血。你用指头能摸到伤疤吗？”

“能。可是别谈这事了，好吗？”

“没什么。我不谈那件不幸的事。他就这样用剃刀把我的辫子齐头发根割了下来，其他人哈哈大笑。我简直没感觉到耳朵

上的伤口痛。他接着站在我面前，用辫子抽打我的脸，而其他两个人抓住了我，他说，‘这就是我们制造赤色尼姑的方法。这就叫你明白，怎样和你的无产阶级兄弟们打成一片。红色基督的新娘子！’

“他用我自己的辫子一遍又一遍地抽打我的脸，然后用辫子勒住我的嘴，紧扎住我的脖子，在脑后打了个结，这样塞住了我的嘴。两个按住我的人哈哈大笑。

“看到的人都哈哈大笑。我在镜子里看到他们笑的样子，我哭起来了，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枪杀使我麻木得哭不出来。

“接着，那个堵我嘴的人用理发推子在我头上到处乱推，先从前额开始，一直推到后脑脖子根，然后在头顶上横推过去，满头都推到了，耳朵后面的地方都没漏掉。他们抓住了我，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看到替我剃头发的全部经过。剃过之后，我真没法相信，我哭了又哭，但我没法不看我自己脸上的那副可怕模样，嘴张着，勒着辫子，推子经过的地方，头发全光了。

“拿推子的人剃完了头，在架子上拿了瓶碘酒（他们把理发师也枪杀了，因为他是工会会员，他就躺在店门口，他们拖我进来的时候，把我从他身上提了过去），用碘酒瓶里的玻璃棒擦我耳朵上的伤口，在我的伤心和惊恐之中，加上了这种零星的痛苦。

“接着他站在我面前，拿碘酒在我前额上写了 U. H. P. 三个字母，就象美术家那样慢条斯理地画着。我在镜子里望着他的一举一动，不再哭了，因为我父亲和母亲的遭遇已使我伤心之极，我自己的遭遇无足轻重了。这我心里明白。

“那个长枪党写完后，后退了一步，望着我，检查他写得怎么样，接着放下碘酒瓶，拿起推子说，‘下一个。’于是他们紧紧拽住

了我两条胳膊，把我从理发店里拖出去。那理发师还是仰天躺在门口，脸色死白，我在他身上绊了一交，当时有两个人正把我最好的朋友孔塞普西昂·格拉西亚拖进来，我和她几乎撞个满怀。她当时看见了我却不认得我了，后来才认出是我，就尖声大叫起来。他们推推搡搡地把我带进广场对面村公所的大门，一直上楼到我父亲的办公室，把我按在长沙发上。这一路上，我始终听到她的尖叫声。他们就是在那儿干下那伤天害理的事来的。”

“我的兔子，”罗伯特·乔丹说，尽量温柔地紧搂着她。可是他满腔仇恨，怒不可遏。“别再说了。别再跟我说了，因为现在仇恨使我受不了啦。”

她在他怀里变得僵硬、冰冷，她说，“好。我再也不谈这事了。可他们是坏人，如果可能的话，我要跟你一起杀他们几个才解恨。不过我刚才告诉你，只是为了尊重你，因为我要做你的妻子。为了要你明白。”

“你告诉了我，我很高兴，”他说。“明天走运的话，我们可以杀很多人。”

“我们要杀长枪党吗？坏事是他们干的啊。”

“他们不打仗，”他阴郁地说。“他们在后方杀人。和我们交锋的不是他们。”

“难道我们没办法杀他们吗？我真想杀几个这种人。”

“这种人我杀过，”他说。“今后我们还要杀。炸火车的时候我们杀过。”

“我想和你一起去炸一次火车，”玛丽亚说。“那次炸火车后，比拉尔把我带走时，我有点儿疯疯癫癫了。她跟你讲过我那时的情形吗？”

“讲过。别谈这事了。”

“我当时头脑昏昏沉沉，只会哭。可是我还有一件事得告诉你。我非说不可。说了你也许不会娶我了。可是，罗伯托，要是你不愿意娶我，那么我们能不能还是一直在一起呢？”

“我要娶你。”

“不。这件事我忘了。也许你不应该娶我。我可能永远不会给你生儿育女了，因为比拉尔说，要是会生育，他们糟蹋我之后我就会生了。这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喂，我怎么会把这件事忘了。”

“这没有关系，兔子，”他说。“首先，情况可能还不是这样。这得由医生来断定。其次，我不希望把儿女带到如今这样的世界上来。此外，我要把我的爱全部给你。”

“我想给你生儿育女，”她对他说。“要是没有我们的子女跟法西斯打仗，这世界怎么会变好呢？”

“你啊，”他说。“我爱你。你听到吗？现在我们得睡了，兔子，因为早在天亮前我就得起身，这个月份，天亮得很早啊。”

“那么我说的最后一件事不碍事吗？我们仍旧可以结婚？”

“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我现在娶你。你是我的妻子。睡吧，我的兔子，因为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

“那么我们要真的结婚吗？不只是说说的？”

“真的。”

“那我睡了，如果醒来再想这件事吧。”

“我也这样。”

“晚安，我的丈夫。”

“晚安，”他说。“晚安，妻子。”

他听到她平稳而有规律地呼吸着，知道她睡熟了，就躺着不入睡，一动也不动，怕惊醒她。他躺在那儿回想她没有对他讲到

的那部分情事，心怀愤恨，高兴的是明天就要杀人了。他想，可是我个人千万别参加杀人啊。

然而我怎能不杀人呢？我知道，我们对他们也干下了可怕的事，但那是因为我们的人没受过教育，不懂得好歹。他们可是有意而深思熟虑地干的。那些作恶的人是他们的教育所产生的最后一批尖子。那些人是西班牙骑士精神的精华。西班牙人曾经是什么样的民族啊。从科尔特斯、皮萨罗、梅嫩德斯·德阿维拉^①一直到恩里克·利斯特和巴勃罗，这批婊子养的。多了不起的民族啊。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出色、更邪恶的人了。再没有比他们更善良、更残暴的人了。谁理解他们呢？我不理解，因为如果我理解他们，就会宽恕他们的一切了。理解就是宽恕。这话不对。宽恕的精神被过分地夸大了。宽恕是基督教的观念，而西班牙从来不是基督教国家。他们的教会里一直有其独特的偶像崇拜。崇拜另一个圣处女嘛。我看正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才要糟蹋他们敌人的处女。当然，这跟他们、跟西班牙宗教狂热分子的关系要比跟人民的关系更深。人民逐渐背弃教会，因为教会和政府合而为一，而政府一直是腐败的。这是宗教改革运动从未波及过的唯一的国家。现在他们正在为宗教审判付出代价了，错不了。

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使你不为你的任务发愁。这比装聋作哑好得多。天哪，今晚他装聋作哑得也够呛啦。比拉尔可是整天在装聋作哑。没错儿。如果他们明天被打死又怎么样呢？只要他们把炸桥的事办妥了，死又有什

^①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西班牙殖民者，于十六世纪分别以残酷的方式征服在今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的印第安人的帝国和在今秘鲁的印加帝国。梅嫩德斯·德阿维拉应为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也是西班牙殖民者，于一五六五年被任命为古巴和佛罗里达总督，率舰队赴新大陆，在今美国东南部开辟殖民地。

么关系？那是他们明天要干的全部事情。

死没有关系。你不可能无限期地老是干炸桥的事儿啊。不过你也不会长生不死。他想：也许我在这三天里已经享受了我的一生。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我们这最后一夜不这样度过就好了。但是，最后一夜总是不好的。最后的事物都是不好的。不，最后的话有时是好的。“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是好的。

他知道这是好的，因为他在心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浑身感到激动。他抬起身体，吻吻熟睡着的玛丽亚。他用英语悄没声儿地说：“我要娶你，兔子。我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

第三十二章

同一天晚上，马德里的乐爵饭店里有很多人。一辆汽车开到饭店的停车处，前灯上涂着蓝色墙粉；车里走出一个矮小的男人，穿着黑马靴、灰马裤和一件钮扣一直扣到领子的灰色上衣。他开门时给两个哨兵还礼，向坐在门警桌边的一个秘密警察点点头，然后跨进电梯。大理石门厅的大门里面两边各有一把椅子，坐着两个哨兵。小个子走过他们身边来到电梯门口时，他们只抬眼望望。他们的任务是检查陌生人，摸摸身体两侧、后裤袋，看有没有人夹带手枪进来，如有带枪的就交给门警加以盘问。但他们很熟悉这个矮小的穿马靴的人，他走过时他们简直头都没抬。

他走进他在乐爵饭店的房间时，里面挤满了人。大家坐的坐、站的站、交谈的交谈，就象在一般客厅里一样，男男女女都在喝伏特加、威士忌苏打和啤酒，从大酒罐倒到小玻璃杯里。其中四个男人穿着制服。其他人有的穿防风外衣，有的穿皮外套，四

个女人中三个是普通装束，另一个穿着剪裁简单的女民兵制服和裙子，脚上穿高统靴，这个黑黑的女人骨瘦如柴。

卡可夫一进房间，就向那穿制服的女人走去，向她鞠躬，跟她握手。那是他妻子，他对她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清的俄国话，他进来时那种傲慢的眼神暂时消失了。然而当他看到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他情妇的时候，那种眼神又流露出来了。她长着赤褐色的头发，表情懒洋洋的。他迈开短小、果断的步子走到她跟前，鞠躬，握手，那样子，谁都不会弄错是在模仿他向自己妻子打招呼的方式。他在房里走过去时，他妻子并不目送着他。她跟一个高高的、漂亮的西班牙军官站在一起，正用俄国话交谈着。

“你那了不起的情人有些发胖了，”卡可夫对那姑娘说。“战争快进入第二个年头了，我们的英雄们全都发胖啦。”他并不对他提到的那个男人望望。

“你丑死了，连癞蛤蟆都要忌妒，”姑娘愉快地对他说。她说的是德国话。“明天我可以跟你去参加进攻吗？”

“不。再说，也没有这回事。”

“谁知道了，”姑娘说。“别那么神秘啦。多洛雷斯^①打算去。我要跟她，或者跟卡门去。很多人都要去。”

“谁愿意带你去，就跟谁去，”卡可夫说。“我可不带。”

接着他转身对着她，严肃地问，“是谁告诉你的？说得明确些。”

“理查德，”她同样严肃地说。

卡可夫耸耸肩膀走开了，由她一个人站着。

“卡可夫，”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用一种没好气的声音招呼

① 即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芭露丽，多洛雷斯为她的名字。

他说，此人一张灰脸肥胖松弛，眼睑浮肿，下嘴唇耷拉着。“你听到好消息了吗？”

卡可夫走到他身边，那人说：“我还是刚听说的，不到十分钟。妙不可言。法西斯分子在塞哥维亚附近成天自相残杀。他们不得不用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来镇压叛乱。他们下午用飞机轰炸自己的部队了。”

“是吗？”卡可夫问。

“不假，”那眼睑浮肿的人说。“这消息是多洛雷斯亲自带来的。她带着消息到这儿来，她容光焕发，那副高兴劲儿，我可从没见过。这消息的真实性可以从她脸上看出来。那张伟大的脸——”他快乐地说。

“那张伟大的脸，”卡可夫声调平板地说。

“你听到她的话就好了，”眼睑浮肿的人说。“她透露这消息时的神情是人间所无的。你从她的声音能断定她讲的是事实。我根据这个在给《消息报》写文章。当我听到这个交织着怜悯、同情和真理的伟大声音的报道时，觉得这是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她象一个真正的人民中的圣徒，身上闪耀着善和真的光辉。人们称她为‘热情之花’^①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是无缘无故的，”卡可夫声音含糊地说。“你现在就给《消息报》写吧，免得把你刚才说的美妙的导语忘了。”

“她不是可以拿来取笑的女人，哪怕象你那样的玩世不恭之徒也不能，”眼睑浮肿的人说。“要是你在这儿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表情就好了。”

“那个伟大的声音，”卡可夫说。“那张伟大的脸。写文章吧，”

① 伊芭露丽早年用的笔名后来成为大家对她的尊称。

他说。“别跟我说了。别跟我浪费你的大块文章了。现在就去写吧。”

“现在可不行。”

“你还是去写的好，”卡可夫望着他说，然后望着别处。这眼睑浮肿的人拿着一杯伏特加站在那儿，尽管眼睑象往常一样浮肿，但双眼全神贯注地盯着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美妙东西，隔了几分钟，他才离开房间去写了。

卡可夫走到另一个人身边，这人约摸四十八岁，身材矮胖，喜气洋洋，长着淡蓝色的眼睛、稀疏的金发和毛茸茸的黄胡子下一张笑嘻嘻的嘴。这人穿的是制服。他是个师长，匈牙利人。

“多洛雷斯来这儿的时候你在吗？”卡可夫问这个人。

“在。”

“都扯了些什么？”

“有关法西斯分子自相残杀的消息。是真的才美哪。”

“关于明天的流言很多。”

“真不象话。所有的新闻记者和这房里极大部分人都该枪毙，尤其是那个不值得一提的诡计多端的德国佬理查德。不管是谁，让这个市井负贩当上旅长的人都该枪毙。也许你我也该枪毙。这也有可能，”这位将军大笑着说。“可是别提醒别人啊。”

“我从来不愿谈那种事情，”卡可夫说。“那个有时上这儿来的美国人正在那边。你认得那个人，乔丹，他跟游击队在一起。他就在他们传说要发生情况的那个地点。”

“噢，那么今夜他该送一份有关这件事的报告来啦，”将军说。“他们不喜欢我到那儿去，要不然，我亲自去给你把情况弄清楚。他是跟戈尔兹干这件事的，不是吗？你明天将见到戈尔兹。”

“明天清早。”

“在事情顺利进行之前，别打扰他，”将军说。“他跟我一样讨厌你们这些杂种，虽然他的脾气好得多。”

“但是关于这次——”

“也许是因为法西斯分子在调动，”将军露齿笑笑。“好吧，让我们瞧瞧，戈尔兹能不能调动他们一下。让戈尔兹这次露一手吧。我们在瓜达拉哈拉调动过他们啦。”

“听说你也要出门，”卡可夫微笑着说，露出了坏牙齿。将军突然发怒了。

“我也要出门！现在人家议论到我头上来啦。我们大家一直就招人议论。这伙下流的长舌妇。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只要有信心，就能救得了国。”

“你的朋友普列托能守口如瓶。”

“但是他不信能胜利。^① 如果不相信人民，你怎能胜利？”

“这由你去考虑吧，”卡可夫说。“我要去睡一会儿了。”

他离开了烟雾弥漫、人们说东道西的房间，走进后面的卧室，坐在床上，脱掉靴子。他仍能听到他们在说话，于是他关上门，打开窗子。他懒得脱衣服了，因为两点钟就要动身坐车取道科尔梅那尔、塞尔赛达和纳瓦塞拉达到前线去，早晨戈尔兹将在那儿发动进攻。

^① 社会党领袖普列托这时正在政府中任国防部长，一九三八年四月调任不管部部长。一九三九年失败后成为西班牙流亡政府的一员，一九四七年到法国，成为西班牙社会党右翼领袖。本书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对共和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第三十三章

比拉尔叫醒他的时候是早晨两点钟。她的手碰到他身上，他起先还以为是玛丽亚的，就侧过身来对她说，“兔子。”等那妇人的大手摇摇他的肩膀，他才突然完全清醒过来，他一手握住放在赤裸的右腿旁的手枪柄，扳下保险，他全身也象那手枪一样的处于击发状态。

在黑暗中，他发现是比拉尔，就望望手表，表面上两根闪光的时针夹成很小的锐角指向上方，他一看才两点钟，就说：“你怎么啦，大娘？”

“巴勃罗溜啦，”大个子妇人对他说。

罗伯特·乔丹穿上裤子和鞋子。玛丽亚没有醒过来。

“什么时候走的？”他问。

“准有一小时了。”

“还有呢？”

“他拿了你的一些东西，”妇人悲伤地说。

“原来这样。拿了些什么？”

“不知道，”她对他说。“去看看吧。”

他们在黑暗中走到洞口，撩起挂毯，钻进洞里。山洞里满是熄灭了的炉灰、恶浊的空气和睡着的人们的鼻息的气味，罗伯特·乔丹跟随着比拉尔走，亮了手电，免得踩着躺在地上的人。安塞尔莫醒了，说：“时间到了？”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睡吧，老头子。”

两个背包放在比拉尔床头，床前挂着一条毯子，和山洞的其

余部分隔开。罗伯特·乔丹跪在床上，把手电光射在两个背包上，闻到了印第安人床上所发出的那种隔宿的、叫人作呕的干掉的汗的气味。每个背包上从上到下有一条长长的裂缝。罗伯特·乔丹左手拿着手电，右手在第一个背包里摸索。这背包是装睡袋的，本来不很满。现在仍旧不很满。里面的一些铜丝还在，但是装引爆器的方木盒却不见了。被拿走的还有那个装仔细包扎好的雷管的雪茄烟盒，还有那放导火线、火帽的有螺旋盖的铁罐。

罗伯特·乔丹在另一个背包里摸索。里面仍装满了炸药。也许少了一包。

他站起来，转身向着那妇人。一个人在早晨醒得太早，会有一种仿佛大祸临头般的空虚感，他现在的感觉比这要大一千倍。

“你就是这样替人家看管东西的吗？”他说。

“我睡觉的时候，头抵着包裹，一条手臂放在上面，”比拉尔对他说。

“你睡得很沉啊。”

“听我说吧，”妇人说。“他半夜里起来，我说，‘你去哪儿，巴勃罗？’他对我说，‘去撒尿，太太。’我就又入睡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可是我想，他人不在，准是按他老规矩去看马了。后来，”她悲伤地结束说，“还是不见他回来，我担心了，一担心就摸摸背包有没有出乱子，于是发现上面割开了口子，我就来找你了。”

“来吧，”罗伯特·乔丹说。

他们到了外面，这时半夜刚过不久，还感不到早晨要来临的样子。

“他能不能不经过岗哨，带了马儿走别的路逃走？”

“路有两条。”

“谁在山顶上？”

“埃拉迪奥。”

罗伯特·乔丹不再说什么，他们直走到拴马放牧的草地上。有三匹马在吃草。栗色大马和灰色马不见了。

“你估计他离开你有多少时间了？”

“准有一小时了。”

“那就完了，”罗伯特·乔丹说。“我去拿背包里剩下的东西，再回去睡觉。”

“我来看背包。”

“你来看，亏你说得出！你已经看过一次啦。”

“英国人，”妇人说，“关于这件事，我跟你一样难受。只要能把你的东西找回来，我什么都肯干。你不用损我。我们俩都被巴勃罗骗了。”

经她这么一说，罗伯特·乔丹认识到自己不能放纵自己，对她冷言冷语，不能和这女人争吵。这一天他必须和这个女人合作，而这一天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他把手放在她肩上。“没有什么，比拉尔，”他对她说。“丢掉的东西关系不大。我们找些代用的东西也能行。”

“可是他拿了什么？”

“没什么，大娘。一些个人享受的东西。”

“其中有你爆破设备中的东西？”

“有。不过还有别的引爆办法。告诉我，巴勃罗自己没有雷管和导火线吗？以前人家给他炸药时肯定也配备这种东西的。”

“他拿走了，”她悲伤地说。“我刚才马上就找过。也都不见

了。”

他们穿过树林，回头向山洞口走去。

“去睡一会儿吧，”他说。“巴勃罗走了，我们更好办。”

“我去看埃拉迪奥。”

“他会走别的路的。”

“我反正得去。我不够机灵，辜负了你的信托。”

“不，”他说。“去睡一会儿吧，大娘。我们四点钟得出发。”

他跟她走进山洞，唯恐背包里的东西从裂缝中漏出来，用双臂捧着拿了出来。

“我来把它们缝一缝。”

“等我们出发之前缝吧，”他温和地说。“我拿走不是跟你过不去，为了这样我才可以安心睡觉。”

“我要早一点拿到才来得及缝。”

“我一定早点给你，”他对她说。“去睡一会儿吧，大娘。”

“不，”她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共和国。”

“去睡一会儿吧，大娘，”他温和地对她说。“去睡一会儿吧。”

第三十四章

法西斯分子占领着这里这些山头。还有个山谷没人防守，只有一家带外屋和牲口棚的农舍，法西斯分子筑了工事，当作哨所。安德烈斯带着罗伯特·乔丹的信件在黑夜中去找戈尔兹，他兜了个大圈子，绕过这个哨所。他知道什么地方有根绊索，踩上就会牵动上了膛的枪扳机，他在黑夜中辨认出来，跨了过去，沿着一条岸边栽有白杨树的小河走去。树叶随着夜风飘动。一

只公鸡在法西斯分子当做哨所的农舍里啼叫；他一边沿河走，一边回头望望，从白杨树干间看见农舍有扇窗子的下半部露出了灯光。夜寂静而晴朗，安德烈斯离开小河，穿过草地走去。

草地上有四个尖顶草垛，上一年七月打仗以来就堆在那儿了。没人把草搬走，过去的四季风吹雨打，垛尖都坍下去了，草成了废料。

安德烈斯跨过拉在两堆草垛间的绊索时想，这真是糟踢啊。他想：共和分子不得不把草背上草地那边陡峭的瓜达拉马山坡，法西斯分子呢，看来就不需要草料。

他想：他们不缺草料粮食，他们有的是。但是明天早晨我们要干他们一下子。明天早晨我们要给“聋子”报一下仇。他们真是野蛮人！早晨公路上可要热闹啦。

他要赶快把信送到，赶回去参加早晨对哨所袭击。然而，他真的想回去吗？还是只不过假装想回去？英国人通知他由他去送信时，他体会到一种危险暂时缓解的感觉。他平静地看待早晨将要发生的事情。该干的总得干嘛。他赞成并愿意干这件事。“聋子”的毁灭深深地激动了他。然而，那毕竟是“聋子”，可不是他们。他们要干他们不得不干的事。

但是当英国人向他交待那信件时，他的心情就象他小时候在村子里过节时的有种感觉一样；那天早晨他醒过来，听到雨声很大，他知道地上太湿，广场上的逗牛戏不能举行了。

他小时候很喜欢逗牛戏，他盼望它，盼望自己来到炎日照耀、尘土飞扬的广场上的时刻，只见一辆辆大车排成一圈，堵住了条条出口，形成一个封闭的场子，人们把活动牛棚前面的棚门提起来，公牛从里面被倒出来，四只脚使劲抵着底板。他又激动又喜悦，吓得出汗，盼望着这一时刻，那时，在广场上，他能听到牛角

撞击着活动牛棚的木板墙的哒哒声，接着，看它四脚抵着底板，滑到场上，昂起了脑袋，鼻孔张得大大的，耳朵抽搐着，光亮的黑皮上蒙着尘土，腰部溅满了已干的粪便；看见它那双间距很大的、一眨不眨的眼睛，张得很开的牛角，既光滑又坚实，好象被沙子磨光的漂到海滩上的碎木，锋利的角尖往上翘起，那模样叫人看了可有些胆战心惊。

他整年盼望着公牛入场的那一天，那时你望着它的眼睛，只见它在广场上选择攻击对象，脑袋突然垂下，竖起双角，象猫那样迅速奔跑，一开始就使你的心完全停止跳动。他小时候整年盼望着那一刻，但是英国人吩咐送信时所引起的感觉，就象你当初醒来听到雨水落在石板屋顶、石墙和村里泥泞街道的水潭里，知道逗牛戏只得延期举行时的感觉一样。

他在村里那些逗牛的场所总是非常英勇，跟本村以及附近村里的任何人一样英勇。他说什么也不愿错过任何一年的逗牛戏，尽管他不到邻村去参加。公牛冲来时他能镇静等待，到最后一刻才跳开。当公牛把别人撞倒时，他在它嘴下挥动一只麻袋引开它。他曾多次抓住了牛角，拖住那把人撞倒在地的公牛，横拉牛角，在它脸上揍啊踢的，直到它撇开那倒地的人去攻击别人。

他曾抓住了牛尾巴，用力拉紧，拖着，绞着，把公牛从那栽倒的人身边拖开。有一次，他一手把牛尾巴扭回来，使另一只手能抓住牛角，等到公牛昂起头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一手握着牛尾巴，一手握着牛角，向后倒退着和牛一起打着转，最后大伙一拥而上，扑在牛身上用刀子戳。尘土飞扬，你喊我叫，一片炎热中夹着牛、人和酒的气味，在向公牛扑过去的人群中，他是第一个。公牛在他身体下摇摇晃晃，猛然弓背跃起，他伏在牛肩隆上，一条胳膊紧勾住牛角根部，一手抓紧另一只角，紧扣着手指，同时他的身

体被弓起来，被扭甩，左臂好象要脱臼似的，而他伏在那热呼呼、灰蒙蒙、毛茸茸的颠簸着的牛背上，牙齿紧咬住一只牛耳朵，一刀又一刀地扎进那上下颠簸着的胀大的脖子根，这时，热血喷在他拳头上，而他全身挂在那高高的牛肩隆上，连连地戳着牛脖子。这时的感觉他记得多真切啊。

他第一次象这样咬牛耳朵、咬住了不放的时候，他的脖子和牙床在颠簸中变得僵直了，之后大家都开他的玩笑。但是，他们虽然拿这个来取笑他，却非常敬佩他。此后他每年都要再出一次风头。他们称他是维利亚康纳霍斯的叭喇狗，还取笑他吃生牛肉。但是，村里人人盼着看他耍牛，每年，他都知道，先是公牛上场，然后是朝人冲击和角挑，然后大伙儿叫嚷着要人冲上去把牛杀死，他就从其他攻击的人们中冲出去，一跃而上，抓住了牛。等到最后公牛被大伙儿压得倒毙地上，事情结束后，他会站起身来走开去，为咬耳朵的情节而害臊，但也骄傲得很。然后他穿过大车之间到喷水泉旁去洗手，人们拍拍他的背，递给他皮酒袋，说：“你这叭喇狗，真棒。祝你娘长命百岁。”

他们或者说，“男子汉就应该有这种气概！年年都了不起！”

安德烈斯就会觉得难为情，空虚，骄傲而快乐，他撇开大家，把他的双手、右臂和刀子洗干净，然后拿起一只酒袋，先漱漱口，去掉那一年的牛耳朵的味道，把酒吐在广场的石板地上，然后高举酒袋，把酒直灌进嗓子眼里。

当然啦。他是维利亚康纳霍斯的叭喇狗，他无论如何也不愿错过村里每年举行的逗牛戏。但是他知道，什么也比不上雨声所产生的感觉更美好，因为这时他明白可以不必干了。

可是我必须赶回去，他对自己说。毫无疑问，我得赶回去袭击哨所，炸桥。我的兄弟埃拉迪奥在那儿，他是我的亲骨肉。还

有安塞尔莫、普里米蒂伏、费尔南多、奥古斯丁、拉斐尔，尽管他显然是个油腔滑调的人。还有两个女的，还有巴勃罗和英国人，不过，这英国人不能算数，因为他是外国人，是奉命而来的。他们大家都要参加在内。我不可能由于送信这偶然性的事而逃避这场考验。我现在得好好地赶快把信送到，然后十万火急地回去赶上袭击哨所。为了送信而不参加这次袭击，我就丢脸了。这是再清楚也没有的。还有，就象一直只考虑打仗的艰险一面的人突然记起了其中也会有乐趣一样，他对自己说：另外，我可以杀他几个法西斯分子来解解气。自从我们上次杀人以来，时间不短了。明天这一天可以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子。明天这一天可以真枪实弹地干一下子。明天这一天可有意思呢。明天快快来吧，我要回去参加。

正在这时候，当他在齐膝深的金雀花丛中爬上通往共和国占区的陡坡时，黑暗中有只鹁鸪从他脚边飞起来，猛响起了一阵扑打翅膀的声音，他突然间吓得气都透不过来。他想：这么突如其来，叫人吃了一惊。它们的翅膀怎么能拍打得这么快？它现在准在孵蛋。我也许差一点踩在蛋上了。要不是这次战争，我要在这树丛上结一条手绢，天亮后回来找鸟窝，把蛋拿来放在孵小鸡的母鸡身下，等到孵出来了，我们的鸡圈里就有小鹁鸪了。我要看它们长大，等到长大了，我要拿它们来招诱别的鹁鸪。我不会弄瞎它们的眼睛，因为这东西会驯服的。难道你以为它们会飞跑？说不定。那样我只得把它们的眼晴弄瞎啦。

不过，我饲养的时候，可不喜欢这么做。我用鹁鸪做诱鸟的时候，可以剪掉它们的翅膀，或者拴住一只脚。要是不打仗，我要和埃拉迪奥一起到法西斯哨所旁边的小河里去摸小龙虾。我们有次在小河里一天摸到了四五十只。要是我们炸桥后到格雷多

斯山区去的话，那儿也有几条漂亮的小河，可以摸鲢鱼和小龙虾。他想，但愿我们到格雷多斯山区去。我们在夏天和秋天可以在格雷多斯山区把日子过得满不错，不过冬天冷得不得了。不过，我们到冬天也许已经胜利了。

要是我们的父亲不是共和分子，埃拉迪奥和我现在都在替法西斯分子当兵了；要是替他们当了兵，那么就没有问题了。活也好，死也好，一个人得服从命令；结果怎样，由不得自己。在一个政权下过日子要比反抗那个政权容易些。

但是这种非正规打仗的责任是很大的。要是你是个会发愁的人，那么可以发愁的事真多着呢。埃拉迪奥比我会动脑筋。他也会发愁。我真心相信这个事业，我不发愁。但是这样过日子责任是很重大的。

他想，依我看，我们生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世。依我看，任何别的时世都可能要好些。我们大家生来就惯于过苦日子，因此也不觉得苦了。不适应这种环境的人就觉得苦。但这是个叫人难下决断的时世啊。法西斯分子发动进攻，替我们作出了决断。我们是为了活命才打仗的。但是我情愿事情不这样发展，使我能在那儿树丛上缚一条手绢，天亮的时候去拿蛋，放在母鸡身下，这样就能在自己的院子里看到小鹁鸪。我就喜欢这种平常的小东西。

他想，但是你没有家，哪来房子，哪来院子呢。你只有一个亲人，明天要去打仗的兄弟，你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太阳和一个空肚子。风不大，他想，眼前也没有太阳。你衣袋里有四个手榴弹，但是除了扔出去之外没有别的用处。你背上有一支卡宾枪，但是除了把子弹打出去之外没有别的用处。你有一份信件得送出去。你有一肚子的屎可以拉在地上。他在黑暗中露齿笑了。你

还可以在上面撒泡尿哪。你所有的每样东西都是准备拿出去的。你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你这倒霉蛋，他对自己说，又露齿笑了。

但尽管刚才那一会儿他脑海里闪现着高尚的思想，他心里还是盘旋着那种在村里随着节日早晨的雨声同来的暂时得到缓解的情绪。他面前的山脊上出现了政府军的阵地，他知道在那儿要受到盘问。

第三十五章

罗伯特·乔丹躺在睡袋里，挨着仍在睡梦中的玛丽亚。他侧身背对着姑娘，感到她颇长的身体碰着他的背，这时的接触仅仅成了一种嘲弄。你啊，你，他跟自己大发脾气。是啊，你。你第一次见到巴勃罗时就对自己说，当他表示友好的时候，就是要出卖你的时候。你这该死的笨蛋。你这该死的十足笨蛋。什么也别谈啦。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他可能把这些东西藏起来，还是扔掉呢？看来情况不大妙。再说，你在黑暗中哪里找得到啊。他会把东西藏起来的。他还拿走了一些炸药。嘿，这个卑鄙、恶劣、奸诈的酒鬼。这个卑鄙、不要脸的窝囊废。他自己滚蛋就行了，为什么要把引爆器和雷管带走呢？我怎么这样愚蠢，把东西交给那个混帐女人看管呢？这个狡猾、奸诈的狗杂种。这个卑鄙的王八蛋。

别多说了，宽心些吧，他对自己说。你只得听天由命，这是最好的办法。他对自己说：你就是给弄得晕头转向，晕得到了家。你脑袋不要发昏，别发脾气了，停止这种没有价值的怨天尤人吧。东西没啦。真该死，东西没啦。让那卑鄙的畜生见鬼去吧。

你可以闯过这一关的。你非这样不可，你知道非炸桥不可，如果你要在那儿站稳脚跟并且——也别想这事了。你为什么不清教你的祖父呢？

嘿，我的祖父、这整个奸诈的混账国家、交战双方的每个西班牙人都统统见鬼去，永世不得翻身。统统都给我见鬼去，拉尔戈、普列托、阿森西奥、米亚哈、罗霍，每个人都给我见鬼去吧。滚他妈的，这到处是奸诈的国家。滚他妈的，他们那利己主义、自私心理、个人主义、自负和奸诈，永远见鬼去吧。在我们为他们送死之前先滚他们的蛋。在我们为他们送死之后滚他们的蛋。叫他们见鬼去吧。上帝啊，滚他妈的巴勃罗。巴勃罗是他们的象征。上帝怜悯西班牙人民吧。他们的任何领袖都将使他们倒霉。两千年来只出了一个好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①，别的人都使他们倒霉。我们没法知道他在这次战争中是不是能坚持下去。我记得，当初我还以为拉尔戈^②满不错呢。杜鲁蒂是个好人，但他的自己人在法国人桥上把他枪杀了。枪杀他，是因为他要他们朝前进攻。根据光荣的无纪律的纪律枪杀了他。这胆小的畜生。嘿，这些该死的都见鬼去吧。还有那个刚偷走我的引爆器和我一盒雷管的巴勃罗。嘿，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里去。可是，不。倒是他坑了我们。从科尔特斯、梅嫩德斯·德阿维拉直到米亚哈都坑了我们。瞧米亚哈是怎样对待克莱伯的。

①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 Posse, 1850—1925)为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于一八八五年创办《社会主义者报》，进而筹组工人大同盟。一九一〇年成为被选入议会的第一个社会党人。为了爱戴他，人们称他为“老爷爷”。

② 拉尔戈(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1869—1946)为矿工出身的社会党人，一九三一年推翻君主制后，他出任劳动部部长。内战爆发后，他担任总理，一九三七年五月被内格林所替代。他曾领导“工人部队”在瓜达拉马山区作战。

这个自高自大的秃顶的畜生。这个愚蠢的、脑袋象鸡蛋那样精光的杂种。滚他妈的，那些个疯狂、自私、奸诈、一贯统治着西班牙和她的军队的畜生。除了老百姓，个个都滚他妈的蛋。等这帮人一旦掌了权，可得千万小心啊，留神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越骂越过分，蔑视和嘲笑的面越来越广，越来越不公正，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了。他的愤怒开始平息了。如果你说的是事实，那你在这儿干什么？那不是事实，你知道这一点。瞧瞧那些好人吧。瞧瞧那些优秀人物吧。他不愿对人不公正，他憎恨不公正，就象他憎恨残暴一样。他躺着，狂怒冲昏了他的头脑，终于渐渐平息，那不分青红皂白、不可遏止、杀气腾腾的怒火全消失了，他的心情变得平静、空虚、敏锐，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就象一个人和他所不爱的女人发生关系之后的感觉一样。

“你啊，你这可怜的兔子，”他侧过身来，对玛丽亚说。她在睡梦中微笑着，并向他挨近。“要是你刚才开口说话，我会动手打你的。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多象畜生啊。”

他这时紧偎在姑娘身边，双臂搂着她，下巴贴在她肩上。他躺在那儿，仔细计划着他得干些什么，得怎么干。

他想：情况并不那么糟，事实上一点也不糟。我不知道别人以前是否干过这种事。但是今后，遇到类似的困境，总会有人去干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干了这事，而人们也听说了这事。如果人们听说了这事，那就行。如果人们没听说，他们就会奇怪我们是怎样干成的。我们人手太少了，不过为此而发愁是没有意思的。我要用我们现有的力量来炸桥。上帝啊，高兴的是我终于克服了愤怒。愤怒给人的感觉就象在暴风雨中透不过气来一样。发怒是你另一个不该有的奢望。

“全都计划好了，漂亮的姑娘，”他凑在玛丽亚肩上，温柔地

说。“你一点也没被它打扰。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死啦，但是我们会把桥炸掉。你不必为此发愁。那说不上是什么结婚礼品。然而人们不是说一夜安眠值千金吗？你安眠了一夜。看你能不能把这当指环戴在手指上。睡吧，漂亮的姑娘。好好睡吧，我亲爱的。我不来弄醒你。我现在能为你做的事只有这一件了。”

他躺在那儿，十分轻柔地抱着她，感觉到她的呼吸和心跳，注意着他手表上的时间。

第三十六章

安德烈斯在政府军阵地前喊了口令。那是说，他伏在三重铁丝网下陡峭地朝下削的地方，抬头朝着石块和土坯垒成的胸墙大声呼喊。这里没有延绵不断的防守线，在撞见盘问他口令的人之前，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黑夜里绕过这个据点，深入政府军的地区。但是，通过这一关卡看来更安全而简单。

“你们好，”他大声喊道。“你们好，民兵们！”

他听到枪栓往后扳的卡嗒声。接着，在过去一点的胸墙后面，有人放了一枪。枪声砰地一响，黑暗中倏的出现了一道向下的黄光。安德烈斯听到枪栓声，立刻卧倒，头顶狠狠地抵住地面。

“别开枪，同志们，”安德烈斯喊道。“别开枪！我要过去。”

“你们几个人？”胸墙后有人喊着。

“一个。我。只有一个。”

“你是谁？”

“维利亚康纳霍斯人安德烈斯·洛佩斯。巴勃罗队里的人。”

带着份信件。”

“你带着步枪和弹药吗？”

“带着，老兄。”

“我们不放带步枪和弹药的人进来，”那声音说。“三个人以上也不准进来。”

“我是一个人，”安德烈斯喊道。“有要紧事情。让我过去吧。”

他听到他们在胸墙后面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接着那声音又喊道：“你们是几个人？”

“一个。我。只有一个。看天主的份上。”

他们又在胸墙后面说话了。接着那声音说：“听着，法西斯。”

“我不是法西斯，”安德烈斯喊道。“我是巴勃罗队里的游击队员。我来带信给总参谋部。”

“他疯了，”他听到有人在说。“给他扔个手雷。”

“听着，”安德烈斯说。“只有我一个。光杆儿一个。我操他妈的就是一个人，别疑神疑鬼啦。让我过去吧。”

“他说话象个基督徒，”他听到有人笑着说。

接着另外有人说，“最好还是给他扔个手雷。”

“别，”安德烈斯喊道。“那就错透了。是要紧事情啊。放我过去吧。”

就为了这种原因，他一直不喜欢出入火线。有时盘问得宽些，但总是不愉快的。

“只有你一个人？”那声音又朝下面喊道。

“我操他妈的，”安德烈斯喊道，“我得跟你们说多少回啊？只有我一个人。”

“你要是一个人，那么站起来，举枪过头。”

安德烈斯站起来，双手握着卡宾枪，举过了头。

“现在从铁丝网里钻进来。我们用机枪对着你，”那声音喊道。

安德烈斯进入第一道之字形铁丝网。“我得用手拨开铁丝网啊，”他喊道。

“别把手放下，”那声音命令道。

“我被铁丝网勾住了，”安德烈斯大声说。

“还是简单点，给他扔个手雷，”有一个声音说。

“让他把枪背着，”另一个声音说。“他举着双手是没法钻铁丝网的。要讲点理嘛。”

“法西斯分子全是一路货，”另一个声音说。“他们得寸进尺。”

“听着，”安德烈斯喊道。“我不是法西斯，是巴勃罗队里的游击队员。我们杀掉的法西斯比斑疹伤寒杀死的法西斯还多。”

“我从没听说过巴勃罗的游击队，”那人说，他显然是这个据点的长官。“也没听说过什么彼得、保罗和什么其他的圣徒和门徒^①。也没听说过他们的游击队。把枪背在肩上，用手钻铁丝网吧。”

“快钻，别等我们向你扫机关枪，”另一个叫着。

“你们真不够朋友！”安德烈斯说。

他正在费力地钻着铁丝网。

“够朋友！”有人对他喊道。“我们是在打仗哪，伙计。”

“有点打仗的意思了，”安德烈斯说。

① 彼得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保罗原名扫罗，在公元一世纪中，起先着力迫害早期的基督徒。据说有次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灵，他才皈依基督教，到小亚细亚、希腊、罗马等地热情宣传基督教，最后被罗马人所捕，于公元六七年左右被杀。后来教会尊他为圣保罗。保罗这名字在西班牙语中为巴勃罗，故此处那长官因听到巴勃罗的名字而开玩笑地提起彼得等其他圣徒及门徒。

“他说什么？”

安德烈斯又听到卡塔一声扳枪栓的声音。

“没什么，”他喊道。“我没说什么。别开枪，让我从这个他妈的铁丝网里钻进去。”

“不许骂我们的铁丝网，”有人叫道。“再骂，我们给你来个手雷。”

“我是想说，多好的铁丝网啊，”安德烈斯喊道。“多漂亮的铁丝网。好比天主掉在茅坑里啦。多可爱的铁丝网啊。我快要和你们在一起啦，弟兄们。”

“给他扔个手雷，”他听到有个声音说。“我跟你说，对付这种鬼把戏，这是最爽快的办法。”

“弟兄们，”安德烈斯说。他大汗淋漓，知道这个鼓动扔手雷的人完全可能随时扔出来。“我没什么了不起。”

“这我相信，”鼓动扔手雷的人说。

“你说对了，”安德烈斯说。他正在小心翼翼地钻第三重铁丝网，离胸墙很近了。“我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事情很要紧。非常、非常要紧。”

“没有比自由更要紧的事了，”鼓动扔手雷的人说。“你以为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他挑衅地问。

“没有，伙计，”安德烈斯说，松了口气。他知道他面前的是帮狂热分子，那些佩戴红黑围巾的家伙。“自由万岁！”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万岁，全国劳工联合会万岁，”他们从胸墙上大声呼应着。“无政府—工团主义和自由万岁。”

“咱们大伙儿万岁，”安德烈斯喊道。

“他是我们一派的，”鼓动扔手雷的人说。“幸亏我没用这个

叫他完蛋。”

他望着手里的手榴弹，看到安德烈斯翻过胸墙，他深深感动了。这个鼓动扔手雷的人双臂搂住他，一手仍握着手榴弹，因此当他拥抱安德烈斯的时候，手榴弹搁在安德烈斯的肩膀上。他吻着安德烈斯的两颊。

“还好你没有出事，兄弟，”他说。“还好还好。”

“你们的长官在哪儿？”安德烈斯问。

“这里归我指挥，”有一个人说。“给我看你的证件。”

他把证件拿进掩体，借着烛光看。一小方折叠起来的印着共和国国旗的绸子，中央盖着军事情报部的公章。一张罗伯特·乔丹用笔记本上的纸写的列具他姓名、年龄、身高、出生地点和任务的安全通行证，上面盖着军事情报部橡皮图章，还有给戈尔兹的急件，一共四张折好的纸，用一根绳子扎好，用火漆封好，火漆上打上安在军事情报部橡皮图章木柄顶端的金属章。

“这个我见过，”这据点的长官说，把那块绸子还给他。“这个你们大家都有，我知道。不过有了它还不说明什么问题，还得有这个。”他拿起通行证，又看了一遍。“你生在什么地方？”

“维利亚康纳霍斯，”安德烈斯说。

“那儿种些什么庄稼？”

“甜瓜，”安德烈斯说。“那是世界闻名的。”

“你认识那儿的什么人？”

“问这个干什么？你是那儿人吗？”

“不。不过我到过那儿。我是阿兰胡埃斯^①人。”

“问我哪个人都行。”

① 阿兰胡埃斯在马德里正南，位于肥沃平原上，盛产水果蔬菜，供应马德里市场。

“讲讲何塞·林贡的模样吧。”

“开酒店的那个吗？”

“自然啦。”

“剃的是光头，腆着个大肚子，一眼斜视。”

“这就行了，”那人说，交还证件。“可你在他们那边是干什么的？”

“革命前我父亲在维利亚卡斯丁定居下来，”安德烈斯说。“那是在山脉另一边的平原上。革命突然爆发时我们就在那儿。革命开始以来，我就随着巴勃罗一伙打仗。不过，我很着急呢，伙计，得送那份急件。”

“法西斯占区的情况怎么样？”那军官问。他不着急。

“我们今天很热乎，”安德烈斯骄傲地说。“今天公路上热闹了一整天。今天他们把‘聋子’一伙干掉啦。”

“‘聋子’是谁？”对方轻蔑地问。

“山里一支了不起的游击队的头头。”

“你们都应该到共和国来参军，”军官说。“愚蠢的游击队搞得太多啦。你们大家都该过来，服从我们自由派的纪律。到时候，如果我们想派游击队，就可以根据需要调派。”

安德烈斯这个人的耐心简直好到极点。他心平气和地对付这次过铁丝网的事。这样的盘问一点也没使他着慌。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这个人不理解他们，也不理解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他满口蠢话，原是意料之中的。慢条斯理的作风也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他这时希望走了。

“听着，好朋友，”他说。“你的话很可能有道理。可是我受命给指挥三十五师的将军送一份急件，天亮时要在这一带山里发动进攻，现在夜深了，我得走啦。”

“什么进攻？你有进攻的消息吗？”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我现在必须到纳瓦塞拉达去，到了那里还要上路。带我到你的指挥官那儿去，让他派交通工具把我送去，好吗？马上派个人和我去找他，不要耽搁时间了。”

“我对这一切非常怀疑，”他说。“还是乘你走近铁丝网的时候，早把你毙了的好。”

“你看过我的证件啦，同志，我也解释了我的任务，”安德烈斯耐心地对他说明。

“证件可以伪造的，”军官说。“这样的任务，哪个法西斯分子都编得出。我亲自带你去见指挥官。”

“好，”安德烈斯说。“你去就好。不过让我们快去。”

“你，桑切斯。你代我指挥，”军官说。“你跟我一样明白你的职责。我带这个所谓的同志去见指挥官。”

他们俩顺着山脊背后的浅战壕朝下走，安德烈斯在黑暗中闻到防守山顶的这些士兵拉在长着羊齿植物的山坡上的屎尿的臭气。他不喜欢这些象无法无天的孩子般的人；他们肮脏，可厌，不受管束，但亲切，可爱，无知又愚蠢，然而有着武器，因此总是危险的。他，安德烈斯除了拥护共和国之外，没有自己的政见。他多次听到这些人说话，他认为他们所说的听起来往往是很美好的，但是他不喜欢。他想：人拉了屎尿不掩埋，不能说是自由。没有比猫更自由的动物了，而猫是把自己拉的屎掩埋起来的。猫是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除非他们向猫学习埋屎，不然我可不会尊敬他们。

那军官在他前面突然站住了。

“你仍旧带着卡宾枪，”他说。

“是，”安德烈斯说。“干吗不？”

“把枪给我，”军官说。“说不定你在我背后用枪打我。”

“干吗打呀？”安德烈斯问他。“我干吗要从背后打你？”

“谁料得到？”军官说。“我谁也不信。把卡宾枪给我。”

安德烈斯解下卡宾枪，递给他。

“你高兴拿枪就拿吧，”他说。

“这样好些，”军官说。“这样我们安全些。”

于是，他们在黑暗中继续向山下走去。

第三十七章

罗伯特·乔丹和姑娘一起躺着，他注视着手表，等时间过去。时间缓慢地、几乎难以觉察地在过去，因为那是只小表，他看不到秒针。但是，他注视着分针，全神贯注地看着，竟发现简直能觉察到它在走动。姑娘的头贴在他下巴下，他转过头来看表，感觉到她头上的短发擦着他的脸颊，这短发象貂皮一般柔软，富有活力，滑溜地起伏，正如你松开夹住貂的捕兽机，解脱了它，抱在手里抚摸它，光滑的毛抚平以后又翘起来。他脸颊擦着玛丽亚的头发，喉咙哽塞起来了。他双臂搂着她，喉头产生一种落寞的痛楚之感，贯穿着全身；他垂下了头，眼睛凑近表面，只见又尖又亮的针在表面的左半部朝上缓缓移动。他能看清楚它不停地移动着，他这时搂紧了玛丽亚，想延迟时间的进程。他不想弄醒她，但又不能放过这最后一次机会，让她一个人待着，于是他把嘴唇贴在她耳朵后，顺着她的脖子朝上移，感到皮肤滑溜溜的，上面的汗毛怪柔软的。他看到手表上的针在走动，于是更紧地搂着她，舌尖沿着她的脸颊一直移到她耳垂上，沿着那曲线优美的耳

轮直移到可爱而饱满的顶部边缘，他的舌头在颤抖。他感觉到这一阵颤抖贯穿了那落寞的痛楚之感，他看到表上的分针朝上移，和时针成了一个小锐角，快到点了。她仍没醒来，于是他转过她的头，把自己的嘴唇贴上去。他们躺在那儿，他只是轻柔地吻着她在睡梦中的丰满的嘴唇，他温柔地在上边吻着，感到嘴唇跟嘴唇微微地摩擦着。他转身向着她，感到她那颀长而轻盈可爱的身体在颤抖，接着她在睡梦中喘了口气，接着还是在睡梦中也搂住了他，接着她醒过来，嘴唇使劲而着力地贴上他的嘴，于是他说，“你要感到痛的。”

她说，“不，不痛。”

“兔子。”

“不，别说话。”

“我的兔子。”

“别说话。别说话。”

于是他们合而为一了，这样，尽管表上的针仍在走动，但是没人看了，这时候他们知道，一个人没有的感受另一个也不会有，此外再没别的感觉了；这是永恒的一切；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他们现在正在享受的是他们将来不可能再享受的事。他们现在享有，过去享有，一直享有，但主要是现在，现在，现在。啊，现在，现在，现在，唯有现在，首先是现在，除了你这个现在，没有别的现在，而现在是你的先知。^①现在，永远是现在。来吧，现在，因为除了现在只有现在。是啊，现在。现在来吧，只有现在，除了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一个在这儿，

① 乔丹在这里套用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名言：“除了安拉没有别的神，而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另一个也在这儿，别问为什么，永远别问，只有这现在；一直下去，但愿永远是现在，永远是现在，因为永远只有一个现在；只有现在，只有一个，除了一个现在没有别的，一个，现在在进行，在升腾，在漂流，在离去，在盘旋，在翱翔，在消失，一直在消失，不停地消失；一个加一个等于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还是一个，还是一个，下沉地在一起，温柔地在一起，渴望地在一起，亲切地在一起，幸福地在一起，善良地在一起，宠爱地在一起，一起伏在土地上，胳膊肘支在砍下来当床睡的松枝上，散发着松枝和夜的气息；现在终于回到了大地上，清晨即将来临。这些想法只在他的头脑里，他一点也没透露出来，他说的是：“啊，玛丽亚，我爱你，我为这感谢你。”

玛丽亚说，“别说话。我们还是不说话的好。”

“我必须跟你说，因为这太美了。”

“不。”

“兔子——”

但是她紧紧搂住他，扭过头去，他就温柔地问，“痛吗，兔子？”

“不，”她说。“我又进入了神妙的境界，我也很感激。”

事后，他俩静静地并排躺着，脚踝、大腿、臀部和肩膀都挨在一起，罗伯特·乔丹这时又看得到他的表了，这时玛丽亚说，“我们的运气真好。”

“是的，”他说。“我们是很幸运的人。”

“没有时间睡觉了？”

“没有了，”他说，“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如果非起来不可，我们去搞些吃的吧。”

“好啊。”

“你。你不为什么发愁吧？”

“不愁。”

“真的？”

“不愁。现在不。”

“可你刚才在发愁？”

“有一会儿。”

“我能帮点忙吗？”

“不，”他说。“你已经帮了大忙。”

“是那个吗？那是为了我呀。”

“那是为了我们俩，”他说。“不是一个人的事。来，兔子，我们穿衣服吧。”

但是他的心，他最好的伴侣，正在思量那神妙的境界。她说过神妙的境界。这和英语中的光荣和法国人所写所说的荣耀没有共同之处^①。这是西班牙民歌^②和唱经^③里的东西。这种境界当然也在画家格列柯和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存在着。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如果否认它的存在，就等于象否认电话，否认地球绕太阳旋转，或者世间还有别的行星一样无知。

我们对于该知道的东西知道得真少啊。但愿我能活一个长时期，不要今天就死，因为我在这四天中学到了很多人生真谛；

① 实际上这个词在英语和法语中跟西班牙语中一样，都源出同样的拉丁词 *gloria*，因此也可以作“神妙的境界、极乐世界”的解释。这里作者用的西班牙语词儿是大写的，专门意味着“神妙的境界”。

② 原文为 *Cante Hondo*，特指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歌，节奏单调、音调忧郁深沉，带有吉普赛风味。

③ 原文为 *Saetas*，为安达卢西亚地区在复活节前一周中宗教行列路过时信徒们诵吟的祷文。

依我看，比我半辈子学到的东西更多。我愿做个老人，具有真知灼见。我不知道人是否能不断地学下去，还是只能获得一定量的知识。我自以为知道的东西很多，实在什么也不知道。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漂亮的姑娘，”他用英语说。

“你在说什么？”

“我从你那儿学到很多东西。”

“哪里话，”她说。“你才是受过教育的人。”

他想：教育，我受的教育仅仅开了个头，才开了个头。要是我今天死去，那就可惜了，因为我现在懂得了一些事理。我难肯定，是不是由于时间短促，使你现在变得过于敏感，才学到了一些知识。然而，并没有所谓时间短促这回事。你应该懂得道理，明白这一点。我到这儿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一带山区。安塞尔莫是我最熟悉的朋友。我认识查尔斯、查布、盖伊、迈克^①，这些人我都熟识，但我和安塞尔莫最相熟。满嘴脏话的奥古斯丁是我的弟弟，而我从来没有过弟弟。玛丽亚是我真正的爱人、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爱人，没有过妻子。她也是我的妹妹，而我从来没有过妹妹，还是我的女儿，而我永远不会有女儿啦。我不愿意离开这样美好的环境。他缚好了绳底鞋。

“我发现生活非常有意思，”他对玛丽亚说。她在他身边坐在睡袋上，双手抱着脚踝。有人拉开了山洞口的毯子，他们俩都看到了灯光。这时仍是黑夜，还没有天亮的意思，不过他抬头穿过松林望去，看见星星悬挂得很低。在这个月份，黎明会来得很快。

^① 这些都是乔丹在家乡的青年朋友。

“罗伯托，”玛丽亚说。

“嗯，漂亮的姑娘。”

“今天行动起来，我们可以在一起，对吗？”

“开始以后，可以在一起。”

“开始的时候不能吗？”

“不能。你得跟马在一起。”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不能。我的工作只能由我自己干，你在身边我要操心的。”

“一结束你很快就回来吗？”

“很快，”他说，在黑暗中咧嘴笑了。“走，漂亮的姑娘，我们去吃吧。”

“你的睡袋呢？”

“要是你高兴，把它卷起来。”

“我高兴，”她说。

“我来帮你。”

“不。我一个人来。”

她跪下摊开睡袋，把它卷起来，接着改变了主意，站起身来把它抖抖，弄得啪啪的响。她然后再跪下铺平、卷拢。罗伯特·乔丹提起两个背包，小心地捧着，免得包里的东西从裂缝里漏出来。他穿过松林来到那挂着毯子的冒烟的山洞口。他用胳膊肘推开毯子，进入山洞的时候，他表上是三点缺十分。

第三十八章

大家都在山洞里，男的站在炉灶前，玛丽亚在扇火。比拉尔

已经煮好了一壶咖啡。她叫醒罗伯特·乔丹以后回去根本没睡过，这时正在这烟雾腾腾的山洞里，坐在凳子上，缝着乔丹一个背包上的裂口。另一个已经缝好。炉火照亮了她的脸。

“再吃些炖肉吧，”她对费尔南多说。“你肚子装满了，就无所谓啦。即使给牛角挑了，也没有医生动手术啊。”

“别说这种话，大娘，”奥古斯丁说。“你有条老娘子的舌头。”

他身子支在自动步枪上，枪脚架折起来贴着有网状散热孔的枪筒，口袋里塞满了手榴弹，一只肩上背着一袋子弹盘，另一只肩上背着满满一条子弹带。他正在抽烟，一手拿着一碗咖啡，把碗举到唇边，在咖啡面上喷了一口烟。

“你变成一片活动五金店了，”比拉尔对他说。“带了这些东西，你走不到一百码远。”

“什么话，大娘！”奥古斯丁说。“一路都是下坡路嘛。”

“开始下坡之前，”费尔南多说，“哨所那儿有一段上坡路。”

“我会象山羊那样爬上去的，”奥古斯丁说。

“你的兄弟呢？”他问埃拉迪奥。“你那了不起的兄弟溜号了吗？”

埃拉迪奥正靠墙站着。

“住口，”他说。

他神经很紧张，他明白大家都知道这个。行动前，他总是神经紧张而焦躁不安。他从墙边走到桌边，开始往自己衣袋里装手榴弹；盛手榴弹的驮篮揭开了生皮盖，靠在桌子的一只脚旁。

罗伯特·乔丹挨着驮篮，蹲在他身边。他伸手到驮篮里拿了四颗手榴弹，有三颗是椭圆形的、有棋盘格凹纹的米尔斯型

手榴弹^①，厚实的铁壳上端有一根用开尾销扣住的弹簧杆和拉环。

“这些手榴弹从哪儿来的？”他问埃拉迪奥。

“这些吗？是从共和国搞来的。老头子捎来的。”

“好使吗？”

“分量挺重，不过挺管用，”埃拉迪奥说。“个个都是宝。”

“是我捎来的，”安塞尔莫说。“一袋装六十颗。九十磅重，英国人。”

“你们用过这种手榴弹吗？”罗伯特·乔丹问比拉尔。

“我们怎么没有用过？”妇人说。“巴勃罗就是用这种手榴弹干掉在奥特罗的哨所的。”

她一提到巴勃罗，奥古斯丁就破口大骂。罗伯特·乔丹在炉灶的火光中看到了比拉尔脸上的表情。

“别讲这个了，”比拉尔尖刻地对奥古斯丁说。“挂在嘴上没用。”

“手榴弹准能爆炸吗？”罗伯特·乔丹握着一颗漆成灰色的手榴弹，用大拇指甲试试开尾销是不是结实。

“准能，”埃拉迪奥说。“我们用过的那一批中间没有一个瞎的。”

“爆炸快不快？”

“扔到之前不会爆炸。不过够快的。”

“那么这些呢？”

他举起一只食品罐头形的手榴弹，拉环用一条带子绑着。

① 因发明家英国人威廉·米尔斯爵士而得名，一九一五年由协约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使用。

“这些是废物，”埃拉迪奥对他说。“会炸。不错。但是只有火，没有弹片。”

“可是准能炸吗？”

“哪有准能的事，”比拉尔说。“我们的军火也好，他们的军火也好，没有十拿十稳的。”

“可是你刚才说那一种稳炸。”

“我没说过，”比拉尔对他说。“你问的是别人，不是我。我没见过有哪一种货色是十拿十稳的。”

“全都能炸，”埃拉迪奥坚持说。“说实话吧，大娘。”

“你怎么知道全都能炸？”比拉尔问他。“扔这些手榴弹的人是巴勃罗。你在奥特罗没杀过人。”

“那老婊子养的，”奥古斯丁开口说。

“别说了，”比拉尔斩钉截铁地说。她接着说，“这些手榴弹都差不多，英国人。有纹槽的手榴弹使起来要简单些。”

罗伯特·乔丹想：我还是每一扎里每种用一颗吧。不过那有凹纹的扎起来容易些，稳当些。

“你打算扔手榴弹吗，英国人？”奥古斯丁问。

“干吗不？”罗伯特·乔丹说。

他蹲在那儿拣手榴弹，但是想的却是：这不行啊。我怎么可以在这事情上骗自己呢，这我不明白。敌人攻打“聋子”时我们感到沮丧，就象雪停时“聋子”感到沮丧一样厉害。这就是你所以不愿正视的。你不得不干下去，制订了一个自己明知道没法完成的计划。你制订了个计划，而现在你明白这是没用的。唉，在这早晨是没用的。你能用现有的力量攻占两个哨所的哪一个都行，绝对不成问题。可是你没法同时攻占两个。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没有把握的。别骗自己啦。黎明快来临了，别骗自己啦。

想把那两个哨所都拿下来是根本不行的。巴勃罗始终明白这一点。我看他是一直打算开小差的，但是当“聋子”遭到攻击的时候，他明白我们完蛋了。你不能把行动计划建筑在可能出现奇迹的假想基础上。如果你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条件，你会使他们全都牺牲，甚至桥也炸不成。你会使他们全都牺牲，比拉尔、安塞尔莫、奥古斯丁、普里米蒂伏、这个神经质的埃拉迪奥、废物吉普赛人以及费尔南多，而你的桥还是炸不掉。你以为将出现奇迹，戈尔兹会收到了安德烈斯的信件，停止进攻？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你这些命令将叫他们全都送命，玛丽亚也在内。这些命令会叫她也送命。你连她也解救不了吗？巴勃罗真该死，他想。

不。别发脾气了。发脾气象吓破胆一样糟糕。不过，你原不该和你的情人睡觉，而应该跟那个女人骑了马整夜到这山区各地去物色足够的人马来使事情办成。他想，是啊，如果我这一来遭到不测，我就不能在这儿炸桥了。是啊，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你不去别处的原因。你也不能派别人出去，因为你不能冒损失人手的危险，以致再少一个人。你必须保持现有的力量，根据它来制订行动计划。

可是你的计划糟透了。糟透了，我对你说呀。这是夜间制订的计划，而现在已是早晨。夜间制订的计划在早晨用不上。你晚上的想法在早晨是没用的。你现在总算明白了，这是没用的。

约翰·莫斯比曾侥幸办成过同样几乎不可能办成的事情^①，那又怎么样呢？他当然办成过，尽管困难得多。记住啦，别低估突然袭击的作用。记住这一点。记住啦，如果你能坚持到底，那

^① 见第279页注。

不算蠢。可是这不是你应该采用的方法。你应该使它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可靠。可是瞧瞧情况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吧。唉，事情一开头就错了，这种情况加强了灾难的程度，就象湿雪地上滚雪球那样。

他蹲在桌边，抬头望去，望见了玛丽亚，她在对他微笑。他也朝她露齿笑笑，但这笑意只停留在表面上。他再挑了四颗手榴弹，放进衣袋。我可以扭松手榴弹中的雷管，就拿它来引爆，他想。手榴弹壳爆裂不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弹壳一爆裂，立刻就能引爆炸药包，不会使炸药包飞散。至少我认为不会飞散。我肯定不会飞散。^①他对自己说：要有点信心。你啊，昨夜你还在想，你和你祖父多么了不起，而你父亲却是个懦夫。现在显出一点信心来吧。

他又露齿对玛丽亚笑笑，但这一笑仅仅绷紧了颧骨和嘴边的皮肤，这笑意仍然只停留在表面上。

她认为你了不起呢，他想。我看你糟透了。还有那神妙的境界跟你那一派胡扯，全都糟透了。你有着了不起的想法，是不？你算彻底了解这个世界了，是不？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别焦躁，他对自己说。别发脾气了。发脾气无非也是一种出路。出路总是有的。你现在不得不解决最棘手的事啦。没有必要只因你将失去现有的一切而否定它。别象一条断了脊梁的该死的蛇那样噬啮自己；再说，你的脊梁并没有断，你这条猎狗。

① 因为背包里的引爆器、雷管和火帽等物都被巴勃罗偷掉了，乔丹只能考虑把手榴弹扎在安在桥面下关键地点的炸药包上，然后把一大卷漆包线的一端系在手榴弹的拉环上，从桥面上朝桥堍走，一路上放出漆包线，到高桥相当距离的地点，到时候只消一拉，就能使手榴弹引爆炸药包。但他又怕弹壳炸裂时，把炸药包一起炸飞了，掉在河里，不能把桥一炸两断。

等你受了伤再开始哀叫吧。等战斗打响了你再发怒吧。战斗中有的时间是时间可以发怒。这在战斗中对你倒有点儿用处。

比拉尔拿着背包走到他跟前。

“现在结实了，”她说。“这些手榴弹很好，英国人。你可以信得过它们。”

“你觉得怎样，大娘？”

她望着他，摇摇头，笑笑。他不知道她这一笑有多深，看来是够深的。

“不错，”她说。“还能凑合。”

她接着蹲在他身旁，说：“现在真要动手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的人太少，”罗伯特·乔丹马上对她说。

“我也这样想，”她说。“太少了。”

接着她仍对他一个人说，“玛丽亚能独个儿管马，不用我管这个了。我们可以把马脚拴住。这些马是骑兵队的，听到枪声不会受惊。我去对付下面的那个哨所，去承担巴勃罗的任务。这样我们就多一个人啦。”

“好，”他说。“我早想到你可能有这打算。”

“不，英国人，”比拉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别发愁。一切都会顺利的。你得记住，他们不会料到将发生这种事。”

“对，”罗伯特·乔丹说。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比拉尔用她那粗哑的嗓音尽量温和地小声说。“至于手的事——”

“什么手的事？”他恼怒地说。

“不，听着。别生气，小兄弟。至于手相的事情，那全是吉普赛人的胡扯；我拿它来抬高自己罢了。哪有这种事呢！”

“别谈这个了，”他冷冰冰地说。

“不，”她粗哑而亲切地说。“我的话只是骗人的胡扯。今天要打仗，希望你别发愁。”

“我不愁，”罗伯特·乔丹说。

“不对，英国人，”她说。“你很愁，这不是没道理的。不过一切都会顺利的，英国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干这一个的啊。”

“我不需要政治委员，”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她对他又笑了笑，她那粗厚的嘴唇和咧开的大嘴带着一个好看而真挚的笑容，她说，“我很喜欢你，英国人。”

“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他说。“既不要你，也不要上帝。”

“要，”比拉尔用粗哑的声音小声说。“我知道。我只不过想对你说说罢了。别发愁。我们一切都会干得很顺利的。”

“当然啦，”罗伯特·乔丹淡淡一笑说。“我们当然会这样的。一切都会顺利的。”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比拉尔问。

罗伯特·乔丹看了看表。

“随时都可以出发，”他说。

他把一个背包递给安塞尔莫。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老头子？”他问。

老头儿根据罗伯特·乔丹给他的样品，削了一堆木楔，即将削好最后一个。这些额外的木楔是以防万一的。

“好，”老头儿说着，点点头。“到现在为止，都很好。”他伸出一只手来。“瞧，”他说，微微一笑。他的手一点也不抖。

“好，那又怎么样？”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整个手不抖，我总是办得到。你伸出一个指头试试。”

安塞尔莫伸出一个指头。指头在抖。他望着罗伯特·乔丹，摇摇头。

“我也这样，”罗伯特·乔丹伸出一个指头给他看。“总是这样。那是正常的。”

“我可不是这样，”费尔南多说。他伸出右手的食指，给他们看，然后伸出左手的食指。

“你能啐出唾沫来吗？”奥古斯丁问他，对罗伯特·乔丹眨眨眼。

费尔南多咳了一声，骄傲地朝山洞的地上啐了一口，然后用脚在泥地上擦掉。

“你这头脏骡子，”比拉尔对他说。“你一定要逞英雄的话，往炉火里啐嘛。”

“如果我们不打算离开这里，比拉尔，我就不会啐在地上了，”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

“留神你今天啐唾沫的地方，”比拉尔对他说。“说不定正是你离不开的地方。”

“这个人老是说丧气话，”奥古斯丁说。他用玩笑来掩饰紧张，这正是他们大伙儿共同的心情。

“我是说笑话，”比拉尔说。

“我也是，”奥古斯丁说。“可操他奶奶的，要等到动了手，我才心安理得哪。”

“吉普赛人在哪儿？”罗伯特·乔丹问埃拉迪奥。

“跟马在一起，”埃拉迪奥说。“你从洞口望得到他。”

“他怎么啦？”

埃拉迪奥露齿笑笑。“害怕极了，”他说。谈到别人的害怕，使他感到安心。

“听，英国人——”比拉尔开口说。罗伯特·乔丹朝她望去，只见她张开了嘴，脸上露出一副诧异的神色。他一边伸手拔手

枪，一边飞快地转身对着洞口。洞口站着一个人，他一手拉开毯子，短自动步枪的锥形枪口露出在肩膀上面；这个人又矮又宽，满脸胡子，眼睑发红，一双小眼睛茫然地不知在望着谁。正是巴勃罗。

“你——”比拉尔诧异地对他说。“你。”

“我，”巴勃罗不卑不亢地说。他走进山洞。

“喂，英国人，”他说。“我把埃利亚斯和亚历杭德罗队里的五个弟兄和他们的马带来了。”

“引爆器和雷管呢？”罗伯特·乔丹说。“还有别的东西呢？”

“我扔到峡谷下面的河里去了，”巴勃罗还是茫然地不知在望着谁。“不过我想出了一个用手榴弹引爆的办法。”

“我也想到了，”罗伯特·乔丹说。

“你有什么酒吗？”巴勃罗疲倦地问他。

罗伯特·乔丹递给他那个扁瓶子，他急急地喝着，然后用手背抹抹嘴。

“你是怎么回事？”比拉尔问。

“没什么，”巴勃罗说，又抹抹嘴。“没什么。我回来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一时软弱。我走了，可我现在回来了。”

他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其实我不是胆小鬼。”

可你何止是个胆小鬼，罗伯特·乔丹想。你不是才怪呢。可是我见到你很高兴，你这个婊子养的。

“从埃利亚斯和亚历杭德罗那儿我只能搞到五个人，”巴勃罗说。“我离开了这儿，一直骑着马奔走。你们九个人是绝对应付不了的。绝对不行。英国人昨晚讲的时候我就明白，绝对不行。下面的哨所有七个士兵和一个班长。要是有了警报器，或

者他们拚命抵抗呢？”

他这时打量着罗伯特·乔丹。“我走的时候想，你会明白这是不行的，你就会撒手不干。后来我扔掉了你的器材后，对这件事倒另有一番想法了。”

“我见到你很高兴，”罗伯特·乔丹说。他走到他身边。“我们有手榴弹。那也能行。别的东西无关紧要。”

“唉，”巴勃罗说。“我不为你干。你是个恶兆头。这一切都出在你身上。‘聋子’送命也是由于你。不过，我扔掉你的东西后，觉得自己太孤单了。”

“你的妈——”比拉尔说。

“所以我骑了马去找人，想能不能把这次袭击搞成功。我把能找到的最棒的人找来了。我把他们留在山头上，好让我先来跟你谈谈。他们以为我是头头哪。”

“你要想当头头的话，”比拉尔说，“你是头头。”巴勃罗望着她，一句话也没有。他接着直截了当地悄声说，“‘聋子’出事以后，我想得很多。我看哪，如果我们不得不完蛋的话，就一起完蛋吧。可是你啊，英国人。我恨你给我们带来这厄运。”

“不过，巴勃罗——”费尔南多开口说。他衣袋里装满了手榴弹，一个肩上背着一串子弹带，他还在用一块面包抹他盘子里的肉汁。“你认为这一仗不会打赢？可前天晚上你说过你相信会打赢的。”

“再给他些炖肉，”比拉尔恶狠狠地对玛丽亚说，然后眼色变得温柔些，对巴勃罗说，“你到底回来了，呃？”

“是啊，太太，”巴勃罗说。

“好，欢迎你，”比拉尔对他说。“我原想你还不至于堕落到那种地步。”

“这次出走了，叫人感到孤单得受不了，”巴勃罗悄悄地对她
说。

“那种事叫你受不了，”她嘲笑他。“十五分钟就叫你受不了
啦。”

“别取笑我，太太。我回来啦。”

“欢迎你，”她说。“刚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喝了咖啡，我
们走。这么做作叫我厌烦了。”

“那是咖啡吗？”巴勃罗问。

“当然罗，”费尔南多说。

“给我一些，玛丽亚，”巴勃罗说。“你好吗？”他看都不对她
看。

“好，”玛丽亚对他说，端给他一碗咖啡。“你要炖肉吗？”巴
勃罗摇摇头。

“独个儿真不是滋味呀，”巴勃罗继续向比拉尔解释，好象在
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我不喜欢孤单单的。明白吗？昨天一整
天我为大家的利益做事，不觉得孤单。可是昨天晚上哪。好家
伙！真不好受啊！”

“加略人犹大，你的臭名昭著的老祖宗，最后是上吊自尽
的^①，”比拉尔说。

“别这样跟我说话，太太，”巴勃罗说。“我回来了，你没看见
吗？别讲犹大什么的了。我回来了。”

“你带来的是些什么人？”比拉尔问他。“带来的人可顶用？”

①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三十块银洋，把耶稣出卖给罗马统治者。等到
耶稣被定了死罪，犹大后悔了。他“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
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
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见《圣经·马太福
音》第二十七章第三到五节）

“都是好汉，”巴勃罗说。他趁机正面对她望了一眼，然后望着别处。

“好汉和傻子。准备送死就是了。配你口味的。你喜欢的就是这种人。”

巴勃罗又朝她的眼睛望着，这次不再往别处看了。他那双眼睛通红的小小的猪眼直盯着她。

“你呀，”她说，她那粗哑的声音又变得亲热了。“你呀。我看一个男人有过一点骨气的话，是永远不会完全丢掉的。”

“准备好了，”巴勃罗说，这时直瞪瞪地盯着她。“不论今天怎么样，我都准备好啦。”

“我相信你回心转意了，”比拉尔对他说。“我相信了。不过，你啊，去的时间可不短啊。”

“你瓶里的再让我喝一口，”巴勃罗对罗伯特·乔丹说。“然后我们动身吧。”

第三十九章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树林爬上山坡，来到山顶一条羊肠小道。他们全都背着沉重的装备，缓慢地爬山。马鞍上也驮着东西。

“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抛弃辎重，”比拉尔说。“不过，如果能够保存下来，我们可以用来再立一个营地。”

“其他弹药呢？”他们用绳子捆紧包裹的时候，罗伯特·乔丹问。

“在马褡子里。”

罗伯特·乔丹感到沉甸甸的背包的重量，感到口袋里装满

了手榴弹的上衣牵勒着他的脖子，感到手枪贴着他大腿的重量，感到装着手提机枪子弹夹的裤袋饱鼓鼓的。他嘴里有着咖啡味，他右手提着手提机枪，伸出左手，把上衣领子拉起，来减轻一点背包带子的牵勒。

“英国人，”巴勃罗对他说，在黑暗中紧靠他身边走着。

“什么事，伙计？”

“我带来的这些人以为这一回事情干得成，因为我把他们带来了，”巴勃罗说。“别说什么叫他们泄气的话。”

“好，”罗伯特·乔丹说。“我们来把事情干成吧。”

“他们有五匹马，知道吗？”巴勃罗谨慎地说。

“好，”罗伯特·乔丹说。“我们把所有的马都集中在一起。”

“好，”巴勃罗说，就不再说什么了。

罗伯特·乔丹想：老巴勃罗啊，我看你不象在去塔尔苏斯路上的圣保罗那样真正回心转意吧^①。不。你回来就是一个奇迹。看来把你奉为圣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带这五个人去对付下面的哨所，能干得跟‘聋子’一般好，”巴勃罗说。“我先切断电线，再回头向桥头靠拢，照我们协议的办法干。”

罗伯特·乔丹想：十分钟之前我们已经全都讨论过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我们有可能转移到格雷多斯山区去，”巴勃罗说。“说真的，这问题我动了不少脑筋。”

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我看你脑子里在这最后几分钟内

^① 塔尔苏斯在今土耳其南部，滨东地中海，为保罗的诞生地。441页注中曾提到他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耶稣显灵所感化的，此处显系作者笔误。

又闪现出什么念头了。你又看到启示了。^①但是你别打算使我相信你欢迎我一起去。不，巴勃罗。别指望我对你具有太多的信任。

巴勃罗进山洞来说他带来了五个人之后，罗伯特·乔丹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好。巴勃罗的再次出现打破了下雪以来整个行动计划显然要搁浅的悲剧格局；巴勃罗回来后，他并不以为自己的运气好转了，因为他不信运气，但是现在整个情况显得好转了，桥是炸得成了。他感到的不再是肯定会失败，而是鼓起了信心，就象气泵使车胎慢慢地充气一样。就象气泵开始打气的时候，橡皮轮胎的表面蠕动起来那样，起先没有显著的差别，虽然有了明显的苗头，可是这信心象上涨的潮水或树身内升起的汁液般不断涌起，直到他开始感到接近不再疑惧的边缘，这种心情常会转化成行动前的真正喜悦。

这是他所具备的最大天赋，这种才能使他适宜参加战争，这就是蔑视而不是忽视可能出现的坏结局的能力。如果对别人怀着过多的责任感，或者不得不执行计划不周或设想不当的任务，这种能力就会被抵销，因为在这些事情上坏结局和失败是不应忽视的。这还不单是可能损害自己的问题，这是可以忽视的。他知道他个人无足轻重，死亡无足轻重。他确实认识到这一点，就象他确实知道别的事情一样。在最后的几天里，他明白自己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就等于一切了。但是他心里知道这是个例外。他想：我们经历过了。就这方面来说，我是最最幸运的。我所以被给与这一切，也许就是因为我从没争取过吧。这是无法夺走，也不会丢失的。但是在今天早晨，一切都过去了，结

^① 乔丹这时又在把巴勃罗比作圣保罗。

束了，现在马上要干的就是我们的任务。

你啊，他对自己说，我高兴见到你重新得到了一度缺少的东西。可是你在那边表现得真糟。^①我真为你羞愧。不过我就是你啊，我没有资格来评判你。我们俩的处境都很糟。你和我，我们俩都这样。得啦。别象双重性格的人般胡思乱想了。一个一个来吧。现在你又正常了。可是听着，你决不能再整天惦念着那姑娘了。你现在要保护她，除了别让她卷进战斗以外，别无他法，而你正在这样做。如果你相信种种迹象，显然会有很多马儿需要看管。你为她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快些把桥炸掉，撤离此地，惦念着她只会妨碍你炸桥，所以别再想她了。

得出了这个结论，他等玛丽亚跟比拉尔和拉斐尔牵着马走来。

“喂，漂亮的姑娘，”他在黑暗中对她说，“你好吗？”

“我很好，罗伯托，”她说。

“什么也别愁，”他对她说。他把机枪移到左手里，伸出右手放在她肩上。

“我不愁，”她说。

“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他对她说。“拉斐尔和你一起看马。”

“我宁愿跟你在一起。”

“不。最需要你干的事是看马。”

“好吧，”她说。“我去。”

正在这时，有匹马嘶叫起来，下面空地上有匹马响应着，声音穿过岩石的缺口传来，响得象一阵尖厉的断续的震颤声。

罗伯特·乔丹看到前面黑魆魆的一群马。他赶紧走上前去，

^① 指清晨和玛丽亚一起在睡袋中时思前想后，独自发愁。现在恢复了信心，应该摆脱一切杂念，执行任务。

跟巴勃罗一起来到马群跟前。那些人正站在他们的坐骑旁边。

“你们好，”罗伯特·乔丹说。

“你好，”那些人在黑暗中回答。他看不清他们的脸。

“这就是跟我们一伙的英国人，”巴勃罗说。“爆破手。”

谁也不答话。也许他们在黑暗中点头吧。

“我们动身走吧，巴勃罗，”有一个人说。“天快亮了。”

“你们带来了手榴弹吗？”另一个问。

“有很多，”巴勃罗说。“等我们撤下了马儿，你们自己取用吧。”

“那我们走吧，”另一个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半夜啦。”

“喂，比拉尔，”妇人走上前来时，另一个说。

“哎呀，那不是佩贝吗？”比拉尔声音嘶哑地说。“你好吗，羊倌？”

“好，”那人说。“还能凑合。”

“你骑的什么马？”比拉尔问他。

“巴勃罗的灰马，”那人说。“这匹马真带劲。”

“得啦，”另一个说。“我们走吧。在这里扯淡可不行。”

“你好啊，埃利西奥，”那人上马的时候，比拉尔对他说。

“我会好到哪里去？”他粗鲁地说。“走吧，大娘。我们忙着呢。”

巴勃罗跨上了那匹大栗色马。

“你们把嘴闭上，跟着我走，”他说。“我带你们到该下马步行的地方去。”

第四十章

当罗伯特·乔丹睡觉的时候，当他计划炸桥的时候，当他和玛丽亚在一起的时候，安德烈斯进展很慢。他以一个体格强壮、熟悉地形的乡下人在黑夜里赶路的速度，越过田野，穿过法西斯防线，最后来到共和国的防线。不过，一旦进入了共和国防线，进程就很慢了。

从情理上说，他只要出示罗伯特·乔丹给他的盖有军事情报部公章的通行证和盖有同样公章的急件，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向目的地进发就行了。但是他一开头在前线就遇上了那个连长，此人象只猫头鹰般对这整个使命疑虑重重。

他跟随连长来到他所属的营部，营长听了他谈到的使命后热情满怀。他在革命前是个理发师。这位名叫戈麦斯的营长骂连长蠢，拍拍安德烈斯的背，请他喝了一杯次货白兰地，还告诉他说，他以前做过理发师，一直想当游击队员。他接着叫醒了他的副官，把营的工作交给他，并派勤务兵去叫醒他的摩托车司机，把他带来。戈麦斯不是要摩托车司机送安德烈斯到旅部，而是决定亲自带他到那儿去赶快了结这桩事，于是在那两边栽着两行大树、布满炮弹窟窿的山路上，安德烈斯抓紧了前面的座垫，他们一路颠簸着，轰隆隆地前进，摩托车的前灯照亮了刷白的树身，显出革命开始后第一个夏季在这里沿路作战时树身上被弹片和子弹刮掉白粉和炸裂树皮的地方。他们拐进一个被炸坏屋顶的山区疗养院，旅部就设在那儿。戈麦斯象个赛车运动员一般刹住了摩托车，把车子停靠在墙边，有个瞌睡的门岗

对他一个立正。戈麦斯把他推开，走进一个大房间，房里四壁张挂着大地图，有个十分瞌睡的军官坐在写字台旁，戴着一只绿色的护目鸭舌帽，台上有盏台灯、两架电话和一份《工人世界报》。

这位军官抬头望望戈麦斯说，“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你从没听说过有电话这东西吗？”

“我必须见中校，”戈麦斯说。

“他在睡觉，”军官说。“我在一英里外就见到你亮着车灯在路上开来。你想把炮弹招来吗？”

“去叫中校吧，”戈麦斯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对你说：他在睡觉，”军官说。“是什么土匪跟你在一起啊？”他朝安德烈斯点点头。

“他是火线那边来的游击队员，带来一份给戈尔兹将军的极端重要的急件；戈尔兹将军指挥黎明时在纳瓦塞拉达那边发动的进攻，”戈麦斯激动而焦急地说。“看天主份上，把中校叫醒吧。”

军官用罩着绿色赛璐珞帽舌的眼睑松垂的眼睛望着他。

“你们全疯了，”他说。“什么戈尔兹将军，什么进攻，我都不知道。带这个运动员回你营部去。”

“叫醒中校，我说，”戈麦斯说，安德烈斯见到他的嘴绷得紧紧的。

“滚你妈的蛋，”军官懒洋洋地对他说，转过头去。

戈麦斯从枪套里拔出他那沉重的九毫米口径的星牌手枪，猛的抵在军官肩上。

“叫醒他，你这个法西斯杂种，”他说。“叫醒他，否则我要你的命。”

“冷静一点，”军官说。“你们这些剃头的全是动不动就发

火。”

安德烈斯在台灯光中见到戈麦斯恨得脸变了样，但是他所说的只是：“叫醒他。”

“勤务兵，”军官用轻蔑的声音喊道。

一个小兵来到门口，敬了个礼，就走出去了。

“他的未婚妻跟他在一起，”军官说着又看起报来。“他准会乐意见你的。”

“妨碍人们努力打赢这场战争的就是象你这种家伙，”戈麦斯对这个参谋说。

军官不搭理他。他接着一边读报，一边仿佛在自言自语：“这份刊物好不古怪！”

“那你为什么不看《辩论报》呢？那才是你们的报纸。”戈麦斯对他说，指的是革命前在马德里出版的天主教保守党的机关报。

“别忘了我是你的上级军官，我给你打个报告是有分量的，”军官头也不抬地说。“我从来不看《辩论报》。别血口喷人。”

“不。你看的是《阿贝赛报》^①，”戈麦斯说。“军队里还是多的是你这样的职业军人，真是腐败不堪。但是情况不会总是这样的。我们夹在无知的和冷眼旁观的这两种人中间。但是我们要教育前一种人，消灭后一种人。”

“你该用‘清洗’这个词儿，”军官说，仍然没抬头。“这上面报道说，你的了不起的俄国人又被清洗了许多。在当今这个时代，他们清洗得比泻盐还凶。”

^① 《阿贝赛报》(“A.B.C.”)为西班牙一大报，创刊于一九〇四年，采取保守的保皇派观点。

“不论什么词，”戈麦斯激烈地说。“不论用什么词，只要把你这号人肃清就行。”

“肃清，”军官傲慢而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一个没有西班牙语味道的新名词儿。”

“那么用‘枪毙’，”戈麦斯说。“这是西班牙词儿。你懂吗？”

“懂，老兄，可是别那么大声嚷嚷。在这旅参谋部睡觉的，除了中校还有别人哪。你的热情叫我厌烦。就为了这个原因，我总是自己刮脸。我一向讨厌和理发师谈话。”

戈麦斯望望安德烈斯，摇摇头。他眼睛里闪着由于愤恨而激起的泪光，但是他摇摇头，没说什么，同时咽下所有的眼泪，留到将来的某一时刻。在这一年半里，他晋升为那一山区的营长，他咽下了多少眼泪啊。这时，穿着睡衣睡裤的中校来到屋里，他马上立正敬礼。

米兰达中校是个脸色灰白的矮子，一生都在军界，他在摩洛哥得胃病的时候，失去了在马德里的妻子的爱情。他发现没法和妻子离婚（要恢复他的消化机能却不成问题），才参加了共和党，以中校身分参加了内战。他只有一个抱负，就是战争结束时保持同样的军衔。他守卫山区干得很出色，他希望留在那里，每当山区遭受攻击时加以保卫。大概是由于被迫缩减肉食的原因，他在战争中觉得健康多了，他储存了大量小苏打，晚上喝威士忌；他的二十三岁的情妇怀孕了，就象所有那些从去年七月开始当女民兵的其他姑娘一样。他这时来到房间里，点点头回答戈麦斯的敬礼，并伸出手来。

“戈麦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他问，接着对写字台边的军官，他的作战科长说，“请给我支烟，佩贝。”

戈麦斯给他看安德烈斯的证件和急件。中校对通行证候的

看了一眼，就望着安德烈斯，点点头，微微一笑，然后如饥似渴地看急件。他摸摸印鉴，用食指检验一下，然后把通行证和急件一起交还安德烈斯。

“山里生活很艰苦吗？”他问。

“不，我的中校，”安德烈斯说。

“他们告诉你最可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戈尔兹将军吗？”

“纳瓦塞拉达，我的中校，”安德烈斯说。“英国人说这地方在火线后，靠近纳瓦塞拉达的西南面。”

“什么英国人？”中校静静地问道。

“跟我们在一起的英国人，是个爆破手。”

中校点点头。这恰恰又是这次战争中出人意外的无法解释的罕见现象。“跟我们在一起的英国人，是个爆破手。”

“戈麦斯，你还是用摩托车把他送去吧，”中校说。“给他们开一张到戈尔兹将军参谋部去的可靠的通行证，我来签字，”他对那戴着绿色赛璐珞护目帽的军官说。“用打字机打，佩贝。这是他的详细情况，”他示意安德烈斯把通行证拿出来。“盖上两个章。”他转身对戈麦斯。“你今晚需要喝些烈酒。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在计划发动进攻的时候，必须多加小心。我要给你些我调配的烈酒。”他接着十分亲切地对安德烈斯说，“想来些什么，吃的，还是喝的？”

“不要，我的中校，”安德烈斯说。“我不饿。在最后一个队部，他们给我喝了法国白兰地，再喝要叫我头晕了。”

“你一路过来的时候，见到我的防线对面有什么军事活动吗？”中校客气地问安德烈斯。

“老样子，我的中校。很平静。很平静。”

“大约三个月前，我不是在塞尔赛迪利亚见过你吗？”中校

问。

“是，我的中校。”

“我原是怎么想的，”中校拍拍他的肩膀。“那时您跟安塞尔莫老头在一起。他好吗？”

“他好，我的中校，”安德烈斯对他说。

“好。这使我很高兴，”中校说。那军官给他看打好的证件，他看了一遍，签了名。“你们现在必须马上就走，”他对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说。“开车要注意，”他对戈麦斯说。“要把车灯打亮。单独一辆摩托车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可你们必须多加小心。代我向戈尔兹将军同志问好。在佩格林诺斯战役后我们碰过头。”他和他们两人都握了手。“把证件扣在衬衣里面，”他说，“摩托车上风很大。”

他们走后，他走到食柜边拿出酒杯酒瓶，斟了些威士忌，从一把靠墙放在地上的瓦壶里掺了一点水在酒里。接着，他举杯慢慢地啜饮，面对挂在墙上的大地图，研究在纳瓦塞拉达以北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点。

“幸亏由戈尔兹去对付，不是我，”他临了对坐在书桌边的军官说。军官没回话，中校的目光离开了地图，来望军官，只见他脑袋伏在手臂上，已睡着了。中校走到桌边，把两架电话推进在一起，在那军官脑袋两旁各放一架，紧挨着他的脑袋。他接着走到食柜边，又斟了些威士忌，在里面掺了水，再回到地图面前。

戈麦斯叉开双臂驾着摩托车，安德烈斯紧抓住座位，低头顶着风，摩托车噗噗噗地行驶在乡间大路上，车灯劈开了黑夜，前面的路面在路边两排黑黑的高大的白杨树中显得很分明，在大路朝下穿过小河河床边的迷雾时显得模模糊糊，呈现出柔和的晕黄色，等到路面升高时，又越来越分明了，前面出现了交叉路，

车灯照亮了从山上开下来的一行灰暗的空卡车。

第四十一章

巴勃罗在黑暗中停下来，跨下马背。罗伯特·乔丹听到他们大家下马时咯吱咯吱的声音、沉重的呼吸声和一匹马把头一甩时马勒上发出的叮当声。他闻到马的气味，新来的人没水洗脸洗澡、和衣而睡而身上带着的酸臭，以及待在山洞里那些人身上隔宿的烟火味。巴勃罗就站在近旁，罗伯特·乔丹闻到他身上发出的铜腥般的酒酸味，仿佛嘴里含着铜币的感觉。他用手握成杯形，挡着火光点燃了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听到巴勃罗声音很低地说，“我们去拴马脚的时候，比拉尔，你把装手榴弹的口袋卸下来。”

“奥古斯丁，”罗伯特·乔丹放低了声音说，“现在你和安塞尔莫跟我到桥头去。装机枪子弹盘的口袋在你那儿吗？”

“在，”奥古斯丁说。“干吗不在啊？”

罗伯特·乔丹向比拉尔身边走去，普里米蒂伏正在帮她把东西从一匹马上卸下来。

“听着，大娘，”他低声说。

“有什么事？”她沙哑地小声说，把马腹下的肚带钩解掉。

“你要听到扔炸弹的声音才能袭击哨所，明白了吗？”

“你得跟我说多少回啊？”比拉尔说。“英国人，你变得象个老太婆啦。”

“不过是想检查一下，”罗伯特·乔丹说。“端掉了哨所，你得回过头来向桥靠拢，从上面和我的左翼用火封锁公路。”

“你第一次跟我交待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再跟我说，我也一样，”比拉尔对他低声说。“干你自己的事吧。”

“没听到轰炸声，谁也不许动，不许放枪，也不许扔手榴弹，”罗伯特·乔丹低声说。

“别再烦我了，”比拉尔恼火地小声说。“我们在‘聋子’那儿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罗伯特·乔丹走到巴勃罗在拴马的地方。“我只把那些容易受惊的马拴住脚，”巴勃罗说。“我这样拴，只要一拉绳子，它们就能自由行动，明白吗？”

“好。”

“我来告诉丫头和吉普赛人怎样看管马儿，”巴勃罗说。他那伙新来的弟兄单独聚集在一起，身子支着卡宾枪。

“大家都明白了？”罗伯特·乔丹问。

“怎么不明白？”巴勃罗说。“端掉哨所。切断电线。回过头来向桥靠拢。封锁桥面，等你炸桥。”

“轰炸开始之前不许有任何行动。”

“就是这样。”

“那就行了。祝你顺利。”

巴勃罗咕噜了一声，他接着说，“我们回头赶来的时候，你会用机枪和你的小机枪好好掩护我们，英国人，对吗？”

“毫无疑问，”罗伯特·乔丹说。“全力以赴。”

“那好，”巴勃罗说。“没说的了。不过你到那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啊，英国人。这掩护的事儿不简单，除非你十分小心。”

“我会亲自掌握机枪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你很有经验吗？我可不愿意让奥古斯丁把我毙了，尽管他没一点儿坏心眼。”

“我很有经验。没错。要是奥古斯丁使另外一挺机枪，我会叫他注意越过你的头射击。高高地越过你的头。”

“那就没说的了，”巴勃罗说。他接着推心置腹地低声说，“马还不够哪。”

这婊子养的，罗伯特·乔丹想。难道他以为我没有听懂他以前第一次跟我讲的话吗？

“我可以步行，”他说。“马由你支配。”

“不，有一匹马给你的，英国人，”巴勃罗低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匹。”

“这是你的事情，”罗伯特·乔丹说。“你不用把我算在里面。你那挺新机枪的弹药够吗？”

“够，”巴勃罗说。“那个骑兵身上的全部弹药都在。我只打了四发试试。我是昨天在高山里试的枪。”

“我们走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必须一早就赶到那儿，好好隐蔽起来。”

“我们大家都走吧，”巴勃罗说，“祝你顺利，英国人。”

我不知道这个杂种现在在打什么主意，罗伯特·乔丹想。但是我十分肯定我摸准了。得了，这是他的事，和我不相干。感谢上帝我不认识这些新来的人。

他伸出手来说，“祝你顺利，巴勃罗。”黑暗中，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罗伯特·乔丹伸手的时候，以为会象握住什么爬虫的身体或接触麻风病患者的皮肤那样。他不知道握巴勃罗手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在黑暗中，巴勃罗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坦率地紧握着，他就报以同样的紧握。巴勃罗的手在黑暗中是强壮可靠的，握着它使罗伯特·乔丹产生了那天早晨他心里最离奇的感觉。

他想：我们现在必须做盟友。盟友间总是多多握手言欢的。且不提授勋或吻脸颊那一套，他想。我高兴的是我们不用这样做。看来所有的盟友都是这么回事吧。他们总是打心底里彼此憎恨。这个巴勃罗可是个怪人啊。

“祝你顺利，巴勃罗，”他说，紧握着这只陌生、有力而意志坚强的手。“我会好好掩护你的。别担心。”

“对不起得很，我拿走了你的爆破材料，”巴勃罗说。“那是我的错。”

“可是你带来了我们需要的人马。”

“我并不为了炸桥而反对你，英国人，”巴勃罗说。“我估计是能圆满成功的。”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搞同性恋爱？”黑暗中，比拉尔忽然在他们身旁说。“这正是你缺少的，”她对巴勃罗说。“走吧，英国人，别婆婆妈妈的道再见啦，免得这家伙再偷了你剩下的炸药。”

“你不理解我，太太，”巴勃罗说。“英国人和我彼此理解了。”

“没人理解你。天主和你的娘都不理解你，”比拉尔说。“我也不理解。走吧，英国人。跟你那短毛丫头说声再见就走吧去你的爹，不过我有个想法：公牛就快放出来，你害怕了。”

“你娘的，”罗伯特·乔丹说。

“你从来没娘，”比拉尔兴高采烈地低声说。“现在走吧，因为我巴不得马上开始，赶快了掉。跟你的人一起走吧，”她对巴勃罗说。“谁知道他们的决心能维持多久？其中有两三个蠢的，我可不愿拿你跟他们交换呢。带他们走吧。”

罗伯特·乔丹背起背包，走到马那儿去找玛丽亚。

“再见，漂亮的姑娘，”他说。“我不久就要和你见面的。”

这时，他对这一切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感觉，好象这些话他以前全说过，又好象有一列火车正要开出，尤其象真有一列火车，而他正站在月台上。

“罗伯托，再见，”她说。“多加小心。”

“当然，”他说。他低下头去吻她，背上的包向前滚，撞在他后脑勺上，因而使他的前额跟她的重重地碰了一下。碰撞的时候，他想起这情形以前也碰到过。

“别哭，”他别扭地说，倒不仅仅是因为背着很重的东西。

“我没哭，”她说。“可你快回来啊。”

“听到枪声别担心。今儿必然会大打其枪。”

“不担心。只要你快些回来。”

“再见，漂亮的姑娘，”他别扭地说。

“再见，罗伯托。”

自从罗伯特·乔丹第一次离家从红棚屋城乘火车到比林斯，再从那儿转车去上学以来，他还没感到过象现在的这种孩子情绪。他当初怕离家，他不愿让任何人知道他怕，在车站上，就在列车员搬上踏脚箱让他能跨上普通客车的踏板时，他父亲向他吻别，并说：“在我们分居两地的时候，愿主保佑我们俩。”他父亲是个笃信宗教的人，这句话说得坦率而真挚。但他的胡子湿漉漉的，他激动得眼眶都润湿了。这虔诚的祝祷，他父亲和他的吻别，这一切使罗伯特·乔丹非常窘，以致他突然间觉得比他父亲年老得多，并替他父亲感到难受，因为他竟然忍受不了这别离的哀愁。

火车开动后，他站在车厢的后平台上，望着车站和水塔变得越来越小，在那不断的卡嗒卡嗒声中，他被带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只见中间横着一根根枕木的铁轨在远处聚成了一点，旁边的

车站和水塔显得精致而微小。

那司闸员说：“看来你爸爸为你离家很难受呢，鲍勃。”

“是的，”他说，望着路基旁的艾灌丛，这片艾灌丛穿过在眼前飞掠过的一根根电线杆之间，直长到象小河般蜿蜒的泥路边。他想看看有没有大松鸡。

“离家去上学，你无所谓吗？”

“无所谓，”他说。这是真的。

在那以前并不是真的，而在那一刻却是真的。直到现在，在这次别离的时候，他才感到当初火车开动前所感到的那种孩子情绪。他这时感到非常孩子气、非常别扭，他非常别扭地道别，就象做学生的时候，和年青的女同学在大门口说再见一样别扭，不知道是吻她好，还是不吻好。然而他知道，他感到别扭的不是道别，而是马上要来的跟敌人的交锋。他对这次交锋感到非常别扭，道别给他的别扭的感觉仅仅是这种心情的一部分而已。

你又来这一套了，他对自己说。不过依我看，随便哪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年纪太轻，应付不了这回事。他不想说这种心情是什么。得了，他对自己说。得了，你的第二童年^①不会就来，还早着呢。

“再见，漂亮的姑娘，”他说。“再见，兔子。”

“再见，我的罗伯托，”她说。他走到安塞尔莫和奥古斯丁站着的地方，说，“咱们走吧。”

安塞尔莫把沉重的背包扛上肩。奥古斯丁离山洞时全身挂满了东西，这时靠在一棵树身上，自动步枪戳出在背包顶上。

“好，”他说。“咱们走。”

① 指人老了，智力衰退而行动幼稚，好象回复到童年时期。

他们三人开始下山。

“祝你顺利，堂·罗伯托，”当他们三人排成单行在树林中行进，经过费尔南多身边时，费尔南多说。他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蹲着，说话的口气郑重其事。

“费尔南多，祝你也顺利，”罗伯特·乔丹说。

“祝你一切顺利，”奥古斯丁说。

“谢谢你，堂·罗伯托，”费尔南多不顾奥古斯丁打岔，说。

“他真是个怪人，英国人，”奥古斯丁低声说。

“你说得不错，”罗伯特·乔丹说。“我能帮你拿些东西吗？你背这么多东西，象匹马了。”

“我能行，”奥古斯丁说。“老兄，我高兴的是我们要动手啦。”

“小点儿声，”安塞尔莫说。“从现在开始，少说话，声音放低些。”

他们小心地爬下山去，安塞尔莫领头，第二个是奥古斯丁，罗伯特·乔丹呢，小心地一步步踩着，免得摔交。他感到绳底鞋踩在枯萎的松针上，一只脚给松树根绊了一下，就向前伸出一只手去，摸到了掇出在前的自动步枪冷冷的枪筒和折叠起来的三脚枪架；接着走之字形下山，他的鞋子在松林地上一高一低地滑动，他又伸出左手，摸到一根粗糙的树干，接着挺起身来，手上摸到一块光溜溜的树皮被割开的地方，他把手缩回来，手心下部沾着粘糊糊的树脂。他们从树木丛生的陡坡上一路下来，来到桥上方的一个地方，那儿就是罗伯特·乔丹和安塞尔莫第一天伏着侦察的地方。

这时，安塞尔莫在黑暗中被一棵松树挡住了去路，他握住罗伯特·乔丹的手腕，小声地说，声音低得罗伯特·乔丹几乎听不

到，“瞧。那家伙的火盆里有火。”

这一点火光的所在，罗伯特·乔丹知道，就是下面那公路直通桥堍的地方。

“这儿就是我们上次侦察的地方，”安塞尔莫说。他抓住罗伯特·乔丹的手往下按，摸摸一根树干下部新割去一小块树皮的地方。“这是你侦察时我做的记号。右面是你打算架机枪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架在那儿吧。”

“好。”

他们把背包放在几棵松树背后的地上，安塞尔莫领着其他两人向一块长着一簇小松树的平地走去。

“这儿，”安塞尔莫说。“就是这儿。”

“天一亮，”罗伯特·乔丹蹲在小树后对奥古斯丁低声说，“你从这儿可以看到这边一小段公路和桥堍。还可以看到桥身和另一边一小段公路，再过去，公路就拐弯隐没在岩石后了。”

奥古斯丁不作声。

“我们准备爆破时，你伏在这里，上面或下面有敌人来，你就射击。”

“这火光是什么地方？”奥古斯丁问。

“是这边的岗亭里的，”罗伯特·乔丹低声说。

“谁来对付哨兵？”

“老头子和我，我已经跟你讲过啦。但是，如果来不及对付他们，你必须向岗亭里射击，看到人就射击。”

“是。这个你跟我说过了。”

“爆炸之后，当巴勃罗一伙从那边拐角上转过来的时候，要是有人追他们，你必须越过他们的头射击。他们出现的时候，你

必须越过他们的头射击，不能让敌人追过来。你懂了吗？”

“怎么不懂？就象你昨天晚上所讲的那样。”

“有问题吗？”

“没有。我带着两个麻袋。我可以在上面隐蔽的地方装满泥土，搬到这里来当沙袋。”

“但是别在这儿挖土。你必须象我们在山顶上一样，好好隐蔽起来。”

“不妨事。我会在黑暗中装好了土搬过来。你回头瞧吧。我会弄得妥妥帖帖，一点看不出来。”

“你太接近了。明白吗？天一亮，下面能清清楚楚地望到这簇小树。”

“别担心，英国人。你去哪儿呢？”

“我带着我这小机枪就在这儿下面。老头子要越过峡谷，准备攻另一头的岗亭。那岗亭和我们反方向。”

“那就没别的事了，”奥古斯丁说。“祝你顺利，英国人。你有烟吗？”

“你不能抽烟。离敌人太近了。”

“不。只叼在嘴上。以后抽。”

罗伯特·乔丹把他的纸烟盒给他，奥古斯丁拿了三支，插在他那平顶牧人帽的前帽沿里。他拉开机枪的三脚架，把它架在矮松树间，开始摸索着解开他背的包，把东西放在顺手的地方。

“没别的事了，”他说。“好了，没别的了。”

安塞尔莫和罗伯特·乔丹把他留在那儿，回到放背包的地方。

“我们把它放在哪儿好？”罗伯特·乔丹低声说。

“我看就在这儿。可是你用手提机枪从这儿有把握干掉那

个哨兵吗？”

“这儿的确就是那天我们来过的地方？”

“树就是那棵树，”安塞尔莫的说话声低得几乎听不到，罗伯特·乔丹知道，就象他第一天那样，说话时嘴唇都不动。“我用刀子做了记号。”

罗伯特·乔丹又感到好象这一切以前全发生过，但这次是由于他重复提问和安塞尔莫的回答而产生的。奥古斯丁刚才也是这样，他问了一个有关哨兵的问题，虽然回答是他早知道的。

“够近啦。简直太近了，”他低声说。“不过天亮后我们是逆光。我们在这儿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到峡谷对面去，在那一头作好准备，”安塞尔莫说。他接着说，“请你再说一遍，英国人。免得出差错。我兴许会瞎了眼。”

“什么？”罗伯特·乔丹说得悄没声儿的。

“只要重说一遍，让我照做不误。”

“等我开枪的时候，你开枪。消灭了你要对付的那个人之后，过桥到我这边来。我会把背包带到那儿去，你根据我向你交待的那样安放炸药。该做什么，我都会告诉你的。要是我出了毛病，根据我以前教你的办法，你自己干下去。别慌张，好好干，木楔都要塞牢，把手榴弹捆结实。”

“我全清楚了，”安塞尔莫说。“我全记住了。现在我走了。英国人，天亮的时候你自己要好好隐蔽。”

“你开枪的时候，”罗伯特·乔丹说，“把枪支好，要打得十分稳。别把他们当人看，只当他们枪靶子，记住了！不要对整个人开枪，要瞄准一点。假使他脸朝你，瞄准腹部中央射击。他脸朝别处的话，射击他背脊中央。听着，老头子。我开枪打坐着的人

时，总乘他站起来还没拔脚奔跑或蹲下就打枪。如果他还是坐着，就打枪。别等。但要瞄准。要在五十码之内射击。你是猎人，不会有问题。”

“我照你的命令干，”安塞尔莫说。

“对。我的命令就是这样，”罗伯特·乔丹说。

高兴的是我没有忘记把这作为命令，他想。这会帮助他解决困难。这样多少可以打消他的一点内疚。反正我希望如此。多少打消一点。我记不起他第一天跟我谈的关于杀人的那些话了。

“这就是我的命令，”他说。“现在走吧。”

“我走啦，”安塞尔莫说。“回见，英国人。”

“回见，老头子，”罗伯特·乔丹说。

他想起了他父亲在车站上的模样和告别的眼泪，他没有说平安、再见、祝你顺利那一类的话。

“你枪筒里的油擦掉了吗，老头子？”他低声说。“免得枪打不准。”

“在山洞里，”安塞尔莫说，“我就用通条全擦过了。”

“那么回见吧，”罗伯特·乔丹说罢，老头儿就大摇大摆地在树林里走开去了，绳底鞋踩在地上声息全无。

罗伯特·乔丹伏在树林的松针地上，倾听着随黎明而来的晨风吹拂树枝的声音。他把手提机枪的子弹夹抽出来，前后推动枪机。他接着把枪调过头来，拉开枪机，在黑暗中把枪口凑在嘴唇上，往枪筒里吹气，舌头触及枪筒边时尝到了滑腻的金属上的油味。他把枪横搁在前臂上，枪身朝上，免得松针和其他东西掉到里面去，用大拇指把所有的子弹从子弹夹中退出来，放在一块摊在面前的手帕上，然后在黑暗中摸着每颗子弹，在手指间

转弄一下，再把子弹一颗颗地推进子弹夹。这时，他手里的子弹夹又变得沉甸甸的了，他把子弹夹再推进手提机枪，卡嗒一声上准了。他匍匐在一棵松树后面，机枪横架在他左前臂上，注视着下面的那点火光。他有时见不到这火光，他知道这是因为岗亭里的哨兵走到了火盆的前面。罗伯特·乔丹伏在那儿等天亮。

第四十二章

从巴勃罗打山间骑马回山洞，到那一队人马下山到达他们安放马匹的地方的期间，安德烈斯快速向戈尔兹的司令部前进。他们来到通向纳瓦塞拉达的公路干线，公路上有不少卡车从山区开回来。他们遇到一个关卡。戈麦斯向关卡哨兵出示米兰达中校签发的通行证，哨兵用手电照在通行证上，给跟他在一起的另一个哨兵过过目，就交还证件，行了个礼。

“往前走，”他说。“可不准开灯。”

摩托车又噗噗地响起来，安德烈斯紧抓住前座，戈麦斯在车流中小心地沿着公路驶去。没有一辆卡车开着灯，长长一列车队在路上迎面开来。路上还有满载的卡车向山区驶去，每一辆都掀起了一片尘土，安德烈斯在黑暗中看不见，只觉得尘土随着风扑在脸上，弄得牙缝中都是。

他们紧跟着一辆卡车的后挡板，摩托噗噗作响，接着戈麦斯加快速度，超过这辆卡车，再超过一辆又一辆，而对面开来的别的卡车在他们的左侧隆隆驶过去。这时他们后面来了一辆汽车，喇叭接连地狂鸣，和卡车的噪声以及尘土混在一起；接着车灯倏的亮起来，把尘土照成了一根黄色柱体，在尖厉的换档声中，

在咄咄逼人、恶意威胁的喇叭声中，汽车在他们身边一掠而过。

接着，前面的所有车辆都停下了，他们钻空档继续朝前驶，越过了几辆救护车、几辆参谋部用车和一辆装甲车，接着又是一辆，接着是第三辆，所有的车子都停着，停在那尚未沉落在地的尘土中，好象一只只笨重的、插着枪炮的金属乌龟。他们发现前面又是一个关卡，那里发生了撞车事故。有一辆卡车停下时，后面的一辆没有发觉，因此后车向前驶去，撞坏了前车的尾部，使几箱轻武器弹药掉在路上。有一箱落地时摔碎了，当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停下来推车穿过那些被阻塞的车辆、向关卡出示通行证的时候，安德烈斯踩着散布在路面尘土中的成千上万颗子弹铜壳。第二辆卡车的散热器全被撞毁了。第三辆紧顶着它的后挡板。还有一百多辆车子排列在后面。一个穿套靴的军官在路上往回跑着，大声喝令司机们打倒车，以便把那辆被撞毁的卡车从公路上拖开。

卡车多得没法打倒车，除非那军官跑到这越来越长的车队最后面，阻止后面的车子再驶上前来。安德烈斯看到他跌跌撞撞地跑着，打亮了手电，又叫又骂，而卡车在黑暗中还是不断驶上前来。

关卡上的哨兵不肯交还通行证。哨兵一起两个，背上背着步枪，手里拿了手电，他们也在叫喊。手拿通行证的那个跨过公路，朝一辆从山上驶下来的卡车走去，吩咐司机开到下一个关卡时通知他们截住那儿所有的卡车，直到交通畅通为止。卡车司机听完就继续朝前开。哨兵手里仍拿着通行证，嘴里叫嚷着，走到那个车上东西被撞落在地上的司机身边。

“别管它了，看在天主面上，往前开吧，让我们保持交通畅通！”他冲着那司机喊道。

“我车上的传动器撞坏了，”司机说，他俯身在卡车的后边。

“去你的传动器。往前开，听到没有。”

“差速齿轮撞坏了，没法往前开，”司机对他说，又俯下身去。

“那么叫人家把你的车拖走，好让我们把另一辆弄走。”

司机阴沉地望着他，那关卡人员把手电直射在这卡车被撞毁的车尾上。

“往前开。往前开，”他手里仍拿着通行证大声说。

“我的证件，”戈麦斯对他说。“我的通行证。我们要赶路。”

“你的通行证见鬼去吧，”那人说，把证件交还他，就横穿过公路，跑去阻挡一辆下行的卡车。

“在十字路口拐弯，倒过来拖走这辆破车，”他对司机说。

“我奉的命令是——”

“去你的命令。照我说的办。”

司机换了档，在路上笔直驶去，消失在尘土里。

戈麦斯发动摩托车，越过那辆破卡车，开上这时没有车辆行驶的公路右侧，安德烈斯又抓紧前座，看见关卡上的哨兵又拦住了一辆卡车，那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听他讲。

这时他们飞速行驶，顺着朝山上一步步升高的公路进发。所有上行的车辆都被阻在关卡上，只有下行的卡车在左边不断地开过，而摩托车不停地迅速往山上开，开始赶上早在关卡交通堵塞前就驶过去的上行车辆。

他们仍没开灯，又超过了四辆装甲车，接着超过了一长排运载士兵的卡车。士兵们在黑暗中默不作声，安德烈斯经过时起初只觉得在尘埃飞扬中高高的卡车上有些模糊的人形。接着，他们后面来了一辆参谋部的汽车，喇叭嘟嘟地叫，车灯一明一暗，每次亮灯的时候，安德烈斯看到这些士兵头戴钢盔，直握着步

枪，机关枪直指黑黝黝的天空，轮廓分明地呈现在黑夜中，等灯光一熄灭，就倏地消失。有一次，当他们驶近一辆装载士兵的卡车而后面亮灯的时候，他在这突然的闪光中看到他们死板而悲伤的脸。他们戴着钢盔，坐在卡车里，在黑暗中驶向某处地方，他们只知道要在那儿发动一场进攻，各自心事重重，耷拉着脸，这突来的灯光显示了他们的神情，换了白天，他们羞于给同伴看到，是不会流露的，除非到开始轰炸和攻击的时候，那时谁都顾不上自己的脸色了。

安德烈斯和戈麦斯的摩托车超过一辆又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仍旧在参谋部汽车前面行驶着，戈麦斯可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脸色问题。他想的只是：“多了了不起的军队。多了了不起的装备。多了了不起的机械化啊。瞧啊！瞧这些人。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军队。瞧他们。一辆又一辆卡车。一式的制服。头上全都戴着钢盔。瞧卡车上架着机枪准备对付敌机。瞧我们已经建立的军队！”

这些高高的灰色卡车满载着士兵，车上有很高的方形驾驶室和难看的方形散热器，摩托车超过它们，在尘土中不停地顺着公路朝山上行驶，紧跟在后面的参谋部汽车的灯光时明时灭，部队的红星标志在摩托车经过卡车后挡板的时候在亮光中闪现着，当车灯照在沾着尘土的卡车车身一侧的时候闪现着。他们这时不停地向山上驶行，空气更寒冷了，公路开始常常拐弯，呈之字形，卡车艰难地嘎吱嘎吱地爬行，在车灯的闪光中有的卡车的水箱冒着汽雾，摩托车这时也在艰难地爬行，安德烈斯紧抓着前座，这时想：这次乘摩托车时间太长了。实在太长了。他以前从没乘过摩托车，现在他们俩正在即将举行进攻的部队调动中爬山，当他们向上驶行的时候，他知道，现在要赶回去袭击哨所

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在这种调动和混乱中，他第二天晚上能赶回去就算运气了。他以前从没见过进攻和进攻的准备工作，当他们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共和国所建立的这支军队的规模和力量，使他惊讶不已。

他们这时驶上了斜贯山坡的一长段又陡又斜的山路，接近山顶的时候，坡度更陡了，戈麦斯只得叫安德烈斯下了车，两人一起把摩托车推上这一段最后的陡坡。越过山顶，左面有一条汽车可以调头的回车道，夜空中出现了一幢又宽又黑的巨大的石头建筑物，门前闪烁着灯光。

“我们到那儿去问问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吧，”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他们就把摩托车推向那巨大的石头建筑物，只见关闭的大门前站着两个哨兵。戈麦斯把车子靠在墙上，那建筑物的门这时开了，从里面透露出来的灯光中可以看出有个身穿皮上衣的摩托车司机走出来，肩背一只公文包，腰后挂着一支有木壳的毛瑟枪。就在灯光消失的时候，他在黑暗中在门口找到了他的摩托车，把它一直推到引擎发动起来，突突地响着，接着就在公路上噗噗地驶去。

戈麦斯在门口跟那两个警卫中的一个说话。“第六十五旅的戈麦斯上尉，”他说。“请问指挥第三十五师的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在哪里？”

“这儿没有，”警卫说。

“这儿是什么地方？”

“指挥部。”

“什么指挥部？”

“哎，就是指挥部嘛。”

“是什么指挥部啊？”

“你是谁，问这问那的？”警卫在黑暗中对戈麦斯说。这里，山路顶点的上空非常晴朗，星星都露面了，现在没有了尘土，安德烈斯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他们下面，公路向右转弯，他能清楚地看到卡车和汽车行驶到那里时被天空衬托出来的轮廓。

“我是第六十五旅第一营的罗赫略·戈麦斯上尉，要打听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在哪儿，”戈麦斯说。

那哨兵把门推开一点，朝里面喊道，“叫警卫班长。”

正在这时，一辆参谋部的大汽车在公路的拐角处一个大转弯，朝这石头大建筑物驶来，安德烈斯和戈麦斯正站在那儿等待警卫班长。车子开到他们面前停下。

一个年老肥胖的大个子和两个身穿国际纵队制服的人从车子后座下来。他戴着一顶过大的卡其贝雷帽，就象法国军队里轻步兵戴的那种，还穿着大衣，拎着一只地图包，大衣腰带上系着一支手枪。

他说的是法语，安德烈斯听不懂，戈麦斯当过理发师，能听懂几句。他吩咐司机把车子从门口开到车房里去。

他和其他两个军官进门的时候，戈麦斯在灯光中清楚地看到他的脸，认出他是谁。他曾在几次政治会议上见到过他，并且经常在《工人世界报》上看到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他的文章。他认出他那毛茸茸的眉毛、水汪汪的灰眼睛、肥胖的双下巴，他知道他是当代法国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曾经领导过在黑海的法国海军起义。戈麦斯知道这个人在国际纵队的崇高的政治地位，他一定知道戈尔兹的司令部所在地，并且能够指引他到那儿去。他不知道岁月的流逝、失望、家庭和政治那两方面的怨恨、挫伤了抱负在这个人身上产生了什么变化；他不知道向他问讯是最

最危险的事情之一。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情况，径直朝这个人走去，握紧拳头敬了个礼，说：“马蒂同志^①，我们带有给戈尔兹将军的急件。你能指引我们到他司令部去吗？事情很紧急。”

这个高高的肥胖的老人伸出了脑袋望着戈麦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仔细打量着他。即使在这儿前线，在这没有灯罩的灯泡的光线下，在凉爽的夜晚乘了敞篷汽车刚回来，他那张灰脸上还是露出了一副枯衰的神色。他的脸使你觉得象是一头十分衰老的狮子爪下的废料所组成的。

“你带着什么，同志？”他问戈麦斯，说的是带有很重的加泰隆语^②口音的西班牙语。他从眼角上向安德烈斯扫了一眼，随即又回头望着戈麦斯。

“到戈尔兹司令部给他送一份急件，马蒂同志。”

“哪儿来的急件，同志？”

“从法西斯阵线后方来的，”戈麦斯说。

安德烈·马蒂伸手拿了急件和别的证件，瞥了一眼，就放进衣袋里。

“把他们抓起来，”他对警卫班长说。“把他们身上搜查一下，等我吩咐再把他们带来。”

他衣袋里装着急件，大步走进那幢石头大房子。

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在外面的警卫室里受一个警卫搜查。

①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安德烈·马蒂生于一八八六年。一九一九年，他领导法国水兵在黑海起义，失败后被捕，至一九二三年才被释放。一九二四和一九三六年，两度当选为法国国民会议议员，他是国际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于一九五三年初正式被开除出党。

② 加泰隆语为西班牙东北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语言。法国南部沿地中海和西班牙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居民也讲这种语言，而马蒂的家乡正是该省省城佩皮尼昂。

“这个人怎么啦？”戈麦斯对其中的一个警卫说。

“神经病，”那警卫说。

“不。他是政界要人，”戈麦斯说。“他是国际纵队的第一政委啊。”

“尽管这样，他还是有神经病，”警卫班长说。“你们在法西斯阵线后方是干什么的？”

“这位同志是那儿的游击队员，”戈麦斯对搜他的身的人说。“他给戈尔兹将军带来了一份急件。要保管好我的证件啊。别弄丢了这些钱和这颗串在带子上的子弹。这是我在瓜达拉马第一次挂彩时从伤口中取出来的。”

“别担心，”那班长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只抽斗里。你干吗不问我戈尔兹在哪儿？”

“我们原想问的。我问了警卫，他把你叫来了。”

“可是接着来了这个疯子，而你问他了。谁都不该问他什么事。他疯了。你要找的戈尔兹在从这公路上过去三公里的地方，在右边树林中的山岩间。”

“你现在不能放我们到他那儿去吗？”

“不行。这等于要我的脑袋。我只能把你们带到疯子那儿去。再说，你的急件在他手里。”

“你不能跟别人说一说吗？”

“行，”班长说。“我一看到负责的领导就对他说。谁都知道他疯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大人物，”戈麦斯说。“以为他是值得法国夸耀的人物之一。”

“也许他是个值得夸耀的人物吧，”班长说，伸手放在安德烈斯肩上。“可是他疯狂透顶了。他得了枪毙人的狂热。”

“真的枪毙人吗？”

“一点不错，”班长说。“这老家伙杀的人比鼠疫还多。不过，他跟我们不一样，不杀法西斯。不是说笑话。他杀古怪的人：托洛茨基分子、异己分子、各种各样的怪人。”

这些话安德烈斯一点也不懂。

“我们在埃斯科里亚尔的时候，不知道为他杀了多少人，”班长说。“我们老是派行刑队。国际纵队队员不愿枪毙自己人，尤其是法国人。为了避免麻烦，总是由我们来执行。我们枪毙过法国人、比利时人、各种国籍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他有枪毙狂。都是出于政治原因。他疯了。他清洗得比六〇六治梅毒还凶。”

“可是你能把急件这事跟谁说一说吗？”

“能，伙计。当然。这两个旅的人我都认得。人人都要走过这儿。我甚至也认得俄国人，虽说只有少数人会讲西班牙话。我们不让这个疯子枪毙西班牙人。”

“但是那份急件。”

“急件也一样。别担心，同志。我们知道怎样对付这个疯子。只有他的部下遇到他才危险。我们现在了解这家伙了。”

“把两个俘虏带来，”传来了安德烈·马蒂的声音。

“要喝口酒吗？”班长问。

“干吗不？”

班长从食柜里拿出一瓶茴香酒，戈麦斯和安德烈斯都喝了。班长也喝了。他用手抹抹嘴。

“咱们走吧，”他说。

呷下了火辣辣的茴香酒，他们嘴里、肚子里和心里都热呼呼的，他们走出警卫室，顺着过道走去，来到马蒂的房间里，只见他坐在一长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手里摆弄着一支红蓝

铅笔，做出一副将军的样子。对安德烈斯说来，只是增加了一件麻烦事罢了。今天晚上的麻烦事不少。麻烦事总是很多。只要你的证件没问题，心脏没毛病，你就不会遇到危险。他们最终会放你过关，你走你的路。但是英国人说过要抓紧时间。他现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回去炸桥了，但是这份急件得送到，而桌边的这个老家伙把它装在衣袋里。

“在那儿站着，”马蒂头也不抬地说。

“听着，马蒂同志，”戈麦斯脱口而出地说，茴香酒加强了他的气愤。“今天晚上我们被无政府主义者的无知阻挠了一次。接着被一个法西斯官僚的怠惰阻挠了一次。现在又被你这个共产党员的过分怀疑阻挠住了。”

“住口，”马蒂头也不抬地说。“现在不是开会。”

“马蒂同志，这是件极其紧急的事，”戈麦斯说。“头等重要的事啊。”

押他们来的班长和士兵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好象在看一出已看过好多遍的戏，但戏中的精采部分总使他们感到趣味无穷。

“样样事情都紧急，”马蒂说。“所有事情都重要。”他这时才抬起头来望着他们，握着铅笔。“你怎么知道戈尔兹在这儿？你难道不知道，进攻前来找某一个将军本人是很严重的事吗？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将军在这儿？”

“你对他说吧，”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

“将军同志，”安德烈斯开口说——他弄错了头衔，安德烈·马蒂没有纠正他——“我是在火线另一边接到这个信件的——”

“在火线另一边？”马蒂说。“不错，我听他说你是从法西斯阵线那边来的。”

“给我信件的人，将军同志，是个叫罗伯托的英国人，他到我们那儿来当炸桥的爆破手。明白了吧？”

“把你的故事讲下去，”马蒂对安德烈斯说；他用了“故事”这个词儿，正如用撒谎、胡诌或捏造一样。

“好吧，将军同志，英国人叫我尽快把信送给戈尔兹将军。就在今天他要在这一带山区发动一场攻势，我们只要求马上把信送给他，要是你将军同志同意的话。”

马蒂又摇摇头。他正望着安德烈斯，但是视而不见。

戈尔兹啊，马蒂想，心里又惊又喜，就象一个人听到自己事业上的敌手在一次极惨的车祸中毙命，或一个你所憎恶但对他的正直品德从没怀疑过的人却犯了挪用公款罪时所感到的一样。敢情戈尔兹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戈尔兹竟然和法西斯分子这样明目张胆地勾勾搭搭。他认识了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戈尔兹。那年冬天曾和卢卡茨在西伯利亚拦劫那列运黄金的火车的戈尔兹。曾和高尔察克作战的、在波兰作战过的戈尔兹。在高加索，在中国，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在这儿作战。但是，他当初接近图哈切夫斯基。^①对，也接近伏罗希洛夫。但主要接近图哈切夫斯基。另外还有谁？在这儿当然接近卡可夫。还有卢卡茨。可是匈牙利人一向全是阴谋家。他过去恨高尔。戈尔兹过去恨高尔。记住这一点。把这个记下来。戈尔兹一贯恨高尔。但是他喜欢普茨。记住这一点。杜瓦尔是他的参谋长。瞧瞧产生了什

① 这里提到的一些国际纵队的领导人，都是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有的在苏联建国初期曾和红军一起向高尔察克等匪帮作过战。伏罗希洛夫当时为军长，以保卫察里津著名。图哈切夫斯基为旧俄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德军俘虏。一九一七年投身革命，入了党，先后在高加索及西线任红军指挥员。后来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得元帅衔。

么后果。你听他说过，考匹克是个笨蛋。那确实无疑。那是事实。而现在这份急件来自法西斯阵线那边。只有剪除这些腐朽的枝叶，才能使树木健康成长。必须使枯枝烂叶清楚地暴露，才能消灭。但怎么会是戈尔兹呢。戈尔兹怎么会也是个叛徒呢。他知道，谁也不能信任。谁也不能信任。永远不能。即使是你妻子。即使是你兄弟。即使是你最老的同志。谁也不能信任。永远不能。

“把他们带走，”他对警卫说。“小心看管着。”班长望望那小兵。就马蒂的一贯表现来说，这一次是着实温和的。

“马蒂同志，”戈麦斯说。“别发疯。听我说说，我是个忠心耿耿的军官和同志。这急件非送到不可。这位同志越过法西斯阵线，把这份急件带来给戈尔兹将军同志。”

“把他们带走，”马蒂这时亲切地对那警卫说。作为人，假如非消灭他们不可，他可怜他们。但是，使他感到沉重的是戈尔兹本人的悲剧。他想：怎么会是戈尔兹呢。他要立即将这个法西斯的情报向伐洛夫报告。不，还不如把这急件交给戈尔兹本人，看他收到时的反映。他打算这样干。假如戈尔兹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怎能肯定说伐洛夫不是呢？不能肯定。这是件必须郑重处理的事情。

安德烈斯转身对戈麦斯说，“你是说他不打算送急件吗？”他问，简直不相信有这种事。

“你没看到吗？”戈麦斯说。

“老婊子养的！”安德烈斯说。“他疯啦。”

“对，”戈麦斯说。“他疯了。你疯了！听着！疯了！”他冲着拿着红蓝铅笔、又俯身看地图的马蒂大叫。“你这个发疯的凶手，听到了吗？”

“把他们带走，”马蒂对警卫说。“他们犯了大罪，精神失常了。”

班长熟悉这句话。他以前听说过。

“你这个发疯的凶手！”戈麦斯喊着。

“老婊子养的，”安德烈斯对他说。“疯了。”

这个人的愚蠢激怒了他。如果他是个疯子，就该把他当疯子撵走。该把急件从他口袋里掏出来。这该死的疯子见鬼去吧。他那西班牙人的烈性，从他一贯冷静的好脾性中脱颖而出，不一会儿就会使他失去理智。

马蒂望着地图，当警卫们把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带出去时他悲伤地摇摇头。这两个警卫听他挨骂很快活，但是总的说来，对这次演出感到失望。他们见过比这精采得多的场面。安德烈·马蒂不在乎那两人骂他。说到头来，骂过他的人可真不少啊。他们作为人，总是得到他的真心怜悯。他总是跟自己这样说。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已经所剩无几，这乃是其中之一。

他坐在那儿，胡子和眼睛的焦点集中在地图上，集中在这张他从未真正看懂的地图上，集中在那些精心绘制的象蛛网般展开的棕色等高线上。他能根据等高线看出高地和山谷，但他始终弄不懂为什么该挑中这个高地，为什么该挑中这个山谷。但是由于有了政治委员制度，他可以以国际纵队政治首脑的身份介入总参谋部，可以把手指点着图上某一个编有号码的、围有棕色细线的地方，那儿四周有一片代表着树林的绿色，上面画着一条条和那始终朝着特定方向蜿蜒曲折的河流平行的道路。他可以说：“这儿。这儿是防线的弱点。”

高尔和考匹克是有抱负的政治家，他们会同意，而结果呢，那些离开基地并在指定的地点挖掘壕沟之前从没看过地图、而

仅仅听说过这山地的编号的士兵会沿着山坡向上爬去自取灭亡，或者被架在橄榄树丛中的机枪挡住，根本就上不去。在别的阵地上，他们也许可以容易地攀上山头，而处境并不会比先前好些。但是，当马蒂在戈尔兹的总部里指点地图的时候，这个头上有伤疤的白脸将军会绷紧了牙床肌肉，心里会想：“不等你把你那灰色的烂指头点在我的等高线地图上，我先要枪毙你，安德烈·马蒂。你干预你一无所知的事情，害死了多少人，为了所有这些死者，给我见你的鬼去。人家拿你的名字给拖拉机厂、村庄和生产合作社命名，你就此成了我碰不得的象征啦，真是活见鬼。你到别的地方去怀疑、要求、干涉、指责、屠杀吧，别管我的总部。”

然而戈尔兹并没有说这话，却仅仅朝后靠在椅背上，不再靠近这弯着腰的胖子，离开那伸出的指头、那水汪汪的灰眼睛、那部灰白胡子和那口臭的嘴远一点儿，说，“是，马蒂同志。我明白你的观点了，可是不能很好地接受，而且我不同意。要是你高兴，可以试着打通我的思想。对。你可以象你所说的那样，把它看作党内问题来处理。但是我不同意。”

所以，这时安德烈·马蒂坐在一张空桌子边研究他的地图，没有灯罩的电灯泡那刺眼的光线射在他的头上，过分宽大的贝雷帽耷拉在前额上遮着眼睛，参照着那份油印的进攻命令，在地图上慢慢地、仔细地、费神地比划着，就象参谋学院的年青军官在解题一样。他在从事战争。他心里正在指挥军队，他有权干涉，他相信这使他也有权指挥。所以他就坐在那儿，衣袋里装着罗伯特·乔丹给戈尔兹的急件，而戈麦斯和安德烈斯正在警卫室里等待，罗伯特·乔丹正伏在桥那边高处的树林里。

如果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不受安德烈·马蒂的干扰，可以继

续前进的话，安德烈斯的使命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也是可疑的。在前线，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能取消这次进攻。机器开动得太久了，现在没法使它突然停下来。所有的军事行动，不论规模大小，都有很大的惯性。可是，一旦克服了这惯性，开始运动了，再要加以阻止，差不多就象使之运动一样的困难。

但是这天晚上这个把贝雷帽拉到前额上的老头儿仍坐在桌边看地图，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俄国记者卡可夫，带着另外两个身穿便服和皮外套、头戴皮帽的俄国人。警卫班长在他们身后老大不愿地关上了门。卡可夫是他好歹能联系上的第一个负责人。

“马蒂同志，”卡可夫用他那有礼貌而轻蔑的口齿不清的声音说，脸上堆着笑，露出了他的坏牙齿。

马蒂站起来。他不喜欢卡可夫，但卡可夫是《真理报》派来的。

“卡可夫同志，”他说。

“你在布置进攻吗？”卡可夫傲慢地说，朝地图点点头。

“我在研究，”马蒂回答。

“是你领导进攻？还是戈尔兹？”卡可夫圆滑地说。

“我不过是个政委罢了，你知道，”马蒂对他说。

“不，”卡可夫说。“你太谦虚了。你实际上是位将军。你有你的地图和你的望远镜。你不是曾经当过海军上将吗，马蒂同志？”

“我是二炮手，”马蒂说。这是撒谎。在起义的时候，他其实是文书军士。但是他现在总是认为自己曾是二炮手。

“啊，我原来以为你是一等文书军士呢，”卡可夫说。“我总是把事实搞错。这是记者的特点。”

其他两个俄国人没有参加谈话。他们正从马蒂的肩膀后面望着地图，不时用本国话彼此讲上一句。马蒂和卡可夫在开头寒暄之后用法语交谈。

“最好别在《真理报》上把事实搞错，”马蒂说。他话说得粗声粗气，使自己鼓起勇气来。卡可夫总是使他泄气，这在法语中叫做 *dégonfler*，因此马蒂被他搞得心烦意乱、谨小慎微。当卡可夫说话的时候，安德烈·马蒂很难记住他自己来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很难记住他是碰不得的。卡可夫似乎总要随心所欲地微微讽刺他一下，他这时说，“我向《真理报》发稿前，通常把事实核实。我在《真理报》上的报道相当准确。请问，马蒂同志，你可曾听说我们有一支向塞哥维亚那边开展活动的游击队给戈尔兹捎来了信？那边有一位叫乔丹的美国同志，我们应该得到他的消息了。听说法西斯阵线后方发生了战斗。他应该已经打发人送一份情报来给戈尔兹。”

“一个美国人？”马蒂问。安德烈斯说的是英国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敢情他搞错了。这两个傻瓜到底为什么找上他呀？

“对，”卡可夫轻蔑地望着他，“一个年青的美国人，政治觉悟不高，可是很善于跟西班牙人打交道，有一段不错的打游击的经历。就把那份急件给我吧，马蒂同志。已经耽搁得很久啦。”

“什么急件？”马蒂问。他明知道说这话是十分愚蠢的，但是他不能一下子就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样说无非是为了推迟丢脸的时刻。

“就是你口袋里那份年青的乔丹给戈尔兹的急件，”卡可夫说，声音从坏牙齿缝中发出。

安德烈·马蒂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急件放在桌上。他直勾勾地望着卡可夫的眼睛。好吧。他错了，这件事现在使他无可

奈何，但是他不愿受到羞辱。“还有那张通行证，”卡可夫低声说。

马蒂把通行证放在急件旁边。

“班长同志，”卡可夫用西班牙语叫道。

班长开门进来。他马上望着安德烈·马蒂，马蒂呢，象头被猎狗围困住的老野猪般也对他望着。他脸上没有害怕，也没有屈辱。他只感到愤怒，不过暂时陷入困境而已。他知道，这些狗决不能制服他。

“把这个交给警卫室里的两位同志，指引他们到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去，”卡可夫说。“已经耽搁得太久啦。”

班长走出去，马蒂目送着他，然后望着卡可夫。

“马蒂同志，”卡可夫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怎样的碰不得。”

马蒂眼瞪瞪地望着他，一言不发。

“也别打算找那班长的麻烦，”卡可夫接着说。“这和班长不相干。我在警卫室里见到了那两个人，他们对我说了。”（这是撒谎。）“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来找我谈。”（这是真的，虽然那时先开口的是班长。）然而卡可夫相信平易近人对他有好处，好心干预别人的事能给人富有人情味的印象。这是一件他决不嘲讽的事情。

“你知道，我在苏联，阿塞拜疆有个城里发生了不公正的行为的时候，人们向《真理报》给我写信。你知道这个吗？他们说：‘卡可夫将帮助我们’。”

安德烈·马蒂望着他，脸上只有愤怒和厌恶的表情。他这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卡可夫在跟他作对。好吧，卡可夫，随你权力多大，咱们走着瞧吧。

“这是另一回事，”卡可夫说，“但原则是同样的。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怎样的碰不得，马蒂同志。我很想知道，那家拖拉机厂的厂名是否不可能更改。”

安德烈·马蒂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回过头来看地图。

“那年青的乔丹写了些什么？”卡可夫问他。

“我没看急件，”安德烈·马蒂说。“现在别打扰我了，卡可夫同志。”

“好，”卡可夫说。“不打扰你的军事工作了。”

他走出房间，朝警卫室走去。安德烈斯和戈麦斯已经走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望着高处的公路那边，望着这时显现在灰色晨曦中的山顶。他想：我们必须赶到山上去。现在时间快到了。

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乘了摩托车又驶上了公路，天在亮了。安德烈斯这时又抓住了他面前的座位后部，摩托车在笼罩在山路顶上的灰色薄雾中弯弯曲曲地驶上山去，他感到他所乘的摩托车在加快速度，接着车子慢下来，停了，他们在一段漫长的下坡路上跳下车来，站在车旁，左边树林里有些盖着松枝的坦克。这一带树林里到处是部队。安德烈斯看到有的扛着抬杆很长的担架。公路右边几棵树底下停着三辆参谋部的汽车，车身两边覆着树枝，车顶上盖着松枝。

戈麦斯把摩托车推向其中的一辆。他把车靠在一棵松树上，跟背靠着树干、坐在汽车旁的司机说话。

“我把你带到他那儿去，”司机说。“把摩托车隐蔽起来，用这些树枝盖住。”他指指一堆砍下的树枝。

阳光正开始射进高大的松树林，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跟着这个名叫维森特的司机跨过公路，在松林中登上山坡向一个地下掩蔽部的入口处走去，掩蔽部顶上的电话线布满了这树木丛生

的山坡。司机到里面去了，他们俩站在外面。安德烈斯很钦佩这掩蔽部修筑得很巧妙，它在山坡上只露出一个洞口，四周没有乱糟糟的泥土，但是 he 在这入口处能看出，这掩蔽部又高又深，人在里面能行动自如，在那结实的木顶下走动不需要低着头。

司机维森特出来了。

“他在山上，他们正在部署进攻，”他说。“我把急件交给他的参谋长了。他签了字。给。”

他把签收过的信封交给戈麦斯。戈麦斯把它交给安德烈斯，他看了一眼，就把它放在衬衣里面。

“签字的人叫什么？”他问。

“杜瓦尔，”维森特说。

“行，”安德烈斯说。“急件的收件人有三个，他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等回信吗？”戈麦斯问安德烈斯。

“最好如此。不过，炸桥之后，我到哪儿去找英国人他们一伙，连天主也不知道。”

“跟我一起等吧，”维森特说，“等将军回来。我给你们拿咖啡来。你们一定饿了。”

“这些坦克啊，”戈麦斯对他说。

他们走过那些由树枝遮盖的、涂成泥土色的坦克旁，每一辆都在松针地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辙，显示出这些坦克是从公路上什么地方拐弯倒车过来的。车上的四十五毫米口径的炮筒在树枝下打横地戳了出来，身穿皮外套、头戴有楞头盔的驾驶员和炮手们背靠树干坐着，或躺在地上睡觉。

“这是后备军，”维森特说。“这些部队也是后备军。那些打头阵的在上面。”

“人可不少啊，”安德烈斯说。

“是呀，”维森特说。“整整有一个师。”

掩蔽部里，杜瓦尔左手拿着展开了的罗伯特·乔丹的急件，望望同一只手上的手表，第四次读这份急件，每次都觉得胳肢窝里渗出汗水，从两肋朝下淌，他对着电话筒说，“给我接塞哥维亚阵地。他走了吗？给我接阿维拉阵地。^①”

他不停地打电话。一点用处也没有。他跟那两个旅部都通了话。戈尔兹到山上视察了进攻部署，到一个观察哨去了。他给观察哨打电话，可他不在那儿。

“给我接第一机队，”杜瓦尔说，突然决定负起全部责任。他要负起责任来停止这次进攻。还是停止的好。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还想打发他们去来次突袭，这怎么行呢？你办不到。这简直是谋杀。你办不到。你千万不能这样做。无论如何不能。他们可以枪毙他。他可要直接打电话给飞机场，取消轰炸。可是，如果这不过是一次牵制攻势呢？如果我们的使命不过是拖住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呢？如果这次攻势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呢？要你执行的时候，他们是决不会告诉你这是牵制攻势的。

“别接第一机队了，”他对接线员说。“给我接第六十九旅观察哨。”

他还在那里打电话，听到了第一阵飞机声。

而刚好在这时，他接通了观察哨。

“是的，”戈尔兹冷静地说。

他正背靠在沙袋上坐着，两脚抵在一块石头上，下嘴唇上叼

① 这是指两个不同的出击点，以瓜达拉马山脉后的两大敌占省会塞哥维亚和阿维拉为目标。

着一支烟，他一边接电话，一边侧着头仰望。他打量着那越来越大的三三编队的楔形机群，在天空中银光闪闪，狂叫怒吼，从远处阳光初照的山脊上空飞过来。他望着飞来的飞机，在阳光中明亮而美丽。他看到飞来时阳光照射在螺旋桨上形成的两个光轮。

“是的，”他对着话筒说，说的是法语，因为打电话来的是杜瓦尔。“我们完了。对。跟以往一样。对。太遗憾了。对。情报到得太迟了，真不象话。”

他望着飞来的飞机，眼神非常自豪。他现在看清了机翼上的红色标志，他看着它们不停地堂堂皇皇地隆隆地向前飞。按照计划是可以成功的。这是我们的飞机。它们装了箱，由船只从黑海穿过马尔马拉海，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地中海，运到这儿，小心翼翼地阿利坎特^①卸下，精确地装配，经过试飞，证明性能完美；它们编成紧凑而清楚的V队，正在可爱的有规律的震荡声中，高高地银光闪闪地在晨曦中飞来轰炸对面的山脊，炸得它山崩地裂，让我们能够通过去。

戈尔兹知道，一旦飞机在上空飞过去了，炸弹就会象翻腾的海豚那样从空中落下来。接着，山脊会轰隆隆地迸裂，消失在一大片爆炸的烟雾中。接着坦克会在铿锵声中爬上那两个山坡，跟上去的是他的两个旅。如果是出人不意的奇袭，他们可以在坦克的帮助下继续不断向前推进，停下来肃清残敌，靠坦克的往返行驶，开火掩护，大干一场，机智地大干一场，同时把别的进攻部队带上来，顺利地继续不断地向前推进，越过山脊朝下冲。要是没有人变节通敌，要是大家尽到自己的本分，情况应该是这样。

^① 阿利坎特(Alicante)为西班牙东南部滨地中海一良港，在瓦伦西亚南。

山脊一起是两个，有坦克车打头阵，有他的两个良好的旅准备从树林里出发，这时飞来了飞机。他必须做的每件事都已按照计划做了。

但是，当他了望着差不多飞到了他头顶上的飞机时，他觉得难受得反胃，因为他从电话中传来的乔丹的急件中得悉，那两个山脊上空无一人；他们后撤在下面狭窄的壕沟里躲避弹片，或者躲藏在树林里，等轰炸机一飞过，他们将带着机关枪、自动步枪和乔丹提到的从公路上运来的反坦克炮回到山脊上，于是结果又将是一团糟。但这时飞机按照计划震耳欲聋地飞来了，戈尔兹抬头了望着，对着电话筒说，“不。没有办法了。毫无办法。不能考虑了。只有这样了。”

戈尔兹用他那严峻而自豪的目光注视着飞机，他知道原来应该发生什么情况而现在将发生什么情况。他为原来应该发生的情况感到自豪，他相信那原来是能够发生的，即使实际上没法兑现，他说，“好。我们尽力而为吧。”接着挂断了电话。

但杜瓦尔没听到他的话。他拿了话筒坐在桌边，听到的只是飞机的隆隆声，这时他想：听这些轰炸机飞来的势头，也许这一次能把他们全都炸光，也许我们能突破，也许他将得到他所要的后备军，也许这次机会来了，也许这次能成功。干下去吧。来吧。干下去吧。隆隆声大得使他听不到自己正在想的话了。

第四十三章

罗伯特·乔丹在公路和桥上方的山坡上，伏在一棵松树后面，看着天色亮起来。他总是喜欢一天中的这个时刻，现在仔细

看着，觉得心里也在亮起来，仿佛自己就是太阳升起前天色渐明的一部分，那时候，随着白天来临，有形实体变得晦暗，空间变得明朗，在夜里照耀的灯光变成黄色，接着消失。他下面的一棵棵松树这时显得明确而清晰，树干坚实，呈黄褐色，公路上蒙着一层薄雾，泛着白光。露水沾湿了他，林中地面柔软，他感到掉在地上的褐色松针在胳膊肘的压力下往下陷。他透过河床上升起的轻雾，看到下面那笔直而坚挺的钢铁桥梁架在峡谷上，两端各有一座木制岗亭。但在他看来，笼罩在河上的迷雾使那座桥的模样显得象蜘蛛网般细巧。

他看到哨兵正站在岗亭里，弯着腰，双手在用打了洞的火油桶做成的火盆上取暖，背对着外面，披着毯子式的披风，头上戴着钢盔。罗伯特·乔丹听到下面山岩间潺潺的流水声，他看到岗亭里升起一缕淡淡的轻烟。

他望望手表，心想：不知道安德烈斯是否越过防线到了戈尔兹那儿。如果我们打算炸桥，我要十分缓慢地呼吸，让时间过得慢些，好好儿体味体味。你看他，安德烈斯，送到了吗？如果他送到了，他们会取消进攻吗？他们来得及取消吗？这是什么话！别发愁啦。他们可能取消，也可能不取消。再没有第三种可能，你很快就会知道。说不定进攻能成功。戈尔兹说能。有这种可能。把我们的坦克顺着那条公路开去，部队从右翼突破，下山直冲过拉格兰哈，山上的整个左翼转入进攻。为什么你竟不想想怎样去打胜仗呢？你处在防御地位太久，所以想不到这个了。没错儿。但那是法西斯武器装备开上这条公路之前的情形，飞机飞来之前的情形。别那么天真啦。但是记住这一点：只要我们能把他们牵制在这儿，我们就能困住这些法西斯。他们在消灭我们之前，不可能进攻别的地方，而他们永远不能消灭我们。要是

法国人肯帮点忙，要是他们不封锁国境，要是我们能得到美国的飞机，他们就永远不能消灭我们。永远不能，要是我们能得到支援的话。这些人如果好好地武装起来，将永远战斗下去。

不，你千万别指望在这里打胜仗，也许在几年之内指望不到。这不过是一次牵制性进攻。你现在不能对此抱幻想。也许今天我们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呢？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要清醒地看到力量对比。不过，如果我们打胜了又怎样呢？别激动，他对自己说。别忘了公路上运过什么武器装备。关于这个情报，你已尽力而为。然而，我们应该有轻便的短波通讯设备。到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现在还没有。现在你只能注意观察，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只不过是从现在到未来所有日子中的一天。但是在未来所有的日子中，好好坏坏全取决于你今天的作为。今年开始以来都是这样。这个样子已经有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战争开始以来都是这样。他对自己说：在这清晨，你变得多浮夸啊。瞧，有什么人来了。

他看到两个穿毯子式披风、戴钢盔的哨兵在公路上拐了个弯，朝桥头走来，肩上挎着步枪。一个在桥的那一端停下来，走进岗亭不见了。另一个踏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跨过桥来。他在桥面上站停了，向河谷里唾了一口，然后慢吞吞地走到桥的这一端，这边的哨兵跟他说了些话，就返身从桥上走回去。这个下岗的哨兵走得比另一个快（罗伯特·乔丹想：因为他要去喝咖啡），可是他也朝河谷里唾了一口。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迷信行为？罗伯特·乔丹想。我也得朝河谷里唾上一口，要是到时候我唾得出口水的话。不。这不可能是什灵丹妙药。这起不了作用。我走上桥面之前，必须

证明这是起不了作用的。

刚上岗的哨兵走进岗亭坐下了。他的上了刺刀的步枪斜靠在墙上。罗伯特·乔丹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望远镜，调整目镜焦距，直到桥的这一端显得轮廓分明，看清了漆成灰色的铁桥。他接着把望远镜对准岗亭。

哨兵背靠墙坐着。他的头盔挂在木钉上，脸显得清清楚楚。罗伯特·乔丹看出这个人就是前两天下午他来侦察时值班的那个哨兵。他还是戴着那顶绒线帽。他没有刮脸。他脸颊凹陷，颧骨突出。他长着毛茸茸的眉毛，眉宇间连在一起。他显得很困乏，罗伯特·乔丹打量着他，看到他在打呵欠。他接着掏出烟荷包和一盒卷烟纸，卷了一支烟。他用打火机打了几下，没打上，结果把它放进衣袋，走到火盆边，弯下腰，从火盆里取出一块炭，在一只手中挥挥，一边往上面吹气，接着点燃了卷烟，把炭扔回火盆。

罗伯特·乔丹透过蔡斯八倍望远镜观察他靠在岗亭墙上抽烟时的脸。他放下望远镜，合拢在一起，放进衣袋。

我不要再看他了，他对自己说。

他伏在那儿望着公路，试图什么也不想。一只松鼠在他下面一棵松树上吱吱地叫，罗伯特·乔丹看它顺着树干往下爬，半路上停了一下，扭头张望那注视着它的人。他看到松鼠的眼睛又小又亮，尾巴激动地抖动着。它用小小的爪子和巨大的尾巴在地上跳远似地蹦跳着，跳上了另一棵树。它在树干上回头望望罗伯特·乔丹，接着在树干上绕了一圈，消失了踪影。罗伯特·乔丹接着听到松鼠在一根高枝上吱吱地叫，他望着它平伏在树枝上，尾巴抖动着。

罗伯特·乔丹又穿过松树之间俯视着岗亭。他很想捉住这

只松鼠藏在衣袋里。他很想有一样可以触摸的东西。他用胳膊肘擦擦松针，但那是另一回事。谁也不知道在于这种事时你有多孤独。我可知道。但愿兔子能顺利地摆脱这个处境。现在别想这个啦。对，当然。但是我能这样希望，我确实也这样希望。希望我好好地把桥炸掉，希望她顺利脱身。好，当然。只要这样。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他伏在那儿，不再望公路和岗亭，转而望着对面的远山。他对自己说：你什么也别想了。他静静地伏在那儿，注视着早晨来临。这是个晴朗的初夏早晨，在五月底，早晨是来得很快的。有一次，有个穿皮外衣、戴皮头盔的摩托车司机，左腿边挂着一支有枪套的自动步枪，驶过那座桥，顺着公路朝上驶去。有一次是一辆救护车驶过了桥，在他下面经过，顺着公路朝上驶去。这是全部动静。他闻到松树的香味，他听到河水的声响，这时桥在晨曦中显得清楚而美丽。他伏在松树后面，手提机枪横放在左前臂上，再也不对岗亭望一眼，以为看来这次攻势决不会发生了，在这么一个可爱的五月底的早晨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是隔了好久，他才听到突如其来的接连不断的砰砰的炸弹声。

罗伯特·乔丹一听到炸弹的爆炸声，不等山间响起隆隆的回声，就深深地吸了口气，拿起手提机枪。他的手臂由于机枪的重压而觉得僵硬，手指麻木得不大灵便了。

岗亭里的哨兵听到炸弹声就站起身来。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伸手去拿步枪，从岗亭里走出来倾听。他站在公路上，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头上斜戴着绒线帽，他抬头朝天空中飞机正在投弹的方向望着，阳光照射在他那没刮过的脸上。

公路上这时没有雾，罗伯特·乔丹清楚而鲜明地看到哨兵站在公路上仰望着天空。阳光透过树丛照亮了他的身子。

罗伯特·乔丹这时觉得自己呼吸紧迫，仿佛有一圈铁丝捆住了他的胸脯。他稳住了胳膊肘，觉得有槽纹的前枪把紧顶着自己的手指，他把这时已落入表尺缺口内的长方形准星对准那哨兵的胸膛中央，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他感到枪托迅速、滑溜、痉挛地撞在自己的肩头上，公路上的哨兵显得吃惊而痛苦，双膝一软向前倒下，前额磕在路面上。他的步枪掉在他身旁，一只手指还勾在扳机护圈里面，手腕向前曲着。步枪掉在公路上，枪上的刺刀指向公路前方。罗伯特·乔丹的目光从这低垂着头躺在公路上的哨兵，转向桥和另一端的岗亭。他看不到那另一个哨兵，就顺着右下方的山坡望去，他知道奥古斯丁就埋伏在那儿。接着他听到安塞尔莫开枪了，枪声从河谷里传来回声。接着他听到安塞尔莫又开了一枪。

随着第二声枪响，桥那一端公路拐角处传来砰砰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这边公路左方远处传来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他听到这边公路上的步枪声，从那边公路上传来巴勃罗那支骑兵用的自动步枪的达达声，和手榴弹声杂在一起。他看到安塞尔莫顺着陡峭的山路爬下，朝桥的那一端冲来，就把手提机枪挂上肩头，提起松树后面的两个沉重的背包，一手提一个，背包沉得使他觉得肩膀上的肌腱都要被拉出来了。他蹒跚地冲下陡峭的山坡，来到公路上。

他一边飞奔，一边听到奥古斯丁在叫喊：“干得好，英国人。干得好啊！”他想：“干得好，亏你说的，干得好！”正在这时，他听到安塞尔莫在桥的那一端开了一枪，枪声在钢梁之间回响。他越过躺在地上的哨兵，晃着背包奔上了桥。

老头儿一手提着卡宾枪，向他跑来。“平安无事，”他喊着。“没出差错。我不得不找补一枪，让他死绝。”

罗伯特·乔丹跪在桥中央，打开背包，取出他的东西。他看到眼泪从安塞尔莫脸颊上挂到花白的胡子茬上，直朝下淌。

“我也杀了一个，”他对安塞尔莫说。“我也杀了一个，”朝匍匐在桥这头公路上的哨兵甩了一下头。

“是啊，老弟，是啊，”安塞尔莫说。“我们非杀他们不可，所以就杀了。”

罗伯特·乔丹爬到桥面下的梁柱之间。他握住的钢梁上有露水，又冷又湿。他小心翼翼地爬着，感到阳光照在背上；他在一根桥桁上站稳了，听到下面哗哗的流水声，听到枪声，听到公路上段的哨所那边枪声大作。桥下很阴凉，但这时他汗流浹背。他一条臂上挽着一圈铜丝，手腕上绕着的一根皮带上挂着一把钳子。

“把炸药包一个个往下递给我，老头子，”他向上面的安塞尔莫喊道。老头儿在桥边探出半个身子，把长方形的炸药包递下来，罗伯特·乔丹伸手接住，用力塞在桥梁下他要放的地方，一包包紧紧排好，用铜丝扎住。“楔子，老头子！给我楔子！”他把一只只楔子轻轻敲紧，使炸药包牢固地嵌在钢梁之间，闻到了新削的木楔的新鲜木头香。

他忙着安放炸药，塞紧，加楔，用铜丝绑牢，一心只想着炸桥，迅速而熟练地干着，仿佛在做外科手术，这时听到下段公路上响起了一阵连续不停的枪声。接着是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又是一枚，在流水声中轰的一响。然后那个方向寂静无声了。

“妈的，”他想。“不知道他们挨到了什么打击。”

公路上段的哨所那边仍有枪声。枪声真他妈太多了。他把两枚手榴弹并排放置在扎紧的炸药包顶上，把铜丝绕住手榴弹上的凹纹，这样它们可以被绑得结结实实，最后用钳子把铜丝拧

紧。他摸摸所有的炸药包，为了更牢固起见，在手榴弹上面轻轻敲进一个木楔，使整个炸药包抵紧在钢梁上。

“现在到另一边去，老头子，”他向桥面上的安塞尔莫喊道，穿过桥架爬到桥的另一边，心想：好象人猿泰山在钢材林里啦。他接着从桥下的阴影里探出头来仰望，下面是滚滚流水，他伸手去接从上面递给他的炸药包，看到了安塞尔莫的脸。他想：多善良的脸啊。现在不在哭。这样才好呢。桥一边已安放好了。现在把这一边搞好就完事了。这能把桥炸得稀巴烂。得了。别激动。干吧。干得干净利落，就象那边一样。别毛手毛脚。慢慢儿来。别勉强地干得太快。现在你不会失败了。现在谁也阻挡不了你把桥的一边炸掉啦。你干得正如你应该干的那样。这是个阴凉的地方。天啊，阴凉得象个酒窖，而且没有脏东西。石桥下面往往都是脏东西。这是一座理想的桥，一座刮刮叫的理想的桥。处境危险的倒是在桥面上的老头子。别勉强地干得太快。但愿公路上段的射击就结束。“给我些楔子，老头子。”那些射击可不妙。比拉尔在那儿碰到麻烦了。哨所里肯定有些人当时在外面。在后面，或者在锯木厂后面。他们仍在射击。那就意味着锯木厂里有人。那些该死的锯末。一大堆一大堆的锯末。锯末干后压得很实，躲在后面打枪是个好掩护。他们一定还有好几个人。巴勃罗在下面公路那边一无动静。我不知道第二回突然打枪是怎么回事。准是开来了一辆汽车或摩托车。上帝保佑，开来的别是装甲车或坦克啊。继续干吧。尽快放好炸药，插紧木楔，好好绑紧。你索索发抖，象个该死的女人。你到底怎么啦？你想仓促了事。我敢打赌，在公路上段的那女人不在发抖，那个比拉尔。也许她也在发抖。从枪声听来，她碰到的麻烦可不少。如果受不了，她也会发抖，就象他妈的任何人一样。

他从桥下探身到阳光里，伸手去接安塞尔莫递给他的东西，他的头离下面的流水声远了一点，这时公路上段的枪声突然增多，接着又是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多的手榴弹爆炸声。

“这样看来，他们在袭击锯木厂。”

他想：幸亏我的炸药是成块的，不是条状的。那又怎么样？只不过整齐些罢了。然而满满一帆布袋的冻状炸药作用要更快些。两袋。不，一袋就够了。但愿我们有雷管和那旧的引爆器就好了。那婊子养的把我的引爆器扔到河里去了。那只旧盒子曾到过多少地方啊。他就扔在这条河里。巴勃罗这杂种。他刚才在下边狠狠地打敌人呢。“把那东西再给我一些，老头子。”

老头子干得很不错，他在上面的处境可不妙。他不乐意杀那个哨兵。我也不乐意，但我当时没有考虑。现在也不考虑。你不得不那样干。安塞尔莫把那哨兵打残了。我知道被打残的人的情形。我想用自动武器杀人要轻松些。我是指对开枪的人来说。那可不一样。一扣扳机就行了，人是枪杀的，不是你杀的。把这个问题留到别的时候去想吧。你和你的脑袋啊。你有一颗不错的会思想的脑袋，老乔丹啊。冲啊，乔丹，冲啊！^① 以前打橄榄球，你抱着球飞奔的时候，他们老是这样喊。你知道吗，那条该死的约旦河实际上并不比下面那条小河大多少。你指的是约旦河起源的地方。任何事物的起源都是这样的。在这儿桥下面有块小地方。这是远离家乡的家。得了，乔丹，振作起来吧。这是严肃的事儿，乔

① 此处原文为 Roll, Jordan, Roll!——是一支黑人灵歌的名字，意为“奔流啊，约旦河，奔流啊！”乔丹的姓和约旦河名在英语中为同一个词，所以同学们借用这歌名来为他助威。美国南部种植园里的黑奴，一代代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他们抒发心中悲愤的灵歌中，往往采用《圣经》中的典故。由于上帝许给犹太人的福地就在约旦河边，故灵歌中常引用它来象征苦难中的黑人所憧憬的自由土地。

丹。你难道不明白？严肃的。可实际上总是欠严肃。瞧瞧河对面。干吗呀？现在无论她怎么样，我都行。缅甸州完了，国家也就完了。^①约旦河完了，该死的以色列人也就完了。我指的是桥啊。那么乔丹完了，该死的桥也就完了，其实应该倒过来说。

“把那东西再给我一些，安塞尔莫老伙计，”他说。老头儿点点头。“差不多搞好了，”罗伯特·乔丹说。老头儿又点点头。

他在桥下面快扎好手榴弹的时候，不再听到公路上段的枪声了。他干着，干着，忽然只听到小河的流水声了。他低头看到下面的河水流过漂石，激起白色湍流，然后泻入一泓清水，水底布满着小石。他刚才掉落的一个木楔在流水中打转。他看着看着，只见一条鳟鱼浮上水面，在追赶一只虫子，在靠近木楔打转的地方游了一圈。当他用钳子绞紧扎住那两枚手榴弹的铜丝时，他从铁桥钢梁之间看到那绿茵茵的山坡上的阳光。他想：三天之前那里还是褐色的呢。

他从桥下阴凉的暗处探身到明亮的阳光中，冲着伸出头来的安塞尔莫叫道，“把那一扎漆包线给我。”

老头儿把它递了下来。

看上帝面上，眼前千万不能弄乱这卷漆包线。要用它来拉响手榴弹。但愿你能把它穿进去。罗伯特·乔丹摸着手榴弹上卡住能使弹簧杆反弹出来的拉环的开尾销，这时他想：但是，有了你正在用的那段长铜丝，就行了。他仔细看看，侧绑着的那两颗手榴弹边留有足够的空隙，在拉出开尾销时弹簧杆能弹起来（绑手榴弹的铜丝是从弹簧杆下面绕过去的）；接着他把漆包线的一端系在外侧那个手榴弹的拉环上，再拿一段铜丝，一端系在另一

^① 这是一八八八年左右美国政界流行的一句箴言。

颗手榴弹的拉环上，另一端系在这漆包线上，从大卷上放出一段漆包线，把这大卷绕过一根钢桥桁，朝上递给安塞尔莫，说：“小心拿着。”

他爬上桥面，从老头儿手里接过漆包线卷，身子探出在桥的一边，一面放线，一面尽快倒退着走向那哨兵倒毙的地方。

“把背包拿过来，”他倒退走着，对安塞尔莫大声说。他一路上俯身拾起手提机枪，重新挎在肩上。

这时他抬头不再注视着放线，远远见到有几个人从高处的哨所那儿在公路上往回走。

他看到他们一起四个，接着不得不注意漆包线，免得被桥边上的钢架勾住。埃拉迪奥没有跟他们一起回来。

罗伯特·乔丹放线走过桥头，在最后一根桥柱上绕了一圈，就在公路上径直奔到一块石路标边停下来。他剪断漆包线，递给安塞尔莫。

“拿住了，老头子，”他说。“现在跟我回到桥上去。边走边把这线带上桥。不。还是我来吧。”

一到桥上，他把电线从桥柱上绕回来，这样，它就一直沿着桥边直通到手榴弹的环上，没有任何勾挂。他把电线的这一端递给安塞尔莫。

“拿着这个回到石路标边去，”他说。“轻轻拿住，可是要抓紧。别在上面使劲。只要使劲一拉，桥就爆炸。明白吗？”

“是。”

“手里用力要小，可是别让电线荡下，免得勾住。轻巧地拿稳了，不到时候别拉。明白吗？”

“是。”

“要拉的时候，就老实地拉。别抖动。”

罗伯特·乔丹一边说话，一边望着公路上段比拉尔一伙里剩下的人。他们这时已走近，他看到普里米蒂伏和拉斐尔扶着费尔南多。看样子，他腹股沟被子弹击穿了，因为他两手按在上面，那汉子和小伙子一边一个架着他。他们扶着他走，他的右腿拖在地上，鞋帮在路面上刮着。比拉尔拿着三支步枪，正在爬上山坡进入路边的树林。罗伯特·乔丹看不清她的脸，但她正抬着头尽快地爬着。

“情况怎么样？”普里米蒂伏大声说。

“好。我们差不多完成了，”罗伯特·乔丹大声回答。

没有必要问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他扭头望着别处，那三人到了公路边。他们企图把费尔南多扶上坡来，可是他摇摇头。

“就在这儿，给我一支步枪，”罗伯特·乔丹听到他哽塞着声音说。

“不，伙计。我们要把你扶到马那儿去。”

“我要马有什么用？”费尔南多说。“我在这儿很好嘛。”

罗伯特·乔丹没听到其余的话，因为他正在对安塞尔莫说话。

“坦克来了就炸桥，”他说。“但要等它们开到桥面上才炸。装甲车来了也炸桥，要等它们开到桥面上。别的人马车辆巴勃罗会阻击的。”

“你在桥下我不炸。”

“别考虑我。有必要，你就炸。我缚好另一条电线就回来。那时我们可以一起炸桥。”

他拔脚朝桥的中部奔去。

安塞尔莫看罗伯特·乔丹奔上桥面，手臂上挽着那卷漆包线，一只手腕上挂着把钳子，背上挎着手提机枪。他看他从桥栏

杆下爬下去，不见了。安塞尔莫用一只手，右手握着电线，匍匐在石路标后面，顺着公路朝桥望。在他和桥之间躺着那个哨兵，这时他的身子更紧密地贴在公路上，阳光直射在背上，他紧紧贴住平坦滑溜的路面。他的步枪掉在公路上，上面的刺刀直指着安塞尔莫。老头儿目光越过哨兵，顺着那笼罩在桥栏杆阴影中的桥面，望到公路沿着河谷向左拐弯，然后消失在峭壁后面。他望着那一端的岗亭上照耀着阳光，接着想到手里拿着电线，就转过头来望费尔南多那儿，他正在跟普里米蒂伏和吉普赛人说话。

“让我留在这儿吧，”费尔南多说。“伤口痛得厉害，里面在大出血。我一动就觉得。”

“我们把你抬上山去，”普里米蒂伏说。“把胳膊挽在我们肩上，我们抱住你的腿。”

“这没有用，”费尔南多说。“把我扶到一块岩石后面去。我在这儿跟在上面一样可以干。”

“可我们走了以后呢？”普里米蒂伏说。

“让我留在这儿，”费尔南多说。“我这样根本不可能跟你们一起上路了。这样可以多出一匹马来。我在这里很好。敌人一定马上要来了。”

“我们能把您带上山去，”吉普赛人说。“很容易。”

自然，他和普里米蒂伏一样，迫不及待地想马上离去，然而他们已经把他扶到了这儿。

“不，”费尔南多说。“我在这儿很好。埃拉迪奥怎么样了？”

吉普赛人用手指指脑袋，表示头上中了弹。

“打在这里，”他说。“在你挂彩之后。在我们冲锋的时候。”

“别管我了，”费尔南多说。安塞尔莫看得出，他痛苦得很。他这时两手按住小肚子，脑袋向后靠在山坡上，两腿直挺挺地伸

在前面。他脸色灰白，在出汗。

“帮个忙吧，现在请别管我了，”他说。他痛得闭上了眼睛，嘴唇在抽搐。“我觉得在这儿很好。”

“步枪和子弹在这儿，”普里米蒂伏说。

“是我的吗？”费尔南多闭着眼睛问。

“不，你的在比拉尔手里，”普里米蒂伏说。“这是我的。”

“我情愿要自己的，”费尔南多说。“自己的使起来顺手些。”

“我去把它拿来，”吉普赛人哄他。“拿来之前先用这支。”

“我这儿的位置很好，”费尔南多说。“不管从公路还是从桥上来的都看得见。”他睁开眼睛，掉头望着桥对面，接着痛得又闭上了眼睛。

吉普赛人轻轻拍拍他的头，用大拇指跟普里米蒂伏做个姿势，表示他们可以走了。

“我们过后再下来扶你，”普里米蒂伏说，跟在吉普赛人后面开始上山坡，吉普赛人正迅速往上爬。

费尔南多仰靠在山坡上。他面前是一块刷白的标志公路边缘的界石。他的头在阴影中，但阳光直照在他那塞了纱布、包扎好的伤口上，照在他捂住伤口的双手上。他的腿和脚也在阳光中。他身边放着步枪，枪边有三个子弹夹在阳光中闪闪发亮。一只苍蝇在他手上爬，但是在剧痛中他不觉得这微微的搔痒。

“费尔南多！”安塞尔莫握着电线，从自己蹲着的地方对他喊着。他已把电线梢绕成一个小圈，扭紧了，可以握在手心里。

“费尔南多！”他又喊了一声。

费尔南多睁开眼睛，对他望着。

“情况怎么样？”费尔南多问。

“很好，”安塞尔莫说。“我们一会儿就要炸桥了。”

“我很高兴。有事用得着我，叫我好啦，”费尔南多说着又闭上了眼睛，身子里一阵阵剧痛。

安塞尔莫把目光移开，向桥面上望去。

他等待着英国人把漆包线卷递上桥面，然后从桥边爬上来，他那晒黑的脸和脑袋会接着出现。同时，他还留意着桥对面公路拐弯处有什么动静。他这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而且这一整天也没害怕过。他想：情况发展得那么快，而又那么正常。我不乐意枪杀那个哨兵，这叫我很难受，不过现在没什么了。英国人怎么能说枪杀一个人和枪杀野兽差不多？打猎的时候我总是兴高采烈，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可是开枪杀人使我觉得好象是在兄弟们长大成人后打自己的兄弟。为了杀死他，还得打上好几枪呢。不，别想这个了。这叫人太难受了，你刚才从桥上奔过来时，哭哭啼啼的象个女人。

这已经过去了，他对自己说，你可以设法赎这个罪孽，就象为杀死其他人赎罪一样。但是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昨天夜晚翻山回来时所希望的了。你在参加战斗，没什么可感到内疚的。即使我今天早晨就死，也没有关系。

然后他望着靠山坡躺着的费尔南多，只见他两手捂着腹股沟，嘴唇发青，两眼紧闭，在费力而缓慢地喘着气。安塞尔莫想，我要是死的话，但愿死得痛快些。不，我已经说过，如果今天我能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就不要求别的了。所以我不提其他要求了。懂吗？我不要求什么。什么都不要求了。只要满足我曾提出的要求，其他我都听其自然了。

他听着远处山口传来的枪炮声，就对自己说：今天真是了不起的日子。我应该明白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

但是他心里并不感到兴奋激动。这种感情已完全消失，心里

只有一片宁静。他这时蹲在一块石路标后面，手握绕成一个小圈的电线梢，手腕上也挽着一圈，双膝贴着路边的碎石子，他并不寂寞，也不感到孤单。他和手里的电线成为一体，和桥成为一体，和英国人放的炸药包成为一体了。他和那个仍在桥下操作的英国人成为一体，和整个战斗以及共和国成为一体了。

但是并不感到激动。四下一片宁静，他蹲在那儿，太阳直晒在他的脖子和肩膀上，他抬眼望去，看到高高的晴空和河对面隆起的山坡，他感到不愉快，然而他既不寂寞，也不害怕。

山坡上边，比拉尔伏在一棵树后面，注视着从山口通过来的公路。她身旁放着三支子弹上了膛的步枪，普里米蒂伏在她身边蹲下，她递了一支给他。

“下去，蹲在那儿，”她说。“那棵树后面。还有你，吉普赛人，到那边去，”她指指下面另一棵树。“他死了吗？”

“没有，还没有，”普里米蒂伏说。

“真倒霉，”比拉尔说。“如果我们多两个人，就不会出这种事了。他应该爬着绕到那堆锯末后面去的。现在他待的地方好吗？”

普里米蒂伏摇摇头。

“英国人炸桥的时候，碎片能飞得这么远吗？”吉普赛人从他那棵树后面问。

“不知道，”比拉尔说。“不过掌握机枪的奥古斯丁比你更靠近。如果太近的话，英国人是不会把他安排在那儿的。”

“可是我记得，炸火车的时候，机车的头灯从我头上飞过去，碎铁片象燕子般乱飞。”

“你的回忆多富有诗意啊，”比拉尔说。“象燕子！妈的！我看象洗衣作里的锅炉。听着，吉普赛人，今天你表现不错。现在别让恐惧缠住了你。”

“嘻，我只不过问问会不会炸得这么远，我好在树干后面好好躲起来，”吉普赛人说。

“就这样躲着吧，”比拉尔对他说。“我们杀了多少人？”

“我们干掉了五个。这里干掉了两个。你不见远远那头有一个？朝桥那边望。见到岗亭吗？瞧！见到吗？”他指着。“还有，巴勃罗在下面收拾那八个人。我替英国人守望过那个哨所。”

比拉尔哼了一声。接着她大发雷霆，破口大骂，“这个英国人怎么啦？跑到桥下面去他妈的干什么了？那么磨磨蹭蹭的！他在修桥还是炸桥啊？”

她伸出脑袋，向蹲在下面石路标后面的安塞尔莫望去。

“嗨，老头子！”她喊道。“你的英国人在搞什么鬼名堂？”

“耐心些，婆娘，”安塞尔莫对上面大声说，轻而稳地握着电线。“他就要干完啦。”

“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玩什么把戏？”

“这是细活！”安塞尔莫大声说。“这事很有学问。”

“我操他妈的学问，”比拉尔对吉普赛人发火了。“叫这个脏脸小子赶紧把桥炸了算啦。玛丽亚！”她声如洪钟地向山上喊着。“你的英国人——”她对想象中乔丹在桥下的作为滔滔不绝地骂了一阵。

“你静静，婆娘，”安塞尔莫在公路那边大声说。“他干的活可不简单。他就要完事啦。”

“真是活见鬼，”比拉尔怒气冲冲地说。“要紧的是快。”

正在这时，大家都听到巴勃罗已拿下的哨所那边公路上响起了枪声。比拉尔停止了谩骂，倾听着。“哟，”她说。“啊哟哟。真来啦。”

罗伯特·乔丹一手把漆包线卷递上桥面，随后从下面爬上

来，他也听到了枪声。他双膝抵在铁桥边，两手撑在桥面上，听到下面拐弯处响起了机枪声。这和巴勃罗的自动步枪的声音不一样。他站起来，探出身去，把漆包线卷绕过桥架，开始侧着身子沿桥倒退着走，一边放线。

他听到枪声，边走边觉得这声音直穿心窝，仿佛就在自己的横膈膜上回响着。他走着走着，枪声越来越近了，他回头望望公路拐弯的地方，但是仍然看不到任何汽车、坦克或人。他朝桥头走了一半路，仍然不见动静。他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电线放得很顺利，没有被什么东西缠住，但路上仍然不见动静。他把拉着电线的手伸出桥外，不让它勾住桥架，爬着绕过岗亭的后面，仍然不见动静。他走上了公路，但对面公路上仍然不见动静。接着他迅速地顺着公路外侧山洪冲成的小沟倒退着走，就象棒球外野手倒退着接飞远的高球一样。他始终绷紧着电线，这时差不多到了安塞尔莫躲着的石路标对面，但桥对面仍然不见动静。

他接着听到公路上段开来一辆卡车，他回头看到它刚开上桥头那长长的坡路。他把电线在手腕上挽了一圈，对安塞尔莫大喝一声：“炸桥！”他站稳脚跟，身体使劲往后仰，猛拉绕在手腕上的绷紧的电线，这时，后面传来卡车的声音，前面是躺着那死哨兵的公路、长桥和对岸那段仍旧空荡荡的公路。接着轰隆一响，桥的中段蓦地飞入空中，犹如浪花飞溅。他感到爆炸的气浪扑面而来，就一头扑倒在布满鹅卵石的小沟里，双手紧紧护着头。他的脸紧贴在鹅卵石地上，炸飞的桥落下来，落在原来的地方，一片带着熟悉的辛辣气味的黄色烟雾向他滚滚而来，钢铁碎片开始象雨点般落下来。

钢铁碎片落定之后，他还活着，他抬头望对面的桥。桥的中段已炸掉了。桥面上散布着边缘参差不齐的钢铁碎片，新炸裂的

断口亮闪闪的，公路上也遍地都是。那辆卡车停在离桥一百码左右的地方。司机和同车的两个人正向一个涵洞奔去。

费尔南多仍然背靠山坡躺着，他还在呼吸。他的两臂直挺挺地垂在两侧，两手松开。

安塞尔莫脸向下，伏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他的左臂曲在脑袋下面，右臂向前直伸。他右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电线。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跨过公路，跪在他身旁，看到他确实已经死了。他没有翻过尸体来看什么地方被铁片击中了。他死了，没法可想了。

罗伯特·乔丹想，他死了，个子显得真小啊。他个子显得很小，头发灰白，罗伯特·乔丹不禁想：他个子真是这么小，我就弄不明白他怎么扛得动那么大的背包。他接着看到安塞尔莫灰色紧身牧人裤里的大腿和小腿肚的轮廓，绳底鞋的破鞋底。他拾起安塞尔莫的卡宾枪和那两只实际上已空无一物的背包，又走过去拾起费尔南多身旁的步枪。他一脚踢开路面上一块钢铁碎片。接着他把两支步枪挎在肩上，握住了枪筒登上山坡，进入树林。他没有回头看，甚至也没有向桥对面的公路望望。他们还在桥下拐弯处打枪，但他这时一点也不理会了。

梯恩梯炸药的烟雾使他咳起嗽来，他还觉得身子内外都麻木了。

他把一支步枪放在伏在一棵树后面的比拉尔身边。她望了望，看到这一来她又有三支步枪了。

“你这儿太高，”他说。“你看不到公路那头有一辆卡车。他们以为是飞机炸的。你不如躲得低一点。我跟奥古斯丁下去掩护巴勃罗。”

“老头子呢？”她盯着他的脸问。

“死了。”

他又剧烈地咳起来，朝地上吐口水。

“桥已经炸掉了，英国人，”比拉尔望着他。“别忘掉这一个。”

“我什么都没忘掉，”他说。“你的嗓子不小，”他对比拉尔说。“我听到你刚才在吼。大声对上面的玛丽亚说吧，我很好。”

“我们在锯木厂牺牲了两个，”比拉尔说，想使他明白过来。

“我看到了，”罗伯特·乔丹说。“你干了蠢事吗？”

“去你妈的，英国人，”比拉尔说。“费尔南多和埃拉迪奥都是好汉啊。”

“你为什么不上去看那些马儿？”罗伯特·乔丹说。“我在这儿掩护比你强。”

“你要去掩护巴勃罗嘛。”

“巴勃罗见鬼去吧。让他用大粪去掩护自己吧。”

“不，英国人。他回心转意了。他在下面打得很猛。你没听见吗？他现在正在打，打坏家伙。你没听见吗？”

“我掩护他。可你们全是混账。你和巴勃罗全是。”

“英国人，”比拉尔说。“你平静些。在炸桥的事上，我一直比谁都更支持你。巴勃罗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可是他回来了。”

“如果我有引爆器的话，老头子是不会死的。我本来可以在这儿引爆。”

“老是如果，如果——”比拉尔说。

当他在卧倒的地方抬起头，看到安塞尔莫死了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随着炸桥之后的松弛而来的愤怒、空虚和憎恨，这时这些感情仍然贯串着他全身。他心里还有一股失望情绪，这是从悲痛心情而来的，军人们为了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当军人，往往把

这分悲痛转变成为憎恨。如今大功告成了，他感到寂寞、孤单而消沉，他憎恨他所见到的每个人。

“如果当初不下雪的话——”比拉尔说。这时，他不是突然地象肉体上的解脱那样（比如说，如果这个女人用臂膀搂着他），而是慢慢地从头脑里接受这个现实，并让憎恨发泄出来。是啊，这场雪。就是雪闯下的祸。雪，就是雪使别人遭了殃。你曾一度看到它象以往那样地伤害人，你曾一度把自己置之度外，在战争中总是不得不把自己置之度外。在战争中不可能有自己。在战争中只能把自己遗忘。这时，在这种忘我之中，他听到比拉尔说：“‘聋子’——”

“什么？”他说。

“‘聋子’——”

“说得对，”罗伯特·乔丹说。他对她露齿一笑，一个失常、生硬、脸部肌肉绷紧的笑容。“别提它啦。我错了。对不起，大娘。我们大家来好好地一起干吧。你说得好，桥已经炸掉了。”

“不错。你得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

“那我现在到奥古斯丁那儿去。叫吉普赛人守在远远的下坡，好让他看得清公路上段的动静。把这儿支枪给普里米蒂伏，你拿这支机枪。我来教你。”

“机枪你自己留着吧，”比拉尔说。“我们随时会离开这里的。巴勃罗现在该来了，我们就要撤离了。”

“拉斐尔，”罗伯特·乔丹说，“跟我一起到这儿来。这儿，好。你看到从涵洞里出来的人吗？那边，在卡车的上方。朝卡车跑来的人，看到吗？给我打掉一个。坐下。别着慌。”

吉普赛人仔细瞄准，打了一枪，当他猛的拉回枪栓，排出弹壳时，罗伯特·乔丹说，“高了。你打中了上面的岩石。见到飞

起的碎石吗？要低些，低两英尺。现在仔细瞄准了。他们在跑。好。继续射击。”

“打中一个了，”吉普赛人说。那人倒在涵洞和卡车之间的半路上。另外两个没有停下来把他拉起来。他们向涵洞奔去，钻了进去。

“别朝人打枪，”罗伯特·乔丹说。“朝卡车前轮胎上部打。这样，即使打不中，也会打在引擎上。好。”他用望远镜望着。“打得低一点儿。好。你的枪法很准。棒极了！棒极了！给我打散热器的上部。只要在散热器上，哪儿都行。你是第一流的枪手。瞧，别让谁通过那儿。懂吗？”

“瞧我把卡车上的挡风玻璃打碎，”吉普赛人快活地说。

“不。车子已经开不动啦，”罗伯特·乔丹说。“等公路上有什么车辆开来再打枪。等它开到涵洞对面才开始打枪。想法打中司机。这也是你们大家的目标，”他对和普里米蒂伏一起下山坡的比拉尔说。“你这儿的位置很妙。瞧那峭壁掩护了你侧面，有多好？”

“跟奥古斯丁一起去干你自己的事吧，”比拉尔说。“别发表演讲啦。我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叫普里米蒂伏再过去一些，守在那儿上面，”罗伯特·乔丹说。“那儿。懂吗，伙计？山坡的这一边。”

“别管我了，”比拉尔说。“你走吧，英国人。你和你的面面俱到。这儿没问题。”

正当这时，他们听到了飞机声。

玛丽亚跟那几匹马一起待了好久，可是它们并不能使她感到宽慰。她也不能使马感到宽慰。她在树林里待着的地方望不

到公路，也望不到桥。以前，马匹圈在营地下面的树林里时，她常常喂点东西给那匹白脸栗色大种马吃，使它很听话，因此在枪声初起的时候，她就用手臂搂着它的脖子。但这时她神经紧张，使这匹马也紧张起来，它听到了枪响和炸弹声，猛的把头一晃，鼻孔张大了。玛丽亚没法镇静下来，她来回走动，轻轻拍着马儿，安抚着它们，结果使它们反而更紧张、更激动。

她试图设想正在进行的射击并不可怕，这不过是巴勃罗和新来的那些人在下面，比拉尔和其他人在上面开的枪，自己不用担心，也不必惊慌失措，必须相信罗伯托。但是她做不到这点，于是桥上方和桥下方的枪声，象远方的暴风雨般从远处山口传来的战斗声，中间夹杂着一阵阵干巴巴的砰砰声和时起时伏的炸弹爆炸声，就可怕得使她差一点喘不过气来。

过了一会，她听到下面远远的山坡上传来比拉尔的大嗓门，朝她骂了一通粗话，她听不清什么，就想，唉，天主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他正在危急关头，不要这样骂他呀。不要得罪任何人，不要冒无谓的险。别惹人恼火呀。

接着她迅速而不知不觉地为罗伯托祷告起来，就象她在学校里那样，尽量快地念祷文，用左手手指记着数，反复地把那两段祷文念了好几十遍。接着那座桥爆炸了，有匹马一听到这轰隆一声，就竖起身体，脑袋猛地一扭，啪的挣断了缰绳，一溜烟地跑进树林。玛丽亚好不容易抓住它牵回来，它浑身发抖，胸脯被汗水弄得发了黑，马鞍搭拉着。她从树林里回来的时候，听到下面在打枪，就想：我再也受不了啦。我不明真相，再也活不下去啦。我喘不过气来，嘴里干得要命。我害怕，我一无办法，我把马儿吓了，只因为这一匹在树上把鞍子撞了下来，脚钩住了马镫，才侥幸地被我抓住了，现在要我上鞍，天主啊，叫我怎么办？

我受不了啦。我一心一意只求他平安无事，我的整个身心全在桥上。共和国是一回事，而我们必须打胜仗又是一回事。但是，亲爱的圣母啊，只要您使他从桥上平安归来，您叫我干什么都行。因为我的心不在这儿。我根本不独立存在。我的心只跟他在一起。求求您为了我保佑他，这样我才能存在，今后我才能为您效劳，而他是不会在乎的。这样做也并不违反共和国。啊，请宽恕我，我心乱如麻。现在我的心太烦乱了，但是如果您保佑他，什么好事我都干。他怎么吩咐，您怎么吩咐，我都照办。有了您们两位，我什么都做。可现在这样不明真相，我受不了。

接着她缚好马儿，上了马鞍，展平马毯，收紧肚带，这时她听到下面树林里传来声如洪钟的叫声，“玛丽亚！玛丽亚！你的英国人平安无事。你听到吗？平安无事。平安无事！”

玛丽亚双手捧住马鞍，把短发的头紧贴在上面，哭了。她听到那声如洪钟的嗓子又喊了一声，从马鞍上转过头来，哽咽着喊道：“听到了！谢谢你！”接着又哽咽着说：“谢谢你！多谢多谢！”

一听到飞机声，大家都抬起头来，只见飞机银光闪闪地在高空中从塞哥维亚的方向飞来，隆隆声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响。

“这些飞机！”比拉尔说。“雪上加霜，又来了这些飞机！”

罗伯特·乔丹望着飞机，伸出一条手臂挽着她的肩膀。“不，大娘，”他说。“这些飞机不是来炸我们的。它们没时间来对付我们。你平静些。”

“我恨这些飞机。”

“我也恨。可现在我得到奥古斯丁那儿去了。”

他穿过山坡上的松林，绕着圈子走，这时飞机的隆隆声响个不停，而在破桥对面的公路上，公路拐弯处那一带响着一挺重机

枪断断续续的砰砰声。

罗伯特·乔丹来到下面奥古斯丁身边，他正伏在一丛小松树后，面前架着自动步枪，这时飞机始终不断地飞来。

“下面情况怎么样？”奥古斯丁说。“巴勃罗在干什么？难道他不知道桥已经炸掉了？”

“也许他没法脱身。”

“那我们撤走吧。让他见鬼去。”

“他有办法的话，现在该来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们现在该见到他了。”

“我没听到他的动静，”奥古斯丁说。“有五分钟没听到了。不。在那儿！听！他在那儿。正是他。”

这时爆发了那支骑兵用的自动步枪啪啪啪的射击声，接着又是一阵，再是一阵。

“正是那个杂种，”罗伯特·乔丹说。

他望望更多的飞机在那蔚蓝无云的高空中飞来，望望奥古斯丁仰望飞机的脸。接着他低头望那破桥，望着对面那段仍然空无一人的公路。他咳了一声，唾了一口，倾听着那重机枪在公路拐弯处的下面又砰砰地响了。听起来枪声仍在原来的地方。

“这是什么枪声？”奥古斯丁问。“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枪声？”

“我还没炸桥，这枪声就一直在响，”罗伯特·乔丹说。他这时俯视着那座桥，看见流水穿过被炸毁的桥的缺口，那儿桥的中段已沉落下去，弯弯的象条钢围裙。他听到飞过去的第一批飞机开始在山口上空投弹，而更多的飞机还在飞来。飞机的马达声响彻高空，他抬头望到一架一丁点大的驱逐机高高地在其他飞机的上空盘旋。

“我看前天早晨那些飞机没有越过火线，”普里米蒂伏说。“它们准是向西拐去了就飞回来的。要是他们见到了这些飞机，就不会发动进攻了。”

“这些飞机大多数是新的，”罗伯特·乔丹说。

他有一种感觉，情况开始是正常的，尔后却带来了不少巨大的、大得不相称的特大反应。就象你扔了块石子，激起了一片涟漪，这涟漪象浪潮般咆哮着，排山倒海似地反冲回来。或者就象你大喊一声，引来阵阵雷鸣般的回声，震耳欲聋。或者就象你打了一个人，他倒下去了，而你只见漫山遍野的其他的人全副武装地站起来了。他高兴的是并不和戈尔兹一起在上面的山口。

他伏在奥古斯丁身边，望着飞机飞过，留神倾听身后有没有响起枪声，注视着面前的公路，他知道路上会出现一些动静，但不知道会是什么，这时他仍然为自己没在桥边被炸死而感到惊讶。他原来深信必然会被炸死，所以现在这一切显得不真实了。他对自己说：别神思恍惚啦。摆脱这种想法。今天要干的事情很多很多。然而这想法还是缠住了他，因此他清楚地感到这一切如同梦境。

“你吸进的硝烟太多了，”他对自己说。但是他知道原因不在这儿。他确实感到，在这绝对的现实环境中一切是那么不真实。他俯视那座桥，接着回过头来望望躺在公路上的那个哨兵，望望安塞尔莫躺着的地方，望望靠在山坡上的费尔南多，再回头顺着这平坦的褐色公路望去，直望到那辆开不动的卡车，可是一切仍然显得不真实。

“你还是马上甩掉这一套吧，”他对自己说。“你象只斗鸡场上的公鸡，谁也不知道你受了伤，外面也看不出，但是伤势已使它快死了。”

“别扯淡啦，”他对自己说。“一句话，你有点儿头脑发晕，一句话，完成了任务，你松劲了。宽心些吧。”

这时奥古斯丁一把抓住他的臂膀，指点着，于是他向河谷对面望去，看到了巴勃罗。

他们看到他绕过公路拐角奔过来。他们看到他在那块把公路下段遮住的陡峭的山岩旁站住了，靠在石壁上向身后的公路方向打枪。罗伯特·乔丹看到矮胖粗壮的巴勃罗，帽子丢了，靠在石壁上打着那支骑兵用的自动步枪，他看到一个铜弹壳喷泉似地跳出来，在阳光照耀下闪着亮。他们看到巴勃罗蹲下来又打了一梭子。接着这个罗圈腿的矮个子头也不回地拔脚飞跑，低着头向桥直奔而来。

罗伯特·乔丹把奥古斯丁推到一边，把这支大自动步枪的枪托抵住肩头，瞄着公路的拐角。他自己的手提机枪搁在左手边。距离那样远，用它是打不大准的。

巴勃罗一路向他们奔来，罗伯特·乔丹瞄准着公路的拐角，但是没有动静。巴勃罗跑到桥头，回头望了一下，向桥瞥了一眼，就向左拐弯，朝下跑进河谷，消失了。罗伯特·乔丹仍然注视着那拐角，但还是一无动静。奥古斯丁爬起身，一膝跪着，他看得到巴勃罗象山羊般爬下河谷。他们见到巴勃罗以来，下面一直没有枪声。

“你看到上面有动静吗？上面的山岩上？”罗伯特·乔丹问。

“没有。”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公路拐角。他知道，那堵石壁陡得谁也没法爬上来，但再下面地势较平坦，可以迂回爬上来。

如果刚才一切显得不真实的话，这时突然变得够真实的了。这就象反光照相机的镜头突然对准了焦距。就在这时，他看到

一辆低矮的坦克的扁车头和掀出了一挺机关枪的绿、灰、棕三色斑斑驳驳的炮塔在拐角处出现在明亮的太阳光下。他朝它打枪，听见子弹当当地直射在钢板上。这辆小型轻便坦克慌忙缩回到石壁后面。罗伯特·乔丹密切注视着那拐角，只见车头又露出来了，接着是炮塔的边缘，这炮塔转过来，枪口指向公路。

“看样子真象老鼠出洞，”奥古斯丁说，“瞧，英国人。”

“这坦克手没有多大信心，”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打的原来是这只大甲虫，”奥古斯丁说。“再朝它打枪，英国人。”

“不。我伤不了它。可不想让它发现我们的位置。”

坦克开始向公路的一头射击。子弹打在路面上，吱吱地反弹开去，乒乒乓乓地打在铁桥上。这就是那挺他们过去听到在下面开火的机关枪。

“王八蛋！”奥古斯丁说。“这就是那些了不起的坦克吗，英国人？”

“这是小型的。”

“王八蛋。要是有个装满汽油的小瓶，我就爬过去放火烧掉它。这家伙打算干什么，英国人？”

“等会儿他会再把坦克探出头来张望的。”

“叫人害怕的就是这些家伙啊，”奥古斯丁说。“瞧，英国人！他在打那些死掉的哨兵。”

“因为他没有别的目标可打，”罗伯特·乔丹说。“别怪他。”

但是他在想：当然啦，要取笑他。然而，假使你自己回到了本国，人家用炮火把你拦阻在大路上。跟着桥给炸了。你难道不会以为前面埋着地雷或设着埋伏吗？你当然会这样想。这坦克手干得满不错。他在等待援军开上来。他正在和敌人交锋。实

在只不过是这几个人罢了。但是他哪里知道啊。瞧这小杂种。

小坦克在拐角上慢慢露出一点儿头来。

正当这时，奥古斯丁看到巴勃罗用双手双膝从河谷边爬上来，胡子拉碴的脸上淌着汗。

“婊子养的来了，”他说。

“谁？”

“巴勃罗。”

罗伯特·乔丹一望，看见了巴勃罗，接着就朝坦克上涂着伪装色的炮塔射击，瞄准了那机枪上方的一道隙缝。小坦克呼呼地慌忙缩回去，又消失了踪影。罗伯特·乔丹提起自动步枪，啪的把三脚架折起，贴在枪筒上，不管枪口还是很烫，就背上肩头。枪口烫得厉害，灼着他的肩头，他用手托起枪托，使劲把枪口指向后方。

“把那袋子弹盘和我那挺小机枪拿了，”他大声说。“跑着跟上。”

罗伯特·乔丹穿过树林向山上奔去。奥古斯丁紧跟在后面，再后面跟着巴勃罗。

“比拉尔！”罗伯特·乔丹朝山坡那边叫喊。“来啊，大娘！”

他们三人尽快地爬上陡削的山坡。他们没法奔跑，因为坡度太陡。巴勃罗只背着一支骑兵用的手提机枪，没有其他东西，紧紧赶上了他们俩。

“你那一伙人呢？”奥古斯丁嘴里发干，问巴勃罗。

“全死了，”巴勃罗说。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奥古斯丁转过头来望着他。

“我们现在有不少马啦，英国人，”巴勃罗上气不接下气地

说。

“好，”罗伯特·乔丹说。他想：你这杀人成性的杂种。“你碰上什么了？”

“什么都碰上了，”巴勃罗说。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比拉尔怎么样？”

“她失去了费尔南多和那两兄弟中的一个——”

“埃拉迪奥，”奥古斯丁说。

“你呐？”巴勃罗问。

“我失掉了安塞尔莫。”

“马很多了，”巴勃罗说。“连驮行李也够了。”

奥古斯丁咬咬嘴唇，望着罗伯特·乔丹，摇摇头。他们听到那坦克在被树林遮住的下面公路上又在向路面和桥扫射了。

罗伯特·乔丹把头猛的一甩。“那是怎么回事？”他对巴勃罗说。他不愿意望巴勃罗，或闻到他的气息，但他要听他的回答。

“那辆坦克来了，我脱不开身，”巴勃罗说。“我们在下面那哨所的拐角上被挡住了去路。后来坦克回去补给什么了，我就来啦。”

“你在拐角上开枪打谁？”奥古斯丁单刀直入地问。

巴勃罗望着他，露齿要笑，想想不行，结果没说什么。

“你把他们全枪杀了？”奥古斯丁问。罗伯特·乔丹在想，你别开口。这不关你的事。你所指望的事，他们全干成了，而且还不止如此。这是帮派之争。别用道德观点来判断。对一个凶手，你能指望什么呢？你正在和一个凶手合作啊。你别开口。你本来就对他够了解的。这又不是新鲜事儿。可是这杂种多卑鄙，他想。这杂种多卑鄙、狠毒啊。

他的胸脯由于爬了山而正在作痛，奔跑之后仿佛要裂开似

的，这时他看到了前面树林里的马群。

“说呀，”奥古斯丁在说。“你干吗不说你毙了他们？”

“闭嘴，”巴勃罗说。“今天我大打了一场，干得不赖。问英国人好啦。”

“那么现在把我们带出去吧，”罗伯特·乔丹说。“因为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巴勃罗说。“只消有一点儿运气，我们就能脱险了。”

他开始呼吸得较正常了。

“你不打算杀我们中间的人吧，”奥古斯丁说。“因为我现在要杀你了。”

“闭嘴，”巴勃罗说。“我必须顾到你的利益和我们这一伙的利益。这是打仗啊。人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王八蛋，”奥古斯丁说。“你捞到了全部的好处。”

“告诉我，你在下面碰上些什么了，”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说。

“什么都碰上了，”巴勃罗重复说。他还是气喘得胸脯象要裂开似的，但这时能从容地说话了，他脸上和头上在淌汗，肩膀和胸膛全湿透了。他小心翼翼地望着罗伯特·乔丹，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怀着善意，接着他露齿笑笑。“什么都碰上了，”他又说。“我们先占领了哨所。接着来了个摩托兵。接着又来了一个。接着是辆救护车。接着是辆卡车。接着是那辆坦克。就在你炸桥之前。”

“接着——”

“坦克伤不了我们，可它封锁了公路，我们没法脱身。后来坦克开走了，我就来了。”

“那么你那伙人呢？”奥古斯丁插嘴说，还在找碴儿。

“闭嘴，”巴勃罗直瞪瞪地望着他，看他脸上的神气，好象一个不等出现不利情况就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的人的神情。“他们不是我们一伙的嘛。”

这时他们看到系在树干上的那些马儿，阳光透过松树的枝丫投射在它们身上，它们甩着头，踢着脚，驱赶马蝇。罗伯特·乔丹看到了玛丽亚，接着就紧紧地、紧紧地抱着她，自动步枪靠在身旁，枪口抵着他的肋骨，听玛丽亚在说：“你啊，罗伯托。你啊。”

“是啊，兔子。我的好兔子。我们现在走吧。”

“你真的在我身边吗？”

“对，对。真的。你啊！”

他决没有想到，在打仗的时候能体会到有个女人在身边；也没想到你身体的任何部分竟能体会到这一点，并对它作出反应；也没想到如果有个女人的话，她的乳房竟是小小的、圆圆的，隔着一层衬衣紧贴着你；也没想到它们，那对乳房，会理解他们俩是在战火中。可这是真的，他就想：好，很好。我原来不会相信这个的。他使劲抱了她一下，但并不对她看，就在她身上他从没拍过的地方拍了一下，说：“上马。上马。跨上马鞍，漂亮的姑娘。”

他们解着马缰绳。罗伯特·乔丹已把自动步枪交还给奥古斯丁，把自己的手提机枪挎在背上，这时掏出衣袋里的手榴弹，装进马褡子里。他拿一只空背包塞在另一只里，一起缚在他的马鞍后面。接着比拉尔来了，她爬坡累得喘不过气来，话都说不出，只做着手势。

接着巴勃罗把他手里的三根缚马脚的绳索塞在一只马褡子里，直起腰来说：“怎么样，太太？”她只是点点头，大家就都上马了。

罗伯特·乔丹骑着上一天早晨他在雪地里第一次看到的那匹大灰马，他觉得夹在他两腿之间、按在双手之下的这匹马十分有力。他穿着绳底鞋，马镫的皮带短了一点；他肩上挎着手提机枪，衣袋里装满了子弹夹，他坐在马上，在一只空子弹夹里重装子弹，缰绳紧夹在腋下，看着比拉尔跨上绑在那匹鹿斑马马鞍上的行李包，拿它当做一只怪样的坐垫。

“看天主面上，把那个玩意儿解下来，”普里米蒂伏说。“你会摔下来的，马儿也受不了啊。”

“住口，”比拉尔说。“我们得用它来过日子。”

“太太，能这样骑马吗？”巴勃罗坐在栗色大种马的民防军用马鞍上问她。

“跟卖牛奶的人一样，”比拉尔对他说。“你看怎么走，老伴？”

“一直下山，跨过公路，爬上那远方的山坡，到上面较狭窄的地方穿进树林。”

“要跨过公路？”奥古斯丁用帆布鞋的软鞋跟踢踢那硬邦邦的、没有反应的马肚子，在他身旁拨转马头，这匹马是巴勃罗上一晚搞来的那批中间的。

“不错，老弟。只有这一条路，”巴勃罗说，递给他一根牵马绳。普里米蒂伏和吉普赛人拿着其余的。

“你愿意的话，骑在最后面，英国人，”巴勃罗说。“我们在高一点的地方跨过公路，不在那机枪的射程内。可我们得分散地走，要赶好多路，然后大家在坡上较狭窄的地方会合。”

“好，”罗伯特·乔丹说。

他们在树林中下坡向公路边骑去。罗伯特·乔丹就在玛丽亚的后面。他没法在树林中和她并骑。他用大腿在那匹灰马身上轻柔地擦着，接着把稳了马头，跟大家一起朝山下奔驰而去，

悄悄地穿过松树之间，一路下山，用大腿的动作给灰马作暗示，就象在平地上用马刺来暗示那样。

“你啊，”他对玛丽亚说，“过公路的时候第二个走。第一个走看来比较危险，其实并不怎么样。第二个走来得安全。敌人总是密切注视着后面的人。”

“可是你——”

“我会出他们不意地跨过去的。不会出什么问题。在队伍中间的位置最危险。”

他望着巴勃罗骑在马上，毛茸茸的圆脑袋缩在肩膀上，肩上挎着自动步枪。他望着比拉尔，她光着头，肩膀宽宽的，双脚钩住了行李，两膝比大腿还高。她回头望了他一眼，摇摇头。

“你赶到比拉尔前面再跨公路，”罗伯特·乔丹对玛丽亚说。

树林越来越稀疏了，他穿过树木之间见到下面黑色的柏油路，和路对面绿色的山坡。我们到了涵洞的上面，他明白，刚好在公路陡的朝下拐的高地的下方，公路从那里笔直地通到桥头。我们的位置在桥的上方八百码左右。如果那小坦克开到了桥头，我们仍旧在它的菲亚特机枪射程之内。

“玛丽亚，”他说。“在我们跨公路登上山坡前先赶到比拉尔前面去。”

她回头望着他，但不说话。他并不盯着她，只看了她一眼，想弄明白她是否会意。

“明白了吗？”他问她。

她点点头。

“赶到前面去，”他说。

她摇摇头。

“赶到前面去！”

“不，”她转身摇摇头，对他说。“我按照规定的次序赶路。”

正在这时，巴勃罗猛的把两只马刺扎进那大栗色马，一头冲下最后那段铺着松针的山坡，跨过公路，马蹄铁砰砰作声，火星四迸。其他的人跟在他后面，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们穿过公路，蹄声哒哒地爬上那绿色的山坡，听到桥那边响起了机枪射击声。接着是一声嘘—轰隆—砰！这一声“砰”很清脆，爆裂声引起了回响，只见山坡上进起一小股泥土，伴着一阵灰色烟雾。嘘—轰隆—砰！又响了一次，那嘘声象发射火箭的声音，山坡上又进起了一股泥土，比第一次远些。

吉普赛人在他前面被阻在路边，隐蔽在最后一排树中间。他望望前面的山坡，然后回头来望罗伯特·乔丹。

“往前冲，拉斐尔，”罗伯特·乔丹说。“快跑，伙计！”

吉普赛人抓着牵马绳，那匹驮马在他背后用脑袋把绳子绷得紧紧的。

“放开驮马，快跑！”罗伯特·乔丹说。

他看到吉普赛人抓着牵马绳的手伸在身后，越伸越高，似乎要不知多少时间才能松手似的，同时用脚跟朝他坐骑肚子上一扎，那绳子绷紧了，接着掉下地去，他就穿过了公路。当吉普赛人穿过那坚硬的黑色公路时，罗伯特·乔丹用膝盖抵着那匹返身向他撞来的受惊的驮马，他听到吉普赛人驰上坡时马蹄的得得声。

嗖嗖嗖—轰隆！炮弹顺着低平的弹道飞来，他看到吉普赛人面前的地上进起一小股灰黑色的泥土，吉普赛人象头奔跑着的公猪般躲闪。他望着吉普赛人奔驰，这时慢慢地登上那绿色的长坡，炮弹掉在他身前身后，他跑到一层山岩下面，和其他人会合在一起了。

我没法带上这匹该死的驮马，罗伯特·乔丹想。然而，我巴不得让这婊子养的待在我的右边。我要让它挡在我和他们正在使的那门四十七毫米口径小炮的中间。天哪，我无论如何要把它带到那边山坡上去。

他拍马跑到驮马跟前，一把抓住了马勒，然后拉着缰绳，在树林里向公路上段的方向骑了五十码，那驮马在他身后一路小跑。到了树林边，他顺着公路望那辆卡车后面的桥。他看到敌人出现在桥上，桥后公路上一片交通堵塞的样子。罗伯特·乔丹朝四下望望，终于见到了他要找的，就伸手从松树上折下一根枯枝。他放开马勒，把驮马慢慢地赶到朝公路下斜的山坡上，接着用树枝狠抽马屁股。“跑呀，你这个婊子养的，”他说。驮马穿过公路，跑上山坡的时候，他把枯枝扔了过去。树枝打中了马，那马快跑起来了。

罗伯特·乔丹朝公路上段又骑了三十码；再往前去路边的山坡太陡了。那门炮还在射击，发出火箭般的嘘嘘声，接着轰隆、砰，迸起了泥土。“跑呀，你这个法西斯的大灰杂种，”罗伯特·乔丹对自己的马说，逼它从斜坡上直冲下去。他到了露天的公路上，马蹄踩在非常坚硬的路面上，使他的肩膀、脖子和牙齿都感到震动。他跑上平坦的坡地，马蹄在地面上蹀躞、扣击、伸展、腾跃、疾走。他隔着山坡俯视那座桥，在新的角度下呈现出一幅他从未见过的图景：桥的侧面展现在眼前，不再是从一端望去的樣子，中央是断口，背后的公路上是那辆小坦克，小坦克后面有一辆大坦克，坦克上的炮这时象镜子般倏的闪出明亮的金光，刺耳的炮声划破了天空，简直就象打在那伸在他面前的灰马脖子上面。山坡上腾的迸起一股泥土，他急忙转过头来。他前面的驮马远远地跑在右面，步子慢下来了。罗伯特·乔丹疾

驰着，头微微转向那桥，看到一列卡车停在拐角的后面，由于他正在向高处骑行，那里的情景显得清清楚楚，他看到耀眼的黄光带来了紧接着的嗖嗖声和轰隆声，炮弹打得太近，没有击中目标，但他听到迸起泥土的地方飞出弹片的声音。

他看到他们全在前面树林边注视着他，就说：“快跑呀，马儿！”他感到这匹大马的胸脯由于山坡越来越陡而大起大伏，看到面前伸展着的灰脖子和一双灰耳朵，就伸手拍拍那汗湿的灰脖子，回过头来望桥，看见一辆笨重、低矮、漆成土黄色的坦克在公路上倏的发出一道闪光，接着他并没有听到嗖嗖声，只听得象锅炉炸裂似的砰的一声带有辛辣火药味的爆炸声，就被压在灰马身体下面，灰马踢着腿儿，他呢，竭力想从重压下脱出身来。

他能够动弹。他能够向右边挪动。然而当他向右边挪动的时候，左腿却依旧完全压在马身下，动弹不得。仿佛左腿上多了一个关节，不是股关节，而是另一个横向的铰链般的东西。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灰马用膝盖抵着地面爬起身来，罗伯特·乔丹赶忙把右腿一甩，踢掉马镫，从马鞍上溜下来，搁在地上，伸出双手去摸平摊在地上的左腿，摸到了锋利的折骨和紧贴在上面的皮肉。

他差不多躺在马肚子下面，他看到马的肋骨起伏着。他坐着的地方，草是绿茵茵的，草间还开着野花，他眺望着山坡下的公路、桥、河谷和对面的公路，看到了那辆坦克，等待再来一道闪光。闪光差不多立刻出现了，这次又没有嗖嗖声，就在这带着烈性炸药气味的爆炸之中，土块四溅，弹片呼呼飞射；他看到那大灰马静悄悄地在他身旁坐下来，仿佛是马戏团里的马在表演。他再望望坐在那儿的马，听见它在垂死呻吟。

接着普里米蒂伏和奥古斯丁架起他的胳膊，把他拖上最后

一段山坡，那条断了骨头的腿一路随着坡地的起伏而上下摆动。有一次，一枚炮弹紧挨着他们的头顶嗖地一声飞过去，他们丢下了他，卧倒在地，但只有泥土撒在他们身上，弹片噓噓地飞到了别处，他们就又把他扶起来。于是他们把他拖上山去，隐蔽在拴马的树林中一条长沟里，玛丽亚、比拉尔和巴勃罗站在他身旁，低头望着他。

玛丽亚跪在他身旁说：“罗伯托，你怎么啦？”

他大汗淋漓地说：“左腿断了，漂亮的姑娘。”

“我们会包扎好的，”比拉尔说。“你可以骑那匹马。”她指指一匹驮着行李的马。“把行李卸下来。”

罗伯特·乔丹看到巴勃罗在摇头，便对他点点头。

“你们走吧，”他说。接着他说，“听着，巴勃罗。你过来。”

巴勃罗弯腰把淌着条条汗水的胡子拉碴的脸凑近他；罗伯特·乔丹闻到了巴勃罗浑身的臭气。

“让我们单独谈谈，”他对比拉尔和玛丽亚说。“我得跟巴勃罗谈谈。”

“痛得厉害吗？”巴勃罗问。他弯下腰凑近罗伯特·乔丹。

“不。我看是神经给压断了。听着，你们走吧。我不行了，明白吗？我要跟那姑娘谈一会。等我说把她带走，就把她带走。她不会愿意走的。我只要跟她谈一会儿。”

“时间确实不多了，”巴勃罗说。

“那当然啦。”

“我想你还是到共和国去的好，”罗伯特·乔丹说。

“不。我主张到格雷多斯山区去。”

“你好好考虑考虑。”

“现在跟她谈谈吧，”巴勃罗说。“没有多少时间了。英国人，

你受了伤，我很难受。”

“既然已经受了伤——”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别谈这个了。可你得考虑考虑，你是很有头脑的，用用头脑吧。”

“我哪会不用？”巴勃罗说。“现在快谈吧，英国人。没时间了。”

巴勃罗走到最近的一棵树下，望着山坡下面、山坡对面以及河谷对面的公路。巴勃罗看到山坡上的灰马时，脸上露出了真正的懊丧，这时罗伯特·乔丹背靠树干坐着，比拉尔和玛丽亚跟他在一起。

“把裤腿割开好吗？”他对比拉尔说。玛丽亚蹲在他身边，她不说话。阳光照在她头发上，她的脸抽搐得象小孩儿临哭前的模样。但她没哭。

比拉尔拿出刀来，在裤腿上从左袋下面一直划到底。罗伯特·乔丹用双手展开划开的裤腿，望着那一截大腿。在股关节下十英寸处，有一个突起的紫色肿块，象只尖顶的小篷帐。他用手指摸摸，能摸到折断的大腿骨紧顶着皮肉。他的腿弯成一个古怪的角度。他抬头望着比拉尔。她脸上露出的表情和玛丽亚的一样。

“你走开，”他对她说。

她垂下头走了，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回头望一眼，罗伯特·乔丹看到她的肩膀在颤动。

“漂亮的姑娘，”他对玛丽亚说，握住她的两只手。“听着。我们不到马德里去了——”

她这时哭了。

“不，漂亮的姑娘，别哭，”他说。“听着，我们现在不到马德里去了，可是不管你到哪里，我总跟你在一起。明白吗？”

她不说话，双臂搂着他，头挨在他脸颊上。

“好好听我说，兔子，”他说。他知道时间紧迫，他在拼命出汗，然而这话必须说一说，让她明白：“你就要走了，兔子。然而我将和你在一起。只要我们俩有一个人活着，就有我们两个。你明白吗？”

“不，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不，兔子。我现在要干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干。有你在身边，我干不好。要是你走了，那么也就是我走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不管有我们中间哪一个，就是有我们两个。”

“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不，兔子。听着：人们不能一起干。人人都得一个人干。可要是你走了，那么也就是我跟你走了。这样，也就是我走了。你现在愿意走了，我知道。因为你心地善良。你现在将为我们俩走了。”

“可是我留在你身边要好些，”她说。“我觉得这要好受些。”

“是的。所以你走就是帮我一个忙。只有你做得到，就帮我一个忙吧。”

“可你不明白，罗伯托。我怎么办呢？离开了你，我更难受。”

“当然，”他说，“这使你更难受。可是现在我也就是你啊。”

她不说话。

他望着她，他汗流不止，这时他说话所作的努力要比他一生中所作的任何努力更艰苦。

“现在你会为我们俩走了，”他说。“你不能自私，兔子。你必须尽自己的责任。”

她摇摇头。

“你就是我啊，”他说。“你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兔子。”

“兔子，听着，”他又说。“这样，我真的也走了。我向你起誓。”

她不说话。

“你现在明白了，”他说。“我看得很清楚。你现在愿意走了。好。你现在就要走了。你说过你愿意走了。”

她没有说什么。

“我谢谢你了。你好好地快快地走得远远的，我们俩一起走，你就是我们俩。把你的手放在这里。头低下来。不，把头低下来。这就对了。我把我的手放在这儿。好。你真好。别再想了。你在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听话啦。不是听我的，而是听我们俩的。你包含了我。你为了我们俩走。真的。你走，就是我们俩走。这我向你保证。你真好，愿意走，你真善良。”

他向巴勃罗歪了一下头，巴勃罗从树旁不时望望他，这时走上前来。他用大拇指向比拉尔做个手势。

“我们下一次到马德里去吧，兔子，”他说。“真的。站起来走吧，这样就等于我们俩一起走。站起来。明白吗？”

“不，”她说，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他这时仍然平静地讲着道理，但带着极大的权威。

“站起来，”他说。“你现在也就是我。你是我将来的一切。站起来。”

她哭着，低着头，慢慢地站起身来。接着她突然扑倒在他身边，他说：“站起来，漂亮的姑娘，”她才慢慢地、疲乏地又站起身来。

比拉尔握住了她的胳膊，她站在那儿。

“咱们走吧，”比拉尔说。“你需要什么吗，英国人？”她望着他，摇摇头。

“不要，”他说，继续对玛丽亚说话。

“别说再见，漂亮的姑娘，因为我们不是分离。格雷多斯山区是不错的。走吧。好好走吧。不，”比拉尔扶着那姑娘走去的时候，他仍然平静地在讲道理，“别回头。把你的脚踩上马镫。对。踩上去吧。扶她上马，”他对比拉尔说。“帮她跨上马鞍。跨上去吧。”

他冒着汗，转过头去俯视山坡，然后回头望着那姑娘坐在马鞍上，比拉尔就在她身边，巴勃罗紧跟在后面。“现在走吧，”他说。“走吧。”

她又要回过头来望。“别回头，”罗伯特·乔丹说。“走吧。”巴勃罗就用缚马腿的皮带抽了下马屁股，玛丽亚似乎想从马鞍上溜下来，但比拉尔和巴勃罗紧挨着她骑着，比拉尔抓住了她，三匹马跑出沟去。

“罗伯托，”玛丽亚转身叫喊。“让我留下来！让我留下来！”

“我和你在一起，”罗伯特·乔丹大叫。“我和你在一起了。我们俩一起在那儿。走啊！”接着他们在沟里拐了弯，就不见了。他汗水湿透全身，什么也不望。

奥古斯丁站在他身旁。

“你要我枪杀你吗，英国人？”他弯腰凑近着问。“要吗？没有关系。”

“用不着，”罗伯特·乔丹说。“走吧。我在这儿很好。”

“我操他的祖宗！”奥古斯丁说。他在哭，哭得看不清罗伯特·乔丹的模样了。“保重了，英国人。”

“保重了，老伙计，”罗伯特·乔丹说。他这时在望山坡下面。“好好照顾那短头发丫头，行吗？”

“没有问题，”奥古斯丁说。“你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吗？”

“这支机枪的子弹不多了，就留给我吧，”罗伯特·乔丹说。
“你反正弄不到子弹了。另一支和巴勃罗的那一支都弄得到。”

“我把枪筒通清了，”奥古斯丁说。“你跌倒的时候，枪口插进泥土里去了。”

“那匹驮马怎么了？”

“吉普赛人把它逮住了。”

奥古斯丁骑上马背，但他不愿走。他在马上向罗伯特·乔丹靠着的树边弯下腰来。

“走吧，老伙计，”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这样的事儿，在战争中多得很。”

“战争是个臭婊子，”奥古斯丁说。

“是呀，伙计，是呀。可你走吧。”

“保重了，英国人，”奥古斯丁握紧了右拳说。

“保重了，”罗伯特·乔丹说。“你走吧，伙计。”

奥古斯丁调转马头，右拳向下一挥，这一挥仿佛是对战争的又一声诅咒，他就跑出沟去。其他人早已不见了。跑到这林间的小山沟的拐角上，他回头挥挥拳头。罗伯特·乔丹也挥了挥手，接着，奥古斯丁也消失了。……罗伯特·乔丹从绿茵茵的山坡上向下望着公路和桥。他想，我这样也不好算坏。现在还没有必要冒险翻过身来俯卧，使伤口紧贴地面，而且我这样可以望得更清楚些。

由于这一切，由于他们的离去，他感到空虚，疲惫，衰竭，嘴里发苦。得啦，事情终于到了尽头，没有什么问题了。不管以往的一切如何，不管未来的一切会怎么样，对他来说，再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了。

如今大家都已离去，他一个人背靠着一棵树。他俯视着面前

那绿茵茵的山坡，看到被奥古斯丁枪杀的那匹灰马，再顺着山坡一直望到下面的公路，和路对面覆盖着树木的田野。接着他望那座桥和桥对面的公路，注视着桥上和公路上的动静。他这时看到那些卡车全开到了下段公路上，灰色的车身在树林中显露出来。然后他回头望着那从小山上通下来的上段公路。他想：敌人马上就要来了。

比拉尔会比任何人更好地照顾她。这个你知道。巴勃罗一定有个行得通的撤退方案，否则他不会这么干。他不必为巴勃罗担心。想玛丽亚没有好处。要相信你对她所说的那一席话。那是最好的办法。谁说这不是真话？不是你。你没说这不是真的，同样你也不会说已经发生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过。还是坚持你自己的信仰吧。别弄得冷嘲热讽的。时间太短促，你才把她打发走。每个人都尽力而为。你不能替自己做什么了，但也许你能为别人出点力。嗯，这四天我俩真走运。还不到四天哪。我当初到这里的时候是下午，而今天可挨不到中午了。一共还不到三天三夜。他说：要说得确切，相当确切。

他想：我看你还是卧倒的好。你还是好歹安顿好一个位置，这样能干点什么，而不要象个二流子似的在这棵树上靠着。你的运气着实好。比这种事更糟的多着哪。不是这天就是那天，这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一旦明白了这是你的必由之路，你就不害怕了，对不对？不害怕了，他说，真的。还算走运，神经被压断了。我简直感觉不到骨折地方的下面还有半截腿儿。他摸摸腿的下半截，好象它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他又望望山坡下面，心想：唯一的遗憾是我将离开这个世界。我非常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但愿我在世上做过了一些好事。我用自己有过的人才尝试过。你是说现有的，而不是有过的

才干。好吧，现有的。

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已经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儿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生。你度过的一生和你祖父的一样美好，虽然时间没有他的那么长。凭着最后的这几天，你度过的一生比谁的都不差。你这样走运，没什么可抱怨的了。然而我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把我学到的东西传给后人。天啊，我最后阶段学得好快啊。我想跟卡可夫谈谈。他在马德里。就在那些山头的后面，在山坡下的平原对面。从灰色的山岩间下去，穿过松林、石南和金雀花丛，越过高高的黄土高原，你能望到它矗立着，洁白而美丽。这一点就象比拉尔讲的屠场前那些喝血的老太婆一样真实。真实的事情不止一件。件件都是真实的。好比飞机，不论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模样都是美丽的。美丽，真是活见鬼，他想。

你宽宽心吧，他说。趁你还有时间，翻过身来吧。且慢，有一件事，你还记得吗？比拉尔的手相？你信这种无稽之谈吗？不，他说。一切都应验了还不信？不，我不信这一套。今天清早炸桥之前，她是一番好意。她担心我也许会信它。可是我不信。不过她信。这种人能看到未来。或者说能预感到什么，象只捕鸟猎犬。这种超感觉的特异功能，你怎么说？她满嘴粗话，你怎么说？他想：她刚才不愿说再见，因为她知道，如果说了再见，玛丽亚决不肯走。这个比拉尔呀。你该翻过身来了，乔丹。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

那时他记起了后裤袋里的小酒瓶，就想：我好好喝一点这种烈酒，然后来试试。他伸手去摸，却没有摸到。他觉得异常孤独，因为他知道，甚至连酒也喝不到了。他说，我还指望靠酒来壮胆

呢。

你看是不是巴勒罗拿的？别蠢了。一定是在桥上弄丢的。
“算了吧，乔丹，”他说。“快翻身吧。”

接着他用两手抓住左腿，用力拉着，把它向另一条腿靠拢，同时把靠在树上的上半身横在树边。他平躺着，用力拉着腿，免得折骨的一端翘起来，戳破大腿。他拿屁股做支点，慢慢地转身，直到后脑勺朝着山下。接着两手抱着朝山上方向的断腿，他把右脚底放在左脚背上，使劲抵住，同时大汗淋漓地翻过身来，使脸和胸膛朝着地面。他用胳膊肘支撑着上半身，靠双手拉和右脚朝一边使劲地推，使左腿直朝后伸，弄得大汗淋漓，但事情办成了。他用手指摸摸左腿，没有出问题。折骨的一端并没有戳破皮肉，而是深深地嵌在肌肉里。

那匹该死的马倒在腿上的时候，他想，大神经一定当真给压断了。腿的确一点儿也不痛。除了刚才翻身时有些动作才使他觉得痛。那是因为折骨挤压着旁边的肌肉了。你明白了吗？他说。你明白运气好在什么地方吗？你根本不需要烈酒。

他伸手拿起手提机枪，拉出插在弹仓里的空子弹夹，从口袋里掏出子弹夹，扳开枪机，望望枪筒里面，卡嗒一声把子弹夹装好，然后眺望山坡下。也许要等半小时，他想。现在宽宽心吧。

接着他望望山坡，望望松林，他试图什么也不想。

他望望那条河流，他想起了在桥下凉飕飕的阴影里的情景。但愿敌人就来吧，他想。我不希望敌人到来之前自己先神智不清。

遇到这种事，你看哪种人比较心里坦然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正视现实的人？宗教使人们得到很大的安慰，然而我们知道，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糟的只是缺乏信念。死亡只有在

拖了很久才来临，并且痛苦得使你丢人的时候才是糟的。你走运的地方就在这儿，明白吗？你既不会拖得很久，也不痛苦。

他们已经撤走了，真是好事。他们既然撤走了，现在这事我就一点也不在乎了。我是说撤走的情形真好，确实了不起。如果当初他们全都散布在山坡上那匹灰马附近，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或者我们全给困在这山上等待敌人出现，那就大不相同了。不。他们撤走了。他们到别处去了。要是这次进攻成功了该有多好。你要什么呀？什么都要。我什么都要，给我什么我都接受。要是这次进攻失利，另一次会成功的。我根本没注意飞机什么时候飞回来的。上帝呀，幸运的是我总算把她打发走了。

我很想跟祖父谈谈这次经历。我敢打赌他决不需要到敌人后方去找到了自己人来干这种事。你怎么知道呢？他也许干过五十次。不，他说。说得确切些吧。这样的事谁也不会干过五十次。没人干过五次。象这样的事也许谁都没有干过一次。什么话！人家一定干过的。

但愿敌人现在就来，他说。但愿他们立刻就来，因为腿开始发痛了。一定是肿的关系。

我们干得满顺手，这时却碰上了坦克，他想。不过，幸亏我在桥下的时候坦克没来。一件事出了差错就势必引起不良的后果。人家给戈尔兹发出命令的时候，你就倒了霉。你知道后果如何，说不定比拉尔感到的也就是这一个。不过今后我们会把这种任务安排得好得多。我们应当有轻便的短波发报机。是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我还应当带一条备用的腿儿来。

他想到这里，苦笑起来，又冒起汗来，因为摔倒时被压坏大神经的腿这时痛得厉害。啊，让他们来吧，他说。我不愿意和父亲一样自杀。我完全可以这样做，可是巴不得不必这样做。我反

对这样做。别考虑这个了。什么也别想了。但愿那帮杂种就来吧，他说。我多么希望他们来啊。

这时他的腿痛得不行了。他翻身之后，由于伤口肿大，疼痛突然开始了，他就想：也许我该自杀了。我看要我忍住痛是不太行的。听着，要是我现在自杀，你不会误解我，对吗？你在跟谁说话啊？没人，他说。我看是祖父吧。不。没人。去他妈的，但愿他们就来吧。

听着，也许我非自杀不可，因为，如果我昏过去什么的，我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如果他们使我苏醒过来，他们会问我很多很多问题，酷刑，拷打，什么都干得出来，那就不好了。最好是别让他们干这些事情。那么干吗不马上就自杀，了结这一切呢？因为，哦，你听，是啊，你听，让他们马上来吧。

你干这一个是不太行的，乔丹，他说。干这一个是不太行的。那么谁干这一个行呢？我不知道，我现在也真不在乎了。可你是不太行的。这你说对了。你是根本不行的。唉，根本不行，根本不行啊。我想现在满可以自杀了，你说是不是？

不，不是。因为你还有些事可以做。只要你知道要干的是什么事，你就得干。只要你没忘记要干什么事，你就得等着干。来吧。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吧！

想想走掉的人吧，他说。想想他们穿越树林，想想他们越过小溪，想想他们骑马踏过石南丛，想想他们爬上山坡，想想他们今夜平安无事，想想他们彻夜赶路，想想他们明天隐蔽起来，想想他们吧。他妈的，想想他们吧。他说，我能够想到他们的就只有这么多。

想想蒙大拿吧。我没法想。想想马德里吧。我没法想。想想喝一口凉水吧。着啊。那就跟喝凉水一样。象喝一口凉水。

你在骗自己啦。什么感觉都不会有的。就是那么一回事。什么都不会有的。那就自杀吧。动手吧。马上动手。现在确实可以动手了。动手呀，马上动手吧。不，你得等待。等待什么？你很清楚。那就等待吧。

我现在不能再等待了，他说。要是再等待下去，我要昏过去了。我知道，因为我已经觉得有三次要昏过去，我熬了过来。我确实熬住了。再以后我就没有把握了。我想是你大腿骨折断的地方周围在内出血。尤其是刚才转动了身体。这使伤处肿大了，使你衰弱，使你开始感到昏眩。现在确实可以动手了。真的，我跟你说，行了。

如果你等着，哪怕能顶住他们一会儿，或者只要干掉那个军官，一切就不同了。一件事情干得好，会使——

好吧，他说。他十分安静地躺着，竭力坚持着，因为他觉得生命在悄悄离去，就象你留意到有时雪从山坡上开始悄悄融化一样。他这时静静地说：那就让我坚持到他们来吧。

罗伯特·乔丹的运气仍然很好，因为正在这时，他看到骑兵队从树林里跑出来，跨过公路。他注视着他们爬上坡来。他看到有个骑兵在那匹灰马旁边停下，对朝他骑来的军官呼喊。他注视着他们俩低头察看那匹灰马。他们当然认得这匹马。打上一天清晨以来，这匹马和它的主人就失踪了。

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们在山坡上，跟他离得很近，他看到坡下的公路、桥和桥对面那几长列车辆。这时他全神贯注着，对这一切久久地望了一通。他接着仰望着天空。天上是大块大块的白云。他用手掌摸摸身边的松针，摸摸身前的松树的树皮。

接着他把两只胳膊肘撑在松针地上，尽量躺得舒服一些，手提机枪的枪口靠在松树树干上。

那军官顺着游击队留下的马蹄印策马小跑而来，要经过罗伯特·乔丹埋伏处下面二十码的地方。隔着这距离打枪，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军官就是贝伦多中尉。一接到关于下面那哨所遭到袭击的消息，他们就奉命从拉格兰哈赶来。他们兼程前进，然后不得不迅速调回头去，在上游高处跨过河谷，从树林里绕过来，因为桥梁被炸掉了。他们的马汗淋淋的，喘着大气，他们不得不逼着马儿小跑。

贝伦多中尉注视着那条马蹄印，策马而来，瘦削的脸严峻庄重。他左臂弯里的手提机枪横搁在马鞍上。罗伯特·乔丹伏在树后面，小心谨慎地控制着自己，免得双手发抖。他等待着这军官来到松林边第一排树和绿茵茵的山坡相会的地方，那儿照耀着阳光。他感到自己的心脏抵在树林里的松针地上怦怦地跳着。

海明威和他的《丧钟为谁而鸣》

一九三六年初秋到一九三九年春的西班牙内战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今天已不大为人们所提及。然而它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德意法西斯政权之间的第一次较量。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进步力量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以文学形式来反映这一页历史的作品为数不多，而今天尚被人推崇、广泛阅读的恐怕就只有这一部《丧钟为谁而鸣》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

一九二九年席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恐慌，对经济落后的西班牙打击极为沉重。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共和党、社会党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于一九三一年四月组成联合政府，建立了共和体制。当时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其中以推行温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势力为最大，而无政府—工团主义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年轻的共产党不得不在对这两股势力作不断斗争的情况下逐渐成长起来。

共和国初期，执政的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不能坚决贯彻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而逐渐被右派政党组织占了上风。一九三三年秋，右派政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倒行逆施，工人以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来回答，农民也展开了夺地

运动。西班牙共产党纯洁了队伍，建立了以伊芭露丽等为首的
战斗的领导班子，迅速壮大起来，在第二年十月各地工人总罢工
及武装起义中起了骨干作用，但结果被政府的优势兵力所镇压，
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一九三五年，人民阵线在法国大选中获
胜，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之下，西班牙进步势力各派克服了分歧，
团结起来组成人民阵线。共产党又转为公开活动，积极参加人
民阵线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二月国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在
四七三席中得到了二六〇席，着手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只得
了十四席，因此总理和各部部长基本上由左派共和党人及社会
党人担任，成分复杂，矛盾不少，这是导致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阴谋叛乱。西班牙的军
队一向掌握在贵族地主资本家的子弟之手，共和国成立后，仅仅
要求他们宣誓对之效忠，没有改组。因此，佛朗哥将军于那年八
月十四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立刻得到各地驻军及法西斯
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的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北部及西南部，
使位于全国中央的首都马德里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中。一开始
形势就对共和政府不利。

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早就和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独裁政权
勾勾搭搭，这时德意两国公然以飞机、大炮、坦克等军用物资源
源不绝地支援佛朗哥，并派教官及军队参战，残酷地屠杀西班牙
人民，激起了进步人类的公愤。但英法等国却对希特勒采取所
谓的“绥靖”政策，害怕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会影响自己国内
的政局，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对西班牙实行可耻的封锁。以
各国共产党人为中坚的工人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
纷纷以实际行动来声援西班牙人民，把共和政府的事业看作全
体进步人类的事业。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有的志愿参加医

疗队，抢救伤员，有的直接参加作战，如著名的国际纵队，在第一年冬季马德里保卫战中，和英雄的首都军民并肩作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不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英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尔夫·福克斯及克里斯托弗·考得威尔。其他在内战期间亲赴西班牙的知名人士有白求恩大夫、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斯、智利诗人聂鲁达、苏联作家爱伦堡等，而本书作者海明威也是非常活跃的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意大利北部前线经受战火洗礼并受了重伤的海明威，对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感到幻灭。战后，于二十年代初在巴黎从通讯记者成为专业作家，在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中，形象地刻划了一些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战争创伤的英美青年男女，浪迹巴黎、西班牙等地，在酒吧间、斗牛场等等场合寻找刺激及解脱。海明威就此被公认为这“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著名作品《永别了，武器》写主人公不堪忍受战争的残酷，毅然向武器告别，做了逃兵，和爱人逃到风光旖旎的瑞士，过着田园诗式的生活，但好景不常，爱人在难产中死亡，使主人公不得不向爱人的怀抱告别。作者表达了强烈的反战立场及对人生命运的绝望态度。

但是时代在前进。经济大恐慌激化了阶级矛盾。三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高潮。不少有良心的作家通过思考，开始向左转。这时海明威早已回国，因不喜欢跟纽约等大都市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定居在美国东南端佛罗里达州南端的基韦斯特岛，和古巴首都哈瓦那仅一水之隔。他出入于那一带海滨小酒店、码头等场所，经常和渔民打交道，观察社会众生相。他

笔下的人物开始起变化，觉悟到“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以基韦斯特岛和哈瓦那为背景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中主人公亨利·摩根语），这反映了他本人的转变。

这时西班牙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海明威二十年代初任驻欧通讯记者时，就和西班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爱上了这片浪漫的土地和热情的人民，尤其爱上了斗牛赛。他在作品中歌颂这种在死亡面前无所畏惧的斗牛士，充分体现了他提倡的“硬汉子”精神：人终有一死，但不能死得窝囊，在紧急关头要保持尊严和体面。他精通西班牙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于一九三二年发表了关于斗牛和斗牛士的长篇专著《午后之死》。当法西斯魔爪企图扼杀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成果时，海明威挺身而出，写文章，作讲演，挾伐法西斯主义。他以记者身分于一九三七年初来到被围困中的马德里，借了钱买救护车支援共和国政府。他出入佛罗里达旅馆和乐爵饭店，广泛接触政府军人士、国际纵队的军官、各国记者和普通的西班牙士兵。第二年，为影片《西班牙大地》撰写脚本并发表了他唯一的剧本，以马德里为背景的《第五纵队》。由于缺乏武器和粮食，加上内部敌对分子的破坏，政府军的防线于那年年底被叛军突破，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不得不放弃东北部滨地中海的大城市巴塞罗那，二月底，英法即迫不及待地承认了佛朗哥政权，英雄城市马德里终于在三月底陷于敌手，人民阵线的政府就此被葬送了。

海明威这时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的庄屋里开始埋头写作《丧钟为谁而鸣》。该书于第二年问世，得到批评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

这是海明威篇幅最大的一部小说，但全书情节局限于三天

之内(一九三七年五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写得紧凑非凡。那时候，由于三月中政府军在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城附近大败意大利侵略军，首都已转危为安。戈尔兹将军这时正准备在首都西北向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山上防线发动进攻，为了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派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到敌后深山中和游击队接上关系，等战斗一打响，炸毁一座铁桥。本书即从老向导安塞尔莫带乔丹到桥头哨所侦察写起，接着两人就向游击队的营地进发。老人唤来了小组头头巴勃罗，乔丹和他立刻进行了交锋，矛盾就一步步展开了。巴勃罗当年原是马贩子，给部队和斗牛场供应马匹，后来在斗牛场做帮手时结识了和斗牛士菲尼托同居的比拉尔，菲尼托被牛挑伤死去后，她跟巴勃罗待在一起。革命爆发时，巴勃罗率众在家乡小镇包围了民防军的兵营，逮捕了所有的法西斯分子，把他们都处死了。三天后，遭到反动军队的反攻倒算，撤至深山中打游击，一年来，袭击了几次敌人的据点，炸了一次火车，弄到了几匹马，开始酗酒，意气消沉，只求能在这山区混下去。他得悉了乔丹的来意，当场提出他所谓的狐狸的原则：要在一个地区待得下去，就只能到别的地区去活动，不然会被敌人赶走。比拉尔是个直爽热情的妇人，和几个苦出身的斗牛士生活过来，多少尝到了些人间的欢乐，因巴勃罗当初富有男人气概而倾心于他，但如今年近半百，看他堕落成个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胆小鬼，心里非常懊恼，和那些苦大仇深的游击战士一样，正苦于无法为他们所热爱的共和国作出贡献。在这节骨眼上，共和国派来了爆破手。当晚大家聚集在山洞里，比拉尔带头反对巴勃罗，赞成炸桥，大家一致表态支持她，她豁出来说：“这里我作主。”在这剑拔弩张的关头，乔丹不由得伸手按在手枪上。巴勃罗屈服了，但后来出尔反尔，处处

只从他个人的安危出发,乔丹不得不在比拉尔和大家的帮助下,克服了他的破坏活动以及敌机敌骑兵的干扰所带来的困难,于星期二早晨及时完成了炸桥任务,但不幸以身殉职。

海明威发挥他独特的叙事艺术,以细致入微的动作描写及丰富多采的对白,紧紧环绕着罗伯特·乔丹的行动,一气呵成地把这故事讲到底,同时,插入了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及回忆,使这个主人公的形象非常丰满。这位美国蒙大拿大学西班牙语系的青年讲师,十二年来,常常到西班牙度假,寻访名胜古迹,走遍了全国,对西班牙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痛恨法西斯主义,一九三六年夏,向校方请了一年假,志愿赴西班牙,怀着“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反对所有的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他投入了马德里保卫战,后来转到西部敌后搞爆破,炸火车和铁桥。他从小受他祖父,南北战争中的北军骑兵军官的熏陶,爱好军事,自以为在西班牙干得不错,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星期一清晨突然出现敌骑兵巡逻队时,他能沉着应付,领导大家布置阵地,排除险情。雷管和引爆器被巴勃罗偷走后,他想出用手榴弹引爆来解决问题。但他毕竟入世未深,不脱书生本色,因此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落后现象的态度有时不免有些偏激。当深夜得悉引爆装置被盗后,回到睡袋里,跟自己大发脾气,怨天尤人,把巴勃罗和所有的西班牙人都骂到了,活象个任性的孩子。作者还特意在书中加上一段爱情插曲。乔丹头天下午到达营地,小姑娘玛丽亚端来饭食时,两人彼此就产生了好感。这苦命姑娘亲眼看到父母亲被民防军枪杀,自己随后被长枪党匪徒们铰掉了头发,然后被糟蹋了。后来被解往南方,半道上火车被炸,比拉尔吩咐把她带回营地,做了她的保护人。老于世故的比拉尔知道只有真挚的爱情才能治疗

玛丽亚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她成全了他们俩。乔丹那年轻的心灵渴望着爱情，想不到在这奇突的环境中找到了。他明知道这次任务艰险，而且认为“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关系不大”，然而这一来使问题复杂化了。他憧憬着和玛丽亚一起到马德里度假，甚至战后带她回蒙大拿，做他的妻子。作者通过乔丹的内心独白，淋漓尽致地探讨了生与死的问题，个人幸福与人类命运的问题。凭着坚强的政治信念，乔丹胜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当炸桥后撤离现场时，他不幸受伤，折断了大腿骨。他不愿带累同志们，决意独自留下，想起和玛丽亚两情缱绻时，感到心灵沟通，合二为一，这时就坚决劝姑娘跟大家一起撤走，因为这是她的责任，她走就等于他们俩一起走。乔丹一心以集体利益为重，要求最后走的游击队员把那支子弹剩下不多的机枪留下，因为其他那两支能弄得到子弹。他独自等待敌人前来。当屠杀另一个游击小组的刽子手，骑兵军官贝仑多中尉终于露面时，他激动地感到心脏抵在松针地上怦怦地跳。乔丹以他最后的一些行动深刻地体现了本书的题旨：人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每个人都包孕在人类之中。

作者在本书中还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西班牙人的形象，其中着墨最多的为比拉尔和巴勃罗。比拉尔热爱生活，热爱共和国。她爽朗泼辣，嫉恶如仇，眼看巴勃罗一天天沉沦下去，恨铁不成钢，冲着他就骂“醉鬼！”乔丹长得壮实，生气勃勃，她一见就打心眼里喜欢。她看出玛丽亚对乔丹的爱意，就要求他爱护这姑娘，炸桥后把她带到共和国去。她全力成全他们，但看到他们相亲相爱，不禁有些妒忌。她缅怀自己过去的好时光。她自称曾和西班牙三个收入最少的斗牛士生活过九年。当年轻的游击队员轻蔑地说菲尼托没什么了不起，患着肺病，长得矮小，本来

就不该做斗牛士时，她沉不住气了，满怀激情地讲述菲尼托这苦孩子如何为了出人头地，发愤苦学，好歹当上斗牛士的经过。她当他孩子似地疼他，一直侍候到他悲惨地死去。她巴不得到共和国去，为此和乔丹争吵。多亏她的帮助，乔丹完成了任务。

巴勃罗当初拿下了民防军的兵营，亲手枪杀四个俘虏，后来组织群众，在广场和镇公所内把逮住的二十多个法西斯分子都活活打死，做得未免太过分。但内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干下的暴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例如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纳粹飞机疯狂地屠杀了西班牙北部滨海小城格尔尼卡的几千手无寸铁的平民，毕加索为此创作了巨幅油画，向全世界控诉敌人对他祖国的暴行。出于对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巴勃罗当年的作为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当他在山中待了一年，滋生了苟安保命的思想，他竟拿了乔丹的爆破装置出走，但又舍不得自己的人马，才到别的小组去招了五个弟兄和五匹马，及时赶回来。乔丹炸桥后，巴勃罗带那五人拿下了公路下段的哨所，但在向断桥靠拢的半途，他返身一梭子杀了那五人，为了把那五匹马给自己人骑着撤走。小私有者的思想使他干出了丧天害理、背叛革命的行为。

另一游击小组的领导人，“聋子”圣地亚哥，和巴勃罗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乔丹找他谈时，他语重心长，实事求是地摆了情况。当他知道事后撤走时马匹不够，就二话不说，主动地连夜去搞马，哪知偏偏雪停了，敌骑兵巡逻队追踪他的脚迹，把他和四个部下逼到一个山头上。他们据险固守。“聋子”机智地诱敌暴露自己，杀了一个军官，但最后被敌机炸死在山头上，被敌人割下脑袋回去报功。老向导安塞尔莫心地善良，杀了敌人也感到内疚，想不出战后该怎样来赎这份罪，因为对天主的信仰已经被否定了。作者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天

主教对西班牙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对安塞尔莫来说，与其说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无法磨灭，还不如说是这无邪的心灵在被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所折磨。最后炸桥时，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被碎铁片击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引爆的电线。乔丹痛心地说，如果用引爆器的话，这个好人是不致牺牲生命的。除了比拉尔，全书中只写了一个女人：玛丽亚。她生性温柔，天真无邪，和比拉尔适得其反。身心受到了粗暴的摧残，她遇到了乔丹这样的好人，毫无保留地以身相许。听到了“聋子”手下的青年哨兵华金的悲惨家史，她接着他说，“我把你当哥哥，……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乔丹感动地也搂着他说，“我们都是兄弟。”她告诉乔丹，她父亲喊着“共和国万岁”被枪杀，她母亲接着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而从容就义。想到此事，乔丹吻着熟睡中的玛丽亚，小声说，“我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在斗争中，乔丹和这些普通的西班牙人民打成了一片，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海明威用这一系列感人肺腑的小故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同仇敌忾地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历史画面，奏出了一支人类兄弟情谊的赞歌。

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到我国和欧洲当战地记者，在欧洲时屡次亲身参加战斗。一九四六年初回到“了望农场”，声称正在写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但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自杀身亡，没来得及定稿。在他晚年发表的两部小说及由他妻子发表的两部遗作中，只有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年）博得了一致的好评，并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1954年）。从海明威所有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罗伯特·乔丹说自己不是个马克思主义

者，而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所以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未必正确，这是该由作者来负责的。但是，从《永别了，武器》中在不正义战争中幻灭的美国青年军官弗瑞德里克·亨利，到《丧钟为谁而鸣》中为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的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再到《老人与海》中在墨西哥湾一叶扁舟上单身和大自然搏斗的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海明威的主人公”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小我到大我再回到小我的心灵探索过程，而《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作者本人投身有关人类前途的大搏斗的见证，可被看作他的代表作而无愧。

吴 劳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